《汉译大众精品文库》历史类

重组的世界

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

[美]乔治·布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著
胡发贵　胡传胜　陈　刚　朱　珊　译

A WORLD TRANSFORM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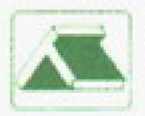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历史类

精品 汉译

重组的世界

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

[美]乔治·布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著
胡发贵 胡传胜 陈 刚 朱 珊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美)布什,(美)斯考克罗夫特著;胡发贵,胡传胜,陈刚,朱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书名原文:A World Transformed

ISBN 7-214-02773-9

Ⅰ.重… Ⅱ.①布…②斯…③胡… Ⅲ.世界史:现代史-大事记-1989—1991 Ⅳ.K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4090号

书　　名	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
著　　者	[美]乔治·布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译　　者	胡发贵　胡传胜　陈　刚　朱　珊
责任编辑	李　幸　杨　健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盐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9　插页6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200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773-9/K·422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20世纪最激动人心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些大事都发生在1989—1991年的短短几年间。这些形形色色的事变，都可归结为本世纪最后的大对抗即冷战终结的产物。本书是我们个人对于这些事件的理解。其内容不是一种回忆录，也不是布什政府的编年史，更不是其外交政策的回顾。我们更愿意将历史交给历史学家，而我们的看法只意在为人们了解那些影响了一个新世界性质的决策提供一个视角。

在我们的四年任期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一一描述它们一个单卷本难以充分胜任。我们以为本书要是面面俱到的话，则意味着一无是处。因为那样的话，我们要不得不去撰写多卷本的数千页的书(有一个时期，我们似乎必须这样写)，要不就是肤浅的罗列汇总历史现象。我们决定聚焦于冷战结束，即1989—1991年间最重要的事变，如德国的统一、“沙漠风暴”、苏联的解体以及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等重大历史现象。

收缩我们的视野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因为略去的远比写入的多，而我们又不得不这样做。我们省略了拉丁美洲的变革、巴拿马行动，还有重新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我们也没有囊括1993年的重大政治事件，如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发生的冲突。本书最明显的缺陷是未涉及

军备控制。虽然军备控制一直是美苏关系的核心问题(在很多年里,如果说它不是两国间惟一的政治对话的主题,也一直是主要的话题)。但因为这一问题是如此恼人地复杂,而目前也只有裁军专家们关心它,故我们只附带谈了谈这一问题。在内容上我们不选择专业性强的内容以困惑读者。最后,本书也涉及一些美国国内问题,当然只有当这些问题和外交事务密切相关,尤其是当它牵涉到议会决议时,我们才写入书中,然后我们还简要地解释一下这种相关性。本书的主题在如此多的限制下,我们反倒觉得可以写出有点特色的东西——更富个性的、更有深度的关于那些被浓缩在短短三年里的历史嬗变的真相。我们想给读者一个机会去重温那些生死攸关的决策,以及我们两人在白宫拍板那些决策时面临的挑战。

本书主要以第一人称、以三种方式来叙述。对事件和决策我们两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行文时在段落上标上各自的名字)和思考,对其意义也有各自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对发生事件的概述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进行(行文中以相应的人称标示出),对已然的事实则综述其来龙去脉以及其演变的轨迹。文中的"我们",代表我们两人,广义上也代表政府。对我们个人所见、所思或直接体验的个人感受,我们作了大概的区分,而事件本身则以叙述体写出。在苏联、中东或德国问题上,我们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我们并不想在这些问题上下结论;本书的叙述只表现了一种"宏观的鸟瞰",并非是一种精确的历史。本书也无意低估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在白宫制定和执行政策与决议时的不懈努力。

我们在小心翼翼地重新勾勒我们的历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大体上都是原始的(最初的)。我们深入地查阅了位于得克萨斯州农业和机械学院的布什总统图书馆(其间藏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数千件原始文档)所藏的大量文献以及总统个人日记、记事簿、信件和其他直接的资料。也有一些小的例外,有时我们很难理出头绪,除

去逸闻轶事的传说，记忆中什么也找不到；但本书没有臆造资料，也没有引用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谈话材料。不过这并不是说本书就没有问题。我们倚重"谈话记录"，它包括电话交谈和个人间的会谈。我们的谈话由职员笔录下来，即使是近乎完美和几乎逐字逐句地记录，也并不总是完善的，有时候一位官员被问及一个问题，而翻译滞后，或者好几个人同时发言，记录就难以面面俱到。在很多情形下，我们两人同时或一个自己做记录，我们一直以此来弥补官方文献的不足。在布什总统和外国领导人"一对一"的单独会谈时，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几乎总是美方的记录员。这使我们自信，如果说它不总是完善的话，记录的内容是准确的。

我们实质上回避了一切"第二手"材料。不过事情的演变有时是难以把握的（而且坦率地说，偶尔会扰乱"最初的线索"），因此原始记录对于作者也可能是无用的。我们确实引用过菲利普·泽里科和康杜利兹·赖斯的研究，他们在我们之前完成了其优秀的著作《德国的统一和欧洲的重组》。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雇员，他们的论述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其著作还触及了美国和国际事务方面的原始资料。基于这些原因，在讨论有关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我们借鉴了他们的研究以补充我们的记忆。

由于大多数我们参引的文献仍然不对学者们开放，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指明出处。书中大多数引用的资料，不管怎样都是不需证明的，如在某一天和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的会谈。总统日记是种特殊的材料。依据一次有趣的经历，他写下他的随感，它既未被预期为（也不是）无所不包的，也不曾想成为其政治生涯的正式记录。部分总统日记被收入本书中，但这不能说明总统的大量文案辛劳只意在出版——或者只是为了获奖；不过在收录时，只是在有些地方对日记的语言作了轻微的修改，个别的只是为了清楚起见。

布什政府实现了一个民族自1950年以来一直追寻的目标，为此目标很多美国爱国志士献出了他们的毕生精力。罗纳德·里根政

府逼近了这一目标：东欧人民的自由与消除对美国的致命威胁；而正是有了哈里·S. 杜鲁门的遏制政策及其后来历届政府的坚持，我们才有可能赢得最后的收获。当我们入主白宫时，冷战有结束的征兆吗？不，我们没有看见，对结束冷战我们甚至想都没有想过。我们所面临的 1989 年 1 月的世界，如果说不再是完全冲突的话，仍是人们熟知的超级大国对抗的两极世界，但是，仅仅在 3 年间——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冷战结束了。当以推倒柏林墙为代表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出现时，可能最重要的情节则是它们的来临大体上都没有伴随着轰动效应，东欧摆脱了苏联的统治，德国统一以及苏联解体，都没有严重的流血冲突发生。自从一战结束以来，在这些国家中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苏联的诸共和国里，当骚乱使生活无望时，从未有要求在战略均衡上作根本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年结束了几乎3/4个世纪的动荡、极权主义潮流、世界大战和核武器的对峙，其显著标志就是超级大国间的和平合作——即使有时不甚牢靠，而他们对后冷战时代第一次危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反应，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合作，那一时刻预示了人们所希望的新世界有可能会出现。

布什外交政策的长远构想是深思熟虑的，即鼓励、引导和制约变革而避免加剧其副作用和慎用制裁；在短期方面，实际的努力也包括一些基于经验的措施和外交活动。在一个时期，当仇恨和友情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时，东、西方世界的领袖发现，在合作解决诸如德国、伊拉克、欧洲的未来等重大问题方面，他们可以大有作为。历史中的伟力可能会带给世界大灾难，但只要本着友善与谦虚、共同参与的精神，我们就可以制约这一力量，于是也就没有输家，只有赢家，而且为了和平需要更为稳固和长久的友谊。我们避开了另一个凡尔赛的阴影，猜忌的消除赢来了信任的勃兴，冲突化成了合作。我们在书中所描述的是我们所了解与接触过的人物、事件、变化以及美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所起的作用。

译 后 记

我们很荣幸地成为乔治·布什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本书的中文译者。由于本书两位作者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亲历了书中所描述的历史事件，而且还以参加者和决策者的角色，深深地介入了这些事件，故本书有着较好的史料价值，而其间的背景知识和“幕后消息”，也使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当然，作者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看待和分析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世界政治风云的。书中的观点只是他们的一家之言，他们的见解也只是为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参考视角。

本书的时间跨度虽然不大，但涉及的空间范围很广，牵涉到很多国家、地区、机构、人物、专业领域和事件，这在客观上使我们的翻译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加之我们的学识水平有限，因此译文中讹误之处恐怕难免，请读者朋友多加指教。

由于一些原因，我们在翻译时略有删节。

本书为我们四人集体合译。分工如下：胡发贵，前言，第一至第八章，图片说明；陈刚，第九至第十四章；胡传胜，第十五至第二十章；朱珊，第二十一章。

李幸和杨健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辛劳，对此我们深表谢忱。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所

1999 年 1 月

A World Transform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1988年12月7日，任期末的里根总统和当选总统乔治·布什在总督岛欢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来访。



1989年5月20日，布什总统和弗朗西斯·密特朗总统在肯尼邦克波特。



1989年7月16日，在巴黎西方七大工业国首脑会议上，弗朗西斯·密特朗和乔治·布什、赫尔穆特·科尔在开玩笑。



1989年11月24日，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首次造访布什总统，她正享受着戴维营的主要交通工具。



1990年2月25日，赫尔穆特·科尔在戴维营为攀登“赫尔穆特·科尔纪念峰”作热身准备。



1990年6月2日，布什总统等人在戴维营私下里讨论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

1990年6月26日，斯考克罗夫特为赢得“斯考克罗夫特奖”在作最后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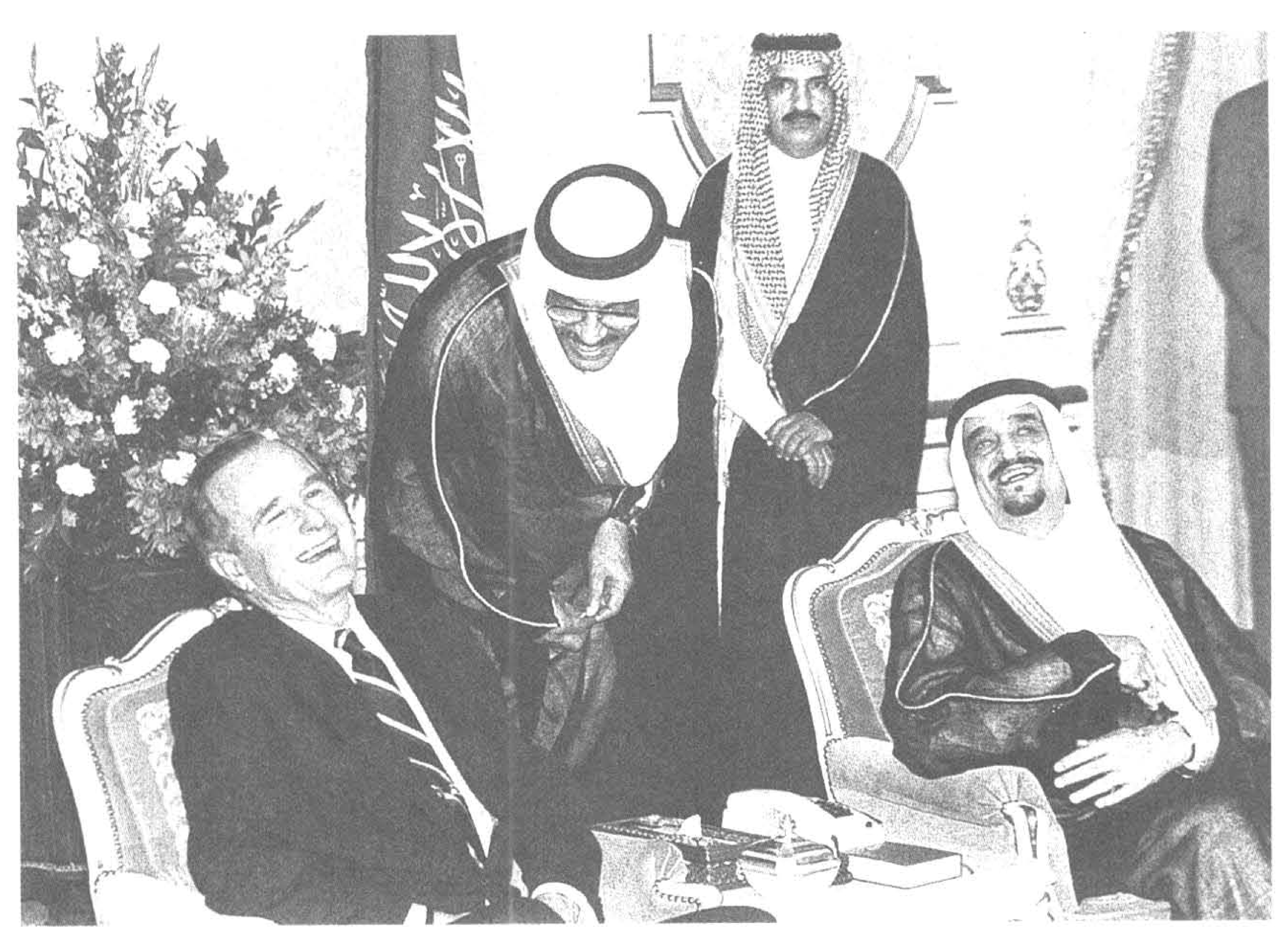
1989年7月11日，布什总统与波兰总统莱奇·瓦文萨在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1990年11月17日，在布拉格哈拉德坎尼城堡，布什总统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克拉夫·哈费尔在交谈。



1990年8月16日，在肯尼邦克波特反伊拉克联盟雏形初现。



1990年11月21日海湾危机期间，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布什总统和法赫德国王共享难得的轻松。



1991年8月1日莫斯科首脑会晤期间，布什总统在苏联副总统盖拉迪·亚那耶夫陪同下检阅一支苏军仪仗队。



1992年6月6日，在白宫的南草坪上，布什总统夫妇和鲍里斯·叶利钦愉快合影。



1992年12月19日，在戴维营，布什总统离职前最后一次会晤好友约翰·梅杰首相。



1993年1月17日，在戴维营的办公室，布什总统和布赖恩·马尔罗尼总理一道注视着顽固不化的萨达姆·侯赛因。

目　　录

第一章 序 幕

乔治·布什

当载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渡船驶过纽约港的灰色海面、慢慢靠近总督岛的海岸警卫队码头时，正在迎候的一小群美苏两国的官员中弥漫起一种紧张的气氛。迎宾区域已大规模地清场，海岸警卫队员与其家人们隔着窗子观望着，热切等待着戈尔巴乔夫迈步踏上这座岛屿，一睹苏联领导人的风采。1987 年 12 月 7 日，这是寒冷的一天。我向前远眺着戈尔巴乔夫，他刚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说，内容是有关未来军备控制的建议。他是为非正式的首脑会晤而顺道拜会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这是他纽约之行的最后一站。

说老实话，我有一点不舒服。自从马丁·范·布朗以来，作为首位在职副总统被选为总统，我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既是将来的总统，又要履行现职。我仅是个当选总统，离我自己的就职典礼还有几个星期，我还没有施政，而同时我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急于想知道我欲对苏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自从 11 月份当选后，我一直努力保持一种低调，我必须小心地将自己的计划与里根总统的区分开，他归根结底仍然在台上，而且很多年里，他一直对我非常关照和友好。我努力避免一切有可能造成损害他权威的事情，如单独会晤外国首脑。我的使命是做一个积极配合的副总统，我曾经、并将继续忠于我的总统。

1985年3月13日我第一次见到戈尔巴乔夫。当时我在莫斯科代表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参加苏联总书记康士坦丁·契尔连科的葬礼。在80年代初期,苏联更换了一系列领导人——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到契尔连科;而为参加他们中每一位的葬礼,我早就不断飞抵过莫斯科。我记得是吉姆,他送给我一句戏语:"你死了,我将飞来。"他以此来形容我的这些旅程。虽然丧事难免阴沉,但我发现它们也是种外交良机。国家葬礼使各国领导人得以非正式地会晤,此外,这些场合也使我们有机会结识新上台的政要。在当时,克里姆林宫里最高当权者很高的死亡率,使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个人情况所知甚少,因为我们刚熟悉一位,他却走了。

契尔连科的葬礼结束后,我们的代表团,包括国务卿舒尔茨,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官方会客厅,房子是常见的那种线条僵硬、高穹顶、装饰华丽的风格,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接见了我们。我在拍给里根总统的电报中记录下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电报所用的词语既有时代的痕迹,又含有冷战的猜忌,但是我觉得在我的记忆中电报的内容也暗示了(可能没明写出来)即将到来的事变:

> 戈尔巴乔夫将会比其任何(我重复"任何")前任更有效地组合苏联阵营来对抗西方。他面带友善的微笑,眼神温和,他有一种在处理不愉快问题时能迅速转向和对话者形成真诚交流气氛的迷人风格。
>
> 他也能够非常坚定。如:当我专门提出人权问题时,他打断了发言而折回到老一套的、我们以前听腻的喋喋不休的空话,他引证说:"在美国国内,你们并不尊重人权",或者(涉及非洲裔美国人)"你们粗暴地压制他们的权利"。但结果却是这样:"我们将准备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和"让我们友好协商来探讨这一问题"。其要旨如下:

“别在人权问题上给我们上课，不要攻击社会主义，而让我们就各自的问题进行讨论。”

数年后看这些文字，觉得它们几乎是在随后几年里美苏关系解冻的指南。我们应谈透问题，不让它们妨碍进展。或许我们在1985年没有注意到，但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的迹象。会晤结束后，舒尔茨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其间他告诉戈尔巴乔夫，里根总统有意与苏联领导人订立私交，舒尔茨说得恳切而冷静。虽然经过翻译，不过可以明确看出，戈尔巴乔夫当即以同样的“人对人”的诚挚作了回应。或许他不是一位像他的前任一样，一味将自己隐藏于老一套空话中的领袖。

后来当他于1987年12月对华盛顿作国事访问期间，我对戈尔巴乔夫更添好感。当我在苏联大使馆见到他时，我们讨论了即将开始的总统选举。我可以肯定他不想将自己卷入一场美国的选举，但我有种感觉，即如果我赢得选举，他不会不高兴。我猜测他希望在军备控制、地区事务方面的合作以及促进苏联的开放与改革等方面，里根政府期间的政策将保持不变并继续下去。

我告诉戈尔巴乔夫，不要在意“放空炮”，在选举期间他会听到此类高调。我还对他解释了这一词语的意思。在被用于抨击美国的政治宣传以前，这是中国领导人使用多年的格言，我想它是毛泽东的专利。他们说：不要在意牛皮大话，而要看其所作所为。我对戈尔巴乔夫说：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活动，在关于美苏关系的所有看法上，将会充满了强硬的言论，你不要对它们太认真；我还告诉他，我正着意思考去更新我们两国间未来的关系。

那天的一件小事，使人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家的老练。我们计划从苏联大使馆共乘一辆轿车到白宫，他来迟了一步，但他对此似乎并不在意，而是热情地邀请我进他那辆“坦克”(防弹轿车)与他同行。当我们开进时，人们夹道欢迎——美国人等待着看

上他一眼。在一个地方我告诉他，我希望他费点时间停一下，向人们说几句话，他会受到欢迎的。片刻后，这辆防弹轿车呼啸着停了下来，因为戈尔巴乔夫突然令司机将车停在路边。当他走进惊讶和激动的围观人群，向他们挥手并用俄语问候他们时，美苏双方的保镖才冲过来，站好位置。这是一幅动人心魄的画面，对他来说更是兴奋万分。他回到车里，因观众的热情感染而显得兴奋不已。

在随后的访问期间，我也明白了他妻子赖莎的为人。在苏联大使馆，戈尔巴乔夫举行答谢宴会时，我坐在她身边。那天晚上进行着一个又一个庆典礼仪。在一道佳肴后，一位奔放的俄罗斯歌剧演唱家出现在餐厅的另一头。她技艺精湛，但并不很漂亮——我以为这一评价可以经得起任何客观的检验。为了努力给过于沉闷的晚会添加一点轻松气氛，当这位歌唱家开始唱她的最后一首歌时，我侧向赖莎说："我想我坠入爱河了。"赖莎愣了一下，然后严肃地盯着我，严厉地回答说："你最好不要，请记住盖里·哈特！"她显然对前任参议员的麻烦作过用心的了解。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选拔期间，这位参议员为此麻烦吃过苦头。我注视着她的眼睛，看她是否在玩噱头，但是不是，我想她是认真的。

现在，一年以后在总督岛，我以新的身份在苏联宣传攻势正盛时，会见了戈尔巴乔夫。这一次他抓住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可能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其内容和风度都使人倾倒。很明显，他喜欢那种故作姿态的小伎俩。这是一场鼓舞人心的演说。戈尔巴乔夫宣称：威胁和使用武力不再是外交的手段；他保证要将苏联的军事观念转移至低调的防御姿态，并将在两年里单方面裁军 50 万——这相对于其总兵力，是个小数，但是个好兆头；他还宣布，到 1991 年，好几个装甲师将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东德撤回并解散。当他向主席致辞时，我伸长脖子恭听他会再说些什么。

面带开心的微笑，戈尔巴乔夫从摇晃的渡船里走出来。他身

穿一套时髦的灰色制服，系一条鲜红的领带。在里根总统简短的致辞后，我有点不自在地在船坞欢迎他们，不一会儿，我们就拐进一座楼里。还有一个半月任期就将届满，这可能是里根总统与他一直所尊敬的人的告别会见。对戈尔巴乔夫，里根总统感到由衷地喜爱和融洽。里根已使美苏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打破了神话，他坚决拒绝针对苏联的一切，而苏联领导人也不再视他为一位不可信任的冷战专家。

我们的会谈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谈，议题既有新的，也有老的。我很少说话。在一个问题上，里根问我有无任何想补充的，我说我希望继续推进他和苏联领导人已建立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但已达成的协议是必须遵守的。戈尔巴乔夫说他明白。对他来说，我们之间关系的前景是光明的，有许多事情他和我可以一块儿做。他希望我考虑其可能性。

为避免繁琐的解释，我声明大体上继续里根的苏联政策。我告诉戈尔巴乔夫，我要组成一个新班子。我无意给事情设置障碍，但我理应要形成我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我这个班子将由这样的成员组成：他愿意推进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在尼加拉瓜（苏联一直援助它）问题上获得突破，那么这将有益于军备控制以及其他一切问题的谈判。他没有回答，对美苏关系的未来他也没有提出任何他自己的看法，只是模糊而笼统地提及，他希望事情如已经发生的那样继续下去。

苏联一方有一位叫安纳托利·杜布尔耶林的，我熟悉他，也喜欢他。他曾任苏联驻美国大使20余年，现在是戈尔巴乔夫的特别顾问。一次会谈间隙，戈尔巴乔夫走近我，说如果我想以秘密的方式将任何特别的信息带给他，我可以用安纳托利。想想当时在场的有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中央委员会书记亚历山大·亚科夫勒夫、现任大使尤里·杜比宁以及其他一些要员，我非常惊讶戈尔巴乔夫成竹在胸地任命杜布尔耶林作为他认可的“幕后渠

道”。在印象中，我想他是发给我一个他急于改善美苏关系以及想和即将作为总统的我加强联系的信号。这也是一个好兆头。

会见中戈尔巴乔夫仅红过一次脸。很容易察觉，当他小有不快时，他的眼睛闪闪发亮，脸涨得通红，嘴唇紧闭，并有点失望地耸耸肩膀。后来，当我更了解他时，我觉得他会故意在一次发言中添加点怒色，以更为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但在总督岛的会见中，当里根无意问及他有关改革和整顿的情况时，他真的发作起来。戈尔巴乔夫带着认真的表情回答说：“你完成了你必须完成的一切改革了吗？”我想他是把里根的提问误解成批评了，因为后来当我们谈及我们希望看到苏联改革成功时，他明显缓和下来，他的好心情又回来了。

在和美国讨论问题时，很多外国领导人都有一种不满，因为人们有种成见：美国习惯于夸大自己的成绩而同时却蔑视别人，以为别人非常落后。确实，我们的所作所为经常是在教训人家，并和别的国家在诸如人权等问题上公开地冲突。有鉴于此，在和外国领导人或外交官员讨论他们的国内事务时，我留心自己的方式方法。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我们对人权的执着，但我避免成为一个炫耀学问的教师。在人权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似乎觉得里根是在代表某些西方“分子”在说话，而据戈尔巴乔夫所见，这些人希冀他的改革失败，并指望苏联陷入混乱和萧条。

第二天可怕的地震重创亚美尼亚的消息使戈尔巴乔夫缩短了他的访问日程。地震至少使5万人死亡，50万人无家可归。因其后果的极为惨重，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政府首次准许外国援助。“美国爱心会”是由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鲍勃·迈考利发起的一个出色的救济组织，鲍勃是一个真正富有同情心的人。“美国爱心会”计划运送一飞机医药物资到埃里温。迈考利来电问布什家族是否有人愿意参加这次飞行，他认为这一做法对苏联人民有着意味深长的意义。

我的儿子吉布以及他的12岁的儿子小乔治答应去，虽然这意味着要在圣诞节离家出远门。他们的任务是帮助下货，事毕后他们被那里的一支欢迎队伍迅速接走。他们访问了一家医院，然后在一个小教堂里作圣诞祈祷。被所见所闻深深触动的我的两个孩子，都哭了。后来，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吉姆·贝克都想告诉我，当布什的家人——父亲和儿子——哭泣时，它将这样一个强烈信号传遍全苏联：美国人民真诚地关心他们的灾难。在我们两国人民的彼此了解中，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新的迹象。

总督岛的首脑会晤后，在华盛顿海军气象台的副总统官邸，我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的尚未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交谈过一次。我告诉他，我想采取一些重大步骤来推动和莫斯科的关系——这不仅是为了呼应戈尔巴乔夫最新的建议，也是大胆改革的举措，这将加强美国在影响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根本性变革的良机。虽然我难以预见在未来的四年中会发生哪些重大的变革，但我相信，如果戈尔巴乔夫推行其改革并兑现其改善对美关系的承诺，我们就有一个获得重大突破的机会，特别是在军备控制问题上。

回应戈尔巴乔夫的提议也是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我知道他的提议会吸引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在欧洲，戈尔巴乔夫是位妇孺皆知的人物，人们为他的新建议而欢欣鼓舞。他的演说迫使我们正在组建中的政府要加速完成，并且还要提出我们自己的对策，以迎接他的挑战。我不想让人觉得我跟不上戈尔巴乔夫的节奏而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故意不与他合作，而且我确实也不愿作出一个愚蠢的或短视的回应。

较之新政府里的其他成员，我比较信任戈尔巴乔夫。我想，就如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曾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位我可以信任的人。深入地了解他后，我觉得他是真诚地希望改进苏联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的。戈尔巴乔夫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位非常自

豪的俄罗斯人，他充满自信。我相信他是一位深感自己有义务改变国家、调整外交政策的人。因此他不会、也不可能从他已发动的革命中后退。我从不赞同那盛行于某些苏联专家中的看法，即戈尔巴乔夫很快就会以一些令我们愤怒的事情来观察美国新政府如何反应。当然，我确实也相信，他正在谨慎地观察我们，看我们是否会转向执行一种比里根政府时期所奉行的政策更为强硬的路线。

回顾我和戈尔巴乔夫交往的历程，我深感它反映了冷战末期美苏关系的演变。我们于 80 年代开始正式交往。正如我描叙过的，当时彼此致辞拘谨地用“主席先生”和“副总统先生”(后来是“总统先生”)；90 年代早期结束了这一拘谨而开始用“米哈伊尔”和“乔治”这种随便而充满真挚友情的词语了(芭芭拉和赖莎在她们的关系中也同样大致经历了这一过程)。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有时是有争议的问题时，彼此信任的增加，对我们双方更为重要和有益。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他，而且我认为在当时的苏联危机中，他可以深切地、完全地信赖西方。如果我们之间富有活力的关系和其他领导人的有所不同，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变化的更为困难的一面。不是说会因此发生战争，而是因为一个统一的德国的性质、或者裁减军备与兵力的进程——更不用说应付波斯湾战争了——毫无疑问有其不确定性，果真如此我们的世界可能就更不安全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和那些先行者之间的一个不同就是，我和戈尔巴乔夫来往的频繁。我和他的来往大概比我的历届前任和他们的苏联对手的都要多。我喜欢这种和米哈伊尔的个人交往——我喜欢他。有多少美国总统能够这样谈论苏联领导人？罗斯福或者杜鲁门这样谈斯大林？肯尼迪这样谈赫鲁晓夫？尼克松这样谈勃列日涅夫？我知道里根也对戈尔巴乔夫有好感——一种真诚的相互感情——但他没能像我一样有机会和他紧密合作。戈尔巴乔夫和我发现我们可以促膝谈心，我们可以讨论世界各种问题，我想我

能体察他的心灵深处。公开和坦率取代了过去的有意无意的猜忌，我们正将数十年黑暗的冷战时期的尖锐对抗，远远地抛弃了。

我们已经知道在过去的50年中，超级大国的关系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此50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苏间的冲突。冷战以及一种可以预见的国家安全的紧迫性，决定了美国观察世界的立场以及我们如何突出我们的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优先性。莫斯科和华盛顿在全球各地、在国际战略的每一个具体方面，都争斗得难解难分。第三世界的独立战争、欧洲的分裂以及联合国的僵化，都是这场持续斗争的部分内容。

在一个已根本两极化的世界里，这些年的历史充满了这两个超级大国或者说他们的代表间的频繁冲突，在柏林(一而再、再而三)、朝鲜半岛、越南、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尼加拉瓜问题以及持续的军备竞赛上。苏联与美国间的协议是一种复杂的讨价还价，我们很快明白其间的一个要素就是要求有耐心和一种求同存异的意识。布什政府期间，在欧洲发生的所有变化，都可归结为下列一系列的事件：从1989年的东欧变革到德国统一、波罗的海危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改组，以及最后苏联自身的解体。

这一猜忌和敌意的环境，充其量滋长了我们两国间不稳定的关系。通观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莫斯科和华盛顿间少有直接的交流——除了在安全和军备控制问题上。这两个大国在有关社会、政府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上，持完全相左的看法。在思想和实践上，苏联固守这样的主张：这两种社会制度不可能永恒地共存。这些差异并非是在舆论交锋中所体现的文化的不同。这些二战时结为盟友之间的敌意酝酿产生于敌对的意识形态因素，而政治方面的紧张则源于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美国第一次碰上了一个对手，它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击美国，并完全可能使它的人民在瞬间遭受无数生命的毁灭、伤害和蒙受灾难；我们几代人从中获得安全感

的海洋,已不再是核攻击的屏障。对我们、对我们的盟友,苏联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指望我们美国来保证他们的政治独立。总之,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能在意志和物力上对抗苏联的国家。我们承担了这一责任和领导的义务。

从1950年开始,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核心,一直是"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统治与流行。这一战略意在阻止莫斯科扩大其势力范围,并以此期望苏联共产主义将最终被转变成一种较少威胁的东西。到1960年末,遏制政策的冷冰冰的冲突性质,掺入了缓和的意念。对美国来说,其基本假设是:两个超级大国与两种社会制度,在最近的未来会共存。因此,我们的政策核心应该是减少冲突的可能,寻求降低紧张气氛和增进合作领域。不过,实践中的长期敌对和猜忌使实现缓和十分困难。苏联的态度和行为顽固而僵化,难以有显著的改变,缓和的外交政策随着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而告结束。

里根就职时,美国政策急遽转向对抗。最初,里根政府在其宣传攻势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苏联视为"邪恶的帝国"。缓和被这一观念所取代:在一个长的历史进程中,拖垮苏联;再通过加大经济和政治压力以加速其最终崩溃。里根的战略是计划在一个优势的位置上与苏联对话。他的中心是放在尽可能给他们施加影响的先进军备上,而并非一味依赖于谈判。在里根年代的早期,两国间没有首脑会晤,当时美国正在重建防务和改进核武器。不过,到了1984—1985年间,由于秘密渠道的沟通,宣传攻势开始弱化,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以及他在1985年的改革,都有助于加速这一变化。令众多里根强硬路线的追随者惊愕的是,里根喜欢上戈尔巴乔夫,并变得相信苏联领导人对改革的承诺是真诚的。里根从一味施加压力转向期待一个可能出现的新苏联,转向和他们做生意,他甚至谈到了结束冷战。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总的说来是里根的苏联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对这一政策施行时的某些方面，我持保留的批评态度。我的感觉是过去对“邪恶的帝国”的宣传过分了，它会吓着我们的盟友，还会使美国对西方的领导更困难。这一严峻时期后将会很快出现另一个极端的岁月，其标志我以为是一种没有保证的假定，即苏联的态度和腔调的改变，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掌权，是东西方 40 年冲突结束的信号。

里根政府乐意宣布冷战的结束，却未能深思熟虑其间的条件，这使我不安。火药味十足的冷战，伴随着复杂的战略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平衡问题，一直时断时续。就我看来，核武器是美国压制苏联战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筹码，也是对他们在常规武器方面巨大优势的一种牵制。因此，我尤其注意 1986 年在雷克雅未克首脑会晤时达成的这种谅解：如果苏联单方面削弱其常规武器的性能，我们可以自愿减少，甚至消除核武器。这一谅解显示里根政府已经忽视了武器控制的战略内涵，转而削减自身的核武器。我以为，这是武断地臆测了苏联的发展方向。

当我们开始新思路时，我感觉我们所冒的风险太大，甚至于可以说，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这一思路难以实施。作为一个国家，在里根政府早期我们犯下了一个过错，即为了在方向上作一基本的改变而扭曲了前进的道路，因此我断定在深思熟虑方面我们肯定出了偏差。我早就有谨慎的名声——这是一种我有缺点的指责。我坚信人们在试图去改变伟大的国家巨轮的航向时，应小心谨慎，因为航向一变，就极难恢复。这是 70 年代早期缓和的严重负面影响。因缓和在政治上有诱惑，而在实际上只是一种战术策略，在公众的意识中，缓和则是美苏关系中一种长远的战略变化。为此失误，在一些年里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冷战的原则、强硬和代价，似乎不再必要了，而美国遏制苏联的决心也开始衰弱。作为这一切的一种后果，至少在部分意义上，莫斯科在诸如埃塞俄比亚、安

哥拉、阿富汗等地区变得更富进攻性。这使里根政府痛下决心，用可观的预算支出来重建现实的理论。如果实行缓和的后果如此严重，我真的不希望我们重蹈覆辙。真正的问题是：为了美苏关系的根本改变，我们会再一次误解苏联的战术变化吗？答案主要在于戈尔巴乔夫，即在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政策是否能被苏联所接纳。

我怀疑戈尔巴乔夫的动机，也疑虑其未来。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新明星。1970 年后的一段时间，当美国略显迟疑时，苏联则在自信地大谈“军事合作”的一种长远变革（按他们的意识形态，衡量这一关系的尺度就是他们判断是否时机成熟到可发动攻势了）。对他们来说，事情开始变糟了。最后几年里，近乎乖张的勃列日涅夫，还有后来不幸多病的安德罗波夫以及病弱的契尔连科，占了几乎整个萧条时期的 6 年或更长时间；与此相反，在里根总统领导下，美国经历了重要的更新。在这些对应变化之外，则是苏联经济的恶化，而到了契尔连科死时，还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政治局中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能创造奇迹的强力领袖是关键。选择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委员们满以为他们并非选择了一个会毁掉这一制度的人，而是选择了一个能使这一制度步入正轨的人。戈尔巴乔夫精明而务实的声誉，加之主要动议越级提升他的人的身份，似乎都坚定了他们的选择，但根本的问题是，难道他们都错了？在 1989 年，我并不认为是这样。

一言以蔽之，我相信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恢复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活力，激活苏联在国内和国外的实力以与西方竞争。在我看来，特别是 1990 年以前，这使戈尔巴乔夫的潜质比他的前任更危险。他的每个前任，因其进攻性的举措而挽救了西方，使西方在不可挽回之前有机会逃出对苏联一厢情愿的险境。在 60 年代，苏联制定的核战略计划打碎了我们的假设，即他们的目标仅是一种有限的或相对的保证核武器的战斗威力。同样在 70 年代，我

们希望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能基本上阻止苏联按其步骤实现战略武器现代化，这一希望遭到苏联新的和更先进的导弹问世的沉重打击。1979年苏联占领阿富汗，终结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目标是有限的看法，这正是苏联领导人时时敲打我们的脑袋以提醒我们注意其侵略野心的例子。

戈尔巴乔夫不同，他试图以温柔之刀而不是暴力来致我们于死地。他不断说些我们爱听的话，提出数量可观的诱人的裁军建议，以在争夺国际公众舆论的战斗中占领和保持宣传上的优势。单方面裁军的雏形包含在其12月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而其军事意义甚微。但他的演说打动了众人的心弦，也使他获得了一片赞许，致使西方处于心理劣势。人人倦怠于冷战，甚至像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这样的领导人，现在也宣布冷战结束了。我的担心是戈尔巴乔夫会说服我们解除武装，而苏联却没有对其军事力量作任何必需的、根本性的压缩。这样，在十数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们将会面对一个比以前更为严重的威胁。

简言之，我想戈尔巴乔夫始终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前途萦绕于心。通过"开放"和"改革"，他努力去复兴苏联与强化其经济，就政治改革本身来说，他基本上对它不感兴趣，他只是以此来作为一种手段，以应付党内欲阻止他进行经济改革的那些人。

戈尔巴乔夫希望，或许也相信，到2000年，他能使苏联低效率的经济接近西方的水平。无从知道，他是否真正懂得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应怎样进行，多大程度上他愿意或能够接受西方的方式，现有的苏联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调整来适应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改革。要抓住改革所面临的问题的内容和深度是困难的，但问题出现时，情形将会比任何人(包括苏联国内和国外的)想像的都要糟。

开放逐渐揭示了问题的真相。西方仅了解和猜测了其间的部分内容。苏联高度集中化的工业和农业的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党的领导人手里,他们就如支配私人财产一样支配它们,将公款塞进他们自己的口袋,伪造产量以应付虚夸的数字报表。其分配制度是落后的,它使庄稼糜烂在田野里,而同时却使城市的人们蒙受着短缺和面对空空的货架。在俄罗斯罕见的寒冷冬天里,燃料稀缺,这意味着短缺对大多数人们来说后果是严重的,尽管事实上苏联有数不清的油田和巨大的煤炭储量。在面对这些困难时,苏联为谋求极端需要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以支撑其日益崩溃的经济,也为遮掩正悄悄进行的改革的负面影响,到 1989 年戈尔巴乔夫试图向西方求援。

令人不安的改革阻力大概已出现,还有一种更为巨大的挑战——即争取共产党支持改革。虽然政府的管理机构存在并支配着权力,但党及其工具确实最终控制了国家,党以人民的名义选举国家领导人。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获得了他的权位。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面对着巨大的源自意识形态、官僚政治、腐败以及对市场经济粗浅无知和偏见的阻力。他清理苏联制度的努力,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危机通过威胁盘根错节的共产党的组织和官僚利益,通过为诸如自由主义分子、持不同政见者、还有每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分子等异己分子,建立维护自身权利的组织提供机会而表现出来。改革公开地划分了两大社会利益集团——党与苏联权贵和军队与工业强力利益集团。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戈尔巴乔夫没考虑到苏联体制对其改革的抵制。他开始以一个相对务实的计划来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并发起了反酗酒、反旷工和反腐败的运动;他还在努力以一种增加消费品产量和质量的积极的促进措施来取代僵化的政策。在我看来,他不可能使党支持

其改革。面对这一事实，戈尔巴乔夫实行民主改革，并用选举作为威胁顽固的"共产党当权派"的一种方法，其实他应该用支持他改革计划的人民来反对他们。他的开放战略，无疑是真诚地试图将体制中的斯大林的恐怖清除，但他却也用此恐怖来对党的官僚体制施压，揭露他们的巧取豪夺。他试图去挽救这一体制，而不是去毁灭它。

不过只要戈尔巴乔夫所作所为符合我们的利益——使事情朝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我赞同乔治·布什谨慎地与其合作。但疑虑和谨慎并不意味着我不愿大胆前进。我坚决相信，现在是改变思维和变革美国对苏联战略核心的基本理念的时候了。我们和苏联有两个主要的关系领域，在我看来有理由会进一步发展，它将为我们构筑最初的发展基础，而且还会增进我们的利益。第一个关系领域在东欧。那里朝向改革的最初变化，将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利用苏联的"新思维"以瓦解苏联对其卫星国的控制；第二个关系领域是核武器与常规武器控制——这里我们将继续进行反复无常的战略武器控制谈判——目的是签订"削减战略武器会谈"(START)协议。此外，还将继续常规武器的谈判。我想这些都是重大裁军的机会，它不仅加强了战略稳定，也削减了莫斯科用来控制东欧的常规武器。我们将不得不熟悉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美苏间极其复杂的各种主张，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不得不考虑苏联眼下的立场是否吻合我们自己的宗旨(此宗旨我们至今尚未建立起来)，特别是关于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应该签订，还要找到最佳途径以利用新的机会来打开东欧的局面。

乔治·布什

1988年秋末，我准备就任总统时，我就考虑过在新政府中哪些人我想委以重任，这些人将负起处理上述问题的责任。我幸运地曾在三位合众国总统手下干过——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德·福特和罗纳德·里根。当我是一个议员时，我观察过林敦·约翰逊，后

来我也远远地观察过吉米·卡特。通过他们的经验我渐渐明白外交事务如何与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相协调，如何与议员合作以及总统职位本身的挑战性。

关于当总统我从罗纳德·里根那儿学得最多。当里根邀请我加盟他 1980 年的选举时，我对他还没什么了解，但我人生中幸事之一是我迅速熟悉了他。他是这种典范：既是一位强力领导人，又仍然是一位谦谦君子，在某种意义上，我以为他是这个国家的表率。他有一些引为座右铭的并反复坚持的坚定的原则，如人人都知道他对诸如税收和苏联问题的一贯立场。对他能解析复杂问题的方法，对他能以透彻而简单的词汇向美国人民阐述他的观点，我非常惊奇。

里根证明，领导并非需要与浮夸结盟。某些人能凭外交辞令领导，某些人则依靠大话，而另一些人则依据其性格和率先垂范来领导。对秘书所起草的故弄玄虚、词藻华丽的演说稿，我从来不满意。我觉得人民会观察我是否努力做一个伟大历史传统的学生，或者只是一个轻浮的卖乖弄巧的人。在一次私人周末见面中，我曾问过里根，他是如何准备他所发表的非常动人的那些演说的。我一直记得他在诺曼底奥马海滩附近，向阵亡将士致辞时所说的话。他告诉我，在精心准备演说词以后，他将反复推敲它们，以使他的一腔激情趋于平缓。这样做后，他发现他在演说时可以抑扬顿挫，而不会在中间出现停顿。我从未掌握这一艺术，我太容易平铺直叙了。

即使我不能像里根那样善于表达，但我明白对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我希望的是什么。我想处理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迟迟不能解决的超级大国间的对抗，我必须去做那些能够使世界更美好、更安全，使人民不再恐惧灾难性核武器的事。虽然在军备控制上，我肯定不懂行，但我准备去以一种将不会减弱我们的核威慑的方法来减少核武器。对我来说，把我的看法对全国作一次重要的演

说是困难的,但我肯定我的做法的必然结果是导向一个更和平的世界,它比试图以华丽词藻来说服人民要好得多。

我也有自己的指导原则和价值观。我从历史、从我父亲柏瑞斯·布什所学到的以及我在美国海军服役时所推崇的,都是大写的这三个概念:"责任、荣誉、国家。"我相信为国服务是一个人的责任,其含意可能不仅是战时服兵役,也是承担使命或公职。我以为设身处地地处理问题是重要的,即要真刀真枪地干,不要只站在一边找碴和冷嘲热讽。对我来说,荣誉和正直两者都是非常宝贵的。越战和水门事件已在新闻界很多人士中造成了一种挖苦的敌意,有人似乎深信所有公务员都可以被收买,或者都不可能说真话,而且他们里外都是不道德的。其结果是不论真相如何,也不论谣言对无辜者是多大的伤害,谣言满天飞。由于这些不和谐的气氛,我觉得我的政府不仅应努力保持,而且也要明确表明最高的道德标准是必要的。我相信我们会成功,我们的政府将由那些忠于职守的人组成。我清楚在我的多年的公务员生涯中,我犯过错误,但当历史学家回顾布什时代时,我希望他们肯定我曾以荣誉和真诚服务于国家。

除了表现出里根总统那样的领袖风范外,我的前任们还在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机构应如何运作等方面提供了许多睿识。我竭力成为一个"二传手"似的总统。我想让主要的外交政策的执行者知道,我要让自己涉及国防、国际贸易和外交事务政策的很多具体内容,但我并非试图去掌握所有的细节以及复杂的行政事务。我计划充分地学习,以使我能够做出有见地而非肤浅的决定。我要真正倚重各部门的专家,在做出最终判断时,要倚重内阁部长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倾听其明智的建议。一个总统必须使自己置身于精英之间,就不会担心授权以人。

同时,强烈的个性也可能在制定和执行决议时产生现实的问题。我目睹过难以避免的个性冲突和无谓的争议,这些都将会纷

纷出现于内阁成员、顾问和阁僚之间。我必须精心构造好新政府中的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以减少出现这些问题的机会。国务卿是总统的主要的执行官员和外交政策的策划者，我对国家安全顾问有着特别的期待，因为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当家人。[1] 我需要一个真诚的顾问，他能客观地向总统反映各个部门内阁成员的看法。如果国家安全顾问博得了大家的尊重，他能解决很多争端。因此，我期望在此两个关键的政治职位上的人，是卓越而又可信的。

我对国务卿的选择，用高尔夫球的术语说是"运气"。詹姆斯·贝克和我的关系可以追溯得很远。在1959年，当芭芭拉和我从米德兰迁移到492英里以外的休斯敦时，在我们的新家乡，吉姆（詹姆斯·贝克）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我们的妻子也成为最好的朋友。在60年代早期，当政界权贵打击我时，吉姆就站在我一边。当我在1970年两届任期届满后卸任众议员而第二次竞选参议员时，他也和我站在一起。结果我被弗洛伊德·本特森击败，但在那次竞选中以及在后来的多次竞选活动中，吉姆给我很多帮助。从我们的政治合作以及很多其他方面的联系包括体育锻炼中，我了解吉姆是个积极而坚强的人。我还亲眼目睹，当他的第一位妻子死于癌症时，他坚强地面对了个人的重大困境。当时，我和他一起在他妻子床边，当她处于弥留之际时，我搂着吉姆。在任何情况下，吉姆都是一位真正的战士，而且总是竭力而为。他的这些品质，在世界各地的无休止的会议中、在"沙漠风暴"的行动中为促进盟军的合作所进行的协调中不断地表现出来。吉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位老练的贸易专家，一位顽强的谈判高手。我知道他总

---

[1]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四个法定成员：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则作为法定的顾问出席，而国家安全顾问也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会对我直接而有说服力地谈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而且我也清楚，我想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另一个信赖的朋友，作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当布伦特在福特手下任此职而我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我曾和他密切合作过；我在当副总统时，他曾供职于多个部门和委员会，这期间我们仍有这样的合作。考虑他已经担任过此职，他可能想要一个不同的职位。我曾简要地试着劝他接受国防部或者中央情报局的职位。但我越想下去则越觉得将布伦特放在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上，对我、对国家都是最好的。对外交事务的透彻了解以及基于过去业绩之上的声望，都毫无疑问地显示，他正是我想要的真正的人选。他并不想凌驾于其他内阁成员之上，或者阻断他们与总统的联系，而且我也知道在出现问题时，他会给我富有见识的忠告。选择他后，我也将给我的内阁和社会各界人士一个信息，即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在决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这是一个新迹象。当我入主白宫时，对这个我想把握的世界，我怀有一种设想，但我从没固定的“十点计划”。在军备控制和国防问题上，布伦特大大弥补了我的欠缺，他很周全地准备好议案，他是一位解决问题的能手。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198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天早晨，当选总统布什邀请我到海军气象台的副总统住所去喝咖啡。当我抵达时，发现吉姆·贝克也在。

我觉得乔治·布什是一位好朋友。我熟悉他，也极为佩服他。我在 1972 年初入白宫任尼克松总统的军事助理时，我们就相识了。当时他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直到尼克松政府结束，我们的交往大都限于内阁会议上。1974 年，当我接替亨利·基辛格担当国家安全顾问时，福特总统任命布什为驻中国的联络处主任。他是第二位任此职的人。联络处是 1972 年随着尼克松中国之行而成立的，直到 1979 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为

止，联络处一直是美国在中国的正式代表。从福特政府的早期岁月起，我们就有了频繁的接触，虽然自布什去中国后，这种接触主要靠电报或电话来进行。

他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期间，我们的关系得以密切发展。我们有一个取笑他的老笑话——他是危机的晴雨表，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经常在周末造访他在缅因州肯尼邦克波特的避暑别墅，他总是电话通知我他要走了。似乎形成这样一种奇异的巧合：他一离开华盛顿，就一定会有危机爆发。所以，无论何时他告诉我他准备去缅因州了，我就会对他大声惊呼，某地又要发生危机了。

我和吉姆·贝克的相识很偶然。自 1975 年起我们就彼此相识了，但那是一种相互开玩笑的最随便的关系。当我们两人在 1976 年设法应付福特竞选的口误时，真是碰上了个不小的挑战。当时，在圣·弗兰西斯科与卡特辩论时，福特竟宣称波兰不再被苏联控制了。接下来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听他这样说时，我都凉了半截。在那场争论后，在“敢做敢为”访谈节目中，我们立即发布消息，称关于波兰没有任何新变化。我当即信心倍增，心想我们大概已避开了一颗子弹了。可是，当我们回到旅馆时，仿佛所有媒体都聚集来了似的，要求予以解释。贝克，作为竞选活动的主管，和我，作为国家安全顾问，面对这群誓不罢休的人而惶惶不安。关键的问题是苏军有多少师部署在波兰。当我们两人努力解释福特所说的话的意思时，累得大汗淋漓。那是一个艰难的夜晚，但它也是一段难忘的合作经历。

13 年后在这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当选总统布什、贝克和我，一起走进卧室后面的小书房里，那里的火炉烧得旺旺的，火苗劈啪作响。因为事先没有通气，故当总统要我作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时，虽然我有准备可能被邀加盟新政府，但此提名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此前的 6 月份，他和我讨论过外交政治战略以及在其

竞选中应该如何表现它。我尽我所能提供了协助，而绝没有任何要“回报”的念头。假设可以选择，我倒愿意干国防部长。这主要是因为我已当过国家安全顾问了。不过，我知道约翰·托尔有意干国防部长，因此，没有任何犹豫，我接受了布什的提议。我认为，在一位总统所应具有的品质方面，乔治·布什堪称典范。能有机会和布什紧密合作，我感到自豪与激动。

乔治·布什

外交队伍中另一位重要成员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对此人选我也心中有数，因为作为福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我懂得了在国家安全机构中，中央情报局局长位置的分量。他不是、也不应是一位政治决策或者执行者，而应永远超越政治，只处理情报。这一角色的惟一例外，我觉得就是作为特殊政治决策的一部分，而关心隐蔽的战线。我从未要求与内阁成员们一样的待遇，而且我坚定地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甚至不应出席内阁会议，除非会议涉及到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当主题从外交政策移开，比如说，转到农业政策时，我会起身离开房间。鉴于此，当我成为总统时，我决定不将中央情报局局长列入内阁名单。

我也坚信我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选，将不会按其他总统选择的模式来物色。每一届新政府都会自动地更换中央情报局局长，这将使本质上专业性很强的一种职业政治化，而此职业被认为是超越政治的。像前任总统们对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样地对待中央情报局局长，除了最特殊的情形外，在一般情形下都是一种好规则。在我看来，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应该招募雇员，招募那些能立即适应情报工作特性的人。当福特提名我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我必须努力工作以避免将政治带入情报局，我的这种担心不难理解。我想我自己的选择要为情报专家们带来一个积极的信号，事实证明这不难。威廉·威伯斯特，他曾在圣·路易斯出色地在联邦法院干过，后来又在里根手下当过联邦调查局局长和中央情报

局局长。他确实干得好，他在两个职位上都曾避开过政治。我请他留任，我相信他会留意于适合国家安全机构的人选。我对此决定从未后悔过。

选择一位国防部长更为复杂。前参议员约翰·托尔列入我的首选名单。约翰是我的一位忠实老友，在进出得克萨斯政界的岁月里，我与他相交已有25年多了。他是一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坚强领导，我曾屡次看见他为一个基于适当国防预算之上的正确的国防政策而奋斗。我对托尔在国防问题上的素养有信心，我只是有一点担心。依我的看法，我想这位意志坚强的人，肯定会和国家安全机构的其他人士相处得不错；虽然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强硬的鹰派，而那些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远比社会所议论的更有理性、更通情达理的人。

当我提名托尔时，我未曾料到批准的过程会是场灾难，它对约翰及其家庭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和侮辱！它也对很多愿意为华盛顿服务的好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历史上，议员或曾任过议员的人，都会受到同仁的尊重，甚至几乎是敬意；我当时肯定，凭托尔在参议院长期工作的经历，他会很容易通过批准程序的。我大致了解，托尔比其他大多数参议员同事都干得好，我从未看见他完不成任务或者在挑战面前退缩。在参议院投票时出现的谣言是一种耻辱。当在3月9日未能最终通过任命托尔的提名时，我对约翰及其家庭非常同情，我自豪的是一直到这场风波平息，我一直和他们站在一起。他是一个好人，像任何人一样，他也有缺点，但从没严重到辜负我对他的信赖，辜负我在他的提名遭到严重挫折时，对他的支持。

托尔的提名在党派的仇恨中被否决后，我忙于迅速找到一个新的、优秀的人来代替。在新政府第一周里，缺乏一位国防部长，将使五角大楼的决策性工作陷于瘫痪，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一位能通过批准程序的人，理想的是一位参议员。我一直以为布伦特担

任此职最合适，但我清楚，我特别需要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我很快决定，如果能说服迪克·切尼离开议会以及他现在的领导职位，切尼将是合适的人选。

切尼不像托尔，他没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委员会里任过要职，但作为共和党议员团领导机关的成员，以及作为“选举情报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他对国防事务有相当的了解；而且，他还曾担任过福特总统的办公厅主任，了解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他享有正直和坚持原则的好名声，同时，他也善于与人合作，他坚强、坚忍和公正。我相信，作为国防部长他会善于并有效地处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关系。他在两院中广受欢迎和尊敬。在托尔的提名被否决不到48小时，我就提出迪克担当此职。他立即接受了。如我所希望的，他很快通过议会的批准，而且如布伦特一样，他将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条。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对于切尼的任命，我很高兴。在福特政府的最初日子里，我就知道他了。当时他任办公厅主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助理。后来，在艰难的1975年10月，切尼被任命为办公厅主任，而同时我成为国家安全顾问，那时，乔治·布什刚从中国回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我和迪克密切合作。他是那种坚强、理智、务实的人，他处理手头公务从不自负轻率，他的到来促进了大家的团结协作。在福特政府期间以及切尼进入议会后，我帮助他介入涉及军备控制以及其他战略问题的研究小组的活动，其结果是较之他从官方委员会获得的信息，迪克对国防问题的知识，明显大为丰富了。

乔治·布什

另一个国家安全方面的要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法律规定此职的任期是两年，阿德米内尔·威廉·克罗的任期刚过一半。因为此职功能主要是参谋而不是决策，故我以为此主席是一种专业公务员，超越于通常的政治压力之外。对此职，我心系克罗，想

让他留任。直到1989年9月底他退休为止,他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支持。

当克罗宣布他将退休时,切尼建议我任命科林·鲍威尔来接替他。我初识科林时,他还是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讨人喜欢,容易与人相处,我们很快成为朋友。他富有幽默感,这帮助我们度过了很多艰难时光。科林虽是位很好的人选,我仍有两点顾虑:首先,我担心提升他太快。将一位资历低浅的四星上将,在其他非常优秀、且资格很老的将军之前越级提升,让我不安。另外,我担心要科林担任此职,对他来说是否为完全正确的一步棋,或许一位老资格的将军更合适些,他日后担任此职仍是年富力强的。切尼很坚定,并说服了我。不用多说,我从未后悔任命他的决定。

科林于10月1日上班,恰好碰上巴拿马贿选危机。几天之内,那里发生了一场反对其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的军事政变,其策划者均是其安全保镖。后来,在12月份我目睹了鲍威尔在此敏感期间安排救助美国侨民,将诺列加带到美国审判以及重建巴拿马民主的一系列行动。当他向我简要介绍情况时,我发现他以一种冷静、高效的方式,将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并有问必答。这使我大为放心,也使我对他的信心大增。我赞赏他的精细,尤其是他对军队的关心,在策划"沙漠风暴"以及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行动期间,他的这一长处不断地表现出来。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初遇科林时,他是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参谋长。我们当时的接触是短暂的。他后来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弗兰克·卡卢奇的助理时,我们在国家军事学院坐在一起讨论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规则,又有了一些交往,当时我就为他的管理思想以及他清晰的思路所打动,这一印象在向布什政府过渡期间,变得更为深刻。后来我接替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作为一个简单的职权移交,这一更换毫不费力就办成了。他所拥有的思想,正是我想了解的,而

我因为以前担任过此职，故默契于他的外交见解和对国家安全的看法，我发现它与我的观点几乎不谋而合。我确实担心，作为一个新手和年轻的四星上将，对他的任命是否会有军方接受的问题，特别是他能否被接纳为“白宫的一员”。其实我没必要担心，一点问题也没有。鲍威尔一贯冷静沉着，即使情势或会谈陷入僵局。以往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与总统讨论问题时，偶尔会发生一些龃龉，鲍威尔作为他直接上司身边的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官员，漂亮地予以化解了。

乔治·布什

另外两个重要人物是副总统丹·奎尔和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虽然他们主要处理国内事务，但对外交政策小组很有帮助。两个人既明智又对军备控制感兴趣，在那些年里他们的建议应该说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选择正确的人士放在重要的岗位上是重要的，而让他们有权物色自己的合作伙伴也同样很关键。吉姆·贝克曾告诉我，他想请劳伦斯·伊格尔伯格作为他的副手。我支持他的想法。雷利(劳伦斯)是一位聪明而杰出的专业外交官，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曾在国外当过大使，也曾在福特和里根政府里任过国务院要职。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贝克和我谈过有关他选副手的事。他提出过好几个人选，其中包括伊格尔伯格，并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依我之见，没有比伊格尔伯格更合适的人选了。当贝克第一个提及他的名字时，我曾有些惊奇。我和雷利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既是缘于个人的性格，又因为专业上的关系。我们两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起共同协助过亨利·基辛格。贝克可能会对此经历的潜在含意有些为难，我则以为它表现了贝克极为坚强的性格，他将一切消极的东西弃置不顾而一意寻找最好的人。我过去是、将来也仍然会被他采取这一步骤所感动。雷利的加盟极大地推进了国家安全政策的决

策与执行过程。

和贝克一样，我也在选择自己的职员。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人数很少，我的原则是，加入这一部门的人，应有在不断的压力下坚持工作的准备；当他们觉得难以适应这一节奏时，他们就该退出了。其核心就是每位成员（他和她）都要满负荷工作。我相信，好的人事关系甚至能使一个僵死的机构运作起来，但即使一个很正常的机构，在恶劣的人事关系中也难以很好地运转。

我的当务之急是选一位副手。我需要一位杰出的人士，他有广博而扎实的知识基础，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制度，明白如何运转办事机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总统的信赖。我认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是个好人选。在福特政府期间，我曾将他引荐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初级职位，他也曾在卡特政府期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服务过。因此，他很了解不同的总统对此部门的要求。鲍勃（罗伯特）在非常年轻时，曾被里根总统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很快他不公平地被卷入了“伊朗门事件”。每每在伟大的爱国情感支撑下，盖茨不是坚持为自己辩护，而是有勇气辞职以不再贸然困扰其总统。当选总统布什肯定知道他，当我讲出鲍勃的名字时，他热情地认可了他。

布什总统选择的人员，事实证明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大多数都曾在一起工作过，所以这给新政府带来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之间也有一种真诚的同志友谊。我认为这一品质使布什政府殊异于任何其他我所了解的政府，也肯定不同于那些我曾服务过的政府。他们是些个性突出的人，而个人主义却又没有渗透到国家事务中。一种真诚的幽默在每天的日常事务中，产生了不少笑话和善意的玩笑，在此气氛中，最可怕的危机也被淡化了。这是一种随便的气氛，但同时又是最为重要的凝聚力。在我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之间也是这样。虽然大多数成员在过去没一同工作过，但当我们在一起处理日常事务时，一种善意的幽默就在我们中间滋生开来。

我很快觉得、而且一直觉得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份感情。

乔治·布什

到1月份就临近就职典礼了。在那段翘首以待的日子里，我每天见到布伦特。他在1月2日来到戴维营(里根总统不在这里时，他慷慨地允许我使用)，和我讨论我们将要遇上的机遇与挑战。在那种轻松的环境下，特别是在营地周围、在白雪覆盖的树林里长长的散步途中，我们深思过苏联、军备控制问题以及一种宏观的战略设想。我们并无意形成任何结论，而仅仅是勾画出我们需要什么、优先处理的问题是什么。我渴望开始行动。

此后不久，在1月9日，我和亨利·基辛格、约翰·苏努努、吉姆·贝克、布伦特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有关苏联问题的谈话。对亨利的历史知识和他的见解，我一直非常尊重。他说需要的是一次精心的谋划。虽然他太客气而没说出来，但很明显他觉得我们在处理欧洲与苏联问题时，缺乏实际的战略观念。基辛格主张建立多个非正式的和苏联联系的渠道，这种方式以前的政府也用过，他自己也可以作为一种渠道。我担心的是：我要保证不能将错误的信号传给莫斯科，不要造成我们的政府这样说，而另一些人正忙于秘密谈判，而此谈判可能会传出矛盾的信号。不过幕后渠道很有用，它会使捣乱的人对未来的政治决策或者对总统与外国首脑的某些谈判毫无察觉。

正当我犹豫用哪个人作为正式的秘密渠道时，戈尔巴乔夫已在总督岛指定杜布尔耶林来担当这一角色了，我让这种设立秘密渠道的可能性公开化了。我确实利用基辛格即将对莫斯科的访问，让他顺便捎去了我给戈尔巴乔夫的个人信件。我谢谢他对吉布的关照以及我的儿孙在亚美尼亚访问时所受到的礼遇。我也强调了他在访问联合国时我已向他指出的观点，并解释了新政府班子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美苏关系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军备控制。我想将我们的对话从军备控制扩大到我们想建立的广泛的关

系上，这是很重要的。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同意基辛格的看法。我坚决赞同设立秘密渠道，以此作为双方政府传递信息的一种手段和加强与戈尔巴乔夫直接联系的一种途径。但杜布尔耶林，戈尔巴乔夫已选定的人选，比基辛格更接近于满足双方的要求。在1月份，贝克和我在贝克家与杜布尔耶林见了面，目的是交换看法和讨论需要什么样的安排。但计划实施后，秘密渠道并不真正奏效，尽管我方付出了许多努力并在数月里成功地使用这一渠道。杜布尔耶林很早就病了，而且似乎有段时间在苏联的人事变动中不得势了，这削弱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我遗憾我们失去了一条非正式的交流渠道，这种渠道在我们和英国、法国、德国之间起了很好的沟通作用。

从莫斯科回来一些日子后，基辛格送给我们一份详细和令人高兴的他和苏联领导人广泛交流的纪要，还提供给我们一份关于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分析报告。这位苏联领导人说他欢迎和美国新政府进行一种有效的对话，并补充说他注意到当选总统甚至在就职前就已会见了他，这对对话是一个很好的信任信号与认真负责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告诉基辛格，对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苏方不会施加压力，但他想政治对话可以早在3月开始。他提出了一组特别是有关欧洲的国际问题。他说：“我的看法是我们应盯住德国，我的意思是东、西两个德国。我们一定不能做任何动摇欧洲而使之陷入危机的事。”他没有进一步地阐述。至于东欧的改革努力，生活正在发生一定的变化，没有人能够阻挡，西欧同样如此。但东、西欧双方应谨慎地不要互相威胁对方的安全。这就是他欲进行对话的精神。

戈尔巴乔夫托基辛格捎个口信给华盛顿：“考虑到协调我们在

国际事务方面的政策，我准备开始交换看法。我非常满意这个信息，特别是秘密渠道甚至在较早的阶段已开通了。"从此消息的语调和内容来看，似乎清楚地表明他想营造一种积极的气氛并准备立即拾起里根政府时已废弃的渠道。

基辛格在其报告中写道，当他准备起身离开时，戈尔巴乔夫变得忧郁起来。他告诉基辛格："我领导着一个奇怪的国家。我正努力领导我的人民奔向未来，但他们不理解，而且很多人竟不想前进。当我成为总书记时，我想现在可以完成改革了，可是相反，经济改革才刚刚开始。但有件事是肯定的，不论改革发生什么事，这个国家将再不会保持老样子。"基辛格问他，作为旧体制的一种产物，他如何能够如此决断地去改变它赖以存在的基础。戈尔巴乔夫说："很容易看出什么是错的，难的是找出原因何在。但我需要一个长的和平时期。"基辛格判断，苏联总统正试图改革一切，他也正在寻找作为一个突破口的外交战略，基辛格相信戈尔巴乔夫愿意为此目标付出合理的代价。

第二章 从理论到实践

乔治·布什

椭圆形办公室本身并不怎么大，但它有一种特别的气氛，甚至当我离开总统职位时，我仍怀有过去任职期间初次进入这个房间时的敬畏与崇敬之情。它是总统职位本身的一种带有至高无上的历史意味的权位象征，在此我能够感觉到在我之前的众多总统的风采，我读美国历史时的兴奋，以及了解到发生于我正端坐在其间的这间房间里的故事后的愉悦，都更加强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有时也是种约束。例如，不论何时人们想来，我会到此迎候并告诉这位朋友，他应该注意什么；不知怎么搞的，一进房间，他的膝盖就会哆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好事，它提醒人们、包括我在内，有些事情比我们所有人所从事的要重要得多，这会帮助我们保持正确地观察事物的能力。

在这间房间里工作我很愉快。我可以眺望窗外的景色，看看孩子们嬉戏。有时我的爱犬雷杰被雨淋个透湿，哼哼唧唧在门外团团转，央求着要进来。在秋、冬两季，壁炉里总烧着火，使这间办公室温暖舒适。与椭圆形办公室紧挨着的是一间很小的私人书房，也可以说是一间小办公室。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在这儿我可以和一班人进行很随便的交谈，它也是我的一个隐蔽的读书场所。这里还有一个小餐厅，它面对着花园，我可以经常在此宴请客人。在它旁边是一个小厨房，多明哥·奎科在这里可以很快地为

我们准备一顿饭。多明哥在白宫是一位特殊人物，自肯尼迪政府起，他就在此工作了，他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现在有了一条迷你小狗)。正是这一温暖的、家庭般的气氛，使白宫成为这样一种地方：这儿是有工作和责任，但在此工作非常轻松愉快。

在就职典礼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立即开始建立工作规范和程序。其间一个重要的安排，是上午 8 点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在会上，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向我简要介绍世界各地的最新情况。它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情报简介，布伦特、罗伯特·盖茨，通常还有约翰·苏努努和我一起出席，比尔·韦伯斯特则一个礼拜参加一到两次。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会拿进"总统每日简报"。它是一种重要的情报材料及其分析的综合报告，简报是在晚上和早晨很短时间里完成的。我在白天就此简报提出一个要点，在一次布伦特或他的副手出席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通气会上，他们则根据这个要点着手准备"总统每日简报"。这一方法使我可以要求这些官员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介绍更多的情况，如果我在读"简报"时想起有关政策问题，就请布伦特去查有关的文献条目。中央情报局官员会记下我的问题，在一天或多些时间里，我会得到一个答复或一份详细的报告。

因为了解我一贯关注训练严格且又十分重要的秘密情报工作，韦伯斯特偶尔会向我引荐某些人士，他们(他和她)曾冒着生命的危险搜集极为重要的情报。我感到那是些令人激动的岁月，我深为那些勇敢、爱国、忠于职守的人们所感动，我深深敬重那些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情报工作的人们。他们默默无闻，也从没机会身居要职，但他们属于那种我所知道的最无私奉献的美国人。他们或她们中的任何一位同志，都有牺牲的危险，因为他们的掩护会被那些我视之为叛徒的败类所撕破，但他们仍忠诚地为国家服务。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中央情报局的简介会后，国家安全会议的第二部分就要开始，

听取另一个中央情报局专门小组汇报情况的副总统也将来参加，而我则仔细研究这一天所发生的某些事态。总统指定的题目是必须研究的，而其他事项也要讨论。这时通常已经浏览了至少七份报纸和白宫新闻简报的总统，会从其阅读中不断提出问题或评论，有时还会提出时下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或者会琢磨萦绕他心头的其他问题。

在这些每天的例会中，我很留意在有关"伊朗门事件"调查中所提出的问题。其大意是：由于是秘密审判，总统没有通知那些应该知道的人而"悄悄"地随便下了定论。因此，我小心地不去利用这些材料来作出一个牵涉到其他国家安全部门或机构的判断。如果总统表明他希望采取的一种政策倾向，我肯定其他人会乐意被总统咨询，因为这样可以提出他们盼望实行的想法。另外，我确定了让盖茨也参加会议的规则，他负责记录并审查时而会有的有关消息的官方评论；有些事情我也提交给正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当我总是在一天里的其他时间个别会见总统时，这些清晨的讨论对于决定外交政策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材料。

托尔·博德曾调查过"伊朗门事件"，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组织和运作程序的改革，他给过我很多的劝告。那份调查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我写的，弗兰克·卡卢奇和科林·鲍威尔两人，在先后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时，我曾和他们讨论过调查的结论。结果，实际上博德所建议的都已被接受，而国家安全委员会运作得也很好、很顺当。我想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机构进行的主要职能方面的改革，和"伊朗门事件"无任何关系（我想它主要是与此相关者的责任）。我热切地想增加一个"主任委员会"，它可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而无需总统和副总统参加。我想在问题提交给总统以前，这个委员会将有助于理清问题和探明各种情况。这可以为总统节约可观的时间，而时间，我相信是总统最为宝贵的东西。在就职典礼后不久，我将包括这一委员会的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机构和行动的初步设想通报给贝克和托尔，他们两人都不反对。这一委员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希望以自己的行事方式，对一个地方作重大的改变——这就是和议会的关系。因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任命不需在国会听证，因此他和国会的关系是非正式的。在福特政府时期，我曾试图不将与国会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我后来承认那是个错误。在如此众多的通向成功的外交政策的途径中，国会是非常关键的一种；在另一方面，和诸如国家安全顾问这种角色密切关系，也会加强国会的力量，因为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的关系如此亲密，因此这种努力将不会是白费的。

因此，当我在搭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时，我的第一个行动是请求维吉利亚·兰普利来担当与议会联系的任务。她总是几乎本能地知道在什么时候我要联络什么人，并提醒我议会在我思想中的优先位置；她还一直为我们正在做的为促进议会的认可而进行的机构调整出谋划策。吉尼（兰普利）以对外交文件的准确措辞与坚强、谨慎的工作风格来协调各部门间的行政过程，有时她还协助政府在国会山上团结一致地谈论有关国家安全问题。她的个性以及她对我关心问题的理解，使她在我们探讨尚属保密的问题时，也自然成为一位重要的参加者。总之我不仅在与议会的联系上倚重她，我更在其他大量的事情上依靠她的帮助。

乔治·布什

就像任何新的政府一样，我按照规定的程序就任总统职位。在我想了解的和我需要或应该了解的之间，确定恰当的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制定出有关规则很不容易。作为副总统时，我喜欢过直露坦率和尽可能的个人间的接触，但现在苏努努清楚地要求我摆脱文山会海，要我不要忙碌于不当的事情或沉湎于琐事与细节。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或副总统，我没机会阅读堆在我办公桌上的所有文件。我羡慕过去慢节奏时代的总统们，有大量的时间来阅

读和书写。我不愿破坏苏努努精心创立的制度,因为这里需要某种限制。我倚重于布伦特来整理那川流不息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文件,其间原因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一个组织方面的问题是哪些人出席正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里根总统曾专门拟定一个名单,人数超过了法定的限额,顾问们也参加讨论。因为参加会议是如此一种人们求之不得的特权,因此,任何破例都将会引起轩然大波。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和我两人都计划保持最低限度的人数来处理应急的特别问题,以利于促进坦诚和公开讨论的气氛,并减少泄密的可能。不管怎样,出席会议与否都不是事情的要害;不过总有些人觉得,如果他们被排除在外,似乎表明他们就远离了椭圆形办公室了。

总统表示,最低限度,无论何时某个部门和机构对有关重要问题的讨论,他都想亲自出席。他还认为,他的新闻秘书、他也很信任的马林·菲茨沃特也应正式出席。这就使问题更复杂了。下面这一点很重要:马林·菲茨沃特,对即将发生的事应有所察觉,同时又应具有这种涵养:除了对于敏感问题不能泄密以外,对那些他知悉的事,他也要对新闻界守口如瓶,而且还不应因此而苦恼。马林说他能处理任何此类问题,他确实极为圆熟地处理过。约翰·苏努努也必须知道,将要进行的是什么以及因此要着手的是什么。当周围不时有抱怨时,我们要有能力控制局面。

乔治·布什

并非每个人都会在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阁会议时打盹,但内阁成员常会被严重的时差不适所折磨,也常苦于一直忙到深更半夜来应付一次危机,尽管以顽强的努力来保持清醒,他们有时也会失败。布伦特在白宫跟任何人相比都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他可以工作到深夜,然后跑回家,吃点夜宵,睡几个小时。结果,他不时地、也许是很经常地,在开会时打瞌睡,或许“熟睡”是个比较好

的说法，但他却睡出了一种艺术风格与形式。他能在几秒钟内睡熟，又能及时地醒过来，会议讨论的细节他也清清楚楚。我们惊奇他的这种睡觉能力，以及他后来闻名的“苏醒基因”。布伦特之所以能在片刻工夫警醒并能立即书写某些东西，甚至任何东西；他之所以也能在演讲者或许正讲到精彩部分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呼呼大睡，充耳不闻，其原因或许正在此“基因”。

布伦特的瞌睡与警醒表现得是如此突出，以至在布什政府成立的第一年，我以他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奖项——“斯考克罗夫特杰出睡眠奖”，它在每一年度的年终庆典上颁给获奖的内阁成员。在一年里，各位内阁成员将考察那些他们觉得应提名受此殊荣者的表现，不过此提名并不必须内阁成员们自己来操作。

一个秘密的由一个人组成的“评判委员会”主观地评价竞争者瞌睡—觉醒技术的完善程度。为了获奖，竞争者发展出各种机智的方法来将评委的注意力从瞌睡本身移开，从他们是否对周围发生之事一无所知的事实上移开。当首次奖状无可争议地发给布伦特时，他打着鼾声将它领走了。在此以后，获奖者就有点难以选择了。有些竞争者以其长期参与竞赛，或者以其多样化的睡觉形式和新颖的觉醒方式，赢得了上述评判委员会的好感。每次总有这样的局面：一位极为热衷和着迷于此奖的竞争者，会抗议获奖的他或她没有睡着，因为他们从眼神里或一声咳嗽里找到了证据。委员会不可能被收买，它保持着被提名者种种表现的大量记录，而且还将这一记录保存到计算机软盘里。

下面是始自1991年5月的一些条目，它证明了竞争者的水平以及委员会收集情报的能力。

日记　5月8日

约翰·苏努努发起了一场很好的挑战。在我们上午

8点钟的例会上，约翰刚好在上午8点16分躺下睡觉。他就这样和某些“熟睡”议员们一起，在“内阁成员休息室”小睡了片刻。不过，这是一场温和的竞赛。

日记 5月15日

当吉西亚·诺曼正在宴请伊丽莎白女王的宴会上演唱时，斯考克罗夫特和约翰·苏努努宣布，我已经向瞌睡奖杯发起了挑战。因为我自信我的清白无辜，我就和芭芭拉讨论了此问题，她鼓励我不要退出比赛。布伦特提出的证人是我女儿朵拉。但当我询问朵拉的时候，朵拉却为她父亲的这一荒唐可笑的“罪名”进行辩护。虽然这个指控已录入了“斯考克罗夫特文件”，但它是如此离奇的指控以至于不可能提起诉讼。更令人惊奇的是，当我们从奥里奥尔斯的棒球比赛回来后，女王陛下在5月16日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挑战，但它是晚上了，伦敦时间是上午4点，这儿已没有人来记录了。

日记 5月31日

一次在我私人的餐厅里我宴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普里马科夫的一次私人午宴上，布伦特自己表示他要瞌睡了。在上巧克力甜饼后，布伦特吃了两块，眼睛开始变得呆滞。公平地说，我不能说他睡着了，但普里马科夫注意到有情况，笑着看着我，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不知底细。在紧接着出席我们一个将去苏联的代表团的会议上，布伦特上演了一场严肃的挑战，一场杰出的表演，但可惜没有一个优胜者。

在“内阁成员会议室”，下午2点，有12位议员在这儿。布伦特和我隔着三个人(也许是两个)。

他打瞌睡了。

当他的左邻发言时，他漂亮地醒过来，有力地点头称是。

好几次他的双眼完全闭起来了——这一下他得了好几分。出于自信，他醒来了好几次。只是在临近会议结束(下午2:48)时，他倚伏在桌上，头趴在胳膊上，而胳膊搁在桌子上。

(鲍勃)佐里克又演说了。当他言及某些复杂的农业信用贷款问题时，斯考克罗夫特又来了一次了不起的觉醒，继而打起了如雷的鼾声。

下午2:51，他的头一直低垂着，胳膊耷拉着，现在，头离桌子只有4.5英寸了。严格地说，他眼睛并没有闭紧。

迪克·切尼是第二年奖杯的最终获得者。他胜在奖项本身所言明的："最重要的理念——'完美的瞌睡'。"或许他在领奖时总结得好，他说："我获奖了，但是我确实不应该得此奖。"但事该如此。

一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制度订立和运作起来，布伦特就作为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外交政策的制作者。我坚信，只要你信任你的属下，只要他们团结并步调一致，那么他们的意见就会很有用、很有效。布伦特试图将问题减少到这种程度：他和我，可能还有吉姆·贝克和迪克·切尼只要去处理剩余的问题。有时候，部长们会在看法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或者，彼此较劲的部门会对一个问题非常敏感。布伦特总是稳妥地使他自己、也让我弄清楚每位"对手"的观点。如果遇到他不能独立对付的困境，那么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就和我一道来帮助解决。即使这样，布伦特在允许他们打扰我以前，仍要其开动脑筋。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中，以其开明而

真诚的态度，帮我减轻了大量的压力。我们之所以能精诚团结，之所以能有一种完善的决策程序，他是其间的一位功臣；而此团结与程序，使我们总能抢先对决策作很好的准备。有时，这种制度运作得不理想，但它管用。

为维护布伦特安全顾问的角色，我谨慎地确保让他知情，特别是在决定性的重大问题上，使他不会在事后突然地被告知。每当我与吉姆或迪克谈论重要事情，一般布伦特也会在场。当然也有些偶然的例外，特别是在我们应付德国统一或"沙漠风暴"的忙碌的数月里，当吉姆独自以电话或电报向我简介情况时，我会只给他一些指示，但我从未忘记通知布伦特或与他共享情报。通常，我接到的任何有关安全或外交政策方面的请示电话，我会以各种方式告知布伦特。

布伦特和吉姆确实有那么一点点不和谐，但很少见。吉姆担心在制定一个对其部门有影响的决策时，不让他参加。作为一个前任办公厅主任，他知道一个意志坚强、且受总统赏识的总统顾问，能很容易地孤立一个内阁成员。或许可以肯定地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和布伦特一样，都关心国家的前途。我们非常努力、我想也很成功地让参与者都知情，并减少了那些能破坏决策和有效外交的个人间的冲突。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对我们"危机处理程序"的首次"考验"，出现在新政府成立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1 月 23 日，星期一。特工人员平静地通知我，来自苏联的一个神秘的大包裹已经被送到白宫。上面没有任何标志说明，打到苏联大使馆的电话也一无所获。特工人员仔细检查每一处疑点后，确认这是一个炸弹装置，于是将它移到安全地方，然后小心地打开它，出人意料的是盒子里是一个精美的 500 磅重的蛋糕，现在可有点儿难包装了。有人制造了个大麻烦，但是谁呢？

我将此蛋糕交给盖茨，他肯定会让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苏联

问题专家康杜利兹·赖斯[1] 作为探长来追查这一蛋糕的来龙去脉。艰苦的侦查揭示，蛋糕是在苏联的一个城市(我忘记了它的名字)由某个组织烘烤，后以庆祝布什总统就职典礼的名义送来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总统被感动了。他建议将蛋糕拍张照片，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和家人站在蛋糕旁边。然后他要将此相片及一张便条送给苏联那个组织，蛋糕本身可以送给一家慈善机构。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当一切安排就绪，安全委员会库房里的老鼠已经愉快地聚餐过了。将蛋糕捐献给慈善团体的主意只好放弃。但是，那个面包组织(也许现在已解散了)拥有了一张他们自己蛋糕的照片和一封来自美国总统个人的感谢信。这初次遭遇证明我们的危机应付制度需要某些改进。

在那些最初的日子里，我们从我们的战略角度出发，重新检视现行的政策和地区目标，同时也在思考军备控制。完成这些工作要花费大量时间，但是我们想迅速施行我们的政策。这是一个新的不同的政府，有些东西新闻界似乎并不明白，我们需要这个机会来决定我们的政策方向，而不只是简单地接受前任政府的政策。对付苏联政府以及在苏联发生的变化，显然是我们必须优先考虑的，必须放在考虑东欧问题之前。

华沙条约内部的变化与机遇的存在，构成了我们关于苏联问题最初想法的背景。在中欧和东欧出现了动荡不安，它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或者偶尔相反)进行着。这些年里，在这个地区出现了这样一种模式：镇压，逐渐形成一种仇恨，然后是一场反抗爆发，接着是另一个回合的镇压。但现在出现了转折：戈尔巴乔夫给了这儿的改革者以新的希望，苏联的自我关注已经导向了一种对

---

① 我选择康迪，是因为她对苏联的历史和政治有着广泛的了解；在预计事物的进展时能很好而客观地把握分寸；她思想敏锐，对战略和理论问题也感兴趣。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她曾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务，因此，她精通和熟悉军事事务。她可爱、温柔，但情况需要时，她也能很坚强。

其欧洲卫星国的有益的遗忘。改革和来之莫斯科控制的松弛，使中欧和东欧人民开始享有对其自身事务的主宰权，他们正在摆脱过时的专制政治制度和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结果是(即使不顺利)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一连串的挑战。

我想波兰最可能成为通向自由的领头羊。1981 年危机后，那儿的情况从未稳定过，结果导致颁布戒严令。波普·约翰·保罗二世是一位布什总统和我都很尊重的人，天主教会本身和他都大力支持这场伟大的自由运动。持不同政见的团结工会，是一个未经批准的劳工组织，它几乎一直处于与政府的冲突状态。到 1989 年，波兰终于出现了实质性的积极变化的征兆，华沙颁布了鼓励私有企业和允许开办外资企业的法律。面对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事变，在 80 年代初就成为军事镇压象征的总书记沃伊西奇·亚鲁泽尔斯基和其他领导人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而这将为团结工会的合法化打开大门。

在和团结工会长期冲突后，波兰政府流露出要给它一个国会议席的意愿，以此换取团结工会对政府经济计划的支持，圆桌会谈将讨论团结工会的政治参与问题。从我们的观点看，这一进程可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至少是值得鼓励的和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波兰政府与主要反对派会见的事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进展，它是由濒临崩溃的经济形势和政府显然已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所引发的结果。苏联老大哥将不会帮助他们走出其中的任何一个困境。

我也在匈牙利看到了希望。1988 年 11 月，政府宣布了一个将非共产主义政党合法化并进行广泛改革的计划，包括在 1990 年订立新宪法。改革家米克洛斯·尼米斯被任命为总理，在 1 月初立法机关通过了集会自由的法案，接着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变革。本性谨慎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一直因 1968 年的军事干涉和华沙军事集团的入侵而意志消沉，警察一直在镇压未经批准的示威游行和搜查反对派领导人的家，在 1 月他们逮捕了持不同政见者

的领袖瓦克拉夫·哈费尔；在另一方面，政府又首次允许各种独立组织为纪念“国际人权宣言四十周年”而进行大规模游行。大大落后于上述三个国家的是东德、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我想这一变化的气氛促成了美国关注焦点的转移，即从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其重点几乎完全集中在军备控制上——移至东欧。重视东欧将也会提醒每个人，冷战的基本格局依然存在，苏联的军队依然占领着东欧。我主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试图通过达成常规武器协议使苏联军队撤出东欧，或者至少大规模地减少其在东欧令人胆寒的存在，这样则会为那里的政治改革创造一种较好的环境。第二个是要调整我们对待每个东欧国家的战略。

多年来美国一直注重和这些苏联卫星国打交道：使它们最大限度地独立于苏联的政治路线，或者最大限度地摆脱苏联对其外交政策的控制。这种注重在给一直是对手的苏联造成不安的意义上，已达到了一种不错的效果。在此政策的影响下，曾是这些国家中最斯大林化的罗马尼亚，现在却成为美国的好朋友。我想我们应该采取下面的战略：优先和那些正悄悄地进行内部非常强劲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苏联卫星国打交道。这将会进一步鼓励这些东欧政府趋于改革，于是我们就有希望实现我们长远的目标——使这一地区全部获得自由。因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对国家的全面的专制，我们这一政策上的变化将会使罗马尼亚在美国的注意力中退居次要位置。

乔治·布什

我同意布伦特这一观点：戈尔巴乔夫的新的改革举措使我们有机会影响东欧的局势，不过我希望要小心。东德 1953 年、匈牙利 1956 年、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反抗的创伤，在这些动荡的数月中，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想去鼓励这类事变：它可能会转向暴力而失去控制，然后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去支援，而把那里的人民搁在危险境地。我希望尽可能迅速地鼓励争取自由的运动，

但不要导致来自政府的镇压——就像 1981 年在波兰发生的那样，或者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这一点就极为清楚地勾画出了事情的界线以及苏联人将会把什么行为看成是挑衅。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那些构成可持续变革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复杂因素，是戈尔巴乔夫在欧洲公开的战略。他鼓励那儿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被视为一位改革的"事实上"的同盟者。他似乎一厢情愿地认为：可以以推动东欧改革的进程来触动苏联国内顽固派，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改革方式。我想戈尔巴乔夫并不真正明白东欧情形的本质。他似乎想去培植一帮"小戈尔巴乔夫"，他们会获得广泛的支持，也因此他们在本地区代表一种积极的进步力量。他显然未能意识到这一地区的专制统治，不论其情形如何，都是从外面强加的，而且一旦时机来临，这一统治将会被推翻。

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也应该被考虑到。苏联国内的情形怎么样？他和保守派的关系如何以及他的改革阻力有多大？这些问题使一个本已经够复杂的方程更复杂了，而且也增加了我们判断苏联改革进程的困难，在我们有关东欧的政策中，这些问题也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乔治·布什

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着手起草关于苏联问题的正式内部报告之际，我也在请教其他专家的看法。杰克·马特洛克是我们派往苏联的大使，他第一次使命是由里根任命的，他是一位对苏联有着长期研究的人，长期以来他为我们提供了详细而有益的情报。我也请布伦特去成立一个外围的专家小组，并于 2 月初在肯尼邦克波特与他们见第一次面。会见是在我的主卧室进行的，在这座房子里，这间大概是惟一有暖气的房间。虽然观点各异，但我发现他们的见解在我深入思考苏联未来动向时是有益的。基于这一点，我要求在每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上进行类似的讨论。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关于苏联的战略报告(NSR-3),在3月14日放到了总统办公桌上。但它是不完善的,它总体上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缺乏详细和实质性的内容,缺少特别的和富于想像力的创见,而欲满足美苏关系中建设性的要求则需要这种内容和创见。因此欠缺,我们设计出一种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和意图的"时事评估"来代替它。评估是由康杜利兹·赖斯领导的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小组起草的。

我相信康迪的报告揭示了一种指导构建美苏关系总体战略的基础。为针对戈尔巴乔夫,报告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我们应该从国内的角度来强化目标明确的美国外交政策理念: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目标和工作进展不表现出信心,我们就不能迎头赶上戈尔巴乔夫。其次,我们亟须做的是对盟友们关心的事明确表明我们的态度:通过现代化来加强北约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盟国将很快要求建立一种政治战略来推进削减常规武器的谈判,在常规武器方面我们愿意让苏联领先。我们也必须去细心地准备包括"削减战略武器会谈"谈判在内的双边军备控制谈判,国际社会密切地关注着这一谈判。如果我们在军备控制谈判中准备充分,盟友们对我们处理更为复杂关系的能力的信心就会大增。第三,在反思我们的政策后,我们就可以从事有关东欧的设想了。因为东欧人民正在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宽容,尽最大努力地控制属于自己的事务,所以在铁板一块的苏联集团内,这一地区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我们有力的武器应是承诺经济援助。第四,也是最后的则是地区的稳定问题。近来在阿富汗和南非的事态发展,早已显示了美苏间的合作将加强彼此在世界其他地区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意识到苏联可能是某些、但不是所有地区的一种重要的稳定力量,我们必须放手工作来促进地区的稳定。中非则是例外,克里姆林宫没有丝毫减少其支持那里的共产党军事活动的

意思。

上述报告预测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马特洛克还有其他人已就此提出了建议：我们可以影响莫斯科，因为它需要西方的经济资源和技术。在同时提交的一个附件中，康迪提醒我们，苏联正处于国内混乱之中，正急于从国外寻找理论与资源来巩固其岌岌可危的体制。这表明，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局势，在整个美苏关系的谈判过程中采取重大的步骤。正如她指出的，这就要求我们准确地观察苏联在国内和国外的动向，对美国战略来说，它既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也是一个明确和确定的出发点。这四个部分的战略，构成了本届政府初期我们构建针对苏联政策的指南。当近几个月来欧洲的变化迅速展开时，这一政策则要求做广泛的修订——其间有些是应急的修改。

这个文件看上去似乎是一劳永逸的，但在它形成后实际上不到6个星期，其他关于东欧(NSR－4)和西欧的战略研究报告(NSR－5，强调1992年的一体化计划，即所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已经出笼①。关于东欧的讨论，计划安排在3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进行。当我开始作准备时，我发现很显然我们不应一开始只从局部来就我们的战略取向进行高层讨论，因为局部总是紧密内在关联于整体的。我请求总统延期关于东欧的会议，为了使人们能有一段时间来首先讨论整个欧洲的问题。我还提出了另一个想法。我发现即使在本届政府的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也显然并非是一个总统的高级顾问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论问题的地方。有工作人员在场是不允许直率地表达自

①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欧洲小组的是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他是一位外交部官员，曾为政府的决策寻求学术界的帮助。虽然我们相交不深，但我认识他已经快20年了。他有一个优雅的好名声，但偶尔也会怒火中烧。他是一位乐观的有创意的明白人，他揭示了利用迅速变化的东欧局势来构建新战略的方法，这一战略将会增进美国的利益并推动我们迈向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己的观点的，因为发言的内容可能被泄漏。我建议，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非正式的预备会上，只有一个特别小组出席。如果这样的话，参加者是奎尔、贝克、切尼、我自己、伊格尔伯格、盖茨和苏努努。总统喜欢这一建议，而且它也有效。这也表明布什政府启用了一种新的高层会议（“核心小组”）的方式。在正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正常进行的同时，这个临时小组开始对实际决策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讨论开始时，斯考克罗夫特综述了我们面临的问题。美国对欧洲和苏联的后冷战政策是成功的，苏联已被遏制达40余年，西欧已实现繁荣。总之，我们处于一个迅速变化的东西方冲突淡化的时期。

核心问题是苏联的稳定。不论戈尔巴乔夫脑子里怎么想，他所发动的改革运动的结果却难以预料，甚至他自己也不清楚。要时刻记住，这个国家是、或许仍将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大国，它目前所透露出的迹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经济改革。假如我们面临一个混乱和萧条的年代，这些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呢？另一个则是政治改革的进程，它会为自己创造生机还是在一个更为专制的结局中夭折？第三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和中央权力间的斗争会演变为一场浩大的战争吗？

至于东欧，它长期处于苏联的安全保护伞下，这儿的不稳定将会加大危机爆发的概率。美国在这里的目标是什么？东欧仅是我们在解决苏联问题时的一个工具？或者其自身就值得我们重视？

最后一个问题是欧洲统一的趋势。我们是否期待一个潜在的新的超级大国在西欧出现？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性质，美国一直怀着某些矛盾的心理。欧洲的融合和统一的意义对美国来说是好是坏，仍不清楚。不过一个统一的欧洲，也许会使北约组织更有效，但它可能取代美国的军事存在吗？

我们也考虑了东欧民族主义复兴的影响。1917 年的俄罗斯革命,后来斯大林的出现以及 1930 年德国纳粹分子的猖獗,中断了一战后奥匈帝国崩溃时开始的重建东欧的进程。在很多意义上苏联是奥匈帝国的后继者,苏联在东欧统治崩溃的迹象不断地在暴露。这一崩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符合我们的利益吗?像一战前那样的动乱和民族主义会复发吗?不存在那些民族主义的国家会保持长期稳定的社会发展吗?虽然在西欧民族冲突的概念是过时的,但对东欧那些存在种族冲突和分裂压力的国家——像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来说,自 1945 年以来他们的政治发展就因深受其影响而参差不齐。苏联对东欧的占领导致要用大量的军队来应付一个个封闭专制的国家;苏联长期在中欧驻军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分裂的德国,德国的分裂是二战的结果并受冷战冲突的影响而继续分裂着。由于莫斯科控制的衰弱而出现的德国重新统一的趋势,对苏联和对东南欧都有着重大的意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所描述的一个统一的欧洲能够阻止这些潜在的问题和危险吗?

在后来的讨论中,形成这样一种共识:我们应该按过渡时期所出现的形势来改变对东欧的战略:我们要重点鼓励趋向改革以及迫使苏联在东欧裁军或撤军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的创意必须是大胆的。斯考克罗夫特指出,美国缓和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影响了欧洲的走向。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鼓吹冷战的结束,我们也应结束冷战的态势(虽然关于未来欧洲的苏军问题戈尔巴乔夫说得很少),如果我们自己显得行动迟缓,欧洲人民将不会再追随我们,而苏联人则会把握时机来左右国际舆论。布什总统同意这一看法:戈尔巴乔夫已经在悄悄地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布什总统想在 5 月北约组织的首脑会议上提出一系列大胆的建议,它们将使我们夺回主动权。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布什政府成立之际，我第一次向总统提出了一个新设想：美国与苏联都撤出在中欧的地面部队。这有军事意义，因为较之于华沙集团撤走其苏联驻军，北约组织减少其大部分美国军队会更为有利；而主要的，这样的撤军将会减少苏军在中欧令人窒息的压力，而消除这一压力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迪克·切尼看上去大吃一惊，他认为要采取这样一个重大的行动为时过早，我们应该等一等，看看苏联将会发生什么。他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其内容是：我们要求戈尔巴乔夫按照开放的方式，公布其国防预算。吉姆·贝克插话，提出了他的想法——在这一时期也是初次提出——销毁双方所有的坦克。不像裁减军队，他辩解说，挪动坦克双方都容易做到，而且一下子就可见成效。我不赞成贝克的主意。确实我们正设法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来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夺回主动权，但我想其主要的目标应是努力将克里姆林宫的军靴挪出东欧的咽喉地带。苏联其实并不需要坦克来镇压东欧。布什总统结束会议时，用意味深长的口吻说："如果我们不恢复对世界的领导，事情将会不妙。"

这是我们第一次全体核心小组成员出席的战略会议，它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性。在鼓励以尽快的速度推进东欧的改革和自由方面，我们是一致的；惟一的异议来自于财政部，虽然它不涉及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狭义的意义上它也有助于东欧的经济改革的进程。布什总统已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想要的是意义深远的新构想。因为切尼和贝克的意见都没有得到支持，撤军就是我们所有的最好方案；而同时我的建议又过于激进，因此我们最后采纳的意见，虽是出自我的设想，但作了很大的修改。

在如何应对欧洲和苏联迅速变化的事态这类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时，我们的讨论就显示了阁僚间的差异。切尼是最富怀疑精神的，他以为那里的变化主要是表面的，我们惟一要做的是静观其

变;盖茨的看法相类似,他坚信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之举大概不会成功,相反,变化的趋向似乎是在倒退;对苏联人贝克是最为乐观的,当他与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相知更深时,他这一情绪变得更为强烈。

乔治·布什

回顾那天布伦特的提议,我觉得他的发言中已显然暗示了德国的统一问题,而当时我们中还没有人能预见这种统一的急迫性。我自己的想法集中在使美国走在前列,并领导西方对付东欧和苏联的挑战。如果我们要促使东欧平稳地发展,我们就必须一开始就争取主动。那儿的一切变化极快,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或消极观望,我们就越难以左右变化的结局。对于苏联集团内个别国家的改革,我们现有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眼下我们很难对那儿变化的进程施加直接的影响。我们不能诱导造反,因为那将很可能造成另一波的暴力镇压,这样近年来的一切进展都将付诸东流。布伦特的培养一种能促进积极变化的"环境"的原则设想,使我很受启发,因为这一"环境"将促使苏军撤出。但我也认识到,我们应该经常和仔细地和盟友协商,解释我们削减现有在北约地区驻军的目的和战略,这将是一个复杂的工作。

我喜欢"核心小组"反复进行的坦诚和无拘无束的讨论,所以我后来赞成更为经常地集体研究。切尼、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之间反复切磋的种种设想鼓舞了我,我们正带着不断被修正的新设想走向正确的方向。美国的领导地位,要求我们制定出能反映盟友、甚至更多朋友的广泛要求的计划。对我来说这种讨论表明,我获得了锦囊妙计,但我更为急切地想从这些见解中提炼出实际的政策,因为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的部分内容,当我们宣布裁减欧洲常规军备时,核军备控制仍是我们考虑中的一个独特和复杂的问

题，它也始终是我们20年来针对苏联政策的核心。直到现在，在此问题上的谈判一直是或多或少在政治隔膜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美苏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是完全对抗的，当双方试图在此棘手问题上合作时，彼此间的关系则变得很微妙。我们以超常的态度来处理这一问题：即将核军备控制与政治关系分开，将前者只作为一种技术问题来处理。我以为这一政策的某些做法被布什政府所继承，政府内一些人士继续主张军备控制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即使当军备控制从孤立状态发展为一种双方公开对话的话题并成为推进美苏关系走向全面合作的中介时，上述主张仍丝毫不为所动。假如首先就承认军备控制对美国安全和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我希望在我们满足于自已所采取的政策之前，我们应彻底考虑一下我们的主张。在酝酿军备控制政策时，我依赖于我的军备控制和政策方面的主要专家阿罗德·坎特。除了拥有令人惊奇的辨析能力外，阿尼（坎特）也是一位真正的战略思想家，在我的经验中，他是一位奇才，他熟悉军备控制方面的情况，但他从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地忽视我们的战略目标。

我深信军备控制的主要目标应该稳定，不要因其自身的原因而波动。我们首先应寻求避免这样一种情况：一方或双方担心，如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他们将被毁灭；或者相反，如果首先使用核武器，则将会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这类的投机是危险的，因为它会激化双方的已有矛盾，并使之恶化为全面的冲突。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首先必须解决军备控制问题。军备控制问题甚为重要，而要将它们理出个头绪，则要花些时间。为了保证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我们延迟到6月才与苏联讨论军备控制问题。

与军备控制相关的问题是美苏首脑会晤。早在布什政府成立之初，媒体就在推测会有一次提早的会晤，这种推测明显带有倡议的色彩。早些会晤确实有利，它将会大获民心，并使我们摆脱虚浮之名。两国领导人不带框框地交换意见本身就有益处，但是，客观

地说，我坚决反对这种会见：没有精心的准备，也不能达成具体的成果。

对我来说，我坚信不移：准备仓促或者流于形式的会晤是有害的。因为这类会晤几乎总是有利于苏联的目的。除非有实质性的成果，诸如在军备控制方面达成协议，否则苏联会利用会晤的某种效果——如会晤所产生的良好情感——他们会利用这一愉快的气氛来瓦解西方的决心，而某种踌躇满志的心态也会致使一些人认为，美国大可放松戒备，在一般意义上是苏联人、在特殊意义上是戈尔巴乔夫为造成这一不利局势的主谋。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演说，已经造成了一种矫饰夸张的喜气洋洋的乐观气氛。他能够利用不久前和一位新总统的一次会晤，来现身说法似地宣称冷战时代已经过去，而且还不需一个"新"苏联做些实质性的事情来证明。在这一风气盛行的情形下，我相信，提前举行首脑会晤只会助长苏联时下势头强劲的宣传攻势。

如果我们为滋生此欢乐的气氛发挥了作用，我觉得我们至少也应从中获益。这可能会要求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做大量的工作。当我可能是反对美苏首脑尽早会晤的急先锋时，布什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确实还很少有争论。虽然不是那样强烈，吉姆·贝克却也持和我相同的看法，我明白布什总统想尽早和戈尔巴乔夫坐下来谈谈；虽然他没有坚持立马这样做，但过去的数月里，他时时提及这一问题。

整个 1989 年春天，许多批评抱怨我们谋划得太慢，希望我们直接施行里根政府制定的政策。几乎每天媒体都要询问我们何时考虑好，并推测我们的方案肯定毫无益处。在 3 月份类似的报道开始出现。它们无视事实，称布什政府没有理念，没有预见，没有战略，是朵随风漂流的浮萍。"考虑考虑"是我们使用方便的托词，这也是事实，因为我们还来不及发布我们的战略决策；但与此同

时，攻击我们缺乏“见识”，却伤害了我们。而且当我们发布我们的战略报告时，这也将使新闻界很难对它作出公正的报道。

既然我们抓住了主要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也就到了该寻思以何种形式来透露我们的战略框架了。有两个选择因素制约了我们公布新政策的方式，其一是某种要求，另一个是时机。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间进行的成功的圆桌会谈要求美国有所反应，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时机作为我们发布鼓励东、中欧政府改革的美国新政策的契机。接下来的更好的宣扬我们战略的机会是大学毕业典礼——开幕致辞是透露政策的方便之时。我们决定布什总统有关欧洲和苏联的战略，将分别在其4个演讲中一一发布。其间一个是关于东欧的，一个是关于西欧的，一个是关于苏联的，一个是关于防务与军备控制的。

我们热切地关注着波兰圆桌会谈的进程，因为它的失败，将会对我们的本就棘手的东欧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会谈经常搁浅，双方的极端分子互相谴责和示威。大约在计划6周谈判的中途，莫斯科做出了反应。在3月1日，它允许刊载一篇正面的对莱奇·瓦文萨的长篇访谈。莱奇·瓦文萨是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在此以前，他一直受到苏联媒体的严厉斥责。这一变化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支持波兰的改革时不会因此而刺激苏联，我们的回旋余地更大了。

这场谈判拖了6个星期。最后在4月5日，圆桌会谈达成协议，它标志着波兰政治体制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团结工会成为合法组织，一个新的、强有力的议会机构建立起来了，它有着100个新参议员议席，反对派将被允许竞选参议员议席，即在目前的460席的国民议会或者说国会的席位中，竞选其中的161席。我们为此现象而高兴——高兴得以至于我们将马林·菲茨沃特早早地送入白宫新闻发布室，在此协议在华沙正式发表以前就欢呼它了。在公布谈判成功的消息前，他们决定谈判在午餐时休会，但

对此我们一无所知，不过似乎也没人注意到我们的失误。

两天后正式签署的这一历史性的协议，标志了波兰45年的专制统治的终结，它表明波兰正走向自由政治道路。这一进程需要美国提供帮助，我们有一个理想的对东欧采取新政策的借口，问题是我们何时和如何来宣布它。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现在已是4月，关于欧洲政策的演说必须赶在学生毕业时进行。白宫的策划者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演说地点，他们找到了密执安的汉姆恰迈克，一块底特律的飞地。这里常常被作为演说的场所，这里的特点是充溢着爱国主义。这里密集居住着大量东欧后裔人士，这里还有着大量的里根民主党的蓝领工人。对于谈论苏联国内变化以及表达我们盼望波兰自由的渴望来说，这都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要搞好演说，就要先做好三件事。第一、第二都牵涉到政策本身：理清我们的原则，然后确立我们将要提供给东欧国家什么样的援助，这种援助是对东欧变化的回应。第三则纯粹是官僚主义的，但就其自身而言又是重要的，即由谁来起草演说稿。确定的新政策框架是明确的，因为我们已决定把促进东欧变革本身作为我们的目的，而不再简单地以之作为对抗苏联的一种工具。其结果是，作为我们实施援助的标准，我们将更多地关注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改革，而较少注意其外交政策。这一变化反映了我们对苏联国内极为可能发生的变化的看法：莫斯科逐渐松绑，对游离斯大林教条主义的言行有了更多的宽容。

我们准备给困难的东欧经济提供的任何援助的时机、量和性质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康迪为了我们能够扩大帮助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项目的计划在动员行政部门。预算处处紧张，而巨大的联邦赤字使任何额外的花费都捉襟见肘。但当援助东欧

是必要的时候，最尖锐的反对也偃旗息鼓了。在4月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拉迪强调，只应对经济而不是政治改革提供援助，他指出1970年的教训。当时美国倾注资金于波兰，以支持其政治变革。由于那里没能进行使用好这笔资金的任何经济改革，其结果只能是浪费。后来波兰情况不妙，陷入沉重的债务负担。贝克和我辩解说，现在的政策有所不同，它不是简单地基于孤立苏联，而是基于推动东欧走向一个开放社会的真正的政治进步之上，而其间经济改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争论是激烈而且互不相让的，这要求布什总统来打破僵局。

乔治·布什

在尼克(布拉迪)与布伦特的主张之间选一个可并非易事。尼克所强调的是谨慎，不要让活钱变成死钱。资金确实紧张，赤字捆住了我们的手脚。财政短缺部分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我已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如果不能从预算中的其他地方作相应的减省，我们就不能将资金投向一个新项目，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地提出大笔花钱的计划。"管理与预算局"局长迪克·达曼经常提醒我们没有空头支票，他明智而富有想像力，在我们相处的4年中，他对我们弱点的直率的忠告，我一直记在心里。

另一方面，当波兰还债信誉不好的时候，布伦特和吉姆却感到，我们仍必须支持那里正在发生的重要的变化。我也认为我们必须给予波兰实质性的帮助，说大话不可能保证他们朝着更深刻的政治改革与开放的方向发展。虽然东欧的经济形势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实际的援助也可能于事无补，但我们必须努力一博。我下达了我想好的援助计划——为此我希望，在此紧要关头，达曼能够找到钱。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由谁来撰写总统的演说稿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议在整个布什政府期间都未能平息，它也生动地表

现了就是准备总统一篇演讲稿也可能引起冲突与不和。我曾设想过，总统有关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讲话，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负责写初稿。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基本内容的准确无误。因为总统的演说不仅是面向美国人民，也是面向世界听众的。在确定内容后，初稿然后才能交给撰稿人以作文字修饰，使之带上总统风格，并使语句生动感人，再加上其他的润色，以使好的文稿变成一篇伟大的演说词。

但演说撰稿人可不这么看。他们以为，他们是行家里手，完全有能力写出有声有色的演说稿。他们倾向于组成由恰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参加的一个班子，来讨论演说稿的内容和基本的立场，然后他们将撰写第一稿，当然还承担所有后来的工作。他们之所以这样坚持，不仅是因为怀疑他们不能写出好的演说稿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更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学究气的呆板写法和“僵涩”的文风，本身就难以修改。

争论的要害不容置疑的是出于官僚主义意识。初稿的主撰者一般地说来对最终的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负责管理演说稿写作班子的约翰·苏努努原则上倾向于那些撰稿人的意见。我相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他的人，也因为他想华美的辞藻会有益于总统的演说。白宫办公厅秘书吉姆·西科尼也试图来调和争议，不过由于他个人对外交有着强烈的兴趣，而且他觉得自己也不容置疑地拥有相当的写作技巧，他以为保持文稿撰写过程的开放性以保证定稿的质量也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关于演说稿问题，我以为除了某些例外，白宫的演说稿写作班子写不出那种我以为很好的东西。他们的文章看上去充斥了政治宣言式的器宇轩昂，意在大会上哗众取宠，以博得喝彩，但却很难适用于严肃地讨论重大的战略问题。有鉴于此，康迪和主撰者迈克·戴维斯一起提出初稿，但实际效果每次都有所不同。我们曾试图商定写作的程序，但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

应该讲什么以及如何来讲,不论我们就此如何费尽口舌,演说稿撰写者似乎总以为他最了解政策的内涵。演说的效果是好是坏,在过去是部分地取决于有关撰稿者的水平,但现在的情形则是取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演说稿撰写班子间的竞争。

如果是重要的演说,总统常常较早地介入,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实质问题上的态度,几乎总是一律被总统采纳。总统会修订文稿,直到它准确地表达出某种特定的内容和他所希望的语调。总统在修改时所表现出的细微不同,不仅反映了他理解的深度,也表现了他对内容及其表达方法重要性的认识。但文稿撰写程序本身仍未能如我所愿的予以厘清。在整个布什政府期间,这一状况对总统有关外交政策众多演说的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它一直是政府内一个主要的是非之地。

乔治·布什

我同情我的写作班子,因为他们和我相处不久,而且重要的是我的演说技巧也不棒。汉姆恰迈克的演说稿是一个我从不相干到被卷入而亲自操刀的例子。在确定演讲前的一个周末,我在戴维营忙于准备文案与我的讲演。这里有些要点我想强调,也有好几个问题我想避开。例如,我想回应去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总督岛所做的演说,我要求专门插入一段话,来否定他的约有1/4的美国人乐见苏联改革与开放失败的说法;相反我宣布,我们毫无疑问地欢迎苏联到目前为止的变化并支持他们的改革。我还想删除一段“某些变化正在考验苏联宽容的限度”的文字,而代之以这样一段内容:为正在波兰发生的变化而称赞亚鲁泽尔斯基。我也重新润色了文字,我常常喜欢干这类无关宏旨的事,而这种事有时是令撰稿者入迷的。

最后的演说稿大家都满意,而布什总统于4月17日在汉姆恰迈克市政厅的演讲也很吸引人。为了鼓励波兰正在发生的改革与

促进其进一步迈向市场经济，他宣布了一些特别的贸易和金融措施。我们正寻求减免波兰货物的关税，并建议我们的朋友与盟友重新核减其债务，还请求议会允许“海外私营投资有限公司”(OPIC)在波兰经营，支持“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给波兰贷款，督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波兰制定出基于市场经济之上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为与波兰的国际贸易提供担保，并为美国商业公司与波兰私营企业之间具体的相互合作的商务协议的谈判牵线搭桥。总统称如果波兰的试验成功，其他国家将会效仿。当我们对东欧国家奉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时，波兰则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其一是，缺乏重要的政治与经济自由化，就不可能有进步；其二是，西方的援助应该以自由为目的。演说中所透露的刺激波兰改革的长长的援助清单令人头痛地显示了我们缺乏为东欧提供实际援助的资金。虽然这一计划令人吃惊，但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发现，只口头强调东欧经济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是完全不够的。

乔治·布什

汉姆恰迈克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每个窗口都插上了美国国旗，人人手里拿着的也是小国旗。人们情绪高涨，当我宣布我们的计划时，热情的观众听得很专注。人们肤色各异，但都怀着关注的心情，尤其对团结工会感兴趣。就在我演说的当天，团结工会已获得了正式的承认。在结束旅程时，我很高兴地在当地一家小餐馆吃了一顿波兰佳肴。这里只不过是美国一个各民族杂居的小城，但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原来在我演说时远在听众后边有一个带着家伙的刺客，他专为刺杀我而来，但一直被金属探测器阻止着不能接近我。演说结束后，他来到华盛顿，守株待兔似地等着寻找机会。我和芭芭拉偶尔会光顾两家各有特色的餐馆，他企图在那里袭击我。幸运的是，他在守候着的时候，我们再也没出去。他离城而去，后来只在西海岸出现过，在那儿他坦白了一切。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将第一步放在东欧问题上。这虽然只是个开始,但它是一个努力去利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变革迹象并将之推向积极方向的重要行动,当然其力度要让莫斯科能接受。关于冷战核心问题的演说则需要严肃认真的准备。虽然这是总统首次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但在美国这一演说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大家都公认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和媒体的事先沟通不够,而华盛顿的记者则误以为如果我们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要说,也不会选在汉姆恰迈克那样的地方。

在欧洲和苏联情形却不是这样,在那儿总统的演说被详细地报道。东欧各国媒体,是按照各国政府对待改革的态度以及能否赢得美国的援助为标准来划分阵营的。因此对布什总统的演说,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应是谨慎的乐观,保加利亚是犹豫迟疑,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则是消极的,罗马尼亚则保持沉默。苏联的反应是复杂的:《真理报》在总体上持欢迎态度,它有选择地赞赏布什总统对苏联改革的积极评价以及总统对发展美苏关系的乐观展望;莫斯科的国际电台更多地则是批评,它宣称布什总统的演说在整体上仍充满冷战的意味,它猜测布什总统已显然陷入了在东欧击退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对东欧各国二战后的政治道路的历史选择,若企图提出任何质疑,它警告将必然导致向冷战的倒退。

宣布我们对苏联的未来战略,费了不少时间。因为嫌此战略构想进行得太慢,我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立意于我们未来的打算,为总统另起草了一份演说稿,其间也吸收了早先里斯及其他人所提报告中的思想。这一战略认识到,苏联出现了新气象,而对苏联声明的他们将信守的原则,则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这是一个普通的战略,但它却表明了我们与莫斯科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总统于5月12日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演说中宣布了这一战略。

总统得克萨斯演说的大部分内容反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中的意见：即美国应超越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旧思维，我们应将苏联理解为一种国家共同体；我们应做出一个承诺，以促使苏联走向更开放并对我们的行动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最后，我们的目标是欢迎苏联回到国际大家庭，但莫斯科应证明它的诚意。

> 苏联说它正寻求世界和平并批评它自己的战后政策。对这些话我们只能喝彩，但一种新型关系靠莫斯科说句话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也不是别人所能恩赐的，它必须去争取，它之所以必须去争取，因为光承诺总是不够的。

苏联理应采取积极的步骤。如削减其常规武器，允许所有东欧国家享有自主权（即拆毁铁幕），与西方一道努力来加大这一切的实际进展的力度，并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世界各地的地区冲突，始终奉行政治多元化和尊重人权。最后，与美国一起来对付诸如毒品贸易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

为了引起人们对新战略的注意，也为了帮助美国人民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意图，我们在演说中加进了几天前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向总统提出的建议：重新开放我们的领空。这一设想最初出现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它允许美苏两国的非武装的侦察飞机飞越对方国家的领空，我们建议将之扩展为美国和苏联双方盟友间的领空。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认为，开放领空的建议有点耍花腔的味道，它可能还会造成这样一种错觉：我们没有创新的思想能力，只得倒退 30 年来寻找

一个老做法，但毕竟我们现在可以让众多的盟友来做此类的监视工作。我不再争论，因为我不能提出更好的建议。

乔治·布什

我并不认为开放领空是个很坏的主意，因为从我方来看，这是一个无风险的方案，而承诺开放的戈尔巴乔夫，会发现从国际社会关系的角度很难反对这一提议。“开放领空”的做法是过时的，但戈尔巴乔夫赋予它新的开放势态。我想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去争取。我知道怎么样才能飞越美国，在国防上是有些棘手的问题，但我觉得困难并不是太大。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如此开放，因此我相信苏联从我们这儿所能猎取的额外情报是非常少的；相反，我想他们会因为这一自由侦察飞行而遇到不少问题。如果戈尔巴乔夫赞同这一计划，我们只会获益——对苏联我们要知道的东西有很多。

总统 5 月 21 日在波士顿大学的演说，是系列演讲中的第三讲。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毕业典礼，因为法国总统弗朗西斯·密特朗也要发表讲话。两位总统在肯尼邦克波特开完会并举行过联合记者招待会后，一起旅行至波士顿。虽然波士顿的演说主要是有关欧洲问题的，但也涉及到苏联问题，布什总统还有意突出了我们对苏联关系的乐观态度，对他们那儿正在进行的积极变化表示赞赏，但总统强调苏联的变化固然是令人振奋的，但它只是刚刚开始。他们仍然拥有可怕的军事机器，故我们仍将把解决欧洲的军备竞赛问题置于优先的谈判位置。总统告诉学生们，我们向往“一种真正的和平，一种欢乐的和平，但并不是军营里的和平”。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布什总统于 5 月 24 日在海岸警备学院发表了他四个演说中的最后一个。这次演说的准备情况较之以前的要复杂得多。假如

这次演说紧接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学院的演说之后，我们就没有时间来准备了。演说的第一稿是由白宫的写作班子完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只作了少许的添加。总统因其语气强硬而生气地拒绝了提交的初稿，总统厌烦了那种将他紧紧捆绑在冷战战车上的争吵。他觉得这份初稿是篇夸夸其谈的、强硬的、充满"好斗的"冷战思维的东西，这不是他真正想说的。总统不满意的后果是，在撰稿者修改这些不妥以前，我先为它忙了一夜。

为了适应演讲的地点，演讲稿讨论了 1990 年的军事战略和军备控制，指出我们想保持一种有效的核威慑力量，但也将寻求推进削减核军备，当然这种削减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进行并保持可靠的最低限度的核武器数量。总统指明了在军备政策上我们战略思想的要义，而将军备控制和苏联变化的进程联系起来，以及将军备控制与需要和莫斯科建立一种更稳定的全面关系联系起来，就不单是军方的事了。中程核武器条约和戈尔巴乔夫提出单方面削减常规武器，都为欧洲彻底摆脱战争的危险提供了机会。为了继续发挥在得克萨斯的演讲内容，布什总统呼吁苏联实践其承诺，抛开其进攻性的军事战略，照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样子，将华沙条约集团改变成防御性的联盟。演说受到听众的良好反应，不过某些媒体仍认为这是一种强硬路线，只不过它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明了我们的裁军和军备控制战略必须利用迅速变化的安全环境。

海岸警备学院的演说结束了我们针对东西方冲突多事地区的新战略的公开阐述。这一战略是谨慎和深思的，也是迅速变化和动荡时期的一个合适的政策；它为我们设想的实施提供了一种极其稳定也极有意义的框架。我们正努力从军备控制战略上的旧的、狭隘的老政策，转向一种广泛的旨在减少战争威胁以及推进真正和平的对话——它包括推进东欧的进步、解决 CFE(欧洲常规武器)以及地区问题。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促成一个"新"苏联，以使

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一个可信赖的角色，成为一个对美国及其盟友更少威胁的国家。

第三章 统率北约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构建我们的新战略之际,我们面临着一大堆的实际问题。我们要为5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峰会议以及7月底的七大工业国首脑经济会议作准备。虽然大多数北约组织的首脑会议进行得都很顺利,但这次却有些不同寻常。时值北约组织40华诞,而戈尔巴乔夫12月份在联合国演说中所刮起的重大裁军旋风,也使这次会议、还有我们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

北约组织面临着两个迫切的难题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东西方关系的变化又影响了对它们的正确认识。首先一个难题是,已列入计划的裁减欧洲常规武器(非核武器)的谈判;其次,则是更为棘手的北约关于短程核武器的政策:即这些武器的现代化、何时以及是否要去谈判裁减这些武器的问题。虽然对北约来说,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却是枯燥乏味的,而且也要选择好的谈判时机。戈尔巴乔夫正在散布其广受欢迎的关于东欧和平与民主的说词,而我们却仍在这儿傻乎乎地争论西方的坦克和导弹数量。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迹象,再加之以戈尔巴乔夫热情的宣传活动,促使西方一些政治领导人对是否需要增强实际防御能力产生怀疑。而且特别是在德国,他们又提起了这一敏感的话题:是否要保持我们现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器?苏联似乎早已跨过了冷战

时代，一时间引得德国人对美国军事存在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要使德国哪怕坐下来讨论核武器问题，要使盟国之间步调完全一致，都将是非常困难的外交工作。

虽然政治环境很不利，但解决欧洲常规武器和短程核武器问题，却有其迫切的政治必要性。布什总统和我都坚持，北约组织需要改进核武器，这一主张贯串于整个布什政府期间以及美国一贯奉行的政策中。这些武器可以抵消华沙集团在常规武器上的优势，而这一优势仍然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是北约的"官方"立场，美国和英国也持同样的看法。北约的这一立场遏制了在西德日益滋长的噪音，在德国，公众对核武器的抵触情绪特别强烈，而赫尔穆特·科尔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内政治而不是这些武器。

因为苏联拥有一种射程在 300 英里以下的核弹，这种短程导弹肯定无疑会瞄准德国(东德或西德)境内的目标。因此，西德觉得自己正成为核武器进攻的挡箭牌。西德的强烈而有组织的反核运动，极大地刺激了反对改进核武器的声浪，不仅不改进，相反它要求销毁现有的核武器(我们有 88 个发射装置，而相应地苏联则多达 1400 个)。在西德的压力下，北约在 1987 年 6 月几乎已经同意，在北约形成一种联盟一体化战略与军备控制的广泛共识以前，推迟作出任何关于改进核武器的决定。这一意见被及时地提交给北约组织 5 月份的首脑会议作进一步的讨论完善。面对如此烫手的政治难题以及政治支持率的下降，科尔与其政治盟友、自由民主党的汉斯·迪特里奇·根舍(时任外交部长)希望，将讨论延期到德国 1990 年大选后再进行。

在另一方面，对大多数北约组织成员来说，在我们成功地抵消华沙集团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并实现军备总体平衡以前，是美国和英国坚持既不可削减核武器数量，也不能停止对它的改进。此外，苏联裁军对我们也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下面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促使苏军撤出其占领的东欧地区，在没有镇压危险的前提

下，敦促其允许东欧政治自由的发展。北约成员大体上同意，常规武器的谈判理应优先于核武器谈判；但好几个成员认为，照顾德国国内关于推迟核导弹改进的政治要求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同情科尔的困难处境，尤其是当我们想去做点什么以在政治上助他一臂之力时。我们赞赏他与社会民主党相对立的政治态度，社会民主党自从赫尔穆特·施米特领导以来，就已转向了左派。他们现在则支持削减核军备，他们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的传统主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迁就苏联。眼下的问题中有部分呈现出这样的态势：西德的某些政治团体，其间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与绿党，似乎乐于陶醉于戈尔巴乔夫有关裁军鼓噪的表面文章。在我们削减北约的防务力量以前，布什总统和撒切尔首相，都要求苏联在裁减常规武器方面拿出实际行动来。

1 月 14 日，北约和华约已同意着手进行常规武器的谈判。这一谈判将被纳入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①] 的议程框架内。我们坚决支持北约的一个建议，它将由贝克于 3 月 6 日左右在维也纳召开的大会上提出。它要求：为了建立一种均衡的军备态势，北约与华约的裁军不是对等的，北约裁减的幅度是其目前军备总量的 5%—10%。北约的建议立即遭到广泛的批评，人们认为它是不适当的和难以想像的，因为它对北约要求极少而对华约要求极多（每一类别武器的削减幅度，华约都要超过北约 50%）。不过，华约以及华约的代表谢瓦尔德纳泽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他们可以接受：提议双方更进一步地大幅度裁军。

谢氏的建议有点让人喜出望外。我们已有准备，莫斯科可能会抖出个新花样来让北约为难，而苏联表现出的意愿甚至是渴望，竟然是希望推进比北约提出的幅度更大的削减，或者说比北约拟打算削减的更厉害。这就为布什政府沉湎于冷战思维而对苏联提

---

① 于 1975 年成立于赫尔辛基的东西方安全问题论坛。

出的机会无动于衷云云一类的抨击，又添加了新佐料。里斯·阿斯宾议员是参议院军事后勤委员会的主席，他指责北约缺乏一种见识来签订新的结束冷战的安全协定，以至于“我们看上去像一群斤斤计较的账房先生，而戈尔巴乔夫看上去则像一位想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朋友”。非议远没有从戈尔巴乔夫那里争来主动，而只是突出了我们的问题，这使我们的处境更为被动。

关于短程核武器的争论，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更是搅得北约不得安宁。要赶在首脑会议以前形成一种签订协议的共识，的确我们必须表明坚强的北约正在掌握着主动，即向公众保证，是西方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将为欧洲指明未来之路。北约组织内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且当事人双方都个性强悍。布什总统和撒切尔首相是这一秉性的一方代表。撒切尔对任何可能削弱北约防务的迹象，总是坚定不移、寸土不让地予以反击；相反，另一方的科尔总理却一个劲地在呼吁、至少也是在要求，延缓对核导弹的改进，推迟着手讨论削减核导弹问题。要使双方走到一起，则需要有一种更为坚强的毅力。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为了首脑会晤的成功而及时解决这一分歧，并且是以一种增强北约团结、且使我们领先于戈尔巴乔夫的方式进行，将是对布什总统统率北约权威的首次考验。

乔治·布什

我一直以为，为了欧洲的和平以及领导北约的义务，美国一直承担着太多的责任。到 1930 年，我们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是错误的。当欧洲开始与法西斯浴血奋战时，我们却袖手旁观，但为了重建欧洲的自由，我们却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当冷战开始时，西欧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前线，北约联盟则依赖美国为其指出方向，美国总统将成为领路人。

我认为，在处理外交与统率北约联盟以及其他事务中，个人之间的接触也是重要途径之一。有些人以为强调领袖之间的个人关

系是不必要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亨利·基辛格曾向我进言，对于增进国家利益，个人间的关系帮不了多大的忙。他指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会因为他喜欢另一位领导人而改变其政策；相反他估计有这样一种危险：如果一个人希望友谊能使别的国家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他就会幼稚地沉湎于陶醉之中而空欢喜一场。但是对我来说，我想这一危险是不会发生的，我以为个人外交和政府外交是可以携手并进的。

美国总统与其对手建立联系，确实有着很明显的理由。如果一位外国领导人了解美国总统的习性和特质(反之亦然)，那么双方就很容易做到准确地了解对方。个人关系可能不会解决双方之间的棘手问题，但它能够提供一种充分的善意来避免某些误解；这种个人间的理解还有助于一位总统制订和调整政策，而这又可能引起对方的呼应。有无个人关系能造成这样一种差别：猜忌与理解之悬殊，而建立个人关系能使双方获益，并给应付困难的政治问题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我计划将个人联系作为一种方法，向外国领导人表明美国关心他们并和他们站在一起，而不是隔岸观火。如果一位总统将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问题委派给低级官员，他就向外国领导人传达了一种冷淡的、甚至是蔑视的感觉。每个国家的领袖和政府的首脑都为其国家而骄傲，因此，他们理应受到真诚和尊敬的礼遇，而其间当然要包括和他们的友好协商。当大多数国家已经在尊敬美国时，他们想知道、并相信美国对他们也怀着极大的敬意——作为对其尊敬美国的回报、作为对其主权的尊重。明确地表示出我们尊重他们的主张是重要的，特别是当面临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去解决的重大问题时，你就必须去多交朋友。如果你信任某个人，这种信任是通过个人关系建立起来的，你肯定会获益多多。除非你审慎地努力，否则你不可能培养或赢得这种相互的信任和尊重。我是幸运的，我已经熟悉当今许多外国领导人多年了，而且常常是在

他们执政前就已和他们开始交往了，这更有助于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布什总统投入了可观的时间用于个人外交上。在我看来，这对我们外交政策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他与对手的直接关系对对方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乐于保持与布什总统的个人关系，他们不再是和我们仅有偶然的正式交往的陌生者。总统常与他的重要盟友和朋友进行电话交谈，而所谈的往往并非是某些特别的问题，只是聊聊天，交换对时局大致发展趋向的看法。其间某些领导人，诸如荷兰首相拉德·柳伯斯和埃及总统侯赛因·穆巴拉克，就成为我们的立场和主张的可靠和重要的传播者。几乎每天都有这类电话，有时只是就某件事的简短商谈，但更多的则是长长而详细的交流。总统乐于从事这份他自寻的活儿，他与外国领导人电话交谈的时间，大概比其四五位前任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这种联系意味着外国领导人熟悉他的个人秉性，了解他的基本看法，这样，当布什总统给他们打电话寻求支持时，就能得到积极而有益的回应。其结果是，一旦我们需要他们时，这些外国领导人就予以积极响应。这多半是因为和布什总统在各种情形下的电话交流，使他们知道他、了解他、也关心他。

那些对美国政策没什么重要意义的领导人，也是布什总统注意的目标。如在 1989 年末，他实际上和拉丁美洲的每位首脑都通了电话。于是，当我们在 12 月份出兵巴拿马以重建那里的民主原则时，其效果就显现出来了：若在过去，此类行动早已炸开了锅，因为这儿的领导人对外国人、尤其是对美国人的入侵特别敏感；但现在由于这些领导人了解乔治·布什，明白他的目的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结果他们对美国出兵巴拿马事件的反应是温和而相当低调的。

个人外交配合官方的外交，会极大地增强后者的效能。将政

府和国防部作为正规的渠道，再辅之以总统的电话交往，就会形成一种强劲的合力以有力地支持美国的战略。外交部长有自己的观察问题的途径，有时会与国家或政府首脑的见解差异很大，如法国外交部长奎尔·迪奥赛就享有与国务院作对和固执的大名。各国外交部长们都清楚，如果他们有意消极怠工，或者在某一问题上不积极投入，他们会受到其政府首脑的追查，因为布什总统的电话不时在提醒这些首脑，这对吉姆·贝克是极为有益的。这种方法给我们的朋友造成一种感觉，我们已做好了准备，我们用一个声音说话，我们在制订政策时，会和他们进行真诚的协商。

乔治·布什

我与外国领导人个人间友谊的一个范例，是我和布赖恩·马尔罗尼的关系。他是加拿大总理，他在作为一位朋友和作为一位政策顾问的高参两方面都是我的一位挚友。在 1980 年我们就相识了，当时他是总理，我是副总统。我发现他好说话、爱交际并具有很好的幽默感。他目光炯炯，极富感染力。当他说“很高兴见到你”时是真诚的。在我遇到过的所有外国领导人中间，没有一位像布赖恩那样对国际事务持如此强烈的兴趣。当我首次当选为总统时，他忠告我要和我众多的幕僚搞好关系，他在任何时候都能轻松自如地给我提意见。我发现他的忠告总是以一种我喜欢的直接而坦率的方式提出的。他善于进言，也善于抓住要点，但他也是一个好的听众。布赖恩成为我政治决策中的重要一部分，我们经常通过电话或当面交流——因为他经常为赴宴飞抵华盛顿。我可以和他谈心里话，我也知道他会将我的意思准确地传达给其他领导人。我曾在一个问题上请他向戈尔巴乔夫解释我所承受的国内的压力——这里我意指的是有关立陶宛问题。我觉得我乐于请他帮忙，而让戈尔巴乔夫知道我和布赖恩谈论这些问题且没有别的官员和其他顾问参加，我想，这也不会对布赖恩有害。因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加拿大和法国有历史渊源关系)，故布赖恩与弗朗

西斯·密特朗也有一种亲密的友谊，因此他可以对密特朗的想法与顾虑提出忠告。

布赖恩证明，他既可以是一位坚强的加拿大领导人，也同时是一位美国的真诚朋友。当我们在讨论贸易或者环保问题时，他总是坚定地将加拿大利益放在首位；但即使我们在政见上有分歧，我们的个人关系仍使我们能坦率地讨论这些分歧，而且可以用悄悄地而非大张旗鼓的方式来解决它们。

2 月 11 日，布赖恩和我在渥太华会晤，探讨应付错综复杂时局的对策，此次主要讨论针对苏联的政策。当我和吉姆·贝克、布伦特、加拿大国务秘书兼分管国际事务的乔·克拉克以及其他人士汇聚一堂时，布赖恩询问我关于北约的设想。我对他说，在我们和苏联谈判达成协议以前，我们应统一我们的个别的和集体的行动，以加强联盟的团结，我特别担心的是德国。布赖恩说，作为反击戈尔巴乔夫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的一部分，布什总统作一次东欧之旅或许有好作用。如果我们带去一个处理那一地区问题的内容丰富的计划，带去一个教人们如何理解这一计划的指导思想，那将确实是我们在公关上的一大奇招，而这对戈尔巴乔夫也并非就是坏事。我想一次欧洲之行是个好主意，这将提醒人们注意苏联和西方之间的真正差异。我说："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力量。事实上我们是民主、人权和经济自由的守护者。"但正如克拉克所提醒我们的，西德（它位于北约的心脏地带，我们大部分军事设施也布置于此）一直是这种外交战中的关键，西方在这里正处于劣势。

西德成为反击戈尔巴乔夫在欧洲宣传攻势的主战场。戈氏 12 月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使短程核导弹的问题在西德掀起了轩然大波，也使说服德国公众认可早日改进核导弹的必要性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它还使德国政府急于尽早举行削减核武器的谈判。波恩辩称，此类谈判将证明西方是竭力想抓住时机的；而如果

北约拒绝谈判，德国联合政府将难以继续参加"冷战"——波恩隐晦地暗示这将损害美国对联盟的领导。

乔治·布什

在启动限制核武器谈判和推迟改进核导弹两个问题上，德国变得日益执着和坚定，他们反对等到我们处理完常规武器的谈判以后再进行这两项工作。对我、尤其是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德国在这些事情上正走向错误的方向，而在这些事情上的妥协是危险的。自打我结识赫尔穆特·科尔起，我一直以为他是美国的朋友，是北约团结的坚定的拥护者；但我也意识到他的政治危机可能会迫使他损害与北约的关系。我当副总统时，曾去欧洲帮助平息因部署"潘兴 2"中程导弹而引起的争吵，还目睹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当时我就拜访过科尔。改进导弹问题特别棘手，但这一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他来应付。如果德国联合政府有一个正确而坚定的立场，也可能使科尔的周旋有些余地，我担心德国人民会要他不理睬北约的其他问题。

科尔的基督教民主党联盟及其姐妹党基督教社会党联盟，与根舍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一起，共同组成了领导联邦德国的联合政府。为此，在讨论那些可能涉及选民支持率的问题时，科尔常常身不由己；而为了顶住那可能削弱他的党在议会中微弱的多数席位——在德国政体中，失去这一多数即要下台——的压力，他必须不断地和他的执政盟友妥协，他也必须时常防备着国内的政治投机者。数年前，自由民主党就曾这样干过，当时它从科尔的前任、社会民主党的赫尔穆特·施米特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退出去。根舍曾在施米特手下当过外交部长，并凭其自身的能量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我相信赫尔穆特·科尔会被说服。他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可能也是我所见的最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我尊敬他。不论他在投票

站的得票显得多么少(他曾非常成功地在选举快要结束时,一下子从落后攀升到大大领先),也不论他的批评者或者某些政界权威们如何宣称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他却总能东山再起。他的政治天赋极为深厚。他长青于政坛,不是靠迎合,而是靠理解与预知他的对手,并将他们的观点融入自己的决策中。他总是消息灵通,并针对对手的计谋而改变对策。归根结底,他靠自己的自信来领导国家。当他被各种势力挤兑时,我总能发现他努力为美国和北约帮忙。

赫尔穆特·科尔是一位体格魁伟又和蔼可亲的人,他有时又像一头巨大的熊。他爱开善意的玩笑。我常拿佩特拉·凯利去逗他,凯利是德美关系的挑唆者,她后来成为强烈反对科尔的绿党的领导人。绿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抗议、挤兑、嘲弄、威胁基督教民主党联盟。我在当副总统时,曾经在克里弗尔德做过科尔的客人,那次是为纪念早期到美国的德国移民。那时,绿党很好斗,而并非像其名称所表白的那样,是爱护树木的环保主义者。在宴会期间,他们集会游行,反对美国将核武器布置在欧洲。随后,凯利又闯入科尔为我举行的午宴上,她直冲向主桌,在她被保安阻拦以前,我转向科尔,并无恶意地问他:"这是你依恋佩特拉的激情呢,还是一种物欲的诱惑?"我想科尔笑得岔了气。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如果我们想去克服北约联盟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就必须着手进行常规武器的谈判。一旦我们了解常规武器的均衡达到何种程度——如果实际的削减已经开始进行的话——我们就清楚了我们需要何种核武器以及进行核军备谈判的必要前提是什么,而削减核军备的谈判是德国所盼望的。在任何情形下,销毁核武器都是不能接受的。至于核军备的改进,虽然早期的决策不怎么有效,但它有助于北约联盟下决心来维护核威慑和核防务的必要能力。我想延期核军备谈判,会使欧洲日益滋长的一种厌烦核

武器的情绪恶化，这很令人担心，因为它会拒绝进一步的加强防务的努力。苏联人在总体上的劣势，正是因为我们的强大以及这些年我们采取的坚定的政策，我们决不应该在决胜的关键时刻放弃这些政策。其次则是议会反对的问题。在战术核武器改进方面花钱，特别是如果不能保证欧洲会接受这些武器时，议会会变得怒不可遏。

2月10日，这是贝克按计划到波恩开始其初访欧洲的“交友”之行的前夜，科尔正式吁请北约联盟，德国希望关于改进北约的短程核武器的决议，推迟到1991年或1992年再作出，他指出目前的西德政府，要到1995年或1996年才会换届，所以希望这一决议延期到1990年以后，即在西德大选以后再讨论。这是一个突然的、令人不愉快的消息。贝克试图说服西德同意专门发表一个支持导弹改进原则的声明，但科尔的要求显然与贝克的打算背道而驰。贝克访问之初的不祥之兆，在他逗留欧洲期间变得更加严重。科尔的立场似乎变得愈发强硬。他不仅反复致电北约联盟要求延期作出改进的决定，即至少推迟到西德大选以后，而且他还要求北约重开与莫斯科有关削减短程核武器的谈判，他急不可耐地要在我们解决重要的常规武器均衡问题以前开始这一谈判。根舍更甚，在2月14日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要求根据苏联的裁军承诺，在总体上对改进核武器有无必要进行讨论。

面对联合政府日益减弱的政治支持，科尔似乎是准备采取行动，因为对于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来说，核武器问题是个重要的焦点问题。4月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德国的一次选举表明，近乎2/3的西德人希望科尔下台。在4月中旬，他避开内阁，越来越强硬地坚持尽早进行核裁军谈判，这在北约组织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乔治·布什

为了面对面地讨论问题,我告诉科尔,建议他来一趟戴维营或者华盛顿,为解决目前的核武器问题我们进行一次特别的非正式的会谈。科尔坚持说,联合政府的现状使他难以成行,但他提出了派遣他的顾问、也是布伦特在波恩的谈判对手——霍斯特·特尔奇克前来的建议。我以为这也很好,因为特尔奇克深得科尔的信赖。科尔保证将很快安排一次访问,但结果却未能实现。特尔奇克之行的再一次取消促使我推断:科尔不仅处在推迟改进核导弹以及要求和莫斯科尽早谈判的日益增强的压力之下,而且他也觉得与我们会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他担心他被德国人民看成软弱无能。我为他的闪烁其词大伤脑筋,如果我们准备在北约首脑会议期间达成一种共识,我们就必须形成某种决议。

在4月12日,我会见了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沃勒。他曾在科尔手下任国防部长,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即将来临的北约诞生庆典之际的首脑会晤前,他期望我设法平息日益紧张的核武器的争论。他还提醒我,现在是制定联盟新方向的时候了。他认为:"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虽然我们做得很好,但公众却以为是戈尔巴乔夫在引导历史。"曼弗雷德提议,我们应立即统一联盟的政治理念,而不仅仅是应付莫斯科发起的军备控制的挑战,北约应确定其未来的方向。在一个政治激荡的年代,它应将自己建设成稳定和安全的堡垒。他警告说:"美国不要指望别人做出很多,相反人们所期待的是美国。"曼弗雷德是正确的,该轮到我去寻找一个解决短程核武器问题的方案,即一个将在首脑会晤前加强联盟团结的方案,又要为联盟制定出新的前进路线。

几天以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来到华盛顿讨论这一问题,他重申了在核武器谈判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一点在我就职典礼后我们的首次会谈中,撒切尔就已向我阐明了。我对她的担心也有某些同感。一旦我们开始谈判,在我们得以采取行动来确

认常规武器的均衡以前，要求销毁所有核导弹的政治压力会更加势头强劲。豪传递了撒切尔的主要意思：美国可以让开，让她和科尔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不愿意这样做。这部分是因为我们理解撒切尔与科尔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而且，她比我们更强硬，因为她对妥协的危险更敏感；而要与科尔达成共识，我并不认为这些因素是其间的有利条件。我想撒切尔尚不清楚我计划如何来领导北约，而她在短程核武器问题上采取的强硬立场，有理由推论，会对我与德国人达成协议造成更大的困难。我也希望，就如她对里根所说的一样，她将仍然会说美英之间有种特殊的关系。但是我下定决心，美国总统必须领导北约联盟。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出于关注德国的政治问题，于4月20日开会的北约国防部长们，起草了一份公报，基本接受了德国的将核武器的改进问题推迟到1990年以后再解决的要求；同时报告也建议保持“所有系列的机动核武器”。这一妥协性的报告发布还不到一天，波恩就炸开了锅，我们从媒体透露的消息了解了一些情况。执政的联合政府已投票要求，立即着手东西方直接的有关削减短程核武器问题的谈判。消息显示出一种蓄意的预谋，即操纵政治压力来迫使北约接受德国的立场，而不是通过秘密外交来解决问题。

乔治·布什

对于这种单方面的动作，我很恼火，我想它是一个损害联盟事业的典型例子。当我次日和科尔通话时，他解释说：联合政府一直忙于核武器问题，现已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一个内部的一致意见，他保证在一定时间内送给我看，当下周一根舍以及他的新任国防部长来华盛顿时，他请我会见他们。他们是来与贝克、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会谈的。他们的来访，将使他可以宣称德国在核武器问题上一直是和其盟友协商的。这暗示德国的立场尚未敲定，而他为了能提出这一哪怕不被采纳的建议，他也需要在国内获得支持。

我告诉科尔，我理解他的处境，而且我也不想干涉他的内政；但他应该在形成类似的决定并在将它公之于众以前，和我们讨论一下短程核武器问题。我不愿看到波恩向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既成事实”。我还坚决地说：“这一既成事实是意味着没有泄密，但它会把人逼向困境。”他谴责了他的三党联合政府的泄密缺陷：联合政府为此类问题的发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使我们之间以任何方式的保密都很困难；当北约部长们提出自己的方案以供讨论时，他则必须就此和他的政治盟友商量，这就无法防止人们探听其内容，也无法阻止争议的公开化。

我回答说：“那不成问题。问题是西德不优先采取一种坚定的代表联盟利益的立场。我们必须以某些公开的讨论来研究我们的分歧，并确立一种我们可相互认可的立场。我们必须‘现在’就确定这一立场。这样我们就能开一次成功的北约首脑会议，也使今天非常团结的联盟不致出现裂缝。”对于德国的策略，玛格丽特·撒切尔也怀有我那种不满和担忧。次日我告诉她，我劝说科尔应事先协商的努力以及我对缺乏他的合作的担心。事实上，她猜测科尔可能是在依靠美国和英国来压制根舍。她说，北约不是德国，而且我们也不能听任波恩来对联盟指手画脚；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能为北约而坚定地站在一起，科尔不可能从他与美国和英国的联盟中分裂出去，因为那样的话，结果是将“极其可怕的”；她强调，只能依靠华盛顿和伦敦来“拯救”北约联盟；我们必须对德国强硬，他们将其决定公开化是错误的。她愿意将自己的这一看法公布出去，但必须是作为北约的而不是她个人的。

撒切尔声称，来自有关首脑会晤的消息表明，盟友中不可能没有作梗的，不过它不会成功；她重申关于改进短程核武器的决策是不容置疑的，绝不容置疑；她还激动地说：“德国很清楚，联盟要依赖短程核武器的机动性，也因此这些武器才被保存到今天。德国人同意，在欧洲我们需要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综合防御，但是他们

却以其在某种核武器上的立场来反对这一原则！这不是科尔，而是根舍企图以其5%的德国选区(票)来控制北约联盟。”

不过撒切尔也承认，在本次首脑会议上，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迟布置改进过的核导弹的决议，而此延期决议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协议。她说：“重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一致，因为没有这两个国家，也就没有北约。”她询问是否至少可以公开我们的电话交谈内容，以显示美国与英国正齐心协力对付德国人。我说，我已经请求过科尔不要公开我和他的谈话，我们的谈话最好也等到我们与德国人在华盛顿会谈以后再公诸于众。当德国人来访时，我们将以一种亲密和友好的气氛来和他们讨论。

这次谈话充满了典型的撒切尔风格：坚强而有原则。这反映她察觉到了德国人的阻力以及我努力寻找一种变通的办法来对付科尔的重要性。这些年里我一直很佩服撒切尔的坚强。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77年的岁末，当时是在一个英语国家的活动中，我被介绍给她。她那时还不是首相，而我还尚未从政。我被她的演说能力所深深折服。后来作为副总统，随着我去伦敦以及她常来美国访问，我加深了对她的了解。撒切尔和我成为好朋友，但我遗憾我们未能成为密友，我们之间没有形成那种她与罗纳德·里根一样的关系。

撒切尔对里根怀有一种由衷的尊敬之情。通常当里根在国际会议上讲话时，他常请撒切尔作会议总结，让她作为他俩的代表发言，她也乐于做这种代表，“罗恩(里根)和我觉得”常挂在她嘴边。我一直牢记美英关系的特殊重要性，因而必须和撒切尔保持密切的合作，但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讲话。当我们有分歧时，我们可以消除它。在她的回忆录中，她引证说，我需要为自己的责任而坚持自身的立场。我想她的感想源出于我当初这样一个决定：对美国而言，只应有一个发言人。我知道她理解这一点，但相对于过去，相对于她曾享有的可以代表里根讲话的殊荣，这是一个大

变化。

撒切尔从来不是一个没有主见、也不是一个轻易放弃自己主张的人。我明白她何以成为如此强硬的一位领导人。她总是果断而毫不犹豫地说话或者道出与他人的差别。密特朗在辩论中，习惯于引用历史掌故来表达他的看法，而撒切尔则更倾向于从不计较细节坚定而率直地陈述自己的态度，她强悍但不粗鲁。她也是一位作风精干的人，而且知识渊博——尤其专精于军备控制。我佩服她的明智和见识，特别是她在处理欧洲和北约事务时的智慧。就如我向里根学习一样，我也向她学习坚持立场的原则性，而且我钦佩她的坚韧和她充分的自信。她不能容忍愚蠢，我也从未发现她对幽默喜形于色。她确实没有布赖恩·马尔罗尼、约翰·梅杰或者科尔所具有的轻松戏谑的性格，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确实比撒切尔具有多得多的幽默和风趣。

撒切尔从不掩饰她对美国深厚的好感，也从不掩饰她对我们两国间关系的倚重。她努力设法保持美英"特殊"关系的圆满性。她确实不希望我们两个国家在国际论坛上分道扬镳，而且如果那意味着她要做出某种让步的话，她也不会责怪我们，为此我非常感谢她。撒切尔对于欧洲的一体化有种敏锐的忧虑，因此，她视美国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伙伴，而且是真正的朋友。我相信她也视我们为一种平衡德、法间日益亲密关系的砝码，她深为这种关系感到担忧，她确实不太完全信任欧洲人。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像撒切尔一样，我也认为德国人的举动不是件好事。由于德国人在一个如此多方关注的问题上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形势变得有点紧张了，虽然德国人事后派出一个巡回游说团来解释他们的决定，但也无济于事。在4月24日，贝克、切尼和我会见了两位德国部长。他们虽然提出了好几个建议(包括单方面削减我们的短程核武器，同时又向苏联挑战，也要求他们削减到我们的水平)，

但除了缓和气氛，情况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一无所获。这一情形正在联盟中滋生出更大的危机。

美国和德国的立场走进了无法调停的死胡同，这一局面正在华盛顿引起更强烈的批评。参议员萨姆·纳恩——参议院军事后勤委员会的主席，他警告北约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以为我们没有一种战略能完全解决目前的问题，美国在北约联盟中有陷于孤立的危险；他声称，在没有决定和华沙集团谈判以前，要德国同意改进短程核武器，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公众会因此而觉得是我们不愿意进行短程核武器的谈判（很准确），而且公众还会以为连要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准确）。我们希望是将核武器的谈判推迟到实现常规武器的均衡以后，问题是要帮助科尔寻找到一种方法，既赞成我们的这一主张而又不会引起政治危机——或者说不损害北约的基本安全需要。

乔治·布什

科尔在5月5日又来电讨论这一问题。我告诉他，我对我们之间分歧的公开化感到很伤脑筋，我也设法和他一道努力来创造一种和谐的峰会气氛。他保证为了峰会的顺利举行，他要尽最大努力来及时地达成一个协议，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有点怀疑。虽然两天前他在罗马说过，他以为将核导弹问题的会谈与常规武器的会谈放在一起进行没什么问题，但我一直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削减常规武器的哪怕一丁点儿消息。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而没有任何进展。我一直在期望这一前景：赫尔穆特·科尔和我们之间的坦率讨论，将为达成真正的共识和为避免影响峰会的召开创造一种机会。

北约组织内的不和，使苏联人捞了大便宜。5月11日在莫斯

科，当贝克站在戈尔巴乔夫身旁时，戈氏宣布：苏联从东欧撤出500枚短程核弹头（苏联拥有的核弹头仍然远比我们的多）。当时，贝克觉得自己被蓄意地耍弄了。科尔和根舍欢迎苏联的决定，根舍还造势说，苏联的建议推动了波恩倡导的尽早开始短程核武器的谈判。西德和其他欧洲官员还在媒体上含蓄地批评华盛顿又一次让莫斯科控制了局面。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5月17日，斯托尔腾博格又来到华盛顿进行两天的会谈。他主要会见的是迪克·切尼，我参加了宴请他们的午宴。单派斯托尔腾博格一人来是科尔的计谋。他比根舍更同情美国的立场，而且他近来还曾为处理这类问题的失误批评过外长。德国的立场是：一旦苏联人表明他们认真对待大规模削减常规武器问题，特别是严格遵守维持同等水平的坦克协议，北约应该同意进行削减短程核武器的谈判，但其间没有提及要等到苏联的削减着手进行后，再开始核导弹问题的谈判。

斯托尔腾博格还提出了建立一个研究小组的初步建议，此小组研究常规和核武器各项谈判之间的相关问题。尽早谈判是大家基本的共识，惟一的问题是何时举行而不是是否要进行。我想将这一问题交给一个研究小组，可能会使联盟在首脑会议期间不会遇到冲突；但这在根本上只是一种拖延，是听任问题继续恶化的下策。除了认可谈判的原则之外，我怀疑这建议能给科尔帮上什么忙。虽然他最终似乎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但我们不能接受他们最初所采取的态度。

同时，我们已完善了我们自己的一揽子解决的方案。它包括这样的内容：在削减常规武器条约达成并着手实施——即明确地证明常规武器的削减——以后，短程核武器的谈判就开始；我们的方案还要求，在谈判结束后北约仍要保持一些短程核武器。我们

自信这一立场会符合德国所要求的一种实质性的进展,情况似乎正是这样。在5月21日,科尔的新闻发言人汉斯·克莱因告诉记者,西德认为我们的努力是为达成协议夯实了基础,但"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撒切尔对我们的新建议感到不快,尤其是因为我们事前未跟她商量。正如她在其回忆录中所叙述的,她一直希望联盟发表一个明确的声明来支持核武器及其现代化。她后来写道,她并不倾向于任何谈判,"而且,如果必须要达成某些协议的话,我希望的条件要比美国方案中的更严厉。总之,在'第三次销毁'上不应有虚假不实之词"①。

虽然我们为自己能和盟友协商办事而自豪,但这也有些例外,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知道撒切尔将会如何反应,故我们决定事先不透露一点风声。我们坚信我们必须对德国人表明我们的态度,这利大于弊;而假如我们和英国协商,他们的强烈反对的态度,则会使事情更棘手。

我们曾希望在北约首脑会晤前,先将短程核武器问题搁起来。现在只剩下两个星期了,却不曾料想这一打算被公开化了。我们必须以一种不破坏会议庆典气氛的方式,在峰会期间解决这些分歧。我们的提议就其本身而言,对于解决联盟的分歧是有益的,但可能不完善。我们必须给常规武器的谈判一个促动,而酝酿出一个新方案也许会推动德国接受我们有关短程核武器的立场,对于平息越演越烈的指责我们缺乏主见以及留恋冷战的声浪,这或许也会有所帮助。问题是如何去构造它。

我一直确信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大胆的创意,以加强我们的领导地位,以赢得我们对国际事务的主宰权,以巩固和支持北约组

---

① 见《唐宁街岁月》,哈泼·科林斯,1993年,第788页。"第三次销毁"之意见本书第86页注①。

织。无论何种建议都必须能充分有效地消除这样一种疑虑：美国只是为了解除其自身的压力，仅仅是在提出象征性的军备削减，而且这也不是出于迫切的政治战略的需要。毫无疑问，美国在北约中作出进一步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再说我们提出的任何裁军建议都会要求苏联的裁军幅度比我们的大。因此，这将会实际地推进而不是破坏美苏间的军事平衡。我原来的关于实质性大幅度裁军的观念就反映了这些要求，而且它还有额外的吸引人的内容，那就是削弱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在我们的讨论中，为了使这一裁军方案能摆上议事日程，我不时提出需要一个新的常规武器谈判方案，这对于总统想要采取的行动，后来证明是多余的。

乔治·布什

在这几周里，由于我们最初提出的有关欧洲常规武器的方案遭到冷遇，我渐渐失去了耐心，因为我从我们的军备控制专家那里，没有看到任何令人振奋的设想。研究完林林总总的参考文献后，专家组勾勒出了一些预案，但没有一个是我想要的那种大幅度裁军。在费力地看完大量的简报以及在和布伦特、迪克·切尼的几次会商后，我提出了一个方案：在北约大约320 000名的美国军队中削减25%，苏联也裁减一个同等数量。我想这一幅度大得足够表明我们是严肃认真的，而且这也是在实践我们所做的承诺，即呼应我们所目睹的苏联政治上的积极变化。我电邀迪克、布伦特、海军上将克罗以及其他人，于5月19日来肯尼邦克波特讨论我的想法。克罗的反应是震惊，他声称如此程度的削减将迫使北约作根本的战略调整。经过一番长长的争论后，我请他们回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制定出究竟我们可以多大幅度的裁军而又不危及北约联盟的安全。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任何幅度的裁军都不热心。但是当我向克罗讲明，我主意已定后，他们带回了一个削减30 000名，即裁减10%的方案。在我看来，其削减的幅度不够大，但我不愿意漠视参

谋长联席会议的任何建议。坦率地说，我想提醒方案的制定者，如果可能的话，要利用军方或者军备控制来争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明确支持。我决意不胁迫军队保持沉默，或迫使他们同意，在此情形下，如果我不再坚定地推动，五角大楼恐怕根本不会再往前走半步。克罗的本意是，裁减应包括战斗部队(与后勤支援部队相对)在内，其数量大约相当于军队总数的一半。这就可以使我们在数字上重新核算，在不计算非战斗部队员额的情况下，要求不少于20%的裁军。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也建议，达成常规武器协议的时间表，从两年缩短到6—12个月之间；而实际的削减时间被修改成1992—1993年。这个更短的时间表可能会使德国人更容易同意我们的一贯主张，即直到我们确认常规武器的削减正在实施后，再进行短程核武器的谈判。这是重要的一揽子交易，我们希望它能解决联盟内的政治问题，并向苏联和欧洲证明，我们是严肃认真的，是向前看的，而且准备冒着某些风险奋力将东西方关系推向一个新水平。

乔治·布什

正当联盟在裁军问题上喧哗不已时，5月20—21日我抽身来准备接待弗朗西斯·密特朗。自从2月份在东京参加裕仁天皇葬礼的宴会上会面以来，这还是我们初次见面。我邀请他来肯尼邦克波特是想专门为改善美法关系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因为最近几年来我们两国关系一直有些紧张。国务院和法国外交部常有些摩擦，而里根政府时的一些官员也觉得密特朗不好惹，坦白地说，他们不喜欢他，而且还随意说他的坏话，因为密特朗与里根不是好朋友。我想改变这一点，在肯尼邦克波特度一个温馨而安静的周末，可能会为此改变提供一个机会。

戴维营和肯尼邦克波特的环境非常适合于轻松的会晤。在戴维营，恬静的山峰、树木、小径，电影以及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都

有助于坦率地交谈，也为和客人进行私下交流提供了适宜的场所。在我们缅因州家乡，空气有点咸味，海货很多，海浪拍打着礁石，我们还可以在我的28英尺长的"忠诚"号飞艇上钓鱼，或者驾驶它飞驰在亚特兰大海湾的水面上。人们喜欢在白宫的会面，但这些会见是正式的，而且也不怎么有利于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

当我提出在肯尼邦克波特接待密特朗的想法时，芭芭拉以为我不会成功。大家都认为这是个最傻的主意，因为将要到我们这座非常普通的民宅来的，是由法国总统领头的一个正式的法国代表团。况且，密特朗又不是运动员，肯尼邦克波特平时的娱乐活动——像钓鱼、网球、高尔夫球、划船、钉马掌等，对他可能很少有吸引力。随着时间的逼近，一大帮法国先遣队来检查情况。就如我们会向他们提出的一样，他们也提了很多问题。芭芭拉和我决定将密特朗安顿在我母亲用过的平房里。这是一个独立的小建筑，与我们的房子相邻，位于过道的尽头；可是，我们很快就担心这一安排是否合适。

正如芭芭拉在其回忆录中所描述的，这座木质平房已有70年历史了。除了大约30年前添加的设施以及季节性的打扫外，这座平房就未被修缮过。我们的女儿朵拉领着法国先遣队走进房子，指给他们看密特朗将下榻的地方。因为还是春天，加之那年我们是刚打开屋子，里面看上去有点脏和潮湿。更糟的是，我母亲的病床仍在屋里，用芭芭拉的话说，情形看上去"有点寒酸"。朵拉请疑惑的法国人不要担心，我们会为他们的总统收拾好一个新的、宽大的床。朵拉说，最尴尬的是她向他们展示浴室时，因为当时在坐便器的上面还有一个升降器。芭芭拉组织并率领一支清扫的队伍，日以继夜地干了好几天，把平房和正屋收拾停当来迎接贵客的来访。升降器被移走了，搬进了一张不错的新床，还安上了专门的电话。一切就绪，我们的小农舍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著名的客人。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用那么担心，密特朗喜欢这儿的一切，这是

1995年当我在巴黎拜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他还说，他当时陶醉于那种家庭般的气氛。

我认识密特朗有些年头了。当密特朗在1981年首次当选总统时，里根总统要我去巴黎，向他表明我们加强两国关系的愿望。里根对他宣布将任命两名共产主义者为政府成员感到担心。我清楚地记得，密特朗告诉我，他是将任命一些共产主义者为部长，但这无关大局，"再过五年时间，共产党的得票数将从14%降至7%"。从这次会见以及以后的一些交往中，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那就是密特朗觉得我们对共产主义过分担忧，我们将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归类为侵略性的斯大林主义了。国务院怀疑那是他有意造势的策略，而且认为他被共产主义欺骗了。但事实证明，密特朗是正确的，法国共产党所得的选票在1977—1987年间下降了一半。

我从政之初就和密特朗建立了一种友谊，但直到我退休时我们之间也说不上亲密。我曾自忖，他是不是怀疑，我作为一个保守派可能会更同情戴高乐而不是他。他知道，我和他的一个政敌、后来成为巴黎市长的雅克·希拉克是朋友，而且我衷心地钦佩他。但我觉得我和密特朗的关系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值得回味的。

我喜欢密特朗的决策方式。每当我和他在电话中交谈困难的问题时，他总会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他告诉我他准备做什么，然后他果然去做了。我也乐意倾听他的历史故事。在政府首脑聚会时，他爱用事例来说明历史是如何有助于我们分析当前问题的。他有一种平静的幽默感，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面蕴藉着含而不露的温情。

在里根时代，外交礼仪的繁文缛节已成为友谊的障碍。每逢首脑会议时法国和美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就比其他同仁——比如就比其他七大工业国首脑享有不同的礼仪要求，即一个总统的级别不同于一个总理。他们各自的秘书在国际会议中，发展出一种

强烈的突出自己国家首脑特权的竞赛。我对所有这一切不感兴趣,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我可以听从密特朗,我会乐意去做,我以为,我这样做不会损害美国的威望,因为他是长者,他从政比我早,所以他为什么不能享有这种尊敬呢?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有不同意见,就坚决地说出来,不要拘泥于地位或者身份。密特朗对我一直彬彬有礼,虽然这一好意没能自始至终贯串于两国政府之间,但我们为求得彼此的谅解而努力且不让分歧恶化。和法国这位聪明的领导人相聚的时光常使我留恋,他的国内社会主义的政策固然与我的政见相左,但他证明他是一位可信赖的伙伴和朋友。

在肯尼邦克波特,密特朗和我讨论了北约的裁军问题。几天以前,他曾支持过美英的立场,即在导弹问题谈判以前,北约应等待观察苏联削减常规武器的进展情况。我解释了我们将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谈判捆在一起并胜出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我提醒他说,撒切尔期望我们目前的立场不要变,但同时努力去找到一种方法来帮助赫尔穆特·科尔,以防止北约出现分裂,这也是必要的。

密特朗坚信,即使科尔本人认同美国立场,但他仍不能不受反对在德国部署核武器的公众舆论的左右。密特朗补充说:“其间有许多因素,但戈尔巴乔夫的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况且那里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失败、共产党、中立主义者、绿党以及‘现实主义者’。”虽然他们之间还没有任何政治协议,但这些组织已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说“不”的战线。密特朗以为:“这培植了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的立场:抨击核武器,并倡言苏德之间可以达成一种引导两德重新统一的协议。不过,这只是一种梦想。因为欧洲人和苏联人一直担心德国的扩张,在苏联人的脑海中,有肇始于12世纪的德国扩张主义,还有日耳曼骑士,他们对德国有很深的猜忌。”

密特朗说,虽然他是德国社会主义党的朋友,但在北约框架内却很难说服他们,他宁愿做科尔的工作,而且我们还可以帮助他。

他说,“非常坦率地讲”,问题是科尔与撒切尔是死对头。他还透露,“科尔称撒切尔为‘那个女人’”。撒切尔对法德的轴心关系也深感不安,“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大不列颠一直在设法阻止大陆国家间的结盟,这一点在大不列颠的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

密特朗继续说,“尽管如此,严格地说弄清楚我们在布鲁塞尔的目标是重要的。苏联虽提出‘第三次销毁’①,但在目前情形下,由于苏联在常规武器、化学武器以及核武器上的优势,这是不能接受的。第三次销毁也不可能促进军备平衡。科尔也同意,但他不能多说,所以他说‘让我们谈判’。我们应帮助他维护面子,他赞成拒绝苏联的‘第三次销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削减常规武器”。而核导弹的改进之需尚非如此迫切,它可以等到 1992 年以后再进行。

为继续打听他对热点问题的看法,我问密特朗,他对德国重新统一是怎么想的。

他推测说:“只要苏联强大,这就不会发生。因为自 1917 年以来,苏联就受到周边包围的大压制;自他们的国内战争以来,他们就一直有种身处围城之中的心理,现在他们又有东欧问题、波罗的海等等问题,所以他们不会再给德国统一一个机会。”

我又问:“你如何理解德国再统一的问题呢?”

他回答:“如果德国人民愿意,我不反对。但自二战以来的变化还不足以允许这一统一。”他认为在未来10—15 年,不会出现这种统一。他就此又补充说:“苏联人不会在德国问题上让步,戈尔巴乔夫很高兴东德是其营垒中最保守的一员。”

我又问:“戈尔巴乔夫能控制局面吗?”

密特朗承认:“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天事情会发生变化。”

① 双方已销毁了战术和中程导弹,销毁短程核导弹将是第三次削减核武器的开始。

不过他确实仍没有看出德国人在追求统一。统一的进展程度，或者西德对核武器问题的态度，都可能会构成新的事变的“导火索”。

密特朗不想乘“忠诚”号外出兜风，故我们选择了一次午后的森林散步，他妻子丹妮勒作陪。当时是缅因州最美的季节。我深信这次轻松、友好的访问，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彼此间的信任，在未来的岁月里，在我们之间一旦出现分歧时，这一信任会使他不会责怪我们。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肯尼邦克波特的会见，是总统个人外交最成功的一个范例。这个周末所建立起的关系，在以后三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实际作用。尽管两国间偶尔也有很大的分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个人间的修好却能形成有效的合作以圆满地解决问题；只有在诸如关税及贸易协定的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北约组织的未来走向等少数问题上，出现了乔治·布什总统难以预料、也和肯尼邦克波特友好气氛不和谐的对立；至于短程核武器谈判所面临的困境，密特朗似乎觉得科尔被挤进了死胡同，他需要一条脱身的退路，一条能够尽量保持其政治体面的退路。我希望布什总统有关欧洲常规武器问题的新的最佳方案，将会给科尔一个机会来同意推迟核导弹问题的谈判，因为此方案中增加了缩短最终签署削减核导弹的时间表。

参加我们在肯尼邦克波特会谈的还有雅克·阿塔里，他是我在爱丽舍宫谈判的对手。华盛顿大多数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不是一个有趣的人，人们广泛地以为他才华横溢、傲慢、偏狭以及在总体上反美，但我发现他极为聪慧，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还有一种惊人的运用英语的能力，他因此而自信——甚至有点自负。在各种外交事务问题上，我们曾作过有趣的交流，有时我们看法一致，有时各执己见。面对我大多数同事的怀疑，我们相处得很好，而且成为一对好朋友。他和密特朗总统关系很亲密，看上去他了解密

特朗的想法并参予他的运筹，他确实对密特朗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他不反美的话，他也对美国持一种优越感；但即便如此，他总是起促进作用的，而且我们两人都满意于我们的关系。

大约一年后，阿塔里离任，继任者是阿德米内尔·雅克·兰克谢德。他曾是密特朗时代爱丽舍宫里一位低级官员。较之阿塔里，他是一位与我在精神气质上更为接近的人物，而在关于欧洲战略和军事问题上，他的见解与我的观点很相近。他确实没有阿塔里那种和密特朗的亲密关系，而爱丽舍宫的人事安排使得兰克谢德未能成为我的真正谈判对手。他的办公室与总统府隔街相望，当我们的直通电话装好后，法方的仪器立即在密特朗总统办公室外面安置好。当我要给他打电话时，必须要事先通知他，为了使他有时间穿过街道来接电话。这些保安措施简直是不顾一切，而只要热线电话的安全。

尽管有这些障碍，我们还是达到了彼此间的深刻了解。后来在“沙漠风暴”期间——那时我们的关系，我想也是美法两位总统间的关系是极为融洽的——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大约6点钟，兰克谢德正在我的办公室。当来自布什总统的电话使我的私人话机铃声大作时，我们正在深人地交谈。打电话来的是布什总统夫人，她问我是否愿意和她、还有总统一道去当地一家中餐馆吃饭。我问他们准备何时动身。芭芭拉回答：“马上！”为不使客人为难，我说我正有一个约会，一时难以走开。5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布什夫人问：“你的客人是阿德米内尔·兰克谢德吗？”当我说“是”后，她说：“带他一道来！”这样，雅克和我与布什一家一起挤进一辆轿车里，奔向维吉里亚的郊外，共用了一顿美妙的晚餐。这件事情大大出乎阿德米内尔的意料之外，而这在巴黎更是难以想像的，但这却是布什总统的典型风范。

关于欧洲常规武器问题的方案，费了很长时间才在政府内部

形成共识。现在我们忽然发现快到5月底了，北约首脑会议快开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有关常规武器的一揽子计划的潜在影响力，我们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制定的，只有少数高层官员接触到它，而且我们也不事先和北约盟友协商，盟友们完全不知情——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在历史关键时刻出笼的重要提案，因此理应尽可能保持其完整性。如果我们通过正常的北约组织程序送交这份提案，其内容就极可能被歪曲、被篡改，更不用说还有泄密的危险了；不过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形下，在首脑会议上突然将此方案提交给盟友也会有副作用，如果事先向盟友们提交方案，使他们有几天时间来审核，也是一种重要的礼貌。因此我们想在散发给各国首脑的会议公报中提到它以前，悄悄散发出我们的方案，以使首脑们有机会来思考它。在北约内部可能发生争论之际，为了增加获取盟友支持的机会，阐明我们的战略是重要的。

为了实现我们的预想，也为了突出我们着手解决北约困境的重要性，我们采取这样一个策略：派遣雷利·伊格尔伯格和鲍勃·盖茨穿梭于欧洲，向英国、法国、西德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来解释这一揽子计划。除了伦敦，所到之处他们两人都受到了很热情的欢迎。撒切尔个人对他们表达了友好的欢迎之意，然后友善地送给他俩"长得像孪生兄弟"一样的评论；但她对我们的议案很冷淡，她在开始和结束谈话时都说了句"我很担心"。撒切尔由于下面两点而不快：制定这一议案时事前未跟她商量；她担心议案中所包含的削减一定数额军备的内容，可能会鼓动戈尔巴乔夫又试图要求其他领域的一揽子谈判。尽管她不开心，但她在会见结束时仍说了句很有分量的话："如果布什总统想要这个议案，我们当然会支持。"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5月26日，我们出发参加北约首脑会议，计划的行程中要路过意大利。我们选择这条路线不仅是因为我们想向意大利人更为充分地阐述我们的议案，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即如果"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30日)我们在欧洲的话，将去拜谒美军烈士陵园。途经意大利是一个好主意。这里的美军烈士陵园，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到过，因而这是一个纪念很少被提及的安济欧登陆的好机会。安济欧登陆是二战中一段痛苦而艰难的岁月，于是我们的意大利之行变成了一个庄严的选择。位于内吐鲁的美军烈士陵园很秀美，它被富有奉献精神的意大利工人精心维护着。拜谒仪式是动人的，气氛是庄严的，离开时我们满怀爱国的激情和深深的敬意——对所有将他们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而长眠在这里的将士们，心中充满悼念之情，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安葬在这片如此美丽的土地上而且他们的墓地被细心地看护着。

接下来的是礼节性的会见、宴会以及对我们方案的讨论，对此议案意大利人同意予以支持。离开意大利我们动身去布鲁塞尔。我们都很清楚，到首脑会议上一切才能水落石出。我们能够忍受德国控制联盟吗？我们能使英国和西德达成妥协吗？我们会因布什总统而成为联盟的无可争议的领导吗？我们能够超越戈尔巴乔夫的优势吗？我们能够扭转新闻界对我们的那种极端悲观的印象吗？这一印象是媒体从布什的外交政策中、从某些事例中演绎出来的，他们因此甚至怀疑布什总统的能力。

首脑会议一开始就不顺利。各国政府首脑和外长在品尝大会准备的会前咖啡时，显得拥挤和嘈杂，撒切尔对此感到不快而忧虑。尽管她再三向伊格尔伯格和盖茨保证不再争论，但她仍私下对布什总统重申她已流露过的担心，甚至在走向会议室的路上，她仍然说个不停。开会时她的座位与布什相邻。

会议正式开始后，布什总统细述了我们的四项建议。第一，促

使华沙集团接受北约提出的下列要求:削减双方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大炮;所有被裁减下来的装备应被销毁。第二,加大北约的削减幅度,即削减北约现有水平的各种类型直升机和攻击机,幅度是15%以内。第三,减少战斗兵力。美、苏在欧洲的兵力各自最多保持275 000名。这将要求苏联大约裁军325 000名(相对应的美国裁军30 000名)。第四,缩短达成协议的时间表,即6个月到1年,完成裁军的日期是1992年或1993年。

接下来讨论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这一议案是优秀的,其作用我们已有所预见,北约的主要成员对此议案尤其赞赏,很多人激动地即席发言支持它。首脑们的情绪是乐观的,即使是撒切尔,也热情地欢迎这一方案。在最有争议的地方,即在常规武器问题上,它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最初的反应也是赞扬的,戈尔巴乔夫在其首次的正式评论中,说他以"满意的心情"收到了这一新建议,并补充说,美国的方案是对华沙集团提议的"一个认真而专门的反应";他还说,这将使协议的达成比预期的要快。

要解决核武器问题的分歧,则显然困难得多。当首脑们讨论我们的常规武器议案时,那些一直就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的专家们,却未能取得丝毫进展。北约首脑们在傍晚决定继续推动谈判,不过是升格将问题提交给外交部长们。讨论很快停了下来,因为部长们准备了一个大聚会,但他们又传出话来说聚会取消了,只要了一些三明治。大家在晚上仍继续绞尽脑汁。

乔治·布什

在为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的宴会上,气氛有一点紧张,因为我们在等着外长们的消息。我的座位紧挨着撒切尔,她不一会儿就开始给我上课。她说:"我们决不在这个方案上后退,你不准备让步,是吧?"我们的主人曼弗雷德·沃勒为不使冷场,一直和那些在白天的会上未曾发言的人打招呼,并一起谈起下午会议的主题。他不停地讲述着外长们谈判的进展。对外长们能否达成协

议，而如果达成的话，协议能否为撒切尔所接受，我倒是没有把握。宴会结束后好久，大约到了半夜，吉姆·贝克打电话来汇报了协议的内容：常规武器的削减一旦着手施行，在与有关的盟友协商后，美国准备启动部分削减（不是消除）美国和苏联短程陆基核导弹到一个均衡且可验证水平的谈判。我吃不准撒切尔是否会同意，但吉姆估计她会，我请他和布伦特商量商量，他回电说，布伦特赞同此方案。我告诉他放手干下去，希望英国能接受这一方案。

荷兰外长汉斯·冯·登·布罗克是此次讨论的主席，在他的得力组织下，贝克主持了一场漂亮的谈判。大约凌晨2点，经过数小时充满火药味的辩论后，外长们终于达成了协议。我们用常规武器的议案来促进核武器谈判的战略奏效了。西德承认谈判一直是很困难的，并指出常规武器的方案帮助了他们接受核武器谈判的条件，而有关核武器问题的谈判此前他们是反对的。次日早晨，当我们又集合开会时，撒切尔大为振奋，我猜测她不愿意游离于美国，她的顾问也向她建议我们的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在此关键的辩论中，我衷心地谢谢她的支持。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北约首脑会议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沃勒的记者招待会几乎洋溢着一片欢快的气氛。记者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扭转了全部局势。即使我们后来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与记者之间产生了很多严重的不愉快时，他们再也没有拾起春天的老话题——即我们没见识、没战略、只是蒙头乱撞。

事后我们直接去波恩访问科尔。科尔着实兴奋不已，他给布什总统一个热烈的拥抱，就好像过去数周里的紧张和艰难从未发生过一样。在首相官邸的简短会晤后，两位首脑在花园里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科尔称北约首脑会谈是北约能得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而且也是突破重重困难后取得的“巨大成果”。这一情景与曾经弥漫于华盛顿和波恩间的紧张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

预计到6月18日,德国要进行欧洲共同体议员选举以及在莱茵—巴列丁奈特和萨兰举行重要的地方选举,因此绝不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科尔是有意识地将我们带到莱茵河的一条大游艇上。对他来说,这是一次炫耀美德关系以及展示他拥有伟大朋友的宣传之旅。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而布什总统发表的一个动人的演讲更将气氛推到高潮。演讲是在历史名城美因兹的莱茵高德·哈勒进行的。当时,听众挤满了屋子。

布什总统的演说是打开我们与欧洲和苏联、尤其是与德国关系局面的关键。其间一个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德国重新统一的敏感话题,对此,我们尚未形成定论,也未和德国人讨论过。提交给这次首脑会议的最初的方案文本,曾提到过两德统一,但我们考虑没必要刺激德国的民族主义,就又拿掉了它。

布什总统的演说是意味深长的,它收到了良好的反应。他谈到了欧洲的未来,呼吁拆除柏林墙,结束德国的分裂现状。值此机会,我们提出了"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的新概念,与"超越遏制"不同,我们确实想让它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另一个概念却不曾料想后来使撒切尔焦虑不安:原来布什总统在演说中称美国和联邦德国为"共担领导责任的伙伴",撒切尔将此看作是对美英间特殊关系的挑战。其实她没必要过虑,布什总统的表述并无否认这一特殊关系的意思,而仅仅是意在烘托气氛,为鼓励德国人而已。

乔治·布什

从德国我们又飞到伦敦,在6月1日会晤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是我们首次长时间的面对面的交谈。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见,其轻松的气氛恰好与过去数周,特别是与北约首脑会议期间的忧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她一直处于极度焦虑之中。撒切尔和我就广泛的世界事务交换了看法——从苏联到中东到南美的经济改革到种族主义。撒切尔消息灵通,而且富有见识。我还发现,就如我常常所察觉的那样,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看法非常

接近。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英国政府里查尔斯·鲍威尔是我的主要谈判对手。他和我一起作为书记员参加了这次私下会晤。我记不起来我何时和查尔斯相识的,当布什政府组成之初,我就对他有点了解了。我们很快就建立了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在此后的数月中,这一关系变成了一种宝贵的资源。我们的通信技术保证了我与在伦敦、巴黎和波恩的同僚们的直接而安全的电话联系。伦敦的热线是首先被安装的,当工程结束时,我们双方中任何一个人,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揿钮和拿起话筒,让对方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来就行了。快捷、简便的通讯使我们可以凭借它就各种问题来阐述我们的主要想法,并以此作为我们制定政策的第一步,而基于这一政策我们可以和对方更融洽地合作。

查尔斯是一位聪明、慢性子的人。他喜欢用一种最精确的方式来阐述问题,而这在他顽强地追求英国利益时,是很有些作用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了如何以一种愉快的、灵活的方式来探讨问题的可行性,我们觉得我们的原则适应于各种问题。我日渐深信他是惟一对撒切尔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和撒切尔关系密切,他非常了解她的想法,即使她有坚强的个性,也会被他很好地说服。在我看来,我和鲍威尔的合作以及这一合作对美英关系的促进作用,就体现了美英间的极为特殊的关系。

对我们来说,伦敦之行结束了一个紧张而焦虑不安的时期,也稳固地树立起了布什总统的威望和领导地位。布什总统通过用一种直接的个人接触的方式,促进了白宫和国防部两方面的齐心努力,终于使撒切尔和科尔跨越彼此之间严重而又错综复杂的分歧而相互沟通。而且经过形成共识和协商,布什总统又推出了一个重要的常规武器谈判方案,虽然欧洲常规武器协议的最终达成(1990 年 11 月)尚需时日,但朝向削减东欧苏军的第一步已经迈

出。我们捍卫了北约防务战略并振兴了北约联盟。

我们登上空军1号时很疲劳，但感觉不错。

第四章 “红萝卜”

虽然东欧之旅是附带被纳入到我们去巴黎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行程中的，但它却很重要。布什总统的亲临，将会以一种非常抢眼的方式来强调我们的新政策并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这也是一个抢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发动宣传战的好机会。我们将表明美国支持东欧的改革努力及其未来的西方化梦想。

波兰和匈牙利是选择落脚的理想的地方。他们符合总统在汉姆恰迈克宣布的获得美国援助的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标准，而且他们与东欧其他国家的立场尖锐对立。特别是波兰，正在敢为天下先地进行改革，正努力慢慢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匈牙利紧随其后，从 5 月 2 日起，它一直在拆除它与奥地利的边防关卡，它正在撕开“铁幕”的一角。这一拆除行动在后来的东德大逃亡中将有着更为巨大的意义。不过，对布什总统来说，还有一种特殊的和情感之约，需要他再访波兰，因为在 1987 年他曾作为副总统访问过那里。在波兰和世界人民看来，布什总统的那次访问，曾使当时的改革运动更有信心，也深受鼓舞。在和共产党总书记亚鲁泽尔斯基会晤后，布什总统还曾将多位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带到美国大使馆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而在波兰人民新的困难时期，布什总统的再一次到访，将会又一次带来美国的帮助和鼓舞。

因为 4 月 7 日开始举行圆桌协商会议，政治变革的节奏已在加快。波兰在 6 月 4 日进行大选，选举国会议员，而团结工会则进

行了一次真正的彻底整顿。协议为共产党在国民议会中保留65%的席位，但团结工会赢得了161个有效席位；而在100个参议院席位中，它获得了99席，在这里一个席位也没为共产党保留。这个结果令人瞩目，连最乐观的预测也未料想到。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使波兰总统的选举进程更加复杂了。

新总统将由国会议员以多数票选出。7月6日即在布什总统到达这里的前三天将为此进行预选。共产党失去了优势，团结工会、农民党和民主党都未表示要支持亚鲁泽尔斯基。面对失败的可能，亚鲁泽尔斯基——对他来说这一职位根本上是人为安排的——宣布他将不再是一位候选人，但他提议总书记切斯拉夫·基斯泽克扎克将军作为候选人。他当时任内政部长，在圆桌协商中他曾是政府的谈判代表，但他深受团结工会尊敬。按照协议条款，莱奇·瓦文萨将不被允许参加总统竞选，而团结工会的领导则表示，在国家充分民主化以前，并不想获得这一职位。他们要求工会或者支持亚鲁泽尔斯基，或者支持基斯泽克扎克，但公众支持那些共产党政权的代表，1981年的军事镇压已经被淡忘。在候选人上的僵持，促使政府在7月5日决定推迟总统选举，直到布什总统访问以后再进行。这意味着布什总统将面对一个不明朗的政治局势。布什总统的官方主人将是作为国务委员会主席的亚鲁泽尔斯基，而总书记将不再有作为新政治体制首脑所拥有的权力。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要对在波兰发生的显著变革以及在匈牙利进行的静悄悄的革命精心地设计出一种适当的对策，是我们这次旅行将要面临的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波兰有着种种问题：巨大的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生产力低下、巨额外债和士气低迷。华沙粗略地估算，在未来的3年里，它需要300亿美元的援助。毫无疑问，按照美国的政治标准，波兰有资格获得援助。波兰—美国委员会呼吁我们注意波

兰在实质性改革中所出现的紧缺，但是我们的困难处境依然没变：没有足够的钱，而在实际上，大多数经济努力还必须由波兰自己来做出。有一个积极因素即将出现——马上要召开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因为西欧对东欧的变革密切关注，我们可以借此会议的机会来建议分担经济援助。美国来不及准备好详细的援助方案，亦即难以形成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我们的资金已经不足，而我们的主要盟友和伙伴清楚，我们的巨额赤字对自己自身的经济增长也是个隐患。在我们的波兰和匈牙利之行后，因七国首脑会议的会期临近，我们可以真诚地告诉波兰政府，在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会商前，我们难以定出一个详细的援助清单。

带着这些担心，我们制定了一个一揽子计划。它包括一个重新安排波兰 390 亿美元外债的归还问题，向世界银行申请 3.25 亿美元的新贷款，并用 1 亿美元的美国基金"来促进波兰的资本主义化和私有化"。从政治视角来看，这一揽子计划只是杯水车薪，令人揪心而不安。虽然经济援助没有达到能对波兰的经济和它的政治改革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足够有效的数额，但波兰人民真正需要的是这种感觉：当他们面临眼前的经济困境时，美国和他们站在一起。当然，我们的一揽子计划还没有有效到来传达这一信息。

当波兰在奋力地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时，戈尔巴乔夫却在那年的春天和夏天在欧洲大讨其好。他在 6 月 12 日大肆张扬地正式访问了西德，在 7 月 4 日访问了法国，并于 7 月 7—8 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华沙集团会议，在我们到达波兰首都的前一天会议才闭幕。在访问联邦德国时，人们簇拥着戈尔巴乔夫，为他的进一步削减或销毁核武器的政治姿态而喝彩。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7 月 6 日，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前的一次重要演说中，戈尔

巴乔夫提议:如果北约愿意谈判的话,双方立即开始削减短程核导弹,以最终达到销毁这些武器的目的。这样的一个提议紧随在北约在此问题上所拟定的议案之后,很清楚其意在北约组织之内使坏,并再揭刚刚在首脑会议上好不容易痊愈的伤疤。此类事情的出现,使我坚信,在对付戈尔巴乔夫时我们要小心,至少在核武器这个问题上,其行为确实不像是一位真正的后冷战时代的苏联领导人。

在同一个演说中,戈尔巴乔夫似乎有意含糊地勾画出一个“欧洲共同家园”的设想。在华约和北约两个集团之间或在任何一个集团内,他呼吁反对使用武力威胁和使用武力。他这样说道:“任何对主权国家国内事务的干涉以及企图限制一些国家、朋友、盟友或任何其他组织的自主权,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以此含蓄地重申了勃列日涅夫的理论,这一理论声称,苏联有权阻止华约集团内任何游离社会主义阵营的企图;他还暗示莫斯科不会干涉匈牙利和波兰的政治变革。戈尔巴乔夫也建议,那些在1975年签署了《赫尔辛基最终协定》的国家再一次聚会,以为一个新欧洲设计一个蓝图,在那里,“惟一的战场将在自由贸易的市场里、在自由的思想领域中”。不过他的演说也包含了某些令人忧虑的信号。其中一个是他警告以压服社会主义来结束欧洲分裂的任何企图,将会是“通向冲突之路——如果情形不恶化的话”。尽管波兰和匈牙利都明确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戈尔巴乔夫仍继续表达了一种欧洲未来在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另外一个问题是,即使处于压力之下,戈尔巴乔夫仍然拒绝抨击中国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行为。这可能暗示他们仍想努力与中国修好,不过它也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暗示,即苏联仍企图镇压其卫星国里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布加勒斯特,华沙条约集团支持戈尔巴乔夫悄悄地否定勃列日涅夫的理论。他们现在公开声明,其成员可以决定他们自己

的改革步伐，可是，对其阵营中的日益增长的分裂，这一声明并未能完全遮掩住。由于波兰和匈牙利改革家们的政治“异端”性，他们正在遭到依然保守的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东德的猛烈的批判。

乔治·布什

戈尔巴乔夫的新建议在西欧迅速传播，使我的东欧之旅不得不应付他讲话中的这一提议：即在苏联削减其防务和军事装备以前，西方需要的不是等待苏联的具体行动。我的这次访问，主要意在鼓励那里的改革家们，故我必须小心说话和行事，华沙集团内几乎公开的争吵证明了情形很微妙。对东欧有可能的民主变革，我们有义务成为一种可靠的催化剂。我们可以支持自由和民主，但我们这样做时，必须采用这种方式：当戈尔巴乔夫游离其前任的铁拳政治时，我们对戈氏与党内强硬路线之间的政治纠葛不要显得幸灾乐祸。我不准备放弃我的原则，因为那样会触犯戈尔巴乔夫；但过激的宣传会和苏联与华沙集团的好战分子造成没必要的对抗，而且还可能促使他们起而反对这些变革，还有他们的政敌——戈尔巴乔夫。

苏联人担心我的东欧之行意在鼓动造反，或可能在无意中煽动起不满的情绪。其实我从未有过此类计划，我空蒙其冤。如果人们为了表达反对苏联的统治而聚集起来，形势可能会失去控制，一场热情的欢迎有可能演变成反抗现政权的暴动，而它将对这一地区日益滋长的乐观主义和进步的态势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取消了计划好的在格但斯克活动中的一次大型集会，而在我们到达布达佩斯后的一次演说中，我们则指望莱奇·瓦文萨能控制局面。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在华沙奥克西机场着陆的时间是晚上10点。这是一个

闷热、潮湿的夏日傍晚，我们受到了正式欢迎礼节的接待。没有任何群众，只有一大群迎接的官员，其间不仅有亚鲁泽尔斯基总书记，还有团结工会的代表。在布什总统和亚鲁泽尔斯基总书记分别讲话后，接下来是正步走和护旗队的军事方队表演，然后我们离开机场前往华沙城。路上站满了轻松自在和抱有良好祝愿的人们，他们挥舞着旗帜和打着团结工会的“V”字型手势。有可能是晚上闷热难当，故一些人来到街上，他们大概只是为了逃避屋里难以忍受的温度，当到了旅馆时我们就发现了是这么回事。这是一座现代建筑，装修考究，但空调系统却满足不了降温的要求，室内的温度比室外的还要高，窗户被设计得又打不开，我们真是犯了难。最后我终于设法将窗户开到适当的位置，并将地板上的卧具移近窗户，这儿有一点小风。饭店的解释是，这里没有充足的电来有效地开动空调系统。这是波兰经济多么恶化的一个不幸的迹象，它也预示波兰未来的征程将很漫长。

7 月 10 日我们的访问在诚挚的气氛中开始，一路都是正式的国事访问的礼仪，只不过它带有很多个人间的亲切。我们和亚鲁泽尔斯基、瓦文萨讨论了这些问题：将波兰推进到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为推进双方的合作下一着棋该怎么走最好。正式的日程以献花圈开始，向无名战士墓、向阿姆斯克莱格普拉茨的一个纪念二战中遇难的波兰犹太人纪念馆献花圈。这些活动以及排成长龙似的车队并没有引起市民的关注，只有稀稀拉拉的不多的市民来观望。我对于没有热情的波兰人民来欢迎布什总统很失望，特别是当我回忆起 1972 年尼克松总统献花圈时，这个广场上挤满了热情似火的人群。在当时，前面的人群将尼克松的轿车从广场中央的汽车长龙中挤出，并使之直接开进人群。这一行动刺激得人们激动不已。这种情形很容易蜕变成一场真正的暴乱。

我心里清楚那时和现在的不同。在 1972 年，人民委实无法表达他们对政府的痛恨，当碰上尼克松来访这样一个合法的机会时，

人们就充分地利用它来宣泄对现行体制的忿恨;而现在,事情正朝积极方向发展得这样快,以致人们没什么不满要发泄,因此,人们是这样的"正常"。

乔治·布什

我想起1987年的波兰之行。当我们开车去对亚鲁泽尔斯基作所谓的礼节性的拜访时,他作为国家首脑的权威已是日薄西山了。在我的前两次访问中,他和我有一些有趣的谈话,因此我盼望见到他。我发现他比我想像的更有理性和更有思想,他迷人而富有幽默感,我深为他的爱国主义情感所感动,当然,我也不满于他的专制统治,而且事实上他已将如此众多的仅仅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波兰人关进监狱。但即使如此,我却看到一个双重性格的男人:他既富有爱国之情,又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而对苏联的要求俯首称臣。在我前次的访问中,他重申了官方的态度:团结工会实已死亡了。他希望我相信,即将到来的变革将不会是根本性的,它们将不会动摇莫斯科建立的政治秩序。不过,我也得到这一印象,他觉得美国尽管嚷着援助团结工会和变革,但对波兰已发生的进步却持漠视的态度。现在,两年过去了,亚鲁泽尔斯基和我正忙于平等的公开对话。我们到达贝尔维德勒宫后,一场本拟10分钟的喝杯咖啡时间的谈话,变成了一场持续两个小时的会谈。

亚鲁泽尔斯基推心置腹地问我,他现在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告诉我他犹豫于是否参加总统竞选。他的希望是使波兰避免没必要的一场政治拉锯战。他不相信团结工会会无条件地支持他的竞选,他担忧落选的耻辱。我告诉他,他拒绝参选可能会在无意中产生严重的混乱,因此,我提醒他再考虑考虑。这有点反讽的意味:一个美国总统却在说服一位重要的共产党领袖来竞选公职。不过我觉得,亚鲁泽尔斯基的阅历是波兰进行一场平稳变革的最大保证。

亚鲁泽尔斯基认为,波兰需要一个联合政府。它有一位共产

党的总理和一位非共产党的副总理。问题是任何政府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经济措施，这对团结工会来说是特别困难。因为它既是一个劳工组织，又是一个政党。他指出，美国的劳工组织控制了大约20%的劳动力，但在波兰，这一数字却是80%。在此情形下，难以开展竞争。他说，“自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情况不佳”。团结工会正在要求，农场主要从牛奶制品中获得比商店的报酬高3倍的收入。

我说：“团结工会必须意识到这一切都应改变。”

他回答说，工会领导人虽然知道这些，但他们害怕失去其选民。“西方能够帮忙，因为目前波兰需要严厉的紧缩政策。对于推行改革来说，来自外界的压力是必要的”。他们必须行动起来以防止经济崩溃，然后他们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整顿要取得最终的结果，可能要花十年时间。他已经给西方七国集团写了封信，列出波兰的问题，并希望我在巴黎会议上再提一提它们。

我告诉亚鲁泽尔斯基，在我第二天见到瓦文萨时，我会将这些问题中的某些问题向他提出来，我也会和七国集团商量，看看我们可以为波兰做些什么。我解释了我们带来的一揽子计划，它将在下午的国民议会上宣布。我说我意识到波兰一些人要求100亿美元的援助，但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改革作基础，这些钱将会被浪费掉。

亚鲁泽尔斯基也同意。他说，你提醒波兰工人要脚踏实地并努力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只艳羡美国的富裕是不够的。他希望我明白波兰人民正在团结起来。他尊敬瓦文萨，并说，在努力寻求解决波兰的问题时，工会领导人正成为真诚的伙伴。也因此在他的谈话中，挑刺的团结工会被看成积极的因素。

我点头说：“我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微妙的时期，保持住波兰已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很重要的。我告诉他我相信美国的制度是好的，但它不能移植，“我们将支持改革，不论会发生什么”。

他说:“人们以为,欧洲比美国更支持戈尔巴乔夫,因为欧洲人看到了稳定的好处。”他告诉我,我们的谈话使他信心大增,他会将此转达给戈尔巴乔夫,他还说,戈尔巴乔夫希望很快和我见面。

我问他,在没有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的情形下,和戈尔巴乔夫见面是否有价值。他回答说,对此我心中应是最为有数的,“但应该记住的是,雷克雅未克的会谈在最初似乎是杳无希望的,但后来由于双方立场的接近,结果却柳暗花明”。

我说我们将不会做任何阻挠苏联改革进程的事情。他停顿一会儿说:“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在热情奔放上都相似。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人民关注着改革,并明白是动乱分子恶化了道德问题。像法国就不会有改革。但改革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已经出现的自发的变革,使得逆转改革的进程已不可能。”

紧接着这一重要会见后的,是一个在美国驻波兰的大使约翰·R.戴维斯住宅里举行的同样重要的正式午宴。作为一位已经适应了此间环境的外交官,小戴维斯广受不同客人的尊敬——出席午宴的大约有40位共产党、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主教等客人。准确地说,这是他们首次在一个社交场合中坐在一起——甚至连狱官和犯人都坐到了一起。团结工会的发言人亚鲁斯·奥尼斯基维奇和亚鲁泽尔斯基将酒杯碰得丁当响,如果人们考虑到一年前他还在亚鲁泽尔斯基的监狱中,变化确实很大。

天气依然很热,因此我建议我们脱去外套,这一动议受到热情响应。当亚鲁泽尔斯基到达时,他对脱外套有些犹豫,他走进另一个房间,然后再一次出现时,外套就不见了。在吃烤面包时,他向我坦白,他还脱掉了他的背带,他担心在发表长篇演说时,裤子会掉下来。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烤面包占去了片刻的时间。布什总统告诉他的客人:“你的挑战是要超越误解,是要把波兰人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在

被邀请品尝一片烤面包时，亚鲁泽尔斯基愣了一下，然后他说：“我认为在这儿、在美国大使馆，方方面面的朋友能这样会面，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国民议会中领导团结工会核心小组的布罗尼斯劳·格尼迈克乐观地说：

> 波兰仍处于政治分裂状态，但现在正发生的事完全有可能风行全国……即使这刚刚出现的萌芽，也已昭示我们波兰现在正涌现的是什么。首要以及最关键的，是我们弄明白了在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波兰的未来改革惟有依靠波兰人民，我们不希望改革在别人的援助和控制下进行。

在东欧紧张而平和地从专制演变到多元政治的关键时刻，这次聚会的戏剧性情景清晰地表明美国在其间扮演着助产士的角色。

正式午宴后，布什总统在波兰国民议会发表了演讲。他是首位美国的执政者在这里发表演说。这是一篇鼓劲的讲话。波兰是这样一个国家，15 年前的冷战就从这里开始，而她的人民现在可以帮助结束欧洲的分裂。布什总统重复了他在汉姆恰迈克的许诺，并指出了对波兰的改革发展美国将采取的相应步骤。我们在经济支援上的有限计划，正像预期的那样，波兰人不太满意地接受了。最后，波兰人是心胸宽广的，他们承认没有人会代替他们来做那种艰苦的工作，也承认布什总统所表明的政治支援比多一点的美元援助有着更为根本和长远的价值。国会议员们热情饱满，以波兰传统的赞词向布什总统欢呼：“一百年，又一个一百年，愿他长寿，为我们长寿。”亚鲁泽尔斯基后来说，没有任何其他外国领导人享受过这种礼遇，包括戴高乐、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内。

在国宴上，我坐在切斯拉夫·基斯泽克扎克将军旁边。我发现

他是位现实主义者,他理解正在发生的迅速变革。他支持向更为民主的方向发展,并坦率地谈及了他对变化的速度以及实现这一变化方式的看法。他赞同团结工会的主张,共产党应该取得总统职位,权力完全归于团结工会可能会使政治架构处于过分紧张之中。在和工会签署了圆桌会谈的协议后,我认为他觉得自己比亚鲁泽尔斯基更了解他们。可是,即使如此,他仍深信说服亚鲁泽尔斯基改变其不参加竞选的主意是重要的。我从他的谈话中深深感觉到波兰政治家的成熟,也深信他们的见识会使这场困难的转变获得圆满成功。

乔治·布什

第二天,7 月 11 日,我们到达格但斯克吃午饭,并在此作了一次演说。这是一次充满了各种期待的旅行,也使我有机会来更好地了解莱奇·瓦文萨。莱奇·瓦文萨洋溢着感人的热情。我上次波兰之行时,在我遇见他片刻后我就喜欢上他。他有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脸上时时带着微笑。我现在还记得,在 1987 年,在我下榻的宾馆周围散布了许多波兰的安全警卫,他竟能大胆地突破防线冲进我的轿车,而当时车子正要开往帕德鲁斯基广场。他冲进我的车里,我们一直朝城里开去。我盼望着再一次见到这位有胆识的先生。

这一天的活动由莱奇和达奴塔招待我和芭芭拉的午宴开始。宴会是在格但斯克郊外的瓦文萨家里举行的。他们的家很俭朴。莱奇告诉我们,在这所小房子里,生活着他们一大家子人。房子缺少绝大多数美国家庭所具备的最基本的现代化器具和家具,但这是一个清洁和温暖的家。记者们向前挤着要拍照,所以我们信步走出房子,来到瓦文萨的花园里。莱奇自豪地介绍他的植物和葡萄架。这位波兰的真正英雄,如此朴实无华地贴近人民,他就像他的每位同伴一样,过着量入为出的简朴生活,没有任何奢侈和享乐。

午餐的气氛极为亲密，在场的只有我们四个人，但瓦文萨却准备了五六道菜，而且是清一色的银餐具，上的都是珍肴，还备了好几种酒，几位漂亮的小姐是从附近的饭店借来做服务的。在整个宴会期间，达奴塔看上去有些手足无措。她是一位娴静和腼腆的女人，看来她对在家里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宴请有点紧张。

在向我们提出要求时，莱奇虽然说得热情洋溢，但他显得有点不自信和不踏实。他说，波兰不是像新闻报道所说的那样，向你们乞讨100亿美元，但他希望钱能汇来，使贷款能达到这个数。波兰会归还每分钱。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列有向世界银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一些金融组织的借贷要求，他相信这些银行和私人公司会注意波兰的需要。我怀疑他是否明白他给我看这一切的含意。我有一种感觉，这位骄傲的男人不愿意他的国家卑躬屈膝地问我们要钱。

瓦文萨告诉我，波兰人懂得他们必须去工作，他强调在未得到帮助以前，他们仍要继续改革。他希望西方向波兰的未来投资。他提出一个计划，将所有企业——甚至包括波兰的农场都放到拍卖台上，他认为美国的农场主可能会购买波兰的农场。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开玩笑地说：“我后无退路，如果我失败了，我就要考虑到哪儿寻求避难了。”

瓦文萨认为只有切斯拉夫·基斯泽克扎克可以当总统，他将支持他。他承认“这不是我喜欢的，也不是我希望的，但是我要去做”。他觉得亚鲁泽尔斯基是一个比较好的人选，但他却不参选。每件事情都和经济挂钩，他估计，没有美国的重要帮助，波兰会出现罢工，而亚鲁泽尔斯基可能不得不派军队镇压。他觉得反对派在很多方面没有公正地对待这位总书记。他宣称，“对亚鲁泽尔斯基来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是错误的。”他说，“没几个真正的专制主义者。那些人，包括亚鲁泽尔斯基，都是‘红萝卜’——只是表皮红而已。”他还补充说，很多人觉得他们要与这位总书记化解宿怨，

“其实他们低估了他”。

瓦文萨想开辟直接帮助团结工会的渠道。他说：“我们要放慢政治变革的步伐，以使经济改革能跟上趟。”我试探性地问他团结工会的要求。他告诉我这一组织是实际的，它也懂得在某些棘手的问题上不能我行我素。对此我没有附和，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波兰的经济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我担心团结工会没能抓住如何解决问题的关键。他们的某些要求，例如妇女五年的产假，就是如此的不切实际，没有任何政府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能够满足他们。

午饭后，芭芭拉和我与瓦文萨一道乘车前往莱宁船厂，我要在那里讲话。当我们接近场地时，瓦文萨似乎被黑压压的人群镇住了。他一直用英语说着：“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他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多的人群。

我在团结工会的劳动者纪念碑前，向广场上黑压压的朝气蓬勃的人们发表演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难以言状。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大街两旁一直排到城里，而在广场上的人群，估计有250 000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处是成年男女的欢呼声。所有的标语旗帜都表达着对美国的喜爱：旗帜上书写着的欢迎我的标语，显示了美国和波兰的友好关系，而“V”字符号随处可见。

在演说中我叙述了波兰在二战中的奋战历史，也附带提及了对冷战的遗憾。我说：“你们的时代来到了！这是展现波兰未来的时刻，也是决定波兰命运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当他们发现一个新的大陆，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新世界——强大和自豪的波兰时，美国将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在演说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不已的激情中：我想到波兰过去的惨痛历史，想到瓦文萨的勇气和波兰的骄傲。人群的情绪已经沸腾，他们欢呼雀跃。他们交替喊着“布什总统，布什总统”和“莱奇·瓦文萨，莱奇·瓦文萨”。

那一天的集会结束时，当政府的领袖和团结工会的领导走到一起，我有一种亲眼目睹新的历史被当场创造的兴奋不已的感觉。我感触最深的是那些听我演讲的人们，他们来自团结工会，来自政府机构。我两年前来过这里，从那以后，波兰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奇的发展。我深信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是强大的和不可阻挡的，因此，这个国家将不会再甘心听从苏联的统治。但我很担心苏联是否真的会试图阻止在波兰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更为不安的是，这样波兰可能完全失去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

一些年以后回忆这次访问，回忆和波兰领导人的这些谈话，我相信，仍然处在重要位置上的亚鲁泽尔斯基以及其他共产党的元老，是一些特别的领导人——他们是波兰的爱国者而不仅仅是党的理论家。亚鲁泽尔斯基更是特别的复杂，但他头脑清楚。在另一方面，他是 1981 年军事镇压和旧秩序的代表，可是，同时他又深切地关注着波兰的未来走向。他对戈尔巴乔夫也怀有某种忠诚之情，但是，即使有这种情谊，他仍然断言，波兰能够、也必须摆脱苏联的统治而获得自由。不过他和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关系，很显然地使这一自由目标只不过是一种希望。我认为他坚信，1989 年中期以前苏联将不会干涉波兰的变革，他现在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将他的国家推向新的道路的自主权。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波兰之行完全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准确无误地表明我们支持那里的改革进程，我们这样做时是怀着对波兰人民的热爱之情的，而且，一切都办得有条不紊，避免了刺激等不良反应，真是不错。但到我们离开波兰时，其宪法危机仍未解决，那时我们尚未看出布什总统分别和亚鲁泽尔斯基与瓦文萨谈话的作用，这些谈话使双方走到了一起，并促使他们向前看。在我们走后不久，总统与他们会谈的成功作用开始表现出来。在 7 月 14 日，瓦文萨宣布他将支持共产党提出的任何候选人，并强调总统只能从共产党领导

的执政联盟中选出，因为政治形势不容乐观。瓦文萨的声明得到支持亚鲁泽尔斯基的农民党的响应。由于他的选举建议的巨大推动，在亚鲁泽尔斯基阵营中产生了积极回应。

我们又要准备7月11日的匈牙利之行了。6年以前，布什总统曾作为美国副总统访问过匈牙利，现在他则成为访问匈牙利的首位美国总统。在气氛上，波兰与匈牙利所表现的差异是显著的。波兰虽然充满希望，但是谨慎和忧虑的，波兰人似乎更为着意于当下的生存问题，而并不怎么在意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匈牙利，则洋溢着一种奔放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令人感动的向往。这儿虽然没有团结工会，但在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相当强劲的知识分子的不满。从布达佩斯的精神气氛中，我得到一种感觉：这个国家能够应付未来的艰难转变。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国家在气氛上也有相似的一面：两国都有意尽可能平稳而有序地进行重大的变革，最难的是刚开始的变革，它确实是冒着苏联干涉的危险。

虽然匈牙利不如波兰在政治变革中走得那样远，但也出现了改革的迹象。强硬派卡罗里·格罗斯仍然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但现在他的身边出现了另外3位领导人，其中一位被推选为新设立的党的主席。很明显格罗斯正从领导权位上淡出。党代会计划在10月份举行，届时估计有重要的人事变化。在6月份有16 250 000名党员齐聚布达佩斯参加伊姆里·纳吉的迁葬仪式，伊姆里是1956年上任的总理，后来在1958年被处死。

我们在一场夏日的暴风雨中到达布达佩斯。“空军1号”因这场暴风雨而推迟了着陆。计划安排布什总统在科索斯广场发表首场讲话，广场在市中心。当我们的飞机在上空盘旋时，欢迎的人群正站在倾盆大雨中；人们虽然被淋透了，但是他们的热情不减，仍在热烈地欢迎布什总统。匈牙利总统布鲁诺·施特鲁布不愿意由于大雨和飞机晚点而压缩其演说时间，仍一个劲地猛读了15分钟事前准备好的讲话稿，人们耐心地等待着。

施特鲁布终于结束了他的平淡无味的讲话,布什总统走向麦克风,他拿开了雨伞,深思熟虑地很快讲完话。人群开始欢呼,然后他又作了一番即席演讲,夸赞了匈牙利锐意改革的领导人。当布什正要结束他的演讲时,夕阳穿破乌云,似乎欲将其清柔的余光抚慰现场的人们。当看到一位老妇人站在演讲台旁边,身体都被雨淋湿了,布什总统就脱下他的雨衣,替老妇人披上。当人群对此爆发出赞同的喝彩时,布什总统走进他们中间。他挥舞着双手,祝福人们好运。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也是我难以忘怀的场景——人们和布什总统之间如此水乳交融。

乔治·布什

说实话,雨衣属于一位安全警卫人员,他坚持要我穿上。当我看到一位老太太站在那儿,像是有点冷,而我又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她披上,于是我就将雨衣给了她,而忘了它是人家借给我的了。在我们回到车上后,芭芭拉责怪我把别人的雨衣送掉了。我们都笑了,我有些惭愧地向那位慷慨的警卫人员解释了我是如何处置那件雨衣的,后来我赔了他一件。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第二天,7 月 12 日,布什总统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他要和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接着是一次演说和又一次会见,会见反对派领导人。他拜访了共产党的主席奈伊索·奈尔斯、总书记卡罗里·格罗斯、总理米克洛斯·尼米斯;然后,他还会见了主席团成员伊姆里·波扎斯盖,他是党的改革集团的领袖,他是第一个公开地说 1956 年的“反革命”事件事实上是一场起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格罗斯,这些人都有向前看而不是眷恋过去的特征。这里没有后悔,没有念旧。波扎斯盖说,他对匈牙利的希望是,它将来是一个自由的宪法国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尼米斯赠送给布什总统一个小盒子,里面装有一截来自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的带有铁刺的铁丝网——它是“铁幕”政治的一种象征。

下午，布什总统在卡尔·马克思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听众专心而安静。布什告诉大家，一所大学的任务是促进自由的思想讨论，而这就是这所学校伟大的教师——伊姆里·纳吉的精神信仰：

> 当他的葬礼数周以前在英雄广场举行时，响起的匈牙利的音乐是令人闻之激动的“Szozat”[1]。而在此悲怆的仪式上，世界看到的不仅是一次庄重的仪式，更是一次和解的行动，我们看到了一次正确的行动。它基于这一正确的基础上，比磐石更为稳固——这就是匈牙利开始构筑新的未来。新的一代期待着礼赞伊姆里·纳吉的勇气，也许人们会世代牢记这一勇气。

匈牙利又一次在欧洲的变革中成为一座航标灯，在其与奥地利的边境上，它撤除了欧洲分裂的丑恶象征，“‘铁幕’终于被撕破了，而匈牙利，你们伟大的祖国，正走在欧洲变革的前列”。

布什总统表示美国的盟友会帮助匈牙利不断地改革，并宣布了援助的计划，同时布什宣布匈牙利接近了享受“一般特惠制”关税的标准，故享有2 500万美元私人企业基金资助(对波兰是 1 亿美元)，其中 500 万是给一个地方环境中心——它是美国和匈牙利之间的一系列交换项目中的一项——以及资助在布达佩斯的美国文化中心。一旦议会通过政府提交的给匈牙利人民移民自由的议案，布什总统将使匈牙利成为第一个免受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限制的国家，因此也就享受永久性最惠国待遇[2]。布什总统还说

---

① 这是一首被改编成乐曲的匈牙利诗歌，其著名的程度类似于我们的“美丽的亚美利亚”。

② 一年一度审议最惠国待遇，是 1973 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所提出的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从未对波兰使用过，因为在这一法案通过以前，波兰就已享受最惠国待遇了。

他可以派遣“和平军”工作人员来匈牙利教英语，如能成行，他们将会是这一组织的人员首次在欧洲到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工作。匈牙利的经济形势比波兰好得多，因此，当我们提出所能提供的少量援助时，我发现听众似乎并不激动。

毫无疑问，这是这次旅行中最好的演说，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技巧上，都是最好的，但听众的寂静无声使我惊讶；不料在结束时，布什总统受到了热烈的起立鼓掌欢呼。我们后来才了解到，这里的人们习惯上不在演说的中间喝彩。

演说后布什总统来到美国大使馆，在这里他会见了非政府组织和反对党党派的领导人，在匈牙利他们可以自由活动。我深为这些年龄悬殊的领导人所感动，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因其党派问题而在同一所监狱被关押过，他们的组织在 1947—1948 年间被取缔，而党内进步的思想家也遭高压。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在鼓吹其陈腐的老观点，这使得在冷战之初掌握权力的共产党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撇在一边。

当我们离开布达佩斯飞往巴黎时，我思考着新欧洲的诞生。不同的人民将走着不同的改革道路，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开始坚信这些变革将不可阻挡。今天的改革不再是迟疑的，而是深思熟虑的，并且不再有报复的苦难，而这种报复，有可能引发新的压迫。我忘记了我们的时间是多么紧迫，我被我们所目睹的一切所深深打动了。

现在我们正奔向我们最后的、也是扩展了内容的一站。这是布什总统第一次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我们想将注意力放在东欧以及那里发生的、我们亲眼目睹的变化上。我们希望说服我们的伙伴来承担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因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最终要安排来讨论这类问题。不过将会议重点移向东欧将是困难的，因为通常首脑会议要涉及的议题，秘书班子在几个月以前就已

经研究和讨论过了,况且为了保证美国的领导地位,我们的议案应该精心设计后再提出。密特朗总统是本次会议的主席,他对这次会议有自己的想法,这次会议比往常有着更高的规格。他计划在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后,接着再开首脑会议。为此庆祝他已邀请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其中很多的是法国共同体的成员。密特朗试图以这种方式将两个群体凑合在一起,以实现他预期已久的目标——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开一次南北对话会议。对此我们有点担心。

我们反对这种会议,因为我们相信"南方"必然会以一种煽动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似的宣传,来要求西方为多年的殖民"剥削"提供"赔偿",这一要求还有可能获得某些左倾的"北方"国家的支持。虽然我们关注那些贫困国家的境况,但我们愿意举行双边的讨论来援助这些国家。为了避免参加南北会议,我们原本考虑将我们的行程安排在经济首脑"会议"开幕的那天上午到达巴黎,但是,布什总统不愿冒犯密特朗,在巴士底庆祝日的盛大节日里不到场。和法国官员的讨论说明了我们的立场,也更加强化了我们反对南北会议的姿态。我们同意7月14日一整天呆在巴黎。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7月14日巴士底庆祝日的盛大军事游行上,密特朗展示了纷繁多样的兵种以及目前在法国军队服役的各种类型的军事装备。游行看上去像一场苏联的五一游行,它尽情展示法国的辉煌和壮丽。游行是明显地被设计用来向他的第三世界的客人显示,法国仍然是一个世界级的军事大国。观礼台正对着爱丽舍宫,在它前面通过的军队方阵,走到观礼台的正前方就变成分列式。游行的队伍非常长,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密特朗的可以理解的骄傲昭然若揭。

在此规模宏大的游行结束后,密特朗召来了他的车队,坐进他

自己的轿车离开了，而让他的客人仍坐在观礼台上。一件荣耀的事情几乎立即就变成了一场事故，因为客人们都不知道退场的秩序。台上将近有25位国家元首，每人都有一个车队，当每位元首的随行人员同时拥向其领袖，并试图使他离场时，其结果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一片嘈杂和交通堵塞，在最轻的意义上，这也是一场混乱。

三天的经济首脑会议在游行的那天下午开始。会议讨论得非常顺畅，以至首脑们决定提前结束会议，以享受闭幕的大餐。会议绝大部分的内容是有关环境问题的，布什总统将东欧变革及其经济困难的两方面内容安排到首脑会议的中心议题上。我们延迟了波兰偿还外债的时间表，并特意安排了一次会议来推进并协调西方对波兰和匈牙利的援助。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成果，它多亏了吉姆·贝克的谈判艺术。为了增加我们自己对东欧不多的援助，我们特别需要这一协议，为了实现这一协议，贝克提议在欧洲共同体内建立一个机构，因此在头绪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组织中，又出现了一个，即二十四国联盟。它的产生，在其组织形式上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但它满足了帮助波兰和匈牙利的目的。

乔治·布什

这次首脑会议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进展，即它启动了苏联加入七国集团的程序。戈尔巴乔夫给密特朗写来一封信，要求东西方在全球经济问题上加强合作，并表示苏联有意参与世界经济事务。虽然他还不是特地要求参加经济首脑会议，我们并没有误解其企图：就如希望西方来帮助恢复其经济一样，戈尔巴乔夫也向往参加经济首脑会议的那份荣耀。是否到了该吸纳苏联来参加这些会议的时候了，对这一问题该小心从事。西方七国首脑们正计划合力来推进自由市场经济，就我看来，苏联的改革还远远不够，或者说改革尚不够彻底，还难以将苏联列为完全的会员。所有西方七国集团的领导人都同意，在回复戈尔巴乔夫这封信时，态度应当

积极，但措辞不要说得太明。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这不是一次重大的首脑会议，却是一次让人满意的会议。我们将东欧问题列入了会议议事日程的中心，并设法避免了好几个有问题的议项。即便如此，仍有某些记者抱怨，说布什总统没像他的前任那样来主宰讨论，相反却接受了其盟友的意见。在我看来，似乎有这样一种迹象，那就是新闻界明显地不认可布什总统的儒雅的领导风范。记者们似乎更兴奋于轰动和爆炸性的事件，而对友好地说服与合作及其成果不怎么感兴趣，这令我失望。布什总统的领导风格有利于真诚地交流，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也因此更喜欢协商而不是霸道的态度。不过在新闻界这种猜疑和挑剔也不是普遍的，一些记者(在我看来，显然是最有眼力的)仍充分地信任我们能开一次圆满的会议，这些又使我心中暖洋洋的。

我们在巴黎停留期间还有一个重大的进展。7月16日，星期六，布什总统、吉姆·贝克和我坐在大使馆房子的阳台上，俯看着花园，一边泛泛地聊着这次旅行，说话间布什总统提出了和戈尔巴乔夫会面的问题。他只是说和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时机成熟了，他是考虑好了才会这样说的。不论是贝克还是我，都没劝阻他。贝克本来就从不像我那样，对尽早会晤戈尔巴乔夫持消极态度，而我现在也没有当初那样强烈的劝阻之意了。我们现在虽已充分地准备好我们的东欧战略了，但如果我们未能准确地估计戈尔巴乔夫现在的打算，就仍有失算的危险。或许我们可以想出筹划一次至少可以避免没有任何具体协议的首脑会晤的方法。

乔治·布什

好几个礼拜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与戈尔巴乔夫会晤的问题。7月1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关于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我一直在内心深处盘算

着我们该做些什么。我希望会晤，但我不期望会晤纠缠于军备控制问题，我也不希望会晤被军备控制所主宰。我倾向于寻找一些我们可以和苏联一道努力来解决的世界性的大问题，或者是在全球性的大灾难中的相互协助问题，或者是某些能展现我们彼此合作的事情，虽然我不奢望在一次高层会见中我们就可着手解决重要的军备问题，但我希望能有机会与戈尔巴乔夫安静地谈谈。

当我的欧洲之行临近尾声时，我意识到拖延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会变得很危险。东欧的变化太大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变化——如果超级大国不着手安排事情的发展，其间的每一个事件都可能使东欧陷入混乱并动摇美苏关系。我们仍然不清楚戈尔巴乔夫将允许这一地区变化到多大的程度，而我发现东欧人民自己则试图尽其所能地走得更远。西欧领导人也要求我们进行一次会晤。依照戈尔巴乔夫给七国集团的信，我知道要求会谈的压力在增强，我以为我们可以务实地来设法安排一次非正式会晤。我希望能与戈尔巴乔夫坦率而真诚地交换看法，就如我与亚鲁泽尔斯基、与匈牙利领导人、当然还有与西欧领导人会谈时那样。

我被自己在东欧看到的希望所打动。此次东欧之旅实现了我预期的目的——突出了这一地区对我们的重要性；提醒东欧人民注意是西方带来了美好的未来。也因此，我们消除了戈尔巴乔夫鼓惑性宣传的影响——即以裁军来作为结束冷战的第一步；我们促进了趋向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我离开东欧时，心中充满了希望。我也发现，东欧人民的处境是那样的险象环生，而局势仍是那样的扑朔迷离，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国家里的变革是理所当然的。我只访问了两个最进步的国家，而这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中产生了震动——在这些国家中，政府对改善人民的生活漠不关心，而热衷于维护自身的权力。我们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言行如履薄冰，我

们避免了激怒苏联,因为它的军队一直驻扎在这一地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我明白,一旦苏联这些可靠的盟友进一步地分崩离析,一旦他们针对西方的安全防线遭到侵蚀,来自强硬路线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进行干预的压力就会增强。前面会有危险,当东欧人民在争取自己的未来时,我的呼应要格外地谨慎,我们不能让东欧人民遭受挫折。

第五章　希望与革命

乔治·布什

当我们离开巴黎回家时，我拟好了给戈尔巴乔夫的信，建议进行一次会晤。我是这样写的："我想我们会晤时应没有前呼后拥的助手簇拥在左右，没有没完没了的简报，当然也没有每隔5分钟就大喊'谁赢了'的新闻媒体在场……"就此，我解释道：我觉得我们的会晤应该达成重要的协议，而不要让对此关注的世界失望，"现在，我的思想在变化"。

我继续写道，"这或许是由于我的波兰和匈牙利之行，或许是由于我耳闻了你最近的法国和德国之旅的言论。不论是何种原因，我只想减少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会出现的误会。我想让我们的关系基于更个人化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没有议事日程的访问。"我的看法，会晤最好避免'首脑'一词。因为这一词汇，从好的一面说是夸张，而从坏的一面说，它的含意是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戈尔巴乔夫可以来戴维营或者肯尼邦克波特。我对别的安排也乐于接受，而且如果他觉得这种非正式会晤不太方便而不想接受我的建议，我也能理解。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马歇尔·瑟盖·阿克罗米耶夫在7月底为讨论军备控制来访，趁此机会我们将布什总统的信交给了他。阿克罗米耶夫是苏联总参谋部的前参谋长，他于1988年11月退役，现在是戈尔巴乔夫主

要的军事顾问。他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亲近，过往甚密。虽然国务院正绞尽脑汁地设法通过正式渠道来通知对方，但对于传递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消息，我们想他是能保证绝对秘密的最可靠的途径。我与马歇尔共进早餐，然后我们进行了一次极为吸引人的会谈。我尽量将会谈的主题安排在军备控制的基本问题以及双方的战略目标上。他是一位坦诚的人。

乔治·布什

阿克罗米耶夫是一位很管用的信使，几天之内就有了答复，回信是由亚历山大·贝西默特尼耶克带来的。1970 年他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任公使衔参赞和代办，现在则是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首席助理。贝西默特尼耶克这次赴美，是专门来讨论我的建议。他告诉我戈尔巴乔夫欢迎会晤，并称最好提早在 9 月份举行。戈尔巴乔夫喜欢我提议的会晤形式，并有意进行广泛的交流。但当贝西默特尼耶克开始和我商讨合适的地点时，事情显然就不那么顺利了。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从阿拉斯加到西班牙，我们选择过好几个地方，但由于议程安排或议案的原因，没有一个地方双方都能接受。在几个星期里，我们竭尽所能，想尽了一切办法，后来我都准备放弃了，并且开始怀疑苏联人是否真的想进行一次会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他准备在 11 月底对意大利作一次国事访问时，我们开始仔细思考戈尔巴乔夫这次访问会带来什么机会。布什总统的弟弟，“神气劲十足的”威廉·布什刚去过马耳他，他说这个地方很好。我提到一个先例，那就是 1942 年在纽芬兰海域的罗斯福—丘吉尔号船上举行的会晤。布什总统喜欢这个在船上开会的主意，因为它可以谢绝大批的记者，也可省去大量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免去许多烦人的礼仪。为了使会见在周末举行，戈尔巴乔夫必须调整其访问行程的安排，不过他愿意这样做。他惟一的要求是，两位总统一同到达马耳他，

但不要坐直升飞机去——显然他痛恨坐直升飞机。由于场地的原因以及尽量将会晤压缩到最小规模的考虑,芭芭拉·布什就不随我们一同前往了。

在深思熟虑我们的目标和战略,反复调整我们的立场、特别是在战略武器控制上的立场以后,我们才恢复了与苏联的高层接触。5月份贝克的莫斯科之旅是个例外。当时贝克站在戈尔巴乔夫身边非常吃惊,因为戈尔巴乔夫宣布了苏联一个新的削减短程核武器的建议。他在西欧的宣传攻势、他有意在北约组织中策划和挑起分裂时所显示的过人本领,只能使我们怀疑他的动机,怀疑他是否真诚地希望我们之间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考虑成熟后在6月20日的总统信函中点明了我们的态度,向苏联提出了有关战略核武器的问题,但直到9月份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还有些问题要与莫斯科切磋。在地区问题上,美国和苏联之间多年来一直彼此冲突,所取得的进展很小。正如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学院演说中所说的那样,莫斯科必须摆脱空洞的宣传,在其外交政策中表现真正的"新思维"。我们认为地区问题是检验苏联是否真诚的试金石,因为他们在第三世界的行为似乎陷入了"冷战"的泥潭。到那年的夏天,莫斯科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向好几个敏感国家提供了援助,其间包括阿富汗和尼加拉瓜。这些国家都是莫斯科强硬路线的追随者,而强硬路线只会妨碍达成协议。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在回应他们的行动时,不是不感兴趣就是不愿意,或者无能力——为了美苏间的全面关系作出让步。偶尔苏联的代表们比他们几个月前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莫斯科大概认定,将其匮乏的资源集中地投向一些精心挑选的地区,会有更大的收获。

在2月份,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走其军队,但6个月后,我们仍未能完全解决喀布尔政权问题,它仍由苏联的傀儡穆罕默德·纳

杰布拉控制。苏联撤军之际，一般的估计是纳杰布拉政府将在数周内垮台；但相反，它变得越来越巩固。对苏联人来说形势变得这样好，以致于他们又坚持要将纳杰布拉纳入在联合政府之中。对我们来说，纳杰布拉是阿富汗灾难的一个象征，而且美国对穆加哈汀的支持也清楚地表明，在纳杰布拉离开阿富汗以前，穆加哈汀不会停止战斗。对我方来说，如果没达成政治协议，我们不赞成简单地削减军援，因为那样的话只会导致对纳杰布拉有利的一种明显的军事不平衡以及一种难以接受的政治现状，这将为未来埋下战争的祸根，我们也不想让苏联获得一次重要的地缘政治的胜利。我们需要一个结束阿富汗战争和重建一个自由政府的长远方案。

在美苏关系中最令人头痛的是中美洲。这里，苏联一直在支持他们的小兄弟尼加拉瓜，并通过它和古巴来支援萨尔瓦多的游击队。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在前不久的交换意见中，未涉及中美洲、古巴，或者说两者均未提起，我们只是强调了要促使戈尔巴乔夫在尼加拉瓜问题上采取行动。苏联则辩称，未能解决此问题的主要障碍是未能就解散美国支持的“反对派”一事达成一致。正如谢瓦尔德纳泽所强调的，苏联停止了军援，但古巴和东德早已取而代之，继续提供军援。一旦搪塞不过去时，苏联人就诉苦他们控制不了卡斯特罗。

在中美洲问题上我们还要继续一场与议会的斗争。里根政府的政策曾困顿于中美洲问题上，在布什政府时期，它一直也是一个热点话题。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两人都认为，现在应该与议会休战了。我们的计划是要求在尼加拉瓜进行民主选举，我们以为这不仅可以瓦解那块大陆上惹是生非的政府，而且也可迫使戈尔巴乔夫坚守其支持民主的诺言，或者迫使他暴露其真实面貌。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为，加深了我对戈尔巴乔夫的不信任和

不满。那为数很少的某些地区所发生的变革,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源于苏联的失误而不是滋生于超级大国间地区竞争所引发的宏观格局的重组。例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就显然是其一个过分扩张而失败的例子。当冰山浮出水面而不能控制时,于是他们决定甩掉包袱。尚未得到证实的是,是否他们的贪欲也已被扑灭了。在诸如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等地方,我相信莫斯科现已算清,他们付出的太多而回报却太少。因此,不仅不是扩张,相反苏联的优势看上去是在缩小。通过三次首脑会晤和多次外长会谈,我们可以预测,地区问题将在"苏联"苟延残喘的全部存在期间成为其难以脱手的一个烫山芋。在东欧和苏联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杠杆作用下,如果苏联政策中会出现积极变化的话,那么它势必是基于国内的需要。

整个夏天东欧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化着,我们冷静地紧紧追踪其发展趋势,我们要多做少说。我们支持民族自决,但小心地避免唱高调或者显出干涉之态,这只会在我们希望他们承认是他们自己助长了这一积极的变革时、刺痛苏联人。

7月18日,在我们从巴黎返回的那一天,亚鲁泽尔斯基通知我们,他将重新参加总统竞选。次日,他被国民议会选为总统,而这要求好几位团结工会成员的弃权以满足他多数票的需要。这真是一幅具有讽刺意味的图画:长期作为团结工会镇压者的亚鲁泽尔斯基,一直被西方视为波兰的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现在却被选为总统了,而且是在一种完全自由的选举中,很多他曾经关押过的人投了他的票。

亚鲁泽尔斯基的当选,扫清了波兰改革的主要障碍。在我看来这清楚地显示:布什总统在其访问波兰期间与各党派的会谈是实现这一突破的催化剂。总书记被布什总统说服,意识到他的参选至为关键;布什也使团结工会懂得,亚鲁泽尔斯基是波兰政治稳定的关键人物;虽然有我们的动员,但人们仍然难以忘怀亚鲁泽尔

斯基的过去以及他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这使得亚鲁泽尔斯基在总统选举中只以微弱优势当选。

波兰的下一步是要更换政府的总理米克扎耶斯拉夫·罗科斯基。按照圆桌会议的协议，团结工会将保持反对党的角色，而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来统治国家。而这次重要选举的结果则已对此协议提出了挑战，因为共产党要寻求团结工会的参与（共同承担应付经济危机的责任），要团结工会分担危机的重压。大多数团结工会的保守派不愿与共产党共同组建政府，因为他们没有主导权；而其间最为积极的反共产主义者则主张，选举结果本身就是要求团结工会来组建政府的。

团结工会获悉，苏联、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将反对从团结工会中提名总理人选，故亚鲁泽尔斯基推荐基斯泽克扎克将军为总理人选，并号召组建联合政府。团结工会则宣布，成立联合政府要等它组成政府以后。在8月2日基斯泽克扎克被选为总理，但在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以后，他未能组阁。共产党议会联盟、农民党和民主联盟都拒绝合作。于是在8月16日，莱奇·瓦文萨宣布，他将在“他自己的直接领导下”和在团结工会的旗帜下，组建一个内阁。

这是一个大胆的动作，它远远超出了圆桌会议协议的范围，而且它也向亚鲁泽尔斯基提出了一个难题：他必须或者接受这一意外的变化，或者解散立法机关并要求重新选举。没有圆桌会议的限制，对共产党来说，选举将是一场灾难，而且还会导致更快的变革。在瓦文萨肯定波兰将仍留在华沙条约集团里以及共产党将获得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的职位后，亚鲁泽尔斯基则两害相较取其轻，基斯泽克扎克辞职，而团结工会被要求组建新一届政府。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虽然我们在私下非常高兴这些进展，但我们的兴奋却难以淋漓尽致。因为莫斯科仍在东欧驻有大量的军队，而且我们也不能冒险以波兰的自由来惹恼苏联。因此，我们的政治姿态是非常低调的。我们只让马林·菲茨沃特说，布什总统“将会支持”组成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

不论有或没有受到美国反应的安慰，苏联的态度则是出奇的平静。耶维金里·普里马科夫是戈尔巴乔夫的亲密顾问，他宣布波兰政府的组成是一个应完全由波兰人来决定的事，团结工会和两个小的非共产党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是可取的。事实上当波兰共产党拒绝参加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时，戈尔巴乔夫曾打电话给罗科斯基。虽然电话的内容不得而知，但共产党却开始了合作。这大概是苏联一改其对东欧进步潮流态度的最生动的例子。依照瓦文萨的建议，亚鲁泽尔斯基提名塔丢斯·梅左维基作为新总理，并在8月24日的投票中因只有4票反对而获得通过。他在1980年帮助创立了团结工会，他的当选是波兰摆脱40年专制统治的重要一步。

乔治·布什

在这些纵横捭阖中，亚鲁泽尔斯基表现出相当圆熟的政治技巧。在时机来临之前，他曾像一个无奈的勇士一样迟疑不决，然而在争取团结工会领导人关键的支持时，他则显示了了不起的政治判断力，而且自始至终他还必须精确估计苏联的反应，要弄清楚波兰在打破常规时到底有多大的自主权。我想他生活中的这一篇章，使得很多波兰人——包括那些以前仇恨他的人——对这位复杂的领导人产生了更多的好感。在今天的波兰，虽然不少人还记住他过去的残忍，但更多的人则原谅了过去，并理解他的处境也很艰

难，人们最终肯定了他在推动波兰摆脱苏联全面控制中的作用①。

与此同时，匈牙利为了改革选举制度和政府机构，也在加速进行他们自己的“圆桌会议”。在9月18日，与会各方在转向多党议会民主上达成了部分的一致。在10月7日，共产党投票决定自我解散，并重建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党。这一行动显示的是匈牙利共产党的某种崩溃，故只有很少的党员签名来支持这一新党。这里的政治变革出现了新局面。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因为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形势发展平稳，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就转到经济援助上。在援助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争论。其一是在我们的政府内，关于援助政策的基本原则仍未确定；其二是在援助数额及经费来源问题上与议会的分歧。我们的预算困难虽然在整个夏天都不会好转，但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现在议会已充分意识到在东欧发生的重大变革的意义，懂得了美国在东欧的政治影响与这些国家息息相关，现在议会也不是那样的关注预算赤字了，而是准备，特别是为波兰拨付一大笔钱。当资金已是明显不足的时候，还要去争取比我们要求的更多的投入，是件令人为难的事。

我们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布什总统曾将其中的一项带往波兰。二十四国集团已经同意提供1.2亿美元的紧急食品援助，为此，我们追加拨付了5千万美元。我们在美国政府内寻求资金，在本财政年度内来说是太迟了。为了避免找钱过程的不快，我们要求从10月1日开始的下一个年度的预算中拨付。在9月15日，我们宣布了对波兰另一笔5千万美元的长期的一般性食品援助。对匈牙利的帮助没这么大方。三天以后，商务部长罗伯特·莫斯巴赫宣布，匈牙利将获得永久性的最惠国待遇，而“海

① 在1996年，退出政界的瓦文萨来肯尼邦克波特拜访芭芭拉和我。我向他问起亚鲁泽尔斯基，他以非常宽容的态度说，尽管有过去的镇压，但历史将抚平一切。

外私人投资公司"提供的担保，将扩大到去匈牙利投资的美国人。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则声称，对波兰的援助是不适当的，而且也表现了布什政府"总是割舍不去的冷战情结"。贝克称此批评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当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上赢得了70%的支持率时，我如果是反对党领导人，我也可能会说些类似的话"。贝克的评论增加了我的不安。我们的压力很大，如果因为我们听从了官僚主义的夸夸其谈，而致使东欧这一摆脱苏联控制的历史性进展夭折，那么历史将不会宽恕我们，而我们也不会原谅自己。所以，虽然我同意贝克的看法，米切尔的攻击是出于其党派偏见，但我也认为我们还应继续努力。

在9月20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批准对波兰和匈牙利的12亿美元的为期三年的援助计划。在一次党派界线分明的投票中，只有一位共和党议员退席，其他所有人都反对干涉政府的外交政策。外交委员会说，这笔钱可以从国防部研究预算和发展预算中支付——这破坏了在援助款和国防预算之间禁止拆借的规定。议会似乎决定拨付比我们要得更多的款子。假设布什总统不得不否决此项援助波兰的议案的话，事情将变得极为棘手。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在政府内部，最激烈的争论发生在我们到底是否应该援助波兰的问题上。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希望调整并扩大计划，还试图动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提供实质性的投资。布什总统已计划于9月27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上发表演说，这将是和盘托出如此雄心勃勃方案的一个重要机会。不过，在波兰施行经济改革以前，财政部一直反对提供任何援助。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虽然不是这样的反对派，但也坚持所提供的任何资金必须有完全的补偿。在我的印象中，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或者谋求一种适当的补偿过程中，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未发挥其任何职能作用。

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莱斯泽克·巴尔塞威克茨在布什总统发表演说的前一天访问了我。他说明了波兰的需要，还带来了一个坚定的经济改革计划。巴尔塞威克茨提出了他认为的最低限度的一揽子计划——5亿美元用在弥补第四季度的财政赤字，10亿美元用作稳定货币基金。他的计划似乎可以满足任何合理的援助要求，但它来得太迟了，布什总统难以在第二天的演说中予以回应，而且我们的援助政策仍然还未能出台。我们可以提供的最多也就是“我们一定更加努力”和“就其自身而言，美国愿意站在斗争的前列”之类的表白。在此情形下，听众不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尽管有此波兰计划，财政部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仍持迟疑态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支持这一计划的贷款以前，财政部不愿采取行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辩称，支付任何新贷款的资金，必须出自海外援助项目，也因此它必然占用其他国家的援助金额。布什总统愤怒地批驳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与财政部，并决定我们可以从国际组织中为波兰寻求援助，而不要过分单纯倚重美国不足的资金。我们达成了一个协定，为波兰提供10亿美元的稳定基金，为此美国支持2亿美元，不过这要等到波兰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结束以后才可支付，其余的将出自欧洲，特别是来自德国。议会对待这一计划特别认真，并维持其预算承诺：当最后的协议金额高于总统所提议的，那么原先计划中提出的巨大数额则作相应地削减。

那个夏天在东欧出现的对苏联统治的挑战，现在已扩展到苏联本土。长期受压制的民族主义纷纷涌现，相伴而来的还有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这形成了戈尔巴乔夫到目前为止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波罗的海各国，气焰很盛的民族主义者已从支持改革转向旨在独立的要求经济自治。爱沙尼亚在去年的11月已经提出了其主权要求，并在今年的5月18日再次强调了这一主张；立

陶宛在同一天采取了相同的立法措施;而拉脱维亚则在 7 月 29 日紧随其后。8 月 18 日,戈尔巴乔夫的一位主要顾问、也是一位开放的先锋亚历山大·亚科夫勒夫,在有关波罗的海各国问题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 1939 年希特勒与斯大林签署的协议,这一协议允许苏联吞并这些国家;但他又进而支持莫斯科一直所认为的波罗的海诸共和国是联盟内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也反对任何分裂苏联的企图。亚科夫勒夫的演说激起了民愤,拦阻波罗的海各国民族主义的大坝开始崩溃。4 天以后,立陶宛议会宣布苏联的吞并是非法的,其他三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则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斗争。

苏联对波罗的海民族主义的反应殊异于它对东欧争取自由的态度,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谴责了日益滋长的独立浪潮。戈尔巴乔夫仅仅在一周或多一点时间以前,曾给波兰共产党领袖去过电话,要他们宽容为怀,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给立陶宛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电话中,则警告这三个共和国"决不要妄想脱离苏联"! 其间的差别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波兰和东欧,到目前为止的问题也就是改变现存的制度,苏联更为根本性的安全利益所在——如"华沙条约",依然稳如泰山而没有任何问题;而在波罗的海各国出现的独立情绪,在苏联人看来,却是对联盟自身的完整性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他们面对这一威胁,是绝不可能心平气和的。

对美国来说,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也同样是不同的。在我们看来,波罗的海诸国的现状是克里姆林宫最恶劣的背叛和背信弃义的铁证。我们从未承认苏联在 1940 年对他们的吞并,而且在任何意义上我们也不会对这些国家出现的独立趋势作出"常规"的反应,这些长期存在的趋势或许能够证明,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是维护其利益的守夜人。美国也有一个强大的"第三院",它在总体上是保守的,但特别看重波罗的海各国与美国的关系;在独立问题上,它渴望的就是扰乱苏联的阵脚,他们不仅希望波罗的海各国的自

由，而且盼望“现在”就自由，其结果是导致了美苏双方都对波罗的海将要发生的变化特别地关注。正是在这一地区，我们过去倾向于施加最大的压力，但现在却显得漠不关心；也正是在这一地区，苏联人过去是恣意妄为，根本不愿尊重当地的人民。

苏联国内的危机也开始在扩散，这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政策所引起的。为了在全国各地都推进改革，戈尔巴乔夫用威胁并下令进行真正的选举来对党内的顽固派施加压力。他故意地鼓励人民与身居要职的党和政府的达官显贵作对，他为国家正面临的问题而谴责这些官僚；而在同时，他开始抛开一直反对他改革的共产党，而转向用政府的权力来推行他的改革。他不断将权力集中在自己以及他的一些顾问手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戈尔巴乔夫不断削弱党的地方权力及其合法性，这样它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也就遭到破坏。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 9 月初，出现了这样一个难题：布什总统是否应该会见一位戈尔巴乔夫最猛烈的批评者——鲍里斯·叶利钦。他这次访美，共有 8 天时间的巡回演说，华盛顿是其间的一站。叶利钦的美国之行广受关注。他是一位秉性粗犷的人物，他的作派，特别是他的豪饮，往往是记者们大做文章的好材料。因为不满改革的步骤与进程，他也在利用一切机会来贬损戈尔巴乔夫，甚至还包括某些人身攻击，如在接受早间电视新闻节目采访中，他就是这样做的。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在美国的所作所为不可能高兴，这不是由于戈氏不喜欢他。在俄罗斯叶利钦是一位著名的公开的反对派，他对苏联事务渐渐开始发挥重大的影响，而且得到了某种认可。但是值得总统在白宫会见他吗？而如果不，又用什么方式来接待他呢？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他利用这次访问来打击戈尔巴乔夫。

我的职责之一是向总统推荐哪位来访的外国政治领导人他应

该会见。这里有两点考虑。其一是要扩大在国内的影响,并以此决定是否在白宫接待来访的他或她。其次则是不要浪费总统的时间,这大概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布什总统和我制定了一个在白宫接待来访者的明确的规则。其中居首位的是列入计划的总统本人接待的访问。其次则是由我接待的访问,作为这种访问的一个环节,我可以将来访者引进大厅,简短地"顺便走访"一下总统。更低规格的由我陪同的来访者,总统则相机"顺便拜访一下"对来访者表示欢迎,但严格限定他接待来访者的时间。最低规格的来访者,是连白宫也不让进的,他只能和我见见面。这些规定有些例外,如让来访者拜访副总统奎尔也是一种有益的选择。这里还有些别的细微的区别。我们在大楼设有三个入口,来访的客人通过它进出。首脑人物走外交通道;那些我们希望让记者们接近的客人则由西门廊引进;列入总统正式计划的、但我们不愿让记者看见的来访客人,则由西隧道入口引进。

叶利钦可不是一位容易对付的来访者。我的脑海深处还记得福特政府时期一次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泽尼斯耶恩的来访。从外交政策上考虑,福特没必要会见他——一位流亡者,一个在本国被官方放逐的人,而且前不久他在欧洲的整个逗留期间,没有一位政府首脑会见过他。这一切都说明,福特当初若决定和他会一次面,将会引发一场国内的大麻烦。索尔泽尼斯耶恩还被控对勃列日涅夫卑躬屈膝,而且他在苏联也并不支持自由和人权。叶利钦的情形也有某些与此相同的心理上的因素,这是一件难办的事情,布什总统也确实不需要引起国内一场轰动。

乔治·布什

我想见见叶利钦,因为他在苏联支持那种我们希望的根本性的变革。苏联人长期以来一直接待竞选总统的各种美国人,所以他们对我们愿意会见他们的反对派应该理解,而且特别的是,这些反对派还是些支持改革的人,我想听听叶利钦自己对苏联变化的

看法。后来，我决定到布伦特的办公室"顺便走访"式地见见他。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9月12日，叶利钦迟了半个小时来到了西隧道入口，在这儿他与康迪·赖斯见了面。但叶利钦拒绝下车，除非保证他会见到布什总统。赖斯告诉叶利钦，他约定的是与我见面，叶利钦顿显不快。在一阵简短交流后，康迪说，如果他不想坚持和我的约会，他也可以回到他的旅馆。威风顿失后，叶利钦只得跟在康迪的后面上楼来到我的办公室。

我问他为何来到美国，这样开始了我们的会谈。有点抑郁的叶利钦，沉浸于滔滔不绝地大谈其十全十美的计划概要。他称，通过此计划美国可以援助苏联的经济改革。其演讲的核心是他胸中酝酿已久的如何来管理苏联的见解。布什总统的中途光临打断了他的表演，但他显然来了精神，变得更加热情澎湃。布什总统的顺便会见只有几分钟，在此期间他告诉叶利钦，他认为他和戈尔巴乔夫有种积极的关系，并重申他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布什总统离开后不久，副总统奎尔也为合影和简短的交流而来顺便看望了一下。在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结束了会谈，然后叶利钦起身离去。

我们将叶利钦带到西隧道入口处，以避免撞上记者。当他的车开上西公务大道时，他一定看见了草坪上的一些记者，他们在这里拍摄白宫的景物。叶利钦停下车并钻了出来，于是立即引起了注意。他迅即被记者包围，趁机进行了一场即席的新闻发布会。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平静、安宁的访问结局，但也没有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在9月底，谢瓦尔德纳泽来到美国。除掉美苏关系遇上了麻烦的时候以外，对苏联外长来说，在他于联合国大会的秋季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时节，来华盛顿拜访布什总统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在

纽约安排了一次会晤，在这里布什总统自己也将就全球禁止化学武器协议的问题发表演讲。苏联人不同意，他们要求会见应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而且他们想延长会见的时间以使它引人注目，它显示出莫斯科想以此表明美苏关系正处于良好状态，以转移人们对其自身的国内问题的注意。

自从布什政府施政以来，谢瓦尔德纳泽已与贝克三次会面，但这是他第一次与布什总统会谈。这既给我们一个充分地了解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的机会，同时也使我们有机会对他们直接提供援助。我们特别想示意谢瓦尔德纳泽，我们理解改革进程的起伏，而且我们一直冷静地对待新闻报道中丑化苏联改革的漫画。

我们对他所说的苏联迅速滋长的民族主义也很感兴趣。他到达美国两天后，苏联就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持续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破坏性的动荡和实施戒严法只会导致少数民族的暴乱。动荡现在正蔓延到乌克兰，那里出现了煤矿工人的罢工与示威游行。举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措施，看来并不能证明戈尔巴乔夫已经理解了民族主义挑战的严重性。在他要求大幅度地改革苏联的联邦体制，以更进一步满足各共和国自治要求的同时，中央委员会也加强了莫斯科的中央集权，戈尔巴乔夫宣布改革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统率下进行。这一结果说明了两点：戈尔巴乔夫显然从他强调的自由化和多党政治的立场上倒退了，他再次强化了党的组织神圣不可侵犯。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谢瓦尔德纳泽在9月21日来到白宫，并向布什总统递交了一封戈尔巴乔夫的信，内容是对布什总统有关武器控制建议的回应。他扼要地陈述了一些他们承诺的让步，并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意思，即苏联希望加速进行销毁常规化学武器的谈判。这表明，苏联

愿意推进武器控制的谈判，并准备作一些让步以使谈判得以进行下去。但当布什总统提出敏感的地区问题时，谢瓦尔德纳泽则顾左右而言他。在我看来，在美苏关系中，戈尔巴乔夫好像更愿意将焦点放在武器控制上，尽管有政治上的困难，但他一直有能力控制官僚体制作出艰难的决策。这也许表明了，戈尔巴乔夫以为，对苏联来说，在第三世界事情将会进展得相对不错，因此他没有特别的需要，也不感兴趣来和我们在地区问题上展开讨论。

和谢瓦尔德纳泽的会见之所以吸引人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他向我们生动讲述了苏联国内的情况。除了贝克，我们大家还是头一次听到如此真实的报告。在我看来他的讲述是坦率和真诚的，但其内容也是令人不安的。按照他的估计，苏联的问题是严重的，而且还在恶化。他的率直令人耳目一新，因为苏联人绝非如此。我觉得这真正表现了一种迥异于普提马金几十年里村夫一样的新面貌，而在过去普提马金的举止却大差不差的是苏联外长的标准形象。

到夏末，东欧的骚动达到了高潮，而且席卷到东德。东德是华沙条约集团的基石，也是苏联最信赖的盟友。在此变化中，戈尔巴乔夫突出地站在与埃里克·赫拉塞克专制政府尖锐对立的立场上。埃里克·赫拉塞克顽固地拒绝承认和适应这一社会的大变动，现在终于诱发了一场危机。针对国内的政治高压和经济衰退，东德人开始利用他们8月份的假期，以自由旅行来逃离他们的国家，因为去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不需签证。在这或许是最激动人心的、而且还在不断地在这一地区蔓延的变化趋势中，大量的东德人聚集在本国的以及上述三个国家里的西德大使馆前面，要求政治避难。

一条新的而且更容易逃亡的通道已经打开了。当匈牙利在5月份开始撤除它与奥地利之间的边界关卡时，它就向“休假”的东

德人提供了一个穿越这条边界而进入匈牙利然后再入西德的方便通道。为此匈牙利政府很快就陷入了一种为难的境地：阻止移民或者寻找别的通道。经过好一番犹豫并且在试图让两个德国共同协商来解决移民问题的努力失败以后，在9月10日，匈牙利打开了它和奥地利的边境，10 000多名东德人席卷而过。布达佩斯已经公开地破坏了它与东德之间的同志关系，而东德对此的抨击是迅速而严厉的。东柏林谴责匈牙利破坏了协议和损害了东德的根本利益；匈牙利则回答说，按照《赫尔辛基正式协定》，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这更进一步激怒了东德人。苏联外交部的发言人盖拉迪·格拉斯莫夫对此仅仅说，匈牙利采取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步骤以及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对此事态苏联虽有点担心，但它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苏联。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匈牙利人向东德人提出了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东德公民的出逃——就如1961年的情形一样，当时柏林墙也正是为了对付类似的出逃而修建的——是对其国家的公开羞辱，而它在华沙条约集团内一直为自己最为富裕而骄傲。杜绝一切出逃的可能会在国内酿成暴动，而改变社会制度则意味着损害一个独立东德的根本基础，因为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两个德国了。这就要涉及当时尚为虚拟的两德重新统一的问题了。

匈牙利打开了它的边界，接着的是在波兰成立了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这两个大事发生时，莫斯科都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些事件的出现，揭示并加深了华沙条约集团内自由化的国家与东德、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顽固的强硬政府之间的鸿沟。我们的反应是谨慎的乐观：有可能这一集团将不再发挥紧密的军事联盟的作用。我们正目睹的变化看上去是不可逆转的，而这可能会永远消除对"北约"甚至对欧洲未来的根本威胁。

在一阵迅猛的出逃浪潮后，赫拉塞克政府允许那些在柏林、华沙和布拉格的西德大使馆里要求政治避难的逃亡者们出奔西德。可是，一旦这些大使馆空了，又会很快挤满人。华沙条约集团在10月7日要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届时戈尔巴乔夫也要出席。在10月3日，即庆祝会的前夕，东德试图关闭它的边界。在那长期以来一直被吹嘘为一种成功的制度中，东德人争先恐后地大逃亡的景象，实为这一政府难以承受的羞辱。赫拉塞克显然希望戈尔巴乔夫的到访会提供某些支持，也给一个萎靡不振的政府打打气；同时，有点相悖的是，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们，都把戈尔巴乔夫看成他们的英雄，推崇他在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僵化国度里强行进行改革。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戈尔巴乔夫如何在东柏林事件上使自己的言行一致，将不仅在东德、而且也将在全东欧产生强烈影响。他会对具有代表性的东德社会主义敬而远之吗？而这种社会主义他正试图在苏联国内加以改变，或者在努力支撑苏联帝国的迅速崩溃的西部防线时，他会不守其诺言吗？戈尔巴乔夫自己恐怕尚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他正设法在其自己的政治体制中除掉赫拉塞克这类人，所以东德领导人完全不是他喜欢的那类人。在与东欧情况相似的苏联，他所采取的举措也似乎是有理由的，因为我相信简单地以和他自己一样的自由共产主义者来取代强硬派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当木已成舟时，戈尔巴乔夫在两个方面都只作了一点努力。他避免了直接批评赫拉塞克，他将自己的评论只限制在声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面对改革的挑战，不过赫拉塞克所需要恢复的统治秩序则得到他明确的认同。戈尔巴乔夫态度暧昧的声明，反而对赫拉塞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我觉得赫拉塞克的麻烦好像要更大

了。

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抓住戈尔巴乔夫访问的机会，要引起他对他们的改革要求的关注。在德雷斯顿和利帕茨格，不断出现愤怒的游行示威和暴力。最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抗议者呼喊着："戈尔巴！戈尔巴！戈尔巴！"抗议者似乎已嗅到血腥味，对赫拉塞克政府来说，这种呼喊声包含了一种新的、不祥的预兆。又因为到目前为止的问题一直是东德人的出逃，所以抗议者现在则改成呼喊："我们在这儿！"其含意很明显，即大多数东德人不是要逃离压迫，相反决心推动改革。对游行示威者政府没有采取暴力，但赫拉塞克暗示了要使用武力。

在10月18日，赫拉塞克被迫辞职而被埃贡·厄伦茨所取代，厄伦茨深得赫拉塞克的宠信。但示威的队伍日益扩大，而逃离东德的浪潮仍在继续。在10月31日，厄伦茨前往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商。他回来后重新组建了东德的领导机构，他将与赫拉塞克关系密切的人请出了政治局。虽然他呼吁东德人呆在自己的国家里，但他还是宣布某些自由旅行的权力将被认可。可是，出逃仍未看出有停止的迹象。在他发表讲话的次日，有500 000人——这是最大的一批——上街游行示威，而同时仍有大批的人继续穿过边境逃到捷克斯洛伐克。到了11月7日，全体东德议员辞职。次日，党内改革派汉斯·莫德劳被任命为总理。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越来越断定，情况的发展已过了头，不可能再回转了。不满的情绪扩散得如此广泛，以致政府连压制行动都停止了。我现在担心这一情形是否能维持。赫尔穆特·科尔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东德人的汹涌流入，造成了西德的紧张，因为作为德国公民他们自然要接受援助。这一情形是可能发生的：东德崩溃而陷入暴

乱，西德也将因此被卷进去，然后还有苏联。东德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而且如果有苏联企图干涉的地区的话，东德就是。
乔治·布什

日记　11月8日

我一直听到有批评说，我们在东欧问题上做得不够。现在事变正激动人心地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如果在波兰、匈牙利或东德发生了任何一件大变革，人们会说这很好。但事情的发展——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对我们的批评也猛增，说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他们的意思是要加倍地花钱援助。这不单是送钱的问题，我想它是一种狂热；而且如果我们处理不当，采取一种美国式的方案（支持不同政见者就是），那么就会招致灾难……并有可能酿成流血冲突。

在11月9日，东德宣布将放松对其和西德接壤的边境控制政策。这一声明，由于官僚的失察，没有将柏林包括在内，这蕴含了一种极不寻常的特殊事变。人群开始沿着那堵将柏林市分割开的臭名昭著的柏林墙聚集起来，人们要求卫兵打开通向西德的检查站。卫兵当时犹豫了一会，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指令，但最后士兵对人们的压力作了妥协，允许自由通行。就在此短暂的片刻功夫，柏林墙倒了。

乔治·布什

大约午后的光景，我正坐在我的办公桌边，这时布伦特突然兴冲冲地跑进来告诉我，他有几份有关柏林墙被推倒的报道。我们离开椭圆形办公室，进入书房，打开电视，看到现场报道中柏林人民欢庆的场面。片刻工夫后，马林·菲茨沃特带着一大叠通报情况

的电报走了进来。他建议我对记者发表一个声明。虽然我对于所发生的事很振奋，但我对匆忙地发表声明心存犹疑。报道仍未得到证实，所以在我们确切了解详情以前，我不想急急地发表评论。更重要的是我明白，对此好消息我们必须要更加谨慎地作出我们的回应，我还必须考虑到戈尔巴乔夫及其反对派的反应。正如布伦特所指出的，现在尚不是我们心满意足于西方在和戈尔巴乔夫的竞争中赢得高分的时候。

马林建议我们就在办公室举行一个简短的临时新闻发布会。这似乎比一个正式的通报会要好得多，而举行正式的发布会，我想会是一步臭棋。很快，白宫里的全部新闻记者都挤进椭圆形办公室，他们手里拿着照相机、闪光灯和录音机。当我在我的办公桌边坐下来时，记者们都冲了过来，其间就有莱斯利·斯塔赫，她实际上已挤到了我的椅子旁边。

这是一次棘手的和令人不安的新闻发布会。记者想让我对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作出一番评论。当然，我对柏林的事变有过深刻的思考，但是当我在回答问题时，我脑子里仍在紧张地判断苏联镇压的可能性，一旦苏联干涉将会使这所有的快乐翻转为悲剧。我的回答是谨慎的，我努力说明，我们将会以一种不会刺激苏联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件。莱斯利向前探着身子，对着我强调说："在东西方的大战中，这是我们获得的一个大胜利，但是你好像并不怎么高兴。我不明白你是如何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我说："我不是一个感情冲动的人。"

她紧逼着又问："那么，你现在的感情如何呢？"

我平静地说："我很高兴。"

在对话中我所表达的看法，使我受到了连珠炮似的批评。斯塔赫以及其他记者想以此说明，我要不就没有抓住所发生事情的意义，要不我也许对它就根本不感兴趣。对事情的真相仍然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我非常理解柏林人民为什么会在大街上欢呼雀

跃。我担任副总统时曾到过柏林墙,我和科尔以及西柏林市长理查德·冯·韦扎萨谢尔曾一起在墙根下伫立过。他们向我指出是在哪儿,当年轻的东德人试图越墙而过时被射杀,他们向我详细描述了这一恐怖事件。我还到了莫德尔鲁瑟城堡,将德国分成两半的边境线正好从城堡中央穿过。当时至少我清楚,这一分裂的民族将会重新统一,而现在这里的人民已能够追求、投奔和享受自由了,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我们想目睹这一切顺利地发展,我们就必须小心在它刚开始时不要打扰它的进程,一个错误的行动就会葬送我们所亲历的欢乐。参议员乔治·米切尔、众议员迪克·格普哈特以及其他的民主党议员急切地建议,要我赶往柏林,去为柏林墙的倒塌而“欢呼”。这完全是愚蠢,科尔后来告诉我,如果我这么做了,那就不知道有多么愚蠢和糊涂。因为这将是火上浇油,是公然地挑逗苏军采取行动。

事实上,苏联对推倒柏林墙的反应,是立即发出了警告。在柏林墙打开的那一天,戈尔巴乔夫向科尔发出了信息,警告他要停止谈判两德统一问题,并给我打电话要求我不要作出过激反应。他担心游行示威可能会失去控制而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他要求理解他的心情。这是戈尔巴乔夫对东欧事变第一次清晰地表现出真正的焦虑,在此以前,他对在这一地区日益明显的脱离专制主义和苏联控制的变化迹象,一直掉以轻心,甚至有点见多不怪了;这会儿他好像突然明白过来了,这样演变下去后果将多么严重。在我读他的电报时,我又想起此间众多议员们的所做所为。

日记 11月10日

昨天我们从戈尔巴乔夫那儿得到一条信息,他要求我们不要采取过激行为……我想科尔以及其他领导人都知道我们的言行受到制约……莫斯科在同一封信里警告

我,要中止两德重新统一的谈判。柏林墙的倒塌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麻烦,但正如我一直所说的,这是一个民族自决的问题,是德国人民自己的问题,因此我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能够阻挡它。

我自己内心寻思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利用这些变化?在我们根本性地改变我们的国防架构以前,苏联应该做些什么?官僚主义的回答将会是,不要下大力气去做,要看事情的变化等等再说,但我不想失去一个机会……编制预算的过程伴随着艰难的舌战,但我要告诉我的人民,我们必须调整国防体系,支持创新研究的要求。这样我们就能发现什么样大胆的(军备控制)方案能够真正地造福人类,而且也能够保护欧洲的安全。当东欧发生事变后,我完全相信,所有有关欧洲防务(经费)的支出会降低。

过了一些日子后,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说,我接受了他对公共安全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担心,并且告诉他,这三个西方盟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一直与德国人合作来保证维持社会稳定。不过,我不能接受他的科尔正试图利用这些事变来煽动民心的看法。我说:"就我看来,联邦德国领导层采取了极端负责任的行动。他们强调了对在民主德国出现的事变,要慎重地一步一步地来处置的重要性;他们还强调了必须避免扰乱欧洲的正常秩序。"我还说道,我以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改革的承诺,在鼓励其盟友走上相同的改革之路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我向他保证:"我们无意于从民主德国以及其他华沙条约组织成员的当前变化中捞取单方面的好处。我们将继续坚守我们对《赫尔辛基正式协定》的承诺,尤其是对和平发展和自决原则的承诺。从你自己的声明中,我相信你同样是这样做的。"

为柏林出现的重大事变所振奋的科尔，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下午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他情绪昂扬地说："边界被完全打开了，这就像目睹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出现一样。"他推测、或者说是希望，人民从此可以随意地来往而不再是逃向西方。当然，自由的来去只有当民主德国实施改革才会实现。科尔也有其隐忧，"厄伦茨会推行改革，但我想其改革的幅度是有限的……我可以推测，改革只会维持几个星期，而且人民只会等上几个星期，看看改革是否会到来……(但人民)如果见不到隧道尽头的阳光，就将会有更多的人逃离民主德国"。他就此警告说，大逃亡的结局将会是一场"经济发展的大灾难"，因为优秀的人正在离开——医生、律师、专家，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多达二三十万人已经抵达联邦德国，大多数是平均年龄在 25 至 30 岁的年轻人，他们在这儿能挣更多的钱"。精力旺盛的科尔还特地说了句："没有美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变革。请转告你的人民。"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一夜间，那特殊的最为重要的"铁幕"象征就被摧毁了，它标明了东欧革命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的转折点。迄今为止，变革都是通过有改革思想的共产党政府与其人民通力合作而实现的，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在东德，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猛烈冲击了"华沙条约"集团内最顽固的政权并瓦解了它。东德政府在政治动荡刚萌芽时，就跌跌撞撞地拼命要笼住权力，但革命现在已从汹涌的浪潮骤变成冲决一切的洪流。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突然间一切事情都变得是可能的，甚至连我们谁也没想过的梦，我们也许会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就是一个统一和自由的欧洲。

第六章　结束与开始

东欧的集权政权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在崩溃，但在柏林墙倒塌所产生的冲击波以后，似乎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了。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年的最后的几个星期里所出现的风云变幻中，集权政权几乎全垮台了。在11月10日，也就是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托德·契夫可夫，这位保加利亚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国家主席，在其长达35年的斯大林式的集权统治后，宣布辞职。他的引退虽有点意外，但在东欧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引起震动。对苏联来说这是位最温顺和最听话的领导人，但现在也不再紧跟莫斯科了。或许契夫可夫希望体面地而不是像卡达尔和赫拉塞克那样被迫离开权位，但不论何种原因，他的离去，使强硬路线的阵营中只剩下两个人仍在台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米罗斯·吉克斯和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捷克斯洛伐克直接地受到了东德共产主义衰落的影响。集权的吉克斯政权在反抗改革上是赫拉塞克最理想的同盟军，这会儿它也忧虑地注视着东德的变化。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亲眼目睹了东德人民弃国而出的大逃亡，因为他们出逃西方的主要路线要穿越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注视着出逃的人群，并帮助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当他们的困难达到一定程度，东德人民的出逃必然会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影响。

与波兰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运动一直很少，而且总是不那么坚决。捷克斯洛伐克有一批要为1968年布拉格之春平反的知识分子。作为一群念旧的人士，他们通常被看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人，因为他们脱离工人和青年学生，而这些人才是进行真正革命的主力军。不过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与政府之间也一直有种不成文的协议：以一定的物质繁荣来交换政治上的服从。这种“默契”只是被人民勉强地接受下来，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则开始触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了。

剧作家瓦克拉夫·哈费尔，作为一位英雄和反对派中心人物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转换点。1月份骚动的结果是，政府决定把哈费尔作为一个要犯予以惩处，并将他逮捕、审判和关押，不料这反而使哈费尔成为众人仰慕的领袖。在某种意义上，他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莱奇·瓦文萨。在极度的夸张下，他被说成是人民的希望所在。这位温和而平静的人，迅即成为一个使所有民众振奋不已的人物；而苏联态度的游移，也使人民更为大胆地挑战现存的政治秩序。在另一方面，吉克斯政权也对苏联支持波兰的非共产党政权以及赫拉塞克的垮台大吃一惊。

在整个夏天和秋天，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进展显得相对的平静。在8月21日有一个小规模的游行示威。受东德反对赫拉塞克游行示威成功的鼓舞，持不同政见者们在10月28日，即每年纪念共和国在1918年成立的国庆日，发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局拘留了哈费尔和其他的反对派领导人，并于当天关闭了维莱克斯拉斯广场半天，还驱散了10 000多名示威者。不过对现政权权威的最大冲击，发生在11月3日，即当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出现在苏联的电视新闻中并受到苏方欢迎时，自从在1968年被免职以来，这是杜布切克首次亮相。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的是，吉克斯掌权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巧合的是，在杜布切克接受采访的第二天，东德重新开放了它

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东德人又开始涌入西德。柏林墙的倒塌和契夫可夫的下台，更进一步地鼓舞了人民，于是维莱克斯拉斯广场上的集会人群越聚越多，在 11 月 12 日开始时大约有10 000人，在一个星期之内猛增到200 000人。在 11 月 24 日，哈费尔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他和杜布切克一同出现于广场上。在 11 月 27 日，一场全国性的两个小时的大罢工，迫使现政权同意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这个由占多数的非共产主义政党组成的政府，在 12 月 10 日宣誓就职。这场“温和的革命”获得了胜利。

乔治·布什

在东德、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所爆发的激变，促使戈尔巴乔夫和我安排在 12 月初会面。在数周前，我自己就开始以极大的热情作准备，不多久我就研究完了种种简报。布伦特提供了差不多 20 个题目供我选择，我都采纳了，我想准备所有方面的问题。如果从坏的方面来看，我发现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的分析很有见地。有份分析报告推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注定要失败，而且他的政治改革也正在引起他无法加以控制的问题，报告称改革强劲得足以瓦解苏联体制，但又不足以使苏联人民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基于这一结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人开始揣测，戈尔巴乔夫可能正走向一场危机，而这场危机可能会迫使他在苏联实行镇压以维持秩序，或者也许会迫使他退出政坛。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政府里似乎人人都同意，戈尔巴乔夫完成其改革的机会不大；但在完成改革对戈尔巴乔夫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我们中间有分歧。贝克向我表示过，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热诚抱极大的乐观态度。贝克可能受到了他与谢瓦尔德纳泽关系的影响，而谢瓦尔德纳泽，我们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位最为坚决地主张彻底改革的人。我一直坚信，戈尔巴乔夫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或许他不再完全拘

泥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教条，但他仍时刻准备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来对付我们。他正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前进，但这是为了他自己；而只要他这样做，他就需要我们的援助，特别是——按我的估计——苏联的保守派们从不担心他正试图推翻他们的制度，他也因此成为一位这样的领袖：当他“左”倾时也完全能与保守派们同舟共济。

雷利·伊格尔伯格自信地指出，从戈尔巴乔夫承认其制度已变得多么可怕、从他奋力推进改革的深度来看，戈尔巴乔夫是值得信赖的；对于那些是否应该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争论，雷利觉得是学究式的教条，是毫无意义的。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元首，在实际的层面上我们别无选择地要与他打交道。鲍勃·盖茨则非常悲观，他认为这个已改头换面的、且有着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共产党政府，其前景堪忧，而且戈尔巴乔夫努力去创造的，人们很容易将其颠覆。

迪克·切尼的看法也是消极的。他觉得现在就放松冷战的象征性压力是操之过急了；苏联的制度是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必须坚持强硬路线，因为目前的局势以及我们所处的有利地位，正是这一路线所带来的，为什么要放弃这一明显的胜券呢？当时已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其态度则显得游移不定。他真诚地设法避免采取与切尼相左的立场，在他们两人之间哪怕出现一点分歧的时候，人们总能发现鲍威尔终究会站在持稳健观点的切尼的一边。不过，副总统奎尔是所有人中最为保守的。他差不多持这样一种看法：在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小伎俩，以哄骗我们相信危险已经过去，我们可以裁减我们的安全防卫系统了。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看法里，我只举出了很少几个例子，它们也未列入我研究这些问题的正式报告中。

乔治·布什

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前途和他的改革意愿，我持一种比布伦特或盖茨更乐观的看法。不过同时，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

会的成员们所提出的忧虑，我也有点同感，我担心我们正在应付的是一个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我们难以预测苏联国内反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计划的压力有多大，我们只从莫斯科得到一些暗示，即戈尔巴乔夫与我在马耳他会晤的目标之一，是争取我们对他的处境予以“理解”——因为面对压力他或许会采取镇压措施。但我不能给他这种理解，如果我给的话，这将是永远难以偿还的历史的、政治的和道德的代价。

我也清楚我必须在马耳他促使戈尔巴乔夫停止干涉中美洲事务。在11月底发生了一些突发事件，诸如在萨尔瓦多迫降了一架尼加拉瓜的飞机，飞机上装载的是苏联的地对空导弹以及其他军火。这虽无关大局，但更令人讨厌的一个消息是，苏联的货船正向古巴运送米格-29战斗机。这是一种空中格斗战机，它可以用来发射核武器。我不敢说古巴布署有任何核武器，但虽然如此，我对这一事实本身以及发生这一事件的时机，可谓郁愤交加。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这些突发事件生动地提醒我们，我们一直在面对着一个本质上仍是勃列日涅夫体制的政权，只不过它戴上了仁慈的假面具。我不想把米格-29飞机的外运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个人身上，但很难设想他对此一无所知。这种毫无缘由的挑衅性行为，只有“旧苏联体制”会干，况且如今也明显地不需要这样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关键时期，更是如此。不过此次货运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军事冲击，因此我不认为我们应将心思倾注于此，而是应该用于处理更为重要的事情上。

乔治·布什

日记 11月25日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昨天）来到戴维营，我们进行了

一次很好的会晤。总之她不愿看到，以任何借口对国防预算作任何削减……我向她解释，在预算问题上我们有压力，但真正困扰我的问题是，我难以说服她并使她相信，我们在国防费用上难以有所作为……科林·鲍威尔和切尼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她一贯表现得那样强硬。今天，我给柳伯斯、冈萨雷斯、马滕斯都打了电话，他们都说，"巩固北约组织，但不要逼迫华沙集团解体"。但他们并不像说得那样坚定，他们(对马耳他会谈)并未提出任何国防方面的议案。

但在最后，撒切尔给我发来一个很好的电报，在令人非常惬意的语句中，她说她想尽力帮助我。

11 月 29 日，我也与布赖恩·马尔罗尼在用餐期间作了一番长谈，谈话涉及的是他在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布赖恩说，戈尔巴乔夫想和我在马耳他建立信任，他不期望出现奇迹或者解决什么问题，他也不奢望获得援助；他只想更进一步地了解我并谈谈他的目标和主张。我告诉布赖恩，我要努力使戈尔巴乔夫相信，我们希望与他合作。

最后，是如何在事后向盟友们通报情况的问题。弗朗西斯·密特朗已经邀请我在回国途中作客法国南部。虽然我想与他会晤，但我觉得此举会引得其他国家也要求个别的会见，而我实在没有时间跑遍欧洲。于是，我们想起了这个主意：请曼弗雷德·沃勒来准备一次北约首脑会议，在会上我们可以向各成员国简要通报情况。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新闻界在议论，在美苏一系列会晤中戈尔巴乔夫的"突然袭击"策略：如在 1986 年夏天的雷克雅未克与里根会晤时所发生的，今年 5 月与贝克在莫斯科会晤时所出现的。这种可能性引起了我

们中的一些人的注意。我们讨论了如何来防备以及如何来应付它。我们决定,如果我们碰上了一个我们没有研究过的建议,布什总统将谢谢戈尔巴乔夫,然后只告诉他,我们要将建议带回华盛顿研究,完了才给他答复;接着贝克则上前提出我们自己的方案,并设法将戈尔巴乔夫置于守势。他的想法是就每一个问题提出一个一揽子方案,然后让布什总统抢先提出来。布什总统喜欢这一主意,因为他觉得,还有在其他事情上,一直有那样一些批评者,不断指责我们没有定见和缺乏方向。我们起草了一个包括 17 个议案的一揽子计划。

我并不特别满意贝克的主意。因为我觉得从好的方面说,它是有点外行,而从坏的方面说,则是老一套的了无新意。我以为总统首先推出的应是有深度的东西,亦即提出一种他对世界的"大写意"似的宏观构想,其间包含美国与苏联在其中所担负的责任以及我们所面临的危险与机遇。虽然这显然也会为戈尔巴乔夫设法来左右会谈大开方便之门,但这将为进一步详细地讨论建立一个适当的框架。

我们飞向马耳他的那天晚上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我们是在 11 月 30 日的晚上 7 点钟,从安德鲁空军基地起飞的。吃过晚饭后,大家都惬意地躺下来,准备在这短短的时间好好睡上一觉。当电台工作人员走过来说,鲍勃·盖茨给我打来电话时,只有苏努努和我两人还在忙碌着。盖茨说,在菲律宾似乎正酝酿着一场突然的军事袭击,他已经要求召开参谋委员会会议,但其间出现了一点波折,因为副总统奎尔要求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切尼在家中,他拒绝来白宫赴会,他的理由是副总统不是本部门的负责人,而这类会议也没有正当理由召开。伊格尔伯格则已经去会场了。

会议对科里·阿加诺总统的援助请求发生了争议。反叛者已控制了一个空军机场,并威胁要轰炸总统官邸。鲍威尔提出、大家

也同意的一个建议，是派遣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到叛军占领的机场上空盘旋，以迫使叛军放弃轰炸的企图。我赞成这一计划，因为这一方面可以满足阿加诺总统的请求，而另一方面我们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又很小。

贝克睡得很香。除非总统遇上了特殊的问题，否则我决定不去叫醒他，没必要在今晚把大家都弄得精疲力竭。不一会又有奎尔和切尼的电话找我，而盖茨的电话则是隔不了几分钟就来一次，他尽力向我介绍奎尔与切尼情况的进展。我竭尽全力来抚慰每个人。在此情形下，我只得请苏努努喊醒总统，向他解释国内的建议并请求他的批准。布什总统迅速同意了。

即使承认上述切尼的“部门负责人负责”的态度是正确的，这也是小题大作。这场小危机提醒我的是，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政府系统如何顺利运作。我考虑的是，在控制机场问题上我们所采取极克制的步骤，应不会有闪失，事情也许会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处理，但我们的行动正是意在防患于未然，而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开一枪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乔治·布什

我们在上午10点到达马耳他，天空正下着毛毛细雨。在和马耳他总理弗莱切·阿达米的简短会晤后，我们去瓦莱塔港参观访问了美国军舰“弗瑞斯特”号[1]，接着又登上了美国巡洋舰“贝克莱帕”号，它是美国第六舰队的旗舰。在一英里以外停泊的是苏联的巡洋舰“斯拉夫”号，而苏联大型的巡洋舰“马克西姆·高克”号则停在船坞里，在与会谈有关的三艘舰船中，它是最为警备森严的。我

[1] “弗瑞斯特”号上的主人是安德米内尔·乔纳逊·豪，他是南欧盟军的司令。我第一次遇见乔，是在1972年我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当时他是直接听命于亨利·基辛格的海军少校。在那里他干得很出色，并历任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一军事职位，最后获得海军最高军衔。当总统提名鲍勃·盖茨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我请求乔代替他作为我的助手。

在"贝克莱帕"号上安顿下来，我占用了船长安德米内尔·乔纳逊·D.威廉姆斯的舒适的卧室。当安营扎寨结束后，我挤出一点时间来钓船上的扇尾金鱼。我一无所获，我只不过让其中的一个家伙轻轻咬了一口鱼饵。

外面一直在刮着大风，不过我第一晚躺在床上，耳中隐约听见的海浪轻拍船身的声音，却仿佛是一首温柔的催眠曲；但到了第二天天气变坏了。汹涌的海浪严重打乱了我们的计划，还甚至迫使我们取消了一次会晤。住在"马克西姆·高克"号上的戈尔巴乔夫，不愿冒险外出到"斯拉夫"号上来，而原计划第一次会晤在那里举行。他不来，我们只得前往"马克西姆·高克"号。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又面临着一道难关，因为那大浪让人难以站稳脚跟。

"马克西姆·高克"号很漂亮。它有着厚玻璃板的窗户，最近又整修过，它之所以被安排在这里，正是作为苏联代表团和工作人员的栖身地的。戈尔巴乔夫在客厅外楼梯顶层的平台上迎接我。由于他在前一晚到得很迟，显得很疲惫，但是他面带微笑。他身着深蓝色的细条子外套，乳白色的衬衫，系条红领带。他的头发好像比我们上年见面时变得更为灰白。和他在一起的是谢瓦尔德纳泽、亚可利夫、贝西默特尼耶克、阿纳托克·切尼耶夫，还有一大群顾问：瓦伦丁·法林，前大使杜布尔耶林、阿克罗米耶夫、维克多·卡波夫，现任大使尤里·杜比宁，新闻秘书盖拉迪·格拉斯莫夫以及其他一些人。当戈尔巴乔夫一一介绍他那一大群随从时，我发觉他们以前我全见过。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和总统一样，我也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位。尽管大家都很友好，但气氛仍略显紧张。在客厅里，当我们彼此隔着桌子相互致意时，感觉到有一种期待的紧张。作为这艘船的主人，戈尔巴乔夫以正式的欢迎词作开场白，然后他邀请布什总统首先发言。当总统开始演说时，他有点不自然，很显然他对可能发生的事高度地戒备，

当话题开始后，他轻松自如了。

乔治·布什

我提出了我们的方案，并建议在6月底的某个时候召开一次首脑会议。为了推进贸易，我转向讨论其中的障碍。我说："我想撤消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因为它阻碍了MFN(最惠国待遇)。但现在有两件事必须先做。首先你们要修改移民法，并希望尽早在明年彻底完成。其次我们的法律规定，在最惠国待遇以前达成的贸易协议可以被承认。因此让我们立刻进行商贸谈判，我将推动美国方面采取行动，我想促成这件事。如果这一指令传达不到我们政府的高层官员中，我想我应对此负责任。我乐意于尽快在1990年首脑会晤时达成一个协议……"我也提出了某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个是人权以及分离的苏联家庭问题，他们中的部分人生活在美国。当我说这番话的时候，贝克递给戈尔巴乔夫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名单。戈尔巴乔夫注意到，苏联大使没办法来应付那些如潮水般想移民的人们。他答应要追查这件事。

我提出了中美洲这一在我们两国间最为敏感的话题。我指出，那里的国家领导人正不断向我施加压力，要求我请戈尔巴乔夫出面制止卡斯特罗向这些国家输出革命。我说："在我们正不断改善的关系中，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因素，这不仅是美国右翼人士的看法。还有比这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我知道这对你是很敏感的——在美国有些人会问：'(苏联)怎么能将钱投到古巴，却一直在问我们要(农业)贷款？'……尼加拉瓜保证谢瓦尔德纳泽先生不会送武器去。桑地诺集团应为你们作出一个解释。"我补充说，这一地区问题的最终的解决是真正的选举和改变政治制度。

我继续说："在军备控制问题上，我想避开化学武器，这是我的想法。"我提出一个包含我方让步内容的新建议。如果苏联赞同我于9月份在联合国大会演说时提出的有关化学武器的提案，我将准备停止改进我们的化学武器计划——一旦全球禁止化学武器公

约生效时，我们就这么做。我也希望欧洲常规武器条约在 1990 年签订，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后面的“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上。为了使事情能进展下去，在谈判立场上我们准备做些变动。我要求戈尔巴乔夫就如美国所做的一样，也公开他们的军事预算、总兵力、武器产量等等的详情，“作为一个前中央情报局的雇员，我希望在我们下次会晤时，你能从克格勃那里要到这些数字”。

戈尔巴乔夫面带微笑说：“他们说，你并不公布一切。”

我说：“我希望你把这件事作为增加信任的一种措施来做。”我在结束发言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我们可以合作的其他领域，诸如环境问题、科学和留学生交换问题，最后，我开玩笑地说：“我的杂乱无章的发言就此打住了。”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贝克的计划发挥了作用。不论戈尔巴乔夫内心深处的打算如何深藏不露，布什总统显然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在被美国蜂拥而出的提议所包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显得有些困惑；但他很快完全恢复了平静，并做了一个令人信赖的演讲，但在有关防务问题上我们当初在彼此交换意见时所滋生的担心，依然存在。

乔治·布什

戈尔巴乔夫在回应我以前，停了停。他缓慢地说：“这有意思。它表明了布什政府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了。”他大声朗读起写在一个小橙色本子上的他对世界看法的要点。“我相信正确认识这段历史，对我们双方都是重要的。你不能重写历史，发生了什么，也就发生了，这就是历史的特性；但考察所发生的则是我们的特权，甚至是责任……今天，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完全是新的问题，对于它们我们想都没想过，也未料到它们会变得如此尖锐。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像过去一样来处理这些问题。”他反对某些美国人所持的观点，即以前的政策一直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坐收其利。

他又说："我知道你不赞同这一点，我知道你倾听过专家们的意见，但你今天所讲的，表明布什总统有自己的见解，而它契合于我们时代的挑战。"

他勾画了一幅他所预见的日益临近的新世界的轮廓——一个完整的欧洲、强大的日本和中国的多极世界，印度也正变得更有活力。他能想像新的更为严峻的问题将会出现，而一切都与竞争和有限的资源有关。"我们苏联对这些问题已作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美国和苏联注定要长期地合作，但我们必须要抛弃互相为敌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说，他并不是在提议美国与苏联来共同统治世界，而仅仅是描述事实。他说："我并不怀疑我们的共同责任或我们过去的合作模式，但现在必须找到一种合作方式来应对新的现实。"无论哪一方忽视另一方或者否认他方的利益，对双方来说都是危险的。"美国并没有完全抛开旧的立场。我也不能说我们就完全抛弃了旧框框，有时候我们觉得，美国总想教训别人，或者对别人施加压力，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听听你的解释，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来架设彼此沟通的桥梁而不是隔岸对峙。"

我回答说："我希望你注意，在最近几个月大量涌现的积极变化中，我们没有作出哗众取宠或狂妄自大的反应，因为这会使苏联的处境变得更复杂，我所说的可能有点自吹自擂。我一直有谨慎和胆小的名声。我是谨慎，但绝不胆小，但我让自己的行动不要把你的生活搞得复杂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柏林墙事件上没有大作文章，推波助澜。"

戈尔巴乔夫说："是的，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也很欣赏。我们对一件事有些担心：你们在菲律宾采取的行动。"至于中美洲，军火船问题是个误会。"如果我们向你保证了什么，我们总是愿意遵守承诺，要不在我们的关系中你不会信任我们。我们要使你信服，我们不准备卷入那里的政治游戏中。我们保证不会向尼加拉瓜提供军

备,而我们也确实没有。"在迫降飞机的事发生后,他说,他们已和尼加拉瓜和古巴进行了联络,双方都说与这一突发事件没有任何联系。他保证说:"不过,我们仍将严守诺言。"

他继续说:"在尼加拉瓜已实现政治多元化了,而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把桑地诺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是荒谬可笑的。尼加拉瓜目前状况的根由,在于其经济与历史,我实在不明白尼加拉瓜为什么不能被你们所容忍。选举后他们会有一个新政府,让联合国和拉丁美洲来监督选举吧。坦率地说,对他们我们并不是那么在意。至于古巴,卡斯特罗的出现,我们没有提供任何援助……没有人能向卡斯特罗下达命令,绝对没有任何人。卡斯特罗有自己的改革理念,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说着笑起来。"我们需要相互理解。我们不想在古巴和中美洲建立桥头堡,我们没必要那样做。你应该相信这一点。"

我对第一轮次的会谈很满意。从会谈所涉及的大量问题来看,它与我所准备的小规模的无会议日程的会谈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发言经过精心的准备,特别是经吉姆和布伦特的加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我觉得当我们在午间时分的私下会谈时,戈尔巴乔夫变得轻松了。在这个轮次的会谈中,只有我们的翻译布伦特和我、戈尔巴乔夫及其翻译切那耶夫共四个人在场。

为了对我谈卡斯特罗,戈尔巴乔夫狠劲地提高了声调。他说:"我和卡斯特罗在古巴的会谈可就多了。卡斯特罗对我们的(改革)政策流露过担心,我向他解释,我们的目标是正确的……实际上他要求我来帮助实现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正常化…… 这是我第一次在非常秘密的场合说起这件事。"戈尔巴乔夫特意指出。

我回答说:"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有关卡斯特罗的牌放到桌面上来吧。我们的盟友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关心中美洲,在他们看来这真不是个有价值的对象。对美国国内的左派来说,这也不是个有价值的问题;但对刚刚诞生的拉丁美洲的民主、对美国右派来

说,它却是个很大的问题。当你前进时、当西半球向民主挺进时,卡斯特罗就像个船锚,老阻绊着你。"

戈尔巴乔夫说过,桑地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无涉。我说:"我倾向于赞同你的看法,我也不认为桑地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但我坚信他们正在输出革命,他们正在输出武器。我不在意他们曾告诉过你什么,但他们正在支持 FMLN(在萨尔瓦多的左派军事力量)。我现在确信又有一艘载满直升机的新货船,正从苏联驶向尼加拉瓜。"我告诉他,我认为解决尼加拉瓜问题的方法是举行一次可以核查的选举以及不论选举的结果如何,丹尼尔·奥特加都不要试图问鼎权力。至于美国的态度,我向他保证:"如果它是一次自由的选举,我们将承认它的结果。"在中美洲还有另一个问题是巴拿马,在这里曼纽尔·诺列加仍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我透露我们正准备对他采取坚决的措施[①]。

戈尔巴乔夫轻松地说:"让我来告诉你们的行动在苏联引起的反响。人们问,就没有办法来阻止美国对主权国家的干涉行动?美国在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而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

我提出了菲律宾问题。因为在前次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曾提起过它,而且我想它也是一个涉及美国卷入他国事务的理想的正面例子。我说:"在菲律宾,(由荷拉汉森上校领导的)是一群特殊意义上的军人,他们是叛军。民主选举的总统阿加诺要求我们提供帮助来防止王宫遭到这些叛军的轰炸。我从来没想到这一行动会在苏联引起疑问,虽然我本可以愿怎么干就怎么干。"

戈尔巴乔夫加重语气说:"在苏联,有人说:勃列日涅夫主义正在被布什主义所取代。"我提醒戈尔巴乔夫,在菲律宾,是一个民主政府要求我们来帮助它对付叛乱的暴徒。

戈尔巴乔夫说:"我同意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立基于宪法之

---

① 在 12 月以后,才在巴拿马最后采取了重建民主的军事行动。

上；在东欧，这里的许多政府也是合法选举的，但现在它们正在被推翻。问题是，在东欧的冲突中，（如果）有人要求苏联军队进行干预，又该怎么办？现代社会一切都是彼此相关的。如今有人抱怨说，我们不想对我们的朋友尽责，不过我们还没有接到进行干预的请求。"

我回答说："在东欧，变化是和平的而且是受到你的鼓舞的；而在菲律宾，则有一位陆军上校企图以武力来夺取权力。"

戈尔巴乔夫点点头。他说："和平变化是主流，我们的立场是不干涉。变革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各地都能找到来干这些坏事的上校军官。"

他将话题转到东欧和西德上面，并说他有三点要说明。第一，"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是如此紧紧地把我们联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有些美国政治学家主张，欧洲应基于西方的价值观念进行统一，他不喜欢这种说法，他进而说，"这就是某些人正在鼓吹的——当然不是你"。第三，科尔先生在德国问题上过于激进，"这并不好"。

戈尔巴乔夫推测，科尔刚刚发表的声明①，其动机是意在"选举前造势"；他建议，我们"应该让科尔知道，他的态度可能会坏了好事"。因为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一个统一的德国，是不结盟呢还是加入北约组织呢？答案提出的时机尚未成熟，我们暂不提出来——我们将会让它水到渠成地自然出现。你和我都不对德国的分裂负责，让历史决定未来吧，对此我们需要一种理解"。

我告诉戈尔巴乔夫，我想科尔对所发生的事大概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动。我承认："他的计划中有某种策略，也有某种感情的宣泄。我想他理解他的盟友的疑问——在他们支持德国人民有统

①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11月28日，在有关德国最终统一的一次庆祝性的演说中，科尔宣布了一个两德间更紧密合作的计划。

一的权力的同时，他们在私下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有所顾虑。”

戈尔巴乔夫回应说：“是的，我知道，而且他们让我知道。不同于他们、也不同于你，我所说的是：有两个国家，历史决定过他们的命运，所以还让历史决定它们的未来吧。科尔向我保证，他将遵守我们(5月份)在波恩达成的谅解。现在他说他想在电话中和我聊聊，还将派根舍来。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特别谨慎对待的问题。”

我点头称是。我说：“我们不会轻易采取什么行动，以试图来加速德国的重新统一。当你和科尔会晤时，我想你会发现，他也认为……我是‘胆小’的——当我对柏林墙的倒塌拒绝作出过激反应时，参议员米切尔就是这样刻画我的。现在不是哗众取宠的时候，更不是采取那些看上去漂亮但实际却是鲁莽步骤的时候。”

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蕴含着伟大责任的时代——有着极好的机会，但也有着伟大的责任。”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马克西姆·高克”号上谈了大约四个半小时后，我们回到“贝克莱帕”号去。天气已变得很坏了，即使在港湾里，海浪也非常大，风在怒吼，我们上船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最终之所以能上船，多亏了“阿德米勒”号汽艇上船员的娴熟的技术。海浪在一瞬间将汽艇颠簸到15英尺高，使得靠上“贝克莱帕”号的甲板平台简直成了一场特技表演。汽艇将船的右舷平台甲板撞得粉碎，但最终我们还是设法从左舷平台甲板上了船。船员们担心汽艇也会撞坏这个平台甲板，如果真是这样，在海浪平息前，那就进退两难了，因为直升飞机也解决不了问题。

到夜幕降临，船像发了疯似地摇摆。这场风暴使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下船，而且我们动弹不得，即使我们的船正停泊着。戈尔巴乔夫也不可能前来“贝克莱帕”号赴晚宴了，于是我们为他吃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剑鱼、大龙虾以及其他美味。在这里，两位超级大国的元首相距仅仅几百码，但却不能在一起共进晚餐。风暴将

我们与外界隔开了，即使会谈进行得很顺当，但在我们可以和岸上的人见面之前，我们却不清楚大家对会谈是怎么看的。

乔治·布什

我走在甲板上，一边和向船头走去的志愿兵们说着话，为躲避浪花和雨水大家都低着头。摇摆的船身使我想起了我在美国海军旧航空母舰“圣·哈辛托”号上的岁月，那时，在太平洋上也经常遇到大风暴的日子。曾有一位船员警告我不要站在船头的锚链旁边，他说，它曾经脱落过，而如果它突然折断，我的双腿也只好随之报销了。海浪是如此厉害，船不得不抛下它的尾部锚链，这使得情形更为紧张。我折回来朝船尾走去。我经过志愿兵的食堂，看到士兵们正准备看电影。有些水手带着照相机，他们要求和我合影，这很有趣。我朝里瞧了瞧海军军士长的卧室，我看到屋里有三层床，这使我想起美国海军“长须鲸”号潜艇上的双层床，1944 年我被敌机击落后，这艘潜水艇曾救过我。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舷梯、船舱、能自动开启的水龙头。我所在的是第六舰队的旗舰，它状态很好。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真正是与世隔绝了。我设法和华盛顿联系，但成效甚微。全体无线电人员都全力以赴，但在我看来，设备似乎并不是目前最为先进的。我暗自祈祷，今晚不要有危机发生。很幸运，那晚出现的惟一的一场危机只是与记者有关。

马林·菲茨沃特在船上，他早已安排好了要与格拉斯莫夫举行一次联合新闻发布会，但现在他却无法离船上岸。他拍电报给罗曼·波帕迪克，他是我们的新闻秘书助理，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负责公共关系的高级顾问，但显然是有去无回，没有任何回

音①。一切都太迟了，格拉斯莫夫已在大唱戈尔巴乔夫的赞歌了。玛格丽特·塔特怀勒，国务院的发言人，也送来了类似情况的汇报。马林坚韧不拔地给罗曼拍电报，说明我们对今天事态的看法。面对苏联同行大肆宣传所造成的舆论声势，罗曼设法将零星的信息汇聚起来，并与玛格丽特一道尽全力予以反击。

乔治·布什

第二天早晨，风暴平息了，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实施我们的计划。由于仍然未能说服戈尔巴乔夫冒险前往"斯拉夫"号，所以我们又去了一趟"马克西姆·高克"号。他很开心，人也变得直率起来。又是一次轻松的会晤。戈尔巴乔夫可能有点顽固，但他有很好的幽默感。我感到当我们谈话时，我们的语调都相同。

戈尔巴乔夫对我说："我想对你和美国人民说，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动一场战争，而这是非常重要的。苏联已准备不再把美国视为敌人，并准备宣布我们的关系是合作伙伴。"现在是考虑超越军备竞赛的时候了，但他抱怨当苏联已经转向防御性国防理论时，美国和北约却仍然没有改变其军事理念。当他结束发言时，戈尔巴乔夫递给我一张彩色地图，上面画有美国在全世界各地的空军和海军的军事基地。他开玩笑地说："我不敢肯定这张图是否完全，或者是否还需要些补充。第六舰队（包括我们用来会晤的船只）则是活动目标。"

我笑着说："'斯拉夫'号在哪儿？"他的地图很吸引人，但说明不了问题，例如，他们在巴拿马运河上标上了蓝旗帜。我问他："巴拿马运河与包围苏联又有何干？"

① 罗曼是我从科林·鲍威尔那儿聘请来的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他在此双重任务中，干得非常出色，马林和我同意继续聘请他。罗曼与新闻界打交道的本领令人称绝，他在新闻界的声望也很好。当他在1992年离职赴乌克兰任大使时，我们用瓦尔特·坎斯特洛来代替他。瓦尔特是我的一位负责非洲事务的主要顾问，他很快就适应了罗曼所从事的复杂的工作。

"不要在意巴拿马运河。"说完他哈哈一笑。

"这张图在我们看来是否是准确的以及如果它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将会向你说明。"说完,我将图递给布伦特。

我将话题转向讨论欧洲问题。我说:"虽然你和那儿的事变利害相关,但我仍想议论议论……难以要求我们反对德国的重新统一。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已经努力克制我们的行动。"我补充说,我们都很清楚《赫尔辛基正式协定》关于边界的规定。我问:"你如何看待目前的状况?"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相信全部欧洲将会更加紧密地走到一起。他说:"我们的看法——被所有欧洲人、甚至被与我们有些细微差异的科尔所认同——是: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不应逾越《赫尔辛基正式协定》。"我们必须去促进稳定并确保不会损害那维持着欧洲平衡的条约。他预计在将来,"华约"和"北约"将会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不是军事意义。

在下面接着进行的一对一的私下会谈中,我单刀直入地提出了波罗的海问题。我问戈尔巴乔夫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他描绘了他所面对的问题,特别是苏联境内盘根错结的民族问题。他说,他一直准备通过扩大自主权的方式来解决波罗的海问题,但是如果他们走向分裂,"那将是非常严重的。我决不能为改革带来危机,否则苏联人民也难以接受。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 50 年,我们是一个整体"。他指出,有 300 万俄罗斯人生活在波罗的海地区,爱沙尼亚的一半人口是俄罗斯人,而拉脱维亚一大半的居民也是俄罗斯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分裂将在人民中间引起强烈不满"。戈尔巴乔夫说,那里曾经很"安宁","但一直有矛盾,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我希望你理解我们的立场。民族分裂主义会点燃一切可怕的大火,如果美国不理解,那么它对我们关系的损害,将比任何事情都要厉害"。

我插话说:"但是,如果你们(在波罗的海)使用武力——你也不希望那样——那也将会产生一场大灾难。"我指出,美国对苏联

在这一地区使用任何武力都将会作出反应。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们想让一切得到公平对待。如果我们从纳加罗—卡拉巴克地区[1] 撤出 MVD[2]，我们将(陷入)国内战争。我们承诺要实施民主，我们希望你能相信这一点。"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正当这个节骨眼上，赖莎·戈尔巴乔夫进来问候我们，于是正式会谈就此结束了。从这次交换意见中，我相信戈尔巴乔夫会明白，对我们来说，波罗的海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虽然在有些地方他的话说得有点圆滑，但他会约束自己不要对那里的人民采取强制措施。

乔治·布什

我们已就各种问题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讨论。尽管彼此之间存在分歧，但我认为，我们已达成了很多的共识。由于我们取消了一次会晤，在一些问题上谈得又是这样彻底，所以我们并没有严格遵守会晤日程。戈尔巴乔夫建议，让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继续谈——完全放手让他们谈，对此我也同意。更为重要的是，马耳他会晤在我和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关系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以为，我们联袂出席新闻发布会就象征了我们的友好关系。在美苏关系中，这是两国首脑首次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会谈显示出我们之间真挚的坦率，彼此能以一种真诚的态度来倾听对方的意见。或许我们之间不断加深的相互信任，有助于他能够接受并推进东欧的变革，而不担心我们会乘机从中谋利。我们在这里面对新的挑战所做的一切，正有益于加强欧洲的安全。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这次马耳他会晤进行得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虽然没有就任

① 它位于阿塞拜疆境内，这里大多数居民是倔强的亚美尼亚人。
② 苏联内务部队。

何条约进行谈判或者签署任何协议，但它为着手进行以后的“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和“欧洲常规武器”的谈判、为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化学武器协议，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布什总统还拓展了双边的经济关系，并通过解决 MFN(最惠国待遇)问题，实现两国贸易关系正常化。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双方极为关切的每一个问题上几乎都交换了看法，而这使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都明朗化了，当我们遭遇危机和机遇时，这一态度能发出一种更为可靠的信号。数月来一直令我不安的反对首脑会晤的企图并没有得逞，新闻界也没有进行谁输谁赢的打分论高下。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延期得太久了，也许是因为总统的品格和他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也许是因为布什总统在开场白中的主动出击，使我们获得了优势；或者与这些都无关，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未曾想展示其突然变招的“超人本领”，或者也是因为他对会晤的结果没有大吹大擂。

我们动身前往布鲁塞尔，北约首脑会议已安排好向各盟国通报情况的议程。我们自信我们已为美苏关系构筑了一个良好的、坚固的基础。

尽管罗马尼亚也面临着尖锐的压力和严重的经济困难，但齐奥塞斯库似乎就是不受横扫其邻国首都的政治风暴的影响。很多年里，他一直对苏联敬而远之，他在对开放以及对波兰、匈牙利和东德变革的谴责中，竭尽挖苦之能事，即便在出现了赫拉塞克倒台的不祥征兆后，他仍然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在 12 月 17 日，蒂米索拉的抗议者反对驱逐一位匈牙利的新教牧师，不幸遭到残暴的镇压，但这一次却引起了全民族的愤怒，而且军队也加入了抗议队伍，在东欧这类现象还是第一次出现，它冲击了罗马尼亚政体的基础。齐奥塞斯库中断了他在伊朗的访问，匆匆赶回来处理骚乱。在 12 月 21 日的一次演讲中，他被成千上万的群众讥笑着轰下台。次日，“民族拯救阵线”宣布自己为临时政府；接着

发生的，也许是结束东欧专制统治行动中的一个最为极端的行为，也是许多罗马尼亚人想都不敢想的："民族拯救阵线"在圣诞节那天处决了齐奥塞斯库。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齐奥塞斯库死在雪地里的景象，是东欧革命中最令人难忘的画面，也是对寡头政治专制行为的最严厉的警告；但这种冷酷的行为是我们所从不敢赞成的，不过它也提醒我们1989年的变化终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取得了胜利。

乔治·布什

那年秋天的事变进程，既使我震动，也使我兴奋不已。东欧人民世代相求、甚至是屡次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它就是自由。我觉得我们有节制的、主张渐进的立场取得了成功，即使我们未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对事变助一臂之力，我仍然这样认为。我一直被指责为太谨慎，这或许是因为我对东欧的事变采取低调的缘故。但我的态度是深思熟虑的，是基于我对东欧二战后历史的研究之上的。当我在波兰和匈牙利访问时，我一直小心不要用过于刺激的言词，因为那样会诱使人们做出一些情绪性的举动，而这可能会招致苏联的报复，会失去我们正孜孜以求的东西；相反，我鼓励积极的东西，以促进变革。与此同时，我还让莫斯科、东欧诸国清楚地看出，我们坚定地站在自由的一边，而且决不退缩。攻击我们的人很少留心于我们因谨慎所遭遇的磨难。回想起来，假如戈尔巴乔夫主动干预，这也不意味着东欧的变化节奏更快些就有危险；不过也很清楚，这一节奏也不会带来意外的好处。

我想我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即使我们无法介入即将在苏联国内发生的变革。我们已决定将我们的工作中心从莫斯科转移至中欧和东欧，这部分是出于检测戈尔巴乔夫对改革、对

开放以及在外交政策中推行"新思维"承诺的实践程度。幸运的是,我们的政府从一开始就赶上了东欧的变革,由于着意于东欧,我们延缓了与苏联在军备控制上的谈判。对于波兰朝气蓬勃的发展,我们立刻予以肯定。我们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当自由主义浪潮在这一地区蔓延时,我们可以促进它并充分地利用它。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的东欧政策有过变化,即从援助那些最勇敢地反抗苏联的国家,转移到支持更重要的自由运动。我们的政策确实为东欧的变革提供了坚定的支持,也使我们能对事变采取适当的反应,但如果说我们的东欧政策一直是促进东欧变革的积极因素之一,却并非事实,尽管这听起来很带劲。东欧事变发展的速度之快和涉及的范围之广,在西方烘托出一种欢乐的情绪,而布什总统则不得不预防这一情绪的过度膨胀:即人们从欢呼自由和自决的胜利,转而把东欧的变革也夸张成冷战的战果,这种夸张很容易挑起冲突。基于这一考虑,我们的政策——也许是不自觉地——从完全支持变革到力求苏联默许这种变革、甚至是与他们的合作。冷战尚未结束,在我舒心地说他们不再是对手以前,还有大量的遗留问题要与苏联一道去解决,当然,前进的步伐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撇开探测苏联的忍耐限度不说,我们在东欧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缺乏援助资金。这会有什么影响吗?在短期内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要感谢布什总统的东欧之行,改革者们从此清楚了我们的立场以及我们对他们的目标的支持,而他们自己的生气勃勃似乎弥补了物质援助的不足。但从长期来看,情形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如果美国能向改革者们提供这种帮助——它足以向人民证明新的改革会带来实际的人们可以感觉到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那么人们就能忍受改革的痛苦而坚定地支持改革。在社会实践中,改革有时也会导致混乱和无序而不是经济的进步,因此,改革者偶尔会被那些信誓旦旦地保证恢复秩序和稳定的新共产主义者

所取代。

东欧和中欧的变革，只是刚刚开始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就在呼吸之间，这一地区已奔向了自由，而在东欧和中欧的变革中，最具典型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柏林墙的倒塌。而柏林墙的消失，立即将德国统一——尽管这一问题过去就一直存在，但一直是若明若暗的不明朗，以及欧洲的未来等问题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第七章　德国统一问题

乔治·布什

德国的重新统一对我个人而言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①。在我任副总统时曾有过西德之旅，我亲眼目睹了德国的分裂给它的人民所带来的痛苦。具体的时间大概是在1983年2月，当时芭芭拉和我在联邦德国国防部长曼弗雷德·沃勒的陪同下，访问了巴伐利亚的一个小城姆德尔鲁斯，它恰好坐落在东、西德的边界线上。对我来说，它就如柏林墙一样，象征着德国重新统一的意义。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天气寒冷，我们裹上了厚厚的外套。直升飞机将我们带到边境。就像柏林——事实上它的绰号就是“小柏林”——一样，姆德尔鲁斯被分成东西两部分：那高高的带刺的铁丝网正好从城中央穿过。身着淡褐色军装、神情严肃的边

① “重新统一”和“统一”两个概念，其侧重的涵义有所不同，一个即指两德本身，而另一个则不仅指两德本身。“重新统一”，意指聚合那些二战以前就构成德国主要领土的地区，在此意义上，这一词汇有着强调重建一个以前存在过的政治实体之意，这就提出了德国的边境问题；而“统一”一词所包含的意思则是：两个后冷战时代的德国将会创造一个新的、完整一体的新德国。因此，在两者中选择哪一个，就不仅有遣词上的不同，其间还带有这样的内涵差异：或者强调延续过去完整的德国（好的或坏的）——即截止到“第三帝国”和二战以前的历史上的德国，或者坚信现代德国是一个在政治与社会上与其“前身”完全不同的政治实体。不过在实际上，在所有国家和领导人中，即使有时人们注意其间的差异，但这两个词汇还是被随意混合使用的。我们在这两个词的本意上引用它们，在有些场合，我们用“重新统一”来意指那作为冷战一种象征的德国分裂的结束，而不是指重建以前的政治实体。不论选用哪一个词汇，它们都保有德国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尽管其间有着政治和地理上的变迁。

防军人在铁丝网的东侧巡逻。铁丝网是这样拉的:附在水泥柱上的铁丝网,正面朝东边而不是西边。这很清楚,东德政府建造这个铁丝网,其用意就是防止他们的人民到西方来,而不是防止西方人过去。东边的一侧还沿着边境布满了地雷,又挖了深深的壕沟,以此防止人民和车辆接近边境。我方的士兵指出,用双筒望远镜跟踪我们的东德边防军,从一个个高高的混凝土和钢筋的瞭望塔上,正用探照灯和反光镜照射我们。由此我意识到,他们也一定会向其人民施加恫吓和威胁。我知道他们有命令,可以射杀任何想偷越边境、投奔自由的同胞。

当我们沿着边境走过雪地时,透过铁丝网我可以看到姆德尔鲁斯在东德的那部分。虽然我被告知,那边只有部分房子住着人,但那里的传统的德国房子都被油漆成统一的颜色,很是整齐。他们把建筑的外表搞得很光鲜,以炫耀东德的富足,但这只是掩盖那半座城市穷困和衰败的虚伪装饰,那里甚至连空房子的灯也为了面子而开着。它与西边的这个充满温情、丰富多彩和欣欣向荣的农业小城相比,差别就太大了,这个小城和我在美国中部所见的很多农业小镇没什么区别。

在这次旅行之前,我对民主德国就有点厌恶。我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期间就知道,作为训练恐怖分子的营地和策划政变的大本营,东德是最令人憎恨的恐怖国家之一。在所有的间谍领域,他们是最富侵略性的,而且他们的欲壑永远也填不满。也正是为东德,苏联干出了大量的丑恶的事情。在东部华沙集团中他们是主要的元凶。

姆德尔鲁斯之行使我切身体会到国家的分裂与冷战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和伤害!而这是报纸和图片所无法传达的。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以及所有德国人,可能都通过这铁丝网,眼巴巴地望着只不过几步之遥的亲朋好友而难以相聚。综观整个德国,很多家庭像这样地被分离了几十年,大概只有在两国之间关系缓和

时,才偶尔相会过。对生活在"铁幕"下的两边的人民,这种分裂揭示了冷战的无情、冷酷和悲惨的事实。

这是芭芭拉和我第一次与曼弗雷德·沃勒见面,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和他熟悉了。在我们返程向波恩飞行不久,下起了更大的暴风雪,我们的驾驶员看不见前方,于是我们被迫在一个小的十分荒凉的简易机场上停下来。在我们想出回波恩的办法以前,我们只得在一个寒冷的候车里室等着。曼弗雷德开始设法从地面返程,我问是否有合适的火车。我晓得下面要做的事就是:他、芭芭拉和我一起开车前往火车站。

在火车站我们发现了一辆慢车正停在那儿,这是一趟每个小站都要停的火车,我们进了一节已为我们打扫干净的车厢。因为当时正处于西德大选的前夕,所以曼弗雷德以极大的竞选热情,把身子伸出寒冷的车窗外向人们挥舞着双手致意,而且每到一个车站他都这样做。令人高兴的是,我发现德国人已为我们在火车上准备了好几箱诱人的啤酒。我们回波恩的旅程轻松而愉快,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促膝谈心的好机会。从那天起,我和曼弗雷德就成了好朋友。

当后来曼弗雷德被选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时,我很高兴。他坚决支持美国参与欧洲事务,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个聪明的人。在我当政期间,就如在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上一样,在有关北约的未来等问题上,我愿意经常向他请教,我们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他不幸于 1994 年因癌症过早地去世了。在他辞世前四天,布赖恩·马尔罗尼和我,还曾一起在电话中向他问好。他的离去使我觉得失去了一位挚友、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

柏林墙的倒塌,标志了重建欧洲的极其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步的开始,这就是两德的统一。二战结束时,德国被胜利的四个盟国的军队分别占领,它们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在签署有关德

国问题的最终协议(和平协议)以前,四国的占领虽然只是暂时的状态,但因冷战升温,敌意强化,占领区演变成了两个独立的政治国家。两个德国的处境非常奇特:两者既分别被作为敌对阵营中的独立的成员国来对待,又被作为整个占领区的一部分来对待。基于这些原因,结束这种分裂是意义深远的:它将标志雅尔塔会议上分裂德国协议的寿终正寝——这一协议是盟国之间签订的,他们在那场悲惨的战争中曾一度是战友,但在和平时期却变成敌人;它将既意味着二战的结束,也意味着冷战的终结,即结束冷战时代。

对边界两侧的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分离是一个深深的民族感情问题。自从1945年以来,两个德国没有一个在处理自己的事务上拥有完全的治理权——亦即主权。事实上盟军的特权一直存在,作为一个被占领和被公然瓜分的城市,柏林的情形非常特殊,在这里外国军队并非仅是和平时代邀请来的盟友。德国,东德和西德,至少在基本的意义上,已被"畸异化了":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它被其他国家视作异己分子、被视作政治嫌疑犯、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简短的民主经历以失败而告终,集权主义复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已清算并拒绝了其历史上的军国主义而拥抱民主(在西德至少如此),并与其邻国建立了积极的和平关系。

一些西德人是把两德分离作为这样一种预防措施来予以接受的:即防止过去的军国主义倾向和灾难的重演。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似乎是遥远和不确定的,即使"西德基本法"[①] 承诺政府要寻求统一。1970年,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威利·布兰特最早提出了"Ostpolitik"(东方政策)——即与东德发展紧密的关系。这个政策默认了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特质的两个独立德国的存

① 作为一种近似宪法的根本大法,直到两德重新统一后,它才得以实施。

在,并增加了西德对东德的必要的经济援助(事实上,如事实所表明的,这一援助支撑了东德)。但很多德国人一直把最后的统一——或重新统一——看作是一种单一的德国民族的复兴,并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这些人来说,在整个夏天和秋天,那加速了柏林墙倒塌的东德人民的大逃亡,更加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这一预期,即德国的重新统一终究是可能的。

如同在各个反对党派之间一样,在西德执政的联合政府中也有分歧,这可能反映了德国国内在重新统一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虽然赫尔穆特·科尔和汉斯·迪特里奇·根舍都明白东德同时存在着政治和经济问题,而要减轻这一状况对西德的压力,东德必须立即实行改革,但他们两人在心中都各有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也许是受东德人民大逃亡局势的触动以及对一种历史性时刻的感悟,科尔宣扬东西德间更直接的、更紧密的联合以及实现最终的统一,他甚至于在 8 月份宣布:德国的再统一要“遵照国际惯例”;而在另一方面,根舍对以成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德国实体来解决分裂问题则心存疑虑,他希望两个德国间的任何紧密的联合,应该在欧洲一体化的总体格局中进行。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只是简单地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反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并且拒绝“民族的”德国,甚至还希望与一个改革的社会主义东德在未来和睦相处。

大致说来,欧洲其他国家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则持一种猜忌的、甚至是担心的态度。在欧洲政治的中心重现一个强大的德国,这一景象激起了人们对仍未定论的“德国问题”的强烈关注。最起码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邻国和以前的对手,诸如法国、英国以及与其相邻的小国,对德国都有着痛苦的记忆。即使在战争爆发 50 年后,很多人对德国发动的最后一次侵略战争仍记忆犹新。能够信任一个统一的德国吗? 对波兰来说,重新统一的德国又激活了其旧有的不安,而且是难以释怀的安全关注。在二战结束时,

大片的东德领土被划给波兰,以此补偿波兰被苏联强行霸占的土地。统一的德国会要求波兰返还这些领土吗? 归根结底它们在历史上好几个世纪里都属于德国,虽然在二战结束后,这些领土上的德国人已被赶走了。

如同欧洲一样,莫斯科的很多不安也来自于和德国的历史瓜葛,其中有些则要追溯到几百年以前了。就最近的来说,纳粹德国在战争中、在对苏联部分地区的占领中,对苏联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和破坏。对于很多苏联年长的领导人来说,那场战争的创伤依然在流血。在1941年德国入侵的最初几天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布列斯特失去一个哥哥;戈尔巴乔夫的父亲也曾参加抗战,而在战争中他失去了三位叔叔。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都一贯重视这场战争对苏联人民来说,其牺牲是多么巨大,其胜利是多么重要! 不过苏联更为急切的关注则是:德国的重新统一是否会损害其目前的安全架构的基础。

德国重新统一的战略性后果,当然会引起苏联的惊慌。虽然苏联默认了波兰、匈牙利甚至还有波罗的海的变革,但东德从苏联眼皮子底下的消失,则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东德是"华沙条约"集团的基石,失去东德,或者更坏的,东德成为北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对二战后的苏联军事战略将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对华约集团也不啻是种釜底抽薪的毁灭性打击。社会主义东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果实,也是苏联最可靠的军事盟友和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如果失去它,如果接受两德统一的事实,那也就意味着苏联承认其在东欧强权统治的结束,意味着莫斯科承认其构造的卫星国的安全网被完全撕破,而这种网是其安全战略的核心。

美国政府对德国重新统一前景的态度,显然与欧洲国家和苏联不同。虽然美国政府曾与希特勒作战,但我们的本土从未经历其军队的蹂躏之苦。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从冷战的现实角度和两个独立的德国并存的政治地理的事实而不是从一种担忧和不安

的心态来看待德国的分裂的。我们提出的“结束欧洲的分裂”，是迥异于一个或两个德国的问题的，我们很看重其间的政治意义。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很多年里对德国重新统一的希望，只作出了尊重的姿态，而实际上却缺乏任何真正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构想。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东欧变化的可能性，德国的重新统一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希望。当考虑政治自由化的可能性时，东德可能是人们想到的最后一个国家，因此，在1989年之初，德国重新统一对我们来说就像在过去40年里一样，还是一个未来的希望。

乔治·布什

在政府成立之初，我很少想到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我不是德国问题的专家，但我确实把西德看成一位诤友和伙伴。对联邦德国、对它与美国保持的长期和富有活力的关系，我怀有深深的敬意，为此我也决心要努力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

当然我深知德国的侵略历史，但我也知道这个国家已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洗刷其纳粹的丑恶历史，来补偿纳粹给犹太人和欧洲其他人民带来的可怕的灾难。我觉得德国已经脱胎换骨，而且他们就如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痛恨自己历史上的残暴岁月。我不认为所有现代德国人必须世代来偿还他们的同胞在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在1980年，德国就已经赢得了一个积极的民主国家的国际地位。

但撒切尔、密特朗以及其他一些人士担心德国的统一可能引起更多的麻烦和悲剧。我不这样看，我也不轻视这些担忧，但在德国重新统一的进程中，我要努力帮助其他领导人来理解我的看法：即这是个新德国，它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我也强烈感觉到，美国应该遵守它所作出的支持德国在适当时机统一的承诺。当然统一的过程也许是复杂和危机四伏的，但重新统一的追求是一种要由德

国人自己来决定的事。

我必须承认，至于我们是否应该促进德国的重新统一，我还没有明确地想好。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国务院认定推进是个坏主意，我肯定会接受他们的看法的，我不准备在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上固执己见。对待德国统一问题，就如在和苏联人讨论军备控制问题时一样，我比——比如国防部——更得心应手一些，这只是因为我采取了别人所缺乏的务实的态度。由于我不担心德国的统一，所以在此问题上，我也许为本届政府定下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调子。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事实上，在政府中布什总统是第一个毫不含糊地支持德国统一的，这在西方领导人中也是第一位，这一点科尔从未忘记。布什总统在德国问题上明确地作出坚定决策的那一特别时刻，我实在记不起来了。他有关德国自决的看法，是逐渐浮现的，对它我们每个人是时不时地感觉到的，或者是他在回答记者们提问时向我们流露的。由于坚决地支持德国人民的统一权力以及对德国的统一不存戒心，布什总统可能使欧洲人很难振振有词地大谈他们的忧虑以及他们毫不掩饰的反对立场；更为重要的，他的领导和他个人的外交态度，成为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而德国的统一是欧洲重建中的最大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欧洲安全和改变东方和西方战略平衡的大问题。

在布什政府成立之初，在酝酿战略决策时曾对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有过一些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在如何处理德国未来的问题上，有着尖锐的对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张我们应更加注意民主德国，应该将它置于我们欧洲战略的中心，如果我们真的想结束冷战的话，就要结束德国的分裂。国务院对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研究的结论是，至少在目前的关键时刻，介入这一问题是操之过急的。那时也没有其他国家谈论过这一问题，连两德自身也还

没有顾及到。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们的想法都出于欧洲战后的稳定与和平的考虑,为什么要用多余的德国统一话题来破坏目前的形势呢?结论是我们不要公开谈论这一话题,但可以继续说一些支持德国在自由和和平的方式下重新统一的套话。带着很大的牢骚,双方都接受了这一和稀泥似的决定。

说实话,我很怀疑推动德国重新统一是否明智,而就此问题而言,更多的是国务院的事而不是我的职责了。德国之外,尤其是在我们的欧洲盟友中,大体上没有一个国家喜欢德国统一的观念。此外,只要形势稳定,德国的分治又有何不妥?重新统一的进程可能会引发巨大的震荡,甚至导致冲突。当然在舆论上我们不可能反对这种统一,但也基于此我以为没什么理由将它放到目前的议事日程中。

到 1989 年的夏天和秋天,随着移民危机的出现和赫拉塞克的垮台,我的看法开始改变。我的主张是基于不要无事生非之上的,但如果事情已经变了,那么过去的那种态度就不能适应形势了;不过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谨慎,而且我们还应该按科尔的要求行事,因为他比我们更熟悉西德变革气氛的节奏和趋向。那极端重要、也几乎是出人意料的柏林墙的忽然开放,则预示了将会发生超过柏林墙倒塌这类大事的更重大的变革。

11 月,东德政府仍在继续努力挽救其政治与经济危机,并拼命推迟改组政府,但其种种行为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不满。埃贡·厄伦茨总理希望西德能提供金融援助,以帮助抑制移民潮的扩大,并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11 月 8 日,科尔宣布他愿意扩大经济援助,但要东德采取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而这一改革本身也是东德极为迫切地需要进行的。科尔说,没有这些改革,钱只会被浪费。11 月 11 日,厄伦茨告诉科尔,两德统一是不可能的,但他声称东德政府已准备好实行重大的改革。

但在11月13日,在"社会主义者联合党"(SED,它是东德共产党的正式名称)的全体大会上,一次匆忙的东德议会罢免了厄伦茨的总理职务(但是他仍然保留党的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头衔),而任命汉斯·莫德劳为新总理。莫德劳很快组建了一个第一次包括非共产党党派的政府。就像厄伦茨,他也设法来稳定政治局势。11月17日,他宣布了一个一揽子特别改革的计划,其中包括政治改革,但它要求保留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东德国家,他反对统一,相反的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加强两德间关系的设想:未来的两德间没有正式的和完整的国家形式,只有一种他称之为"相互共存"的形式;这种共存立基于一种条约共同体之上,而这一共同体只用来在两德政府之间传递信息。

乔治·布什

在同一天,莫德劳宣布了他的计划,赫尔穆特·科尔则向我保证,他将不会做任何动摇民主德国的事情。他与戈尔巴乔夫曾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就如六天前他对厄伦茨所说的,科尔直截了当地提醒苏联领导人,没有如同波兰和匈牙利所进行的改革,"东德的政权将会垮台"。

我说:"尽管议会跃跃欲试,美国政府依然保持平静并支持你刚才所谈到的改革。"说这番话时,参议员米切尔和众议员格普哈特的态度浮现在我脑海中[①]。"我们不会鼓励德国的统一,也不会提出任何时间表。我们也不会由美国总统对柏林墙事件的表态来突出统一的问题"。同一天,我请布赖恩·马尔罗尼将此信息传达给苏联领导人,他正准备前往莫斯科会晤戈尔巴乔夫。

我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作了交谈。她关注按计划不日将召开的讨论德国问题的欧洲共同体会议,会议是由弗朗西斯·密特朗

① 参见第五章。

倡议举行的。她显然希望此次会议能对两德统一的议论降降温。撒切尔似乎觉得，现在是打住这一话题的时候了。她说："在东德开始走出'铁幕'时，过分的欢乐和过分的热情反而不能搞清楚其潜在的意义，而德国的统一则更是问题重重。"戈尔巴乔夫应该是我们主要的关注对象，因为这一切没有他都不可能成为现实。她警告说："动摇戈尔巴乔夫，那么我们将失去在苏联推行民主的可能性。"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像撒切尔一样，我们意识到合并东德可能会加剧苏联的政治问题，并诱发保守主义的反攻和危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甚至波及他所掌握的权力。到目前为止，戈尔巴乔夫已经认可了东欧的变革，并压制了党内和军队中对东欧变革的抵触情绪。我们关心的是，他是否愿意、或能否忍受失去他们最为重要的盟友——东德。我们估计，他直接的对立反应，会是竭尽全力地反对德国重新统一，以此来保卫苏联在东欧所剩无几的安全堡垒。因此，到了11月中旬，我们关于德国问题的思考，主要着眼于它会不会影响整个东欧和苏联的改革进程。我们着意于提倡东德的自决——就如科尔正在做的那样，而不是作为一个目标来推进统一以及设计如何来实现它。我们倾向于听从科尔的安排，支持他而不说任何可能会扩大事态的话。

乔治·布什

即使有任何政策问题上的困难，我仍然想表明我的看法。在11月13日，亨利·基辛格参加了布伦特、吉姆和我在官邸举行的宴会。虽然我们聚会主要是想讨论基辛格最近的中国之行，但话题不知不觉地就转向了在柏林发生的重大事件上。我们在1月份见面时基辛格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这次却不一样，他的见解和我的相似，即对两德统一应出谋划策并加以推进。他相信德国的重新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东德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根本性的前提

条件已不复存在。

按基辛格的看法，戈尔巴乔夫一定知道东德难以再存在下去。对于德国统一，他(基辛格)指出苏联有两种可能的反应。首先是企图让两个德国都退出北约和华约。一个中立的德国可以用核武器的威胁来加以控制，而且可以利用东欧对统一德国的担心来将东欧诸国控制在华约一个阵营里。其次则可能是设法让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解体。基辛格强调，依他的判断，对于德国，美国不应成为统一的障碍。我听得很仔细，我钦佩基辛格对问题的独到看法以及他对德国的了解。

在我到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以前，作为与我们盟友协商的一部分，我曾有机会听到欧洲有关德国问题的议论。根舍在11月21日访问了华盛顿。我问他，他是否觉得东欧的迅速变化会在德国产生一种立即统一的要求。我说："我们知道从长期来看，统一必须由德国人民自己来决定，而且是基于自决的前提之上；但是如果统一的进展比我们任何人想像得都要快怎么办?"

根舍回答说："没有人能未卜先知。昨天晚上，在莱比锡有20 000人反复地高呼'一个德国'的口号，事情就是变化得这样快。当民主德国建立了民主，对整个欧洲都是有益的。"他认为民主德国所发生的事件，是建立一个更伟大欧洲的基础，他说："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将坚守我们在北约和欧洲共同体中的义务是很重要的。对德国来说，我们不想搞特殊。但自决只能在德国进行……不过这一切都要以不刺激苏联的方式来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固守现行的边界，这是在欧洲建立一个稳定框架的条件……"

11月24日我在戴维营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会晤，着眼点也是为准备马耳他会谈，不过这也是个倾听她对德国问题详尽看法的好机会。如根舍一样，撒切尔强调以促进东欧民主的方式来稳定形势；而且她特别担心，有关德国统一或者改变边界的话题只会激怒苏联。

她告诉我，“首要的目标是在全东欧实行民主。在历经磨难后，我们维护了北约的强大，也赢得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但是，推行民主要花费时日，因为民主并非仅为安排一次选举，撒切尔明智地观察到，“民主是一种政治生活的方式，只有到这一步民主才是不可逆转的”。她还指出，这种民主进步只有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才会出现。“这意味着北约和华约都要保存。北约无论如何都要存在。如果在1930年就有了北约，那么也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现在不能谈论边境问题，因为这会损害戈尔巴乔夫。回头我们再看看中欧：纵观我们这个时代，那里大量的问题都与边界有关[①]……现在应集中精力于民主”。

撒切尔主张，德国的命运比自决问题来得更为重要。边界问题，柏林的四大国统治，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都说明统一问题涉及极为复杂的内容。她还提及了波罗的海地区。她提醒我，“我们绝不能在这种时刻触动这些国家，因为它会损害戈尔巴乔夫的大部分努力……”

她从手提包中拿出一张地图，这张图她常常带在身边。她指出1937年的德国边界以及现在被划入波兰的领土，这块土地被特别标示出来。她说：“看看德国。重新统一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是输家，他将失去华沙集团的完整性。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会是一个在欧洲中部有着8 000万人口的国家，是有着巨额贸易盈余的国家。当然如果他们想统一，我们也无法阻止其目标的最终实现，但至于现在，我们应集中精力于民主。这将会解决某些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也不会引发某些滋生于现在而爆发于未来的灾难。”

从这一次以及11月17日的谈话，就可以明显看出，撒切尔对德国统一缺乏热情，还心存疑虑，这可能深深根植于英国和德国过

---

① 实际上每个东欧国家都与其邻国有着尚未解决的边界纠纷。

去那种剧烈冲突的关系。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设法保持大陆的力量平衡，以确保没有一个单一的国家能够统治欧洲。英国曾与拿破仑一世的法国作战，与德意志帝国作战，也曾在更大规模和更高的代价上与第三帝国作战；而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其政治与经济影响力遭到削弱。自从1945年以来，英国一直通过加强与西德的关系来处理德国问题，并以依赖北约以及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来抵御德国任何潜在的威胁。德国的统一对未来提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德国会重建？或者德国会再一次谋求控制欧洲？而且这种控制仅仅是在经济意义上？西德几乎是欧洲共同体的发动机，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会雄踞欧洲，而接受德国的统一，即意味着把欧洲的光荣拱手让给波恩。

乔治·布什

尽管我不赞同撒切尔对德国统一意义的忧患性的认识，不过对两德统一可能对戈尔巴乔夫造成的负面政治影响，就像撒切尔一样我确实也有点忐忑不安。但是，我想我们可以采取一种能消除她的大多数忧虑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我相信，与德国有着稳固的友谊、与苏联也有着牢靠关系的美国，能够成为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催化剂。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对两德统一的前景我不像布什总统那样乐观，而且我对撒切尔的立场始终怀有某种同感，她对某些重大的问题总有自己的见解。不过，在东欧已经发生的变革，其扩展之迅速令人始料不及，而且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应；这一变革将会为防止德国统一进展中出现的危险和动荡，提供最好的防护。

为了继续马耳他会晤前的磋商，布什总统于11月25日与荷兰首相拉德·柳伯斯，在11月30日与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

奥蒂，分别进行了交谈。他们都怀有撒切尔那样的忧虑。柳伯斯告诉布什总统："我们不应谈论国家的疆域，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问题，我们也应该避免谈论德国的统一问题。"安德烈奥蒂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刚刚会晤过戈尔巴乔夫，后者坚持《赫尔辛基正式协定》[1] 的条款应该得到遵守，这些条款特别规定，除非用和平的方式并经相互协商，否则边界不可改变。受撒切尔言论鼓舞的密特朗，显然已在 11 月 18 日的欧洲共同体会议上得到了他想要的。当时主流的气氛确实有点忧虑。

安德烈奥蒂对科尔 11 月 28 日的举动也有自己的看法。在这一天科尔发表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推进统一的方案，他公开了这个描述未来两德间关系的周密的计划。这一计划没有为统一本身设计谈判进程，但提出以改革和签订条约来推进两个德国间的关系。可以推测，此计划意在减轻移民问题(单单在 11 月份就有超过 130 000 人涌进西德)的压力，或许，也为刺激部分东德人民对统一发生更大的兴趣。

科尔的计划充满了善意和承诺。他再次提出了对东德的援助，当然其前提是东德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包括自由选举和结束"社会主义者联合党"的一党专政。像莫德劳一样，但他走得更远，科尔提出组建一个谈判委员会来解决两德间的问题；在东德自由选举以后，再建立一个联邦机构，最后形成一个全德国的联邦政府。或许是为了争取根舍的支持，他将这一进程纳入"全欧洲进步"的大系统中。他指出，趋于统一的进程是渐进的，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和两德间都是如此，但他并没有为此提出时间表。科尔新奇的方案传遍欧洲，当然也招致了愤怒的批评。这部分是因为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共同体会议刚过去十天时间，而在会上科尔还向他的朋友们保证，不会发生要求改变德国现有边界的事情。

---

① 1975 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正式协定》。

乔治·布什

可能是害怕走漏消息，或者也许是这个方案正在形成中，科尔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一位北约成员，甚至包括我们，这可能是招来批评的主要原因，他也让根舍一无所知，只是在发布的当天下午才告诉他。对此我很奇怪，但我并不担心，在两德统一问题上他不可能自行其事，而令我不安的是他可能会因此疏远他最紧密的盟友。我肯定他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前会和我们协商，因为他需要我们。科尔在波恩披露其方案的同时，也确实给我们送来了一份，而且还附上了一篇长长的电文，表达了对马耳他会晤的期望。很清楚，他想得到保证，戈尔巴乔夫和我不要在有关德国未来的问题上达成秘密协议，就像斯大林和罗斯福在二战结束前几个月里所做的那样。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很注意科尔出人意料的声明。我以为我们一直和他都是知心朋友，我们曾和他就两德统一的每一步都进行过讨论，也得到他的信任。如果他什么时候担心我们会是他的障碍而试图单独行动，这对我们没有一丁点影响。事情是否已发展到这一步，以至科尔决定他只要用中立来交换就可以获得统一？虽然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科尔的单方面行动，在我看来，这对将来的统一大业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情。

乔治·布什

在科尔发表统一演说的第二天上午，我和他通了电话。他叙述了民主德国的近况。他说，东德人民“对腐败感到震惊和失望”，因此，当人们更进一步地掌握政府腐败的内幕时，他们准备予以揭露。“在小范围里，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继续改革进程是重要的”。科尔乐观地估计，到 1990 年秋天或者 1991 年初，东德就可以进行自由选举了。“我相信事情已发展到这一步，它已是

不可逆转的了。一个理由是，如果他们不改革，他们就难以阻止人民大量地外流"。

科尔也解释了其周密计划的旨意，他将它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理智和谨慎地行动，因为在中欧和德国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我个人来说，这意味着我要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和我们的美国朋友协商。第二是（东德）人民的意愿，即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新闻传媒中的报道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在选举以后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就像波兰的情形一样，如果东德能进行真正的自由选举，他们将会成立新政府。第三点是，统一将是长期的过程。他们（民主德国）仍将留在华约集团中，而我们依然是北约的成员。安全方面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

他急切地向我保证，他意识到他的责任。他承诺不仅要与我们、也要和欧洲共同体协商。"离现在还有一个星期，在斯特拉斯堡（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我要说明我们在'经济与金融联合会'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玛吉（玛格丽特·撒切尔）站在她的立场上，认为现在该是谨慎的时候，我认为她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德国将不再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这是一个铁的法则；胸怀全局，则是我们的责任。"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这次布什总统和科尔总理的谈话有两点触动了我，一个是承诺问题，一个是滞后问题。先说前者。科尔曾反复表达他与美国、与盟友间的牢固关系，并保证他不会采取单独行动，但仅在他表态一天以后，事实上他就采取了"单独行动"了。而后者，甚至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设想了一个看来要花费好多年的统一进程，"他们仍将留在华约集团中，而我们依然是北约的成员"。当统一的进程蓬勃发展时，他肯定没有站在这一进程的前列。

乔治·布什

11 月 20 日我们在一起吃饭时，布赖恩·马尔罗尼谈了谈在他

的印象中戈尔巴乔夫对德国形势的态度。我们的谈话也是马耳他会晤前磋商的一部分。在莫斯科他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我的想法，即我不会在柏林墙问题上作什么表态。他告诉我，戈尔巴乔夫担心，科尔正设法在两德统一问题上加速“冲刺”。他觉得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是“德国人应该忘记统一”。布赖恩注意到一种他称之为俄罗斯人“痛恨德国人”的迹象。他告诉过戈尔巴乔夫，要理解科尔，他就必须理解这位总理正在向他的选民献媚。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懂，但统一是不可能的。他警告说：“人们会因为吃了未成熟的果子而死去。”戈尔巴乔夫曾说过，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实现统一，但实际上“不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德国人想让变革的进程朝向统一，他们就应该在时机尚未成熟前，不要把它摆到桌面上来。

在苏联，谢瓦尔德纳泽对科尔设想的反应，则是抱怨事态的发展正导致混乱，他警告这将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并声称波恩是幕后的“策划者”，虽然东德急切地渴望得到波恩的援助，但对科尔的计划也同样的不满。尽管科尔在其十点计划中包容了莫德劳的共同体设想，但因为它可能消解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东德，所以东柏林坚决拒绝科尔的方案，他们反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干涉其内政的行动。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科尔的十点计划表明了一种对两个德国间合作和统一的可能性的基本看法，但在我们看来，它忽视了国际和安全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它忽略了一个统一的德国与北约的关系以及边界问题。德国坚定地留在北约联盟内是重要的，这样说不只是因为将德国留在西方内对于缓和其邻国的担忧是重要的，也因为这对北约也是至关紧要的。德国是北约联盟的地理上的中心，也是联盟中第二

大经济和军事强国，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退出北约将会“摧毁”这一联盟；而在实际的层面上对美国来说，德国作为北约的成员也是重要的，没有德国以及我们在那儿的军事基地，我们在北约、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如果不是难以为继的话，也将会变得更为困难。

就德国统一的国际背景，我们一直考虑了好几个星期，然后吉姆·贝克和国务院拟定出四条原则作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要让美国认可，统一必须是：尊重自决原则，而不论德国人如何选择；必须与德国作为北约和欧洲共同体成员的角色相一致；统一必须是渐进与和平的，并且要考虑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利益；尊重《赫尔辛基正式协定》中有关现存边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但也允许和平变更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些对统一的要求是公正的，而科尔却忽略了它们，但我们就像支持统一一样，也完全支持科尔。我们的建议倡导一个缓慢、渐进的统一过程，这将会减轻英国、法国和苏联的顾虑。贝克在 11 月 29 日的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通过回答记者的提问，将我们的这一主张公布了出去；但正式向外界介绍是总统在 12 月 3 日的讲话，当时马耳他会晤刚结束，总统也正要向各界通报会晤情况。

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我自己对两德统一的态度也变得积极了。其一是民主德国情况的持续恶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要取得并维持某种稳定的机会似乎越来越渺茫了，如果两德间的某种平衡不能维持，统一就变得更诱人了，因为它确实是对付危机的惟一现实的选择。另一个因素是总统的情绪，在我们的谈话中，布什总统越来越溢于言表地支持科尔、支持统一，它表明总统已胸有成竹。

在 12 月份，公众要求东德政府忠实于自己的改革承诺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同时人们也正在争取自由选举。在 12 月 1 日，东德议会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在 12 月 3 日，政治局解散，政府

开始逮捕很多被指控为腐败和滥用权力的前政府官员；在 12 月 6 日，厄伦茨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但尽管有这些措施，动荡仍在滋长：市民们冲进政府机关，搜索档案，因为大家害怕政府会销毁它们以抹去其罪行的证据；苏联的军营也受到冲击，而这足以使苏军为保护自己而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担心，这一事态会逐步恶化甚至产生与苏军的直接冲突，再加之其他可能出现的触怒苏联的行动，可能会诱发苏军作出强烈反应，那样一场国际危机就要爆发了。12 月 9 日，在一次谴责东德共产党的大会上，讨论了采取哪些步骤来安抚这些愤怒的公众，可以预期人们支持两个独立的和享有主权的国家间结成联盟。

乔治·布什

12 月初的马耳他会晤，戈尔巴乔夫和我只简短地讨论了德国问题，我们主要就东欧变革的背景交换了彼此的看法和预期。离开马耳他后，我飞往布鲁塞尔向我们的盟友通报我们的会晤情况，我向他们保证美苏间没有共同统治世界的秘密协议，对东欧也没有作出雅尔塔式的协定。我觉得这样做很重要。

晚上我到达布鲁塞尔。在优雅的斯图温博格别墅里用过晚餐后，我终于有了与科尔谈话的机会，这也是自从去年夏天以来，我们期待已久的。美国方面有布伦特和苏努努陪同我参加会谈，而西德方面陪同科尔的则是霍斯特·特尔奇克和沃尔特·诺伊尔。

我向科尔和盘托出了我对德国统一的支持，但提醒他，戈尔巴乔夫认为他的行动令人措手不及，因此莫斯科反对他的十点计划。科尔则向我通报了德国事态的最新进展。

科尔前倾着身子，眼睛炯炯发亮。他急切地问我："我能告诉你在民主德国所发生的事吗？人人都失望了，刚成立的政府恐怕又要面临一场危机。人民要求知道给了领导人什么样的特权，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在罗斯托克，人们冲进了一座工厂，发现里面有

军队。人们想搞清楚这些军队要开往哪里。"他曾告诉戈尔巴乔夫,没有人希望东德的事变失去控制,这也是为什么他率先提出没有时间表的十点计划。戈尔巴乔夫说,他将不会阻拦自由选举,科尔自信地说:"他已经放弃了冷战意识。"

他感谢我"平静地"接受了他的计划,他宣称欧洲的一体化和北约联盟的成员身份是德国未来命运的寄托。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欧洲的一部分,也将继续是欧洲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他一直在小心地与密特朗讨论此类问题。他强调:"对我们正在西德所从事的事业,十点计划'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方案。"他的邻国所真正担心的是,发展比西欧其他国家都迅速的德国,兴许会滑向东方(其含意是:以损害西方的利益来密切与莫斯科的关系)。他认为这是很荒唐的。他承认:"坦率地说,陡然增加1 700多万问题重重的人口,6 200万欣欣向荣的德国人民是很难承受的。"

科尔预测了下一步将可能发生什么:在民主德国自由选举后,下一步将是两个独立国家组成联邦;然后,从联邦到一个单一的国家,将会在"仅仅数年,或许是五年里"实现,当然也将是在争取德国的邻国同意的情形下实现,这一进程可能会延长,但他保证德国的统一一定会实现。

我告诉科尔,对这一问题他必须找到一种不惊动戈尔巴乔夫的方式,还且还要保证西方的团结。我说:"戈尔巴乔夫的态度说不准。我不想说他会对德国统一暴跳如雷,但他肯定会不高兴。我们需要一种既能推进统一,又不惹怒戈尔巴乔夫的安排。"

科尔以肯定的口气说:"我之所以不做任何干扰平稳统一进程的事情,也出于这一考虑。《赫尔辛基正式协定》规定,边界'可以'在和平的方式下变动。我不想把戈尔巴乔夫逼到墙角,我需要与他会晤,我不想制造麻烦。报纸是如此地胡说八道!"他说,基辛格甚至在两年前就提及了两德的统一问题,不过那时是不可能的,两德间经济的差距太大了。

我认为科尔希望尽快地实现统一,但是他对此保持缄默,因为否则会危及统一大计。戈尔巴乔夫正关注着东欧以及现在在东德发生的变革,科尔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确实不想再往火上浇油;此外,他也承认,欧洲对在他们中间出现一个巨大的、统一的经济大国——德国,也甚为敏感。基于这些原因,他一直保持低调。我可能向科尔流露了我不会反对统一的意思,这在某种意义上使他受到鼓舞。我认为我从未打算要警告他不要操之过急,就如我曾告诉戈尔巴乔夫、科尔和根舍的那样,自决是关键,没有人能够反对自决。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我看来,布什总统这次与科尔的会谈标志了一个转折点。我认为我们彼此之间很好地沟通了有关统一的想法,而且气氛显然是极为坦诚的同志似的。在当场我就看出,会谈的顺利似乎使科尔信心陡增,因为布什总统支持他。后来科尔在他有关两德统一的回忆录中,提及了这次会谈,并把它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乔治·布什

第二天上午,我向盟友们通报了马耳他会晤的情况;当天下午,我发表了一个题为"欧洲未来的形势和新大西洋主义"的演说。我提醒北约其他领导人:

> 北约联盟的建立……恰为今天正在东欧发生的令人惊奇的变化奠定了基础……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去巩固这一和平进步的结果,并为继续和平的演变提供框架支持……我们的政府在5月份再一次承诺,要设法寻求结束欧洲痛苦的分裂,我们从来不赞成这一分裂,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来决定自己自由的生活方式。

我阐明了我们有关两德统一的四点原则,此外我们还提出了

这一看法：即两德的统一，还应该在“适当考虑四大占领国的法定地位和职责”这一前提下进行。我希望这将会有助于使英国、法国，当然还有苏联放心，他们的担心将会受到认真对待。我号召北约推进东欧走向更大的自由，自由是北约联盟的一个基本要素；我还指出北约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成立的，而这一组织则是我们构筑未来的基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布什总统发言后，科尔也发表了演讲。他认真地说，还没有人很好地整理出联盟中的各种看法；他还说，布什总统的讲话应该被视作联盟关于两德统一的基调，因此他建议休会。在一阵令人不安的沉寂后，意大利安德烈奥蒂总理发言。他提醒如果统一搞得太快，自决将会失去控制并招来祸害，如果明天波罗的海诸国也要求他们的主权，怎么办？科尔愤怒地反击说，如果台伯河分裂了意大利，安德烈奥蒂总理大概就不会这样看了。在此激烈交锋后，柳伯斯支持美国的态度，撒切尔说她也怀有安德烈奥蒂那样的担心，并希望更谨慎地研究德国统一问题，其他领导人大体上都支持美国的方案。

德国人兴高采烈时，撒切尔却愁眉不展。她认为一个统一的德国应该是北约的一员，但她反对这种意见：即在统一的德国作为北约成员的同时，必须“促进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对后者，大家都知道她是不喜欢的。

撒切尔后来写道：“一旦决定不需一系列的谈判（意指通过西德自身的现成成员资格），东德就可以加入欧洲共同体……这样想通过欧洲共同体组织来延缓两德统一的进程，看来希望就很小了。”她意识到她放慢统一进程的提议，是没什么市场了，她本希望四大国协定可以帮她一点忙，但她清楚，“因为美国、很快又是苏联，都开始重视讨论统一细节，不再把统一看作只不过是在吹大牛

了”,在此情形下,英国自然难以对统一的进程施加影响。但她仍不放弃,她又没法联合法国,共同努力来阻止、或者至少迟缓德国的行动。在12月8日的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上,她私下里会晤了密特朗两次,在次年1月份他俩又再一次会晤,但这两位却未能形成一个行动方案[①]。密特朗和科尔也在斯特拉斯堡私下接触过,密特朗问他的德国盟友,现在对波恩来说,德国的统一是否比欧洲的一体化更为重要?科尔则顾左右而言他。

乔治·布什

在12月16日,我在圣·马丁的卡里宾岛上会晤了密特朗,作为对他5月份作客肯尼邦克波特的回访。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原因,我们很少谈及德国问题;不过密特朗认真地强调,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应该与北约和欧洲共同体联系起来考虑。我似乎感到,与法国政府中的异议相反,他对德国的统一采取认可的态度。他要求我们以朋友的姿态来看待统一问题,“对于德国的愿望,我们应该表现出理解。对于统一问题,我们所能做的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并不想发动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但他对在德国出现的操之过急的迹象,也感到不安,因为他担心,在西方欢庆胜利之际,这些迹象可能引发一场危机。相反的,我们应该强调军备控制、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欧洲的货币统一;同时为了创造一个新欧洲,还要加强美国和欧洲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他警告说:“否则,我们将倒退到1913年,而且我们还会失去一切。我们是德国的朋友,他们不应该误解我们的建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西德已经化干戈为玉帛,并已结成亲密的伙伴,密特朗和科尔两人也是好朋友。虽然如此,德国的统

① 参见《唐宁街岁月》。1993年,哈泼·科林斯,第796页。

一仍对法国的未来提出了复杂的问题，而且这还是种捉摸不透和难以回答的问题。自从德国1871年首次统一以来，在争夺主宰欧洲大陆的事务上，法国一直是德国的主要的对手，而在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中，其结果是法国的战败；后来，德国多次侵略法国，在1940年到1944年间，德国又侵占了大片的法国领土。因此，对法国来说，一个分裂的德国并不是坏事。巴黎还曾设法通过加强和西德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法国已经成为西德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及在北约内搞好两国的关系来制约西德。一个统一的德国会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法国又意味着什么？当这个新国家有其西方的"成分"时，法国又如何来"控制"它？

同时，苏联也急于寻找到某些方法，能将有关统一的会谈引导到他们可以随时施加影响的轨道上去。11月30日，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又一个赫尔辛基条约，并提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首脑会议，要求在东欧所出现的一系列变革的宏观背景下来讨论德国的统一问题。法国和英国对此提议都表现了某种兴趣，根舍也是如此，但科尔对它反应冷淡；在美国政府内部，国务院认可这一想法，但国家安全委员会反对将德国统一问题放到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上讨论，因为这种首脑会议只在签署"欧洲常规武器协议"时召开；此外，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一票否决制，也会使统一的反对派有机会来阻拦统一。值得庆幸的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坚持他的设想。

苏联后来又打起四大盟国的主意。12月8日，他们要求在柏林召开四大国会议，这是自1971年以来的头一次。英国和法国又以积极的态度予以响应，他们几乎与苏联一样，都亟欲提醒德国人注意四个盟国所拥有的控制权。我们的态度是断然拒绝：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奉行雅尔塔式的干涉，将会破坏德国的自决，而这正是我们要设法避免的。但苏联人却在威胁：在民主德国将出现暴乱，一旦出现这一情况，他们就"有权力使用武力"。对他们可能

采取的行动，我们仔细研究过，因此，对于这次会议我们也不准备一味反对。我们同意举行一次会议，但坚持讨论必须限制在柏林四大占领国权限范围内以及不逾越现行的有关协定——统一问题不在本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之内。这样一来举行这次会议已无大碍了，于是在12月10日四国会晤了，结果没有造成什么损害。莫斯科好几次想把热门的统一话题放到四国会议上来，但是我们成功地挫败了他们每一次的企图。

12月19日，谢瓦尔德纳泽在对欧洲议会的演说中，又抛出了一个苏联的新见解。他再一次警告改变两个德国现状的后果，但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他似乎准备支持某种联邦制。他的演说中包括紧密相连的七大问题：如何来保证德国的统一将不会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和欧洲的和平构成威胁？统一的德国愿意承认欧洲的现行边界、会放弃向任何国家提出领土要求吗？统一的德国将会对欧洲联盟的整体架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还没有人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当民主德国改头换面时，联邦德国却原封不动"。统一的德国的军事立场是怎么样的？它准备采取步骤走向非军事化吗，或者为了保持中立而彻底地改变它与东欧的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吗？盟国的军队将仍留在德国的土地上吗？它如何与赫尔辛基条约规定的撤军进程相吻合？最后，德国政府准备如何来考虑欧洲其他国家的利益，即在总体上它准备如何来为所有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和问题——包括欧洲和平协定——寻找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案？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谢瓦尔德纳泽点明了莫斯科主要的担心：如果统一来临的话，必须不得损害苏联的安全。不过他也暗示了克里姆林宫可以接受的一种结局：统一的德国或者退出北约或者非军事化和中立。我们也有谢氏的某些忧虑，例如，当我们一揽子来解决有关统一的问

题时，德国要保证不动现有的边界以及要遵守与邻国协商来解决边境问题的承诺；不过，其联盟成员身份的改变以及德国中立的可能性问题，则是另一回事了。

乔治·布什

虽然当时我没有太在意谢氏的演说以及他所提出的问题，但我知道这类担心在苏联领导人中一定是个争吵不休的话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们的不安，并向他们作出解释。戈尔巴乔夫已经接受了东欧地区这样多的变革，也克服了军队和党内的保守派阻力，如果此时我们处理不当的话，也许就会使他们变卦转而反对德国的统一。

我知道，如果我们准备参予统一的进程，那么我们就要与莫斯科平等合作来对付危机，并向莫斯科表明，我们毫无疑问地理解德国的统一可能会给苏联带来大量的问题。一方面，为了促进解决有关统一的问题(也包括四大盟国的责任问题)，对苏联施加压力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这一压力又不能过头，否则会引起对抗。如果事情变得非常糟，并出现了暴力，那么就要轮到我们挺身而出了。

第八章 如履薄冰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1990年来临之际，我们心怀谨慎的乐观。回顾过去的一年，在东欧出现了振奋人心的历史性的变化，我们发现自己也面临着机遇，也许我们可以在战略平衡上实现根本性的改变。专制统治正在衰退，那潜藏于美苏关系中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种种疑虑也在改变。布什总统与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的坦诚会谈，改善了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也把所有问题都摆到了桌面上来。看来开端不错。

新年里我们的政治目标是务实的：贯彻马耳他会晤精神，准备暮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脑会晤的材料。具体地说，即继续努力于军备控制、地区问题和经济联系，其间我们还要单方面提出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要促进苏联进一步从东欧撤军，而这依赖于削减常规武器的细致的谈判，这一谈判已在维也纳进行。然后还有德国问题，我们要设法克服阻力以解决那些有关德国再统一的问题，并推进统一的进程。

这些设想受制于苏联国内政治的现实情况，因为我们把握不准机遇的大门还能敞开多久。面对如此多的需要兑现的支票和如此大量要做的工作，我们尽力延长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改革家的政治生命，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因为这些政治家们通过改革与开放推动了这些变化。我们坚信苏联人是渴望推进美苏关系的，因为外交政策的失败，只会恶化戈尔巴乔夫国内的政治困境。在戈尔巴乔夫离开或被迫离开政治舞台以前，我们应该迅速而小

心地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的形势。我们感到我们正打开计时器，但我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1990年可能又是困难的一年。问题在堆积，其间包括对政治体制的挑战、对计划经济能否适应其所面临的根本改革的疑虑。除了东欧和德国的变化，苏联内部的民族主义恶化了其安全问题，并危及了其政治稳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正自顾不暇，波罗的海诸国则正在努力脱离苏联。这一情形也出现于在经济上有重要地位的乌克兰，这里有罢工，分离主义者闹腾得也很厉害。这些激变可能是戈尔巴乔夫的祸根，因为苏联人似乎开始把他看成在处理这些动乱时一位无能和优柔寡断的人；同时，他在使用武力上的迟疑，使得很多少数民族主义者，把他视作达到其独立目的的最大希望。

由于内部的骚动，最令我们关注的国家、在未来数月里也将极大影响美苏关系的国家，就是波罗的海诸国。他们表现出的民族自决的渴望，我们是支持的，这一渴望也盛行于东欧和德国的每个角落。

波罗的海诸国对我们来说也有个情感上的问题。他们和苏联任何其他共和国，或者与任何一个东欧国家都不相同。尽管他们在1940年被并入苏联（对此我们从未承认），我们仍允许他们在华盛顿保持外交使节以代表其过去的国家。我们国内的波罗的海血统的美国人情绪激昂，他们对美国政府和议会施加了精心策划和大肆张扬的政治压力，要求我们采取行动来支持其祖国的独立。我们以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已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达成了一种非正式的谅解，而布什总统已表明了我们所能容忍的界线；戈尔巴乔夫也似乎明白，他尽最大努力来克制而不诉诸武力是十分重要的。

1989年夏天到冬天这段时间，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一直在

挑战苏联的权威。12 月,立陶宛的共产党从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分离出来;次年 1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大肆宣扬地去了一趟维尔纽斯,试图说服立陶宛政府和人民,抛弃分裂路线。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立陶宛。在众多的国际电视摄像机面前,他勇敢而惹人注目地走进怒目相视的人群中,呼吁团结。在他的这个最显眼的外交努力中,他竭尽全力,但这位世界级人物戈尔巴乔夫,这位敢做敢为的改革家和领袖,也只得垂头丧气。当他两手空空的刚回到莫斯科,其他地方又冒出了新麻烦:在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库,爆发了反亚美尼亚的骚乱,由此滋生的暴力席卷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在几天之内,30 多人死亡,到 1 月 14 日,两个国家都在调动军队。莫斯科调来了内务部队,但他们也无能为力。1 月 20 日,戈尔巴乔夫将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派往阿塞拜疆。亚佐夫命令维护秩序部队开进巴库,隔开敌对双方并控制这座城市,由此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有些记者报道死亡了好几百人。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作为一种原则,如同我们对待德国的再统一一样,我们坚决支持民族自决。不过在实践中,我们也意识到民族主义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使戈尔巴乔夫的处境不妙。在这一问题上,党内那些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并不是那种我们愿意看到的取代他的人。尽管戈尔巴乔夫有着自己政治前途问题,谢瓦尔德纳泽仍反复重申,如果苏联使用武力,那将意味着改革的毁灭。但我们都认为,其间的某些因素会促使戈尔巴乔夫出兵,即使仅仅是用来挽救他的政治命运。如果这意味着改革的终结,我们将丧失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重要优势。

乔治·布什

在支持民族自决理论和动荡的现实之间,我左右为难。如果我们鼓动变革,我们的宣传可能会导致一场军事干预的后果,并使

得苏联各地的自由化进程受挫而不是高歌猛进，而且对于我们所推动的事情，我们也无法使它停下来。我试图声明要求在对话和改革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但是我的谨慎引起了批评。我引发了新闻界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从美国的波罗的海社团领导人到某些“专家”都批评我过于迁就，并轻率地认可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表面上的改革。我真正地意识到了危险，但我在马耳他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感受，还有贝克与谢瓦尔德纳泽的良好关系使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在努力实践其诺言上是诚实的。

我期望继续马耳他的会谈，军备控制是特别重要的。这一问题也将是戈尔巴乔夫和我的首脑会晤的中心议题。我已同意会晤在6月底以前进行。在12月和来年的1月，我又开始在政府内要求更大胆地削减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方案。讨论要花的时间不少，而军备控制谈判小组中日益滋长的悲观情绪也令我不安，对于能否在首脑会晤前及时地完成“削减战略武器会谈”方案，他们没有把握，对于东欧发生的变化，我还担心议会可能会立法草率地削减常规武器，其幅度我认为是不明智地过大。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布什总统已清楚地表明，他要在会谈过程中采取主动，他要控制事态而不是被事态所控制。他的举止吻合他在公众中的谨慎形象。有传闻说，苏联人正打算提出新的更大规模地削减常规武器的方案，而布什总统也将于1月31日在联邦政府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一个新主张。总统要求我安排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

1月14日在议员会议室举行了第一次讨论。在“削减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我说明：我们是否还维持到现在已三年的上届政府的方案，并设法使其尽快地签署，或者根据近来的形势发展来修改它。另起炉灶会延缓协议的签署，并潜在地在国防预算上会影响我们的总体战略规划，而且苏联人也许会变得不耐烦而坏了我

们的大事。贝克、切尼和我，各有不同的看法。切尼强调，苏联人不会有什么改变。他说："我们应着手于已摆在桌面上和已启动的方案。很清楚，国家关系及其所包括的政治利益，有益于达成协议。"在没有添加新的修正的情况下，解决遗留问题时我们会有很大的麻烦。"让我们解决这些麻烦并达成协议，而将其余的留在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会谈时再处理。"我提出，有许多原因要修改"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会谈"方案，比如预算就制约了我们的眼下的计划，再如苏联人正推出新制度的事实。苏联人会很快发现议会正企图削减我们的国防预算，而我们又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加以阻止。贝克同意切尼的看法。他说："我们走得太远，以至现在已难以重开'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会谈'。我们应该尽早举行这一会谈。政治形势比战略(问题)更重要。"鲍威尔支持迪克和吉姆。

布什总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在以后的6个月里达成一个条约这样悲观。他问："是什么阻止了我们？苏联人已打开了大门，让我们和他们谈。世界在变化、显著地在变化，而议会正准备利用这些来搞垮我们，对此我真担心。眼下正是从苏联那儿争取点什么的大好机会。"

讨论转向了常规武器。这里的问题也类似，并且和欧洲的变化相关连。我问："我们是随波逐流，还是以大家的名义提出一个特别的建议？"我提议我们和盟友商量一下，并要求通过谈判美苏双方各自裁军200 000人。这也要抢在议会之前，以使我们能保持一支我们期望的有相当规模的军队。我说："然后我们可以到苏联人那儿，只要提出一个裁减20万军队的协议就行了，其他的就不用再费心了。"

但总统和我再一次居于少数。贝克的看法是"不要得陇望蜀"，只要坚守住我们得到的就行了，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中，我们可以平静地和盟国领导人商量裁军20万的底线。很明显，布什

总统力求的是一次成功的会谈，并且不想惹起新麻烦，因为那会延缓协议的签订。

切尼提醒我们，盟友间对美国裁军所引起的不稳定的担忧，他不得不去安抚。他说："东欧人、苏联人、西欧人都寄希望我们（在那里驻扎军队），除了议会，那里的人民都盼望我们不要走。"他还补充说，情报界称，华沙集团现在已是中看不中用了，它已不再具有任何攻击能力了。迪克就此提醒说："这只会在国会中给我们增添一个更大的障碍。"

对于我们迟迟不动手修正我们过去的方案，布什总统越来越不快。他质问："这是不是个好消息？我们为讨论275 000士兵的问题坐在这里，而对苏联的行动却无动于衷。世界正在变化，我们也应与之保持同步……我们为什么总是需要那固定数目的军队和炸弹？我们应该试探苏联人，要求他们做一些我们认为他们从不会做的（对应削减）的事，否则我们将错过机会，而由议会决定我们单方面的削减，这样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我们不能只对变化发发牢骚，而要勇敢地采取行动。我们面临着采取行动以取得重大突破的一次巨大机会。"

1月16日又恢复了讨论。争论双方的阵营仍纹丝不动，而且争论得更趋激烈，布什总统更加坐立不安。为什么他不能得到一个新的裁军方案？他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在设法加强我们安全的同时，来扩大我们的政治利益。"为什么裁减20万人的问题变得如此复杂？"切尼阐明了他对军备控制的态度："军备控制妨碍了裁减军备。苏联人遇上了大麻烦；而同时，对我们来说从欧洲撤军也很困难。为什么要谈判进一步裁军？这只会使每个盟国产生疑问。"他还强调，"军备控制不能和政治进程挂钩。"对此，赫里斯也表示赞同[①]。这一下可激怒了总统，他对此尖锐地回应说：

① 罗伯特·赫里斯是空军司令，并兼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这正是我想设法去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当贝克重申这一方案将会使我们和盟国的关系复杂化时，我再次发言说："为什么不设法来修改这一方案中的不妥的地方呢?"当会议几乎搁浅时，布什总统问，如果我们不知道盟国的想法，我们是否能形成一个方案。我提议向我们的盟国通报进一步裁减的设想。如果我们不能形成共识，就不急于推出这一方案。"给了盟国选择的机会，我们就在议会和盟国面前赢得了主动。"

到了 1 月 22 日，我们的讨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此期间，我曾请吉姆·伍尔塞[1] 和他的德国朋友谈一次，以弄清楚德国人对增加裁减的反应。伍尔塞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还补充说，东欧人盼望华沙集团作更大的裁减，其意在使苏军撤出那一地区。这也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他们担心这样大规模的削减，会被苏联作为一个借口来拒绝裁军。刚从欧洲回来的鲍威尔认为，德国人会支持进一步的裁军，虽然这可能还要布什总统给科尔打个电话做做工作，但英国会反对，而法国则很难说，对于在德国没有苏联和美国军队，欧洲人(东欧和西欧)很紧张，但他说，所有人都希望驻军的规模大大低于目前的水平。

这是布什总统一直期待的消息。切尼沉思地说："这朝布伦特的方案迈进了一大步。"他强调，"我觉得事情的进展改变了我的看法。"他同意我们应设法使苏联军队撤出东欧，但他担心"连锁反应"，即要求美国和苏联同等地减少驻东欧的军队，而且一方的削减必然要求另一方作出同样的裁减，这也可称作"平行主义"或"对等"。我们要打破这一怪圈，不仅是因为我们希望在中欧保持美军(文中的"欧洲中部地区"，意指德国)却同时使苏军撤出，而且更因为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还有我们的驻军，但我们不希望这部分军队被计算在总的兵力中。切尼承认，不论确定何种裁减规模，他

[1] 吉姆·伍尔塞是我们在维也纳的"欧洲常规武器谈判"的代表。

和鲍威尔的设想与议会的主张会有差异。他补充说："如果盟友们觉得方案可行，我们就难以非难这一方案。"我们还研究了如何来打破苏联和美国裁军规模的连锁反应问题，以及在总体上我们应确定维持多少部队。专题小组最后确定了中部地区的数额是195 000人，这不包括我们在西欧其他地区的另外30 000名驻军。这将会使苏军保持在195 000—225 000名之间。

这一决定以及制订这一决定的过程，典型地表现了布什政府在处理国家安全方面的风格。在一位参与争论并设法引起大家各抒己见的总统率领下，人人坚定而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此气氛下，大家都怀着一种同志式的情谊，而这种情谊使争论不致过火。当布什总统作出决断后，争论立即停止，转而着力于执行。

布什总统的意思，下一步是要派出一些人，把我们的想法向撒切尔、科尔和密特朗通报。因为他想在1月31日的国情咨文中纳入新的"欧洲常规武器谈判"方案，因此我们来不及和盟友们进行必要的磋商。伊格尔伯格和盖茨以前曾有过此类穿梭外交的经历，所以布什请这两位"孪生兄弟"再跑一趟。布什总统要求他的外交幕僚为他们做好准备。

乔治·布什

1月26日，我打电话给赫尔穆特·科尔。他觉得我们的方案不错，但认为撒切尔对此方案会有所保留；不过，如果进行充分地协商，密特朗大概会予以支持。他开玩笑地说："你知道我一贯的态度：吻联邦德国的国旗一次，但要吻法国的三色旗三次。"次日早晨，我和密特朗通了话，他饶有兴趣地、但很谨慎地谈了他的看法。他简单地说："这一主张（撤军）应不受德国中立化的干扰。德国的中立化是苏联的目标。"

我回答说："是的，当然是这样。"我问他是否现在比我们上次谈话时更担心德国的中立。密特朗谨慎地回答说："我认为有一种

德国人盼望的重新统一的趋势，而且东德人也不再坚决反对统一。到年末，如果我们选出代表两德的议员，而他们又以重新统一作为其纲领，那时德国就会出现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追求摆脱一切外国军队和核武器。这是惟一的危机，而且是场较大的危机。但我认为它可以被遏制。我以为你的率先裁军至 195 000 的决定，如果再以一次演说来阐述它，就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们不能允许德国的中立化。"

当我和撒切尔通话时，她直奔主题。这表明她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她问："你所谈的只是在欧洲的驻军规模吗？如果这样，苏联人会充分地完成他们从东欧撤军的义务吗？他们会把这些军队布置在乌拉尔山以东还是以西的位置？"她长期以来一直担心苏联人从东欧撤军，但将这些军队布置在乌拉尔山脉西侧，并保持高度的机动性。我解释说，我们正谈论的是解散而不仅仅是换防。她似乎对其可能性感兴趣。她评论说："在东欧更少的驻军，可能会更有利于苏联人保护自己。"

撒切尔将我们的"欧洲常规武器谈判"方案、将她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和德国的中立诸问题的看法，统统纳入其对北约组织主要战略的通盘考虑中。她说："令我担心的是，局势的发展好像使我们处于被动，这从北约不断妥协的点滴迹象就可看出；而这种退却却不是基于我们同意的某个新的政治协议之上的，特别是它没有考虑到德国重新统一的政治条件。我在一则电报中曾指出过，科尔希望在 1994 年完成统一，我们应该对中欧的情形、对德国的统一及其对北约战略的影响作出一个政治决议，而不只是作出个别的撤军决定。"

她说明，她正和她的外交和国防参谋们讨论这一政治局势及其对北约的影响。她说："因驻军问题的重要性，故我们在北约中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也因此反对德国的核态度……只有我们两个国家能默契地形成共识，故我确实不愿意在'我们之间'未达成

基本一致以前，即没有顾及我们全方位的防务战略以前，采取遭人谴责的行动。"已约定好了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在当天与我们在华盛顿见面。她告诉我，赫德将会转述她的想法。

我同意她的意见，但提醒她，自从我们组成早先的"欧洲常规武器会谈"的谈判班子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形势，而且我相信这意味着减少军队的规模；我们只将军队裁减到可以获得议会容忍并将得到欧洲盟友支持的程度。我说："（在议会中）有大量的反对派，他们有着古怪的念头，他们中很多人不愿我们在欧洲保持任何军队。我所建议的裁军规模将会减少苏联人的威胁，降低我们的防务开支，而且不会导致联盟的崩溃，而这一点是你所极为担心的。"她同意会见伊格尔伯格和盖茨来讨论这一问题。

很清楚撒切尔一直担心德国再统一会出现对我们不利的情况，像密特朗一样，她也担心德国会"趋于中立"并不允许在他们的国土上布置核武器。她肯定，当联盟赞成在德国布置中程核导弹时，一定会出现席卷德国的反核抗议浪潮。她需要更多的解释。在我看来，统一大势已很明朗，我们只能迎合这一趋势。到1月底，由于东德政府已难以再控制局势，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我接受了德国的统一，并欢迎这种统一，而且，我相信科尔不会领导德国走向一条反常的脱离联盟的道路。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认为撒切尔的思想受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首先，战略格局在总体上并不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因此，我们没必要来修正原有的、并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国防政策；其次则是其思想中对未来的战略预测。当我们面对的一切都彼此相关时，她不认为我们应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诸如德国统一和"欧洲常规武器谈判"之类的问题，她认为在对当前局势的个别原因作出判断以前，我们应该一起坐下来制定一个总体性战略。她的主张有很多可取之处。为

了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了和英国的双边关系，我们总是通盘考虑一种战略的各种因素，不过要在联盟内的多边关系中这样做则是很困难的。撒切尔有关我们两国一起制定出一个战略协定的意见，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加强美英特殊关系的动议，不过在当时，我不认为这是必要的。当美英关系更为开放、更为紧密和富有成效之际，我相信这种现象在过去也不是一直常有的。

至于说统一是不可逆转的、或者说统一会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实现，对此我不像布什总统那样乐观。下面这种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苏联人宣布，德国的统一是不能容忍的，并反对这种统一，而且必要的话，将以武力来反对；要不，他们会不费劲地为此统一附加条件，而这又使这种统一变得令我们难以接受；此外，也还有大量的其他实际工作要去做，还要去解决四大战胜国的遗留法律权利和义务问题。在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后，我们也必须去关注欧洲的政治秩序和安全问题。我们面临着一大堆复杂的外交难题。

在1月28日，我们派出了伊格尔伯格和盖茨，他俩踏上了穿梭外交的行程。伦敦是第一站，也是最困难的一站。撒切尔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他俩，请他俩"坐在他们熟悉的椅子上"。经过长长的、探索性的会谈后，终于云开雾散。虽然她有些不高兴，但她愿意认可我们想做的事。在会谈期间，撒切尔对美国在欧洲的进展，表现了令人叹服的了如指掌。当这位坚定的盟友真诚地送别两位使者时，她说，欢迎他俩随时再来，"但不要再为了这个问题来"。其他几站是平静的。最后这支游说队伍带回了盟友们的一致支持。

乔治·布什

因为有盟友们的支持，我在1月31日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知他我们的方案，而我也将在当晚联邦政府的会议上宣布这一方案。我再一次告诉他，美国只意在欧洲保持一支精干的军事力

量,并重复了我在马耳他会谈时的观点。我说:"我希望你明白,美军的存在对欧洲的稳定大有益处,而且也是我们对欧洲的一种重要的贡献。关键的是我们要达成欧洲'常规武器谈判'协议。我不希望这一新方案在任何意义上延迟我们的谈判。但我的专家们认为要满足这种变化是不可能的,而要达成一种与现今的形势了无瓜葛的协议,也是不可能的。"

戈尔巴乔夫说,他对我的主张怀有同感。他沉吟地说:"就我的理解,你的建议展望了一种新的、更低的驻军规模。你刚强调了在完成谈判后,美国仍将在欧洲保持军事存在,如果我没有误解你的意思的话,就是不问苏联会做些什么。"我肯定正是这样。

戈尔巴乔夫说:"对此我们要想一想。但我要说,我们有必要来谈谈欧洲中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谈谈美国和苏联的军队,也要谈谈其他国家的军队问题。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要做的事很多,你和我也需要谈谈。你可能希望我们合作、我们之间积极的合作,而且你也能够断定我的反应意味着我很高兴我们保持接触——为了关注当今最重要的种种问题。我也十分希望你能从我这儿得到更详尽的答复,或者当贝克在莫斯科时能得到这一答复。"吉姆定于2月初赴莫斯科。

2月和3月在莫斯科出现了新的动荡,苏联的政治架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出现了市政委员会和议会的选举。2月4日,莫斯科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民主的游行,有300 000多万人参加。第二天,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为了迎合多党制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向共产党发起了挑战,要求它放弃在国内实行的一党统治。他呼吁更多的经济改革,缩小中央委员会的规模,形成一种新的、西方化的总统制。实际上,他是在要求共产党放弃其绝对的统治。2月7日,为了和谢瓦尔德纳泽会谈,贝克刚巧到了莫斯科。在经过激烈

和势不两立的争论后,共产党同意放权。2月12日,最高苏维埃常务会议要求举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特别会议,目的在增加总统的权力。两个星期以后,又在莫斯科爆发了一场支持民主的示威游行,参加者多达100 000人,有报告称军队和克格勃的队伍包围了这座城市。2月27日,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给戈尔巴乔夫想要的更多的总统权力。最高人民代表大会在3月13日批准了这项法案,也正式废弃了苏联宪法第6款,正是这一款神圣化了共产党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

苏联共产党不仅在中央失势,在3月19日的地方选举中,也遇到重创。在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人民阵线"以压倒优势获胜;在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候选人也以失败而告终。竞选俄罗斯议员的叶利钦,在莫斯科获得胜利。民族主义在高歌猛进,戈尔巴乔夫的危险征兆日渐显露。选举鼓舞了分裂运动,特别是在波罗的海诸国,反对派候选人干得异常出色。

乔治·布什

3月7日,吉姆·贝克拿来了一份杰克·马特洛克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内容是与谢瓦尔德纳泽的会谈,他同时转交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谢瓦尔德纳泽认为,立陶宛的形势现在"很危险",而各共和国的形势全面恶化,他警告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谢瓦尔德纳泽很担心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处境,因此要求我们予以理解。我也很不安,非常的不安。我们难以站在反对立陶宛独立的立场上;而另一方面,一旦它宣布独立,我们再承诺予以支持,这可能会导致戈尔巴乔夫下台,或者致使苏联军队使用武力。如果那儿发生暴力,美国实际上只能旁观而难以有所作为。这样,我们就会因鼓励立陶宛的得寸进尺而使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这将会是一幅悲惨的画面。

谢瓦尔德纳泽的预言很灵验。在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重建立陶宛共和国，并选举维托塔斯·兰兹伯格斯为总统。戈尔巴乔夫斥责这一宣布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并威胁要中止所有谈判。他发誓要维护苏联的政治与领土的完整，并警告要以军队施压；人民代表大会支持他的立场，坚决不承认立陶宛的独立。因此3月16日，即在议会选举兰兹伯格斯为总统的次日，戈尔巴乔夫向兰兹伯格斯发出废除3月11日独立声明的最后通牒，他有意炫耀武力来威胁立陶宛人，苏联空军奉命进入“戒备状态”，并在立陶宛首都的房屋顶上低空盘旋，散发传单。

乔治·布什

这些压力威胁了迄今为止在立陶宛进行的和平变革，而且我担心它们还将成为镇压的前兆，这不仅会损害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也将危及美国和欧洲的总体关系。虽然我不愿意看到军事干预，但为了以防万一我必须决定要作出的回应，我请国家安全委员会列出我们可以施行的措施。我们确实谈及了取消官方的往来和首脑会晤（或者至少推迟），但我们希望事情不要发展到这一步。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来自议会、新闻界和波罗的海血统的美国人要求承认立陶宛独立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我们的好友、非常理智的南西·凯斯鲍姆参议员，也打电话来要求我们采取某种承认的行动。另一方面则是议会极其莽撞地兴风作浪，其间最著名的例子是阿尔·达马托参议员，挑衅性地进行了一次立陶宛边境之旅。3月21日，议会要求承认立陶宛的呼声达到了高潮，当时由杰西·赫尔姆斯提出的呼吁承认立陶宛独立的议案，发到了参议员们的手里。幸运的是，群情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激昂，而且那项动议也以59对36票未获通过。

没有人比我们更渴望看到波罗的海诸国的独立。我们是可以

赶时髦,承认兰兹伯格斯的新政府,并要求苏联承认立陶宛的独立。这会造成良好的印象,也会平息愤怒的批评。不时有大量的批评指责说,我们之所以不承认新的立陶宛政府,是因为较之对波罗的海诸国的独立,我们更在意于支持戈尔巴乔夫。这一指责忽视了这一敏感局势中的核心因素,事实是波罗的海诸国只有取得克里姆林宫的认可才会获得永久的独立。我们的任务是促使莫斯科走到这一步,与莫斯科冲突和威胁莫斯科,其实是下下策,不仅我们会因此而一无所获,波罗的海诸国也难以获得独立,甚至苏联的改革将夭折,德国的统一也可能随之流产。当布什总统再三权衡,如果苏联人在我们承认立陶宛新政府后派出坦克我们该怎么办时,我明白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这要艰难地忍受那些"自以为是"者的指斥。

戈尔巴乔夫3月19日最后通牒的期限过去了,但它并没有解决这场危机。第二天,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赶赴纳米比亚的温得和克,参加这个国家的独立庆典。在此期间的一次会晤中,谢瓦尔德纳泽向贝克保证,苏联将不会使用武力,而只会采用对话的方式。他坚信立陶宛已经深陷独立的狂热中,而忽视其严重的后果,因为波罗的海诸国依赖于联盟中其他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 。他告诉贝克,"他们从我们这儿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此,他们不能拍拍屁股就走人"。贝克提醒他,如果苏联人采取高压行动,将会严重危及美苏关系。谢瓦尔德纳泽回答说,戈尔巴乔夫承受着来自军方要求镇压的压力。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就在同一天,我在办公室会见了苏联大使杜比宁,向他转达了大量相同的信息。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我们的自主策略就会变得不怎么管用了。对立陶宛难以控制的突发事件,要想仅仅以宣

传攻势来预防，看来是远远不够了。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阿德米内尔·威廉·克罗，在3月份分别去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告诉肯尼迪，立陶宛决定为独立而进行全民公决，是“一种宫廷政变”行为。当肯尼迪问他是否拒绝使用武力时，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如果暴乱危及他人的安全，则另当别论。克罗分别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马歇尔·瑟盖·阿克罗米耶夫，马特洛克发电报汇报了他的会谈情况。当他遇到老朋友马歇尔时，他觉得马歇尔被周围的变化所困扰。电报称：

> 立陶宛人说他们有权做他们想做的事，但苏联领导人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出去。他强调，立陶宛人民难以接受戈尔巴乔夫所答应的给予立陶宛人主权的允诺。他说，政府希望避免此类行动，而代之以使用各种法律和各种花费时间的立法程序来延缓这一过程。

克罗说他的感受是，阿克罗米耶夫一直在急于作出决定，而且变得疲倦和失望。阿克罗米耶夫告诉克罗，他一直在支持戈尔巴乔夫，因为他赞赏戈尔巴乔夫所从事的事业。但尽管如此，阿克罗米耶夫强调，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国内的分裂迹象。他说这个国家对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还没有作预防准备，因为这儿有种种局限。有关苏联共产党的情况，阿克罗米耶夫对它的黯淡的未来谈了很多，并指明这是种“自我毁灭”，他说这无数次使他心碎；他表达了这种看法：让党重新走向团结是可能的，但他肯定过去的苏联共产党已经结束了。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贝克和克罗的议论突出地显示了戈尔巴乔夫周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的改革盟友与朋友谢瓦尔德纳泽坚决主张立陶宛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来处理(虽然他对立陶宛人的独立不屑一顾);阿克罗米耶夫,苏联军方的主要领导人,也同样主张不可能允许波罗的海诸国脱离苏联,面对发生的事变,马歇尔所表现出的焦急和担忧之情,在军方和党内"正统的"的领导人中,确实不在少数。这显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力量在增强。

乔治·布什

3月28日,根据当天与戈尔巴乔夫进行的一次电话交谈,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于政治压力是如何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提出了某些独到的见解。她对戈尔巴乔夫未谈及和平解决立陶宛问题,深感忧虑。事实上,当她促使戈尔巴乔夫不要使用武力时,戈尔巴乔夫一直在闪烁其词。她想戈尔巴乔夫可能过分夸张了立陶宛的形势,在她看来情形又并非如此严重。撒切尔说,戈尔巴乔夫一直处于孤独、忧郁、悲观之中,她觉得他受到了围攻。戈尔巴乔夫强调他正试图将国家引入"法治"的轨道,并设法通过宪法而不是立陶宛领导人那种单方面的行动来进行这些变革。撒切尔认为这一点很明显,但她觉得戈尔巴乔夫难以和立陶宛人合作,也难以获得他们的理解,这使他的选择余地变得很小。因此,在他与立陶宛领导人在新成立的"联邦议会"接触后,他可能不得不采取行动。

在和布伦特、苏努努和吉姆·贝克碰头后,大家决定我应给戈尔巴乔夫和兰兹伯格斯同时发出信息。我在3月21日已经给戈尔巴乔夫寄出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在"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中,添加一个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的条款。但信中未涉及立陶宛问题。在这封新写的信中,我则设法私下跟他说一些在公开场合我不能说的话,因为那样会对他不利,也可能会捆住他的手脚。信中写道:

当我告诉你，美国无意于利用立陶宛问题来谋求任何利益时，请你相信我。当然正如你所了解的，美国从未承认波罗的海诸国被并入苏联，因此我们支持他们的自决，但我们一直非常小心，在我们的公开声明中尽量避免激化局势，也没有批评苏联政府……

你们的高压态度在这里引起了日益高涨的批评，包括议会、新闻界，甚至我自己小圈子里的成员，人人都真诚地——就和我一样——同情立陶宛的独立要求。这种批评实际上减小了我的回旋余地。

你告诉撒切尔首相，你的选择余地在缩小。就你的情形而言，我对和平的结局日渐失去了信心。总统先生，怀着由衷的敬意和真诚的友情，我要说，任何不是基于和平会谈的结果，对你已取得的和希望取得的，都将带来真正的危险；这不仅是指对我们的关系，对于你们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同样如此。你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两人都曾对吉姆·贝克和我说过，使用武力将会使改革严重受挫。我以为使用高压政策对你的努力也会产生相似的负面影响。改革是不可分割的，使用武力和恐吓的必然结果是，在立陶宛实行强制军管，这显然与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相违背。

思前想后，难道避免冲突、最后通牒和种种高压威胁，而使之转向一种能进行理智对话的气氛就不可能吗？吉姆·贝克在和谢瓦尔德纳泽的会谈时，谢瓦尔德纳泽似乎接受了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兰兹伯格斯博士现已公开声明，他要准备一次全民公决。这是否提供了一种达成共识的基础？……我们想帮助化解目前的危机。通过谈判会既满足你们的利益，又照顾

到立陶宛人民的意愿，双方皆大欢喜。我也非正式和间接地要求兰兹伯格斯博士不要采取、发布可能导致冲突的行动和言论。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对是否送一封信给兰兹伯格斯发生了争论。如果走露风声，它将会显示布什总统正试图干涉立陶宛事务。因为问题如此敏感，我们不想通过立陶宛在华盛顿的代表来转交一封书面信件，而是请参议员迪克·路加带去这封信。路加是一位老外交官，也是一位"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3 月 31 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如果立陶宛人放弃其独立要求，就开始和他们谈判。兰兹伯格斯断然拒绝，即使议会宣布它愿意进行谈判，兰兹伯格斯也不理睬。

4 月与谢瓦尔德纳泽在华盛顿的会晤，使我们有机会就此局势与苏联外长进行商讨。我们的讨论不顺利。在椭圆形办公室以及在与贝克的会谈中，谢瓦尔德纳泽都持消极态度。贝克觉得与 2 月在莫斯科的会晤比较，其差异几如白天和黑夜一样显著，当时苏联代表团同意了一系列的军备控制方案。这表明，在此期间军方在军备控制问题上施加了压力。因为谢瓦尔德纳泽的谈判队伍已经从其 2 月认可的立场上后退，谢瓦尔德纳泽几乎道歉地说，他们因为作出了太多的让步而受到攻击，"所以请注意我们的一些立场也反映了我们对自己所面临的政治压力的一种感悟"。至于立陶宛，贝克汇报说，主要的难题似乎是兰兹伯格斯拒绝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会晤的要求。此外，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在 3 月 11 日，未经全民公决或投票所作出的"突然袭击"似的行动，使谢瓦尔德纳泽很气愤。贝克问苏联是否可能接受"暂时搁置"独立问题的建议，谢瓦尔德纳泽不愿讨论这一问题。

谢瓦尔德纳泽转交了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总统3月21日讨论军备控制问题信件的回函。就此问题，一些日子后，布什总统发出了一封更带私人感情的信。戈尔巴乔夫坚信，在军备控制上我们能够确立我们的远大目标，并有希望实现它们。戈氏在信中写道：

> 为了更有效地推进这一方式，我们必须特别着意于我们的对话气氛，相互自觉地避免不必要的复杂和人为的问题。我欣赏你对美苏对话进展的现实态度，你对对方愿望的理解，对对方利益和问题的关心。这就是我对你1990年3月29日给我的私人信件的看法。我愿重申，我们期望基于民主和改革（它根本地左右了苏联社会）之上的历史进程继续下去。我们希望经过积极和认真的对话，建立一个真正法制的国家。不用说这一切预想都要求宪法秩序和保护我们国家所有公民的权利和安全。

虽然在使用武力问题上有点含糊其词，但这是一个积极的回应。

乔治·布什

4月6日，我和谢瓦尔德纳泽在白宫举行了会谈。在交谈中，他着重地解释了其政府的某些困难。他试图将部分责任归咎于法律条文上。他说："问题是我们的国家结构所拥有的根本原则与你们的不同。我们是一个有着15个主权国家的联盟。"法制进程落后于政治上的一体化，虽然苏联宪法禁止共和国有脱离联盟的权力，但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来对付这种分裂。对于立陶宛的独立行动，我们以前的法律严重滞后。他说："我说过，我愿重申我们的主要武器是对话。对任何加盟国家这都是真诚的，尤其是对我们的人民更是如此。改革与民主，自决的权力，这些都是我们追求的

一部分。和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领导人的对话，必须是公开的、坦诚的和坦率的。”新当选总统戈尔巴乔夫，正着手处理这些问题。戈尔巴乔夫希望他转告我，“他将坚持他所阐明的那些原则”。我告诉谢瓦尔德纳泽，对话是惟一的选择，而且我们特别地同情立陶宛人民，虽然我们没有承认立陶宛的独立，但我们必须支持他们的民族自决。

我愿意相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里没有暴力，但这又很难解释我们所目睹的冲突。是谁下令射击的？后来我设法让谢瓦尔德纳泽坦率地谈谈，戈尔巴乔夫承受的来自军方的压力到底有多大。但我很失望，他顾左右而言他。他承认党内有不少麻烦，他自己和戈尔巴乔夫也因表现得不够果断而正遭受人们的严厉批评。在最近党的一次全会上，苏联驻波兰大使——他也是一位中央委员——就曾站出来攻击戈尔巴乔夫和中央领导的东欧政策。谢瓦尔德纳泽复述了这场争论。他说他拥护改革，宣称没有改革，苏联的结果不是无政府主义，就是专制。无政府会使苏联和欧洲——而且不仅仅是欧洲——陷入混乱；专制则将酿成悲剧。不过谢瓦尔德纳泽强调，苏联的处境尚不是那样糟。

苏联共产党强硬派力量增加了对戈尔巴乔夫的压力。或许是受公众对东欧变革和波罗的海诸国事变大胆批评的鼓舞，在4月9日，苏联议会主席团声明，立陶宛对戈尔巴乔夫3月30日电报的回答是不够的，并威胁进一步使用经济、政治和其他手段来对付立陶宛。这表明戈尔巴乔夫已经决定他将不允许立陶宛脱离出去。戈尔巴乔夫种种威胁以及兰兹伯格斯的顽强拒绝，终于在4月13日形成了一种最后通牒：除非立陶宛收回它的独立声明，否则就将在48小时内切断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除了电力，立陶宛实际上完全依赖外界的能源，所以立陶宛全体人民很快就会感受到这一切断的后果。最后日期临近了，但不见有“收回”声明动静的

出现。

乔治·布什

4月16日，当我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百慕大会晤时，我对她谈及了我的忧虑。我告诉她："戈尔巴乔夫确实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当谢瓦尔德纳泽在华盛顿时，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问他，戈尔巴乔夫承受的来自右翼的压力是否越来越大？如果我采取行动，他是否能忍受？如果戈尔巴乔夫不从波罗的海困境中脱身，我将难以与他合作。你和我在这点上的认识都一样，但情形越来越困难……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倒退到过去黑暗时代的危险仍然存在……"

撒切尔赞同地说："戈尔巴乔夫是够呛。"苏联军方正在掀起一股强大的反对声浪，"他们的待遇恶劣，他们不得不销毁还不错的武器，他们的军队在按着种族闹分裂。军队已不再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这也影响了苏联对德国、对"欧洲常规武器谈判"、对"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的政策。她说："戈尔巴乔夫是位敏感的政治家，但在过去六周里，他在其总统位置上变得麻木不仁了。这是出人意料的，不过这更有利于北约的团结，因为苏联的局势表现出难以预料的危险，因此，不仅在欧洲，在此地区[1]以外的其他地方，也需要加强防务。"

日记　4月17日

今晨电视上的主要新闻是立陶宛……新闻界都在询问：下一步你要干什么？下一步你要干什么？他们要求我们加大压力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但如果我们做了，又会

---

① 意指在地理上北约控制区域以外的地方。

冒出一些批评。当你为潜心对付苏联而制定出另一整套计划时，他们会问：你又为何这样做呢？……反正你里外都不是。但我一直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认识到这一事件是灾难的同时也会使他享誉全球。

我会见了由乔治·米切尔率领的参议员代表团。他们始终不愿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他们只是说，你要去做某些事，但他们不说是哪些事，而只是说这些事是正确的……议会极为高兴你这样做。

日记　4月18日

问题是，如果你不原谅苏联人的所作所为，你又如何维持美苏的关系？我们碰到的局势如此危急，而且它还会危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影响到我们。军备控制始终萦绕在我心头，而阿富汗、古巴、安哥拉以及其他地区的很多问题也让人揪心；此外还有令人不安的德国中立问题、波兰问题。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愿恶化和苏联的任何关系。在我们国家，你还得应付人权组织、右翼以及那些或者痛恨、或者怀疑戈尔巴乔夫的人，他们都想以人权的名义来紧逼戈尔巴乔夫。

4月18日，贝克告诉谢瓦尔德纳泽，我们认为禁运是一种强制行为，提醒他这将会损害美苏关系。谢瓦尔德纳泽安慰他说，他们在华盛顿以及以前说的话仍然有效，“我们坚定地承诺在立陶宛只使用政治手段，没有其他考虑”。但他坚持立陶宛人理应先迈出第一步。

第二天，我在芝加哥会见了密特朗。我复述了我们与谢瓦尔德纳泽的会谈。我说：“如果他们切断石油和天然气，我必定要采

取某种行动。但我不想中止军备控制谈判，不过我可以做的是中止'最惠国待遇'的谈判。"我请教他，他认为我们该怎么做。

他回答说："我们处于一种严重的对抗中。我们的利益是在支持立陶宛独立时，同时维护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密特朗要求我们应让他有时间来熟悉情况。他继续说："现在已处于起义的前夜。如果乌克兰开始行动，戈尔巴乔夫就要完了，其结果就将是专制。"至于波罗的海诸国，法国也不承认苏联对它们的吞并，波罗的海国家一直与巴黎保持正式的关系。但他提醒我，在承认它们时要小心，"因为这就如同美国派一位大使到阿尔萨斯一样"。

我告诉密特朗，令我担心的是苏联军方的刚愎自用。他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应按西方的利益来行事……我们正在构筑未来：好比我们正走在一条十英里长的路上，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走了500码。"他建议，如果苏联贸然行事切断石油和天然气，我们的反应应该是经济的而不能采取任何其他方法，"我不想强求别人做我自己不愿做的事，我们不能出兵"。密特朗深思熟虑，而在我们众多议员们失察的地方，他则明察秋毫。就在我和密特朗会面的同一天，苏联完全切断了对立陶宛天然气和石油的供应。

日记　4月20日

新闻界正在对我大肆围攻。因为苏联人不仅没有节制，反而变本加厉……他们正在开倒车。他们断定，天然气和石油已被切断，所以我们不会有所作为。贝克与谢瓦尔德纳泽已进行了第二轮会谈。谢瓦尔德纳泽说过，应以行动而不是言论来判断他们，贝克说，"你是如何信守诺言的？"谢瓦尔德纳泽再也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那天晚上，布伦特、吉姆和我讨论了我们应如何行动，我们的

话题转向了经济手段，例如制裁。我请吉姆和我们的盟友进行磋商，看他们意下如何。我们决定，在下一周与议会领导人会谈。这样我们在形成一个回应方案时还有点时间。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布什总统在4月23日星期一的傍晚，就立陶宛问题召开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主要委员齐聚在议员会议室，其间包括经济小组成员，如尼古拉斯·布拉迪、商务部长罗伯特·莫斯巴赫、农业部长克莱顿·尤特、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布什总统强调这不是一个决策会议，而只是务虚。我指出了我们所处的形势，我们可以在三个领域采取行动。第一个是安全方面——如军备控制的谈判，我认为在这里我们没有什么杀手锏。第二个是非经济的美苏间的协议和交流计划，这里的情形与前一项差不多，我们也难以制约对方。第三个是经济方面，在这个领域，我们完全可以对苏联采取一些与苏联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强制一样的措施。我说："不过，这将难以向议会解释。我们又要和莫斯科签订一些经济协定，当他们使用经济杠杆来遏制立陶宛时，这些协定却会加强苏联经济，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签订这些协议？"

中止经济协定的方法有好几种。一种是取消在马耳他会晤前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的协议；对于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讨论过的，比如贸易协定和"最惠国待遇"地位问题，暂缓继续谈判。另一种则是取消双方的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后者推动了我们自己改变苏联的目标。我们也可以只搁置最初的协议，因为它们对苏联人更有利。

贝克强调我们有两个目标：保持我们与苏联的全面关系，避免和我们的盟友发生冲突。他和我们世界各地的盟友磋商过，他们一致的反应是，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对于苏联切断能源的做法，我们只能予以谴责。贝克和经济小组成员坚持，如果戈尔巴乔夫不使用武力，经济制裁是过分的。

我对会议弥漫的克制态度有点失望，虽然从经济部门所表现出的意向中可以预见到这一点。对政治和安全问题，或者对于那些批评总统对苏联"太软"的言论，他们果然无动于衷；而贝克的两点本身都不能满足我们在处理立陶宛问题上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必须作出强烈反应，但这不是出于国内的政治压力。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戈尔巴乔夫完全无视我们的要求，而且也粗暴地践踏了他对布什总统所作的每个承诺，他似乎以为我方完全有责任来配合他们。我认为他们这样继续下去是危险的。如果我们的反应无关痛痒，那么下一次我们自己将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服从会议上的主流见解，我以为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只能是一无所获，只是在浪费时间。

乔治·布什

对这次讨论，我也感到失望。因为它没有作出行动的决议，而我想采取行动。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表明支持立陶宛人民。虽然我一直相信美国人民支持我们处理立陶宛问题的方法，但迟疑不决却是说不过去的。我们不想使立陶宛人民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在漠视他们的困难。但是，我们也不能提议，我们将和他们一起走向战场，而一旦苏联真动武时，却又让他们孤立无援。

选择中止经济协议和暂时的制裁，倒令人感兴趣。这不用我们去威胁就会加大压力以迫使苏联人取消切断能源的决定，而我们的威胁很可能使戈尔巴乔夫很难在不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也不失面子的情形下作出妥协。我决定，在苏联人开始着手以谈判来解决问题以前，我们停止签署贸易协定和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谈判，但我不想取消其他协定和首脑会晤。

日记　4月24日

我们和议会的多党领导人有个会晤，我竹筒倒豆似

地和盘托出了我对立陶宛问题的看法。让我感到高兴和惊讶的是,他们都坚定地乐意给我选择权,支持我沉着应付。杰西·赫尔姆斯是个例外,他希望承认立陶宛,不过罗斯滕科斯基以及其他人明白,我关注东欧变化的趋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通过对话和会谈来设法说服苏联人,他们很欣赏。他们赞同我们的回应应在经济范围内,这样我就有点回旋余地和时间了。

兰兹伯格斯虽然是位真诚的爱国者,但面对如此复杂局势,也觉得十分为难。就在苏联切断能源供应的同一天,他抱怨他的国家成为另一个"慕尼黑事件"的牺牲品。我对他的说法很不以为然。我能理解他的失望,但我也希望他能意识到我们对立陶宛的独立有承诺,以绥靖的罪名来指责我是可耻的。除了将此于事无补的决定通知他,我确实还不太清楚如何来回应苏联的行为。我是在4月25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向立陶宛转告这一消息的。次日,密特朗和科尔给兰兹伯格斯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撤回"立陶宛独立的宣言,并要求他和戈尔巴乔夫谈判。这些贝克已和谢瓦尔德纳泽谈过。我以为这是个好主意,因此,我鼓励他们去做。这或许会形成一种社会压力,迫使兰兹伯格斯采取合作的态度。

在我行动前,我打算给戈尔巴乔夫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但不是大张旗鼓地来做。我起草了一封信提醒他我计划要采取的措施,并点明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难以继续进行"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谈判——这本该开始进行的会谈。我吃不准局势的发展是否要求我们作出更强烈的反应,或者我是否应当发出这封信;但那天晚上当我坐在打字机前,并一吐为快地打出五页纸时,我确实长舒了口气。在4月29日信被修改好。其中写道:

……我一直十分重视你不会使用武力以及你所说的

立陶宛最终有可能实现独立或自决的话。问题是我们不能再对所发生的事无动于衷，不能再对立陶宛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漠不关心。

我常常公开讲过，我的愿望不仅是看到改革成功，而且也愿看到你个人的顺利，对此我一直特别牵挂在心……在星期二我会见了我们议会中的主要领导人，我向他们解释，在立陶宛问题上我不想采取过激行动，尽管这里的人们日益觉得我的按兵不动是对立陶宛以及其他真正热爱自由人民的沉重打击。这一日益滋长的对我的不满使我确信，我们将无法来继续我们的"贸易谈判"。因此，除非你们开始与立陶宛对话，"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谈判也将难以进行。

我别无选择，我必须支持我们所坚决维护的信念：立陶宛有权自决，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盼望我们在即将到来的会谈中见面。尽管有目前的紧张局势，但我决意按计划举行会谈。这里的情况极其紧张。

在我等待答复时，参议院在 5 月 1 日以 73 票对 24 票决定，在苏联针对立陶宛的禁运取消前，停止与莫斯科的贸易往来。两天以后戈尔巴乔夫给我回了一封冷淡的信，它由苏联大使杜比宁转交给布伦特。其中有这样的话：

在我看来，在马耳他我们关于立陶宛问题的处理已达成了基本的相互谅解，正如我当时所强调的，这类问题只能以冷静的、排除任何外界干涉的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我请你特别注意排除外界干涉这一点，请你注意，如果你要损害我们的关系，要来恶化我们的人民对美国的态度，

那么你就可以鼓励分裂主义。我也说过，我们一直在期待在此极端复杂的时期，美国总统能谨慎而深思熟虑地采取行动。你，总统先生，你说过理解我所表达的，这一理解应成为今后行动的基础。

马耳他会晤后，你和我们对立陶宛形势的不同看法，证明我们确实实现了彼此的相互了解……现在你打算要改变主意，在美苏贸易和经济关系上采取消极步骤，我们能理解这一切吗？或者，是华盛顿现在想变本加厉？而这在差不多十天以前还被美国方面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答复。在我看来，在马耳他我们商定的是一个包括戈尔巴乔夫不使用强制手段的谅解，而他们切断能源正是一种强制措施，它很难说是一种"民主"的解决方式，它也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谈中所承诺的不相符合。我曾努力来为双方着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当莫斯科试图来威胁和惩罚立陶宛时，我们不闻不问。我们采取了一种延期进行"最惠国待遇"以及贸易谈判的反制措施，我想这是种适度的反应。虽然我们同情立陶宛人民，但我们也没有屈服于要求制裁苏联的要求，我们一直在支持积极的双边对话而不是分裂主义。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立陶宛总理卡兹米拉·普鲁斯基涅 5 月初正在美国访问，她被邀请到白宫作一次非正式的会晤。为表明我们支持立陶宛和这位总理，这是个好办法。卡兹米拉比那位时而热血沸腾、时而垂头丧气的兰兹伯格斯更为谨慎明智。原计划她从西北门进入白宫，我们在议员会议室等她，但没见着她。原来那扇沉重的机械大门在轨道上开启到一半就卡住了，她的轿车进不了院子。她和她的随员只得又走到西门口。

这一不幸事件被某些记者不怀好意地描写成一次精心策划的

羞辱普鲁斯基涅的安排，而对事情的真相只字不提。我们确实不想哗众取宠，我们邀请她是为了一种表态。自从波罗的海国家被苏联吞并后，这是一位美国总统和一位立陶宛总理的首次会晤。因此，这是一次极其敏感的事件，我们也是这样看的。我们惟一担心的是这次会见将被看成我们承认立陶宛的独立。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没允许立陶宛的领事陪同她一起来。后来在一次记者吹风会上我解释说，总统会见普鲁斯基涅，不是把她作为独立的立陶宛总理，而是作为立陶宛人民自由选举的一位代表。

乔治·布什

普鲁斯基涅是一位坚强、坚韧的总理。她对立陶宛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我发现她比兰兹伯格斯更能理性地商量问题。她理解美国长期以来支持立陶宛的独立，明白美国既要帮助她的国家，又要时时在和苏联打交道时维护自身的利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她说，科尔和密特朗的信开启了某种可能性，使事情的解决出现了一线希望。不过，立陶宛人民需要这些保证：承认立陶宛人民独立的权利，承认现任政府的合法性，承认立陶宛领土的不可侵犯。她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想使用武力，她要求西方对戈尔巴乔夫加大压力以促使他来抵挡反动势力。

我不是如此乐观地认为一场镇压是不可能的，苏联军方仍然可能会干涉。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我们承认立陶宛独立，苏军把坦克开进来，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说："……我不想看到立陶宛大地再遭到铁蹄的践踏，就像1951年那样，我们空喊几句'到街垒上去战斗吧'，却使匈牙利人民陷入战火之中。那里的人民献出了生命——他们是被谋杀的——而我们却在这里袖手旁观，西欧也同样是隔岸观火。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对于立陶宛人民来说，要理解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也正是我要去做的。"我说，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我还希望苏军撤出波兰，瓦克拉夫·哈费尔应有机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争得自由。"只有美国能承受过失，并为

大家谋取机会。世界在疾呼军备控制……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一直说得上话。我讲述这些事情，并不是我小看了立陶宛的独立，而是因为危机四伏……公开地打击戈尔巴乔夫比和平地促使他理解我们的信念会更有意义？……当你离开这间办公室时，有件事你应该明白，即自由的意义。对立陶宛的自由，我以人格担保，布什政府也承诺保护它，但实现这一自由的方法我们可以讨论，请你理解事情的关键所在。”

以谨小慎微开始的一年却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苏联军队要求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上，不要再作出过多的让步。这可能会影响苏联对东欧的战略。我们担心，作为一个自由大陆的一部分，如果德国统一和东欧的改革不马上进行，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新的、强硬的苏联政府，一个不愿意作出我们需要的妥协的政府。立陶宛的局势给任何有关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投下了阴影，它也同样波及了6月份的首脑会晤。

第九章　构建共同基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冷战紧张局势的释然取消了战后西欧全部安全防御结构和我们战略计划所赖以存在的基本设想:苏联的威胁和大陆的分裂。美国在欧洲以及北约组织体制中的军事存在主要以该威胁的存在和使用在西德的基地为理由。突然,一切都得重新考虑。未来欧洲之安全究竟需要什么?或需要构建什么样的安全?北约组织的前景如何?一个统一的德国与北约组织的关系会怎样以及它会允许我们在那儿驻军吗?

我们得重新思考欧洲安全、我们在那里的角色以及超级大国的关系等更大范围的战略图景。欧洲正在发生的事件其原因与结果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既得从个别的也得从总体的和前后关系的角度加以考虑。我们目睹了通常只有在一场重大战争结束时由胜利者所强加的那种变化。关键是我们避免了另一次凡尔赛式的解决,它使一战后的欧洲陷入分裂与不和,从而产生悲剧性的结果。我们的任务是发展一种共同的远见卓识,即后冷战的欧洲不仅是我们和我们的同盟所希望出现的,而且苏联人也认识到他们与之密切相关或至少接受它。

我们首先需要防止重复困扰20世纪欧洲的那些混乱。美国人的孤立主义也部分地促成了这些悲剧。我们从血的历史中所记取的教训是,美国必须在欧洲安全及所有与苏联相关的问题上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该作用的媒介必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

联盟是美国能够在欧洲保持力量以对其安全与稳定承担责任的惟一方式。此外,一个统一的德国成为该联盟的完整成员是我们存在的关键所在。德国有我们的基地,如果它脱离该联盟,美国仍然在欧洲驻军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很困难。我们需要赫尔穆特·科尔承诺德国留在联盟以及同意美国在其领土驻军。德国统一的成果除结束欧洲分裂以外,还与我们的重大利益密切相关。

我们得修改北约组织的使命,不仅要使美国人民相信继续耗巨资——且不说军事部署——乃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且也要告诉莫斯科人该同盟不再如他们 40 年来向他们人民所说的那样是个威胁。布什总统在北约组织最高级会议的 12 月演说中已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安全结构,吉姆·贝克稍后几天在柏林也理解了此重要性。贝克还认为新的结构需要北约组织、欧洲共同体与欧安会召开新的最高级会议。他的提议在主要方面已深思熟虑,强调北约组织对苏联人没什么威胁,以及呼吁法国人更加重视欧洲的结构。他还提到我们的基本要求,美国保持其与欧洲安全的联系,统一的结果以及同时在欧洲安全秩序中出现的变化不仅符合欧洲人与苏联人的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国人的长远利益。

乔治·布什

我知道美国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并以一种避免现在或未来可能发生冲突的方式构想重新统一的进程。如此利害相关,特别对我们在欧洲的角色说来如此,我们将尽早地介入到日益复杂的外交活动之中。我想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和合作的基调,正如我们在柏林墙开放时抵制那些煽动性的言论和要求那样,重新统一和一个完整而自由的新欧洲不应当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它应该是东方和西方共同努力和接受的。我们并不按照胜败来安排我们周围的变化。

以此方式来安排欧洲的统一和未来安全结构乃不朽之业。由于变化是如此迅速,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来仔细思量。幸运的是,德

国乃至整个东欧的历史潮流在我们一边。我们得推动、指导和尽可能地控制这股方兴未艾的积极潮流。

在1989年最后几天的短暂时刻，东德似乎显得还坚持得住。为努力加强和扩展对其政府的支持，莫德劳开始召集由不同政治派别组成的协商会议，探讨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出路。大多数非政府的参加者都参与了10月和11月的抗议，但仍支持东德关于统一的改革。他们倡议一种介于自由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制度——一种中间立场。该协商会议很快商定1990年5月进行新的议会选举，甚至以议会自居而行动，领导反对令人痛恨的党的秘密警察。

然而，所希望的变化没有出现。充满旧面孔和拘泥于旧习惯的莫德劳政府很快就毁掉了它所曾有过的那点稳定性。它不能或不愿对行将崩溃的经济作彻底的改革。政治改革也没有实现，包括对解散政党要求的回应。在1月初，莫德劳试图通过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组政府和策划诸如拆毁苏联的战争纪念碑事件来恢复党的权威。政府的微弱信任如今已烟消云散。协商会议愤起抗议，与政府的有效合作结束了，随之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

1990年1月15日，数以千计的示威者血洒东柏林街头，党的总部受到强烈震撼。1月26日，布什总统与赫尔穆特·科尔说起我们新的主张时，他不再相信东德自己能够改革。它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乔治·布什

非常疲倦的科尔谈到最后的发展。东德政府出了问题，但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改革，他说："他们不可能改好。"哈费尔在捷克斯洛伐克拥有道德上的权威，梅左维基在波兰也如此，莫德劳如今对他的人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我本人在一点一点地推动必要的改革，”科尔解释说，“东德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应当一日做成的事却花费数周。结果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出现了危机。数以千计的人离开，剩下的也在打点行装……从1月1日以来已走了43 000人。从长远角度看，这是难以忍受的。他们都是优秀的人，医生、工程师、专家。他们不可能被替代。”

科尔2月在瑞士与莫德劳讨论如何给局势带来秩序。“我的工作是结束欧洲的不稳定，”他说，“这是我夜以继日所干的事。”他问我是否可以会谈几个小时，就我们俩，或许如我们10月在戴维营那样进行讨论。我为这个想法所激动。我想我们坐下来解决的方式非常重要，结果我们于2月24日进行了会谈。

科尔不愿与一个不能起作用和不愿改革的东德政府一起工作。他也对莫德劳仍坚持的联邦计划不感兴趣。在1月莫劳德尝试重申党的权威以后，西德的政党一致同意中止制定一个共同体条约，直到举行自由选举，科尔希望它将最终使民主德国踏上联邦和统一之路。对莫德劳来说，他认识到他的政府不可能长期把持权力，而于1月28日同意协商会议把选举从5月6日提前至3月18日。我们预料时间早些将会有利于共产党或社会民主主义者胜利。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华盛顿，我开始认识到我们，乃至所有的人，都大大低估了东德瓦解的速度。由科尔所提出和我们所支持的，一种谨慎、可控、“渐进、有步骤”过程的可能性似乎在消失。如果不可能控制瓦解的步伐，那么最快的改变或许是把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减小到最低限度的最好方式，甚至可能是惟一方式。它也减少了敌对者使过程出轨的机会。迅速变化的局势需要美国强有力的领导，如果

要使统一按照我们希望的情况发生的话。

我们在西方努力的关键是与西德密切合作以确保他们工作的结果如我们所望。我们的政策原则很简单。总统在12月3日的会议上告诉科尔，我们将支持重新统一，这使西德在与东德打交道时可奉行独立的“内部的”外交政策，而无需担心美国最终是否支持。这个主张的缺点是以这样一种设想为基础，即科尔与我们一样，同样优先考虑“外部的”或国际的问题。我们希望总统支持科尔的允诺将会保证这位总理继续主张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保留美国的军队。但一直存在这样的危险，他也许为压力所迫而与苏联作交易，以德国的中立换取统一。

还有，我们希望所有国家，特别是苏联，接受外界的解决方案，并认识到自己与欧洲当前的秩序利害相关。达到各方意见一致的战略必须包括解决基本的重新统一问题，如我们怎样决定解决哪些、在什么时间、和谁一起的实际顺序。鲍勃·布莱克威尔、菲利普·泽里科、鲍勃·哈钦斯与康迪·赖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致力此过程的欧洲人——草拟了一个看上去像是我们所要的德国重新统一及如何实现的大纲。整个德国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外国的军队驻扎在东德的领土。它的边界是西德也是东德的界线，柏林已并成整体，同盟国权力乃至任何被占领状态结束。重新统一本身是在两个德国之间制定和实现的。当它完成时，德国将会得到四大国的祝贺。我同意这个看法，虽然关于重新统一过程的讨论还不够细。

国务院的想法则不同。同意基本的内部安排应由两个德国进行，贝克认为这太危险了而不能把该过程外部的其他方排除在外。试图冷落苏联可能导致它不与西方就德国问题进行谈判，而隐含灾难性结果。因此，国务院设想，把两个德国之间的谈判与四大国相融合——即所谓“二加四”。为减轻四国力量介人的危险，他建议它们预先同意讨论的目标是统一以及四国将只关心统一的外部

和国际的方面。

我对国务院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我理解吉姆关心的是"只有一个德国"的谈判,但我也知道四国的介入所可能引起的损害。它将使苏联在此过程中开展反对活动。它们甚至能够争取对统一并不热心的英国与法国,至少采取某种拖延战术。我相信,风险最少的道路是尽我们所能尽快推动德国内部的谈判,并尽力使之免于干涉和希望事情发展迅速而成为既成事实以防止潜在的反对力量。与此同时,3 月选举的结果将会影响到两德之间谈判的进行速度以及方向是什么——联邦还是邦联。

试图冷落戈尔巴乔夫于该过程之外原则上被认为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意。宁可增加人选——如果它是可行的话,这也正是贝克计划所下的赌注。他的条件是所有六个参加方一开始就同意以重新统一为目标,两德处理内部的统一,以及东德有一个自由选举的政府——这就意味着谈判在选举之后。如果这些条件被真诚地遵守,那么"二加四"或许是可行的。为贯彻该战略做了大量工作的吉姆是一位懂得谈判的人。我准备把我对贝克及其助手讨论的保留意见放在一边,听从他的主张。

我们下一步是创造一个西方统一的局面,以支持德国的重新统一和完全的独立自主,不保留任何限制。西方同意重新统一和参加北约组织均由德国决定,这对苏联来说阻碍任一目标都会更加困难。同时,我们将与苏联一起解决政治和战略问题,我们将提出对他们安全的关心以消除他们的疑虑。该战略旨在给莫斯科阻止重新统一造成困难,从而使他们默认之。

乔治·布什

通过个人细致的外交活动在同盟中宣传我们的战略,随着 2 月 29 日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对华盛顿的访问而开始,这

次访问是他替代杰弗里·豪以来的首次访问。赫德重复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立场，这些我已从她与我关于欧洲常规武器谈话中得知，她勉强同意在此基础之上的统一，即对之不再从更大的战略角度仔细考虑[1]。

"她勉强同意重新统一——一种不太情愿的统一，"当我们坐在椭圆形办公室时赫德告诉我，"不反对，但不情愿。她认为事情应区别对待。德国是否加入北约组织？东德是否在欧洲共同体？俄国人是否过敏？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讨论这些问题的框架。"在讨论其他问题时贝克同他谈起"二加四"计划，赫德很感兴趣，但他倾向于接受苏联关于举行欧安会最高级会议讨论重新统一问题，对此他指出，欧共体的部长刚在都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取得一致意见。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英国对在欧安会最高级会议上解决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的兴趣令人吃惊。大(35 个成员)而不便的全欧组织并不是进行此类谈判的场所。如果四大国能够破坏重新统一，那么在任何问题都很难取得一致同意的欧安会，一个大德国的前景更有可能被推迟或延缓。一个旨在批准一项重新统一协议的欧安会最高级会议会展示旧的创伤和未决争端，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关于德国的和约会议。科尔和我们都反对一个有关德国的正式的和平条约概念以及对"输一赢者"作另一次安排。

波恩也开始考虑如何解决与重新统一有关的实际的国际问题，特别是北约组织成员问题之操作条款。2 月 31 日，根舍在休金新教学院的一次演说中提出了重新统一的建议。他重述他坚信重新统一必须产生于统一的欧洲之中，它也必然意味着德国邻国的安全。此外，德国的北约及欧共体成员身份不可改变。"我们不

---

[1] 请参见第八章。

想要一个统一的中立主义的德国。"他宣称，德国将仍留在北约组织，但东德的领土将留在同盟之外。他还提出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都应该被吸收进更大的立足于欧共体和欧安会的欧洲安全体系之中。欧洲安全会议应当得到加强，新的结构应在该年晚些时候的最高级会议上予以通过。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对该计划的某些部分有异议，同时也看到潜在的麻烦被忽视。还有，假如存在着实际问题以及由于欧安会的特定性质，我们就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认可该集团能够吸收北约组织及其功能，根舍没有明确北约组织与民主德国领土的关系如何，或即使有的话，也未明确北约组织在什么时候重整其防御。在民主德国的国防军(东德武装力量)作用没有被包括在内，他也没提到在德国的美国军队的前途。根舍显然绕开四国在重新统一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这也是令人担心的，特别他提出将由德国人决定什么样的联邦，然后把它交给欧安会批准。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根舍个人的立场，还是得到了科尔的支持。

赫德访问几天以后，2 月 2 日根舍到达华盛顿与贝克会晤。他解释了他在休金提议之后的想法，强调关键是让苏联确信北约的领土不会向东扩张。贝克或许没认识到问题来自北约，而接受了这番解释。这对根舍说来是一个不幸的让步，一个可能产生严重困难的让步。贝克概述了"二加四"概念，根舍反应积极，"很清楚只要是'二加四'而不是'四加二'"——这就意味着联盟并不起决定作用。虽然根舍本人并未正式承认，但贝克认为该观念已得到了他的支持和默认，欧安会并不是谈判德国未来的地方。

波恩的联合政府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有些复杂——对德国对我们均如此。根舍并未面对面地与科尔讨论每一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关于他们的现实政策我们的视角偶尔有所不同。此外，根舍与

科尔的言或行有时也未相互通气。科尔未告诉根舍他在10月的十点动议，根舍也疏于事先向科尔通报他的休金提议，更近一些，科尔没有让根舍知道戈尔巴乔夫的2月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因此，我们在波恩同这位总理谈及我们的观念还是必要的。为试探科尔的意见，鲍勃·布莱克威尔和我都将利用3月3日的幕尼黑会议会见霍斯特·特尔奇克。

我与霍斯特初次相遇于80年代后期的一次会议上。那只是一次简短的相遇，我感到我并未真正了解他而只不过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我花了一些时间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与他相识，特别在直通电话安装以前。他很精明与直率，且常常以一种轻松的自信谈论他的总理的言论，甚至说的多了些。我对他在电话里的欢快问候表示欢迎——“你好，布伦特！我是霍斯特！”——因为我们的讨论常常是建设性的，即使结果意见并不一致。特尔奇克是总理观点的强有力支持者，我觉得他也经常有很多改变。他并不盲从总理，而是帮助我理解总理与外长的细微差别及其影响。

科尔定于2月11日会见戈尔巴乔夫，贝克应早两天到达莫斯科。霍斯特告诉我科尔计划警告戈尔巴乔夫：大批东德人的流出或由于他们的议会的作用可能促使在3月选举之后很快实现重新统一。他也将申明德国的中立。我们赞同在科尔见戈尔巴乔夫之前应该向他简要汇报贝克会见的情况。

霍斯特和我都同意如果我们要在反对力量有机会阻止之前实现重新统一的话我们的政府就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加强合作，但是他仍担心四国的干涉。我向他保证美国不允许这样。我们也同意不能让任何会议变成一次和约会议。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我对波恩愿与我们密切合作以及支持对我们说来同样的“永久性”结果这一点更有信心。

向英国与德国概述了“二加四”过程的想法之后得到了积极的

回应，虽然不是坚决的支持，贝克承担了在2月5日于莫斯科讨论武器控制时向莫斯科宣传“二加四”的任务。贝克计划去布拉格途中在爱尔兰的咸伦停留一下以便加油。在那里他会见了法国外长诺兰德·杜马斯，杜马斯来爱尔兰是为参加一次欧洲共同体会议。杜马斯喜欢这个计划并允诺向密特朗推荐。

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正在许多问题上受到攻击，显然在德国问题上处于“弱势”。2月1日，莫德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之后宣布一个由两个保留其政府的德国组成一个中立同盟的新计划，该计划受到苏联的公开支持，戈尔巴乔夫还亲自写信给布什总统，以促进统一的“渐进”过程。该提议对我们以及对科尔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特别因为它要求中立、非军事，或至少在某个时候，仅只是一个联邦的德国。然而，苏联现在首次表明他们不反对德国统一的原则，这是一个令党的反对派心烦意乱的发展。

2月7日，贝克向谢瓦尔德纳泽展示了“二加四”方案，并一再强调它是设想用来解决重新统一国际方面的难题，以及只能在3月选举之后进行。美国不可能支持莫斯科一个中立德国的提议。事实上，一个中立的德国对苏联来说比一个坚决加入北约的德国更危险，它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贝克重申根舍关于民主德国的方案：如果德国留在北约组织那么就不会有北约的管辖权问题或倾向东方的力量。北约将会成为一个更多政治色彩而更少军事色彩的联盟，总统在北约12月的布鲁塞尔会议已对此作了阐述。

谢瓦尔德纳泽主张一个统一的德国应当是中立的，他说他完全不反对统一，但他希望对苏联的安全有所保证。他敦促四大国讨论一个和平条约，说他担心的是新纳粹主义在政治的边缘地带复活，以及德国重新武装的可能性，四大国应当让形势发展得慢些。英国与法国也是这样想，虽然谢瓦尔德纳泽承认事态发展得已经超出可能，他支持莫德劳的渐进过程的计划。贝克重申德国不可能是中立的或非武装的：必须允许它自我保护。如果苏联担

心统一德国的潜在的军事威胁，也许不让它进入北约组织从他们的角度看来也许更好？

贝克2月4日首次向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二加四”计划，包括必要的前提条件，包括该过程只有在选举之后——让德国人按自己心愿实现首次重新统一。戈尔巴乔夫说他能够接受这个计划，只要立足于国际法的基础之上。他对德国军事力量复苏的担心显然远不及谢瓦尔德纳泽。他告诉贝克他同意美国人的观点即“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威胁德国统一的前景”。然而，他对德国参加北约有所保留。

贝克问戈尔巴乔夫是否宁可德国独立和在北约之外，或与该同盟有一种联系，即保证“北约现在东面的统辖权不能有任何拓展”。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定下决心，但他反对北约组织的扩张。贝克重申“北约的统辖权将不会有任何扩展，因为北约的军队不向东前进一英寸”。戈尔巴乔夫说他能够看到让美国军队留在德国的好处。他也不想凡尔赛德国重新武装的事再现。“你对我所说的主张和选择是非常现实的，”他说，“……但不要让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最低界线。”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很重要。戈尔巴乔夫不仅说他不害怕重新统一，而且对于我们如何达到目的以及会有什么样的成果首次表现出灵活性。该讨论当然为苏联领导人与科尔和根舍的会谈铺平了道路，并预示戈尔巴乔夫很可能是值得信赖的。科尔的会见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们需要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保证它成功。德国在莫斯科所提出的一切都必须按照我们的立场和步骤，与贝克刚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听来的相一致。在慕尼黑，特尔奇克给我一份科尔计划提交戈尔巴乔夫的提纲，该提纲归纳了我们对此会议的期望。然而，总统知道，科尔身处巨大的政治压力与人身压力

之下，以及这会是这位总理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会议之一。我建议他写信给科尔，给予他所可能有的一切个人支持以及让他清楚我们对一个统一德国前景的关心。

乔治·布什

我让科尔相信美国仍然支持重新统一。“如果事态变化之迅速超过我们所料，”我写道，“它意味着我们关于德国统一的共同目标实现的速度之快甚至超过我们所希望。”当四大国责任出现疑问之时，“我想要你明白美国不会做任何使你的国民认为我们不尊重你们对自己国家前途之选择的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会允许苏联把他们的四大国身份作为一种工具，迫使你们成为符合莫斯科心意、按莫斯科步伐行事的那种德国。”

与此同时我再次说我想看到一个坚定地属于西方阵营的统一德国。

> 自然对德国人民及其所选择代表的决定又是一回事，所以我对你们拒绝中立的建议和坚定地表示统一的德国仍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感到非常高兴。在这一点上我赞同这样的思想，即提出一个统一德国在北约组织的成员身份对目前的东德领土来说可能是一种特定的军事态势。我们相信在实质上，或许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苏联军队从中欧和东欧撤离这样一种情境中，这样一种约定对于德国的安全及其邻居的安全是适合的……
>
> 即使如我们所希望，苏联撤走所有在东欧的军队，那么欧洲距单独具有强大军事力量也相差甚远。美国在德国以及在这块大陆上的军队作为可信赖的威慑力量应受到支持，在我看来只要我们的同盟希望我们的军事力量作为欧洲共同防御的一部分存在就必须继续维护西方的安全。我们两国的道路通过此时此刻的希望与允诺联系

在一起，我们对我们共有的保护自由之果实的能力充满信心。戈尔巴乔夫先生对吉姆·贝克或对你所可能说出的一切都不可能改变我们深远的久经考验的伙伴关系这个基本事实。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总统在他的信中澄清了我们的立场，即其与北约组织的关系应当是一个统一德国的东德部分与北约之关系。他采用曼弗雷德·沃勒在一次讲演中的建议，提出"一个统一德国在北约组织的成员身份对目前的东德领土来说可能是一种特定的军事态势"。该建议不同于根舍关于一个统一德国应全部在北约的领域和管辖权之内，因此应在北约的安全保护之下。总统解释说他希望"特定的军事态势"将伴随着苏联力量从中欧和东欧实质上的撤离。既然整个德国都将属于北约，苏联军队应当撤离东德领土。这就作出一个重要的修正，以防止戈尔巴乔夫试图让我们陷入根舍的思想难题之中。

由于特尔奇克和我的安排，贝克也把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摘要送一份给科尔。因此当科尔踏上他的重要旅程时他得到了美国可能是最强有力保证的支持。为促进我们所选择的结果实现我们已尽可能作了最大努力。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有些紧张。我们非常信任科尔，但也许难以改变戈尔巴乔夫的决定。我们不能排除戈尔巴乔夫可能诱惑或威胁他的可能性。由于科尔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后就打电话给布什总统告诉他个人的看法，因此当我听到关于科尔这次会谈的新闻报道时心中颇感宽慰：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我都同意德国人民独自决定是否生活在一个国家是他们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向我肯定地允诺苏联将尊重德国

人民生活在一个国家的决定，及应该由德国人自己决定重新统一的时间以及方式……也同意德国的问题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解决，也就是说必须实现于全欧洲的组织(欧共体)与东西方关系的一般进程中。

这是个历史性的会见。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德国重新统一是德国人自己决定的一件事。然而，仍有附带条件。他明确外部的方面远不是德国人独自的事，他还是不准备接受德国的北约成员身份。

乔治·布什

就在科尔于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2月10日来到戴维营与我共进午餐。他强调他相信美国对于保障北约的未来和使德国留在联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这是决定性的时刻。”他说，“在几周或在下个月里，你们个人将作出决定欧洲未来的抉择。”只剩下一个关键的问题：德国是否中立或留在北约。“对此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未来几十年欧洲的历史”。他警告说如果德国被允许离开联盟，“在欧洲竞争和敌对这个古老的潘朵拉盒子将再次打开”。一个在欧洲拥有9 700万人口和最强大经济的中立德国定会有可观的军事力量——它也许最终会拥有核武器。

他接着说，一个解除武装的德国将重犯凡尔赛条约的错误，它将与任何安全的结构无关。接下来对英国与法国来说最自然的反应是试图控制新的德国，德国人会反对而组成自己的同盟，于是我们就会重复我们在世纪之初的欧洲政治中所看到的所有不稳定。东欧潜在的不稳定加剧了竞争与敌对的形势。

曼弗雷德为这样一种看法所紧张。“我们必须避免德国传统的诱惑：自由无定，与东方和西方都作交易，”他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启示，那就是你们不应当允许它发生。那是你们的历史任务。”

苏联地位不稳定，如果美国明确地支持此过程，那么他们不可能阻止统一。

沃勒相信戈尔巴乔夫最终会接受德国加入北约。“如果苏联能够正确地洞察他们的长远安全和利益，以及假若他们有历史记忆，他们怎么能要求德国中立呢?”他问道，“但是从短期角度看，苏联也许会促进其中立。”他对他们是否有办法阻止德国保留北约成员身份表示怀疑，甚至他们在东德都没有什么影响。“你们与德国现在都赞同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再说服苏联人接受，”他提醒我们，“苏联人只得接受它。”

在德国必须是北约组织的一个完整成员这一点上他也毫不动摇。“正是由于与北约的联系会吸引德国与苏联人打外交上的交道，”曼弗雷德警告说，“如果德国在统一的北约组织结构之外，那么美国也会在欧洲之外，这会给欧洲带来巨大的不稳定。如果你现在离开，那么你就是在一个决定性时刻离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认为沃勒的分析很精彩。德国及其北约组织成员资格是欧洲未来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中心，美国总统必须坚持对寻找解决方案的领导权，由此为欧洲确立方向。这个时刻来临之时，曼弗雷德正在带领北约组织以这样一种方式前进，它不仅促进戈尔巴乔夫对德国成员资格的默认，而且也推动北约组织向后冷战世界转变。他在1994年过早的去世使大西洋社会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战略家。

实现“二加四”计划对我来说仍不容易，我们并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未将之列入计划或许是我的错，但我想过贝克是惟一能听到同盟声音而清楚该概念是否会流产的人，不需要实际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在，我们突然到了把方案定下来的时刻，我心中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根舍在玩一种孤立科尔的游戏，贝克则漫不经心地帮助和支持根舍。

我们惟一理性的选择是支持科尔，但是我不能确信他是否全力支持“二加四”，我担心他会认为它束住了他的手脚。我从根舍那里知道总理希望自由行事以及有关根舍日程表的一些问题。2月12日贝克前往渥太华参加一次北约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外长关于开放领空议题的会议。他试图在聚会地点确定包括六个国家的“二加四”方案。我对他强调总统不想干涉科尔的行动自由。贝克清楚地感觉到根舍与科尔都和我们看法一致，他通过根舍请科尔给总统打电话，告诉总统他支持我们的计划。科尔2月13日利用描述他的莫斯科之行的机会这样做了。

乔治·布什

科尔感谢我的帮助，还有吉姆。“我相信你在我出发去莫斯科之前送给我的信将载入德美历史的伟大史册。”他非常爽快地说。他报告说他与戈尔巴乔夫讨论了“二加四”，他也一再告诉戈尔巴乔夫德国的中立有问题。科尔的印象是苏联想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一点我们可能在谈判中赢了。“形式很重要，”他说，“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我说我们即将来临的戴维营会议对于确立我们的战略——哪里更强硬哪里更灵活——将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一些紧张的谈判与会议，即将加入“二加四”过程的参加国外长在渥太华作了一个联合声明，宣布他们想开始讨论“实现德国统一的外部方面包括邻国的安全问题”，最初的讨论将于东德选举之后开始。其他的北约国家外长大都忽视这次讨论直到传媒公开宣布，结果触犯众怒和引起争辩。意大利外长在谈到“我们在同盟一起工作40年”这一点时对很多人表示了他的气愤。根舍转过身来，带着一种冷淡的目光，生硬地告诉他：“你不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会议在该声明所产生的震动中结束。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贝克与戈尔巴乔夫在渥太华就双方削减化学武器也达成了一种共识，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华盛顿最高级会议上正式签署，时间定于5月底。欧洲未来双边削减的欧洲常规武器谈判是另外一次最高级会议。苏联要求削减至平均水平，但是我们想打破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军队的数量均势和赞成不对等削减。苏联将从东欧撤离，而我们目前仍在那儿保留一支军队。贝克确定一个方案，在中欧保持195 000人的适当水平，在此地区之外美国还有30 000人，总共225 000人(苏联在此地区之外没有军队)。

贝克打电话给我阐明这个提议。它听上去和我们的想法相同，于是我与切尼接触。他说此数量乃防御所必需，但他对星期六晚上能否当场批准明显地担心。我告诉他贝克正伤脑筋，他最后说没问题。我接着向总统讲清楚并打电话给贝克要他继续前进。然而，由于匆忙未联系上。允许驻军的总数没有问题，因为它已是结果，次低限(195 000人与30 000人)仍然不明，这就大大减小了五角大楼调动周边军队处理临时事件的灵活性。没有不可克服的问题，但是制定外交政策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政策制定的综合与调整是我的职责，我对这样一种混乱的结局感到不快。

贝克承担了一项宏大的事业，即组合一个过程(同时也为之谈判)，这个过程将使德国获得统一，并向此目标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但这无论如何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关心"二加四"的有效性，阻碍的可能性仍现实存在。渥太华宣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重新统一迅速进行的舆论。然而，仍有理由相信如果该过程被延长，或甚至统一德国的发展缺少一种力量，英国与法国至少不会感到不愉快。

至于苏联，局势发展之意义更为消极。戈尔巴乔夫对贝克与科尔相当随和，但是他本人所想的也许主要是苏联的统治制度，而远不是从和解到重新统一。苏联和东德仍希望开创一个德国联

邦——通过此对德国事务保留强有力的影响。这需要左派、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在东德的3月选举中取得胜利,这将由一次投票的结果来揭示。失败之后,左派仍能希望德国人在统一与北约之间作出选择。

波恩政府似乎正在为这样一个问题而奋斗,即搞清楚统一将如何实现。按照德国的联邦基本法有两种可能性:首先,第146条是,由全体德国人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然后由他们创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国家、政府形态、法律和宪法;第二,选择权在第23条,它允许德国的其他部分加入联邦德国。这种处理将使东德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解体,而转过来为联邦德国所吸收,导致联邦德国的扩展,它的制度毫发无损。第146条需要一个新的国家,也许是联邦形式,而第23条则意味着对东德的直接接管。

科尔(和我)强烈地倾向第23条,它避免了改变西德制度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在西方与东方赢得对立宪会议的控制,就会让新的德国走中立(还更可能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个现实的危险。西德2月中旬的投票揭示58%的公众支持两个联邦组成一个统一的德国,希望东德的社会民主党将赢得3月的选举,而且,两个社会民主党宣布一个未来的统一德国应不属于任何联盟。科尔(很快有他在东德党中的同盟者所追随)公开支持第23条,主张货币与经济均实现统一(这相当于把东德吸收到现存联邦德国的一切领域,因为它已纳入西德的经济体系之中)。但是联盟内部关于全德选举之选择仍有严重的分歧(一种"第三条道路",如根舍所指出)。

与此同时,东德领土与北约的关系在波恩也引起激烈的争论。国防部长格哈特·斯托尔腾博格支持所有领土的完整成员资格,西德国防军驻扎东德的土地。根舍声称莫斯科只有在东德中立和在北约之外才同意德国的统一。2月19日,科尔为加强联盟在第23

条上的统一，压倒斯托尔腾博格与特尔奇克的建议，提出一个综合了根舍概括的关于修改民主德国地位的声明。它说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东德领土不属于北约范围，它宣布没有北约的军队——包括国防军——会驻扎在那儿。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民主德国将非军事化，我们仍未回答北约如何对这个地区负责任的问题，或德国的成员身份在这些条件下如何运作。我们希望在戴维营向科尔提出这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特别令人烦恼的问题：德国波兰边界。大多数德国人（包括根舍）及其他的欧洲人与美国人都相信东德的奥得河与尼斯河构成了分界线，它是战后占领安排的一部分，构成战后德国事实上的东方边界，应当是合法的。然而，科尔主张只有一个统一德国的政府能够同意1937年德国边界任何合法的改变，它包括那些现在在波兰的实际部分。他对此问题的暧昧声明使许多担心德国未来举动的人感到焦急，他们支持如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关心统一者的观点。

对我们来说，边界问题因需要加强科尔在国内的地位而复杂化了。争论严重破坏了波恩的联盟并考验科尔与根舍的关系。我们感到宽慰的是科尔关于边界的最终立场是与我们一致的。我们认为他起初的动机是不想作出强硬的回答以避免疏远战后从波兰的德人区大批被驱逐出来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是保守的投票者。该问题也许会变成右翼共和党在即将到来的西德选举中的竞选纲领。或许科尔也有一种历史眼光和不愿作为放弃大片领土的领导人下台，这些领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其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我们想支持他的任职，我们得准备听从他的意见直到他正式解决边界问题。他似乎时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但是他目前对此问题的公开立场以及在他的欧洲伙伴中所激发的忧虑引起了我们的深深关切。

乔治·布什

波兰边界与北约成员资格问题列入我计划于2月24日在戴维营与科尔提出的论题中。在准备中我于出访日凌晨打电话给撒切尔与马尔罗尼。我也试图打电话给密特朗，但未能打通。

撒切尔毫不掩饰她对德国统一问题的关心，也不反对"二加四"的安排。她已与安德烈奥蒂、根舍、斯托尔腾博格和梅左维基(科尔明显不在此名单中)谈过，她说，他们全部接受这个事实，即重新统一在进行之中，但是人们也为结果的不确定而感到担心。她认为渥太华的安排将有助于减少一些担心，但北约一半成员仍为被排除在外而不快。

她指出重要的是找出联盟的共同立场。"没有很多选择，"她认为，"科尔对北约不错，继续让你们的军队留在德国。存在东德问题，如果所有共产党的军队都离开民主德国，那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就是惊人的发展，联盟的边界就似乎离他更近了。"根舍与她都觉得如果允许苏联军队在一个限定的时期内保留，就会消除戈尔巴乔夫的某些疑虑。"我担心如果重新统一的进程全都按西方的路子走戈尔巴乔夫会受到孤立，他就不会让华沙条约国家转向民主政府"。

然而，撒切尔对一个统一德国始终感到担心。她阴郁地预言德国将会是"欧洲的日本，但比日本更坏。日本是一个海上大国，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德国处于大陆国家的中心，这些国家大多被它攻击和占领过，德国有巨大的财富和贸易顺差。所以我们必须把一个更大的国家，苏联或你们包括在此政治区域"。她一再建议已到加强欧安会的时机和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框架里运用之。还有一些经济问题有待处理，特别是接纳一个新的成员(民主德国)进欧共体，一个有数百万市民却没有市场经济经验的成员。

撒切尔提出东德领土加入北约的问题。她反对斯托尔腾博格关于西德军队能够在那儿驻军的建议，这对苏联也是个问题。我

问她的提议是否想使民主德国领土非军事化，以及把苏联军队排除在外。她对戈尔巴乔夫在一开始就为之努力表示怀疑。“北约将(向东)移动，他会得到一些保证。这是留在北约的代价”。苏联军队留在东德的想法并不能使我得到安慰。虽然梅左维基想要他们停留，但我不认为波兰人民会长期支持这个想法。但我真正想要的是科尔的坚定承诺，西德将为一个统一德国寻求成为在北约的全权成员。对科尔来说如何解决东德领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这就是我有一个小组在这儿参加讨论的原因，”我说，“根舍不在这儿，他们的大使也不在。这儿是布伦特、我和吉姆·贝克。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对政党问题能够讨论得更为充分……为了赫尔穆特·科尔的成功我们还得承受很多风险。”

我问撒切尔关于密特朗的想法。“我们讨论了，”她说，“就个人而言，他的担心与我们一样。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德国人在和平中将得到希特勒在战争中未能得到的东西。他坚定不移地主张奥得—尼斯线，法国人对德国的支配地位心存恐惧。他们对西德不是先提出其他问题而是迅速促进统一感到担心。我们在渥太华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因为人们认为将会出现与大多数人不和的巨大的内陆势力。把德国固定在欧共体是不够的——它也许会成为德国的新帝国：未来的帝国将是经济帝国。”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撒切尔这番话对她的位置而言是相当世故的，但是她的关心仍很明显以及——对我显得——很焦急。她不喜欢中世纪欧洲的大德国概念，对重新统一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影响感到担心。她熟练利用波兰边界问题暗示德国也许根本没有改变，她把她的关心与他们的相互支援联系在一起。

她的语气又缓和了许多，但我并未从内容中得到多少安慰。我们政府中的大多数都坚决反对让苏联军队仍留在东德，它会推迟或阻碍重新统一。当然切尼与我也反对，总统也是这样，我们努

力工作想使苏联军队离开东欧。贝克也许是个例外。他似乎因谈判策略的缘故愿让他们暂时留下来,以作为得到莫斯科支持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的手段。我也对撒切尔支持东德非军事化感到沮丧。最后,她的加强欧安会的言论也使我担心。她似乎出于好意,但我看得很清楚法国似在寻求以欧安会替代北约。这个观念不可接受,因为以北约对苏联的战略具有中心地位,对我来说还因为共同的安全,以国联和联合国为例,到头来都不安全。

乔治·布什

布赖恩·马尔罗尼支持重新统一但有所保留。"我个人关心的是促进德国统一的似乎不仅是两个国家合并在一起的合理愿望,"他说,"而且还有一国经济的全面崩溃和另一国的经济实力。我告诉根舍你没真正谈到这里的合并,这是一次接管。"他预言统一的真正问题会进一步表现出来,如在共同市场领域。"欧洲共同体可能不再是人们心中的伟大力量。"他说。我把这些视作得另外解决的头痛事,但是我并不真正为此担心。

我向布赖恩说起我们关于允许苏联军队留在东欧的建议,"虽然我们对此并不满意,但如果我们想努力使德国迅速稳定,那就得默许或提议苏联军队留在德国,"我说。"这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反对的。"马尔罗尼反应强烈:"公正地说,我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够接受这些。对德国统一来说最低限度的和平应当是完全的北约成员身份和所有西方组织的完全支持及对美国在同盟领导地位的完全支持。我对根舍指出……我告诉你:我们不想出借我们在欧洲的席位,我们为之付出了代价。如果人们想要知道加拿大如何为欧洲的一个席位而付出,他们就应该清点在比利时与法国的那些坟墓……北约已带我们走得这样远,同盟的巩固将会把我们带得更远。"布赖恩一矢中的。

我在戴维营会议反对科尔的理由很简单:协调统一的道路,把德国留在北约,宣布奥得—尼斯线。这或许是一个德国的总理首

次在戴维营，我期望带科尔参观那个地方和进行一些轻松的谈话。

2 月 24 日之晨阴郁、黯淡、寒冷。山上的气候更冷，地上覆盖着厚厚的雪。冷风凄厉，芭芭拉与我紧裹着皮夹克，向科尔及其妻子汉乐洛尔致以问候，他们是乘总统直升机到达的。他们由吉姆·贝克（衣着华丽，红法兰绒衬衫和牛仔靴、牛仔帽）与布伦特陪同，他们相遇于道尔斯机场。芭芭拉与我开高尔夫车送科尔与汉乐洛尔到他们的别墅去梳洗。

两居室的戴维营"小屋"，虽然不算精心制作，但还是非常舒适的。每栋别墅都有一个烧火的地方，在科尔到达时，烟雾正从烟囱冉冉升起，表示欢迎。我们告诉科尔衣着随便在这种天气是很正常的，会议与活动的日程和时间表可以按他们要求安排。我总是不愿意让一个被飞机搞乱生理节奏的人按照死板的时间开会而难以保持清醒和活力。在小屋社交中心劳莱尔别墅一次气氛热烈的午餐之后，我们转移到镶着木头的大卧室里。

科尔描述了在东德发生的事件以及他如何看待正在进行中的德国统一。"发展是如此戏剧性以至我几乎不能相信，"他惊叹着，眼睛放着光芒。"东德共产党像一间纸屋子一样崩塌了。"莫德劳政府 2 月份实际上已瓦解，其领袖已不知道如何重新得到信任。"2 月初到现在，约有一整个城市的人离开东德，"科尔挥着手说，"我们必须劝这些人留下。东德的生产率在急剧下降，每一个人都要求付德国马克，短缺在迅速扩展。前东德官方的腐败产生了灾难性结果，一年前东德最重要的 15 位官方人物有 10 个在监狱里，他们曾经是领导。在这个国家其余的人中腐败也在蔓延。"

"三周前局势就是这样以至于我得出结论我们该做些别的事情，"科尔继续说道，"我们得改变我们的计划，我们现在需要货币统一。"他知道在选举之后东德政府会要求波恩把钱输入国家企业。他将只得说不，局势过于严重，不能按计划投资。工业发展需要有更大的行动。"他们的电话系统没有工作，铁道是一种灾难，

环境一团糟，包括两个危险的核反应堆——比切尔诺贝利的设计更糟。局面是灾难性的，所以我必须快点行动。我必须坚持选举后我们立即转向市场经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科尔放下波兰边界问题。“边界问题不那么严重，”他微笑着宣称，“对待朋友我可能是最诚实的。今日西德85%到95%的人都赞同奥得—尼斯边界，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将是边界。那个构建戴维营的人，罗斯福先生从来不被德国人所欢迎。波兰被推向西方，德国人被赶了出来。这是对纳粹罪行的反应，但是受影响的德国人是无辜的——这是1 200万到1 400万人，1937年时的德国1/3被割去，1945年200万德国人在逃离东欧时被杀。我们得在我们国家处理这个心理问题。”

科尔说得消除波兰人对1 000公里边界的疑虑，但是他们得理解决定必须来自一个由全德议会批准的条约。他坚持认为他与西德的行动都不可能代表一个统一德国，但承认他的工作必须满足波兰人的希望。“问题是波兰人会要求赔偿，”他说，“我知道那是不可能接受的。我们已付了1 500亿马克给波兰、以色列及一些个人。我们不能再付了，战争结束50年了。”

为采纳华沙和其他一些人的建议，把波兰包括进“二加四”会谈，科尔提出一个不同的附加条款。“如果我们协调美国与东德的关系，我们可以与波兰面对面解决问题，不是通过参与，而是通过协商，我愿帮助梅左维基，但是‘二加五’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坚持‘二加四’，但必须有与波兰协商的机制。戈尔巴乔夫对奥得—尼斯线不感兴趣：他不想波兰公开它的东部边界问题。苏联还有原波兰城市。”总之，科尔提出由美国调停。

他向我再次保证德国不想中立。“统一的德国将是北约组织的一个成员，”他为强调敲打着椅子的扶手，坚决地说，“然而，德国的北约成员资格需要明确限定，我们也需要一个过渡期。北约联

盟，包括为北约服务的国防军都不能驻扎在东德的领土。"与此同时，他不希望苏联军队无限期留在东德，因为这损害了德国主权。

他头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个烦人的念头。"如果西德是北约的一个成员，我们是不是应该像法国那样呢？"[①] 他问道，"这个新德国出现德意志军事统一会怎样？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我们并不想要任何全德国的特殊军事状态，如1918年以后所发生的那样。这就是北约的重要性所在。"科尔又说我们也得思考美国在德国的核力量以及如何看待在东欧的这些武器问题。

我很快作了反应。同盟中有一个有特殊安排的法国，这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德国在北约的观念绝对至关重要。"我提醒他。我又说有时他忘记与我们较小的北约成员商量，根舍在渥太华对意大利人的评论于事无补。他承认问题并试图修补与安德烈奥蒂等的关系。"有时我对弗朗西斯·密特朗也这样，"他说，"他很固执。大多数法国人都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法国的政治传统是反对我们。"丹麦、挪威、荷兰仍然是问题。至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关于她我不能做什么，我不能理解她。"帝国已崩溃（而）德国仍好战——她认为联合王国已付出巨大代价，现在德国人又回来了。"

"我们不能这样看，"我回答道，"我们不怕过去的阴影，撒切尔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商量，承认我们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作用。"我告诉他那天我打电话给撒切尔听取她的意见。

"东德的德国人有气，因为我们作为可靠的参加者已20年了，"科尔解释说，"为何不帮一帮它呢？"我告诉他美国能够并愿意帮助。当他说德国会以完整的成员资格留在北约时，他们信服了。他也会重视强调波兰边界以及美国在德国的核武器，我以为这些都是我们当前的重要问题。德国没有这些武器就很难劝欧洲的其他国家留有它们。而且，我们的公众视核威慑为我们军队的防护。

---

① 法国是北约成员，但并未加入其军事框架之中。

如果我们失去这些武器，让这些军队留在欧洲的国内支持就会减少。

科尔回答说他希望美国留在欧洲，不仅在军事方面。"我想消除欧洲军事堡垒的看法。"吉姆指出北约就是美国军队在欧洲的存在理由。"我们不可能让美国在欧洲的军队驻在一个不是北约完全成员的国土上。"他提醒科尔。科尔推想能使苏联同意成员资格的东西也许"以钱的问题来完成，他们需要钱"。我告诉他我希望改革成功以及好好开一次美苏最高级会议让戈尔巴乔夫放心。然而，"苏联人并不能决定德国的北约成员资格。让我们着急的是德国不得留在北约的议论，让它见鬼去吧！我们胜了，他们没有。我们不能让苏联在颓势中控制胜利"。

科尔敦促美国在"二加四"的范围之外就德国在北约的完整成员资格与苏联人对话。"这样（他们）就会理解美国和东德全部协议没有任何花招，"他说，"苏联就会更愿意对你说出换得他们同意的真实价格。"莫斯科想要一些东西作为回报。"你已经到钱袋里了。"我开玩笑地说。

在讲了很多话以后我建议绕着戴维营作环形散步。科尔声称他对散步很热心。我们迈着矫健的步伐，沿着栅栏旁的小道前进。他对户外活动明显喜爱，但是可以看得出他还未从欧洲的长途旅行中恢复过来。风已减小，但午后的微风仍有些冷。科尔走得很惬意，直到我们来到一个很长的陡坡。爬到半山腰，我们对他能否到山顶产生怀疑。这位被飞机搞乱生理节奏的总理被大大激怒，坚持着上了山顶。我们立即授予此山坡为"赫尔穆特·科尔纪念峰"。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来到戴维营可爱的新教堂出席一次礼拜仪式，这对布什一家来说一直有很大吸引力。基地上的所有海军人员都会合家而来。12人的唱诗班由志愿者、官员及其配偶组成。一个船上牧师主持了简单而感人的仪式。给这个特殊日子增

加意义的是我们与德国总理肩并肩，一起请求上帝祝福我们的工作。家庭赞美诗自选，科尔与其随员用德语一起唱。

礼拜后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讨论，科尔想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二加四”之事。两个德国在选举前不能进行谈判。“我们不能与莫德劳政府谈判，”他说，“它没有地位。”贝克提醒他说同盟在为协商紧张不安，并解释说我们正在考虑与莫斯科谈判前在美国、英国、法国与西德之间的讨论。“（它）会有助于减少英国、法国以及北约其他成员的焦虑，特别是我们如果让北约组织了解这些讨论的情况下”。

“好像我们在瓜分欧洲，让我们发誓决不离开我们的联盟。”我说。我问他认为重新统一最终将在什么时候实现。科尔只能猜测：也许是年底。与政治过程相平行的是货币的统一，这也需要做很多工作。“我不想热得过快，部分地因为别人的担心。所以德国统一也许在明年”。

科尔预言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最高级会议期间会固守他关于德国的底线。“戈尔巴乔夫希望与美国人就武器控制的主要协议与进展和总统作出一个现实的选择，”他说，“那不会是‘二加四’，只是戈尔巴乔夫与总统。”

“戈尔巴乔夫已经得到了面子和声望，”我回答道，“这是关键。”

“这支持我的论点，”科尔说，“他想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打交道的中心问题是德国在北约的成员资格。最终，戈尔巴乔夫会对总统作出让步。”

在我们讨论的最后，霍斯特·特尔奇克提出东德领土的地位问题。他指出在谈到北约和东德领土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使用“管辖权”而是用“影响力”。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差别：“管辖权”涉及根本的联盟责任（我们不想妥协），“影响力”的定位却不。贝克同意。“在我认识到它将冲击北大西洋公约第 4 条和第 5 条之前我曾使

用术语‘管辖权’。”他承认。科尔建议我们公开宣告此观点。

在我们共同出席新闻会议时，我清楚地阐明我们在德国北约成员资格方面意见一致：

>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一个统一的德国应当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全权成员，包括加入其军事结构之中。我们同意美国的军事力量应当作为一种维护长期稳定的力量留驻在统一的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总理和我也同意在这个统一国家的东德领土应当有特殊的军事位置，即它（东德地区）会考虑所有相关国家包括苏联的正当的安全权利。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认为会见已取得很大成功，虽然不是每件事都意见一致，但总统与总理的关系确实得到了巩固。在统一形势突飞猛进之时我们之间亲密无间忠诚合作，我觉得确实帮助巨大。有几件事特别给我以震动，首先是科尔对东德的描述。东德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发电站，它是间谍活动、恐怖分子培训、输送武器到左翼和反美政权手中以及以经济援助支持共产主义国家的前沿阵地。我们怎样才能远离这个影响呢？也许国内的腐败是这种国际侵略所付代价的一部分。

我很高兴总统迅速而坚决地抛弃德国在北约的作用像法国一样的观念。对我来说科尔是认真的或只是简单考察总统在北约问题上的态度还不太清楚。如果是后者他无疑改变了。然而，东德领土问题仍然存在。

我对科尔在后来的新闻会议上回避边界问题感到失望。第一个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认为存在着最终的边界，他对此论题不够坦诚。“根据我们国际的立法情况，只能是人民自由选举的议

会——从而政府决定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他能够通过声明来解决它,而只有一个统一的德国能合法地确定边界,波恩坚决支持奥得—尼斯线。他躲躲闪闪因为他仍想得到西德右翼的支持。

乔治·布什

戴维营会议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密特朗和撒切尔。"关于边界问题,我相信科尔的沉默是个错误,"密特朗说,"科尔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他应当使用外交辞令。他必须承认奥得—尼斯线。然而,因选举的原因,我不相信他会这样,我告诉科尔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事实上欧洲人一直因战争而对德国有戒心,虽然他们也许隐忍不发。社会民主党可能赢得 3 月 18 日的选举。如果这样科尔继续保持风头就很难了,他就会对开放最感兴趣。"他认为科尔失误在这一点即不应是德国来查证边界。"胜利者应当有发言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英国、法国和美国在这一点上必须是绝对清楚的。"

他对自重新统一的话题开始以来法国军队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愤怒。"我指示法国驻柏林大使组织一次游行,柏林人要求取消这次游行!"密特朗希望搞清楚联盟的位置。"我们在德国是为了西方世界以及为保卫德国。如果我们只是征服者,而不需要留在德国,我们就不想瞒着人民,愿意苏联留在东德。我们谈起德国人的统一,这是'二加四'。当我们谈到边界时,它是'四加二'。我想你知道我的思想。我也想要你们心中有东德的位置……我们不必抑制我们国家对赫尔穆特·科尔的国内政治态度的战略关心。所以这些都发展很快。我们不相信苏联会从舞台上消失。"密特朗并不感到高兴。

撒切尔对科尔谈到北约成员资格感到高兴,但她仍不喜欢波兰边界问题。我理解密特朗的保留和她的观点,但对结果有信心。我相信科尔会承认奥得—尼斯线。我耐心听取他们的担心和保持对他们关心的关注。但我不会被劝离在我看来是最好的进程。

2月28日我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他对我关于戴维营会议的描述并不感到特别高兴。他对科尔躲闪边界问题感到不快以及不喜欢在欧洲安全的范围内谈论德国的未来。“你说你与科尔已经相互理解。我必然对你失望——我们对科尔总理还没有共同的理解，”他认真地说，“你说应当没有人关心这些变化以及一个统一德国的威胁。但是，如果这样，如果你相信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不是威胁，为何西方国家想把它们结合进一个联盟呢？如果我们发现这会对苏联有消极的影响，我们就得长时间考虑和难以接受它。”然而，他对我打电话告诉他讨论的情况感到很高兴，并要求我继续这样。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戈尔巴乔夫的语气是友好的，但“长时间考虑和难以接受它”的用语无疑具有不祥的性质。他并未踏上布什—科尔列车。密特朗有些令人惊讶的情感爆发——众所周知的法—德密切关系——这对科尔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们能够做多少来消除这些有待揭示的根本忧虑对我来说远未清楚，虽然科尔对边界问题即将作出的声明肯定会改善气氛。

东德选举已经临近，我们对结果都有些紧张。根据东欧的经验，东德人或许会抛弃集权制度。然而，既然东德已“社会主义化”，就有理由相信大量投票将集中于社会民主党。实际上美国与欧洲的许多观察家普遍这么认为。我从未奢望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胜利。

乔治·布什

科尔在选举前夜打电话给我，态度谨慎乐观。他希望结果会带来一个“合理的联盟”，至少从复活节开始一个新政府，然后开始统一货币工作。他允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重新统一都会成为事实。应当与波兰人商量，在所有与他们相关的领域。他再次允诺西德与东德的议会将宣布达成协议，一个全德国的政府会立即缔

结一个国际条约。然而,他不想谈及在华沙对此问题进行的一次“二加四”讨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能够直接去‘雅尔塔’。我不想这样。”我将很快会见梅左维基,以及答应在此之前与我们的高层人士讨论他的思想。

如果对东德的崩溃及其人民对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渴望已成为重新统一的推动力这一点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东德选举可使其停止。选举投票率超过93%,其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48%的选票,社会民主党的得票仅为22%,改了名的共产党——民社党得到了16%的选票。

该结果震动了所有的相关政党。这个结果意味着科尔的同伴将控制东德议会400个席位中的193个。由于科尔的推动,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袖和新总理路沙·德·梅耶尔声称他在竞选期间就致力于迅速实现按照宪法第23条的重新统一。在几天之内他宣布全力支持重新统一,并提出7月1日作为货币统一的日期。两个德国之间关于经济与社会统一的谈判紧随政治的全面统一立即开始。重新统一的“两个方面”之国内方面已经解决。现在是我们转过来解决国外的和国际一面的时候了。

第十章　欧洲新貌

东德选举对于围绕重新统一"外部"方面的外交活动之影响是戏剧性的，它明确结束了苏联想通过忠顺的东德政府放慢统一进程的任何希望。对莫斯科来说代之面对的是一个急切希望加入联邦德国的东德政府。苏联现在政治上孤立了。然而，我们继续与他们协商和完全把他们当作伙伴，而不是把我们想要的结果作为西方的条件简单提交给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选举的结果对于西方同盟来说也非常重要。特别是，英国承认重新统一现在是不可避免的而接受这个事实，并开始认真为有可能最好的结果而工作。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我们努力让德国留在北约以及消除重新统一对联盟冲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盟更加巩固，消除了苏联想在"二加四"谈判中分裂西方的进一步机会。法国与英国对德国人热情起来，不再坚持问题的解决应当包括一个和平条约。他们也同意我们将"二加四"的范围限制在同盟权利和类似的"特殊化"问题，以防止苏联扩展的计划。

乔治·布什

我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惊讶和高兴。假如社会民主党赢了，我认为联邦德国在北约之外的风险将大得多。科尔本人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些结果。他身系德国的统一大业以至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和对统一的推迟或许都会损害他在即将到来的西德选举中的政治前途。但是科尔为帮助组织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力量而努

力战斗。工作有了进展，再次证实他的担忧没有道理。

5月20日，我打电话给科尔向他祝贺："你的选民棒极了！""这是艰难和严峻的时刻，但是它值，"他说，"你心中必须牢记这些人正处在困难时期，上一次自由选举是50年前。从1961年柏林墙树起来以后，这个国家与外界没有实质上的联系，工人投票支持我们。如果我们的行动正确，五年内或许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能走好。该结果对北约问题也非常重要。如果左派赢了，我现在就会发现支持率完全不同。所以我很愉快。"

布什总统与科尔讨论在同盟团结方面留下的一个棘手问题——波兰边界。对任何不喜欢重新统一前景的政府来说它成了一个抨击点。5月8日，在西德联邦内部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科尔向联邦议院宣布了分界线，即如他在东德选举之前在电话中对布什总统所描述，两个德国都将肯定波兰的边界，但条件是波兰宣布补偿和尊重剩余的少数德国人的权利。在重新统一之后将缔结一份肯定该边界的条约。然而，波兰人却不太容易平息。5月9日总理梅左维基说服密特朗公开号召在统一前签署一个德波条约，形势变得严重。梅左维基准备访问华盛顿，总统提出调解。

乔治·布什

我向科尔阐明我想与梅左维基说的内容，并询问他的想法。"我要告诉他你一再向我保证的东西——以及我相信你——当前的东德与波兰边界应当是永久的德波边界。"我说。我也支持波兰参加"二加四"的谈话，只要内容涉及到波兰。

科尔想让两个德国政府都写信给梅左维基使他放心。"让我们作进一步的讨论，这是不公开的：我准备和愿意与梅左维基达成一个最终的文本。"我问他我们是否向波兰领导人提及此事。"如果你认为这是有益的，如果他并不公诸于众——以及向你保证他

不会这样。"科尔回答说。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不能确信按科尔的明确提议行事是个好主意。既然波兰强烈地鼓励新闻公开，我们就不能再当波兰与西德公开争吵的中间人。我想我们应该让科尔本人决定在什么时候和采取什么方式，他也许想把此问题直接向梅左维基提出。

乔治·布什

5月21日我在白宫会见梅左维基。他因科尔和我在戴维营的联合声明对我表示感谢，该声明把波兰包括在"二加四"的讨论中。"波兰人对正在制定他们不理解的协议有些怀疑，"他告诉我，"对我们来说关键是保证我们的西部领土不是从斯大林那里得来的礼物——它们是由所有大国所保证的，而不是一个人的单方面行为。"

梅左维基重复说他想要一个文字的条约，在统一前酝酿，然后俟一个全德政府成立即由它来签署。我解释了科尔的政治问题，并大力敦促他信任科尔在宣布当前的边界应当是永久性边界时所说的话。梅左维基对我说他很尊重科尔——问题不在这位总理而在于一个统一和更强大的德国会采取什么立场。这就是他想预先得到保证的原因。

"相信吗，如果可能我现在就使科尔同意与你达成一个书面的协议？"我问道。"现在不要回答，请相信。如果有助于促进该过程，我会试试。"梅左维基指出他对此想法的第一反应是积极的，但是他还必须研究它。

事实上，我误解了科尔提议达成一个书面协议的意思。我以为他意指一个最终的德波条约的文本。然而，在接着而来的电话中霍斯特·特尔奇克向布伦特明确表示科尔提议的是两个德国议会对该问题的共同文字宣言。

5月23日我对科尔解释说明情况，科尔说误解不算严重。我

告诉他我已提出向他询问是否考虑与梅左维基一起制定一个文字条约。“……我只请他保持信心，”我说。“它是作为乔治·布什的思想提出而不必考虑你与我在此问题上已说过的话。”科尔说我们能进一步发展这个思想。“坦率地说，你这里所提议的是他认为只有德国才能做的事。”然而，他不理解，为何梅左维基不拿起电话直率地说。“我会告诉他我不会过早地签署条约，”他宣布，“没有人强迫我。但是我仍想帮助他。如果两个德国议会和两个德国政府都这样说（接受奥得—尼斯为永久边界），那就没有理由设想他们的态度会在两年内发生变化。”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有了这些讨论，边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布什总统对该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提出已经引起了注意，他使双方都达到一种理解，结果他对科尔意图的“误解”促进了一项解决方案的提出。他得到科尔从两个德国政府角度对波兰的允诺，两国之间将制定一个有关未来的“关键的”文字条约。

整个争端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是，当联邦德国决定根据东德的德·梅耶尔政府接受的第23条吸纳东德时，边界问题已无实际意义。一个统一的德国只是联邦德国的扩大，它有着现存的法律，因而仍受束于原有的对奥得—尼斯线的法律承诺。但是没有人想联系第23条解决边界问题。我们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最重要的国际争端在于——劝苏联接受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如果我们有任何机会使他们相信这不是形成威胁，我们就必须指出联盟本身的性质是在怎样发生变化。对我们来说已有实际的理由重新考察北约的使命与战略：紧张局势的缓和与苏联对华沙条约控制的松弛。重新统一也使与联盟有关的现存问题变得复杂，如延缓短程核武器现代化问题与削减常规军事力量的谈判。

2月我们开始认真讨论我们想要看到的北约未来会是怎样，

总统命令对我们的北约战略作一次全面的再评估。我们把一个专门小组,即由鲍勃·盖茨领导的欧洲战略指导小组集中到一起,分析实际问题。第一个难题是短程核导弹问题。在前些年的北约最高级会议上联盟已同意在常规武器条约签署以后进行有关短程核武器的新的军备控制谈判。从那以来,该问题完全被搁置一边。在我们不对称地削减常规力量之时,短程武器作为抵消华沙条约数量优势之手段的重要性已告消失,早在1990年我们就开始担心国会不为装备现代化拨款。取消现代化在军事上是可行的,在政治上也是有吸引力的。然而,正式的磋商会在德国引起公众关于导弹的未来存留问题的争论,从而给支持统一德国中立的人以口实。我们得找到一个方法结束完全是同盟内部的争辩和避免国会简单地宣布现代化终止。我们修改的计划是在国会行动之前取消现代化和自动提议在正在进行中的常规武器条约完成之后讨论短程武器控制。

我们也得估算适合一个统一德国的武装力量常规武器的新界限。我们知道德国军队的上限对于苏联至关重要,他们希望见之条约。然而,凡尔赛将这样的"特别待遇"强加给一战后的德国军队,而引起很大的怨恨。西德与美国都能接受国防军的一种上限,我们希望它的界限定在所有处于双边同盟中的国家军队限度内。

所有这些问题都影响重新统一,特别是北约成员资格的谈判。因此,我们想在联盟中尽可能快地把它们解决——它需要举行另一次北约最高级会议,宁早勿迟。在4月初,贝克、切尼、斯考克罗夫特和鲍威尔建议对取消短程核武器的现代化秘而不宣,以及总统在一次演讲中提议举行一次北约最高级会议。这个计划雄心勃勃,因为它唤起对最高级会议的预期,从而给我们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关于这次会议曼弗雷德·沃勒已有提议。

关于北约的未来、美国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加强西方对德国在联盟中完整成员资格的支持,我们有必要与我们的主要盟友商量。

"二加四"的首轮谈判定于5月5日于波恩举行，我们想把讨论的议题集中到联盟权利，不讨论德国在北约的成员资格和类似应当留给德国人自己讨论的问题。总统与根舍谈起一些他4月4日在华盛顿以及我们更早与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讨论过的问题。在4月中旬我也与撒切尔和密特朗举行了会谈。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波恩联邦内部关于北约成员资格性质继续有不同意见。在东德选举之后的5月23日一次演讲中，根舍推测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都会很快萎缩，暗示把东德的位置留给一个统一的德国，即在北约之外和在一个仍然不明确的欧安会安全结构之中。科尔被他的外交部长大大激怒了，因此改变了他与根舍以前的稳健立场，而公开接受斯托尔腾博格的论点，即整个德国都在北约，以及德国军队能够在东德领土驻军。在我们4月4日的会谈中，根舍改变原来的立场，更积极地谈论北约组织的未来作用并推测如果某些条件满足苏联可能接受一个统一德国的北约成员资格。这些变化受到鼓励，但根舍的外交部官僚在一段时间内仍继续说东德可以留在北约之外。像科尔一样，根舍也预言即将召开的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最高级会议对于解决此问题很关键。至于"二加四"，根舍支持我们很有限的议事日程。

当总统于4月13日在百慕大会见根舍时我相信我们会得到英国的支持。我们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目标与经济利益几十年来一直很相似，我不希望我国与英国的现存关系将会由于冷战结束或德国重新统一而改变。从40年代后期即杜鲁门政府时期以来，美国开始承担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传统的"平衡"角色，英国期望我们反对苏联的威胁，以及增强他们在欧洲及更大范围内的发言权。我们不会允许新的挑战，我们关系的推进与合作的精神会一如既往，特别在改革后的苏联如果最终恢复元气而扮演积

极的全球角色的情况下。

乔治·布什

在百慕大，我告诉撒切尔我们想让“二加四”的议事日程更集中，以及在每个会议前密切磋商。她表示同意，但敦促我们确保这些谈判不要被防御问题所干扰，像我一样，她宁愿在其他会议处理这些问题。我告诉她曼弗雷德·沃勒建议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以及阐明我所认为新的北约宣言能够包括的内容，如对我们的使命与战略进行再评估。她很热心。我们都想保留北约作为西方防御的核心，并相信联盟能够在大西洋地区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她相信未来的北约会承担防御的责任，而欧安会将会是东西方的政治论坛，一个与东欧对话的地方。我们仔细检查短程核武器文件，我要她放心我们仍然答应在欧洲留有军队，但是国会不会投票赞成为短程核武器的现代化计划花钱。我想宣布取消它。

撒切尔说科尔个人对在德国土地上保持常规的和核军事力量绝对是坚定的，但是我们需要德国人民公开同意在那儿保留核武器。“我同意那里不搞（现代化），因为德国人民不会同意。”她抱怨说德国人“失去了防御的欲望，德国政治变得朝向左派而不是我们。但是我并不悲观地认为我们会失去德国。我认为我们能（使它）留在北约，以及在那里驻扎西方的常规军队。我对核武器没有把握”。她觉得如果我们能在（全）德国选举之前召开北约最高级会议将会有助于科尔确定他的责任。“我认为北约最高级会议对于公众舆论是决定性的”。

撒切尔认为苏联最终会认为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力量乃是维护其稳定的力量，即如我们看法一样，但仍会主张我们应同意苏联军队留在那里有一个过渡期——它将对戈尔巴乔夫的军队有利。“我不同意，”我回答说，“我想让苏联军队回家。”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总统在这次会谈后于 4 月 19 日在芝加哥与密特朗进行了类

似的谈话。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次关键的会见，如果我们想恢复“肯尼邦克波特的精神”的话。从1989年5月以来美法关系在恶化，虽然没有波及两国总统的个人关系。我相信这或许导因于我们对后冷战时代的欧洲及美国在其中的作用看法有着差异。

法国多年来是一个有价值的盟友，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与英国的热火或协调一致。法国长期以来对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有着矛盾心理，在欧洲事务方面视我们为部分的对手以及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声音。在冷战时期，强烈需要美国军队作为反对苏联威胁的平衡力量，法国支持美国介入欧洲与北约，虽然60年代在戴高乐领导下从统一指挥的结构中撤出，反应了他们对美国作用的不满。现在威胁消除，我认为法国最可能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军事存在需要消失，还有我们在欧洲事务上的发言权。这将给法国提供一个加强他们在欧洲影响的机会，基于一个由法国支配的德法协约之上。

由于德国的重新统一越来越显得不可避免，法国关于欧洲未来的观点似乎开始陷入错觉，至少我以为如此。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会盖住法国，也许还有整个欧共体。我希望巴黎会承认这些实际的变化，修改其战略，也许转向美国与北约以之作为对一个扩大了的德国的抗衡。然而，法国似乎走向了相反方向。他们反对为欧安会最高级会议发展一种共同的西方立场，反对北约关于“二加四”的协商以及在西方盟国确立一致的立场，反对扩展北约领土的任何尝试。美国似乎长期不注意法国自己对欧洲的打算。这些打算主要表现为设想这样一种欧洲概貌，在其中北约的作用将停滞，或甚至消失，西欧联盟作为欧共体的防御体系将逐渐负责欧洲的安全。

我希望总统能够在芝加哥向密特朗提出这些问题，希望能够停止或改变我所看到的法国消极倾向。他在会谈前夜致密特朗的一封信中提到这些要点。它强调密切的美法关系对于当前欧洲的

巩固至关重要，以及总统决定美国仍对欧洲深负义务，包括有效的军事存在。北约内部关于“二加四”的协商是重要的，不是让北约组织成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指导的论坛，而是给盟友一种安慰感。总统为“二加四”概括了我们限定的议事计划：“结束战争的遗迹，恢复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德国的主权。”关于其安全我们应当给苏联一种放心感，但是不允许其操纵“二加四”的过程。该信件进一步强调加强北约，提高其政治作用，以及宣称北约、欧共体与欧安会都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这是一个有力的信号，我们希望当信号传及密特朗时他会以一种相互平等的方式看待它。

乔治·布什

结果表明，芝加哥会议是令人愉快的，没有对抗。我们的第一次会议只有我们四人——布伦特和我以及密特朗与雅克·阿塔里。没有议事日程，大多数讨论集中于北约的未来。统一问题本身只是简单讨论。至于“二加四”的目标，密特朗对撒切尔与我上周在百慕大宣布的严密时间表表示满意。像撒切尔一样，他对苏联在此问题上的焦虑有些担心，认为东德不应有北约的军队。

在我们讨论北约时，我解释为何美国留在欧洲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留。“我们并不寻求在欧共体会议桌的第13个席位，”我说，“欧安会不可能保护欧洲的安全，但是我们看到北约的作用在扩展。”密特朗发现北约的作用已经很大。怎么才能使之更大呢？“它将维护稳定，”我说，“它的作用会不同，其组织必须灵活。”

“战争的风险已经减少，”密特朗回答说，“苏联保留其联盟有困难，东欧不再是敌人。不过，仍有一个威胁。戈尔巴乔夫也许会制造某些险情，如果他为情势所迫的话，所以我们作出维护我们安全的安排，苏联并不放心。”一个超级大国处在弱势是危险的。美国应对所有影响欧洲均势的问题有个说法。“北约是讨论有关欧洲安全和均衡问题的有组织论坛。”

密特朗同意我们能保证北约、欧共体和欧安会相互补充，并建

议我们在外长层次经常进行部长级的联系讨论政治问题。这样一种计划欧共体并没有完成。“欧洲大于欧共体，”他说，“东欧也不知道向何处去。它们只得像乞丐一样来到欧共体。”所有这些耗尽了一整代人的时间，他说：“人们说我不希望美国再留在欧洲：这就完全错了。我想美国人应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告诉他如果北约不能发挥一种新的作用我们就不能使美国留在欧洲。密特朗提议召开一次北约最高级会议讨论此问题——这对我说来可谓正中下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会议满意地解决了我们关键的合作目标，它使我们一起完成当前的任务。但是我的关心并未减少。密特朗插入的讲话意使北约保持发挥传统的作用——防止苏联对西欧的大规模进攻。准确地说这并不是我们所想，这肯定会导致联盟的萎缩。我离开芝加哥时甚至更加相信美国与法国关于欧洲的未来和我们在其中作用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差异。

4月底，西方在“二加四”的目标上和德国在北约的成员资格方面或多或少取得一致。我们现在转向以这样一种方式策划北约的未来和欧安会责任的挑战，即让苏联相信没有来自它们或北约德国的未来威胁。既然戈尔巴乔夫在2月与贝克的讨论中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及其北约成员资格问题表现出矛盾的心理，如果我们能提供适当的刺激他就有可能被公开说服。

5月4日于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布什总统正式呼吁召开一次北约最高级会议。由于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变化应提出一种有广阔视野的北约战略观。它应强调四个关键点：北约在欧洲所起作用；联盟所需要的常规军队和常规武器控制目标；在新的武器谈判中以欧洲和西方的目标为基础的核武器的作用；以及最后，加强欧洲安全会议以增强北约与保卫现已统一和自

由的欧洲民主之价值。他也呼吁促进欧洲常规武器条约的谈判和宣布取消短程核武器的现代化计划。

在我们计划怎样改变北约和进行对苏联的促进之时，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考虑莫斯科会需要什么样的保证。他与贝克在纳米比亚相遇之时正是东德选举之后，他们讨论了德国问题。"二加四"有助于满足他们的一些关心，而苏联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他们现在焦虑的不是谁管理德国，而是德国的未来。谢瓦尔德纳泽说他们不可能接受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但是能够允许德国不必中立。"坦率地说，"他说，"我们不知道此问题的答案。"贝克仔细考虑了支持德国加入北约和美国在那里存在的逻辑。谢瓦尔德纳泽说他并未询问美国军队现在或未来存在的价值：事实上，在东德的苏联军队毫无疑问是暂时的。他说，问题是美国在德国的军队也难以保证：他怀疑五年、十年后的下一代德国领导人会仍然要他们。

但是当阿德米内尔·威廉·克罗5月在莫斯科与瑟盖·阿克罗米耶夫相遇提出德国北约成员资格问题时，他的反应远比苏联外长的态度严厉：这个差别反应了莫斯科的资深领导人所掌管部门的态度。阿克罗米耶夫那次读着克罗的电报，谈起他的反对意见无所顾忌。他坚持说这事苏联不可能接受，对人民来说它也不可能被接受。他指出所有苏联家庭都有关于二战时德国人的记忆，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关于德国进入北约，谢瓦尔德纳泽比这位元帅似乎更有灵活性，但他也深深担心苏联改革的未来和戈尔巴乔夫对权力的控制，两者都会深刻影响重新统一的结果。自2月以来，谢瓦尔德纳泽发现自己在改革和外交政策方面受制于军队和党的保守派，而不能有与西方签约的任何灵活性。4月，他在外交部对共产党委员会的成员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演讲。他抨击对党的愚忠及沉迷于拥有东欧的权力，宣布现在苏联惟一的目的应该是确保改革的成功。他警告说，如果没有改革，"就可能有专制"。他呼吁德国问题的解

决将会"被苏联人民所接受以及给他们以信任,不会有新的军事威胁"来自德国土地。他宣布:"苏联必须寻求一个使用欧安会的新的欧洲安全框架。"

在5月4日波恩的一次"二加四"部长会议上,谢瓦尔德纳泽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提出任何条约都应当解决德国的联盟成员资格和四大国军队的地位。要进一步确定四大国占领军的范围,以及确立德国国内政治的规则以防止纳粹主义复活。可能不要什么北约成员资格,而代之以加强欧洲安全会议。波兰必须加入边界讨论,德国必须放弃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

谢瓦尔德纳泽接受西德基本法第23条为统一的方法,意味着现在苏联同意东德加入西德,但是他提出其外部的方面和内部的方面应该是"分开的"。统一会取得进展,但外部问题的解决(安全问题,这是问题的核心)将被延迟,直到欧洲的安全结构的发展能够对联盟作出重新安排。四大国的权利在统一后仍然存在。总之,谢瓦尔德纳泽要求继续把统一的德国特殊化——中立和在联盟体系之外——一个仍然受外部控制的国家。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谢瓦尔德纳泽是莫斯科的现代喉舌。

乔治·布什

波恩会议之后,我们与德国都致力于软化苏联的立场。5月17日科尔来到华盛顿,在那里他向我通报了最新的德国国内情况。"下周我正要去签署一个两德条约,有关经济与货币的统一。"他说。他认为完成它将要用14个月的时间,并预言在1991年2月进行全德选举。

他似乎非常担心在这些非常关键的"二加四"的日子里戈尔巴乔夫掌权的情况。关于苏联经济他描述了一幅阴郁的图画,并说戈尔巴乔夫在寻找美国和西德能够帮助的方式。他向我简要通报在提供经济援助之前特尔奇克花了几天时间去莫斯科做的一次秘

密旅行。苏联谋求从西方得到接近120亿美元的信贷。科尔预测戈尔巴乔夫会在华盛顿最高级会议上寻求类似的援助。我告诉科尔美国不能借贷给苏联，除非波罗的海的形势有了变化。“我的问题是：我们想帮助他还是想看到别的什么人在台上？”科尔回答：“我认为是他。”

他的顾问认为苏联军队可以接管吗？“是的，但不是用武力，”科尔回答。“将是有军事作后盾的一群文明人。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但波兰和其他人将会难过。”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许并不想在东德驻军，但这是苏联的一个国内问题。“它不像斯大林时代，”他说，“在国内他必须面对公众舆论。我认为他与你的会见将非常重要，不是实质而是现象。因为他作为平等的人与你站在一起。他有大问题，他的东德盟友说他们想加入北约。”

“我们将平等待他，”我坚定地说。“如果只有我们能够解决立陶宛问题……我们可能不会给他钱。但是我们还要提出宗教问题、武器控制等等。我们不想这次最高级会议犯一个错误。”科尔提议提前与戈尔巴乔夫讨论。“但是这应当在我们俩之间，”他说，“我的内阁不知情。”至于苏联在东德的军队，他计划让他们保留一个有限的时期，“如果必要的话”。

“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说，“我知道你的立场，但是我认为他们应该离开。”我说我认为我能让戈尔巴乔夫相信美国军队应该留在德国，“但是我必须知道德国愿意要美国的军队”。

“让美国军队到一边去，北约将会是什么样子？”科尔问道。如果欧洲人让美国人离开，这对每个人都是个失败。“记住1919年的威尔逊。”他说。

在布什与科尔于华盛顿会见之时，贝克于5月16—19日访问了莫斯科。我们希望获知苏联关于立陶宛、德国和武器控制的一些情况，但是任何问题都没有什么进展。似乎军方对戈尔巴乔夫

和谢瓦尔德纳泽有沉重的压力。谢瓦尔德纳泽甚至取消了一次晨会,我们本来希望它有助于澄清军备控制——特别是欧洲常规武器的进展。苏联领导层内部似乎显得僵化。

当贝克看到戈尔巴乔夫时,这位苏联总统作了一个包括苏美关系、东欧和德国重新统一的长篇讲话。戈尔巴乔夫直接与布什总统提出这些问题也许并不轻松,特别是财政援助。所以他选择贝克传递他的信息,发泄他的挫折感。这也许是个机会,这位信使和总统的密友会加强这个信息。他以一种很少有的方式展示他的思想,问道:"我们为何应当这样做呢?它对我们有何影响呢?"

戈尔巴乔夫认为华盛顿并没有真正把苏联当朋友,他暗指在东欧。"我们已与你们讨论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将根据我们的许诺而行动,"他教训贝克,"我已有消息,你们的政策是力图使东欧与苏联相分离。你知道我的态度——如果这些国家本身寻求分离,如果那就是他们想要的,那就让他们这样吧,就是 OK。但如果促使他们的是你们那就不同了。"

另一个例子是德国。"我相信你们对此的立场是暂时的,你对我们说两个德国都要和平,都要民主,以及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危险。"戈尔巴乔夫继续说,如果事情如此,为何不让德国人变成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如果我们说我们能够信任德国人,他们已证明自己值得信任,他问道,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们必须加入北约呢?"所以当你谈起一个统一的德国以及你说如果德国不在北约,那么就会出现问题,你实际上说的是你不相信德国人值得信任。"如果我们对把德国无北约成员资格当作对联盟基础的一个严重威胁作一次现实的分析,那么他就能够理解。"但如果你这样说,那么仍然有一个问题。因为你要说你继续需要一个集团,甚至在其他联盟消失时。"美国要说北约现在与未来都是必要的,因为苏联仍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这就是你们对北约论述的立场,那么我认为实际上并不一致:我认为它(与)我们试图以之为

基础建立关系的原则是矛盾的。"

一个在北约的统一德国意味着战略均衡态势的严重发展。"我认为你们必须问我们下一步逻辑上将会怎样,"他警告说,"……嗯,我们第一步或许是暂停所有的讨论,思考这种发展将如何影响我们的观念,如何影响我们的力量,对我们在维也纳欧洲常规武器会谈的观点应当有什么影响。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我在演戏,不是因为我想卷入一场政治争吵。我说这些因为我真的相信这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抱怨说苏联与我们分担他们的改革计划。然而,他对美国准备建立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那种理解表示怀疑。他疑心美国的立场实际不是做事,不是分担苏联的问题,而是孤立苏联,如果他们的问题变得更糟,也许对美国有利。

贝克试图让戈尔巴乔夫消除疑虑,说我们最不希望的是苏联不稳定。美国不谋求优势,也不玩政治游戏。至于不想帮助经济危机中的苏联,情况不那么简单。对政府来说在苏联自己仍在送上十亿帮助像古巴这样的政体时为送纳税人的钱作辩护是困难的。

戈尔巴乔夫反对说,美国在对苏联的努力设置障碍,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德国,已不再小心翼翼,而看到了合作的可能性。如果美国想对经济事务施加影响,那就定会使双方关系付出代价。"作为结果我们现在的合作关系将会减少,"他警告说,"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是危险的。"

对于一个值得骄傲的民族的领袖来说肯定处在一个困难的时刻,特别是与这样一位竞争对手打交道,戈尔巴乔夫说他会与布什总统讨论这个问题,苏联需要短期的财政援助。"我想最好的方式是我们需要输一些氧,"他说,"我们不是要求一件礼物。我们是要借贷;我们为特别的目的寻求特殊目标的借贷。我要对总统说的是我们需要150—200亿美元来渡过难关。"这对苏联来说是个小

数，但他说由于经济的变化他们不能尽快地积聚这样的资源。他请贝克告诉总统这个请求。“如果我们能就武器减少达成协议我们双方都能节省很大的资源与钱，”戈尔巴乔夫说。“（但是）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局面中。”

贝克把话转向德国人，说我们应该让他们选择自己的联盟成员身份。“我们并不强迫德国加入北约。但我们认为德国是北约的一部分很重要，不是出于对苏联的任何担心，而是因为我们认为除非能找到一个方法使德国在欧洲体制中真正定位，否则我们就会播下历史重复的种子。如果德国不在现存的安全结构中定位，那么在欧洲就有一个强有力的新实体，事关其自己发展的安全尺度。对于德国人说来放弃化学、生物和核武器远不如留在北约容易。”

为软化莫斯科的立场，贝克向苏联提出了九项“保证”。这些均已在不同场合由德国和我们提出过，他的工作人员现在把它们一揽子综合到一起：

1．美国愿为整个欧洲把欧洲常规武器谈判进行到底。

2．美国同意俟欧洲常规武器条约签署即提议开始短程核武器谈判。

3．德国会再次重申不生产也不拥有核武器、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

4．北约将继续对所需要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进行广泛的战略再考查。

5．北约军队在一个过渡期内将延缓向前东德领土扩展。

6．德国人同意苏联军队撤离东德有一个过渡期。

7．德国坚定地承认其边界，明确统一的德国领土将只包括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和柏林。

8．欧安会的进程将得到加强，苏联将在新欧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9. 德国明确它将以支持改革的方式寻求解决双边的经济争端。

贝克又说一个在北约的统一德国将是一个不同的德国，北约本身也在变。德国"信任"问题不实际。最后，如果德国不想在北约，那就不会在。

戈尔巴乔夫问如果有一天统一的德国选择离开北约会怎么样，这将危害我们控制它的能力。"在此短暂期间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来试图改变新的制度，"戈尔巴乔夫争辩说，"当前我们在这统一过程中有四大国权利——这就给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手段，给我们一个发展新的体系、新的结构的手段，也许是一个建立在非军事化基础上的体系。"他认为我们或许能够为贝克在四大国与德国人之间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所有原则制定一个文件。

贝克说是否这个最后的解决必须说德国将没有权利留在北约，戈尔巴乔夫说是的。他是在谈论一个中立的德国吗？戈尔巴乔夫说他称之为不结盟，他提出以法国与北约的安排为例。他又说如果苏联不能劝我们相信他们的观点，"那么我要对总统说我们想加入北约。毕竟，你说北约不会直接反对我们，你说这是一个新欧洲，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求呢？"

贝克说我们能够设想德国想加入北约，因为他们确切地说出这一点。苏联不应希望以不结盟作为放弃我们四大国权利与责任的一个条件——这与赫尔辛基的原则相抵触。戈尔巴乔夫会接受德国可以自由选择留在北约吗？"我直率地对你说，"他回答道，"我们不能接受一个统一的德国成为北约或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因为那将对欧洲和世界的战略平衡产生根本的影响。你们实际上不应该让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孤立。我们也许有不寻常的行动。"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要判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是他的意思还是只表达了那些因国内经济原因而不满的保守派的声音是困难的，也许他在涉及我们在立陶宛问题上的分歧。他的冷淡警告是对总统关于立陶宛的信件之回应，该信发出仅两周。多年后我回顾它时，仍很难说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恫吓，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

这个时期或许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遭受保守派和军方压力的高峰，至少在1991年秋季政变之前如此。的确，如其他地方所显示，莫斯科的图景并不美丽。东欧国家迅速从华沙条约组织中剥离。不仅该条约组织在分裂，而且我们还要求其关键的部分——东德，加入联邦德国和北约。在这一切的顶点是民族主义与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在苏联自身内部风起云涌。保守派要戈尔巴乔夫紧急刹车，难！甚至谢瓦尔德纳泽的威胁，也是悲伤多于愤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两难的境地，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处在危险之中。

乔治·布什

我5月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准备华盛顿最高级会议。我对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已有所保留，这时苏联还在封锁立陶宛，国内也有人批评我对他过于迁就。我知道形势没有任何好转，但是我想冒风险提前进行会谈。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危机有所恶化，或如果有暴力存在，我们就会取消会晤。但若听任立陶宛的局面毁坏我们费心在美苏关系中取得的进展，那么我们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危在旦夕。我们必须相互直接对话。

我在缅因州研读情况简报，坚持着参加一个又一个会议。我深深思索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现状，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得到许多我们期望的成果。我们之间的计划有很多没有完成，特别是军备控制，还有许多宗教问题，从阿富汗到安哥拉。我也想到戈尔巴乔夫面临的经济问题，他正在管理的经济虚弱不堪。或许还有他的死

敌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波罗的海的斗争及其他民族问题。这个人已经难以令人置信地做了很多事，对此我们应该感到庆幸。还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明年或明天他是否还在那里呢？为了美、苏与德国内容广泛的议事日程取得进展，苏联和戈尔巴乔夫需要面子和声望，虽然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已经支离破碎——他们的帝国和他们的经济，如今还有他们的联盟。我试图给他们面子与声望，只要不屈从或默认他们一些更有野心的计划，或不对关键的问题让步。我们不能给 200 亿元他们想要的资金，除非他们作出深刻的经济改革——即使现在我们没有这笔钱。我们也不能提供他们想要的最惠国待遇，如果他们没有移民法和在解决立陶宛危机上的真正进步的话。他们必须开始谈判和解除封锁。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些，我们的最高级会议就会开得很成功，这也是戈尔巴乔夫能带回到 7 月党的代表大会上的东西。我当然想给他一些促进，如果我能够的话。

德国人希望苏联关于北约资格的立场有根本的改变。我知道科尔与根舍相信戈尔巴乔夫会想与我签订很多东西——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也许他们是正确的。这可能是适合的时间与地点，但我不是这样确信。他所作出的任何让步也许都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引发对他的权威的严重挑战。我的简报对于签订一项协议抱有悲观的看法，指出戈尔巴乔夫似乎在拖延，希望在这样一些问题如他们军队的规模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更多的让步。德国人也敦促我们在党的大会之前不要把戈尔巴乔夫逼入绝境，并建议我们应当利用这次谈话试探他对贝克在莫斯科提出的九点意见的看法。也许有些方面他愿意改变。

密特朗 5 月 25 日于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他们两人主要讨论了德国问题。密特朗在最高级会议前夜给我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的印象。“（戈尔巴乔夫）对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的敌视之意对我毫不掩饰或躲闪，”密特朗写道，“对此主题，他坚决而确定。他

甚至指出他应当面对既成事实,对许多问题他会被迫改变自己的举动,特别对欧洲的裁军。"他相信戈尔巴乔夫仍在为将要发生的力量失衡而深深忧虑。

他们也讨论了立陶宛问题。"戈尔巴乔夫在谈话中很开放,但不愿放弃根本立场,"他说,"他坚持立陶宛人放弃他们的独立投票。简而言之,我的印象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谈及民族问题(波罗的海国家)或德国统一的结果时没有留下多少回旋余地。关于最后一点,赫尔穆特·科尔所希望的时间表,在我看来,将遇到严重的障碍。"

戈尔巴乔夫到达华盛顿之前,科尔打电话给我,也许这是他期待德国北约资格问题能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解决的又一标志。

"乔治,你能够得到我们最充分的支持,"他说,"对戈尔巴乔夫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懂得,不论怎样发展,我们一直肩并肩。这种合作的一个标志是我们之间通过坚持统一的德国未来在北约的成员资格不受任何限制而联系到一起。你应该对他讲清楚这一点,当然是以友好的方式,也应该明确这也是我的观点。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第二点,我们应该给他找到一个明智的经济安排,他非常需要帮助。他也应该知道我们不想乘机渔利。"

"我不期望有太多的突破,"我说,"(但是)我们要他最终感到开了一次很好的最高级会议,即使没有重大的突破。我想我们能做到这些,我们有内容广泛的协议要签署。"我回忆起科尔在这个月早些时候与我的谈话,当时他预言戈尔巴乔夫会在最高级会议上寻求援助,他与贝克在莫斯科也提过此事。"关于立陶宛我们有些问题。但是我会采纳你的建议。我不要他认为我是在乘人之危。"

第十一章　峰会与方案

乔治·布什

5 月 31 日，天气晴朗而炎热，为戈尔巴乔夫到来举行的仪式以华盛顿纪念碑为背景，显得颇为壮观。福特·迈尔的老近卫军身着革命战争彩色礼服，与绿树蓝天交相辉映。在戈尔巴乔夫和我检阅时军乐队奏乐致敬，国旗冉冉升起，这个经历一直使我难以忘怀。

戈尔巴乔夫看上去不错，他微笑着向我致意并用力与我握手，似乎很自信，且毫无倦意。起初他有些紧张，说话声音很轻。当我们到达椭圆形办公室他即松弛下来，然后我们坐在靠近壁炉的白色椅子上，壁炉的上方是吉尔伯特·斯达特画的乔治·华盛顿肖像，这时他几乎可以说很高兴。

我们那天早上的谈话富有哲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着手对付马耳他会谈。戈尔巴乔夫谈到我们需要从以前的猜疑中解脱出来。“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分界线上，”他说，“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卷入的对抗浪费了我们的时间与精力，而其他人——战败者——走到了前头。”世界的变化具有戏剧性。美国尽管有力量，但也不能靠自己领导世界。世界在“重新组合”，美苏关系是这个过程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能够合作吗？”他问道。

我仔细听着他对我们面临形势长而直率的考察，用笔记下每一点。“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出现了有意义的变化，虽然也有一些疑

问。"我回答说，心中记起立陶宛的事态发展。我又说许多美国人或许不太敏感，例如，关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我们考虑武器控制，不是我仅对此问题更加敏感，而是我的人民都这样，"我继续说。"我想在我们不可避免地告知德国之前公开此问题……我们不要有胜负。"虽然苏联遇到问题，但我还是要他理解只要我在任就不会对苏联落井下石。"在我们讨论细节问题时你必须相信我在这一点上的诚意"。

"你给我那幅有蓝旗在安哥拉上面的地图，"我继续说，"我问中央情报局你们的情报准确度如何，他们给你们打了很高的分。我告诉布伦特我们必须相信你们，这些旗子并不意味着我们试图包围你们，封锁苏联。一些事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来实现，一些必须靠行动。"德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的难题。"我理解你们的大难题与德国问题有关。我们不想要苏联受到任何力量的威胁。我们关于未来的德国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们是重走老路，还是已吸取教训和给他们以应有的待遇？我看是后者。"40 年之后，德国已经不同了。我不想以一种迫使历史自身重复的方式来突出它。

我不能忽视立陶宛。"我们可以看看你们自己决定的原则实现的程度，我们能够合作，"我说，"我努力进行有限的行动，因为我知道你们有大的问题。但是我正在受那些说我为了原则忽视美国利益的左派与右派的攻击。"

就在我们随便闲聊之时，布伦特看了我一眼，面露急色，指着他的表，耐心地提醒我们留些时间，因为各方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内容有待讨论。戈尔巴乔夫微笑着向他挥手致意，还不愿回到有关他的国家所面临问题的广泛论题上。"让我们再来 5 分钟，"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改革阶段或许是决定性的。"他们的政治制度已经改变，他们正处在改革联盟的过程中。"困难是主要的，"他说，"不同的共和政体将有不同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基本抉择是

市场经济,我们(对之)还没有准备。我们有集中的经济,我们在行动时必须考虑这一点。"

"我明白,"我插话道,"但是它在孕育中,你们不能半途而废。"

"但是不可能在第一个月就有孩子,"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我们需要两年的过渡,我们希望这个时候我们相互影响。"他在寻求资金的帮助。

"我们应当讨论它的实际结果,"我说,并决定持不介人态度。"我们有差异,但还是让我们讨论它们吧。"

那个早晨继续讨论马耳他会谈。我们都一再直截了当地把所有问题摆到桌面上。然而,戈尔巴乔夫话题走得太远以致许多内容我们被迫推迟,所以他突然提议苏联使馆安排午餐。

下午4点半我们继续会谈。在内阁大厅顾问与助手团团围坐在磨光的长木桌旁,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讨论德国问题。我从精心准备的描述开始,讨论苏联关心的德国问题,再次解释我们想如何解决,包括一个在北约的统一德国将会稳定欧洲的结构。

戈尔巴乔夫主张我们同时向欧洲和统一的德国发表讲话。"一个不可能离开另一个,"他说,"东欧与苏联正在向文明和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方向变化。"这使有关新的安全结构的对话成为可能。他不相信建设一个新的欧洲能够没有苏联,但警告说苏联也不可能被孤立。"如果这种事发生,肯定会有反作用,"他直率地说,"如曲棍球比赛,有严格的游戏规则。事实上,我希望使之明确。"

他仔细地选择用语。"对我们来说制定一个关于德国的协议极为重要。作者并不重要,他可能是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或斯考克罗夫特与阿克罗米耶夫将军。一个解决方案才是重要的东西。"他说。德国不可能既在联盟又不在联盟。只有一个是苏联可以接受的,但是德国只在北约将会使欧洲不平衡。应当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期,在此时期两个联盟都更多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

"关于德国我们有一个根本差异,它是由历史事件所促使,"我说,"你们比我们更疑心一个统一德国之意图……我则视德国为苏联的一个潜在而强大的朋友。"西方有些人比我更怀疑,但是我们都同意,西欧与东欧的危险都在于孤立或屏德国人于民主国家之外。我们不知道德国人的决定是什么。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能够选择它所向往的东西。但假如历史让德国留在北约——再加上现在在联盟中的稳定作用——则对任何人都是最好的。

"我们赞成美国留在欧洲,"他说,"但是你似乎把你们的存在与北约联系在了一起,德国出了北约将是北约的灾难,因此也是美国存在的结束。"或许一个统一的德国能够在各联盟中都有一部分——他称之为"两个锚"——联邦德国在北约,苏联军队在过去的东德,以及两个联盟之间的某种协议。他想在"二加四"中讨论这些思想(确切说来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以及重复他的过渡期思想。他又说我们能够让两个联盟都保留,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其中一个。"北约是一个开放的组织,"他说,"也许我们也会加入。"

"我没把握马歇尔·阿克罗米耶夫的前同僚会愿意让加文将军指挥。"我开玩笑道。

我试图采取一个新的步骤。我提醒戈尔巴乔夫《赫尔辛基正式协定》指出所有国家都有权利选择他们的联盟。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德国应当能够自我决定想要什么。他同意吗？令我惊讶的是,戈尔巴乔夫耸耸肩膀,接着说,是的,那是正确的。

房间突然静了下来。阿克罗米耶夫与瓦伦丁·法林面面相觑,在座位上不安地动着。鲍勃·布莱克威尔给我一个便条问我是否能让戈尔巴乔夫再说一遍。我对他点点头。"我很高兴你和我似乎都同意国家能够选择他们自己的联盟。"我说。

"你和我都同意一个统一的德国有权利不结盟,或是北约的一员,以一种最后文件的形式?"戈尔巴乔夫问道。

"我同意这一点,但是德国公众想在北约,"我回答,"但是如果

他们离开北约，我们会尊重它。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同意公开地这样说，美国与苏联都愿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它有权最终决定去一个统一德国能够选择的地方。"戈尔巴乔夫说。

"我的说法不同，"我说。"我们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如果他们不想加入，我们尊重他们。"

"我同意。"戈尔巴乔夫回答。

"包括第二部分？"我问。

"包括两个部分。"戈尔巴乔夫答道。

"好，"我说，"我们能让部长们来完成它吗？"

"让他们搞一个过渡期。"戈尔巴乔夫说。

这时，苏联人明显沮丧。阿克罗米耶夫眼含怒火，给法林打着手势。他们很快恢复过来，开始大声喧哗，在戈尔巴乔夫讲话时焦急地辩论着。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类似的情况我们从没见过——实质上是对一位苏联领袖的公开造反。接着谢瓦尔德纳泽拉拉戈尔巴乔夫的衣袖并低声与他说话。戈尔巴乔夫表示他想要法林发言。法林发表了一通相反的言论，论述德国加入北约对苏联人民来说为什么不可接受，这时谢瓦尔德纳泽做着手势，急切地与戈尔巴乔夫交谈。这个吸引人的场面出现了几分钟之后，戈尔巴乔夫重新开始讨论。他现在又试图回到以前一再呼吁过的长期过渡期的论述，作了这个建议，"我们让外交部长来处理这些问题吧"。

这明显是想摆脱他所导致的争端的一个策略——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谢瓦尔德纳泽拒绝了。"我们能够做，"他说，"但这样的问题必须在总统的层次上讨论。"很清楚，他不愿当替罪羊。戈尔巴乔夫无奈继续讨论，他试图退回去，但从未完全放弃前面的论述。他看起来像完全遭受了挫折，一次次提出过渡期，然后再一次让外长继续讨论。这时谢瓦尔德纳泽屈服了。

我对戈尔巴乔夫为何这样做没有把握。也许他认识到我们的位置优越以及这是在他自己人中处理它的最好方式。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令人惊讶的行为。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亲眼所见，让我们来单独分析是怎么回事。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从未放弃他对我们主要原则的明显让步，但显然他在他的代表团中产生了风暴和遇到了严厉的反对。所发生之事的意义与影响可从谢瓦尔德纳泽拒绝援助他的老板一事得到理解，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立场在那儿。这次会议标志着戈尔巴乔夫与总统在最高级会议上就德国问题的讨论结束。我们想就在那一刻，我们已得到了关于此问题能从苏联人那里得到的一切。

乔治·布什

我们仍然没有谈到许多细节问题如最惠国待遇、贸易和立陶宛。那天晚上，当我们从国宴离开时，戈尔巴乔夫留我在厅里长谈。他告诉我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贸易协议，那将是一个灾难，那对他来说将成就或毁掉这次最高级会议。他很焦急，其举止几乎像没看过我在 4 月就此问题给他写的信，这也是我们保密的东西。后来我睡得不太好，我很早就醒来在想一条突破绝境之路，但是我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苏联在立陶宛有所行动。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与一些国会议员共进早餐。后来那天早晨他与我相遇时，他解释说他告诉他们一项贸易协议对他是如何重要。我想这是很厉害的一着，公开会见国会议员以及展示他的状况，这也许有助于减少某些对最惠国待遇的异议。他说苏联把它视同于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他评论道："这两点是此次最高级会议的主要支柱。"他承认，在实际关系中，一项协议不会引起实际贸易连年大幅增加，但它会是一种重要的商业努力之开端。

"你昨天晚上的话给我留下很实际的印象。"我回答说。我大

声读着我给他的有关贸易协议的信，并再次解释立陶宛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如果能继续对话且封锁被解除，该协议一分钟就可以通过，"我说，"我理解为什么你们不能让我们介入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也不想介人。但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我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我不能使它在国会得到通过。"

"我们各人制定我们自己的原则，"戈尔巴乔夫不耐烦地说，"我不能迫使你同意我的原则。你选择波罗的海来压我，把它们放到一边吧。"

"但是有了这个讨论的机会干什么呢?"我坚持着，"你说你会做到这些。"他回答他宁愿选择与波罗的海国家在宪法的框架内对话，但是愿意在此范围之外谈论它。它们应该回到起初的情形(即宣布独立前)和从此出发讨论如何进行。"我们想要一个贸易协议。"我向他保证，"我们不想宣布什么条件，因为那看起来像我在支配你。但是诉诸法律和把这些讨厌的东西从中排除这样做没有意义。"

"好。我认为你对此已有考虑，"戈尔巴乔夫承认，"我认为没办法工作得更卖力了。我们现在没有一项贸易协议，这种情况已经很多年了……"我告诉他我想把它制定出来。"这更是我的问题，"他说着耸了一下肩膀，"我已对你作了解释，现在掌握在你的手里。让我们说我们对波罗的海的关心像你们一样深。我们想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否则对改革将是个打击。但是生活并不总是由我们来控制。"

接下来我们立即转移到内阁大厅讨论军备控制。维克多·卡波夫概述了其他讨论目前的进展以及已经准备好的文件：一个有关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一个关于未来谈判的声明，还有一个关于注意以渥太华协议为基础的欧洲常规武器的声明。

会议以后，我带着吉姆·贝克到一旁。我在考虑贸易协议对戈尔巴乔夫的重要性，假如他在德国问题上犹豫不决，我想试着迁就

他，我知道他必须带着确定的东西回国。我请吉姆试着搞一个妥协的方案。

我建议协议将有公开的或公诸于众的一面，也有秘密和更为严厉的一面。我们将签署谷物和贸易协议，但我们不会把这个一揽子交易送交国会，直到苏联完成我们公开提出的他们取得最惠国待遇的条件：他们必须通过移民法。私下或秘密的一面是与立陶宛开始谈判和莫斯科取消经济封锁之前我们不会把这一揽子交易送交国会批准。我们能够使戈尔巴乔夫的有具体内容的成功具有公开签约的形式，因而有一个达到目的的机会，但我们必须明确立陶宛问题有实质性进步该协议才能履行。戈尔巴乔夫回国不再尴尬，我们也有了我们想要的条件。带着这些建议，吉姆与谢瓦尔德纳泽又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在贝克与戈尔巴乔夫谈话之时，我打电话给科尔告诉他我在前一天与戈尔巴乔夫讨论的情况。科尔问戈尔巴乔夫是否说到经济援助的事情。“还没有，”我说，“我认为他明天会在戴维营突然对我提出来。”我问根据赫尔辛基协议德国有权选择是否加入北约，他对此说法有什么问题。“确实如此，”赫尔穆特说，“我们相信这一点。但是我们还必须改变他的想法。乔治，我认为经济面更为重要。”

打完电话不久，吉姆即带着一个贸易协议回来，所用的形式正是我所建议。协议签署仪式定于两天后下午 5 时半在东大厅举行。在我们进去前戈尔巴乔夫与我相遇，他认真地看着我问道：“我们有了一个协议吗？”我点点头：“是的，我们有了一个协议。”我微笑着回答。戈尔巴乔夫宽慰地笑了。

由于没有人预料该贸易协议会被签署，有人冲到商业部去拿文件而我们必须等待。在我们等待时，东大厅变得热起来，在电视的强光闪烁下不太舒服，高层的听众和谈判者挤得身上出汗，在自己扇着风。戈尔巴乔夫转向我说他认为在立陶宛问题上他们会行

动得比我们所想像得更快。希望如此,我想。

第二天晚上戈尔巴乔夫情绪高昂。他取得了贸易协议,在削减战略武器、化学武器上有了进展,并许愿在欧洲常规武器上做得更好。我们仍没有解决德国问题,但我并不期望我们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也没有解决立陶宛问题,但是我们已增进了我们的相互理解。我应用了某些杠杆。我觉得个人的接触大有益处,我认为他知道我并不是竭力迫使他拆墙,而是真诚地处理问题。

我认识到我必须做些努力以让公众支持关于立陶宛和最惠国待遇的协议,这是我们所能够做的一切。如我所料,新闻界很快开始抱怨吉姆出卖立陶宛。然而,我知道,当结果显现我们关于贸易和最惠国待遇的协议是在鼓励苏联人去解决立陶宛问题时每一个人都会安静下来。批评使人沮丧,但我们当然不希望通过公开展示立陶宛与美国贸易之间的联系来羞辱苏联。

我们星期六去戴维营,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天将不同寻常。戈尔巴乔夫和我共乘一架飞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两人都有一个拿着核密码箱的军事助手陪伴,该密码能够使我们中的一人毁坏另一人的国家。然而我们正坐在这里讨论和平。在飞行时戈尔巴乔夫似乎着迷于不动产,在我们飞向马里兰州郊区时他问了各种问题直到进入该地区。你如何买和卖一栋房子?谁提供这笔钱?谁拥有这所房子?你必须离开时怎么办?这样做得花费多少或那所房子值多少钱?

我在戴维营的习惯是一切都很随便,不拘礼节,时间灵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说我劝他解下领带和茄克是个成绩,他显得放松和热情洋溢。天气也很完美,和风丽日,天空明净。早晨我们坐在室外,打着遮阳伞,下面有一张玻璃桌,放在总统别墅的阳台上。四周树木环绕,微风轻轻吹拂,我们有六个人:我、斯考克罗夫特、贝克、阿克罗米耶夫、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

讨论超出我的希望和预料。戈尔巴乔夫谈了苏联的改革问题，以及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挑战。他谈到叶利钦时很气愤，不愿多谈。我们涉及了很广泛的外交政策问题——从中美洲和古巴到南非、阿富汗和朝鲜——但是我们讨论最重要的方面是真诚率直、不带积怨的。我们发展了这样一种感情，给出我们能够做的，放下我们不能够做的。戈尔巴乔夫理解我们想合作，我的想法也正是他的想法。我们甚至来回开玩笑，包括一些他对嘲笑者喊叫的故事。这些玩笑显示了我们所达到的信任程度，以及我们是如何放松。戈尔巴乔夫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对我的许多建议持赞成态度。

那天的晚餐令人难忘。傍晚戈尔巴乔夫在散步而我在小憩。他闲逛经过蹄型套柱游乐场，他捡起一块蹄铁，扔了出去，第一下就击中一个套环，大家说开头就交好运。我的助手梯姆·穆巴拉尔德找回了那块橙色的蹄铁，给它打上了有关这次访问的印记。在宴会最后祝酒时我亲手把它交给戈尔巴乔夫，他非常激动，当谈到我们国家和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简直话都说不出来。阿克罗米耶夫后来也告诉布伦特他认为这是一个新时期。这些话来自一个冷战多年的老手，这是个变化。

晚饭后，戈尔巴乔夫再次把我拉到一边，这一次是问贝克是否和我谈及他与谢瓦尔德纳泽关于资金问题的讨论。他解释说他不想在自己的人面前提出需要美国金钱的问题。我告诉他吉姆已经提及，但是还有一些政治难题有待克服，一些他意识到的问题，如援助古巴和在德国问题上的进展。这些也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如果他们要得到信任的话，我说可能有政府担保的私人贷款，但这些其他的问题必须区别对待。

奇怪的是如何与苏联人打交道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一些，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常常有意外惊喜。我们听说戈尔巴乔夫不喜欢乘直升飞机，但他似乎喜欢在直升机上临窗眺望，并问很多问题。如果他感到紧张，就不会显示出来。我们也听说戈尔

巴乔夫不喜欢放松,而他告诉我喜爱到户外和经常散步。他可以走 15 分钟的路程,这是相当出色的步行。赖莎告诉我他不再有很多时间锻炼。他喜欢走戴维营的林中小路,我们还穿过树林。他还问及冰毒,一直存在的麻烦事。我们谈到打猎,他解释说他曾参加射击运动,我问他是否喜欢射飞碟,想起我可以带他到戴维营巨大的猎区去,但我猜他只用过来福枪,没用过滑膛枪。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为第二天早晨的新闻发布会作准备时轻松的气氛甚至仍在继续。我们提前把总统那天的开场白告诉贝西默特尼耶克大使以证明我们站在德国一边。它包括了这样的论述:"我们完全同意联盟的成员资格问题——根据《赫尔辛基协定》——是一个由德国人决定的问题。"在苏联代表团于最高级会议第一天就此问题上激怒之后,我预料至少会有人说不同意见的话,令我惊讶的是鸦雀无声。关于这次会谈本身,总统说他们两国并非都同意一个统一的德国应当是北约的全权成员,但他们都同意联盟成员资格问题根据赫尔辛基协议是德国人决定的问题,这时戈尔巴乔夫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必须考虑这种默认显示了苏联立场是否真正具有了灵活性。而记者招待会上很少有人察觉这些论述的意义,这是令人激动的时刻。我们认真地希望戈尔巴乔夫渡过德国问题难关。

乔治·布什

在我们一起飞回白宫时,我请戈尔巴乔夫给我们的五个孩子签名,这时他拿起笔向他们每一个致以问候。我也送给他的女儿伊瑞妮一个,戈尔巴乔夫问的更多的问题是关于不动产,"看看明天的报纸,"我告诉他,"你会看到许多广告。如果有人在卖一处房,你可以有一个不动产代理商,他会做好这笔买卖。"

戈尔巴乔夫笑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开玩笑说,"在我们国家他们找到这位不动产代理商,然后杀死他。"

直升飞机停在白宫的南草坪,我带戈尔巴乔夫到住所去观光。

我向他介绍林肯卧室和葛底斯堡演讲的副本，说明这里所发生的事。接着我们就去我的楼上办公室，在那里他看到我的五个屏幕的电视机和我的电脑。我喜欢与政要、朋友和两党议员分享白宫，他们中许多人从未到过该住所的楼上。他们都被该房间所代表的历史所感动。这是每一个人的房间，给人民一个机会看看它是我很愿意做的事。

在椭圆形办公室，我指示了我本周的每日时间表，戈尔巴乔夫似乎对它的细致留有印象。他说他将使他的办公室现代化——他没有那一类东西。接着我又向他显示了一整月的大时间表。他显得很惊讶，所以我把它送给了他。他说他想送他的办公室主任来与约翰·苏努努一起工作。那年秋天约翰到莫斯科帮助戈尔巴乔夫的工作人员实现办公室的现代化与合理化。我们在白宫漫步时戈尔巴乔夫邀请我到莫斯科，我立即接受了。

我想正是这样一些重要的接触使这次最高级会议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戈尔巴乔夫和我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够推心置腹、直率而不夸张地交谈。我们在戴维营想了各种方案，却都未能用于马耳他。我想我们分手时已是真正的朋友，个人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此关系形成于前面的讨论之中。但我们仍需要看到实际的证据(它出现于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我们至少有了一个可行的交易，其作用是使苏联公开地与立陶宛对话和收回禁令。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也认为这次最高级会议取得了成功。我们在武器控制——这是谈判的方向——方面有了进展。气氛是合作的，两位领导人的会谈给我一个感觉，苏联愿与我们合作，但是仍有问题存在。布什总统通过掩盖与立陶宛的联系而作出了一个主要的让步。戈尔巴乔夫带着他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从这位总统的牺牲中得到的他所需要的东西回国，总统则让自己公开承担放弃立陶宛的责任。德国问题也有不太确定之处。像科尔一样，我预料戈尔巴乔夫想在

最高级会议上解决最终的重新统一问题。他的陈述对此问题是个促进,苏联对布什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概括保持默认也是如此。然而双方都有些暧昧和不确定。我们之间的立场仍有重要的区别。

会谈有助于消除德国问题上的紧张和对北约赢得联盟成员资格是由德国人决定的事情这个原则的某些承认。戈尔巴乔夫不再对此思想持有异议,他和谢瓦尔德纳泽都开始呼吁西方发表特别来自北约最高级会议的“九点”保证。我们也赢得一项加快欧洲常规武器谈判的协议,这将保证军备削减跟得上我们正在目睹的政治方面的迅速变化并促进之。我们不提出欧洲对立方军队的标准就不可能谈论德国重新统一的最后阶段。德国人与苏联人都谈到国防军的上限,但在没有确立两个联盟所有国家军队标准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想谈及。这应当在北约最高级会议而不是重新统一谈判中解决。

乔治·布什

6月8日,科尔又来到华盛顿。我们会见两次,包括一次在白宫与布伦特和吉姆的小型宴会。科尔推测戈尔巴乔夫现在或许急需经济援助,苏联人希望西方帮助他们——200—250亿美元去买消费品。然而,戈尔巴乔夫也单独接近德国人寻求借贷50亿马克来发展他们的信用业。“他们说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东西作为回报。”科尔说。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寻求一种解决北约成员资格问题的方法。戈尔巴乔夫问北约能作出什么样的提议,他出现了两个联盟之间不侵略的一套想法。我不太热心,因为我想在华约处于分崩离析边缘之时这只会支持它。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正餐聚会之前,有一个迷人的游览,至少对我如此。在科尔总理2月对戴维营访问期间,他、总统和我关于军事战略和军事领袖以及美国与德国的比较开了一个很长的鸡尾酒会。在聊天时科尔

对主题表现出渊博的知识，他提到他愿在某个时候访问阿灵顿公墓，并问我是否愿意陪同他。我自然同意，但从未想到此事真的会发生。

然而，科尔到达前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是否在正餐前和他一起到该公墓去作一次散步。我打电话给阿灵顿主管者请求安排一个向导。那天天气温暖而清爽，在下午早些时候我遇见这位总理时，温度已升高到华氏90度，湿度也在增加。在这样的压力下，我担心科尔年龄已不小，建议我们的访问为摩托旅行。他什么也没要，我们出发穿过草坪去探访一些著名的美洲将领的坟墓。我们讨论着，分析这些过去的美国军事巨人之特性、成功与失败，把他们与德国军事史上的伟人相比较，这真是令人难忘的经历。科尔对主题的领悟力令人敬畏，即使军事史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仍不能与他相比。

结果天气对他很不错，然而他汗流浃背，他建议来一杯冰茶。我惊慌起来，我能把这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理带到哪里去搞这杯冰茶而不声张和不搞安检呢？最后我想起波托马克河旁乔治·华盛顿大道上的一家餐馆，我们准备到那儿凉快一下，再继续我们的谈话。

乔治·布什

6月11日，东德总理路沙·德·梅耶尔来到白宫。这是一次临时和有意思的会谈——东德领导人和美国总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更加不寻常的是，德·梅耶尔是仅几天前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的主席。我们的谈话许多完全是形式上的，关于戈尔巴乔夫和濒临死亡的联盟他有一些很有趣的看法。这里是一位美国总统向一个条约组织的主席查询详情——令人吃惊！

"华沙条约组织的发展可能意味着它生存时间不会很长了，"他告诉我，"特别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说，在过渡期后他们不想要这个联盟了。"有必要建立新的结构防止这些国家再造

这个组织。他也说到他的人民所面临的问题。他悲哀地发现:"40年社会主义改变了人民。""失败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人生的某种损失。我们需要重新找回灵魂,让它们被找到吧。"

他描述了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我觉得他仍然设想如果同意两个德国都有北约成员资格,苏联国家和人民就有了麻烦,除非加上某些成分,"他说,"例如,他谈到(两个联盟之间)一个有关苏联军队继续在东德存在的条约。"在我们边午餐边讨论时,我问他是否发现戈尔巴乔夫值得信赖。"我的印象是他认为最高级会议非常成功,"德·梅耶尔说,"他说这标志着从对抗到伙伴关系的过渡。在此意义上,他对我表达的观点相当乐观,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国内问题。成百上千的人在退党,他们分裂成小团体。7月初党的代表大会非常重要,因为在苏联除了党以外没有统一的结构……"

我们关于解决德国重新统一最后障碍的谨慎乐观主义在6月24日东柏林的"二加四"会议上经受了考验。苏联人突然表现得很投入,显示出一种新的没有预料到的灵活性。谢瓦尔德纳泽提出了一个强硬的具有不可接受条款的临时解决方案草案。他提出一个五年期的幻想,在此期间德国仍然保持分离,其各部分仍在现存的联盟中。四国的军队将停留到过渡期结束。德国武装力量将有严格的上限——不能超过25万。在这些限制生效以后,四国的军队数量将减少,西方联盟的军队将不允许进入前东德的领土。四国的军队将从柏林撤离——虽然苏联人仍在东德出现。难以知晓谢瓦尔德纳泽的带有凡尔赛色彩的计划是怎么产生的,它出现于戈尔巴乔夫的华盛顿合作精神和谢瓦尔德纳泽在哥本哈根欧洲安全会议上的积极讲话之后。

贝克似乎认为谢瓦尔德纳泽的计划仅仅是对付苏联国内的摆设,但它的材料很强硬。它显示苏联的强硬派再次猛拉谢瓦尔德

纳泽的缰绳。我们密切关注贝克与他的会见,希望了解从华盛顿和哥本哈根会谈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谢瓦尔德纳泽承认该文件受到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不是他们关于德国问题的最后立场,最后立场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北约最高级会议的决定以及欧洲常规武器谈判和欧安会上的进展。谢瓦尔德纳泽相信他的国家正逼近一场政治的和经济的危机。他的政府能够指出北约的变化以让苏联人民放心,他们不再面临来自该联盟、或者德国、或者美国的威胁,这是必要的。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显然对我说来谢瓦尔德纳泽确实作出了某种姿态,他与贝克的私下讨论似乎都在寻求帮助。他至少重复四次说北约最高级会议宣言被苏联人民批评是出卖德国的主权和北约成员资格。我认为这很严重。如果我们不能在最高级会议上就联盟改造作出勇敢的变动,我们就不能通过苏联人说的非常重要的公众检验。我们不能用言辞代替坚实的物质。

总统5月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概括了他对这次北约最高级会议雄心勃勃的目标。从那以来政府的一个小组一直忙于综合他将于7月作出的建议。至6月底一个简短的包括22个段落的宣言已准备好。它发起改变北约与华沙条约及其个别成员的关系,改变它的军事部署和陈旧的理论,加强欧安会的长期性结构之态势。

宣言提议在四个领域改造联盟:1. 强调它的政治使命,发展与前竞争对手的合作与伙伴关系。联盟保证决不首先使用军队,提议与华沙条约组织成员(不是与条约组织本身)缔结互不侵犯协议,邀请这些政府在北约布鲁塞尔指挥部设立外交使节。2. 呼吁通过不搞"超前防御"改变常规防御的性质,以及加强对更为机动的多国部队的依赖。该文件也提议随着常规武器控制谈判(在欧

洲常规武器条约的结论之后)在欧洲限制进攻性军事力量。3. 宣布新的北约核战略,修正"灵活反应"到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和使它们成为"真正最后诉诸的武器"。4. 提议加强欧安会的进程,给它新的促进民主制度的指令和在矛盾冲突领域进行预防的运作能力,以及一个首次具有新的秘书处和其他团体的制度结构。

宣言主要是想帮助莫斯科挣得一些面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以至不能以通常的方式来审视它。总的来说,每个政府派往北约的职业外交家将会深入研究这样的草案,制定出一个一揽子方案,并认真对待之。由于缺少时间以及需要该提议得到通过,我们决定绕过通常的官僚程序——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处理有一种风险,如果该草案受挫,最高级会议可能变成僵局而失败。联盟成员也反对不预先协商就对一个完全由美国制造的一揽子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弱化这个印象和提前争取他们,总统决定提前与他在北约的最高层伙伴讨论,然后在仅由外交部长和政府首脑参加的最高级会议上就美国的方案进行谈判。他通过特定的渠道把有草案的信送给沃勒、科尔、撒切尔、安德烈奥蒂和密特朗。

乔治·布什

可想而知,联盟主要领导人的反应是复杂的,他们的官僚们由于没有参与此过程而感到震怒。科尔喜欢该提议,沃勒和安德烈奥蒂也很热心。撒切尔持怀疑态度,她认为我们是为了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提案"的缘故,正在放弃加强军事战略这个基础。她支持改变北约重点的想法,但是她不愿部分改变长期建立的灵活反应战略。该政策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北约如遇到苏联常规进攻也可以使用核武器,因此起到威慑作用。她认为该提议宣告核武器是"最后诉诸的武器"损害了我们短程力量以及使我们陷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地位,使我们的常规军队易受攻击。她认为宣言的调子会使人相信苏联不再是一个威胁。她也反对与华沙条约组织联络的思想,而宁可欧安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也有一个承

诺。她需要一个全新的草案，该草案将由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意大利准备。

密特朗更为积极地支持该宣言的大部分内容。但是他也像撒切尔一样关心“最后诉诸”核武器的语言，他觉得与核威慑的概念不一致。然而，他发现法国不是北约军事结构的组成部分，于是他不再试图告诉我们应采取什么战略。法国也不喜欢联络的思想，而宁愿北约仍致力于安全问题。我发给密特朗一份关于对他的异议之反应的海底电报，再次允诺在伦敦讨论该问题。

我于7月2日向北约其他领导人提出该草案，并附一便条解释其内容将在最高级会议上讨论。此外，7月1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撒切尔，指出和解释团结之需要，作为对她的异议的回应。为了赢得苏联同意德国在北约的成员资格我们需要一个大胆的建议。为讨论领导人会见时的语言我又起草一份新的文件。

在伦敦最高级会议上，吉姆·贝克和他的对手几次巧妙的谈判之后我们得到一个接近原始草案的妥协的最后文本。它是加强华沙条约—北约的联合声明，但不是互不侵犯条约。它包括了我们对核武器的建议之精神，但联结它的是一个有关欧洲常规武器的协议，这正是撒切尔担心的问题。它冲淡了表现我们虔诚愿望的提议，即北约事务将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其战略是使核武器成为“真正最后诉诸的武器”。灵活反应得到修正，联盟保证“离开”超前防御。这是联盟变化的标志。

从伦敦返回的路上，我给戈尔巴乔夫一封信解释最高级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宣言对苏联关心的事如何表述的细节：

> 经过我与我们的北约伙伴为草案文本轮流工作，我们数小时前发布了一个宣言，它包括了联盟每一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其与苏联关系的改变。当你读到这份北约宣言时，我想要你知道我起草时从未忘记你在我心中之

重要，在伦敦我与我的同事强烈地表达了这一点。

我希望今天的北约声明将使你相信：北约能够和会有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的安全和利益。

北约宣言和我致戈尔巴乔夫的个人信件使该阶段被证明为德国重新统一谈判的最后阶段。它给苏联提供了西方改变北约真实愿望的坚实证据。我们的提议是公开的。

1990年7月是德国重新统一的决定性时刻。两个德国经济与货币在7月1日就实现统一，东德政府实际上已交出它对内部事务的许多控制。德国确定于7月6日谈判有关政治统一的第二国务协议，希望于8月完成，9月批准。波罗的海的危机也开始减弱。6月29日，立陶宛中止其独立宣言，戈尔巴乔夫取消封锁。

7月第一周，在北约盟友聚会于伦敦之时，苏联共产党第28次代表大会召开。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在国内事务与外交政策方面与强硬派作斗争，这是该党所曾有过的最激烈的大会之一。在严厉的斗争之后，戈尔巴乔夫得到了胜利。他被3/4的人选为总书记，他的权威重新得到巩固。我们仍然担心，随着他评论华盛顿最高级会议为一个“过渡”，他也许会试着把德国重新统一拖得尽可能地长。但是这样的事没有发生。

7月14日科尔与根舍飞到苏联作细致的讨论，首先到莫斯科，接着到高加索山脉戈尔巴乔夫在斯塔拉波的家中。从5月5日的“二加四”会议以来，德国人一直在劝诱苏联人，试图让他们对北约成员资格放心和笨拙地提出需要提供经济援助。5月中旬波恩提出承担东德对莫斯科的所有经济义务和提供30亿美元的信贷作为与德国统一有联系的一揽子交易的组成部分，后来戈尔巴乔夫说这笔援助来的正是时候。德国人也承担过渡期苏联军队在东德的费用。在一次宣布他们讨论结论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戈

尔巴乔夫宣布:“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一个统一德国加入北约的时候将会来临,如果这是它自己选择的话。还有,如果它选择如此,那么它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形式与苏联相一致。”

乔治·布什

7月17日我打电话给科尔,他和我谈的全是他与戈尔巴乔夫讨论的情况。“他已设法做了艰苦的工作通过了党的代表大会,”他说,“我认为它的成功给了他一个推动。”戈尔巴乔夫承认北约宣言的重用性。“至于中欧和东欧,他似乎一心想着苏联,而对他的某些伙伴的情况不感兴趣。”

科尔描述了他们与苏联的会谈。“他的看法第一点是承认至年底会有(全体)德国人的选举,”他细述道,“他也说德国人的主权应得到彻底和毫不含糊的归还。我使用了你在戴维营表述的准则,一个属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主权国家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联盟。我还解释说德国人会毫不含糊地投票赞成北约,我告诉他在此问题上必须对他的工作人员施加强大压力。他认为该观点不言而喻。”

“我们接着讨论一个统一的德国与苏联之间关于(撤离)军队的条约。虽然他的工作人员时间表有所不同,他还是接受了3—4年的时间。这就与我们一致。我们也同意,在苏联军队从东德领土撤离期间,北约军队不在那里驻扎,虽然不属于北约的德国人军队可以在那儿。在苏联军队3—4年撤走以后,只有德国人的北约军队能够在那儿。”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一对一地谈到了德美关系。我告诉他这个关系非常重要。我还告诉他如果苏联试图破坏它,就会影响到德国与苏联的关系。他的回答你会感兴趣。他说他们已吸取一个教训,即试图让美国从欧洲撤离是错误的,他们过去在此方面从未成功。我简要地对之复述一下,我认为他的回答是认真

的。"科尔的印象他是一个清楚地了解自己又具有一种自我幻觉的人。"他已经破釜沉舟，"他说，"他不能后退，他必须成功。"

我的惟一问题是类似于从德国撤军的问题。科尔说该问题没有涉及，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提到它。"我说我认为美国军队理所当然留在德国，"科尔说，"他对此没有拒绝。"

同一天我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向他表示祝贺并简单告诉他在休斯敦即将举行的西方七大工业国的讨论。我们对他关于一个统一的德国有权选择自己的联盟成员资格的论述感到高兴。"这显示了你所具有的伟大的政治家风度，我们为之感到高兴，"我说，"我希望今后几个月在欧洲常规武器和削减战略武器方面取得类似的进展。"

戈尔巴乔夫描述了党的代表大会。"我相信通过你所理解的理由共产党仍是强有力的政治机构。它的立场和行为将决定我们主要的事件进程。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种新的形势和时期，那么共产党独占权力是很自然的。新的共产党将产生。"他在规划与公众的新关系。"这是我政治生涯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时期，"他说。还有很多事要做，他说他希望能够依赖我们的合作。

"我相信如果没有在华盛顿和戴维营的会见，"他继续说道，"没有北约最高级会议和伦敦宣言的结果，没有我与科尔的会谈和你(与他)的谈话等重要工作，没有我们外交经济机构的活动，没有这个真正的政治行动，得出类似于我们观点的看法将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做到这些因为我们理解相互的立场，我们努力考虑各自的观点。我认为我与科尔会谈的结果相当积极。"他希望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能够依靠这个进展。"如果这些协议受到尊重，我们就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对苏联观点的迅速变化感到惊讶和高兴。当然，在北约对东德领土责任方面问题仍然存在，因限制北约在那儿的军事存

在。怎样约定德国军队的上限及其前后承继关系，例如 CFE（欧洲常规武器），仍不太清楚。这些细节有待“二加四”最终解决方案确定。

一些记者称德苏协议为“斯塔拉泼罗”，意指像 1922 年的拉泼罗条约，当时两个流放政府订约合作，这是其他国家军事首脑订立的又一个双边交易。我不同意。如果这是一个斯塔拉泼罗条约，就会接着还有双边交易来加强它。但莫斯科—柏林轴心没有出现。科尔仍然倾向西方，戈尔巴乔夫仍然专注于国内的问题。为何他愿与科尔在斯塔拉泼而不是与总统在华盛顿作交易呢？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已接受统一至少在 3 月选举之时就会不可避免地早早来到，但是他并未作出合理的选择即以北约为德国的家。5 月 31 日，他提出双重联盟和长过渡期概念，或许希望我们会上钩。当我们没上当时，他出于挫折可以作出“让步性”声明，也许想试探一下他的同僚的态度。他在他的同僚当中引起的恐慌说明他的改变不是出于计划，也说明它的不成熟，所以他几乎立即想缩回来。

结果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得出结论，变动是危险的，直到他对付了即将到来的党的代表大会。为了这样，他需要从北约最高级会议上得到一些成果以证明该联盟不再是一个威胁。有此在手，他就能在代表大会上稳操胜券，接着就可以自由地让德国人走，这就是他与科尔在斯塔拉泼所做的。它远不是拉泼罗声音的回响。

有了“斯塔拉泼”的突破，德国重新统一的期限就确立了。第三次“二加四”部长会议于 7 月 17 日在巴黎举行，波德边界也达成了一个最终解决方案的草案。仍然有一系列的问题有待处理，也有一些重要的技术问题需要克服。然而，这些实质上都是细节问题，主要的政治过程如今已经确立。

条约本身由六大国的部长于 9 月 12 日在莫斯科签署。在其

中一个统一的德国定为东德、西德和柏林，德国人批准对其余战前领土的割让。他们弃绝侵略以及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承诺受束于西德已签署的不扩散条约。国防军部队人数限制于37万，在3—4年时间缩减到此水平。该数目是总的欧洲常规武器协议的组成部分。苏联人至1994年底将从原东德撤出他们的军队，而他们留在德国时，只有不属于北约的德国部队可以驻扎在前东德的领土。联盟的军队能够留在柏林，只要苏联的军队留在东柏林。一旦苏联人走了，德国人的北约军队就能够在东德驻扎，但是不能有核武器。德国能够参加它所选择的联盟和拥有完全的主权。最后，四大国停止它们的权利与责任。正式的德国重新统一出现于10月3日，只是联邦德国按照基本法第23条简单地吸收五块重组的东方土地。

乔治·布什

总的说来，最后解决方案很接近于我们的目标。德国获得了统一并留在北约——虽然东部还处于特殊状态。对美国来说，以及从根本上对欧洲来说，重新统一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是否有碰巧的因素，绝对有，想一想它是个人介入并通力合作的结果，即可知道是多么幸运。但我们敏感的问题是让德国的关系合法化，与法国人和英国人紧密合作，还有苏联人也与结果利害相关，从而使过程有活力和向正确的方向变化。我相信如果没有美国站在分界线上，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很可能的是，德国人与苏联人达成一个交易，让统一的德国在北约之外。科尔与德国人民都为美国的作用而激动，为了德国重新统一的成功给我们极大的信任。

重新统一是一系列空前而迅速的事件，对许多人来说调整适应极为困难。起初所有的参加者对结果实质上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甚至有人为他们的民族利益对重新统一加以威胁。然而不过一年，我们在欧洲政治中实现了最深刻的变化，以及多年的安

全,没有对抗,没有战火,这是所有欧洲人最为平静和和平的时期。或许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发生这样的重大事件都不会没有对抗。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对我来说,当苏联人接受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时冷战就结束了。我们的结论是结束超级大国对抗的长过程确立于里根政府的动议中,但却是在我们的注视下实现的。它由总统对科尔的信任以及争取我们的盟友和苏联人的政治天赋所促成。许多重要谈判的安排和运作都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是总统最出色的个人外交的成果。联盟的改造、舆论、理解、宽容和妥协锻造了一个改变了的统一的新欧洲。没有凡尔赛,没有遗留的国际病痛。也许,我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所有人都发现他们与结果利害相关,这是经过指导的和平胜利。

由于 1989 年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东欧,那年秋天德国统一前景的出现令人吃惊地把我们几乎全吸引住了,我们的反应必然是特定的而不是战略的。所有关于德国的观念——包括来自德国人的——都是统一仍是一个遥远的梦。结果,我们并没有事先制定一个全面的计划,只得一起仓促行动。甚至到 1989 年秋天我们的所有欧洲盟友和几乎全部德国领导人均同样如此。

如果我们在此问题上对我们的盟友更加开放将会是有益的。我们最后同苏联人一起协调解决问题,但与我们的朋友几乎很少有机会进行这样坦率的讨论。更加勤快地与德国人的邻居对话也许至少有助于减少他们的痛苦感和恐惧。在波兰,我们的努力明显有助于他们减轻忧虑。在英国和法国方面,我们也许没有达到我们所能有的效果。

该过程的一个方面很关键,即一个统一的德国是否留在北约,对于它我们能够和已经实行了真正的、或许是决定性的影响。结果并不是完全命中注定的。戈尔巴乔夫开始顽固地反对统一本身,不考虑德国在联盟的成员资格,他的想法比起他的同事远不算

宽宏大量。我们的政策是不为事件进程而过分高兴，首先在东欧，接着在德国，或不在谈话中以胜利者自居，这样有助于使他相信我们没有把事件看作输和赢的游戏而是在其中只有胜利者。我们不仅双边工作，而且在北约内部也很努力，以改变联盟的战略从针对莫斯科转向后冷战的目标。这给戈尔巴乔夫机会对他的政治局证明北约已经改变，不再是一个威胁。

统一的速度或许也有助于解决戈尔巴乔夫的异议。他显然未能提出比我们提出的要求更好的想法。他未能尽力保持德国的分离。他惟一可以有的选择不是暴力，而是试图让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中立。如果他坚持，也许他能够实现，但是一个没有束缚的德国在中欧松散以后对他说来比约束在北约看上去更糟。

虽然统一现在已经实现，欧洲已痊愈，但未来有更大的问题悬而未决。统一的德国这时在北约已维护了我们在欧洲的存在。我们应该先于北约的转变而行动，确立它的行动方向，使之成为欧洲稳定而不是军事对抗的政治工具。华沙条约那年夏天正式解体。我相信北约会独自在欧洲的安全和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有美国。

这将持续多长时间呢？对欧洲政治和经济领导权的竞争现在进入一个新时期，有新的设想和新的参加者。一种平衡已经出现——德国——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确信其蕴含的意义。悲观主义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会在后来说我们不是让德国恋着欧洲，而是让欧洲恋着德国。另一方面，弗朗西斯·密特朗似乎仍然相信他能够指导法—德协议并通过它维持法国在欧共体的支配性影响。他也似乎相信、或希望北约作为欧洲安全的工具将萎缩，政治稳定功能则由于欧共体和欧安会而加强。我认为他预测孤立主义的美国公众最终会要求美国军队撤离和放弃对欧洲安全的领导权给法国。至于我们，我们相信德国会在欧洲的未来发挥一种建设性作用，也会支持美国在那里的稳定存在。我们则继续通过对联盟的动态领导

显示我们在那儿的价值。但这不是未完成的旧责任,它是新的责任。我们作用的展开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超级大国在面临后冷战世界新的不可预测的挑战时相互合作关系的发展。

第十二章 忍无可忍

乔治·布什

1990年8月1日，星期二晚上约8点20分，心烦意乱的布伦特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专家理查德·汉斯一起出现在白宫医疗所的地下室。我身着短袖衫坐在检查桌边做着深呼吸以减轻我的肩膀疼痛，这是那天早些时候打了很多高尔夫球的结果。我扣着衬衣，和他们两人上台阶来到明亮的大厅。“总统先生，”布伦特严肃地说，“事情看上去很糟糕。伊拉克也许要入侵科威特。”

这是我首次听到证实了我们担心的消息。整天都有消息和传言说伊拉克正在向科威特边界调动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和我们的情报机构在密切监控形势，布伦特和我一直在关注最新形势发展。两国关系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因石油生产和价格问题的对抗而高度紧张已有数周，又由于伊拉克因领土争端对科威特的长期忿恨而激化。在7月25日石油输出国一次会议和一些地区外交之后，政治危机似乎得到缓解。然而，又有报告说新的军事活动在增加了，虽然，我们还不能过早地确定伊拉克的意图。

理查德现在简单告诉我事态的发展，并建议我打电话给萨达姆·侯赛因劝他不要进攻。在我们说话时，布伦特接到国务院鲍勃·克密特的电话，知道我们的大使报告了科威特城市的枪战情况。“都是在讲萨达姆。”我摇摇头说。布伦特和理查德出去了解进一步的消息。

必须承认那天晚上我心里想的不是伊拉克。我们正处于经济

衰退之中，还有一场丑陋的党派预算之战。国会领导人正在紧张地开会以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也还有其他外交上的麻烦吸引我的注意力，如土耳其的扣留人质问题，黎巴嫩的城市战争悲剧，那里的美国人处在危险之中。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布伦特的电话响了。“清楚了，”他说，“他们越过了边界。”这就不再是伴随某些耸人听闻的战争恫吓之争端，而直接就是侵略。我们的情报证实伊拉克以大量的军队横扫科威特。布伦特以他特有的精确性召开一个会议考察形势，并开始提出建议。这样一个开端很重要，他在接下来几个月所扮演的角色常常受到人们忽视，他在我身旁完成的许多最初的计划和认真的思考或许比人们所知的要多。

我发现很难相信萨达姆会侵略。有一刻我在想，或希望他的做法是想给科威特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解决他们的争端，在达到要求之后他也许会撤走。我担心这次入侵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的易受攻击的朋友沙特阿拉伯。

我已定于去科罗拉多的阿斯蓬发表一次演说和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会面，我要求布伦特在我出发前即第二天一早召开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几分钟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与国务院进行协商，这时我在与我们的联合国大使汤姆·皮克林通话。如果必要的话我准备单方面处理这个危机，我想要联合国参与我们的最初反应，强烈谴责伊拉克对其兄弟成员国的攻击。联合国的果断行动对于团结国际上的反侵略力量从而改变伊拉克是非常重要的。我指示汤姆与科威特人一起工作并尽他所能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的紧急会议。

虽然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但我还是不能确定能指望从联合国那里得到什么。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次危机是对后冷战时代安理会的第一个考验。我知道在本世纪 30 年代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国联领导未能抵抗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侵略，结果鼓励了这些政

权的野心。联合国的建立是为克服国联的错误，但冷战导致安理会的僵局。然而，如今我们改善了与莫斯科的关系，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也令人满意，这就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我们可能合作起来组成反对伊拉克的国际联盟。

苏联人的帮助特别重要，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安理会有投票权，同时也因为有他们就能够在政治上孤立伊拉克。我们所试图做的与莫斯科在该地区的传统利益和政策并不一致。苏联长期以来在原则上是伊拉克的政治和经济教父，并向萨达姆·侯赛因出售导弹和空中防御系统，还有坦克和其他装备。莫斯科在那里有接近200个军事顾问和数千名技术人员。我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吉姆与谢瓦尔德纳泽的稳固关系已信誓旦旦，但是他们会（或能够）与我们一起走多远仍有待观察。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和一个朋友正在附近的餐馆里，7点多一点我的寻呼机响了。我说了声道歉就打电话给办公室，得知理查德·汉斯要我直接回白宫。

本届政府之初我就把理查德带进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从未和他一起工作过，但从他在国务院及在荷华德的肯尼迪学校时，从他的作品中以及我们一起出席的许多不同的会议上我认识他已有数年。他对问题有敏锐的分析能力和创新的处理方法，他的文笔也很好。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运气也相当不错，在波斯湾危机时期他担负全责。此外，他具有在巨大压力之下写出漂亮散文的难以置信的能力。

那天晚上我到达白宫时，理查德刚从一个紧急会议回来。他向我提供最新的令人沮丧的情报，又说小组认为布什总统应该立即打电话给萨达姆敦促克制。它也许太迟了，但我们仍然去住所告诉总统所发生的事情。他听到此消息很冷静，仔细听着我们所能提供的细节。克密特来电说侵略正在进行中，我随即指示召集

助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从鲍勃·盖茨度假以来由我主持。我跑回去告诉我的妻子,然后回到工作室,那里晚上11点召开一个紧急电视会议。当晚的会议持续到凌晨2点。我们一致建议尽可能快地采取一些措施如调动军队,包括派一个中队的F-15到沙特阿拉伯,设想沙特会同意。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冻结伊拉克特别是科威特在美国的财产——特别后者急需在伊拉克通过我们听说已经建立的傀儡政府掠夺它们之前就完成。白宫顾问包登·格雷起草行政命令来实行之,早晨4点30分我带着它们去找总统签署。

波斯湾起初并未列入政府的主要关心区域。尽管有些时候与伊拉克的分歧令人气愤,但从1980—1988年两伊冲突以来该地区的发展开始恢复正常,它更多地吸引了我们的专家而不是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然而,波斯湾附近巨大的石油资源对于美国必然具有经济和安全上的重要性,我们早就把之作为战略考察的目标之一加以注意。

从美国20世纪60年代自该地区撤退以来美国政策的制定者就一直关心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由于伊朗国王垮台,我们美国作为该地区的稳定力量第一选择是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采取平衡的政策。这使得里根政府在两伊冲突时倾向于巴格达,不是出于对两个都应受指责政府其中一个的偏好,而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谁赢得这场战争和担心伊拉克将被证明是弱者。这场战争以后,里根政府把改善与伊拉克的关系多少有些制度化。这就是试图鼓励萨达姆·侯赛因方面接受现代化,也希望保证美国人的生意在设想的伊拉克重建努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些目标对我们来说似乎确有理由,我们继续追求它们而搁置了政策考察的成果。实现它们并不容易。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粗暴强硬、冷酷无情,甚至有偏执狂的独裁者,对外界很少曝光,对西方有深深的戒心。它的政府的人权纪录无人知晓,它支持恐

怖分子的历史则众所周知，并可认为与我们有关，即使在我们的关系改善时期它对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有所减少但一直存在。也有一些安全问题使我们的关系复杂化。萨达姆有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并已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伊朗人以及他自己国家的库尔德人。像他的近邻伊朗一样，他已经得到中程弹道导弹，因此想威胁得到中东包括以色列的更大份额。更为不祥的是，我们知道他试图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虽然我们的情报估计他还有很大的距离。

国家安全局的分析为里根政府的海湾政策提供了广泛支持。1989年10月2日布什总统发出指示再次确认我们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警示性地表达了我们的关心，总的说来仍肯定了以前对伊拉克的政策：美国与伊拉克的正常关系将服务于我们的长远利益和促进海湾与中东的稳定。美国政府应当在经济和政治上促进伊拉克的现代化和增强我们对它的影响。问题是如何鼓励萨达姆·侯赛因至少做国际社会一个最低意义上的负责任成员，而不是接受或忽视他的破坏。

我们能够提供的主要经济刺激是继续向美国的出口商提供商品信贷公司(CCC)的信用担保，鼓励伊拉克进口美国的谷物[①]。1989年晚些时候，我们提供了10亿美元这样的担保，5亿美元可以立即使用，剩下的在发出前还得作进一步考察。外事拨款单在1989年10月通过，国会特别禁止进出口银行为伊拉克拨款的计划，一些议员还威胁禁止伊拉克接受CCC信贷。1989年美国对伊拉克出口总额为13亿美元，比CCC所可以提供的总数多不了多少。美国从伊拉克进口的石油1990年估计达到一个新的水平——25亿美元。CCC计划的失去几乎消除了我们对伊拉克所有的那点影响。1990年2月，国会停止CCC悬而未决的制裁议

① 农业计划司为美国的出口商提供一定程度的担保，但不对伊拉克提供援助或资金汇兑。

案。对于它伊拉克作出了一些有限的积极姿态，如表示愿意对完全是在美国船上被杀死者的家庭作些赔偿，他们是在两伊战争期间被伊拉克的反舰导弹所击中的。

鉴于萨达姆行为自相矛盾，这些是我们采取的主要步骤。为改善关系我们正在做我们认为是诚信的努力，但是结果并不如人意。我们与伊拉克继续在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由于他们侵犯人权，我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以及我们的年度报告中就此主题批评了他们。我们谴责伊拉克1990年5月15日处死英国作家法拉德·巴若夫。随着我们的气愤与日俱增，一些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对我们与伊拉克的关系变得如此对抗表示关心。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1990年初，对我来说事情已逐渐清楚，萨达姆对美国的政策突然有了变化，他早期采用的也许是为了讨好我们的相对缓和政策正在被抛弃。他的行为举止甚至难以定性。他告诉我们的外交官他寻求改善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时，又开始声称美国、以色列和英国在策划一个反对他的阴谋。我的结论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萨达姆已决定中止站在美国一边的政策，而代之以站到“反对派”——那些反对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甚至反对其存在的国家——的前沿。他加入他们对由苏联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的谴责，在4月初威胁如果以色列像1981年打击核设施一样再次攻击伊拉克将玉石俱焚。该威胁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中断了提供第二个5亿美元CCC信贷的计划，国会再次打算制裁。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当前的政策已不再合适。然而，萨达姆以性格多变而臭名昭著，因此我想在改变自己的方向之前我们应该等待进一步的证据。这样一个过程有小的风险，因为没有坚持我们确定的政策。

除了刺耳的反以色列论调,伊拉克所造成的麻烦是仍寻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3月我们揭露并成功地阻止其试图获得非法的反应装置,它能够用于核武器。我们与英国人一起调查并阻止伊拉克获得部分远程的装有长筒的"超级枪"炮的努力,他们想自己建造。后来在7月,我们在新泽西的码头查获能够用于他们的核武器计划的特种钨炉。

萨达姆日益增长的好战性埋葬了我们的伊拉克政策。试图让我们节制他的行为的分析似乎是最正当的主张,我们不可能再忽视当前出现的变化。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必须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告诉他我们的想法和期望:除非伊拉克的国际举动有明确的变化,否则我们不可能在商务上一如既往。换言之,他站在一个交叉路口,如果他作出错误的选择,他就要冒使我们成为反对者的风险。

这个信息首先通过我们驻巴格达的大使阿普里尔·葛拉斯皮尔送交塔利克·阿齐兹外长。在华盛顿,雷利·伊格尔伯格向伊拉克大使作了类似的传达。此外,我们决定利用共和党的少数派领袖鲍勃·多尔率领包括民主党的霍华德在内的两党参议员中东旅行团,该团定于4月中旬访问巴格达和会见萨达姆,从而评估进一步制裁之需要。在他们的旅行之后,多尔报告萨达姆确实相信有一个反伊拉克的阴谋集团,虽然在多尔向他保证布什总统并未策划反对他时这位伊拉克领袖显得很高兴。参议员旅行团的结论基本上是乐观的:停止制裁和让关系开放——制裁只会给萨达姆的阴谋理论提供证据。通过这些场合伊拉克人从我们那里接收到了一致的信息:我们需要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建设性关系,但伊拉克的行为仍表现为主要的障碍。

在外交政策出现令人困惑的变化的同时,萨达姆也因石油与他的阿拉伯近邻纠缠不休。石油出口构成了伊拉克外汇的主要来源,几乎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

巴格达的生产和价格标准得由组织内部的协议来确定。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统一程度、成员遵守指定价格和生产标准的自愿程度(以及作为结果对世界石油价格的影响)在改变。过去,该组织有一个稳定期,特别在石油价格上扬时。然而近年来,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外有更多的石油流入市场,价格承受压力,成员国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队伍迅速溃散。由于价格下落,为维持收益就冒风险过度生产和超配额出售,这又进一步使价格走软,致使其他看到自己收益下降的石油输出国成员感到恐慌。极度需要该收益的萨达姆开始抱怨这个恶性循环,并把他的怒火集中于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石油生产并不是伊拉克与科威特的惟一摩擦。两伊战争期间,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个主要支持者(还有沙特阿拉伯,它为了伊拉克在中立地带出售了大量石油),它们的关系在过去因为几个因素而紧张起来。它们共有的边界存有争议,该边界分开了富有的罗美勒油田。伊拉克也对科威特附近的岛屿提出要求,特别是巨大的布比沿岛,它控制了伊拉克主要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右姆·卡斯特的通道。科威特在伊拉克与伊朗打仗期间出借该岛屿给伊拉克使用,巴格达想占有它。还有在战争期间科威特提供伊拉克的300亿美元的债务,科威特已要求归还。这就是积怨。

7月中旬,萨达姆加剧了对抗。7月17日,他谴责科威特和阿联酋超过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生产限制和降低价格,他声称这使得伊拉克减少了约140亿美元的年收入。他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停止的话伊拉克将采取"有效的行动使其恢复正常"。与此同时,伊拉克的媒体发动了一场反对这两个国家的宣传战。萨达姆通过塔利克·阿齐兹发出一封致阿联酋总书记克里比的好战的信正式作出这些威胁,该信指控科威特不愿解决边界问题,拒绝取消伊拉克的巨大债务,它的石油政策导致从有争议的油田"盗窃"石油,构成"军事侵略"。

科威特派代表到阿拉伯世界陈述它自己的理由，并请阿拉伯联盟调解边界争端。萨达姆继续施压，7月17日命令两个共和国卫队师开赴边界，并动员其他的部队。科威特立即使自己的弱小军队处于警戒状态（虽然没有寻求美国的帮助）。阿联酋的海上石油设备在两伊战争期间曾遭到伊拉克攻击，他们紧接着于7月22日提出谴责，同时请我们派出空中加油机和参与联合军事演习。作为我们在该地区有重要利益的一个提示以及我们对伊拉克恫吓不满的一个标志，我们派遣了两架加油机和一架运输机，它们于7月24日到达。沙特7月23日使自己的军队处于警戒状态，但告诉我们他们欣赏美国人的支持，不过事情最好由阿拉伯人自己解决。

我们不能确定萨达姆的目标，考虑到他三番两次的言论与这样一些阿拉伯领袖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沙特国王法赫德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他们彼此都有联系）的舆论，也许不会有进攻。根据我们驻科威特大使纳撒尼尔·豪威尔的报告，科威特人自己也茫然不知所措。对他们来说这不再是石油或边界而是谋求地区霸权的企图：谁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阿拉伯世界扮演领导角色？他们看到类似两伊战争一触即发。我们一直注意伊拉克的军队调动，但是，从那以来边境没有后勤上的部署。我们的结论是伊拉克没计划搞一次火速的军事行动。然而，我们决定立即使我们的警告升级。我们对科威特或那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没有正式的义务，但我们在那儿的利益从艾森豪威尔以来每一位总统都作了宣布。国务院召见伊拉克大使，提醒他美国在两伊战争中的行动表明我们对海湾国家的主权和完整负有责任，明确我们将继续保护我们在那个地区的利益。葛拉斯皮尔也被指示告诉伊拉克外长同样的事情，在7月20日以后的日常例会上，她重复了我们澄清伊拉克意图的要求。

当代的阿拉伯领袖通过电话、使节和个人访问仓促地疏导着

日益严重的危机。穆巴拉克7月22日在开罗会见塔利克·阿齐兹,第二天那里又加入了侯赛因国王。两天以后,穆巴拉克飞到巴格达和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企图调解并提出阿联盟外长在开罗会见。他通过海底电报告诉布什总统他们的讨论情况。他敦促萨达姆克制升级,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侯赛因总统敏感和有接受力。”他写道。穆巴拉克“相信能够毫不迟延地实行和解”。他要求美国避免任何会导致火上加油的行动,从而使紧张局面的缓和更为困难。外界力量宣布参加海湾的军事演习和发表声明应该考虑使当事者更加接近而不是加深他们的隔阂。沙特驻华盛顿大使班达·宾苏滕告诉布什总统,阿拉伯人对穆巴拉克与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谈话感到高兴,沙特阿拉伯赞成美国处理该局面的方法。

7月25日萨达姆突然召唤葛拉斯皮尔到总统府。操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她独自应邀,没有记录者或翻译。后来,她发了一个电报简要报告她的谈话并指出她相信萨达姆很焦虑。“他不想进一步与我们对抗,”她写道,“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军事演习,我们已经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很好。我相信我们能够谨慎地减少公众对伊拉克的批评直到我们看到谈判在如何发展。”萨达姆抱怨我们加入军事演习只会鼓励阿联酋和科威特忽视常规外交。他警告如果伊拉克公开受到美国的伤害,那么它除了“反应”以外就没有选择。然而那会证明不合逻辑和自我毁灭。葛拉斯皮尔电报说:

> 虽然不是十分清楚,萨达姆给美国的信息似乎他将大力推动与穆巴拉克外交的合作,但我们必须尽力了解科威特和阿联酋令人难以忍受的“自私”。大使表明除了和平方式外我们不可能提出解决争端的办法。

在她更长更完整的报告中,葛拉斯皮尔详细介绍了她向他提

出的问题以对萨达姆的意图作出更为清楚的描述：

> 当总统和外长都公开说对科威特的行为等于是军事侵略，以及又听说许多师的共和国近卫军已被派往边境时我们表示关心不是很有理由吗？本着友谊而不是对抗的精神，我们问很简单的问题："你想干什么？"不是很有理由吗？
>
> 萨达姆说这个问题确实有理由。他承认我们应该关心地区的和平，事实上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责任。"但是我们怎样能使它们（科威特与阿联酋）理解我们受苦有多深呢？"

葛拉斯皮尔描写萨达姆怎样离开房间去接穆巴拉克的电话，穆巴拉克告诉他已经安排科威特和伊拉克的代表团在利雅得会见，科威特王储接着就到巴格达来谈判。"我告诉穆巴拉克，"萨达姆说，"会见前什么也不会发生，"以及如果科威特最后"给我们一些希望，那么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也不会有事"。

乔治·布什

葛拉斯皮尔是我充分信任的老外交官，她为与萨达姆的会见受到很多批评。她被他骗了，她清楚地说出了我们只能接受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争端。根据这次谈话得出结论说我们为萨达姆强占其邻居开绿灯完全是误导。没有一个人，特别是萨达姆·侯赛因能够怀疑美国对海湾有强烈的兴趣，不会容忍侵略。她的陈述"如你所知，我们不赞成领土争端"（标准的国务院语言，即我们不会持肯定边境争端的立场，而是希望和平解决）意思完全被误解为我们会考虑其他方式。我很遗憾国会以此为目标抨击她。

当葛拉斯皮尔在巴格达与萨达姆交谈时,阿拉伯外交在日内瓦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上的运作也到了紧要关头。在那里,科威特和阿联酋接受了伊拉克满意的价格安排,石油输出国组织也确立了必须服从的义务,这曾是伊拉克的主要抱怨之一。然而萨达姆似乎并没有很快从他的石油出口得到资金上的缓解(价格并未很快达到伊拉克所要求的那样高),但他使石油输出国组织行动和允诺科威特与阿联酋将服从新的价格与配额。巴格达同意与科威特对话,穆巴拉克宣布萨达姆个人告诉他伊拉克没打算对科威特动武。对我们以及对阿拉伯领袖说来,似乎危机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都被我们所看到的某些进展所鼓舞,包括葛拉斯皮尔与萨达姆的会谈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的结果。外交似乎在起作用,即使步子慢一些的话,阿拉伯领袖也感到乐观。葛拉斯皮尔向我们建议的只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不要过于乐观,而是让谈判进行。为尽我们所能巩固进展,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人员建议总统发电报给萨达姆——很不寻常的步骤。我们计划说我们对新近的发展感到高兴,但是也警告说反对进一步的挑战行为。它提醒萨达姆我们在那个地区有利益。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对话开始之前我们不想发出更加“强有力”的信息,因为这不是做姿态威胁的时候。阿拉伯领导人坚持他们能把事情处理得很好,美国采取的单方面步骤只会使问题复杂化。海底电报7月28日送达。侯赛因国王第二天打电话给总统说信“已收到,什么事也没发生”。

尽管有7月25日新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协议和外交警告,以及他对阿拉伯领导人的保证,萨达姆继续向科威特边境增派军队。

我们7月24日的分析明确他已有足够的军队和逻辑上"完全的选择自由"。7月31日这些军队已达近十万，接近科威特军队的五倍。萨达姆仍想从科威特那里强索其他的让步，如财政援助，或他想确保科威特与阿联酋依从石油输出国组织协议吗？他是想夺取罗美勒油田和沃巴与布比洛岛屿吗？有机会他也许会夺取整个科威特。他现在拥有的力量足可以在48小时之内压垮科威特的军队。

既然萨达姆已按他的方式达到他公开的目标，似乎他不可能会侵略。他已经提高了石油价格，该问题似乎已触及最初的危机，伊拉克的债权人或许很快会取消主要的债务和保证进一步帮助重建其经济。由于这些理由，他的进一步改变显得是敲诈，意在从科威特得到额外的经济和领土上的让步，或是按伊拉克的条件解决边界争端。

7月31日，双方在吉达会面，但是在伊拉克要求科威特豁免伊拉克的债务和放弃某些领土时谈崩了。然而，塔利克·阿齐兹宣布由穆巴拉克和法赫德国王调解的会议将在巴格达继续，伊拉克大使穆罕默德·萨迪克·奥马夏特在华盛顿告诉助理国务卿约翰·凯利同样的事情。第二天晚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防止冲突的主张——对好战的行为施以警告，明确我们站在我们的朋友一边，继续提倡好的行为和好的关系——失败了。一个"威慑的"政策，如对伊拉克使用任何武力施以威胁，会更有效吗？既然萨达姆后来没有被直接对着他出现的50万军队所劝服，那么他就不可能放弃武力。不是所有的战争都可以避免，萨达姆会按他选择的方式做。如果我们更加好斗从而他发动侵略(或许出现此情况)，那么我们就会被指控挑衅，这是使组织一个从根本上击败他的联盟的可能性大大复杂化的指责。

我们没有威胁干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阿拉伯盟友告诉我们那将是破坏性的——不仅对于在当前危机中与伊拉克打交道，而且对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也如此。我们仔细地听取和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而没有单方面地对之行动，这是很重要的，无论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都需要阿拉伯联盟的支持。如果我们没有地区的支持而采取反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行动，我们几乎肯定失去改善美国和阿拉伯联盟关系的机会以及在中东的信誉。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侵略之后阿拉伯联盟与我们的关系很巩固，因为很清楚我们已尽了一切可能来防止冲突，萨达姆完全错了。

乔治·布什

8月2日早晨，布伦特5点之前就到了，这时芭芭拉和我正在床上看着报纸。看上去很疲倦的他告诉我很多入侵的细节和他头天晚上讨论的情况。伊拉克的官方说法即它变动的借口是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它的“领导人”想成为科威特的“合法”政府，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当时的选择受到限制。我们还没有接到科威特或沙特官方的帮助请求，但是重要的是立即表明我们的支持。我命令我们的已处警戒状态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军舰开往波斯湾。我们下一步需要调动空中力量到该地区。布伦特解释说鲍勃·克密特已与沙特一致请求批准派一个中队的F-15。他交给我一个冻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美国财产的特别法令，我签署了它。至少我们能采取一些经济措施。

我在淋浴之后直往椭圆形办公室。6点30分汤姆·皮克林来电话报告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像布伦特一样他与科威特人及其他安理会成员通宵工作考虑详细的解决方案。凌晨，安理会投票14比0支持联合国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要求它从科威特撤军，要求以谈判解决争端。我对沙特阿拉伯的邻居也门的弃权感到失望，或许它在努力讨好伊拉克。我了解阿里·阿伯达拉赫·萨勒赫总统，不认为他会不顾一切地站在萨达姆一边。还有，

联合国的行动是好消息。苏联支持我们,这正是组成反对阵营的一个步骤。

大约7点布伦特到达椭圆形办公室,7点30分比尔·韦伯斯特与汉克·阿普尔巴姆(中央情报局发言人)出现,带着许多报纸给中央情报局《每日概要》杂志。这时候,由于布伦特态度模棱两可,我打电话给吉姆·贝克,他在蒙古的乌兰巴托,是在伊尔库茨克与谢瓦尔德纳泽开一个武器控制会议后作顺带旅行。关于海湾的不祥征兆吉姆已得到警告,他也已与谢瓦尔德纳泽谈到入侵的危险。谢瓦尔德纳泽如我们以前一样,相信萨达姆只是"强暴"科威特。由于有入侵的消息,吉姆敦促苏联人加入对伊拉克的武器禁运,谢瓦尔德纳泽启程去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商量。

8点多一点,我加入了在内阁大厅的布伦特及其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之中。在我们讨论开始前的"录像"中,我对记者发表简短谈话,他们都在急切猜测我们将要做什么。在嗡嗡响的手提麦克风"丛林"包围之中,我说话小心谨慎。我谴责侵略和概略指出我们已采取的步骤,以及已召开一个探讨会议,为保护我们在海湾的利益审视各种选择。合众社的海伦·托马斯立刻问我是否认为干涉也是这些选择之一。

我不想第一次公开谈话就直接威胁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说我没有考虑干涉,还有,即使我知道我们将使用武力,我也不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事实是,我这时候还没有想好我们将选择什么。我确实知道的是侵略必须被阻止,科威特的主权必须恢复。我们在作出海内外的抉择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开始不能犯一点好战的错误。我希望表达的是在我了解全部真相之前尚未决定如何处理局面。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总统关于没考虑干涉的谈话被一些人认为在对待伊拉克侵略的行动方面消极无为或优柔寡断,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在那天晚

些时候的会议上"使他硬起脊梁"。这样的推测是错误的,虽然他选用的措词并不好战。他选择的语言出于心中两个考虑:第一,不能这么早流露他的想法。第二,明确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决策会议,而是对形势的讨论和对反应的选择。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有点乱。我们实际上对现已发生的事情还没有清晰的图画,参与者主要注意入侵的经济影响和萨达姆下一步会干什么。韦伯斯特概述了入侵的范围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反应。阿拉伯联盟已通过一个决议谴责伊拉克,但是没有号召武装行动。莫斯科仍没有官方的说法。北约和日本呼吁伊拉克撤军。"东京的股市在下跌,石油价格在上涨。"韦伯斯特说。英国宣布地区和平受到极大威胁,除了科威特以外似乎没有军事目标。

鲍勃·克密特加入到贝克与伊格尔伯格之中,说出我们已经采取的外交步骤。国务院召见伊拉克大使,他说他知道的不比巴格达告诉世界的更多。外交公告全都很简短,欧洲人已经和我们一起工作,没有人支持伊拉克。我们已经拍电报请其他国家加入我们的经济制裁。英国召开一个内阁会议辩论该做什么。我们也请苏联、法国、意大利和中国停止对伊拉克的武器供应。没有关于在科威特的3 800名美国公民和270名使馆人员,或在巴格达的500名美国人与42个使馆人员的报道。

尼古拉斯·布拉迪指出伊拉克力量的源泉是它的石油,没有它,巴格达就没有钱使其军事机器运转。他提议我们切断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并请其他国家填补其差额。切尼说除非经济和政治制裁生效,否则伊拉克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主要的石油大国。"世界的其余部分严重缺油,"迪克说,"他们对可怜的科威特没多少兴趣。组织一个好的一揽子经济制裁也许有困难。"

讨论转向削减石油的影响,接着科林·鲍威尔介绍我们的军事选择。"总司令部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好

军事准备应该需要几周时间。"他说。中央指挥部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和对在该地区实施军事反应负有责任的人都被邀请与会。他描述了即将进行的空中打击,从海上对伊拉克的轰炸,它们能够在什么时候行动,以及我们能够怎样快地调动军队保护沙特阿拉伯。我们有几艘在海湾的船只能够在数小时之内击中一些目标,但得花几天时间作准备。我们的 F-15 和 F-16 也整装待发,它们能承担保护沙特阿拉伯的任务。然而,这将需要使用那里的基地。至今为止,沙特人说不。

施瓦茨科普夫又说他有一个保护沙特石油区的演习计划,使用在那个地区的军队,他相信我们能够在那里使伊拉克的进攻受挫。然而,如果我们想进行反伊拉克本身的空战,就需要更多的力量和时间。我们将面对 100 多万伊拉克军队,将需要 20 天时间来调动足够的飞机和运输作战部队。

"让我们退回来,"斯考克罗夫特说,"经济方面最有效的选择是石油,这里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关掉两个管道(从土耳其到沙特阿拉伯),让进入科威特的坦克停下来——理论上是容易的,但实际上很困难。我们应该禁止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石油贸易。"围绕石油禁运的后果和哪一个国家会受到影响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布什总统请布拉迪对此问题作一分析,并询问与联合国宪章第七节有关的国际经济制裁,它可授权成员强制执行。皮克林说我们准备把此问题提交联合国。"国际制裁将给我们安全的名义,"总统说,"它们将给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采取有难度行动的国家一些支持,如关闭石油管道。"

克密特报告说国务院在考虑美国人从科威特和巴格达撤离问题。他们也在讨论中断外交关系,但决定不建议这样。美国公民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们要求我们在巴格达的官员保护他们。

布什总统建议我们请国会通过决议强行实施单方面的制裁,赞成联合国的行动,支持我们的反应。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情

报，他说。在我们了解情况之前我们不要声明承诺做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软弱，沙特阿拉伯及其他国家会拔腿就走。”切尼警告说。鲍威尔问我们是否应当宣布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我相信没有选择，”他说，“问题是你如何将它公之于众。”

总统说“我同意”，又说我们不能忽视其他大国力量的介入。至今为止苏联的反应是好的。“我们能使他们参加一份，”他说，“也就是说，不是采取冒险主义，而是让他们同意某些行动。美苏关系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他们想直通不冻港的愿望。我们不想使之再现。也许可以有一个积极的东西如联合声明。”下一步是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在纽约我们应施加压力让沙特阿拉伯及其他国家付款……让我们（美国）在伊拉克势力壮大前就进行适当的制裁。”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讨论的调子之低使我惊慌，它建议屈从侵略，承认既成事实。那些把所发生的事情视作我们时代的主要危机和那些把它看做法律危机的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评论倾向于忽视在此情况下美国所具有的重大利害关系，或后冷战世界出现的侵略之后果。一些论述不考虑发生事情的严重性，只注意中东石油的价格和乱糟糟的结果。该论调意思是危机几乎遍布世界，认真做些关于它的事太难了。后来那天早上，我同布什总统谈起我的关心。我问在下一次会议上我能否撇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开会习惯，首先概括谈谈这次侵略出于美国利益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和我有同感，并提出他本人要作这样一个声明。我告诉他那将会中止讨论，最后同意我先谈。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我们几乎立即去科罗拉多，作了一次被证明为是难以忘怀的飞行。通常空军1号不能在阿斯本机场着陆，为不再浪费时间开飞机到丹佛，总统决定乘小的C-20湾流

号直飞阿斯本。他、约翰·苏努努和我挤在小小的前舱，膝盖碰膝盖，共用一个电话，报纸铺的到处都是。

总统定于在阿斯本作一个重要演讲，提出一个新的军事战略和力量结构以回应冷战的终结。该演讲现需要作一些修改。我的草稿在总统对国会以及外国领导人的要求之间迅速地变化着，还有华盛顿的检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跟上海湾形势的发展。正是在讨论修改他的讲话过程中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必要的话总统准备使用武力把萨达姆从科威特驱逐出去，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这样说。

乔治·布什

我把在空军1号上的时间用于向外国领导人征求意见。我打电话给霍斯尼·穆巴拉克与侯赛因国王，他们正好一起在埃及的亚里山大。两位都在为局势大伤脑筋。

侯赛因国王告诉我他正要去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我真的要请求你，保持冷静，先生，”他说，“我们想在阿拉伯人的范围内处理这件事，寻找一个途径为更好的未来打下基础。”我告诉这位国王，世界不可能承认这样的现状。对美国说来也不可接受。“我相信萨达姆·侯赛因知道这一点，但你能够把我说的话告诉他。”国王回答说伊拉克“决定尽可能快地撤离，也许就这几天”，并答应促成它。

穆巴拉克解释说他们在努力寻找一个撤离而不“抛弃”科威特政府的解决方案。“乔治，给我们两天找解决方法的时间。”他要求道。我告诉他我们已采取经济措施。“当然，惟一的例外是，如果威胁到美国人——那就完全是一场新的游戏了。”穆巴拉克支持制裁（虽然我没有特别地提出该问题）。“我会立即对萨达姆·侯赛因说，”他说，“我也与沙特接触。”

“这非常重要，”我说，“请告诉萨达姆·侯赛因美国非常关心这个行动。我们非常关心其他力量的释放——你知道其含义是什

么，我的朋友。告诉萨达姆，如果你愿意的话。"穆巴拉克说他会，否则将会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我为你祈祷。"我说。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为"阿拉伯的解决方案"感到焦虑，担心以与萨达姆的妥协告终。这真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我们拒绝给阿拉伯的解决以时间，我们就可能在非常需要他们时疏远了我们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默许，而阿拉伯人搞了一个妥协，我们怎么能够拒绝它呢?

乔治·布什

我让贝克与蒙古通话，尽力改变苏联人的立场。与此同时，布伦特拿起另一个电话打向国务院政策计划部主任丹尼斯·罗斯，他与鲍勃·佐立克在莫斯科与谢瓦尔德纳泽在一起。吉姆说他将返回莫斯科尝试制定一个联合声明(已由罗斯和佐立克准备)，谴责伊拉克的行为和呼吁从科威特撤军。

我有一个机会在我们驻英国大使亨利·卡托的起居室里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交谈，卡托在阿斯本有一个家。撒切尔与我对形势的看法惊人的相似，我以为这使我们相互放心。我告诉她美苏声明正在制定，以及我与穆巴拉克和侯赛因国王的谈话。"两个人都要与萨达姆谈话，并敦促我们慢一些——他们需要时间。我说我们不可能接受既成事实。伊拉克必须撤军和恢复科威特政府"。我又说我正从迪戈加西亚岛调动一个航母战斗群。

"如果伊拉克赢，就没有小国安全，"撒切尔说，"他们不愿就此却步，他们看到一个机会能得到更大份额的石油。必须使之停止，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她说她和她的内阁已谈到贸易制裁，但是这件事得全世界来做。她想知道阿拉伯是否会行动以及沙特是否愿意关掉他们的石油管道，如果他们愿意将对石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沙特很关键，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她催促星期一我们应去联合国要求制裁。"侯赛因国王没有用，"她又说，"他告诉我科威特人将要来了——他们不太愿意，但是他勉强同意

与萨达姆搞平衡。"她不能确定叙利亚和伊朗站在哪边。

我告诉她沙特人可能有异议，因为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石油都被我们截断了，伊朗已有主动的表示。"我的一个担心是以色列人也许会采取某些行动，"我说，"这是一件可能让阿拉伯人联合起来的事情。"撒切尔认为一切都得回到让安理会通过制裁。"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赢，"她说，"失去沙特的石油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打击，我们不可能向独裁者低头。（而且）没有封锁我们不可能进行石油禁运。"

大约两点钟，撒切尔和我步出屋子去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谴责伊拉克的侵略和呼吁和平解决，包括伊拉克撤军和恢复科威特的政权。她直指最关键的问题——世界各国是否愿意共同而有效地贯彻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以及迫使撤军和恢复治权。要如此必须由美国人来领导。

那天下午稍后时间我在卡托的房间打电话给法赫德国王，电话放在床上，布伦特拍着我的肩膀。沙特阿拉伯对我们可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不可少，也许它也处在危险之中。在这一点上，我们不知道伊拉克的军队是否到沙特的边界就停止。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电话。国王焦虑不安，翻译竭力使谈话继续下去。

法赫德解释说他如何试图在伊拉克进攻前解决伊拉克-科威特争端，而双方都曾表示愿意对话。萨达姆甚至向这位沙特人保证他"对进攻科威特没有兴趣"。国王又愤怒地说萨达姆走向反面，"因为他骄傲自负，他没有认识到他的行动正在搞乱世界的秩序，他似乎只想到自己。他在步希特勒产生世界性问题的后尘——有一个差别：一个骄傲自负，一个既骄傲又疯狂。我相信对萨达姆除了使用武力以外没有工作可做"。

他提醒萨达姆在巴格达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期间，是伊拉克领导人建议这些国家通过一个互不侵犯协议，同意不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我今天与他的谈话是严厉和强硬的，"国王说，"我要

求他现在就从科威特撤军，我们不会考虑任何强加代表科威特公众舆论或阿拉伯公众舆论的政权。"萨达姆要求继续与这位沙特人对话，国王在想事情到了寻找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了。"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对在科威特的所有人——不管是不是科威特人——的安全负有责任。"他宣布。

法赫德国王说他愿意会见萨达姆的使节，他定于第二天到达，但萨达姆必须明白伊拉克的军队必须撤走。"惟一的其他方法是使用武力，"他严肃地说，"总统先生，这是一个特别严重和重大的问题。它是一个不可能被任何理性或道德的原则所同意或宽恕的问题。"穆巴拉克提议翌日召开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国王对此的想法很棒。"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和平地解决，"他说，"如果不能，萨达姆必须得到他的余生难以忘记的教训——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我问科威特王室家庭是否安全，他要我对此放心(我们经常听说埃米尔的弟弟决定坚持和战斗。后来他在一个宫殿的台阶上被射杀)。埃米尔勉强有 5 分钟时间来逃脱，外交部长几乎被抓。我接着概述了我们的行动。我向他提供一个 F-15 中队，但是他要求讨论进一步的选择。

法赫德国王的犹豫敲响了我头脑的警钟。我开始担心沙特人也许会妥协，他们也许会接受北方边界新的既成事实，如果它们仍在伊拉克人的占领之下的话。阿拉伯人的历史嗜好就是试图作"交易"。即使我们了解沙特人，信任他们，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在这场危机的起初几个小时里，由于事态如此，我必须考虑到，他们是否会在压力之下倾向于与萨达姆达成某种幕后协议。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想到这样，但是该国王不太愿接受飞机引起我注意。我们不可能在中东唱美国的独角戏，我们必须有阿拉伯盟友在我们一边，特别受威胁最甚者——沙特人。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在科罗拉多时我打电话给汉斯请他起草一个一般的备忘录，由我交给总统作为下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背景材料。在里面我们描述了一个抑制伊拉克的政策，放慢其发展常规和非常规武器的能力，对其从科威特撤军产生影响。“这样的政策所必需的手段将有出口控制、经济制裁和军事行动升级，既是单方面的也包括其他国家”。它警告说在此关口重视外交和制裁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在这一切归于无效之前就行动起来，我们将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是让新的既成事实或伊拉克的直接挑战存在下去，要么还以力量或行动(关闭它们的管道等)，而这些几乎肯定会导致军事冲突。备忘录概述其风险说：

> 我像你们一样清楚这样的冲突将会被证明代价有多大和多么危险。但是接受这个新的既成事实也同样如此，我们将确立一个可怕的先例——一个只会加速暴力离心力趋势的先例——在这个“后冷战”时代到来之时。在美国事实上对海湾稳定承诺责任的时代，我们在鼓励海湾的危险竞争——承诺已被我们的声明和军事调动而加强——这又以非常严重的方式提出了美国的可靠性问题。如果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伊拉克已有能力并且想使中东的和平进程复杂化。我们不需要决定还要在什么地方划清界限，我们需要的是采取行动——调动军队，向盟友和不太情愿的阿拉伯人施加压力，等等——这至少会给我们一个现实的选择，如果当前的努力无效的话。

那天晚上我们很迟才回到华盛顿。第二天一早，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于内阁大厅再次聚会之前，布什总统和我再次确定，在简要

通报情报之后，我将首先讲话和向各位提醒风险。伊格尔伯格与切尼将接着加强这个群体的团结一致。

尽管传说萨达姆保证在几天之内从科威特撤走，韦伯斯特还是不敢乐观。我们的情报仍不完全，但我们所得到的消息仍然不祥。萨达姆在加强他对科威特的占有。“所有的情报显示他不想出来。”韦伯斯特说。如果在明年还没有遇到挑战他就将留下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波斯湾地区。他会采取不公正的立场，既然他控制了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已探明的石油储备以及第四大的军队。他也会得到科威特的金融资产和海湾通道，以及把金钱倾注于他的军队的能力。萨达姆国内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他的个人自负不可能被满足，他的野心会更大。约旦和也门倾向于伊拉克。伊朗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很弱，所以不会是一个有力的对手……这并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不能指望阿拉伯人对抗伊拉克，但可代之以让他们出钱。

“……我发现一个便条，写道我们也许得默许对该局面的调停，”斯考克罗夫特说，“我个人的判断是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与伊拉克的调解不应当是一个政策选择。”

伊格尔伯格表示支持。“这是对战后体制的第一次考验。”他说。由于两极的世界已松弛，它允许人们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他们不再担心超级大国的介入……萨达姆·侯赛因现在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苏联人被国内问题缠住了手脚。如果他成功，其他人也可以试着做同样的事情。他相信沙特阿拉伯将是萨达姆的下一个目标，过些时间他就会控制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石油价格。“如果他成功，那么他会攻击以色列。”

切尼清醒地意识到局面的严重性和与之对抗的代价。“起初，我们应该把这件事与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战略利益和石油区分开，”他说，“萨达姆的行为明确表示他想支配石油输出国组织、海

湾和阿拉伯世界。他离沙特阿拉伯40公里,距其石油产地只有两三百公里。如果他没有实际得到它,由于有了新的财富他仍然有影响并能够得到新的武器。问题将更糟,而不是更好。看看军方的能力与选择,"他又说,"我们不应低估美国的军事力量,我们需要为一场重要的冲突做准备。"

伊格尔伯格报告说皮克林在传送一个给安理会其他常任国的制裁草案。"苏联支持它。英国和法国想讨论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没表示他们不会支持它。"他对我们的胜利感到乐观。总统问起伊朗,伊格尔伯格说它也谴责侵略。科威特人与伊朗人已会面。"按照科威特使节的说法,伊朗人对他们说:'告诉我们你们想要什么,我们来做。'科威特人说我们想要你们劝伊拉克人离开。在迟疑一会以后伊朗人说它将受到支持。"他又说叙利亚请我们推动阿拉伯国家。"20小时之内在开罗将有一个阿拉伯联盟外长会议,"他说,"也许他们会意见一致。"

切尼通报了最新的军事情况。他很关心沙特不愿我们的军队驻扎在他们的土地上。"我们需要沙特阿拉伯点头。"他催促道。他请总统与法赫德国王讨论这个问题。

鲍威尔告诉我军队需要准备应付意外。"有两点,"他说,"首先,与沙特阿拉伯一起进一步阻止伊拉克将需要美国的地面部队。这是最慎重的选择,我们需要与沙特阿拉伯一起行动,使萨达姆·侯赛因向南看,看到美国的存在。"第二是部署力量反对伊拉克在科威特的军队,保护沙特阿拉伯人或甚至进攻伊拉克。"请看看这个选择,"鲍威尔说,"这比巴拿马和利比亚更难。这将是'全国橄榄球联盟'而不是散兵作战。它将意味着一场重大的对抗。将持续调动大多数美国军队,不是一天或两天。他是一个职业的自大狂,他可以随意确定天平的比重。他们也有八年的战争经验。"

"如果我们想加以经济压力,那么我们需要考虑他会如何回应和看待这个代价。"斯考克罗夫特指出。问题不仅在于需要采取什

么步骤来进行制裁，而且在于怎样强制实行之。鲍威尔说军舰已经到位在阻止商船。

斯考克罗夫特警告说萨达姆有可能用美国人作人质。伊格尔伯格说有14或15名美国公民已经被伊拉克人监禁，有其他报告说被控制在科威特。我们能够尽力遣送我们的人，但是得有伊拉克人的合作。国务院已做其他国家的使节的工作，寻找一位愿意帮助所有人离开的中立国大使。"它也许不起作用。"他又说。他们警告伊拉克外长不要伤害美国人，并召回驻伊拉克大使。"他没作任何允诺。萨达姆是残忍的母狼之子。他认识到这是资本。"

"我们应当告诉萨达姆这是一场新的游戏，告诉他我们的底线，"总统说，"美国人的死亡和沦为人质将不可容忍。"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的调子比那天好多了，我们建立了我们的框架。如果总统在上一次会议上就有提示，我们的政策就大不相同，就会着眼于控制损害而不是改变它。我们想行动，但是，如讨论所揭示，我们的当下选择，如按总统命令向该地区调动军队和进行国际制裁，在此时刻因实际的和政治的原因都是很有限的。科威特是这样远，在有足够的军队在那里之前要做任何事情而不是象征性的存在都要花些时间，甚至把这些军队部署在何处也成问题。我们还必须相信沙特人，此时此刻在伊拉克部队继续面向南方对着沙特边界时我们必须坚如磐石。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是给伊拉克一个强烈的警告不要入侵沙特阿拉伯，这就是那天我们所做的。

为对劝说沙特人接受美国的军队有所助益，我们请大使班达王子在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来到白宫讨论局势。班达是国防部长之子，法赫德国王喜爱的外甥，受过西方的教育，并且是在美国空军受训过的战斗指挥员。最重要的是，他是法赫德国王处理难题的

能手，级别相当于沙特政府的部长。国王经常向他咨询。因这些缘由，我们知道他是我们联结法赫德国王的特别通道。

班达11点多一点来到我的办公室。在提出我们相信他的国家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之后，我告诉他我们在考虑向王国提供美国军队，帮助其防御。他似乎不太高兴，对此建议的反应并不热烈。对他的含混态度我有些惊异，问他为何对我以为是慷慨赐予的行为表现出有疑问。他的回答使我沮丧。他解释说沙特人并没有确信他们需要美国人的保护。他说，确切说来美国在此地区的声望并非可以信赖。他引用了两个例子支持他的论点。

1979年伊朗国王被迫逃离伊朗，美国提供了一个中队的F-15给沙特阿拉伯做出支持的姿态和警告伊朗的激进分子。沙特人立即接受了。然而，当这些飞机在路上时，华盛顿宣布它们没有武装。第二个例子是1982—1984年美国于涉黎巴嫩。我们派海军到贝鲁特大肆炫耀。不久在海军营房遭到恐怖主义的可怕攻击之后，美国很快把海军运上军舰开走了。为什么国王不担心这些呢，如果情况变得严峻，美国的行为还会同样吗？

我回答说我们能够对过去进行争论，但我宁愿针对现在。布什总统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完全认识到一切后果。根据这个情况，我能够给他一个保证，如果他们接受被提供的军队，我们将支持他们到底。班达说这些保证使情况有了改变，但是如果能简要告诉他我们的防御计划将很有益处。我与切尼商量送班达到五角大楼，在那里向他出示回应伊拉克威胁的中央指挥部计划。沙特人先前计划派一个低层次的技术小组到华盛顿讨论形势和最好的合作方式，班达现在代之以同意一个高级美国小组去沙特。

乔治·布什

早在8月3日下午，我与土耳其总统特加特·奥扎尔谈话，他愤怒地说萨达姆应该“得到他的教训”。他在一个小时以前与法赫德国王通话，担心沙特人不采取行动。“我告诉他如果解决方案是

伊拉克回去，科威特人付钱，那就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另一个慕尼黑。"我提醒他土耳其关键的地理位置，并问他是否愿意关掉从伊拉克来的管道。他没有回答，但是说我们需要比封锁更多的东西。他建议我们让北约组织一起讨论这个形势。"我们不应该重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的错误。"他宣称。

我也与弗朗西斯·密特朗交谈，他同意我们不能接受既成事实，这样做就是允许萨达姆在阿拉伯世界建立霸权。他又说，如果搞石油封锁，就必须成功。如果不成功，西方就会大大丢脸。我们也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让阿拉伯世界一致反对我们。关键将是沙特人。"如果沙特阿拉伯勇敢地反对吞并科威特，就会带动其他国家。"他说。赫尔穆特·科尔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那天晚些时候我也与他们通话，他们都赞成我们需要联合行动。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那天晚些时候，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在莫斯科发表一个联合宣言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该声明特别重要并使许多人惊讶，因为它表示伊拉克的主要靠山不支持萨达姆的侵略。它戏剧性地表明两个超级大国自冷战开始以来第一次在一个重大危机中站到一起。而我以为一个统一德国在北约的成员资格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这当然是进一步令人信服的证据。宣言实质上是苏联人帮助在联合国形成一个稳固的集团支持反对萨达姆的决议。后来我们了解到它掩盖了克里姆林宫在惩罚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戈尔巴乔夫似乎支持宣言，他绕开国内政治斗争批准了它。谢瓦尔德纳泽勇敢地承担风险，为此声明承担个人的责任。

8月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戴维营开会，我们集中注意力在军事选择上。"当然，我们主要根据我们的目标作出决定。"切尼指出。鲍威尔概要介绍了军事形势和选择。他说："我们要提出的是一个推敲了几个星期的长期计划。"它将保护沙特阿拉伯，并为使

北方回到科威特奠定基础。“它是困难的但可行，”他又说，“供养这样规模的一支军队花费巨大。还需要召集一些预备役。”

他继续说，该计划有两个方面：威慑与战斗。“我们从沙特人那里得到的邀请愈早愈好，”他说，“我相信伊拉克在与我们交战之前会反复考虑。我们能够迅速使用空中力量，我们能够解决伊拉克的空军。我们也有一些能够加强的海军力量。地面部队可以使用一个月以上。所有这些都表示我们能够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行动。基本的军队规模是 10 万人。”

施瓦茨科普夫描述我们将对付什么。“伊拉克有1 100架飞机，但大多数已过时，而且没有使用他们的空军进攻的经验，”他解释说，“伊拉克不是十只脚，但是难对付。他们有一支 90 万人的军队，63 个师，5 700 多辆坦克。我们多次看到有很多武器展示，但只有少数具有高质量。他们没有自动火炮。我们的有利条件之一是他们会有远距离作战的问题。他们的军队较多，但比我们派去的质量低许多。他们的飞机不能到达南部半岛，我们只要用很少的时间就能获得空中的支配权。他们的海军微不足道，我们很快就能控制海湾。他们在关键的地点如巴格达有厚厚的(空中)保护层。他们的全部实力包括人数、经验、化学武器和一些现代装备。他们的弱点是集中的指挥和控制，可依赖的外援少，缺少防御经验。”

施瓦茨科普夫说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距离。“在一周之内，我们能够有 5 个战术战斗机中队和航母战斗集团出现，”他说，“两周之内我们能够增加一倍。两周以后我们也能够有稍稍超过 1 个师的军队。所有的计划将要用 17 周。”

“我们在 11 天之内在该地区可以有 400 架飞机，”施瓦茨科普夫的空军司令查尔斯·霍纳中将又说，“我们的军队处于警戒状态整装待发。”

施瓦茨科普夫与霍纳都建议依靠空军力量，至少短期如此。

"空战的历史表明它们并不是惊人的成功，"切尼说道，"这一次为何会不同呢？"

"我并没有建议只用空中力量，"施瓦茨科普夫回答说，"但这一次的环境到处都是目标，在沙漠中不可能掩盖起来。他们的军队在攻击下面无法运转，我们有很尖端的武器。"

"我担心一件事情，"斯考克罗夫特说，"沙特人关心我们的认真程度。地面部队是我们承诺的最好标志，但是这个计划重点是空中。"

"班达对我们提供一个战术战斗机中队不高兴，但他们在听到我们的情况介绍之后已无怀疑。"切尼插道。

"我担心不合沙特人意愿他们也许会退回去，"布什总统说，"我们需要问问他们。"

在这位介绍人离开房间之后，讨论转向下一步怎么做。鲍威尔说他不认为萨达姆想与我们对抗。他相信我们必须派美国军队到沙特阿拉伯，打出我们的旗帜。总统认为鲍威尔讲到点子上了。"我倾向于让一支小的美国军队出现和实施一次空中行动。"他说。他仍然担心对巴格达实施的攻击，这将是空中选择所需要。

贝克现在已从莫斯科回来，他表示同意。"我们使用空中力量打击巴格达可能使情况对我们不利，除非它中断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他说。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继续让萨达姆远离沙特阿拉伯，"总统说，"我们的第二步是在暂停伊拉克的出口能力时保护沙特人免于受报复。我们有一个问题是萨达姆会否不侵入沙特阿拉伯而只是占据科威特。"

切尼说如果我们准备把此事干好就应当这样开始。"你必须准备保护沙特阿拉伯和让科威特王室家庭回来，"他说，"问题是美国人民也许要短时间忍受战争。"他又说这将花费"一大笔钱"。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美国人民会支持干预。切尼表示怀疑。"日本使

用石油很多,"他说,"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帮助王室家庭。但他们的支持也许是短暂的。"他敦促我们必须考虑如果萨达姆不进攻沙特阿拉伯我们将做什么。总统认为他也许低估了世界的反对力量。"很多人称他为希特勒。"他说。

"如果我们对沙特人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就应当比只是显露旗帜做得更多。"鲍威尔说。"我们也许能以朝鲜战争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为榜样做些事情。"汉斯建议道。

贝克想知道如果我们封锁伊拉克是否会失去国际支持。斯考克罗夫特不同意这样做。"关闭航运仅只是关闭管道。"他说。总统建议我们试一试封锁。

乔治·布什

我们的赌注和选择现在似乎更加清楚。我对现在的军事局面和入侵对于美国及海湾稳定的战略含义有了更好的感觉。我批准了该计划,虽然在沙特人同意接受我们的部队之前我们不能实行它。

关键是在伊拉克可能进攻沙特阿拉伯之前法赫德国王就请我们派兵。我理解如果美国和西方的军队在他们土地上运作沙特人将承受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国家并不欢迎美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在这个地区。一支特遣的海军如一艘运输舰是不同的——既然它已离岸并在视线之外那就是被认可的海湾稳定力量,但是对飞机和部队驻扎在其地面上仍有疑问。

星期天下午我从戴维营回来即与法赫德国王通话迫切要求其决定接受军队。他回避这个问题和感谢我对沙特事务的关心,他仍然提议我们派出小组。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谈了几分钟,我向国王施加压力,他含蓄地说我们的小组将讨论这个问题。

"很好,"我说,"但是我想知道你现在认为这些问题处在什么位置。伊拉克声明撤军了吗?埃米尔会回来吗?你担心伊拉克会

越过你的边界吗？我们非常担心。"

"首先，"法赫德认真回答说，"解决方案必须包括埃米尔重回科威特。第二，没有伊拉克的部队靠近沙特的边境，但是萨达姆不可信任。这就是需要尽可能快地派一个小组来协调问题防止这样的事发生的原因。"

我试图强调我所看到的局面之严重与紧急。我们不能再作任何等待以阻止伊拉克南进、迫使萨达姆撤军并恢复科威特政府。"我们现在必须开始我们已向班达详细描述过的行动。我们不能再等否则就晚了。"我告诉法赫德，埃米尔曾请我们军事干预，但那时伊拉克的军队已经占领科威特的城市，美国已不能在那里做什么了。"使用军队要花很多时间，"我说，"这就是我对沙特阿拉伯感到担心的原因。"

"或许伊拉克有可能进攻，但不会发生一次入侵。"国王说。他想让该小组不停工作以应付各种意外，并认为我们还有几天时间调解和制定一个适当的成功计划。"这就是我们所要的一切。"

"我们将让这个小组上路，"我说，"我在这里想要表示的另一点我将以名誉担保。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对于美国的利益以及实际上对于西方世界的利益从根本上说——至关重要。我已经决定萨达姆不能从所有这些丑事中逃脱。我们制定出一个计划，一旦我们到了那里，我们就留下去直到我们被邀请离开。在这一点上我向你庄严承诺。"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布什总统与法赫德谈话不久，班达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明显与国王讨论了情况，他同意需要迅速行动。他现在建议我领导该小组。总统认为这很好，所以我打电话给切尼请他考虑国防部由谁参加。迪克回电时，告诉我他本人想领导这个小组，既然任务基本上是国防，我准备同意，总统也如此。但仍有一个问题。如果切尼，一位内阁部长去，就不可避免地是一位高级别的使节，沙特的

一次拒绝有可能触发一次危机，这样我们两个国家就不可能合作，在此意义上将进一步鼓励萨达姆的侵略。如果我去，我就能够安静地在那里，如果沙特人决定不合作，就没有人需要知道。我对班达解释说，如果切尼去，我们就必须事先知道国王会批准和邀请在王国使用美国军队。班达脸色变白，踌躇不已，他知道我们立场的逻辑与危险。他基于这样的设想支持切尼领导该使团，即我们不讨论"如果"而是使用"怎样"用以及将去什么类型的部队，但是他说必须让国王清楚。过了一小会他打电话给国王，他同意这个小组。

并不只是沙特阿拉伯在犹豫。许多阿拉伯国家都在焦虑萨达姆下一步将干什么。我们关心的是，一些温和派出于恐惧，会接受伊拉克安置在科威特的傀儡政权，作为平息萨达姆怒气的一种方式。不幸的是，约旦国王侯赛因，一个美国的长期盟友，表现得最糟糕，他几乎成了他的邻居伊拉克的发言人。我们不能让巴格达恫吓其他国家，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特别注意阿拉伯人正在察看我们在海湾的意图。由于我们与以色列长期而密切的合作，我们不能被认为在作弄阿拉伯国家。我们必须努力与阿拉伯世界和解，与他们商量，并要他们全力参与。对总统和我们的最高官员而言要认真开展个人外交，第一个姿态似乎是允诺，但是那些能影响到阿拉伯公众舆论的激进分子能很容易地决定制造大的麻烦，包括群众示威和恐怖活动。

对伊拉克的制裁和实行贸易封锁必要的第一步都是协调国际反应。在8月4、5日，总统打电话给科威特的埃米尔告诉他最新情况，开始个别征求盟友意见共同支持制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于8月5日早晨开会。皮克林报告说英国与法国强烈支持制裁，苏联虽然支持，但没有表示。中国似乎倾向他们，但声称对侯赛因国王对伊拉克的支持留有"印象"。然而，中国人宣布他们不再卖

武器给伊拉克,这是对支持的重要表示。皮克林提出一个提案,并试图于8月6日投票。

让制裁得到支持是一回事,使之严格执行又是一回事。我们怀疑他们把萨达姆当作扫除科威特的工具。常会有一些“漏洞”在一些国家不遵守制裁时出现,我们不能确定他们会对伊拉克有什么影响。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没有什么能通过海上进进出出——这就意味着海军封锁。由于伊拉克实质上是一个内陆国家,这就提出了一个另外而更为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它的所有邻居都能够遵守禁运令,如果它们没有,其漫长的边界也许会漏洞丛生。我们相信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将支持制裁,这也是关键的国家。伊拉克的主要石油管道通过它们两个国家,这些管道必须被关闭。叙利亚似乎也会合作,约旦和伊朗则不得而知。

乔治·布什

8月5日,布赖恩·马尔罗尼告诉我他与特加特·奥扎尔的讨论。奥扎尔准备封锁伊拉克的所有石油通道,但警告说还有另一个源头通过约旦在红海安卡巴的港口。他又说巴格达已派一使节试图让土耳其与西方断绝关系。伊拉克厚颜无耻地对奥扎尔说巴格达不想撤走并计划吞并科威特。“西方在吓唬人。”萨达姆说。奥扎尔相信如果西方人不行动,伊拉克或许会入侵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

后来奥扎尔通过电话和我谈了几个小时有关进一步的细节和他的关心。伊拉克使节告诉他伊拉克正在科威特组建一个政府以及约25 000人的“人民军”。他对法赫德国王说,他会支持石油禁运,但在等待联合国大会的行动。奥扎尔催促我们尽可能快地开始制裁,然后他会关掉石油管道。他警告说我们必须考虑军事行动。“萨达姆比卡扎菲更危险,”他说,“他必须走开。他杀死了120位拒绝打仗的官员。如果封锁非常有效,(他的人民)就会推

翻他。"伊拉克使节夸口他们能够在封锁下生活，说："我们是2 000万人，我们将战斗到底……"奥扎尔想要北约给一个明确的表示，如果伊拉克因报复关闭管道而实施进攻联盟将支持他。我们追踪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沃勒，他正在加拿大西部钓鱼。他相信联盟会支持奥扎尔，并说他第二天会回到华盛顿讨论它。

8月5日星期五的下午我从戴维营飞回华盛顿。汉斯遇到我时我刚从落在南草坪上的直升飞机出来，他立即给我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我步行去给等着听报告的一群人作几分钟非正式的讲话。虽然已到周末我却一直在想把我的决定告诉美国人民，但我还没决定应当什么时候做。这时候，我计划告诉各位我们正在采取的外交步骤以及国际反应。我解释说除了伊拉克从科威特全面撤退以外我们没有一个盟友愿意接受任何东西，也不会容忍一个傀儡政府。接着问题开始飞来。

关于这个傀儡政府我们将做什么呢？我们在军事方面将有反应吗？我简单地说："正在等待。看与听。"当然，每一个人都想知道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在科威特的美国人，特别由于伊拉克威胁关闭外国使馆。对此我回答说：

> 我不准备根据调动军队和任何这类性质的事情讨论我们将要做什么。但是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它，不仅对它而且对任何国家的任何威胁都如此，我也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决心反对这个可怕的入侵。请相信我，有许许多多的国家总的说来与我刚刚所说的一致，我向他们表示敬意。他们是忠诚的朋友和盟友，我们愿与他们一起工作采取联合行动。对于科威特被侵略，是不可容忍的。

后来，科林·鲍威尔评论说他认为我实际上在那个星期天宣布向伊拉克开战，它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回想起来，我并不知道我是

否已经决定需要使用武力。毕竟，联合国仍然在采取行动，我希望该问题能够因政治与经济的措施而结束，作此号召仍嫌太早。另一方面，我当然知道武力可能必不可少，我已决定看萨达姆的反应。我的立场决不动摇，即为让伊拉克从科威特撤走我愿采取一切行动。

第十三章 盾与剑

8月5日下午晚些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再次聚集在内阁大厅的长桌旁。比尔·韦伯斯特报告说,由于伊拉克的戒备状态和萨达姆意图的不确定性,对向沙特阿拉伯的进攻提供另外的警告将很困难。与萨达姆声称将要撤退相反,我们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军队正集结在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的边界,并还在增加着。伊拉克介入的军队数量远超过单纯征服科威特所需要。"有人问何时是伊拉克最早可能发动进攻之前夜,"韦伯斯特说,"回答是现在。"

科林·鲍威尔再次向我简要报告军事部署。航母战斗集团正接近海湾,但它们就位还需要几天时间。"空中力量最灵活,"他说,"第一批飞机实际上能够在20小时之内到达。还有,我能让舰载飞机在一天之内在沙特阿拉伯着陆。如果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有一些的话。至于地面部队,轻装军队可以在几天之内到达那儿,但重兵力到那儿需要三周到一个月。根据迪克·切尼所言(他、鲍勃·盖茨和国防部次长保尔·沃尔福威茨那天已启程去沙特阿拉伯),我们能够马上调动海军和轻兵力。我们也能够再给沙特人另外一些我们所拥有的F-15。

"现在是让沙特人得到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了。"斯考克罗夫特催促道。

布什总统想我们的情况不是太糟,我们的使馆没有被占领,我们也不是被迫保卫自由而只不过是保护沙特阿拉伯。"问题已超

过了我们的使馆，"鲍威尔提醒道，"我们正在谈论数以千计的美国人。"

"有保护我们的伊拉克使馆的计划吗？"约翰·苏努努问道。

"不，"鲍威尔说，"没有'沙漠Ⅰ号'[1] 方案。"

乔治·布什

星期天晚上，我在担心伊拉克人真的越过边界进入沙特阿拉伯。有这么多的坦克对着南方，萨达姆有这样的计划似乎无可怀疑。布伦特和我谈到伊拉克闪电式攻击沙特油田的可能性。萨达姆可能进入达兰然后停止，说，"现在你们要做什么？"这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必然是解放它与科威特，我们就会失去我们行动的最好基地。回想起来，如果萨达姆想在沙特阿拉伯干得漂亮些，他或许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在这个简单的时间界限——在我宣布派兵之前就这样做。如果他做了，他将完成一次随心所欲的旅行。沙特的军队甚至在边界站不住，伊拉克军队在数量上有压倒的优势。还有，我完全相信我们在沙特被进攻之前能够让一些军队到位。这时候，我就更关心他会抓美国人当人质——因为那天在科威特市的伊拉克军队开始包围美国和英国的公民并送他们到巴格达。

第二天早上晚些时候，迪克·切尼从吉达打电话给我说法赫德国王接受我们的计划和允许美国军队进驻沙特。那天下午，我给迪克下了警戒令，并派出第82空降兵部队以及两个战术战斗机中队。接下来我们将开始一个大规模行动了。

迪克说国王想要其他的国家也派出军队以显示对沙特的公众支持，并提到摩洛哥和埃及。这位沙特人还说他们将关闭管道和增加他们的石油生产以补偿损失，并把这笔钱交给科威特。我请

① 1979年营救德黑兰人质的流产计划之名称。

迪克去埃及与穆巴拉克交谈,鼓励他也提供军队。在他第二天去开罗之前,迪克再次会见班达和他的父亲,沙特国防部长苏丹亲王。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宣布邀请或任何部署,直到我们的军队到沙特两天以后,世界接受既成事实。

吉姆·贝克很关心推迟公告和我们的沉默也许会使新闻界和公众察觉秘密。他恰当地指出我们需要先行报告此项安排。然而,我们相信默许是沙特人首次邀请我们方式的组成部分。比起遵守我们对沙特人的诺言以及尽可能让我们的军队安全到位我不太担心对国会的通告。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贝克显然记得里根政府由于缺少对伊朗反对派情况的及时通告而产生的严重问题。但是我们有另一个重要理由保持沉默,比此事情重要的是切尼对法赫德国王的许诺。如果我们宣布该安排,如贝克所敦促,那就会给萨达姆约 48 小时时间在美国军队到达之前发动一次进攻。

乔治·布什

玛格丽特·撒切尔自阿斯本回程的路上在华盛顿停留,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这时候切尼打电话来。我信任地把我的计划告诉她,包括细节的安排,并请她不要告诉人。撒切尔和我,还有曼弗雷德·沃勒,他刚从加拿大来,在玫瑰花园就联合国安理会 661 号决议投票作了一个简单的新闻发布。在贝克和汤姆·皮克林的积极游说下,安理会投票以 13 比 0 赞成根据宪章第七条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有古巴和也门参加。然而,问题立即随之而来,该决议是否允许强制封锁制裁。撒切尔强烈认为需要。她是正确的,虽然我对新闻界使用"封锁"用语还有些犹豫。我们的律师注意该问题的法律方面。毫无疑问,为了有效制裁必须封锁。但"封锁"也有一个问题,在国际法中,它是一种战争行为。布伦特建议使用"隔离"一词,如肯尼迪总统 1962 年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反应。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单独会见曼弗雷德。在军事上帮助沙特阿拉伯不属于北约行动,但是我想做他的工作争取其支持联合行动,特别是保证对土耳其我们不会置之于危难而不顾。我请他下周召集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他也能够帮助西方国家为一次海湾的多国行动协调他们的军事安排。这些军队必须很快到位以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或土耳其,如果伊拉克因切断石油管道向他们进攻的话(事实上,奥扎尔在联合国决议当天就关闭了通过土耳其的管道)。

同一天我们与萨达姆本人有了第一次官方接触。他召见我们在巴格达的代办约瑟夫·威尔森并训斥他。这正是奥扎尔及其他人所说的萨达姆蔑视全世界的反对并被激怒的表示。威尔森用电报告诉我们详细情况。他传达了我们关于伊拉克从科威特撤走的要求。“你们在被搞出麻烦之后不应再按照错误的建议行动。”萨达姆回答说,“如果布什总统事实上想要的是保护美国的利益,如他对之的描述,那么使紧张局势升级和选择武力正是反对这些利益。我要告诉你你们将要被击败。你们是一个超级大国,我知道你们能伤害我们,但是你们会失去整个地区。你们永远不能迫使我们屈服。你们能够损害我们的一些经济和工业基地,但你们引起的伤害越大,你们的负担就越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在此地区不会无所事事。”

萨达姆夸口说科威特已变成伊拉克的附属部分。“向布什总统转达他应当把科威特的埃米尔及其王朝看作历史,我们不再让科威特给其他什么人来占领。我不再让科威特成为一块随便人吃的点心——即使全世界反对我们。我们将战斗——我们知道你们是一个能给我们造成巨大伤害的超级大国,但是我们决不投降”。

他还声称伊拉克不会攻击沙特阿拉伯,说:“沙特人是我们的兄弟。”沙特人在两伊战争期间帮助过他们,还有建设管道、给伊拉

克增加拨款而不是借贷[1]。只要事情没有变化，他不会做什么。威尔森直接问萨达姆是否“保证”保持今天的现状，不打算采取反对沙特阿拉伯的军事行动。

“你可以把这个保证先带给沙特阿拉伯人，然后带给这个地区的任何人，”萨达姆说，“我们不会进攻不进攻我们的任何一方。”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萨达姆的警告伊拉克“在此地区不会无所事事”是不祥的。它听上去像是一个威胁，威胁将出动激进分子到阿拉伯世界的街道上发起恐怖主义的攻击。

乔治·布什

日记，8月6—7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顾虑。那里有这样多的专家，这样多的人在说我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我们的内部已经有了磨擦。议院的经济学专家觉得被军方排除于抉择圈之外，是的，他们在执行我的命令，经济情况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但我们在努力减少一些以“需要知道”为基础的情报。

一个有些让人担心的事情是贝克打电话给谢瓦尔德纳泽，告诉他我们将要派进军队时——他却没有谈论它。他认为对他们来说有难处，但如何作出决定的我们不是已经告诉他了吗？他将要把此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贝克接着说，也许他们能够加入封锁，听起来他很注意这

① 这里省略了科威特也这样做了的事实。科威特在两伊战争期间为伊拉克出售中立地带的产品。

件事。

我认为他们想加入进来，他们不想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他们想作一些支持，想要一些面子，这在世界上很重要——他们反对伊拉克的举动，他们在联合国不同意(这次入侵)。但现在如果看到我们拿着球跑起来他们就没戏了，于是他们看上去只是像个次角或无关紧要。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贝克的建议在那时是个刺激。我们其他人都在留心苏联对联合行动的军事参与。为让苏联力量离开中东我们已经工作了几十年，邀请他们加人嫌太早。切尼、鲍威尔和我都反对之，虽然一支苏联的海军加入这支国际舰队不是不令人愉快。贝克想让他们加入地面部队将是对萨达姆的一个重大打击。结果，苏联人派了几艘船监视封锁但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乔治·布什

8月6—7日之夜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打电话。凌晨两点半我打电话给弗朗西斯·密特朗告诉他我们将派兵。他支持我的决定和召开北约会议的想法，说他理解奥扎尔的问题——土耳其是北约的一个成员国，我们必须讨论联盟在该危机中的作用。在我说完之后他只是说："我们在一起。"

密特朗常使我惊讶。有人说法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这次入侵。然而，每次我与他通话结果都达成一致，原本的焦虑被消除。法、美分歧来自官僚政治和政府官吏。在我们这个层次，制定北约派出军队的日期，或调解我们将领的指挥结构，密特朗总是在场，我们总是站在一起。我仍然相信在美法关系方面我做的最好的事情是1989年春邀请他到肯尼邦克波特。我还认为我努力向他个人显示的尊重在我们整个政府期间的外交方面已经得到了报偿，特别在这次。布伦特与他的法国同行安德米内尔·雅克斯·兰克谢

斯德也有类似的和睦关系。布伦特与安德米内尔的工作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密特朗与我说话时，许多政治难题已经被解决了。

我开始应法赫德国王的请求召集我们在该地区盟友的军队，并打电话给阿拉伯领导人请他们接见切尼，他正在该地区穿梭外交。我先打电话给霍斯尼·穆巴拉克，他同意见迪克并解释说他像奥扎尔一样，接见了一个伊拉克使节。他带一个信息给萨达姆·侯赛因说："你是在自杀。"并等待这位伊拉克人的回答。我告诉穆巴拉克我对侯赛因国王感到失望，他表示同意。他认为萨达姆给了这位国王和也门钱和赃物。穆巴拉克仍希望召开一次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可以解决该危机。摩洛哥的哈桑国王也将会见切尼，他的看法显然同我们一样。他提议帮助埃米尔，说已经有摩洛哥人的志愿军。

当我与布赖恩·马尔罗尼谈话时，他跟我说的都是与穆巴拉克的一次谈话，穆巴拉克那时已经接见了伊拉克的使节。叙述令人难以置信，显示了萨达姆夺取科威特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穆巴拉克说(伊拉克人)来了并宣布科威特有他们唾手可得的5 000亿美元，"布赖恩说，"他们用这笔钱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埃及。他们试图告诉穆巴拉克将有 200 亿给埃及，如果埃及支持伊拉克的话。穆巴拉克说：'我们不出卖我们的原则。'"这位伊拉克人说他的国人都准备去死。"他们都不可理喻，"布赖恩说，"穆巴拉克听到了所有的谣传。他告诉这位伊拉克人他认为他们将被赶出科威特。这位伊拉克人的回答是他们不会服输。"穆巴拉克说联合国的决议应当被严格遵守，这也是苏联人同意的。布赖恩相信穆巴拉克的观点将为其他想加入我们正在发展中的联盟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了"掩护"。"发生的事情很清楚是伊拉克抢劫了银行并把它分给任何支持他们的人。"他又说。

穆巴拉克后来告诉我萨达姆的确提出给他一大笔钱，他相信

侯赛因国王和萨拉赫接受了一笔。萨达姆想让他们三人支持入侵，作为回报他们将得到一定比例的科威特石油和萨达姆设法从该国的金融资产和财富中掠夺来的任何东西。穆巴拉克说他毫不犹豫地拒绝该提议。所有这些正是萨达姆宣扬的"无者"对"有者"——新闻界所发现并表演的事情——他努力征服阿拉伯世界。侯赛因国王否认他被这样收买。

迪克·切尼那天下午从开罗打电话给我。他已告诉穆巴拉克沙特官方请求军事帮助——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向其他盟友和新闻界披露。穆巴拉克同意让"艾森豪威尔号"战斗集团通过苏伊士运河到达海湾，批准我们的空军飞越埃及领空。他也同意我们使用埃及的基地加油和运输，但不想看到它们有战斗的任务。他仍然不明确表示加入多国部队。他还想要 48 个小时，说还没有放弃谈判解决该问题。

这时我们正在试图对伊拉克侵略形成一个集体反应，我们也得向美国人民解释我们要干什么。我 8 月 5 日对新闻界的重要讲话还没有走得足够远，即明确为何对我们来说与萨达姆对抗是如此重要。两天以后该需要变得迫在眉睫。我们开始披露出兵的消息，传媒披露我们的船已装满。另外，我们的第一批空军飞机那天已经在沙特阿拉伯着陆。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活动的泄露难以避免，但是，为了遵守我对法赫德国王的允诺，不到最后一分钟我不想作美国官方的评论。我决定第二天 8 月 8 日上午 9 点作一个电视讲话，这时候第一批空降兵部队已经到达。

我准备的讲话稿语气严肃，重点强调我认为在波斯湾的局面和 1930 年莱茵河的局面存在着相似性，那时希特勒否定了凡尔塞条约并向前推进。这一次我不想姑息养奸。开始广播前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椅子上，觉得有一点紧张。我伸出我的手，看看它是否颤动。我被技术人员、摄影师和助手所包围，但我不想被任何人所注意。我看到我的手很稳定感到很高兴。我知道在这些场合我

做的没有罗纳德·里根好，所以我讲话的时候重复录像了一两次。

> 四个简单的原则指导我们的政策。首先，我们要求所有伊拉克军队立即、无条件和彻底地从科威特撤走。其次，科威特的合法政府必须恢复以取代傀儡政府。第三，我的政府，如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每一位总统在此情况下一样，对海湾的安全与稳定负有责任。第四，我决定保护海外美国公民的生命。

我也概括了该情况的利害关系，伊拉克已经控制了世界上第二大油田以及有100多万武装力量。美国进口的石油接近一半由它提供，伊拉克扩张其对世界石油控制的企图使我们的经济变得脆弱。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更依赖于石油进口。

> 我们在欧洲曾成功地为自由而斗争，因为我们与我们的盟友不屈不挠。保持中东的和平不需要别的，正需要这样的精神。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能够充满希望，是一个自由时代，全体人民和平的时代。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抵抗侵略否则它就会损害我们的自由。

那天我会见了科威特大使，他向我描述了他家庭的经历以及他们如何受到威胁。他的妻子决定留在科威特，他非常紧张地挂念她的安全。他告诉我地下室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黄金如何被抢劫，妇女如何被强奸，以及到处是掠夺和盗窃（我第二天也从玛格丽特·撒切尔那里听说一个英国飞机的乘务员被伊拉克士兵强奸。英国表示抗议，伊拉克人说其中一人已被枪毙）。我想我们应该努力让这些有关伊拉克的兽行被外界知晓。但尽管有这些报道，世

界似乎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威特正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使我深感烦恼。

那天的剩下时间我一直与我们的阿拉伯盟友通话，现在该与其他海湾国家交流。去年穆巴拉克曾向我提出忠告：无论何时对这些小国都尽可能直言不讳，承认他们对于美国的重要，这对它们来说会有所不同。和阿联酋扎伊德苏丹以及阿曼的卡伯斯·宾·赛伊德苏丹交谈，都是危机以来的第一次。他们每个人都允诺能够为支持反萨达姆·侯赛因的联盟做任何事。扎伊德欢迎美国军队到该地区并说我们必须"肩并肩"。他跟我说的都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破坏——那天它宣布兼并。

卡伯斯苏丹语言同样强烈，他说："朋友不会容忍背后动手。"阿曼愿为我们的军队提供所需要的物资。卡伯斯也谈到了伊朗人，伊朗的立场对我们来说仍属未知。他给我很混杂的消息。根据这位苏丹的说法，伊朗人对我们所为并不高兴，他们对其他地方和其他事情"感兴趣"——他们不在没有他们利益的地方干事。他警告说伊朗人在与伊拉克人谈判，关于他们之间的分歧伊朗愿意妥协。显然伊拉克人试图引诱伊朗人解决他们的石油争端以从两伊边境调动军队。

我们也从西方盟友那里获得支持。英国很快派海军和空军到达海湾，在我们之后宣布了这项安排。8 月 9 日早晨撒切尔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的决定。英联邦的成员国愿作贡献，但要求与其他国家一起行动。我打电话给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他毫不犹豫地说他坚定地跟着我们并提出派军舰，但是他想要加拿大同样这么做。我立即打电话给布赖恩·马尔罗尼，他告诉我这在加拿大对他帮助巨大。他说他将派空军和一支小的海军——"但不要用它来约束我。"他匆忙地说。如我在美国一样，他还有很多宣传工作要做。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每个人都想有某种保护层以免受背后指责。奥扎尔希望他的调动以北约为掩护。法赫德不希望是反对伊拉克的惟一阿拉伯国家。霍克不想是参加联盟的惟一英联邦国家。甚至我们也需要表示这次行动不是美国单独反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由于许多单个的国家联合和派军,我们得到了力量,但是该联盟不同成员之间需要一种联结以至统一协调的工作非常复杂,且联盟的联结很脆弱。受欢迎的志愿军本身变成一个得设法应付的挑战,在下面几周和数月中央指挥部匆忙把新的派遣部队,包括一些相当小而另一些较大(如英国或法国)的部队,都整合进他们的计划中。多国部队的行动象征着国际上一致反对侵略,但在实际上许多很小的很特别的部队让施瓦茨科普夫的参谋人员搔头不已。

乔治·布什

在8月初或第一周的一封信提醒我是否应到肯尼邦克波特去休假。我意识到由于危机由我负责离开白宫与华盛顿也许会招致批评,不注意我们正部署部队进入沙漠。但是我相信我应该去缅因州,毕竟,美国总统本人所为表现出的信号是极其重要的。

卡特政府在德黑兰人质危机期间的表现及国内外的观察及评价我记得太清楚了。它显得像是美国人的双手被缚,总统的注意力完全为暴徒所控制。我断然决定美国人民不会第二次这样。我要他们以及萨达姆看到不仅总统控制了局面,而且他自信而不焦急。一个放松的布什可能是最好的标志。生活尽可能继续正常,不是为了总统而是为了整个国家。萨达姆的威胁以及恐怖主义的可能那年夏天给许多美国人带来创伤。一些人害怕旅行,当芭芭拉有意乘一架商业飞机时,那就不只是象征性的。美国人的娱乐业受到了损害。我们必须向我们的人民显示美国仍然在政府掌管中,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事实上,一位总统从来不可能真正地休假,也从未“离开”过办

公室。无论他到哪里，责任总是伴随着他，无论白天黑夜，他到哪里哪里就是办公室。现代的总统，尤其如此，迅即的通讯联络既容易又必要。冷战时期，如布伦特亲身所知，一个军事助手总是带着那个“箱子”徘徊在总统附近，里面有发射我们的核导弹的密码。在直升机、飞机、汽车和船上总统总是手边有电话，距离再远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各人的家中有安全的通讯设备，布伦特在那里像在华盛顿一样能够在夜里被唤醒。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工作室从一个场所移到另一个。

还有一直存在的公众注视问题，我们也许能够以不同的方法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我们与白宫报界队伍有相当好的日常工作关系，但在肯尼邦克波特更带有私人色彩的环境中它突然开始出现问题。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安排，如果我们离开房间乘“忠诚号”船出去，新闻记者可以乘他们自己的船跟随我们行动，也许可以问一些问题。同样，如果我们玩高尔夫球，记者们只会在一定时刻出现在球场。问题在于这里没有限制传媒的通道，也许记者们一天只有一次机会提问，不可避免的是，我刚把球放到球座上，他们中占据有利位置、感到灰心的一个就会大嚷大叫提出问题。马林·菲茨沃特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抗议，说这正是照相的时间，他们后面会得到一个提问题的机会。

我8月10日飞到肯尼邦克波特，布伦特从华盛顿打电话来时我正在钓鱼，他给我带来在开罗由穆巴拉克组织的阿拉伯联盟最高级紧急会议的好消息。我们接到的第一个报告说科威特的埃米尔大步走出来，我们认为是一个坏兆头。然而，我们现在听说21个成员国中的12个投票赞成派兵保卫沙特阿拉伯[1]。穆巴拉克

[1]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所有6个国家以及埃及、黎巴嫩、叙利亚、摩洛哥、索马里和吉布提投了赞成票。只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利比亚支持伊拉克。也门与阿尔及利亚弃权，而约旦、毛里塔尼亚和苏丹有所“保留”，突尼斯没有出席。

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给我们的军事活动提供了一个保护伞。萨达姆可能不再声称只是伊拉克与美国的对抗。约旦不支持伊拉克的新闻特别受欢迎,既然我们与侯赛因国王有长期的友好关系,他宣布约旦也将支持制裁我很高兴。看上去他也许转变方向了。

我8月11日早晨5点30分打电话给穆巴拉克感谢他的帮助。穆巴拉克说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已作了外交努力,这对埃及组织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产生了重要作用。回想起来,它或许是阿拉伯世界与我们紧密合作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在侵略前我们已努力做伊拉克工作。同一天埃及和摩洛哥的军队开始到达沙特阿拉伯,对萨达姆来说这是阿拉伯世界不愿容忍他的非常明确的证据。

有了阿拉伯世界的稳固支持,我们开始让联合国的制裁生效。那天午餐时,贝克简要告诉布什总统和斯考克罗夫特他去土耳其的旅行以及8月10日布鲁塞尔北约会议的情况。联盟谴责这次入侵,支持我们的军队部署,也赞成其他成员国的行动,包括法国和英国的海军,以及使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空军基地。一个国际的海军小舰队将到位强制制裁,但围绕封锁仍有实际的和法律的问题。这个强制制裁的决议允许我们使用武力来支持它吗？这是不小的问题,因为如果有船只不理睬封锁我们必须有办法让它停下来。我们不想把船击沉,在和平时期向它们开火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确定该决议给我们的不止是阻止航运权,而且能够相机行事。8月12日我们最后接到埃米尔的信,请求美国代表科威特采取行动实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联合国制裁——该宪章宣布个人与集体都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在我们看来,这解决了制裁的法律问题,既然我们的行动是应联合国提出保护的国家的请求。

但是仍有政治问题有待克服。第二天早晨，我们宣布美国的舰只开始实施制裁，8 月 16 日生效。很快，法国、加拿大和苏联批评此政策，说没有国家能够单方面实施一个制裁决议。他们宁愿我们的行动由联合国主持。另一方面，英国甚至在我们的海军完成准备工作之前就拦截检查船只。我们仍得要大力宣传强制制裁的必要性。

维持一个发展而多变的联盟是一场斗争。我们最挂念的是让阿拉伯人和苏联人上船。阿拉伯成员国本身在合作的道路上能走多远也各不相同，一些只愿意靠我们去打仗，一些情绪高昂愿跟我们肩并肩。苏联的态度似乎与他们最初对侵略的反应已有所不同。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耶维金里·普里马科夫领导的外交部阿拉伯问题专家与传统派——已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东欧和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对封锁伊拉克感到愤怒，反对使用任何武力。另一方面，领导努力支持联盟的是谢瓦尔德纳泽，有时候势单力薄。搞好苏联支持的任务从来不容易，如我们最初所争论的如何实施制裁，以及是否和怎样使用军事力量把伊拉克从科威特驱逐出去等。

萨达姆意识到我们联盟所面临的问题，他尽力利用它们。他恫吓与利诱并施，试图把阿拉伯对他占领的反对变得无害，而轻蔑地拒绝要他撤军的要求。他显然相信西方不会或不能把他赶走，或我们缺乏推翻他的举动的意志。但是他错误估计了他的阿拉伯邻居和我们与他摊牌的决定——如果这就是问题所在的话。

威胁利诱都未能阻止国际团结的发展，萨达姆现在尽可能采取一切方法来分裂之。他知道保持阿拉伯与西方联盟的一致是我们的主要难点。他使用的手法旨在让个别的阿拉伯国家脱离联盟并唤起阿拉伯人反对西方特别是反对以色列的感情，如此等等。他发动的想赢得阿拉伯国家支持的战役隐藏在他的"有者对无者"宣传之中，由约旦和西方的传媒再次提起，旨在讨好而博得那些资

金捉襟见肘的阿拉伯国家的同情(不管伊拉克石油资源是多么丰富,它的收入大量浪费于购买军备和战争)。他又对此施加政治压力,试图刺激公众反对他们的政府。萨达姆经常威胁在该地区到处出动激进分子,证明他们会颠覆如穆巴拉克这样的领导人。我们也为这些可能性而担心,还有大范围恐怖主义的威胁,但没多少成为事实。

有潜在可能的是,萨达姆最有破坏性的策略是试图加剧阿拉伯同以色列的紧张关系。8 月 10 日他发表讲话宣布发动一场反对美国与以色列的"圣战",两天后他宣布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和平动议",在其中他宣称他对科威特的侵略之解决必须与他所谓以色列对阿拉伯土地的占有相联系。通过激发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敌意,萨达姆试图让阿拉伯对他占领科威特的批评发生转移,并把自己打扮成反以色列的阿拉伯领导人。这就会对各个政府施加公众压力,从而不反对这次入侵——或许能使联盟分裂。

萨达姆做得很聪明,但幸运的是他在中东已没有什么信誉。我们拒绝伊拉克动议的不恰当"联系",不能与我们、与他的邻居和联合国所要求的无条件撤军相提并论。这只是伊拉克分裂联盟无休止企图中的一个。在这年秋天有很多其他的具有这种潜在可能性的"和平动议",我们仍然关心它们中的一个也许会给他一个机会削弱联盟或以某种方式从他的入侵中获益。

乔治·布什

由于阿拉伯—以色列关系紧张,整个危机期间以色列非常小心地位于联盟之外。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广泛联盟,一个包括许多阿拉伯国家的联盟,以及有以色列参加。以色列人明智地理解这一点,虽然让他们站在一边情绪上是困难的。在外交上、最后是在军事上对付萨达姆的过程中,我们解决了他们的一个主要敌人,或许是最痛恨的对手。以色列一直是(现在仍然

是)美国的一个坚定的朋友和盟友,在绝大多数方面是合作的,但从危机之初它对我们提出很多援助及情报共享的要求。

萨达姆似乎能够利用制裁伊拉克的步调中的某些不协调因素。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伊朗。8 月 15 日他向德黑兰提出一个和平解决方案。伊拉克从1 000平方公里的伊朗领土上撤走,向它交出在两伊战争中赢得的一切。我们不能确定伊朗现在是否会撤回它尊重联合国决议的誓言,因为我们与伊朗没有可靠的直接联系。最低限度可以肯定,萨达姆在集中精力与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战斗。

我们也关心约旦,有证据表明它在帮助萨达姆而不是如其所言。似乎约旦的银行在为伊拉克洗钱,帮助他逃避金融制裁,还有阿曼也在充当运输伊拉克石油的管道。我们担心武装运输,与伊拉克情报分享,以及约旦人也许会帮助伊拉克人操作他们从科威特俘获的美式哈克防空导弹,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已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与约旦关系也有一些进展。它没投票反对一个泛阿拉伯军队,也没承认萨达姆在科威特的傀儡政权。它拒绝以武力获取领土,似乎愿意支持制裁。我一直试图找到一个途径中断约旦与伊拉克的联系,恢复原来的美国—约旦合作关系。

对我们来说伊拉克对约旦的控制是可以看清的。该国经济上依赖伊拉克,石油 95%从伊拉克进口,其花费的费用抵消了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欠它的债务。与此同时,约旦是伊拉克进口的重要渠道,大约 45%的进口通过安喀巴。这使得执行制裁对约旦人来说至关重要,它会带来该国经济的困难。还有一个严重的政治挑战。约旦隐藏了很多前伊拉克的巴勒斯坦流亡者,骚动使之脆弱和不稳定。他们的存在构成了伊拉克或以色列干预的一个潜在的导火索。

为让侯赛因国王与伊拉克断绝关系,我们开始考虑组织国际

金融援助以及阿拉伯石油紧急援助，提供给履行制裁的国王。帮助约旦和其他受封锁与制裁影响的国家，如埃及与土耳其，这个目标将成为未来数周的主要政策。

乔治·布什

我不想给侯赛因国王找难题，但是我认为他的行动同自己的言论相差太大。他声称反对因阿拉伯的石油动用外国力量，并几乎一个人提议阿拉伯世界谈判解决。他在讲话中并通过传媒公开批评我们，让约旦人的公众舆论反对美国。这位国王过去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这些努力代表萨达姆的讲话使我们吃惊和失望。

侯赛因国王 8 月 13 日见到萨达姆，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要求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局势。我邀请他到肯尼邦克波特，他 8 月 16 日到达那里。关于这次突然的访问传媒充满猜测。估计他从萨达姆那里带来了某种信息，但是他从未向我提及。显然他是想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但是我看不到有什么可谈的。

日记，8 月 16 日

(国王)乘直升飞机准时到达，他和我与布伦特及他的外长直率地谈到了分歧。我一直努力说友谊仍然还在……他急切要求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中间立场，我一直在听，没任何涉及伊拉克必须撤军和恢复科威特政府的内容。不可能有什么中间立场，因为明天，它就会成为别的什么人搞侵略的理由。

我们谈到所有的事实……那些导致侵略的……他要我一定理解他在努力尝试，即使还有一些时间他也不可能得到很多。我要他明确萨达姆曾说他要从科威特撤走

和把他的军队向南调……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心对沙特阿拉伯的侵略。我也非常直率地告诉他，一直反对美国人的意志是很糟糕和不可接受的，我的确很严肃——萨达姆不应通过反对平民来进一步逼迫我们。

侯赛因拒绝承认萨达姆是一个疯子。他谈到"有者对无者"，他的部长还在午饭时告诉我一个大问题是他们想提高石油价格使他们能够付得起钱和得到160亿美元的年收入。我说，你知道谁从世界石油低价格中获益吗？是无者——而不是有者……所以他不可能对我显得似乎两者都有好处。

国王的来访并不重要，它不是一次痛苦而麻烦的会见，但它更为令人失望。他仍然想劝我们问题应当由阿拉伯人解决。我的观点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我要他明白我们的决心。我相信他希望用约旦和美国历史上的友好联系以及我肯定的我们之间的友谊，让我们缓和或改变一点。

侯赛因国王刚离开观景台，沙特阿拉伯外长萨义德王子与班达亲王到了。侯赛因与萨义德之间的对比强烈至极。萨义德坦承沙特人要求我们尽早使用武力，要我们去扫除伊拉克在科威特的力量。我说会实现的，但又说考虑这样的行动还太早。

8月中旬我开始深切关心美国在科威特的公民的安全。伊拉克部队已经开始包围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并把他们转移到伊拉克。8月10日萨达姆命令关闭科威特所有的外国使馆，把他们全体人员送到各自在巴格达的使馆。我们不了解其含义：科威特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管萨达姆声称什么，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都与我们一致。我们一起决定我们保留在科威特的使馆，只要有可能。我一直担心人质情况会出现类似于1979年德黑兰使馆的危机。我的担心很快被证实。

日记，星期五，8月17日

9点45分鲍勃·盖茨打电话给我说伊拉克议会发言人说他们要扣留外国人直到反伊拉克的侵略被遏制。他们会把他们安排在不同的场所，他提到靠近石油或化学工厂——无论怎样——很清楚把他们安在那里使这些地方不能被轰炸。又一个大胆蔑视国际法的残忍和冷酷无情的统治者。我不能容忍，也不愿出现又一个德黑兰。我决心已下。可以牺牲美国人的生命，但我们不能牺牲美国人的原则和领导权。

安理会的反应是8月18日的664号决议，它要求伊拉克同意所有被扣留的外国人离开科威特和伊拉克。第二天萨达姆提出释放人质需要美国人保证——写成文字——其军队从沙特阿拉伯撤走以及结束经济制裁。面对联合国的决议，伊拉克人开始把外国人转移到战略场所。

没有什么比怯懦地使用人体盾牌更使我愤怒。它在我的心中强化了这样的印象，萨达姆所干的不仅仅是进攻科威特。直到那时，我在公开场合还不愿使用"人质"一词，因为我不想让人与德黑兰事件相比较而使国际聚焦不在科威特这个真正的问题上。但是，如我在巴尔的摩对老战士的一次演讲中所言，不管这些无辜的人在巴格达被称作什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事实上是人质。"我想没有任何误解，"我警告说，"我认为伊拉克政府必须对违反他们本人的意志而被扣的美国公民的安全和健康负责。"我非常愤怒地使用同样的措辞起草一份最后通牒给萨达姆：

对伊拉克领导人我现在明确表达两点。(1) 如果任

何美国人受到伤害你将付出可怕的代价。(2) 你违反公民的意志是侵犯你自己的宗教规范,你是在反对对来访者仁慈好客的古老历史,所以我的警告是"现在就释放所有外国人,给他们如自己意愿和按照国际法要求来去自由的权利"。如果你不在数小时之内这样做,如果你不按照联合国法令遵循国际法,你的军队将要付出代价。

然而,发出最后通牒还嫌太早,特别是我们还不能加以贯彻。

萨达姆扣留人质只增强了我反对这次侵略的决心。不会有什么妥协,不会有什么人质交易,不会有条件交换。困扰我的是试图为人质谈判的人都翻不出萨达姆手心。当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去伊拉克寻求释放少数几个英国人时我被激怒了。我理解一些私人的集团和家庭试图让人们得到自由。但是我们一位盟国的前领导人应该知道得更多。然而,那年后来由休斯敦石油界人士奥斯卡·怀亚特作的曾使我大为光火的旅行却是一次很有益的努力,他在伊拉克石油方面投入了很多钱,同萨达姆个人也很熟。怀亚特从外界立场不同意我们抵抗伊拉克,他不愿遵循我们拒绝讨论人质问题的政策。我知道怀亚特以前与巴格达的联系,所以他对我们政策的公开抱怨并不令人惊讶。怀亚特由前任财政部长约翰·克拉利陪同,这增加了他的使命的声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萨达姆利用了。他带着一些人质回家,只是听说第二天其余的人将被释放。然而,这也不令人吃惊,1996 年 12 月联合国允许伊拉克有限数量的石油出口,怀亚特沿海公司雇用的油船运出了第一船。

萨达姆在进一步施加压力要我们关闭在科威特的使馆。8 月 22 日他威胁用武力关闭所有的使馆,逮捕 24 小时以后仍留下来的任何外交官。为了尽量减少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危险,我们决定把他们的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让所有的附属人员出去。在巴格

达带来某些困难之后,8 月 23 日我们设法撤离了大多数使馆人员。第二天我们正式通知伊拉克我们不会关闭使馆。伊拉克部队很快包围了院子,还有八个国家的使节也拒绝撤离。伊拉克部队开始长时间的围攻,试图把留下来的人饿出去。我们的人储存了罐头食品,装了一游泳池的水,他们士气高昂,要我们相信他们能顶一段时间。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到 8 月底,由于萨达姆抓了无辜的公民,我们也面临实施联合国所要求的制裁问题。该决议是否包括使用武力权的国际争议仍然存在。8 月 18 日该争议达到极致,伊拉克 8 艘油船向外开去,都装着少量的水与货物,驶向也门,不愿靠岸和回头,向决议作挑战。问题是,我们是单方面使他们停止,还是等待和试图从联合国得到另外的权力?布什总统想让海军开火。在此之后我们与英国人对此作了冗长的讨论,当然撒切尔说应紧跟这些船。我完全同意我们有所需要的所有权力。宣布一次封锁,如安理会所为,意含批准使之生效的措施。法国人也看到需要禁止,但另一方面却宁愿要明确的联合国大会权力以提供一个国际法的基础。我们对此问题有过一次很尖锐的争论。盖茨、切尼和我对此持强硬路线,提出我们要行动,即使必须是单方面的。贝克主张我们等待。他让总统相信如果我们单方面行动我们会失去苏联人(他们仍坚定地反对使用武力),也许机会在于安理会对于实施决议有更积极的投票。

乔治·布什

我授权吉姆打电话给谢瓦尔德纳泽说我们将暂停阻止航运的军事行动,但是我们希望苏联人支持安理会对此问题作一个新的决议。谢瓦尔德纳泽认为苏联人也许仍可以劝萨达姆从科威特撤军,并要求有 5 天的谈判时间。我对等待并不热心。它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缺少实行制裁的决心,此外,油船问题将用很长时间解

决。然而,吉姆让我相信再争取其他的国际合作有意义,而我想要苏联总体上站在我一边。我同意了,但给莫斯科3天时间,至8月25日,让伊拉克人自愿离开。就在这时,油船到了阿登,在那里也门人没有、或至少没有立即让它们卸货。

撒切尔只是勉强同意推迟。我在早晨3点她的休息时间打电话给她——虽然我不想这样。关于这个问题布伦特已经与查尔斯·鲍威尔讨论了四次,我们知道她是多么强烈地要求阻止这些船只。她主张如果我们放走一只就会开了一个先例。我告诉她我已经决定推迟的理由。就在这时,不是如许多人所说的更早,她说:“好吧,乔治,但是没有时间摇摆了。”

8月24日,谢瓦尔德纳泽与贝克联系说伊拉克人不合作,苏联人现在准备帮助贯彻安理会决议。第二天,安理会投票13比0(古巴和也门再次弃权)通过665号决议,特别授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实行海军封锁。甚至有了禁令,我们实际上仍对封锁生效的机会持悲观态度。伊拉克确实有些依赖粮食进口,但有证据表明该国有丰富的粮食储备和较好的收成。通过减少可资利用的空间来阻碍其工业的发展,我们希望能因此削弱伊拉克的战争机器,但似乎效果不明显。伊拉克的物资储备足够用好几年,仅有几个工厂遇到了问题。制裁取得较大效果将花数月,甚至有人认为不可能以此来战胜他们。

乔治·布什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想了很多,却发现不了怎样不使用武力让萨达姆·侯赛因从科威特撤走。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能消除我的心中疑虑,关于伊拉克抵抗要他们从科威特撤走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之能力的焦虑却日积月累,等待制裁生效(如果可以的话)风险太大。我想找到打破僵局的一条出路,但是我看不到什么办法,如

果没有某些戏剧性的偶发事件来证明直接的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或除非萨达姆本人出了什么事,我不愿公开说使用武力。我们开始让我们的军舰到位和实行封锁。我还不能完全有把握得到国内或国际对此行动的支持。

8月23日,我心中带着这些想法,与布伦特离开观景台去钓鱼。我们都非常忙,自从危机开始以来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有机会无拘无束地谈话。这是美丽而温暖的8月一天,蓝色的天上飘着白云。"忠诚号"乘波而行,波浪冲击着这个蓝色赛艇的光滑船身,在我们来回拖钓的时候它也摇动着。一阵清新的海风吹来,非常凉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我们在水上玩了约4个小时,我放了很多线,但鱼儿却没咬。在我们戴着墨镜和遮阳帽坐在船尾时我们很快专注于一次长而有哲学意味的谈话。

我们谈到海湾危机会怎样发展,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萨达姆是否会退出,将采取什么方式驱逐他。我耐心地问我们能够在什么时候实施打击。我想要知道我们能够用空中力量做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够除去他们的空中力量和装甲兵,将以什么从空中猛烈攻击伊拉克的军事目标。我认为国防部过高估计了伊拉克的力量和决心。尽管他们的军队规模大,但我不认为伊拉克人有这样厉害。他们不能击败伊朗,他们没有很长的军事供给线,或任何时候他们都不能控制空中。此外,我们的一些阿拉伯盟友也告诉我伊拉克的军事力量被高估。布伦特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与经验远不及我,他不太相信我们能够在一次突然袭击中摧毁萨达姆的分布广泛的坦克与飞机。我担心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政府中还没有人和我共有这样的感觉,也许是考虑使用武力的时候了。从危机一开始,贝克就不愿考虑它,并强烈相信外交与制裁应当能提供完成此工作的每一机会。他从未在任何使用武力或计划的决定中后退,但他建议首先推进外交过程和给制裁以更多的时间。我们都害怕军事行动所伴随的人员伤亡,我知道这使

得吉姆很谨慎。他也担心我们可能陷入另一个越南的泥淖而失去公众的支持，看到布什总统被伤害。他相信武力是最后的手段，他与他的盟友伙伴，特别是与西欧和苏联的密切联系，都在告诉他他们还不准备开战。吉姆对我们能够不诉诸武力劝诱萨达姆就范抱有希望的时间比我们其他人都长。

我认为切尼早就认识到迟早会动武。迪克在这一点上或许先于他的军队。没有一个好战士想打仗，而宁愿代之以看到其他各种方法都试一遍。迪克为军队指出的道路，我认为正是我们的宪法所设想的模式：人民领导武装力量，人民领导而不是推动军队理解和完成由总统提出的任务。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从不试图避免使用武力，也不提出反对。科林·鲍威尔，这位专家明智地要求确信，如果我们必须战斗，那么我们就把它干好，不三心二意。他努力明确的是为我想作的任何选择准备足够的军队，一旦政治决定作出就会有做此工作的行动自由。我决定我们的军队将两者都具备。我不想重新出现越南战争的问题（或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战争），在那里政治领导干预军事行动。我将避免错误地指挥军队。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那天我们的谈话加深了我们相信在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危机的思考，即它应该反映我们将面临改变的未来世界之特征。我们都为我们也许处在历史的分界线上感到激动。苏联也站在我们一边，不仅是在联合国，而且也谴责并采取行动反对伊拉克的侵略。这个合作代表了根本的变化。

在此以前，一次国际危机的爆发几乎自动会使美国与苏联站在对立面。如果对科威特的这次进攻标志着这种超级大国对抗40多年历史的结束，未来的前景将会是怎样呢？安理会的作用可根据联合国的框架来构想。美国与苏联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站在一起反对无正当理由的国家之间的侵略。

与我们刚刚经历过的时期相比，该未来时代似乎有一种新的

世界秩序，可用“黎明”一词——不是独创的——来描述我们面前的可能性。用它是因为一系列的情况与我们的观念大不相同。我们当然不指望我们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安宁的时期。确实，一个非常凌乱的世界之轮廓已经依稀可辨。该词如我们所考虑，仅能用于国家之间冲突——侵略的一个很狭窄的方面。是的，冲突的一个很有限方面，但却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以来一个主要的文明病。该词语的含义经常被宽泛化，大多数用于贬义。回想起来，这样的结束或许在预料之中，但是成功地处理国家之间侵略的可能性在当前的世界看上去仍有希望。

至8月底我们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反应的主要部分都已到位。我们用联合国为反对这次侵略建立了合法性。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军事联盟与伊拉克对抗，以多国的海军部队实行制裁。这些主要都是自愿的。在经济方面，封锁所造成的大约一半的石油损失在沙特、委内瑞拉及其他国家。我们的战略是用制裁补偿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损失。所有这些都旨在孤立伊拉克和阻碍它进一步侵略，直到它在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下屈服，或者我们有军事手段和国际上对使用武力的政治支持。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最后用武的根据——如果出现的话。我们还需要特殊的刺激，或反对对科威特的侵略就已足够吗？有很多法律上的理由：安理会决议谴责这次侵略，还有联合国宪章第51条（对保护自己的成员国提供帮助），将会有足够的权威。然而，也许仍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明确的联合国认可就发动一次对伊拉克的攻击呢？

8月末，汉斯详细写了一个可能的计划，他给鲍勃·克密特看过以在正式通过有关用武的决议前谋求支持。它提出开始先与我们的阿拉伯盟友商量，然后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磋商。只要我们预先知道我们得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我们就能请求安理会

行动，我们有相当的把握得到必要的投票。如果在某一点上很清楚我们不可能成功，我们就会从联合国的授权退回来，而辅之以建立在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和盟友参与基础上的一种独立的多国努力。这样做的根据是联合国发出的谴责伊拉克决议，及后继决议的第 51 条，还有科威特的埃米尔干预请求。最后，如果制裁失败，就轮到使用武力，汉斯和克密特都提醒我们说，只要努力开展外交工作，不管有没有联合国的认可，我们团结必要的政治支持的能力都会得到大大提高。

第十四章　微妙平衡

乔治·布什

公众和国会的压力影响到决策，明智地选择和在公众反对而你相信是正确的东西之间搞平衡总是困难的。这一点没有什么时候比下面几周或几月体现得更为真切了。1990 年之秋都用于维持和加强我们的国际联盟而在国内外确立对我们行动——正在做的和也许还得做的——的支持。我希望避免用武，直到我们最终有了国内和国际的支持。在与联盟打交道时我感到欣慰和自信。国内的挑战更为复杂。外交政策与预算政治缠绕在一起，在中期选举临近之时被党派偏见所指责，已经使与国会的关系增加了一点不愉快。它很快成为我的总统任期中最令人沮丧的时期之一，因为我既不愿对实际的预算作出妥协，又要建立公众的理解和对我们介入海湾政策的支持。我经常想如果与一个两院都不被对立政党控制的国会一起工作该是多么好。

对我来说似乎我想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国会的民主党领袖所阻碍。

我知道有一些领域与国会成员在政策上有一些真正的分歧，但我想预算和波斯湾不应该在其中。我想两党关系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应是一致的，同时，我知道我不可能征服极端的国会议员，或极端的美国人。我将面对批评，不管我相信依据刚发生的事情和正确的指导做了什么和决定了什么。

在危机之初，我们对侵略科威特一事迅速作出反应，公众与国

会对我们的支持是强烈而广泛的。投票是对公众舆论不太精确的测量，特别因为他们依赖问题怎样提出和调查者所提出的所有例证，但是结果一致显示美国人总的来说支持我们的政策。根据《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8 月 22 日投票统计支持我的数字高达 76%。这么多的支持使人高兴，数字还有保留。一个批评是我没有把情况即我们必须介入的理由充分告诉公众和国会。公众舆论将不支持我们需要大部队长时间留在海湾，让军队单独行动，没有得到很好的法律根据。一些人想要我作解释事情的炉边谈话，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做的那样。我不善于这样，我相信改变舆论的最好方法不是讲话而是行动。

我经常觉得在科威特所发生之事的重要性被传媒不恰当地掩盖，因此没有为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所理解。这使得表达我们的利益更为困难。伊拉克凶暴的罪行在传媒很少的报道中一带而过。人们似乎不为我们亲眼所见的不公所动，对于这样的不公我甚至认为更有理由与萨达姆对抗。由于伊拉克的审查制度电视网络不可能覆盖这样的事件，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我试着不仅在我的演说和对传媒谈话中解释其利害关系，而且一直让国会知道。在危机过程中，从 8 月 28 日开始，即使是在国会休会期间，到劳动节以后，我 20 余次会见国会领导人和党派集团，或向其简要介绍情况，还不包括与个人的会见。

国会与公众中都有一些人对我们的目标持反对态度。一些人认为恢复科威特的政权我们得不到实际的国家利益。我对此非常失望。其理由是，“科威特是个富国”，“但他们不民主。我们与恢复他们的统治者并不利害相关。科威特人民应该选择。我们应当号召在科威特进行由联合国主持的选举”。如我在日记中所记载：

日记,9月4日

我担心(佐治亚参议员)萨姆·纳恩重提一些人提出的妥协——即应当在科威特进行选举——这样的中断缺少联合国的认可,它正对侯赛因国王及其他一些狂热希望由阿拉伯人解决以及对美国到那儿基本持否定态度的人有利。统治者必须复位。然后科威特人干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还有)在伊拉克(选举)如何?

除与我们的目标和利益有关的问题以外,国会还要求知道其他还有哪些国家想在海湾防卫上花钱以及花了多少。我们预算花费100亿美元。国会的关心反映了国内一种广泛的感觉,我们对萨达姆的反应是在做狮子份内的工作,其行动是代表世界的利益而不是我们自己。这样的立场不是没有理由的,特别在预算之战中。

而我相信对于军事负担美国必须首当其冲,我认为其他国家仅仅利害与之相关的才应有所贡献。一些国家很快派出志愿军,而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的国家可以承担物质的、资金的义务。我们必须通过补偿某些国家经济上的困难支撑联盟,不仅那些受制裁伤害的国家如埃及与土耳其,而且还有约旦和一些依赖伊拉克或科威特石油的东欧国家。我们的盟友负担一些防务费用不是一个新的思想,它的一些措施已实行有年。德国对驻在他们土地上的美国军队给养给予补助。我们也靠这个同意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帮助我们的军队在这些地方的开销。

国会特别想要知道日本的贡献。在这个国家仍有一种反对情绪,它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问题中表现出来。我8月29日与我的朋友中曾根康弘谈话,他尽其可能地给予支持。他拿出一个计划,理论上的支持总计达到10亿美元,还不算日本对土耳其、埃及

和约旦的单方面援助。这个数字后来增加了。中曾根康弘面对着一个难题。他想派非战斗的军队去海湾，但却未能克服国内的反对意见[①]。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资金援助是日本和德国所能提供给联盟的基本帮助，这两个国家的海外军事行动都受限制于他们的宪法。多年以来，它们每个国家都致力于抑制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导致20世纪30年代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宪法的限制意在防止德国或日本的侵略，许多人现在对之作更宽泛的解释，包括海外的任何军事部署，甚至维持和平活动。科尔与中曾根康弘都承受巨大的国内压力，这种压力有时具有类似于法西斯主义的活力，不允许他们的国家参加实施联合国制裁或向在沙特阿拉伯的联盟派军。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8月30日的会议上，我们决定号召我们的盟友和朋友贡献经济援助和支付与我们称作沙漠盾牌行动相联系的防御费用，该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罐头杯"之旅。布什总统准备打电话给撒切尔和密特朗告诉他们我们的主张，然后是科尔、法赫德、科威特的埃米尔和阿联酋的总统，请他们会见我们的大使。我们也决定派一个单独的使节去见戈尔巴乔夫，鼓励他帮助东欧人解决他们的石油短缺。贝克与布拉迪很快带动欧洲和亚洲，"罐头杯"在手。

乔治·布什

埃及的经济情况特别糟，有巨额的外债，封锁和减少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使之更糟。如果他们得不到某些救援国家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问题。9月1日我打电话给霍斯尼·穆巴拉克告诉他我将劝国会豁免埃及欠美国的全部债务。我知道实现它是很困

① 他的政府最终在议会未能通过和平使用日本军队的议案。

难的，国会将出现一种合唱，还会问到其他地方，土耳其怎么办？希腊怎么办？穆巴拉克对于全中东的和平过程以及联盟都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帮助他走出困境。有35名成员的国会代表团定于几日内到达开罗，我请他不要同他们说及我的计划——我想先与国会商量——虽然他能够与他们提起债务豁免问题。

我们也谈到制裁对伊拉克的影响。穆巴拉克相信萨达姆已陷入政治困境，他不大可能愿意只是在经济压力之下撤出科威特。在打了8年仗之后，成千上万人伤亡，2 000亿美元的代价，伊拉克对其与伊朗的战争并没有什么表示。穆巴拉克预言如果萨达姆撤走，他就会大丢面子。这将是自杀：他的人民会杀死他。阿曼外长约瑟夫·宾·阿拉维也认为萨达姆不会屈服于制裁而主张诉诸军事。我发现这些观点使人丧气。

8月的另一个争论是我是否应当去沙特阿拉伯表示对我们军队的支持。我们许多美国人在机场和码头向其亲人告别，我以为总统显示其关心是很重要的。此外，我回来时可乘机与我们需要对话的国家谈及我们在海湾的义务。我也想在访问中联络一下我们的阿拉伯盟友和表示我们对他们正在作出的勇敢努力之赞赏。8月10日我最初在给布伦特的一张便条中提出这个想法。它被仔细检查，没有人赞成它。斯考克罗夫特、苏努努和贝克都认为我应该等待。他们认为这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并担心会让美军存在曝光，给伊拉克以口实，它也可能刺激该地区的激进分子。穆巴拉克阻拦我，法赫德说我将受到欢迎，班达王子甚至似乎也主张它(我应该去叙利亚)，但话刚出口又收回了，沙特人只是显示阿拉伯人的好客。如此勉强，我决定不去了。但是我仍想在外交方面做些事。8月下旬我对布伦特提及，我们应该考虑与戈尔巴乔夫会一次面。布伦特喜欢这个主意(主要是我相信不应被海湾拖着走)，于是我们就开始做准备。

见戈尔巴乔夫有很多理由。毕竟，它加强了我们给萨达姆的信息，美国和苏联站在一起，坚决反对侵略。由于这些理由，会见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我相当肯定如果戈尔巴乔夫认为我们对伊拉克的观点过于激烈那么他就不会同意它，如果我们的讨论是建设性的，那么就会进一步孤立伊拉克。我也认为象征性地承认苏联对海湾有强烈的兴趣是重要的。他们对可能使用武力非常敏感，这使得我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宁早勿迟。我担心在我有机会与他面对面谈话之前有某些偶发事件会使关系变得紧张。

我打印了一封信致戈尔巴乔夫，建议我们在芬兰或瑞士等中立国家聚会一天以使它与通常在每个对方国家的最高级会议有别。本着我们7月在戴维营讨论的精神，我想有另一次机会坦诚地谈话和做事。吉姆8月30日把信交到苏联大使馆，戈尔巴乔夫同意9月9日于赫尔辛基会见。

赫尔辛基会谈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试图让戈尔巴乔夫理解如果谈判与制裁无效我们也许必须诉诸武力。我需要使他相信美苏合作反对侵略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强烈反应，它的含义是为了未来世界和平。我想对此问题有一个强硬的联合声明——向巴格达发出强有力的信号。

我担心苏联人的谈话会涉及广泛的和平解决和中东和平会谈，它将包括解决以色列占领领土问题——海湾危机与阿以对抗的这种联系我们试图避免。谢瓦尔德纳泽对贝克提到这个思想，他指出联合国本身是一个国际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演讲中也间接提及。我们必须把阿以和平进程与伊拉克分开，否则阿拉伯的联盟整体就会受到打击。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吉姆·贝克的工作人员以丹尼斯·罗斯为首，准备了一份联合声明，该声明宣布美国与苏联希望和平解决事件，但是如果萨达姆仍然拒绝从科威特撤走我们也准备采取其他的方法。这是一个好

主意，但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会想一切办法尽可能帮助他的前被庇护国。某种软着陆或妥协的结果对他来说会最理想，他也可能做一切可能之事来阻止军事行动。我认为该声明将难以推销。

戈尔巴乔夫的伊拉克政策或许很矛盾。既然国内的形势令人沮丧，站在超级大国美国一边也许正是他的希望。危险在于他可能显得只是被美国巨舰牵着走的一叶扁舟。还有一个前景是苏联对伊拉克30年的政策被抛弃，他可能因此受到责难。另一方面，支持举世谴责的伊拉克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他两难处境的结果可能是骑墙观望：强烈表示站在美国一边，但在幕后努力保护萨达姆及苏联的投资。

乔治·布什

9月6日，我在与密特朗会见时说到穆巴拉克，他刚与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话。“他对任何导致公开战争的举动都非常谨慎，但他强调需要维持一个有关科威特的共同战线，”密特朗告诉我说，“我发现他有一个很积极的精神状态。他说他对阿齐兹有过一次很困难的访问。”密特朗关心人质，但说这个情况不应当改变我们的政策。“恰恰相反，”他宣布，“它使我们激怒并加强我们的决心……萨达姆让情况变得更为困难。”他认为会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帮助，如果我们一致强调的话。我问他对以军事行动实行制裁怎么看。密特朗回答说这将在联合国安理会665号决议的框架内。“如果有必要向伊拉克的船开火，那就必须干好。”他果断地说。他还没认为这将是必要的。

第二天，玛格丽特·撒切尔打电话来说反对党工党想要一个另外的联合国决议。“我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有此授权，不需要向联合国收回，”她说，“我们可以要埃米尔再写一封信，但是我们不应当收回联合国的决议而冒分裂危险再投一次票，这会削弱我们的立场。花5天时间才通过联合国安理会665号决议，甚至那时我们也不能把‘武力’字眼写进文字。”

同一天,在去芬兰之前,我去参加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预算谈判的开幕式。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我在国会的挫折还在发展。

日记,9月7日

> 我真希望伊拉克危机和联盟的统一能够加强对我们预算的支持。我对参加会议的所有领导人都作了一番简要宣传,他们都理解我必须完成这件事因为我必须赶往赫尔辛基。也许这次有戈尔巴乔夫和伊拉克危机的赫尔辛基之行是我们用来撬动国会的杠杆支点。我相信有望如此。

我们这次飞行遇到很多气流,所以我睡得不太好,星期六我们到达时觉得很累。但是芬兰很美妙,老朋友冒诺·考威斯特总统对我们热烈欢迎。从一次成功的"罐头杯"之旅赶来加入我们的贝克精神为之一振,他在那里转了一圈大约得到了60亿美元。

戈尔巴乔夫和我9月9日在总统府会见。他似乎较为放松,甚至有些高兴,尽管他国内还有麻烦。这是一个小的群体——我自己、戈尔巴乔夫、布伦特和切尼耶夫。吉姆与谢瓦尔德纳泽单独会见。

"我认为有机会从这场危机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在我们开始时我对戈尔巴乔夫说,"但是底线必须是萨达姆·侯赛因不能从他的这次侵略中获益。我还不能确信他是否知道美国已决心要取胜。我希望你带话给他,我们不能容忍执行联合国决议之失败。"我告诉他我们还有一个适当的战略使制裁成为我们一次很好的工作机会。"我不想它升级,我不想使用武力,"我说,"但是如果他不撤走,他必须知道既成事实是不可接受的。"我想与戈尔巴

乔夫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使得联盟如果被迫使用武力，苏联人会支持我们。“这对你们也许是困难的，但我希望你们能够这样，”我说，“传媒问我是否也请你们派兵。我说我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这样决定，我肯定没问题。”① 美国并无计划以后在海湾留驻实质性的部队。“以后继续保持对萨达姆控制的安全防护措施应该是多方面的”。

我指出美国的传统是让苏联人在中东不发挥什么作用，这个政策已经变了。“我认为未来世界的秩序是美苏合作解决问题，不仅这次而且还有中东的其他问题，”我说，“我们今天联系越紧，新的世界秩序也就越近……我想把你作为平等的伙伴一起工作来解决它。我想明天晚上到美国人民中合上冷战这本书，给他们提供新的世界秩序之视野，在那里我们是合作的。”我交给他一张彩色漫画，上面把我们两人画成拳击家，骑在冷战恐龙上双手举起。他笑了。我问他是否在意我们在这些小型会议上用名而不是姓相互称呼。“很好，乔治！”他笑着说。

戈尔巴乔夫同意该危机是对正在过渡中的世界和新的美苏关系的一个考验。“不能忘记其规模，我想如果我们不能对付这个冲突，那么新的秩序也就不会来到。”他说。也许这次危机是块能把我们绊倒的石头。问题是，我们能否以一种新的方式行动和思考。如果不能，后果是严重的。没有马耳他的会见，没有新的关系，东欧和德国的统一将会糟得多，也许会出现可怕的混乱。“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自己有一个不算小的难题。”他告诉我在东欧与德国主要责任在苏联身上，他们得结束陈旧的思考。“在海湾，美国处在更为困难的位置，”他说，“我理解这一点，也许比我们的人民更理

---

①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总统告诉戈尔巴乔夫他能够接受苏联军队加入联盟时我退缩了，虽然很清楚戈尔巴乔夫对派军没有兴趣。这是总统愿苏联人也包含进来的标志而不仅仅是显示团结。对我来说，应当避免苏联军队在中东，如果可能的话。幸运的是，戈尔巴乔夫对此番话没有回应，于是这个论题就被丢到一边了。

解……你们的人民希望你们谨慎行动并且赢。我们的人民都希望很快有结果……你不应该怀疑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我们谴责伊拉克的侵略和支持联合国。我们这点是一致的。但对我们来说困难在于你们先决定派兵,然后才告诉我们。"

"我们并不想在你们背后做事,"我说,"但是我能够接受我们应当打电话告诉你我将要做它。"

"但是以后我们能够肩并肩行动以动员国际社会,这是一个大成就,"戈尔巴乔夫说,"这就看上去与动武大不相同,这很好。但管理这个新秩序肯定有某种安排。你们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对付伊拉克的侵略。"

他提出他关于危机程度的想法。沙特阿拉伯现在是安全的,萨达姆受到了抑制,他说。美国和国际社会能够夸口取得了某些成绩,也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科威特仍然被占领,萨达姆不会轻易离开。他知道我们需要谨慎行事,但是军事解决是危险的,对苏联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怎样用军事行动来证明伊拉克对沙特阿拉伯没有敌意?这就意味着如果伊拉克不进攻沙特阿拉伯或以色列,美国就会是战争的发动者。人们会想起阿富汗和越南。萨达姆对许多阿拉伯人说来已经是抵抗西方的英雄,他不害怕美国。"但是我们不能让局势就这样,"他说,"普里马科夫了解萨达姆这个人,所有人都相信把萨达姆·侯赛因逼入墙角是错误的,必须给他一点面子。"他提出一个建议。萨达姆释放人质,从科威特撤退和恢复科威特政府。转过来,美国允诺不打击伊拉克,我们将减少我们的军队,而代之以阿拉伯一支维持和平部队。一个关于中东的国际会议之协议将随之而来,它是联动的。戈尔巴乔夫相信萨达姆会拒绝这个提议,当他撕下伪装时就会在阿拉伯人中失去支持。我想萨达姆会匆忙作出此计划。他能够利用与此会议的联系掩盖他的侵略。"任何使科威特问题悬置的计划协议对我们已经走了很远的集体行动来说都会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我说。萨达姆

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还有一个核计划,一旦美国离开,他就可能重新开始侵略。"

戈尔巴乔夫建议我们修改计划,但是认为军事行动会显得像侵略。我反对,说萨达姆正在科威特拆除设备。"我认为这就是为何我们应当很快行动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催促道,"武力会毁坏我们已经取得的东西。如果当前的局势拖下去而不采取什么步骤,我们就会失去主动。这里我们能够说的是我们将以一种负责任的想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行动。"

我告诉他我们讨论的结论不可能是一个美苏计划。"它看上去像只是我们两人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说,"但这个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我们必须作一些思考……"戈尔巴乔夫承认我们的行动不可能就像是在独自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什么也不能做,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会见呢?"他问道。他建议我们能够说找到"一种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解决方案"是有可能的。

"我同意,除了我们应说'期待'以外,"我说,"我不太相信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计划。我愿意多走一些路去寻找和平,但是我们不能破坏联合国的集体行动。"

"但是如果他什么也没得到,如果他被逼得走投无路,那么对我们大家来说就会代价更大,"戈尔巴乔夫反对说,"我们需要给他一点希望。让我们给出这样的印象,即他还没有遭受严重的挫败,虽然他会认为他不会成功。"

"如果我们给希特勒提出某个出路,是否会成功呢?"我问道。

"不是一回事。"

"只是人不同。"

"我们必须选择,"戈尔巴乔夫耸耸肩说,"我们没有很多选择。你在这里已经有很多收获了,我相信你想避免一次有可能毁坏油田的代价昂贵的冲突。那将是一次可怕的胜利。如果我们扔给他一个胡萝卜,我们就会赢,就可以确立国际法的作用(通过联合

国)，和我们的合作，避免严重的冲突。"

"我完全同意，"我回答，"虽然我们还必须有一个方法来避免刺激进一步的侵略。你提议的大部分就是如此。"我说我们将仔细研究他的计划。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带着预感散会回来。戈尔巴乔夫的提议明显是由亲伊拉克的官僚精心制作——或许是普里马科夫，他是传统苏联中东政策的设计师，或至少是保护者。这是谢瓦尔德纳泽与普里马科夫为争夺戈尔巴乔夫而斗争的进一步证据，它发生的时间不可能更糟了。它唤醒了莫斯科追求与巴格达单独讲和的幽灵，我们必须阻止它。在我们离会时我对总统说苏联人已经后退了一大步，或许正在小心翼翼地变成伊拉克的保护人。对我来说，给伊拉克"留面子"或部分撤军，答应不进攻，以及把这些与阿以争端相联系，都会改变我们道路的基本方向。

午饭由总统做东，我坐在马歇尔·阿克罗米耶夫身旁。由于此前 7 月的一次私人早餐我对他很尊重。在聊了一小会战略武器控制之后，我问他觉得情况会怎样。他指着戈尔巴乔夫。"他是我的领导，"他说，"我忠于他并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但是我有些困惑。"阿克罗米耶夫告诉我他是一个士兵和热忱的爱国者，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苏联和教导他的原则。突然他被告知他坚持和为之战斗的一切都是错的，苏联，其领导人，其行为和动机——都完全是一个谎言。他的世界彻底崩溃了，他的道德的和国家的支撑点毁掉了。他不再知道相信什么，捍卫什么。他的孩子看不起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制度。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我设想自己如果身处其境，发现我的生命所赖以为基的一切按西方观点看都只是一场游戏会怎样。仅仅一年以后，苏联崩溃，马歇尔·阿克罗米耶夫自杀了。

午饭后及下午与苏联人开会前，总统、吉姆、约翰·苏努努、约

翰·凯利、丹尼斯·罗斯、康迪·赖斯、理查德·汉斯和我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当贝克描述他与谢瓦尔德纳泽的会见时，很清楚他的经历远不同于总统与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也提出中东和平会议问题是一次解决伊拉克侵略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在讨论很长时间以后，贝克劝他说这样的会议会是萨达姆的一次政治胜利。他代之以提出我们两国都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但如果萨达姆拒绝离开科威特，我们就会遵循安理会关于海上封锁的决议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贝克向谢瓦尔德纳泽出示了我们草拟的声明。谢瓦尔德纳泽喜欢这样的语言并问他的职责，瑟盖·塔雷山科与鲍斯在制订它。作为对照，戈尔巴乔夫向总统作了一个有激情的提议，总统的印象和我差不多——戈尔巴乔夫在向问题掺沙子，至少是有联系。我们的结论是最好下面开全体会议，提交两个同时召开会议情况的报告，从外长的开始。

经过充分准备，贝克概括了与谢瓦尔德纳泽的讨论并报告鲍斯和塔雷山科已准备了一份体现其精神的联合声明。布什总统建议我们看一看这份联合声明。戈尔巴乔夫仔细地阅读草案，要求做一些小的变动，然后是绝对令我吃惊的变化，特别是说“行”。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早晨就这样过去了，实际上没有一点迹象要保护他的伊拉克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吃惊——以及特别令人欣慰的——转变。我们勉强逃过了一次危机。

回想起来，似乎有理由相信戈尔巴乔夫在脚踩两只船。如果他能够使我们跟着他的路子走萨达姆就会得到好处，他回国以及在伊拉克就是一个英雄。未能如愿时，他至少能向他的阿拉伯主义者表示他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然后他回到他的次好选择，即签署我们的声明，参加一个联合的新闻发布会，显示两个超级大国在解决世界问题。拒绝它与让会议破裂就拿不出什么给他的反对派了。

联合声明重申贝克与谢瓦尔德纳泽8月3日宣言和我们对联合国决议的支持。它要求伊拉克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让科威特领导人恢复统治，以及释放所有人质。伊拉克必须遵循该决议，让科威特恢复如前，即侵略以前的状态。我们决心执行制裁，同时在人道主义前提下承认联合国决议所许可的伊拉克和科威特粮食进口。我们宁可和平地解决危机，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伊拉克的侵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危机结束，如果现在的步骤不能结束它，"我们警告说，"我们准备考虑其他与联合国宪章相一致的措施。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表示侵略不能也不会得逞。"

我们的结束语回避了有关的争论。一旦安理会决议授权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就会与该地区内外的国家发展安全的结构和促进和平与稳定。"积极活动以解决中东和波斯湾所有现存争端是必要的，"我们就这样结束，"双方在适当时候继续相互协商和采取措施追求更为广泛的目标。"

乔治·布什

我对会谈的结果很高兴。即使戈尔巴乔夫还没准备考虑军事行动，但他把门打开了。我们得到了我想要的强有力的联合声明，宣布接受伊拉克的侵略为既成事实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还阻止了把危机与以色列相联系的另一个企图。

第二天，我从法赫德国王那里得知阿拉伯人的反应是积极的。他相信伊拉克人已四面楚歌，肯定会产生压力，而乐观地预测它只会再坚持几周。记得几天前我与霍斯尼·穆巴拉克有过一次令人沮丧的谈话，我问它萨达姆是否会撤军和仍在伊拉克掌权。这位总统回答说萨达姆实际没有选择，当他撤退时，也就是他的末日。

同一天，伊拉克宣布一个反对我的指控，准备开一个"人民法庭"审判。指控包括：派美国部队到海湾地区和占领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圣地，威胁进攻伊拉克和阿拉伯国家（为全体阿拉伯人民所

牢记),强制实行反对伊拉克的经济措施,向中央情报局下令策划反对萨达姆。

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我给白宫法律顾问包登·格雷写了一张“纯粹个人看法”的打印便条,我指示亲手交递:

请搞一张签证并准备到巴格达就这四个指控为我辩护。

我能够引证联合国的条文击败第三个批评。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派军,但必须确信你愿意接受我的关于“圣地”的案件。我对此一无所知。

他们不可能再搞四个严厉指责来纠缠。

我并不担心,但请在一审之后告诉我情况。

如果他们不让你离开,打电报回家,我们会让人暂时代替你这里的工作。

非常感谢。

(签字)乔治·布什

9月11日我在国会两院讲话报告海湾局势以及我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我希望加强对我们海湾立场的支持,突出我们在赫尔辛基取得的成绩所具有的长期重要性。

日记,9月11日早晨

准备好今晚对国民的演讲,但第四点,预算部分,还不能放在一边去睡觉因为编预算的人要开会到2点半。

据说我非常偏好国际事务。是的,我全神贯注于这次国际危机,我必须说我喜欢做与它有关的方方面面的工作,我深入很多细节超过在国内的事务。所以我想回

答的是我确实喜欢它，但是我认为预算赤字是非常重要——必须要解决的事情。我认为美国人民应该得知情况，无论何时他们注意此事。编预算的人布拉迪、达曼和苏努努今天早晨有些乐观。他们说国会在担心我的（高）支持率。你知道我如何看待投票，亲爱的日记。我认为他们来来回回，我们也能够上上下下。还有，我的确对支持我的行动的人数感到高兴，但是我知道它会迅速变化。整个国家后退时我们会很沮丧，它的变化真的很快。所以我们不应该得意洋洋，但如果今天强有力的数字能够在许多方面帮助我们，而国会不想在整个国家面前被抨击，这样就会好得多。但除此之外，我一点不想仗此投票数而过分自信或骄傲自大。

那天晚上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当我对挤满人的议院演讲时我全身兴奋。我详细介绍戈尔巴乔夫和我在赫尔辛基所完成的事情，谈到我们在与苏联建设一种新的关系，新的伙伴。不可能再有一个独裁者依靠东西方对抗阻碍联合国商定的反侵略行动。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别时刻。波斯湾危机的重要性还在于，提供了一个走向合作的历史时期的难得机会。走出这些令人烦恼的时期，我们的第五个目标——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就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时代，没有恐怖主义的威胁，正义的力量更加强大，更加完全地追求和平。在这个时代，全球的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南方还是北方，都能够繁荣昌盛与和谐生活。上百代人寻找这个捉摸不定的和平之路，上千次战争猖獗横行耗尽了人类的力量。今天这个新的世界在奋斗中诞生，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世界。一个法律的统

> 治将代替生存斗争统治的世界。一个国家将认识到对自由与正义具有责任的世界。一个强者尊重弱者权利的世界。

海湾危机是对我们所追求的新世界的第一个考验，而且关系重大，我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回应，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回应此挑战呢，“它对世界上现实的和潜在的暴君都是一个信号”。美国与世界都必须捍卫共同的重大利益，我宣布——我们会的。

我不能预测我们需要多长时间让伊拉克信服而从科威特撤军，制裁将花时间，我们不能让侵略继续。我们在海湾的利益与作用不是过渡性的。它比萨达姆早，也会比他更长久。我们必须阻止未来的侵略，帮助我们的朋友自我保护，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传播。

> 我还要明确美国与伊拉克人民并无不和。我们的不和是与伊拉克的独裁者及其侵略。不能允许伊拉克吞并科威特。这不是威胁，不是自夸，而只是它的惟一出路。

那天晚上最使我高兴的是对我已经采取的(调动军队)和如果受到挑衅也许还必须从事的行动的强烈支持。只要有国会的支持，我觉得就很有希望赢。我还看到对抗酝酿着暴力问题。

我想找到一个方法让国会明白无误地显示对我们正在做的和也许必须要做的事的支持。9月初我请包登·格雷研究林肯·约翰逊在1964年东京湾决议时期如何处理国会问题。约翰逊努力做个别国会成员和国会本身的工作，他在越南的行动仍有支持的记录。他敦促两院联合听取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军役情况，并请国会坚持点名所以能完成此纪录。结果，他得到众院的一个一致同意的投票，414对0，以及参议员88对2。我认识到越南战争情况不

同，但是他的努力给我很深的印象，于是我开始考虑寻求得到国会类似多的支持票。

日记，9月13日

我们不想发动一场战争权力[①]的辩论（关于使用武力），大多数参议员也不会这样，所以我们准备为解决问题而工作……我的主要疑惑是，他们站在我们一边会有多长时间？参院或者众院的支持会持续多长时间？只要人民站在我们一边，我就会有好的机会。但是一旦开始受到侵害，他们的所为就会如林肯·约翰逊所言：他们把他们的驴漆成白色然后与羚羊跑在一起。当然，不是所有的人。

星期天晚上，第14次……新的投票出来了：57%支持，23%反对——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反对的曾经是7%，我为支持率的下降而焦急，焦急，焦急。

总统9月21日与两党领袖的会议提供了一个把握国会脉搏的机会。发言人汤姆·佛莱说两党和整个国家有着广泛的一致支持，但谈论军事选择还是太快了些。“你必须给制裁一个机会。”他说。如果有挑衅，那就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们必须行动，或许是单方面的。然而，他相信在我们行动之前得到国际授权是很重要的。他警告说：“如果我们卷入敌对状态，战争权力问题会重新开始。”乔治·米切尔与迪克·格普哈特一致同意。“我们支持是因为你们的行动是正当的。”米切尔说。我们应当继续一如既往。克莱

① 请参见第十五章。

本·佩尔反对任何单方面使用武力。共和党鲍勃·多尔与鲍勃·米切尔各自宣布支持现存的政策。杰克·默撒也如此，但认为我们或许在走向战争。萨姆·纳恩宣布如果打仗我们应该依靠空军和海军力量，不要地面部队。莱斯·阿斯平表示同意。

乔治·布什

当时国会的大多数成员似乎支持我们总的立场，并理解利害关系。鲍勃·多尔从一开始就对我们很宝贵，是关于国会和国家状态有价值忠告的源泉。但是我强烈地感到对其他一些国家的优先权有某种忽略。例如，我们还有帮助土耳其问题，这是一个北约成员国和反对萨达姆联盟的前沿国家。奥扎尔对他所支持的东西忠诚不二，他需要纺织品贸易来接济，但特赖特·劳特与杰西·赫尔姆斯敦促我不要否决一份保护主义的议案。这儿是一个坚定的朋友，支持我们反对一个暴君，不要求金钱援助，只想能与我们进行纺织品贸易。当我们开始解决豁免埃及债务和对沙特阿拉伯大范围军事援助时，我们发现没有比此问题要在国会通过更为困难的了。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债务豁免对国会不可避免是一个敏感问题。它必须由关键的议员提出完全是基础性的问题来非常仔细地处理。尽管总统请穆巴拉克不要说任何关于豁免埃及债务的事情，但穆巴拉克还是不幸以一种公开的方式提到了它——在我们与国会商量以前。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几乎使我们的计划泡汤。我能理解国会的一些人为何反对债务豁免。它会让选民不满。在国内许多人还在为学校、农田和联邦住房管理局的债务而奋斗之时，人们会问为何我们豁免外国而不是这些人的债务。

在我们为对埃及的财政支持而努力之时，我们也不顾一切地争取送给沙特阿拉伯所需要的武器装备。伊拉克的军队比沙特阿

拉伯的庞大得多，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沙特人没有弹药能够击败伊拉克的苏制坦克。给他们搞些物资是很困难的任务，特别从我们禁止向非北约国家出售某些特定的武器以来。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国会的通知和这些物资的实际装运之间需要有 30 天的等待期。而总统能够以外援行动的名义使用特别权力授权出售这些弹药，但我们仍得事先通知国会并解释其必要性。

8 月 6 日布什总统签令立即装运 150 辆旧坦克、24 架飞机和有限的弹药。国会并没有反对这第一次武器紧急移交，但它阻止了 9 月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包括现代坦克和装备。该一揽子交易总数约达到 170 —200 亿美元。我们相信它对沙特人以及对萨达姆都会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对该地区的责任超越了当前的危机。此外，把沙特的军队建设得更为强大，对美国军队在未来突发事件中的需要就会减少。随着对第二次一揽子交易规模的抱怨，以及经过与供应装备的签约人的协商，我们把之一分为二。第一部分是沙特急需和马上就能用的武器。这就需要我们缩短这种援助正常的 30 天期限。第二部分是剩下的。国会中有些人很快把此武器一揽子交易，还有埃及的债务豁免搞得一片混乱，他们想为以色列争取一些东西而我们试图送一些紧急物资帮助我们的阿拉伯盟友。结果该武器一揽子交易 10 月 29 日通过，只是因为国会未能在 30 天之内通过一个不批准决议。债务豁免法案在 10 月的第一周得到批准。

乔治·布什

9 月 14 日伊拉克部队包围在科威特市的使馆，搜捕几个使馆工作人员的住所。他们带走美国的领事，以及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的。那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667 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凌辱外交使节。与此同时我听到许多伊拉克人对待科威特人的故事。

日记,9月22日

我刚才看了一份关于伊拉克在科威特拆除设备的情报。射杀停留在汽车里的平民,带走那里极少的粮食。对国内人也残酷无情,毁坏证据。的确,他们在把一块绿洲变成荒原。情报引用了挪威大使的话,他是一位受尊敬的观察家,他证实了兽行的存在和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可怕意图。问题是,除非很快发生某些事情,否则科威特就可能不存在了——也许没有记录——没有人知道科威特市民的存在。有证据表明萨达姆在试图把伊拉克的傀儡向科威特移民,所以如果再有一次全民投票,票数也许会反对王室家庭。萨达姆发誓决不撤军,发誓让该家庭永不复归。这更坚定了我的决心。我在考虑我们是否需要把时间加快。

埃米尔9月28日来到白宫,他告诉我有关他的人民遭受伊拉克军队暴行的第一手情况,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受触动而认为萨达姆的侵略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战略威胁和非正义的、反道德的行动。这个结论我是从8月9日起逐渐得出的。他蔑视国际法。他歪曲事实,他对所有帮助过他的邻居撒谎。为这些暴行我变得情绪激动,它们实际上在催促我积极行动以作回应。由于消息封锁,科威特人所受到的伤害都是听说。我知道存在一个危险即我对听与看到的东西也许反应过度了。我告诉我自己要冷静,不要根据这些人权伤害的事例——他们是那样严酷和丑恶,使用了中世纪的酷刑——仓促行事或作出愚蠢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我所得知的不是一件事情的阴暗面或试图了解另一方的观点,它是善对恶,正确对错误。我相信这些变化使我下定决心不让侵略继续下去和鼓励我考虑使用武

力来改变它。这就是我在进一步搞清楚事实之前在心中所作的各种考虑，它们促使我作出选择。这也使得向我们军队的家庭解释他们所爱的人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稍微容易些。我感到情绪低落并急于想解决这场危机，希望我们能找到理由介人并解决问题。

危机之初，我正好在读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的一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我发现在科威特正在发生的事情与纳粹所为，特别在波兰的所为有直接的相似。纳粹打击成千上万无助的人和强加给整个欧洲的折磨其滔天罪行无法抹去。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德国军队怎样横扫一个地区，紧接着是用特种部队对居民实行恐怖统治。我看到伊拉克的占领军在科威特所干的与之有着令人心悸的类似。我因把萨达姆比作希特勒而受到指责，有评论家批评我把危机个人化，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比较。

我对萨达姆·侯赛因没有个人的仇恨，只是对他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在道德上强烈地反对。他寡廉鲜耻，我们不能让之继续。这时候我扪心自问："我们如何对待在世界上干了这些事的家伙?"我想你可能反对道德上的判断，而我认为他的所为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并会使人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善对恶的问题。在扶持人质和对待科威特人民的过程中，萨达姆成为恶的集中体现。他本人也尽量试图使危机带有个人色彩，他滔滔不绝地把我们要把他从科威特驱逐出去的努力说成是美国刁难伊拉克与阿拉伯人。我公正地决定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强调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原则而不是个人基础之上。

在秋天召开儿童大会和联合国第 45 周年庆典之时，联合国成了一个积极陈述海湾政策的论坛。政治领袖对大会的每一次演讲都谴责伊拉克，有些人，包括谢瓦尔德纳泽提醒萨达姆，如果继续占领科威特，联合国有权"抑制侵略"。弗朗西斯·密特朗利用他 9 月 24 日的演说提出一个和平计划，他说可以把这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一次谈判。但他又说只要伊拉克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就不

可能妥协，他有一个论点，即呼吁让科威特人民民主选择，表明他不愿以埃米尔复位为一个条件。

虽然密特朗的演讲没有揭示美国与法国政策之间的任何重大的裂缝，但我还是担心他不愿意把科威特王室家庭的复位作为伊拉克必须遵守的先决条件。他几次宣布对话的条件是从科威特撤军和释放人质，从而突出了这个论题。恢复合法政府问题被引人注目地弃置一旁，然而该条件是所有安理会主要决议的组成部分。结果证明这是我们意见不同的地方，传媒都瞄准这个问题。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把民主强加于科威特人——而宁可把之看作必须从内部生长出来的东西。我们不能让一个独裁者改变他们国内的政治结构。毕竟，我们不能让萨达姆在政治上从这次侵略中得到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坚持把强加的民主作为恢复主权的组成部分，那么萨达姆就能把自己装扮成科威特政治改革的催化剂。

在联合国发言几天之后，密特朗就给我一封信对之作解释。他强调法国的立场是联合国决议是不须谈判的先决条件。"法国的立场毫不含糊：萨达姆·侯赛因不释放人质和从科威特撤军就很难想像有缓和和妥协……"法国也支持封锁的"有效实行"。然而，密特朗主张给科威特人民主。"法国在与其朋友特别是美国一起进行有重要意义的军事努力，以保证封锁的成功和迫使萨达姆·侯赛因撤走，"他写道，"但如果它仅只为了恢复一个过时的制度，那我不愿冒一个法国士兵牺牲的风险。除了美国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样为了保证法律在中东的胜利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这就给我们一个另外的理由说出我们的想法。"我回了一封信，说我们之间不应有意见不同的表象，斯考克罗夫特给阿德米内尔·兰克谢德一个类似的信息。幸运的是，密特朗不再提及它，所以该问题对联盟没有实际的影响。然而，萨达姆试图利用这个明显的差别，10月底他释放了约250个法国人质，并说这是对该联合国演讲的反应。

10月给联盟带来了新的紧张。似乎苏联国内的政治问题开始显露危机。10月4—5日，普里马科夫访问巴格达，显然带有戈尔巴乔夫的信息。我们对这次旅行忧虑不安，特别是在听说气愤的谢瓦尔德纳泽事先并不知道、更不了解普里马科夫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谢瓦尔德纳泽答应贝克一旦他了解了就让我们知道该使节的意图①。这位苏联人也报告说有来自伊拉克人的潜在妥协和条件提议，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交易。该提案似乎反映了苏联外交部中的亲伊拉克派影响的增长。

谢瓦尔德纳泽很快报告说普里马科夫被派出是作为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代表试图撤出仍困在伊拉克的约5 000名苏联技术人员，伊拉克声称其中一些人掌握的军事秘密也许会传给联盟。普里马科夫显然也抗议使用人质为人体盾牌。谢瓦尔德纳泽告诉我萨达姆说他的部队撤走是可能的，"但不能以最后通牒为条件：要么撤军，要么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萨达姆威胁如果他受到进攻会向阿拉伯半岛的所有油田进行报复。他想要一个政治上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包括联盟的让步，以让他在自己的人民和阿拉伯世界面前保持脸面。谢瓦尔德纳泽推测这意味着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和给伊拉克通往波斯湾的安全出口。萨达姆愿从科威特撤退以交换对罗美勒油田和波斯湾前面两个岛屿的控制。两天以后，总统指示贝克宣布我们拒绝任何领土上的让步。

乔治·布什

戈尔巴乔夫派普里马科夫到华盛顿简要告诉我他10月19日旅行的情况，我听到了以后很感失望。普里马科夫报告说萨达姆

---

① 他的代表瑟盖·塔雷山科告诉我们普里马科夫试图提出某个和平动议，谢瓦尔德纳泽表示异议但遭到挫败。

由于被他的内部小圈子所包围消息不是很灵通，他听到更多的是对他的支持而不是他政治上的孤立。普里马科夫估计制裁还需要5—6个月才能见效，但仅这些并不能迫使萨达姆退出科威特，还可能起反作用，鼓励他进攻以色列。萨达姆说过如果要他在离开和被进攻之间做选择，“我宁死不离开，我准备作出牺牲，但是这场战斗不会只限于一个国家。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知道我必须离开科威特，但我只是不能离开”。普里马科夫提出一个建议，细述在萨达姆撤出科威特之后联盟愿干些什么。我打电报给戈尔巴乔夫说我认为这违反了我们在赫尔辛基制定的基本原则。“该主张不是坚持萨达姆无条件撤军，而是给他很重要的‘面子’，他不可避免地要把之作为一个‘报答’”。这种普里马科夫式的谈话更使我对不使用武力而找到解决方法持悲观态度。即使制裁搞痛了伊拉克，但它们不会厉害得足以使萨达姆离开科威特。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这只是普里马科夫那年秋天所作的几次旅行之一，他到巴格达和其他地区的首都试图为一个解决方案牵线，他努力工作想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得到一些东西。戈尔巴乔夫显得很坦率，他告诉布什总统在赫尔辛基是美国在领导国际力量反对伊拉克，苏联希望合作，他或许深深同情普里马科夫的观点。他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支持者在放弃东欧和德国以后已势单力薄。如果苏联人使伊拉克毫发无损，特别如果他们能因牵线让华盛顿和巴格达达成一项交易而受到赞誉，他们就得到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

也还有其他的挑战。10月8日，耶路撒冷的圣殿山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以色列军队向人群开火，射死21位巴勒斯坦人，伤150多人。该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愤怒，我们只得尽快行动以控制联合国的反应，避免联盟的分裂。就在这时，联合国也就哥伦比亚、古巴、马来西亚和也门所提出的一个提案在进行辩论，该提

案敦促成员国果断地对待巴勒斯坦问题，就像对待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一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呼吁安理会调查该事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提案谴责以色列行为是一个"罪恶行为"，以及派一个使团调查它在加沙及西方银行的一些情况，这些保护巴勒斯坦人的方法受到欢迎。我们不想加入到要求对该提案投票的人中，或显得不关心耶路撒冷人的生命损失，而加强这样的感觉，即我们保护以色列人是以牺牲阿拉伯人为代价的。此外，伊拉克人也在叫嚷把此事件的处理与海湾危机的决议相联系。

事件后那天，我们与英国提出一个草案——也受到其他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它用过度使用武力等不太刺耳的语言谴责以色列，并吁请派一个较为有限的使团到被占领地区。在与非联盟国家就其他方案进行紧张谈判以及总统与密特朗就措辞进行讨论之后，我们设法得到一个对10月12日决议进行修订的一揽子方案。他要求该使团就怎样才能保护巴勒斯坦人提交一份报告，但认定他们主要的保护责任仍依据日内瓦公约以色列有占领权。不幸的是，以色列愤怒地拒绝这个使团，引起更多的问题。联合国再次谴责以色列不合作。

由于这项决议受到美国支持，我们与以色列的关系达到一个新低。以茨哈克·沙米尔总理与布什总统互致信件几个来回。在美国的犹太社团感到吃惊和受到伤害并表示愤怒，他们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更加理解沙米尔，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死使之变得困难。

乔治·布什

圣殿山的国际风暴促使华盛顿的专家考虑联盟要瓦解的问题，正好这时我们与国会的关系开始恶化。预算之争支配一切，使国会与政府分裂，增加了紧张与不愉快。虽然我们设法与国会领袖一起制定出一个包括给国内经费加上硬杠子但也增加税收的协

议，议会10月5日仍未通过，这更增加了我个人的焦虑。那天之前我已经签署了一个继续让政府开放的决议，但否决了另一个，在哥伦布日周末一切都有效停止——虽然它并不影响到军事。我10月9日签署了另一个，并决定在国会10月19日通过一个可接受的一揽子预算方案之前否决任何提案。当然也有积极的立法活动。10月1日，众议院380对29票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支持我们在海湾的目标，同时敦促我继续寻求外交解决。参议院迅速通过类似的决议支持部署军队和我们在海湾的行动。这些措施都止于支持军事行动，这是从这次入侵以来和在我们部署军队之后国会第一次公开表示见解。

我1988年的常规献词"请看我要说什么，没有新税"用语很重。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在1990之秋，我被迫决定要么是在税的问题上妥协，要么政府真的要关门。当我告诉国会一切都要上桌谈判(包括增税)时，猛烈的批评随之而来。即将到来的10月国会选举使问题更带有党派色彩，因为民主党试图利用我在选举中支持率的下降。华盛顿的传媒——左的和右的——因我的食言在党内引起他们所谓"灾难"而"劈里啪啦"地发表意见。更保守的共和党称之为背叛……不管反增税的里根总统曾被迫数次提高税收。甚至我们向国会坚决保证不增加政府自由支配经费这个事实也没给我留下任何机动的空间，虽然我对之并不赞成。我们国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对共和党右派很有影响的纽特·金格瑞其在最后一分钟从他曾同意过的一项妥协后退，我感到非常失望。数年后他告诉我他的决定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最困难的决定之一。也许如此，但它肯定伤害了我。他的支持能够消除我在税收和信誉问题上所承受的打击。

回顾起来，预算政策的影响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后退之后，我们又回到原地，经济于1991年上半年结束时出现恢复，至1992年选举时已茁壮成长。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报界拒绝承认恢

复，我的政治对手特别善于提醒人民我在税收问题上的食言。他们忽视的是我们的经费有一个僵硬的杠杠，它仍然在起着作用并明显压制自由支配的经费。当我离开白宫时，经济在1992年第四季度已经增长了5%，全年的增长超过3%。“请看我要说什么”用语太过。紧要关头，我们的军队正调往海外，我们需要一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政府。我只得搞一个妥协让政府公开，但是我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在预算之争正酣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核心小组10月11日在工作室碰头听鲍威尔与中央指挥部的主要将领罗伯特·约翰逊讲述施瓦茨科普夫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在海湾应该继续进攻。他们描述了一场空中战役，其基本的计划已设计完毕。当问及一场空战是否会使伊拉克屈服或甚至崩溃，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时，鲍威尔显得很谨慎。他警告说或许空中力量还不够，我们也得使用部队。接着我们听取了地面战役的计划，欲使用的部队都在海湾做上了标记。它基本上是以一个军团的规模强行通过伊拉克的心脏直奔科威特，最初的目标是夺取科威特以北主要的交叉路口。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对此简要介绍并不满意。它听上去是由不那么热心和不想做此工作的人作的。他们提交给我们的选择是一次直接通过伊拉克部队中心的进攻，这对我来说似乎违反了直觉，因此我不能再沉默。我问为何不从西北方向和后面包围科威特市的军队然后切断它。发言人的回答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燃料车来支持这样大范围的运作，坦克在合围的路上就会用尽汽油。此外，他们不知道西面荒漠的地质情况是否能支撑这样的装甲兵行动。因此它是不可行的。我对此说法仍感失望。后来我打电话给切尼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得更好些。切尼也有同感，并派计划者重新回去设计。

乔治·布什

情况简介使我认识到在军事行动"轰轰隆隆"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也觉得我们有办法迅速完成我们的使命，而不造成太大的生命损失。我也有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最终会怎样开战。我想对一次挑衅的反应也许最为可能。

日记，10月12日

午饭时与苏努努、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谈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在努力考虑我们怎样全面解决伊拉克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在最高层次召集一个聚会——所有持支持态度的海湾国家元首——然后搞清楚对于挑衅或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时我们的观点是否一致？我们将如何宣战或怎样得到国会的支持？我们军事上将如何安排？

使我心情沉重的是送孩子们去打仗以及生命的损失。也许这来自我自己的体验，也许它来自一个小水兵，他在甲板上被砍成两半而我正站在几步之外，或者我自己中队的飞行员被杀死……我认为我战争时期的经验限制了作为总司令的我并使我谨慎，但是也让我理解胜利之重要。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的印象是早在10月中旬布什总统在某个地方就有意无意地得出结论，他必须尽一切可能解放科威特，实际上这意味着使用武力。我开始察觉到他有些冷静，他似乎不再考虑派出的美国士兵伤亡的问题——这样一个可怕的决定只有总统才能作出。我认为他在自己心中已经作出决定，因此，剩下的事情是总的战略和计

划，不再面临困难的人类决定。我相信他的结论是事不宜迟，如以色列问题及其他"侵蚀"所示，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保持联盟的一致。

乔治·布什

布伦特或许是对的。确切说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非得打仗不可。我的日记反映的是我所感觉到的挫折和急躁。

日记，10月17日

不平静的一天。我信任的朋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来就餐。我们谈论我们如何让情况变化，以及我们如何对待(能证明使用武力为正当的)挑衅(问题)。有消息说国会的某些成员认为我会利用微小的事件去打仗，他们也许是右派。我们必须原谅之。这类事持续的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我想我们能很快解决问题，用美国人的快捷方式。有8个使馆人员和40个非外交人员，我不想他们的命运变得不可确定。

伊拉克继续包围我们使馆的挑衅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我仍然对之非常焦虑，虽然直到10月中旬我还得知使馆人员能够生存。我不希望这些人被抓走和带到接近某个军事目标的地方，我担心伊拉克人会羞辱他们乃至美国。我决定把这些人搞出去，但我们的将领告诉我不能靠一次突袭来完成。我也不知道联合国或我们的盟友会对之如何反应。

日记，10月17日

我这样看待我们在海湾的盟友：英国人是强硬的，法国还是法国。密特朗本人很了不起，(他们的外交部)也

不想妥协和打自己的算盘。其余的欧洲人都不想使用武力。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希望我们把萨达姆踢出去和干快点——顺便说一下,还有埃及。叙利亚人也许是支持的。土耳其人会支持。接下来就是约旦和其他一些国家,他们会失望地摆摆手说,对武力的任何使用都会是一场大灾难。

我还没有把握我们自己的国家会怎样。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一次明白无误的挑衅,我想包括那些不愿同意让我们的(使馆)人员离开科威特的人也会支持我们教训教训这个家伙。我们能从空中打击它。对于我们在地面上能干些什么,我们的军方信口开河且拿不定主意。他们改变了地面的规则,但第二次,公正地说,地面部队也改变了。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将如何开始动用武力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的行动怎样才能够表现出不是联盟方在侵略,总统认为一旦我们受到挑衅就应当行动——但如果没有它我们也能行动吗?在一些人心目中,我们应得到一个联合国决议也就是被授权使用武力支持封锁,建议我们需要一个类似使用武力执行联合国最初的660号决议的决议,如果要先使用武力的话。

此外,如果出现军事行动我们得确立我们的战争目标。总的政治战略目标已确立在联合国决议中:原则上是把伊拉克从科威特驱逐出去和恢复科威特政府。但超过这些就是联盟军队的战略军事目标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目的——美国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这些都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通过空中战役尽可能减少伊拉克的军事力量。从军事观点看,在联盟把伊拉克军队赶出去和解放科威特的地面战役之前这都会“削弱他们的战斗力”。尽可能地损

坏伊拉克的军事机器还有其他的好处。能减少萨达姆对其邻居的威胁。这里的策略是损坏他的进攻能力而不让之出现权力真空和破坏伊拉克与伊朗的平衡，使该地区在若干年里出现不稳定。

乔治·布什

玛格丽特·撒切尔早就急于在现有决议的基础上策划一个军事行动。她拒绝以挑衅为据，她认为它会在我们准备好之前给我们造成损失。按我们的时间表打仗更好。9月底，我们在一起就餐，还有布伦特、查尔斯·鲍威尔及他的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在纽约的英国伙伴。撒切尔和我谈到联盟的目标，策划这个战役将需要些什么，以及如何减少伊拉克在该地区的未来威胁。她认为一旦我们有了战争计划我们就可能为策略与日期而焦虑，她仍然担心联合国会后退。"我们冒被修正的风险……"她说，"我不认为我们的行动需要别的理由。"

我告诉她我认为会有一次挑衅，也许是在我们所有军队到位之前的一次恐怖主义活动，我们除了反应以外别无选择——然后我们能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发起巨大的空中打击。由于让制裁生效的政治压力，我还不想指定一个日期执行任何计划好的行动。撒切尔提醒我军事方面的选择只能是短时间的，我们必须在凉爽的月份——10月到5月行动，如果我们等待制裁生效就会拖到下一个10月。她主张我们不应该让自己受到限制。她也承认如果萨达姆向我们挑衅，我们必须作出某些军事的回应。她认为我们不能以不成熟的计划来对之。

这时候吉姆·贝克到了，我请他谈谈如果开战是否需要一个联合国的决议。"除非我们能够显示我们在努力按国际公意行事，否则我们会为我们必须做的事冒失去公众支持的风险，"他提醒道，"我们得区分挑衅与非挑衅。我认为这是（在联合国）行动的时候了，磋商是很重要的。"撒切尔没有被说服，仍坚持如果我们去争取一个决议我们就会引起疑问，以至没有人跟我们一起走。我仍认

为我只能在一次挑衅之后用我们的全部空中力量破坏伊拉克的战略军事设施。但布伦特警告说我们也许最终仍得通过地面部队解放科威特，如果我们实施的空中打击太早，我们的部队还没准备好，就可能有停止空战的压力，舆论就会转向反对地面战役。那就会让萨达姆留在科威特——我们没有了军事选择。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那次谈话以后，英国和美国国家安全与军事小组于10日初作了磋商。切尼会见撒切尔，查尔斯·鲍威尔和我也密切联系着。我给查尔斯送了一些概括战争时间计划问题的材料。假如我们继续造我们的舆论，在12月初之前我们或许都没有军事上进攻的准备。在此之后可选择军事行动的时间已不多。2月下旬这个地区经常出现坏天气，接着就是穆斯林的神圣斋月(3月17日—4月14日)，然后是香客到沙特阿拉伯的圣地去朝觐。斋月能否冲突有着不同的意见，我们不能自作聪明测试阿拉伯人的忍耐力。朝觐之后，气温已热不可耐，以至军事行动除了停止别无选择。所有这些因素使我们注意到时间不能迟于1月或2月。

乔治·布什

10月18日，圣殿山事件的影响在减弱之中，撒切尔和我通过电报交换意见并打电话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她深为关心我们还能维持这个联盟多长时间，她相信我们必须于2月中旬行动。“伊拉克人很清楚在试图避免挑衅，”她在电报中说，“……我的看法是加快速度，一旦我们必需的军队到位就应该动手，宁早勿迟。否则我们就得冒失去阿拉伯政府支持的风险，它们不理解迟缓，会对我们的决心产生怀疑。我们也会面临更多的和平动议，及在占领区更多的事件和反伊拉克同盟关系的进一步紧张。萨达姆·侯赛因会因而逃脱。”

在准备电话会谈时我也给她一份电报。我同意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待制裁生效，但是我相信通过联合国而不是我们自己

行动在政治上更好。我仍然认为对挑衅的反应是我们必要的理由。我告诉她我正在策划怎样才能让我们的使节自由，我认为我们应该宣称我们有权保护我们的外交使节。我概述了一个计划，我们将援引一个即将产生的关于伊拉克赔偿其造成的损失的联合国决议条款，说我们有权给我们的使馆人员供给食物。如果伊拉克拒绝这倒可以是军事行动的一个导火线。

我们肯定有权根据现有决议行动，有一个决议在政治上很有利，它能讲清楚我们行动的权利以及没有它去打仗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我向她保证我将回到联合国，除非预先进行的协商揭示我们能很快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没有不可接受的限制。我又说我们在考虑这个决议需要秘书长从他的立场为萨达姆执行现存的决议确定一个最后期限。将给他 30—45 天时间让伊拉克人退出科威特，如果不，成员国将会给使用武力开一次绿灯。"我看这样的处理有两个优点：只有在萨达姆看到我们是认真的时候外交才可能起作用，"我说，"但如果萨达姆不肯完全出去我们就必须战斗，我想消除人民这样的看法，即我们没有给外交一点机会。"

在我们的电话会谈中，撒切尔继续反对把任何事情交给联合国，也不喜欢跟随我们在科威特的使节行动，因为这样会使太多的人承担风险。仍然有人隐藏在巴格达的使馆，使馆人员本身也需要保护。对我说来，伊拉克人的一个反应，如射下我们用来援救我们外交官的直升飞机，将是引发一场空战的足够挑衅。撒切尔辩驳说伊拉克人的野蛮给了我们在准备好时就可以行动的总的理由。"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理由。我们在那儿的使馆是保护我们的人民的。如果我们关闭使馆，我们不是遗弃了人民吗？我们不需要进一步引发军事行动，如果你搞一个洞他们就可能掉进去——你们是在猎取猎物。"

"我们的使馆必须关闭，"我坚持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人在里面工作。我们正准备空战，我们没有无限制的时间。这就要求

我们行动要有道德根据并一起行动。"撒切尔说她不这样想。"你的观点是尽量按我们所能做的做。"我说是的。"我们不能把他们(人质)都搞进去——特别那些被关在工厂的,等等。我们的人很快会被饿出来。为什么等到这样呢?如果他掉进了洞里,我们就狠狠地揍他。"

后来那天晚上撒切尔又打电报给我。她不支持我们关于对使馆人员有"供应食品权"的决议修改提议。她认为萨达姆·侯赛因会猜出我们在忙什么,这样我们不仅没有突然行动之利,反而给他时间报复其他人质。此外,她不认为我们在准备营救使馆人员。大多数食品与装备还没到,英国军队到下周还在登陆,这使得我们容易受到攻击。

我们还没有确定我们将使用军队的地点或时间。我的心情也许很急躁。我仍然坚信我们需要有一次挑衅,然后我们压倒性的空中力量会粉碎伊拉克的军事威胁,扫除伊拉克的核设施以及化学和生物武器设备。但布伦特的话是对的——我们必须确信我们能够继续得到国际上的政治支持去到地面上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过早开始空战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在我满意地得到我所需要的答案之前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军事的和政治的准备工作要做。

第十五章　把握进程

乔治·布什

上个星期的预算之争以后，国会为了准备 11 月份的大选而于 10 月 28 日休会，这段时间几乎是个假期。在上两周的竞选中，我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说，在募捐者集会上发表讲话。我想尽可能使海湾危机处于国内政治之外，我的策略是强调两党共同支持我们在海湾的努力。我一遍遍重复参议员阿瑟·范登伯格的名言：党争应当止于水门事件。不过偶尔也出现诸如大卫·霍夫曼这样的记者的指责，说我恰好在竞选期间把心思放在萨达姆身上，是为了把人民的注意力从目前的预算之争中转移开。我发现这种观念特别令人恼怒，这意味着我有意用我们儿女性命在海湾玩政治游戏。

我对人质问题的强烈言词使我陷入了困境，而且这些天我常常将萨达姆与希特勒作比较。我强调我们在科威特被包围的大使馆，让人民理解威胁人质就是在威胁国际关系准则，而且国际法也遭到严重的挑战。我使得好多人认为我想用人质问题作为行动的一个前奏。在一个募捐会上我说：我们的大使馆被围人员受饿，“我情愿在大使馆受困”。“但是我该做什么？”我问，“让我们等着瞧。因为我有美国人的那种处理方法。”我愤怒，因为人民太专注于预算的麻烦而似乎忘记了使馆人员的处境是多么糟。但是我并未试图让人民准备军事行动，而只是想提醒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很明显，总统情绪化地卷入了科威特事件的处理中。他是很有诚意的，但是他的某些措词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或者至少激怒了媒体——它开始指责总统把危机转移到反对萨达姆的个人宿怨上——措词不当与激怒媒体产生了同样的结果。这时候鲍勃·盖茨和我正开始准备我们其中一人与他同行时的竞选计划。同行的第一个目的是当海湾或其他地方突然发生危机时能有个人在他旁边。第二个目的是提醒他，有时候过头的措词会使他陷入困境。

国会10月28日的休会产生了一个新麻烦。直到1月3日新国会召开之前，休会期间我们如何与它商议与交涉？国会指派了一个18人组成的特别小组与我们商议。白宫发言人汤姆·福莱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呼吁在国会休会期间出现新进展时——包括军事行动——两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海湾局势。我们在10月30日早晨会了面。

在我们坐下来讨论时，福莱向总统递交了一封由81个民主党成员签名的信[①]。信的内容是对国会在海湾战争事件中的角色“表示关切”。他们要求总统在讨论新进展时，除了领袖以外在他们当中再挑选一些人参加。在信中他们描绘了他们的担忧：

> “近来的报告与简报显示美国的立场已从防御转向进攻，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我们相信结果会是灾难性的——导致大批的人员伤亡，包括10 000—50 000位美国人，这种事情只能被解释为战争。按照美国宪法，只有国会才能宣布战争。
>
> 我们强烈反对任何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我们相信联

① 在10月9日，一封类似的信由33个民主党人签名。

合国通过的禁运必须完全实施，必须追求所有多国参与的、非军事的解决局势的手段。如果，在所有和平的解决冲突的手段都无效后，且总统相信军事行动是万无一失的，那么……他必须想办法让国会去宣布战争……我们坚定地相信，与这个小组的商议绝不能代替在实施任何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之前要寻求国会来宣布战争这样一种宪法义务。我们要求政府在没有慎重考虑或宪法要求的宣战之前不得实施任何攻击性的军事行动。[①]"

总统对小组说我们正接近一个关节点。虽然制裁很严厉，但它们似乎很不奏效。除了削弱与分化同盟以外，巴格达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为在我们作出自己的军事布置的时候，伊拉克已经在科威特境内与靠近科威特的地方调集了几乎双倍的军队，要保证我们的军事选择仍然可靠，我们必须也向海湾调集更多的部队并敦促我们的同盟也这样做。

福莱在国会描述了对我们改变政策的担心。"你们得到特别支持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运用了联合国的制裁与禁运，"他说，"如果在没有非常严重的挑衅行为的情况下对政策作任何改变，对你们的支持都将产生巨大的改变。这个国家与国会没有作好攻击行动的准备。"米切尔同意他的看法。他向贝克询问指控人质受迫害的证据，贝克在一天前的讲话中已经作了说明。他说人质被当作挡箭牌，被强迫睡在满是虫虱的水泥地上，只给一点点食物。米切尔的问题反映了许多人的担忧，怀疑我们能否用这种情况作为挑起行动的借口。贝克叙述了我们从被释放的法国公民以及其他人口中听来的细节。

---

① 我们决定不对信的细节作出反应，在 12 月初，斯考克罗夫特回信说我们会继续与国会协商。

米切尔和威廉·科恩反驳说他们的消息表明人质问题并没有恶化。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么他们与公众就没有被提供准确的消息。科恩坚持人质问题不应成为攻击行为的理由。“你们将葬送掉那些被你们夸大痛苦与不幸的人的性命。”他争辩道。帕特里克·利希也敦促我们应让制裁发挥作用。“耐心比战争要好,”他说,“对于在科威特发动攻击,不存在一致意见。”大卫·奥贝同意他的观点。约翰·沃纳担心战争在那个地区的长期影响,特别是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克莱本·佩尔要求没有国会的同意不能动武,惟一能做的是在联合国的统一行动之下。

“我同意我的同事对公众态度的意见,”勒斯·阿斯平说,“很显然上个月这个国家没有离开好战立场。预算问题使伊拉克问题退到二线,危机没有新变化和变得残暴。公众对政府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缺少信心。”人们关注的是国内问题。如果有挑衅行为,如人质被杀,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对我们目标的支持仍然存在,但是除了萨达姆做了有利于我们的行动的事情,我们必须听令于联合国。

杰克·默撒不同意。“我认为除了动武以外别无选择,”他说,“我们忘记了科威特被占和石油价格在上涨。这种局面持续越长,公众就越反感动武。我认为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已经看到夸大事态的媒体把注意力集中于几个示威者。你将越来越难以作出决定。”

“你不应该根据公众意见来作决定,”鲍勃·卡斯藤劝告说,“要紧的问题是时间是在我们这边还是在萨达姆那边。”总统指出同盟国在时间可能影响事态上尚未达成一致,虽然他同意我们不会在公众意见的基础上作决定,但是取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从入侵到现在还不到 3 个月,”米切尔反驳说,“制裁到位至现在也还不到 2 个月。没有人会希望它们在一周内见效。说制裁已经失败为时太早。”阿斯平指出从技术上讲制裁生效与它们对萨

达姆产生我们所希望的影响之间是有区别的。他可以简单地减小它们的作用。“在你不得不决定禁运在政治上没有生效之前你能走多远呢?”他问,“动武问题将被更早地提出。”军事决定的时间表排在11月1日到12月1日之间。而公众大部分却认为在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该有9个月的时间等待制裁生效。动武的决定比我们考虑到的还要早。

“我想个人祈求你在使这个国家卷入战争之前,”福莱说,“除非出现大的挑衅,否则你们不可能得到公众的支持。”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下午4:00左右,在那次没有结果的会议之后,我们核心小组在局势室开会,讨论如果伊拉克不限期撤出科威特和释放人质,是坚持制裁还是限期动武。

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写在一份为这次会议准备的备忘录上,呈送给总统。

>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基本目标应该是重获动力,与萨达姆争取主动。这需要两套策略:在外交方面,重申伊拉克完全地、无条件地按照联合国安理会660号决议撤军;在军事方面,加速军事准备,以便在外交努力失败时能有一个切实的选择。作为这个方案的一个补充,是给萨达姆下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限期撤出科威特(并且在允许合法政府回国的同时释放所有人质)。最后期限应该是年底,离入侵与制裁生效时间约5个月。

我指出若要这套方案生效,我们必须有这个地区内的同盟国的支持。我想我们应该告诉他们理想的办法是获得一个新的安理会决议,授权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为了同样的目

的，我们就得准备（在联合国之外）集中非正式的多国努力。不管何种方案，我们在11月底左右发布一个最后通牒，从而有时间作军事准备，也有时间来处理为什么我们没有给外交努力以机会的争论。“假如联合国的途径可行，可以利用我们安理会主席国的地位[1]。这样我们也能在伊拉克有时间制造它的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完全毁掉科威特之前，或者在我们不得不面临恶劣的天气、拉马丹节和朝圣之前解决问题”。

我相信确立这样一个大方向比坐等制裁生效更好。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似乎看不到仅仅依靠制裁就能解决问题的希望。与此同时，人质还是人质，科威特还是正在被毁、正在被别人占据。由于在诸如动武、伊拉克完全撤军的必要性、萨巴斯王朝复位、巴勒斯坦争端等问题上的不一致，同盟国正显示出争吵的迹象。

贝克已经安排好一次对我们主要同盟国的探底之行，以决定对打击萨达姆的支持的深度与广度。我建议与他们讨论三个问题：他们是否支持动武，联合国决议授权动武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以色列遭伊拉克攻击后还手了他们将怎么办（这对联盟可能是个考验）？最后，他们是否允许我们的军队从他们的领土上攻击伊拉克，以及是否准备接受可能暂时将他们的部队交给美国部队指挥的军事安排？吉姆之行后，接下来的就是与苏联以及其他安理会成员国协商。

总统召集了中心组会议。“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继续将所有的蛋放在联合国制裁的篮子里，这样做虽会使事态继续延续好

---

[1] 安理会主席国一月轮换一次。1990年11月美国为轮值主席国。

长时间，但可能避免战争的危险与代价；或者我们提前运用军事与外交两方面的办法对萨达姆施压，现在是作决定的时候了，”他说，“我意识到如果我们给萨达姆一个最后期限，那么事实上我们就自己作好了战争的准备。我同样意识到作出这样的威吓并为此作准备后，萨达姆同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如果我们确信萨达姆会妥协，那么的确有必要把事情推到战争的边缘。不管如何，我想让每一位都知道，迫使萨达姆无条件地离开科威特，我的这种承诺仍然是坚定的……”

“问题是，我们怎样打破海湾局势的僵局?”斯考克罗夫特说，“我觉得我们似乎有三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我们可以听任制裁生效并观察会发生些什么。第二，我们准备动武，这将牵涉到如下问题：确定一个最后期限，如何向公众交待，我们是否要征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发展我们的军事策略与战术，选择最好的时间。第三，我们如何对挑衅作出反应或者我们如何制造一个可以允许军事行动的挑衅——例如，我们在科威特的大使馆。其他的问题牵涉到与国会协商，需要我们的同盟做些什么。在与同盟国的联系中，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否愿意与我们一起行动，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挑衅，他们的加入是不是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我们是否拥有合适的指挥与控制，他们是否能派兵……以及我们必须与谁交涉。我们还需要如何处理以色列问题。美国如何处理伊拉克对以色列的攻击，最后，如果萨达姆·侯赛因现在就回头，我们是否(比联合国决议)提出更多的要求?”

总统问的是基本问题：制裁是否生效了？它们能起到预期效果吗？“需要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已经给了制裁发挥作用的机会?”贝克回答说：“我相信在我们能够接受的时间表内制裁不会使萨达姆撤出。”

“从2—5月。”切尼猜想。他勾画了军事计划。“现在我们的防御部队已经就位，”他开始说，“我们现在可以打个空战，我们可

以佯装在西部进攻。但要真正进攻，我们需要大量增援部队——三个师以上的兵力。所以如果你除了对伊拉克的战略设施进行空中打击以外还要我们做其他事情的话，我建议增加兵力。"鲍威尔补充说更多的部队能更好地推进计划。"在1月15日前我们可能还有另外14万部队就位，"他说，"我还打算把能调遣的全派去。我们正在讨论反伊拉克的一场大战。我想派送5—6个特种部队。"

"从8月以来伊拉克大量集结部队，他们搞了好多防御设施，"切尼补充说，"在未来两个半月内他们会做得更多……"

"总统先生，你需要明白如果我们要穿过这些障碍，我们不能采取发兵又休养的轮转政策，"鲍威尔提醒说，"我们处在岔路口上。我们要么轮转，要么集结。"斯考克罗夫特问我们能否对计划作些补充，包括向西部佯攻，在2月1日之前和之后调进我们其余的部队。

"是的，我们可以先打空战，然后再观察，"鲍威尔回答说，"我的观点是如果你这样做，我们就得全力以赴且快干。我们不能把战线拉得太长。"

"一项最后通牒，加上重兵集结，可以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态度，"贝克建议道，"但是我猜想我们不能称其为最后通牒。"

"吉姆必须敦促我们的盟友向你(总统)的计划倾斜。"斯考克罗夫特说。总统问需要作出什么样决定。"增加部队和制定贝克之行的方案。"斯考克罗夫特回答说。

"我希望你向部队说'行动'，但是让我们等沙特答应后再作决定。"贝克向总统说，"星期六(11月3日)我将到达沙特阿拉伯。假设不存在挑衅行为，我们便不能在2月1日之前动武。这需要灵活机动，而且我们要采取行动还得经过国会批准。"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被挑衅或者没有国会的支持将放弃行动?"切尼问，"这些是重要决定，我们放弃的太多。最后，如果我

们在诸如最后通牒上争论不休，我们将放弃更多。那么萨达姆·侯赛因将有能力改善他的防御。在国内支持也会减少，谁能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联合国不授权行动，我们也将在11月份知道此事。”贝克说，“惟一的时间限制是我们能否得到联合国的决议。”

“这是一个要等到2月1日的主要原因。”切尼提醒说。

“你想一个更早的日期，如1月1日？”总统问。

“军队在1月15日之前不能到位。”鲍威尔提醒我们说。贝克建议我们考虑1月中旬行动。“制裁越有机会实施，我们在联合国获得支持的机会就越大。”他说。

“防御必须先行，防御的军队必须先行调集。”总统向切尼与鲍威尔点头说，“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明天向以色列扔炸弹怎么办？”

“我们首先在科威特发动攻击。”斯考克罗夫特回答说。

“如果沙特答应我们将于星期一(11月5日)宣布出兵呢？”贝克问。

“我们将向媒体说我们的军队继续前进，但尚没有作出决定，”布什总统说，“让我们讨论贝克出访问题，重点是部队持续进入，我们正在关注局势。”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那一天作出的决定不是我们可能动武，而是我们继续派兵，为进攻作准备。鲍威尔仅仅需要知道总统是否在部署军队。部队的现有的补给线已经满负荷。如果数量控制在25万人以内，这是我们现在的承诺，那么必须立即通知部队，以使他们能够作出准备。如果鲍威尔作好了准备而总统决定增派军队，就会使补给系统无力负担。总统已经公开声明我们不仅将派遣足够的军队以保护沙特阿拉伯的安全，而且将保持我们的选择不受限制。对于我来说，“保持我们的选择不受限制”，就是如果我们向北进军，我们就应有

足够的军队来做到这一点。萨达姆在科威特的部队至少增加到了20万。

决定装备军队的时间表受现实的军事考虑的制约,而宣布增兵的时间受政治考虑的推动。政治专家希望把宣布推迟到11月6日国会选举以后。我觉得在伊拉克持续增兵的情况下,总统除了保持他的选择不受限制以外,并不必须非要讲什么不可。切尼想立即公布决定。正如他所指出的,轮换需要一支太大的军队,而且那么大部队要静悄悄地移动是不可能的。如果渠道畅通,鲍威尔就等不到选举以后再下命令。他要求军事部署、军队、装备及早行动。我们还未来得及向国会通报,就出现了若干谣言。我们打算在国会选举后的第二天就向它通报的。

我们在11月8日发出了声明,这时贝克正在海外。他听了暴跳如雷,那是在他在莫斯科会晤谢瓦尔德纳泽与戈尔巴乔夫的前一天。他听了新闻。他冲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联络员哈斯说,这在政治上简直是疯了。他气鼓鼓地说这项声明使得好像在他四处游说寻求我们方案的外交支持之前已经作出决定了一样。他的发怒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他本人曾经提议于11月5日发布声明。吉姆向总统打电话并敦促他给国会领袖打电话,同时给选举后返回华盛顿的议员安排一次情况通报会。

总之,这不是一件很顺利的工作,而且这项工作的进行方式强烈地激起了国会中许多人的否定性反应。

乔治·布什

增兵,特别是增兵规模的消息,在国会中引起了新一轮的争吵,也引起了对我的猛烈攻击,说我改变了政策,决定不加商讨地走向战争。主导性的意见仍然是“让制裁发挥作用”。专家与国会议员在早晨的现场采访与专栏中断言我损害了总统的形象。参议员帕特·莫尼罕,他是参议院海湾观察委员会主席,美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也是我的一位朋友,显得特别生气和挑剔,在11月12

日的电视采访中不仅争辩说我们动武必须经过联合国与国会的同意，还说我们既拒绝商量也不想达成一致。他认为科威特人，特别是那些领袖人物，不值得去解救，他这样描述他们："那些科威特人住在塔夫的施拉顿饭店，他们穿着他们的长袍坐在那里喝咖啡却怂恿我们去战斗。"后来我们就这些观点交换了信件，但在我看来他好像从来没有觉得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所作所为要用战争来打击，纵然科威特与其他国家一样有权获得联合国的保护。他称科威特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它的疆界是殖民的官僚们偶然划定的。

日记，11月10日

我电话告诉布伦特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与国会的协商，尽管近两个月来对于有些职员和国会议员来说打电话不过是例行公事。比尔·布龙菲尔德说我们没有充分协商，对此我十分生气，福莱说我们比前面的任何一位总统都协商得多，这使我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得就我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与国会协商，我们以协商为名的电话打得越多，情况就会变得越好。我也向布伦特建议，我们可以为和平再作一次努力。当我们声明出兵以后，阿齐兹声明说我们应该派外交官员（而不是军队）……我正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能有一个挑战——邀请萨达姆·侯赛因派遣他的外长到这里来，甚至可以在白宫举行一次会晤……要告诉他的是没有妥协的余地，我们是极端严肃的，我们最好是被迫诉诸武力……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动武的争论激化了，但是如果说它已经发展到在整个海湾政

策上形成与国会的斗争则是不准确的。争论还是比较狭窄的，在需要抵制伊拉克入侵上存在着普遍的一致。国会本身就通过了若干决议，对入侵进行严厉谴责，并支持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全部政策。但是增兵带来了与对手的在次要方面的争论。是否必须动武或者制裁必须仍然是反对萨达姆的主要武器？而且，如果考虑军事行动，谁——总统还是国会——有权命令？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与党派分歧并不一致（虽然民主党领袖几乎个个反对动武）。

争端起源于一个长期的法制与宪法上的混乱，即总统的外交统治特权与国会的宣战权。这是一种建立在我们体系内的冲突。宪法虽然规定惟有国会有宣战权，但它并不制止总统使用军队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工具。1973 年实施的关于总统否决权的《战权决议》试图以两种方式分清总统与国会的责任。第一，它规定总统“在动用美国军队于敌对力量之前，或者环境清楚表明敌对力量确然存在……必须与国会商议。”第二，它要求总统在 60 天内解决冲突并率兵回国，除非国会特别授权继续行动。每位总统都反对这项决议，说它是违宪的，而国会中的许多人也不满意这项决议，说它无法操作，还有人说它在这 60 天内给予总统无限的权力。虽然我们探索了国会介入的办法，但我们从未认真地思考过求助于《战权决议》。

我们坚信宪法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因为它规定总统有如有必要可以动用军队的权力。如果我们寻求国会的介入，国会也不是我们要诉诸的权威，而仅仅是个支持。在 11 月中旬，在国会选举与我们宣布增兵之后，参议员迪克·路加建议总统召回正在休会的、现在仅是跛脚鸭的国会，特别通过一项支持武力反对伊拉克的决议。他相信这样可以因两党的支持而平息争端。不过它似乎是一厢情愿的，支持者在哪里这个问题远未确定。如果决议不获通过，这不仅将动摇我们的可信性和我们在盟国中的政治领导地位，

还会动摇反入侵的国际努力。

国会中还有另外一个烦恼之源,即挥赶不去的对出兵困境的恐惧——"越战综合症"的余波。在议员中,因为接触到的材料不同,如危险究竟是什么,如何对付萨达姆,或者因为痛恨在任何(几乎所有)场合动武,也的确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异。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原有的党派病以及因新近的预算之争产生的尚未弥合的创伤。危险到底在何处,在让公众理解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有一项批评说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军队要驻进阿拉伯沙漠,为什么反伊入侵必须由美国领导。甚至支持者也对总统说公众的支持可能存在,但是我们必须更清楚地陈述我们的情况。他们争辩说,好多论证都是抽象的。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太关注海湾危机是产生抵制我们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保护沙特阿拉伯,甚至对伊拉克实施海上封锁,理解这些事情相对容易一些。不过,以往的解释,在使批评者确信必须出兵而不是单单让制裁生效方面,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

乔治·布什

我觉得我们的问题部分在于,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远离公众视线,白宫权力顶峰之外的人很少关心科威特正在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障碍是政府机构内部注意力又都集中在我们的目标上。例如,11 月 13 日在百慕大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吉姆·贝克试图解释伊拉克入侵对美国的经济威胁时,说关键是"工作,工作,工作"。记者立即跳起来,问那是不是从我们自己立场上不同的解释。事实上,吉姆只是重复我们已经说过的萨达姆控制世界那么多石油供给的经济后果——一个我自己在 8 月中旬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的观点。这里不存在不一致之处。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想贝克犯了错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听起来就像整个争端单单是个商业争端。记者也这么想,这就是

他们攻击他的原因。他的讲话想要表达的是我们没有可能允许伊拉克扼住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的石油供给，但是他表达的方式——语气愤怒，我想起来了——使整个含义含糊不清。它必须用切身利益来表达，这是个事实，而不应用商业主义来讲，纵然那关系到美国人的就业。

贝克的评论使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某种挫折，我们都没有能力把这件事所包含的危险讲清楚。我们没讲清楚显然不是因为我们表达能力有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使我们讲不清。第一个是含蓄的拒绝，它是由许多反对我们的论证的人暗示出来的，我们要表达的观点是美国国家利益要求我们越来越深地介入。明确拒绝我们的论证是不礼貌的，但是简单地说美国政府没有恰当地处理好它的事情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第二个因素源于第一个。我们想以增进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之名来反驳对我们的抱怨。这又带来这样的指责，每一项原则都有其自己的理由而我们确实没有把我们的行为组织为一个整体。某种意义上说，虽说它是个很小的麻烦，但是却占据我们的心头，而我们对指责的反应却使问题变得更糟。

我们论证的核心是长期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在海湾保持力量均衡，反对无端的国际入侵，保证没有敌对的地区力量能够控制世界这个主要的石油供给地。布什总统惊骇于伊拉克的暴行，把它与希特勒、火山并论，进行道德上的论证。贝克，如上所说，则将这种论证进行扩展，把美国人的就业包括在内。

当危机在1990年秋发展的时候，另外一个目标初步形成了。我们很少用特别的措辞向公众说明它，但是当我们对入侵持续作出反应时，它对我们来说变得重要了。在危机一开始，我们就有意识地将我们的行动评论为向冷战后的世界开路。苏联在谴责入侵方面的合作为这种思考路线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为安理会像它的奠基者们所盼望的那样合作展示了前景。这反过来直接导致了我

们8月份对“世界新秩序”的讨论。从那个观点向前,我们试图以一种能有助于为未来建立一个模式的方式行动。我们的基础是这样一种承诺,在一个尚无法预见的范围内,美国从今以后有义务像在伊拉克危机中那样领导世界共同体,并且,在一个我们的朋友与国际共同体的构架内,我们尽可能追求我们的国家利益。不过这个目标在我们向公众说明我们在海湾危机中的态度时,很明显是第二位的。

11月14日,我们再次与两党领袖开会,试图平息关于增兵的争吵,并提醒他们危险在哪儿。布什总统对他们说,增兵的决定并不是战争的决定。“我们尚未采取断然手段,或者说事情并不是毫无挽回的可能……”他知道他们中许多人相信我们必须继续给予充分的时间让制裁发挥效用。我们的确如此,但是等待意味着经济与军事上的代价。萨达姆在增加装备与修筑工事,尽一切可能改善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句话,在我们等待制裁生效的时候,他却没闲着,”他说,“当然,现在还不可能作出结论说制裁将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发挥作用……”

他将尽一切可能与国会协商。“协商是一个双车道,”他补充说,“关于我们面临的抉择,我觉得惟一公正的做法是我私下听取你们这些方面的意见,让你们知道在士兵被派出去之前我们面临的艰难选择并采取公众的立场。作为总统我有权知道你们的劝告。不是我们不能做什么的劝告,而是我们能做什么的劝告。”自从增兵的声明后,公众的意见使萨达姆得出结论说我们是分裂的,缺少稳固的力量。“这反过来只会使我们所有人都期望的和平解决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我知道公众辩论是必需的,但是我要求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言行的影响力。”他读了一些剪报,“在这时候,它发送的是错误的信号。”

福莱说总统决定增派部队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普遍

认为我们现在拥有足够多的军队进行攻击,但是对于动用这些军队尚无共识,"他说,"……如果你作为总统单方面作出决定,就会产生严重的关切。"他要求联合国作出关于此事的决议并要求将其送交国会。"我有耐心——即使要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美国人民支持现在的进程并相信联盟不会改变。"

米切尔争论道,就在两周前总统还说过必须让制裁发挥效力。他要求有关制裁的影响与前景的报告。他同意福利的观点,总统必须从国会那里获得进一步的授权,但是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切尼向他描述了制裁的效果:"我相信我们已经成功实施了石油禁运,除了约旦那儿有一点点缺口以外。在约旦与伊朗有一点点食品偷运。存在许多暗地里破坏制裁的尝试,"他说,"有些可能成功。实施制裁是任何人都能料到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没有忽视这个事实。

"我们需要坦率地谈谈耐心,我们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让制裁生效。"鲍勃·米切尔说。从我们的同盟国回来的贝克提醒道,时间并不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不能支撑这个同盟一年或一年半以上。"迪克·格普哈特反对说,如果我们出兵,光是取道将使我们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他宁愿再等上18个月或更长。"我建议你尽力保持联盟的团结。我建议你运用联合国的力量。"他说。如果动武,他要求国会的同意。

鲍勃·多尔关心的是国会如何进行协商。"我们怎样既公开辩论又不向萨达姆传出错误的信息?"他问。"如果我们要求国会参与,那么我们就有负我们的军人,总统要维护政策。"

"三件事导致关注,"勒斯·阿斯平说,"已经声明过正在部署中的增兵数目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还有,你声明没有轮换政策。如果我们进攻性地使用军队,不能保证国会不会否决。你的选择越来越少。声明告诉我们说'明年春天可能有一场战争'。它产生了一种气氛,暗示着就要作出某种决定了。当作出一个决定时,我

们需要一个协商程序。”

“部队的调集和不轮换是关键性的，”萨姆·纳恩同意，“它减少了我们的灵活性与我们的选择。我认为你调集地面部队吓不倒萨达姆·侯赛因。空军是个办法。我非常担心40万军队的给养问题以及如果出现其他危机我们如何对付。”

“公众情感正在激烈地反对你的政策，”克莱本·佩尔坚持说，杰西·赫尔姆斯反驳说支持的任何削弱都是人为安排的——总统一直进行着商议。

“我支持你在此做的一切，”大卫·波伦说，“我建议你回到军队轮换上来，现在就讨论轮换的期限。它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分裂，对总统权力的进一步限制，但是不会变得更坏。”他争辩说如果动武，则必须对萨达姆的核装备、生物与化学装备进行空袭。

“国会假定是领袖，”亨利·海德说，“我们还必须把这个消息带给人民。”他认为联合国的决议可能有助于国会通过一项批准决议。

杰克·默撒提醒他的同事说我们手上必须有可靠的军队。“我不认为需要一年时间，”他说，“我们的决定需要建立在天气和机会上。你无法那么长时间左右国会、美国人民和联盟。萨达姆·侯赛因可以被推翻……如果我们等待时间太长，他就会拥有核装置。”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这次会议使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要反对的是什么。在领袖人物中有几个坚定的人物，如多尔、默撒、海德和沃纳，但是，总的来说，尚没有军队行动的借口。对我们增兵的讥诮仍然出现了。从会上的评论来判断，我觉得平衡并不比30%支持动武更好，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前景不是很好。海德提到联合国的决议可能对我们的情况有所帮助。但它仍然是可疑的，纵然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改变形势。退一步讲，去请求国会通过一项支持决议来反对让

步是一种胆怯。如果我们失败，将处于非同一般的困难境地。一项否决会瓦解联盟，助长萨达姆·侯赛因；如果我们无视否决，还会在国内产生暴风雨。还有，如果我们寻求联合国的同意，肯定会把我们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可能不诉诸国会。我们有了一系列可厌的选择。

贝克11月上旬寻求联合国支持而做的外交斡旋，在我们的同盟中已经奏效，这是最鼓舞人的事情。巴林的埃米尔·卡利发和科威特的埃米尔一样对他给予支持。法赫德亲王建议迅速行动并再次保证如果伊拉克与以色列交火时沙特阿拉伯将保持沉默。霍斯尼·穆巴拉克同样是积极的，但是不能肯定他会进一步派遣他的军队。他担心向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开火在国内会有的反应，当我们要求美国飞机从埃及起飞时他犹豫了。

在安卡拉，特加特·奥扎尔仍然希望制裁生效，但是他希望联合国有进一步的决议并同意考虑派一个装备旅到沙特阿拉伯。和穆巴拉克一样，当我们要求美国空军从土耳其基地起飞时，他犹豫了。飞机停在那里可以，但从那里起飞他觉得不妥。用土耳其空军基地的问题和从他们的领空攻打伊拉克一样，在以后几个月中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

贝克把他的莫斯科之行说成是“非同寻常的”。谢瓦尔德纳泽接近美国的立场，认为11月必须通过一项决议，并在以后六周内生效。他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并使他坚定地和我们的一般路线保持一致。他甚至在贝克之前到戈尔巴乔夫的乡间别墅去游说。“戈尔巴乔夫已经接近了，但还没完全到位。”贝克打电报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似乎依某些假定而行事：首先，美国与苏联在海湾问题上必须协调一致；第二，萨达姆必须被挫败。他们强调萨达姆的入侵必须被反击。对新的和平时代的任何新希望必须依赖于这个事实，依赖于反击萨达姆的胜利——不管胜利多么小。

不过，两者都感觉到制裁尚在起作用，打出我们最后一张外交牌——一张一旦失败我们除了动武以外别无选择的牌——还为时过早。不过，在讨论采取更多的步骤对萨达姆施加压力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依然对联合国是否会作出特别决议授权动武表示怀疑，而且认为现在动武为时过早。苏联想检验所有的办法是否可行，并且计划在 11 月 19 日召开的巴黎欧安会会议前与我们再行商讨，布什总统曾答应参加会议，我们要签署削减常规核武器文件。贝克相信他们最终会同意。

乔治·布什

在一封信中戈尔巴乔夫建议我们使用两个决议而不是一个。第一个决议警告萨达姆如果他不限期撤军则有第二个授权运用所有必要手段完全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决议。在我的回信中，我同意我们必须显示我们已经充分探索了非军事办法，我们已经给予制裁以充分的时间来发挥作用，但是我觉得只要一个决议就够了，这个决议正是我们正在谋求的。虽然它可能在 11 月份获通过，但只能在明年 1 月份实施，使制裁能有 5 个月时间发挥作用。我们还准备了 10 个决议，这些都是萨达姆拒绝的。

我觉得规定最后期限的单一决议有可能触动萨达姆。“我坚定地相信，达到我们的目标的惟一方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使萨达姆确信军事行动是必然的。”我还指出因为美国只在 11 月份成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所以我们冒险将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而不是第二个决议拿出来表决。在程序上我们可能被后继的轮值国——也门、扎伊尔、津巴布韦——束缚。更进一步，萨达姆可能简单地部分撤退并试图操纵国际舆论说我们不想搞第二个决议——或者可能试图使过程拉得很长以使联盟解体。

即将来临的巴黎欧安会可以给我们一次向戈尔巴乔夫推销我们的提议，以及在关键时刻会见我们的西欧盟国的机会。捷克斯

洛伐克敦促我们去布拉格。1989年我没有访问过他们，但是现在他们是同盟国了。我也想在新统一的德国停一下。我觉得德国人在支持同盟时有点“摇摆”。虽然他们保证提供钱，但是科尔在国内正因德国海外驻军问题被卷入很深的政治争吵，对于我们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是，他支持我们动武。巴黎以后，我可能飞往中东，与我们的部队共度感恩节并与我们的阿拉伯盟国会谈。我11月16日从华盛顿飞往欧洲。

捷克斯洛伐克之行是个历史性的和感人的访问——这是美国总统的第一次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是我自从一年前维拉维革命以后一直想去访问的地方。11月17日早晨我与哈费尔总统来到布拉格非常壮观的赫拉代坎尼城堡。我对哈费尔很尊敬，这个人一年前还在牢里，他饱受迫害但绝不放弃。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近乎害羞，完全谦逊与直率。当我站在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旁边和布拉格联邦大会上时，感到同样的谦逊。我想起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杜布切克的作用，以及以后的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要求自由行动的残酷镇压。

正像对其他东欧国家有影响一样，禁运对捷克斯洛伐克也有影响，他们的石油供给受到了限制。这个国家以往受到与苏联贸易的限制，苏联在特许价上是它主要的石油供给者。当苏联经济不景气时，这个供应源也就萎缩了。哈费尔担心世界石油的高价格会反过来损害他们脆弱的经济。他也担心在下一年度当这个国家实行市场价格时的社会稳定问题。我对他说我将尽力使他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得到援助。

我在许多场合讲了若干次，我相信捷克斯洛伐克人比任何人都更知道科威特现在所遭受的痛苦。现在，在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哈费尔是直截了当的，当一个记者问他是否支持我在海湾的政策时，他回答说：“捷克斯洛伐克在许多场合解释过，抵制邪恶是必要的，抵制入侵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历史在绥靖的后果方

面给了我们很多教训。"另外一名记者问他是否考虑过海湾地区拥有东欧正在枯竭的许多资源时，哈费尔简洁地回答说："我的观点是全世界用于抵制入侵的资源将反过来造福于全人类。"他讲出了实质——这个勇敢的人讲的是自由的代价。

下午，我在文萨雷斯广场就维拉维革命一周年作纪念演讲。当时人山人海——我们听说大约有 75 万人到场。遗憾的是哈费尔和我只能待在保安人员所指定的树脂玻璃屋里。我们听不到群众对我们的讲话的反应，但是纵然如此，场面也难以忘怀。然后，芭芭拉和我满怀激情地向群众挥手致意。我们登上另一个平台顶上，与大家一起唱"我们将克服"。那天我在布拉格人的脸上看到了丰富、健康的表情，这提醒我们要永记民主来之不易。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是热情的人民，许多人手里拿着美国国旗，表示他们对美国的尊敬与爱。

在科尔的莱茵省老家，科尔带我们去参观他称之为德国之魂的斯皮尔教堂，在那里埋着许多已故的德国领导人的遗骨。他在路德维希芬讲究、舒适的家中接待了芭芭拉、布伦特与我。他用香肠、泡菜和美妙的葡萄酒招待我们。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他打算派自己的一个特使去见萨达姆·侯赛因，强调我们的立场是多么严肃。虽然科尔向我保证德国将坚定地站在同盟的一边，但是他也曾经向记者说过我们应该仔细地估量动武的伤亡，以及对付要求和平谈判的压力。这是个使人困惑的矛盾，但是我不把它视为对我们准备做的事情的反对，而把它视为对萨达姆的警告。不过纵然如此，他的消息是含糊的，而且对于联盟具有潜在的伤害。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觉得，科尔是无意识地帮了倒忙，而且他派特使去见萨达姆的建议使我感到很困惑。似乎明显的是他想因为德国大选的事而阻止海湾战争。这些——对于统一的德国是第一次——在 12 月

3日有了转机。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反对党领袖威利·布兰特去了巴格达并带回了120名德国人质,使科尔感到非常窘迫。我的结论是他试图从中恢复过来,在大选中避免挑起反战情绪。

乔治·布什

那天晚上我从莱姆斯坦飞往巴黎,在那里我和弗朗西斯·密特朗共进晚餐——在我们到达美国大使馆以后正好一小时。我急于想见他,也急于第二天见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再晚一些见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麻烦变得严重,而撒切尔也面临着政治斗争,她的保守党领袖地位遇到了挑战。撒切尔计划在她的党进行决定性表决的那一天到巴黎。这个时间我觉得奇怪,但是我希望她的出席能对她在保守党的地位有所帮助。

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萨达姆声明如果伊拉克不受到攻击,他将从圣诞节那天开始花三个月释放外国人质。在整个一个月的拉马丹节中或者在天气坏的季节中进行军事行动都是不明智的。我不仅看不到萨达姆的声明中有任何灵活性的标志,而只看到对于人质家庭的玩世不恭的操纵,以及一种把公众舆论从使用武力移开的努力。我相信世界共同体的反应应该与我一样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此作了反击。

在爱丽舍宫密特朗和我讨论了军事行动以及为动武设立最后期限的问题。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动用了联合国这个保护伞,进一步的策略是让萨达姆知道不可能有另外的出路。"这样一种决议是很难起草的,"他说,"但是如果它被很好地设计的话我们将参与并投赞成票。"

第二天,玛格丽特·撒切尔到美国大使馆官邸看我。当我们等人来喊我们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开始交谈。似乎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叫一个服务员去问我们应该到哪儿去吃饭。几分钟以后,他不好意思地回来了:很明显没有人告诉大使馆的内勤今天要有早餐会,因此也就没准备食物。我们大笑一场,让他们大家一块去

看看厨房有什么吃的。我们拿着面包与咖啡继续交谈。

撒切尔先告诉我她的保守党领袖竞争然后转到海湾问题上来。“你要更多的军队,”她说,“我们可以再派一个旅和一个扫雷艇。”我们讨论了日程,我告诉她我准备向军队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她担心这有可能意味着把军事行动时间推得很迟。我们讨论了人质问题和我们被包围的大使馆——我们的大使馆是最后两个被包围的。供给越来越少,而且保护仍然处于躲藏状态的英国与美国人越来越困难。撒切尔提醒我伊拉克命令科威特人在 12 月 25 日到占领当局去登记。“在那以后再隐藏我们的人就更困难了。”她说。我告诉她如果我们按照 10 月份她提出的不要联合国决议而径直采取军事行动,我担心这样做的政治环境。一项挑衅可以有所帮助——我仍然在考虑一个补充性的任务。撒切尔争辩说对于动武人质问题是个足够的理由。“他做了件很坏的事情,”她说,不过她现在也愿意支持一项决议。“联合国的决议会给你所需的一切。”这对市民也是一个提醒。

欧安会有两天大会发言——共 35 个发言,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被战争的阴霾笼罩着。正是那些在过去饱受入侵之苦的国家才最知道局势之坏。捷克斯洛伐克的哈费尔、波兰的梅左维基、匈牙利的安托尔讲了抵制萨达姆的必要性——他们三个人都进过监狱,三个人都对外国入侵有亲身体验。别的人只会袖手旁观,就像我们国会的议员那样,只想告诉我们不能做,我们必须不做什么。此外,他们还对美国站出来领导感到庆幸。不幸的是,他们这些评论登在媒体上,就好像是反对我们正在从事的事情似的,虽然他们在他们彼此之间以及向我表达的真意并非如此。我们一直担心有可能通过关于波斯湾局势的有害的决议,但是所幸的是这事没有发生。

在会议进行中,伊拉克作出了一个破坏联盟的新举动,声明说他们将立即释放德国的人质。他们说,这是“鼓励欧洲人民采取更

独立的行动以反对美国的骄横地位的一个信息"。萨达姆对他的议会说这是因为科尔作了一个"有益的"声明。科尔觉得难堪,对这种情况表示道歉,并向我保证他并没有让步或者与萨达姆就人质释放问题进行过谈判。我跟他说我理解,但是我知道媒体幸灾乐祸的时候又到了,他们会说我们只有对伊拉克采取更"温和"的姿态,我们的人质才会获释。这件小事使我感到不安,特别因为紧接着科尔建议那天的,是他自己直接与巴格达有了联系。他好像忘记了自己的承诺,不仅为了他的人质,也不再承认我们会动武。我希望这仅仅是大选前的慌张。

在11月19日非正式宴会之前,戈尔巴乔夫和我在我们的大使馆小酌。我们谈了苏联的局势,我问他对叶利钦的看法。"口头上说支持稳定,不捣乱。"他恼火地说。人民憎恨分裂。"他们问:什么东西阻止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合作?回答是什么也没有。客观地说需要合作,人民这样想,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拉倒——为什么他这么有名?因为他在反对每一件事情时人民都会说'做得对'。他最喜欢说的事情是什么东西都太坏,谴责中央——他将被利用,然后被抛弃,除非他借助现存的紧张来挑唆人民。他会这样做的。我将团结所有有能力的人——包括叶利钦。"

我转向海湾问题。"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说,"我们需要得到联合国的动武授权以使萨达姆确信到底需要做什么。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使他这样——我希望你知道我的感受是多么强烈。如果我们一起做这件事,那么将会转达一个正确的信号。"我不希望现在就有个答案。"我不想让你在你的同事之中受到攻击。如果你不能与我们一道我也仍然保持合作,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的感受是多么强烈。"

戈尔巴乔夫说他对这事也想过好久。"让我们说这事主要取决于你我两人,"他说,"当然,在有些事情上,我们观念不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合作。在我心中,我肯定你也一样,最好的

结果是没有流血而把这事情解决。这有可能比越南战争更坏，更坏——考虑了好长时间以后，我决定我们需要一个决议，一个能够包括你我想法的决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包括一个最后期限的最后通牒。第二部分也许说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当你仍然是安理会主席的时候这个决议肯定能被通过。"我问他心中的最后通牒的时间界线在哪。他觉得在 1 月中旬。

戈尔巴乔夫不想搞个声明有他自己的理由。苏联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他想尽力追求和平进程和避免使用武力的公开威胁。他也想与伊拉克再谈一次。但是他也意识到决议对于我是关键性的。那天晚上一直工作到很晚，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在推敲起草决议的语言。他们也把我们讨论的不合适放进决议中的一般说法整理出来。我同意拖延我们对决议的声明也使我很头痛——特别是因为这会让媒体把我们的会谈贴上"寒冷"的标签，虽然事实绝非如此。当媒体得到会谈——他们并没有参加的会谈，双方都感到很有诚意的会谈——是"寒冷"的时候，他们就停在"寒冷"中并开始想像寒冷的意思是什么。

大约有 20 个人参加宴会，我们开玩笑、讲掌故。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发出大笑，也参加进来讲了一些关于斯大林的故事。这是个轻松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后来，戈尔巴乔夫和我都认为这是一次我们从未有过的最好的会谈，包括戴维营会谈。

第二天仍有 15 人要发言。出于对我的政府首脑同行的礼貌，我试图坐在桌边并保持倾听状态，我记下竞争国际斯考克罗夫特奖候选人的许多资料。存在许多严重的挑战——所有代表显得没有精神。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和我比任何人待得都长。有一个时间他急忙让他的翻译汇报说他刚刚接到普里马科夫的电话，说萨达姆·侯赛因同意把从科威特撤军作为解决海湾问题的交换条件。当被提醒撤军将是无条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显得失望，但是对我

们能够劝萨达姆和平地撤出科威特表示乐观。

那天下午我会见奥扎尔，我现在感到对他比较接近。他似乎准备动武，并且对此很有信心：如果战争开始，那将是个很短的战争，我们的空军就可以把事情摆平。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接到了霍斯尼·穆巴拉克的电话，他敦促我返回中东时去看望叙利亚总统哈菲斯·阿萨德。穆巴拉克说不是一个人——所有阿拉伯盟国领导人都希望我与阿萨德会见。我问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建议也许是塞浦路斯。奥扎尔的外长对此存有疑问，所以我们决定把它放在日内瓦或土耳其什么地方，我们把球踢给穆巴拉克，让他决定在哪儿与阿萨德见面。

那天晚上，撒切尔保守党领袖竞选失败。她坚持了全天的会议，虽然她看起来神经质并且显得心里有事。她出出进进核实英国的进展情况。我于那天晚上 5 点左右离开她，问她是否有什么话想讲。她说两小时前她才听说结果。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到很悲伤与突然。尽管如此，她出席了凡尔赛宫的宴会，从头至尾。她的冷静令人吃惊——这么快就镇静下来，这样的人我从未见过。虽然我们没有像罗纳德·里根时代那样接近，但是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并且在我在位期间一直稳定发展。我一直尊敬与景仰撒切尔，现在仍然如此。她是个充满自信与勇敢的女性。她是我们所培育的民主革命的旗手，美国和我自己的好朋友。她对原则的忠诚，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那种开放、直接的风格令我钦佩。这集中体现了撒切尔的勇气与决心：同盟将获胜。几天以后，她在 12 月 22 日给我的"告别"信中，加进一个字条，证实英国将派遣更多的军队与战舰。

我离开巴黎前往沙特阿拉伯，在那里我邀请四个国会领袖——参议员乔治·米切尔和鲍勃·多尔，发言人汤姆·福莱以及众议员鲍勃·迈克尔同行。那天晚上我们到达杰达时非常隆重，停机坪上铺着漂亮的地毯，国王亲自出席皇家欢迎仪式。我们驶向一

个指定的、非常豪华的贵宾休闲室，那里充满着奇妙的熏香的气味。然后，我们在爱哈迈拉饭店会见了科威特的埃米尔。他担心人质会影响我们动武，我向他保证不会。我问他现在我们在沙特有那么多军队，萨达姆会不会撤军。他表示悲观。他告诉我科威特正在遭受的野蛮行径，我建议他多说说这种悲惨局势。

芭芭拉和我下榻在另一个有美丽的大理石装点的国王饭店。它被很有情趣地到处装点着蜡烛，为了抵挡沙漠的酷热，空调打得很低，都有点冷。国王以晚间国宴欢迎我们——晚上10点——我听说对于他已经提早了一小时。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宴会。描述食物之丰盛的惟一办法是，如果说桌子被菜肴压得能吱吱直叫的话，就是这一次。我从来没看到这么多菜，以及那么多种类——虽然这样一顿饭通常要吃上3小时或者更长时间，这次只吃了1小时不到。饭后，法赫德和我，以及布伦特、吉姆、约翰·苏努努还有其他人隔桌会谈了两小时，国王想起了入侵时的情景，他对萨达姆的欺骗表示愤怒，因为萨达姆事先向他保证不入侵的。我问萨达姆在拉马丹斋月释放人质的策略，他告诉我萨达姆搞错了：拉马丹节曾经爆发过战争。的确，圣战就是发生在拉马丹节。我向沙特人提醒阿拉伯世界的声明。阿萨德说他的军队不会从沙特阿拉伯境内撤走，穆巴拉克说他不想把军队派往伊拉克。这就好像阿拉伯伙伴们只想让美国单独对付萨达姆·侯赛因一样。这对于我们的军队、美国都是个可怕的信息，而且会使我们与国会很难协调。当我们分手的时候已经近早晨两点了。我又一次被国王感动，坚信不管伊拉克做些什么，他都作为朋友和同盟与我们站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12月22日，我们飞往达兰欢度感恩节。没有办法确切描述我们在沙漠中的经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迎接我们，他是我们几天的向导。我们的访问从达兰的美国空运指挥基地开始，在那里芭芭拉和我费力地在充满热情的年轻空军职员

人群中行走，尽可能地多说话。我们挥手，与他们拥抱，与他们照相。我们从那里出发驶向沙漠看望军队。我们穿过一程又一程的空旷的沙漠，偶尔会看到一群群骆驼和贝多因人的帐篷。我奇怪一个人怎么会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竭力生存。在另一次讲话、另一次穿越人群以后，我们赶到了在伪装网下的长桌子上的感恩节宴会。我们很兴奋地与这些勇敢的士兵一起吃饭，他们为在这前线的同盟部队运送物品。

我们上了正开向公海的美国"纳桑号"航空母舰。在船尾上，我们参加了一次圣餐仪式。船上挤满了海员，我们又一次试图说得很多，告诉他们我以及我们的国家是多么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从"纳桑号"我们飞往海军的沙漠阵地，那里有海军"海蜂号"以及从著名的沙漠之鼠来的英国军队。我不能肯定我能不能挺得住，虽然我没有哽咽地做过若干次简短的即席讲话，我的情绪在军队航运基地以及"纳桑号"的仪式上被调动起来了。军团士兵与水手都很年轻，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必须战斗，上帝会保佑他们。"

施瓦茨科普夫是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在沙漠的劳顿中仍然透露出美国人的力量与自信，他简短地向我汇报了作战计划。从他的介绍中，以及我回到华盛顿后听到的消息中，军队对此似乎很有信心：战争将是很短的战争，根本不像有些国会议员所说的那样。诺曼对于我将供给军队所需的一切向我表示感谢。这次旅行中，我坚信我们能够早日将萨达姆赶出，他（施瓦茨科普夫）肯定觉得我们会。阿拉伯人分享了这种自信——法赫德亲王、穆巴拉克，以及所有我们近两周与之交谈的人。他们都相信萨达姆很快就会变成"炮灰"。穆巴拉克预言我们只要几天时间。不过，虽然我们的阿拉伯同盟确信一旦开火伊拉克军队马上就会溃败，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打算，诺曼不能这样打算。

第二天在开罗，我会晤了穆巴拉克。和往常一样，穆巴拉克是坦率与友好的。我们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都有争执。我指出阿萨

德说叙利亚军队将不会从沙特阿拉伯挪动一步，穆巴拉克告诉我叙利亚会这样的。我也问他埃及的军队会不会进入伊拉克。他说他会做一切必需之事。

那天下午，我们飞往日内瓦会晤阿萨德。我发现他还是介入的，但是谈话很艰难。在一个很长的讲话中，他说以色列是中东的罪恶之源，包括两伊战争甚至入侵科威特。他坚决反对埃以和谈进程，争辩说从那事以后中东的一切都崩溃了。这是令人沮丧的，我们争吵不休。当我提到恐怖主义与人权问题时，他发怒了。我向他指出当盟国军队开进科威特时，他最好不要说他的军队留在沙特阿拉伯。他显得很不自在。我解释说穆巴拉克作了类似的声明并对此作了澄清。他似乎表示了兴趣，我劝他自己去与穆巴拉克谈。虽然会谈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富有成果，它基本上显示为了和平，我们可以在中东作更多的努力。

当我们飞回家时，我总觉得我们不能发现一种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法。我们已经给制裁很多时间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萨达姆会离开科威特。我想看看他对联合国的决议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当我们访问我们的军队与盟友时，贝克在总统到达利雅德后不久，为了寻求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包括亲伊拉克的也门、哥伦比亚(它的驻联合国大使公开反对美国政策)——的支持又进行了有效的穿梭外交。与马来西亚外长在洛杉矶会面。在巴黎欧洲安全会议之前，他与中国外长钱其琛进行了会谈，12 月 6 日时他们两人都在开罗。贝克还获得了安理会其他暂时成员国的支持，如埃塞俄比亚、扎伊尔、罗马尼亚。象牙海岸说他们有可能支持我们，但与苏联一样，还没准备公开这么说。因此，在贝克开始这最后一次冲击时，在安理会中我们已经有了 9 张赞成票。

也门总统萨利赫反对决议并且在与贝克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

上也这样说，这并不奇怪。哥伦比亚在推托，说应该用一种鼓励萨达姆撤军的妥协来换取一种让他挽回脸面的让步。在布什总统的干预电话以后，凯撒·加维里亚特鲁及罗总统打电话给贝克，说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种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方式。贝克与马来西亚外长阿布·哈桑的会谈是艰难的。哈桑对贝克让他大老远赶到洛杉矶感到恼火，但是吉姆对访问亚洲很勉强，他担心激怒中国，因为不可能在中国停留。哈桑争辩说虽然他不反对惩罚萨达姆，但是以色列因为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所作所为也应该受到惩罚。马来西亚希望给制裁更多的时间，而且不希望那种用武力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的决议。哈桑仅仅答应去研究这个决议。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这种小心的外交努力中，前总统卡特写信给许多安理会成员国，要求他们不要支持决议。他说在人的生命、经济后果、更不用说中东的稳定方面的代价太大太没有必要了，“除非所有和平解决方案全部无效”。他要求联合国显示出与伊拉克领导进行谈判的“诚意”，去考虑他们的关切，要求阿拉伯人去寻找一个和平的方法，“而不要对他们的议程施加任何影响”。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件，要求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投票反对自己的国家。如果不是一个收信人给了我们一个复印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卡特后来承认他写了信，但是声称告诉过布什总统他在干什么。他的确送给总统一个相似的东西，但是并没有提到他同样给总统的外国同事也送去了。我觉得如果有谁违反禁止私人干涉外交的劳根法案的话，卡特就是一个。布什总统对于这种干涉他的外交政策并明确进行破坏的行为非常恼怒，但是告诉我还是不要理睬它为好。

投票前一天贝克在纽约作了最后一轮游说。在那里他遇到了

谢瓦尔德纳泽并修改了决议的措词，决议一开始把1月1日定为最后期限，戈尔巴乔夫希望把最后期限向后推至1月31日至2月以后。密特朗建议我们消除分歧，定在1月15日。把这一天作为可以动武的日期，我们同意。

我们仍然不确定中国会投什么票，并且作了最后的外交努力。我们不想逼它太紧以至激怒它投反对票，但是我们的确想劝他们支持我们。11月29日，贝克主持安理会对678号决议进行表决。它获得通过——12票赞成，古巴与也门反对，中国投弃权票。决议授权"所有成员国与科威特政府合作，除非伊拉克在或于1991年1月15日之前完全履行决议，运用所有必要的手段维持和履行（这些决议的所有条款），恢复国际和平与这个地区的安全"。最后期限——从此以后6个星期——被确立。

乔治·布什

通过以明确的语言宣布授权用武力履行早期的决议，并设定了一个最后期限，联合国的表决获得了巨大的突破。我很高兴。我也知道前面还有其他潜在的障碍，但是在整个班子——特别是贝克和汤姆·皮克林——非常有效的外交努力之后，能通过决议，我觉得巨大的担子落到了我的肩上。它使诸如同盟的保持问题变得容易了，也解决了在行动之前需要挑衅的争论。虽然我们那时尚未认识到，它也改变了与国会的辩论，创造了一种把武力用到国外的背景。安理会支持战争。

第十六章　闯过不谐音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从危机一开始，我们就寻求联合国的支持，在国际上达成共识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组成部分，这倒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联合国的命令才能行动。联合国可以提供另一种政治掩护，我们从未想过没有它的祝福我们就不能或不会干涉。美国(和全世界)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科威特已经求助。反过来，我们相信不需要联合国宪章第50条款以外的权威来强化一次在政治上需要的封锁。我们需要一个决议以平息怀疑并保持苏联在同一条船上。不过，这样做的时候，当需要用武力完成初始的决议的时候，我们期望再一次得到授权。通过表决支持制裁，通过详细解释我们何以动武、何时动武，11月决议是一个巩固国际团结和增强美国国内支持的政治对策。应该使萨达姆——或者任何人——对这点不抱任何怀疑，即同盟有决心、有手段走向战争。但是通过细致谈判而产生的联合国否决权也要求关注这个事实，即向联合国要求授权以后，我们同样要向国会要求授权。我们又一次面临对总统使用武力的固有权力进行估价的事实，国会出于明显的政治利益是反对这项权力的。

从11月底到1月，与国会的争吵激烈了。争吵的内容并不是海湾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而是国内政治问题与宪法争端。因为有联合国决议在支持我们，现在的突出的争议是谁有权命令军队。争吵的中心，在国会新闻记者摄影机的强光与媒体眼中，是

此事如何发展必须与国会协商。我们是否必须返回国会开一个特别会议讨论此事。

11月底，参议员萨姆·纳恩就我们的政策召开电视听证会，讨论了制裁与我们的军事准备等情况。作为三军联席会议主席和华盛顿一位令人尊敬的发言人，他不仅仅是个参议员，他对国家安全事务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与权威。因为他的地位，他的那种我们必须恪守制裁——如果必要可以持续两年——的立场，吸引了许多民主党人的支持。当与会者与旁观者把记者招待会作为诉说他们的恐惧的论坛或作为他们街头演说的场所时，发言迅速变成了一场政治责难。

纳恩召集了许多退休的参议员与退休的政府官员来听证，包括亨利·基辛格、海军上将威廉·克罗、大卫·琼斯上将、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前海军参谋詹姆斯·韦伯、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威廉·澳德姆。克罗的出现，加上他是现任，可能是最令人沮丧的。除了基辛格以外，所有人都明确反对动武。他们的争辩多种多样，如我们的军队尚未作好战斗准备，损失将很惨，上万人死亡，我们的目标不明确，制裁必须生效，等等。施莱辛格坚持说战争对地区与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是长久的，而且当我们在沙特阿拉伯集结军队时，公众的支持已经变小了。琼斯担心增派军队会迫使政策改变，导致我们如1914年在欧洲那样仓促参战，而且军队规模太大，难以轮换。韦伯说如果我们想作进攻性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应该使军队先回到原位，然后要求国会宣战。澳德姆说制裁不久便会生效，我们应该等待。他认为打仗是错误的，会招致损失，而且不得不留在伊拉克几年(他相信为了防止地区崩溃是必需的)，而不是固守沙特阿拉伯。

基辛格的发言与其他人完全相反。他争辩说纵然制裁生效，也要好长时间，而到那时若发现不成功，军事行动已为时过晚。制裁也很难维持，放松、抓紧或撤兵都有压力。所以只要有可能，只

要有必要，制裁与军事行动不得不同时进行。但是他预言可能会到达这一时刻，我们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沙特阿拉伯的驻军规模、军事与政治努力都必须继续，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因此，我们无法使足够多的军队处于备战状态，我们可能不得不在撤军的后果与军事行动的后果间作出选择。

有一些谨慎的，特别是那些有关军队尚未准备好以及在动手之前必须先培养公众支持的议论，似乎反映着对越战的残留的回忆。除了基辛格以外，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制裁的影响是多么微小，或者时间会侵蚀同盟的团结。同样，似乎有这样的情况，即有一些委员会的成员，如约翰·华纳，试图使听证会把注意力集中于军事准备或军事问题上，而其他人，如比尔·科恩，则企图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诸如在动武之前是否必须与国会协商的问题上。

乔治·布什

我觉得听证会的人员名单符合那些支持制裁为惟一选择的人的口味。我们在巴格达的代办乔伊·威尔逊打电话告诉我说伊拉克对海军上将克罗的证词的特殊反应是，美国人绝不会攻击这种信念增强了。我11月下旬的日记反映我对国会以及对批评者施压的恼怒：

日记，11月28日

争吵现在越来越激烈，萨姆·纳恩，我估计会竞选总统，反对得尤其卖力。格普哈特与总统"决裂"，说"不要动武，必须让制裁生效"。他们没有人关心人质，没有人分担我对大使馆的担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孤立主义的右派与重复着越战综合症的(老)金曼·布瑞斯特左派搞到一起。越战中大英雄鲍勃·凯里和另一个英雄约

翰·格伦同声“不要动武，不要动武”。

……最后的分析：我们将获胜。萨达姆·侯赛因将滚出科威特，而美国将是催化剂与产生这种结果的关键，而这是重要的。我们作为世界领导的角色将再次得到确认。但是如果我们妥协或者失败，我们就有可能完全阳萎，无力控制局面。我并不担心国会的否决，那不会发生……我希望国会介入。激烈的争吵是关于宣战的，但是大事我们需要他们，我将继续协商。

11月29日午饭后，我与汤姆·福莱以及鲍勃·米切尔会谈，讨论是否要召回国会并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支持联合国投票结果的决议。两人都强烈反对一个特殊会议。他们担心一个失去控制的政府，认为国会选举以后不完全国会会感到受到伤害和充满怨恨，而新当选的议员会感觉到被排斥在外。他们同样指出把会议议题仅限于讨论海湾决议是狭隘的，并提醒说议员们自己会提出各种动议。这样就会产生超出原来意想的否决以及普遍的混乱。我在白宫的最亲密的朋友，民主党人松尼·蒙哥马利具有同样的担忧。第二天，我会晤两党领袖，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考虑很久的一个可以增强国会与公众支持的行动，是与伊拉克直接接触。我想表明我们为了和平已经作了非常大的让步，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平息一些指责，这些指责说我不想与人沟通，只想战争。至少从11月上旬开始，我就一直计划一次高层会晤，在那里可以准确地告诉萨达姆我们的决心有多大——没有妥协的余地，无条件的、完全的撤军是惟一的选择。那个月月末的时候，敦促联合国通过授权动武的决议可能给他最后的信号，我已经决定提交一个议案。惟一的问题是如何提交。

一个可能是让塔利克·阿齐兹到华盛顿来；另外一个可能是我直接派人与萨达姆·侯赛因会面。我可以派一个代表去巴格达送

一封私人信件，也许是吉姆·贝克、布伦特或参议员迪克·路加。吉姆担心如果某个人去见萨达姆，可能会损害这项工作，暗示他没有足够的权威。我自己关心的是与萨达姆·侯赛因会谈，这件事太引人注目了，太多的眼睛将会注视着。我不能肯定这些会谈能够公开到何种地步，我的意思必须如何被转达。很可能阿齐兹不会完全把意思转达给萨达姆。在联合国表决的后一天晚上，我决定可以既让阿齐兹到华盛顿来，又派吉姆到巴格达。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对这个想法并不抱多大热情，因为正当联合国授权动武后，它又重新唤起了谈判的可能性，但是布什总统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作出了决定。他和我已经讨论了这个想法若干次，我指出我们的最紧密的同盟者会认为他变软了，但是我没有把事情说得很重。争论中的一个很强的逻辑是，危险太大了所以极有必要进行直接会谈。此外，他是面临作出将军队派遣出境打仗这个恼人的决定的惟一的人。在这点上他需要心理安慰，也就是说，他是在所有可行的措施都无效的时候才这样做的。无论怎样我们没有做错。他想没有什么争论立即去做这件事，所以贝克和我一道准备他的声明。如果我们先告知理查德·哈斯，他肯定会指出我们所建议会晤的时间与联合国最后通牒的期限相距太近，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做法。11 月 30 日早晨，总统发出了邀请，陈述了他的理由，提议在 12 月 10 日之前的一个星期中会晤阿齐兹，同盟国的大使们在座。他要求萨达姆在 12 月 15 日至 1 月 15 日之间双方都方便的时候接待贝克。

同盟国对声明的反应是激烈的，至少是复杂的。我们没有事先与他们商量，可以理解，由于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什么秘密交易或者也许感到被出卖了，他们显得很吃惊，总统打电话给法赫德亲王、霍斯尼·穆巴拉克、特加特·奥扎尔、科威特的埃米尔以及英国

新首相约翰·梅杰，向他们解释这个决定并保证不存在任何让步。这仅仅是给萨达姆一个机会。虽然法赫德亲王本人持赞成态度，但是班达王储显得神经质并且对提议有不同看法，他担忧且尖锐地问我们是否在变软。贝克汇报说班达王储认为亲王和阿拉伯同盟国，包括科威特，想就这个问题冒昧地与总统对质。他们也担心萨达姆会借机不撤军。穆巴拉克的反应要积极一些，他称派遣贝克到巴格达是“好的步骤”。另一方面，亨利·卡托大使打电报来说对于没有事先协商，英国政府“气得直跳”——特别是就在声明发布一小时前，贝克还与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在纽约区进过早餐。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国际上对邀请塔利克·阿齐兹的反应可想而知，非常严肃。它从底部动摇了同盟，就像联合国的决议似乎清除了采取行动的最后障碍一样。我们几乎无法消除同盟内的混乱，但是总统作了很大的努力，结果还是达到了目的。但是平息一个举步不前的联盟，我们花了一番很艰难的努力。另一个否定性因素在我们的政府队伍里面。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总统在内心冒了多大的险。我没有把他的话传开，因为我希望他能被劝说放弃这种做法。于是我们自己执行这项决定，漠不关心地让会晤的时间与最后通牒的期限几乎同时。我们有一些同事对此表示愤怒——他们让我们意识到这点。

在上层，有两个有利因素。第一个，总统心理平静，知道他为了和平与避免谴责已经采取了额外的步骤。那种谴责说他不想直接谈判，就想把美国军队送去打仗。第二个是美国人的反应是令人吃惊的支持。这种支持弥补了纳恩听证会造成的损失，而且清一色以反战划界的民主党人现在也发现他们很困惑：他们如何能够反对一个在国际上有那么大支持的总统，而这个总统现在又作

出那么大的和平姿态？这种结果的最初的信号是11月30日在内阁厅举行的两党国会领袖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每个人似乎都被总统在试图不用强制力解决对抗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严肃所感动。

在会上，布什总统作了一个临时性的支持联合国决议的演讲，这个决议既能避开要求国会授权的问题又能显示出团结，他再一次询问是否要召开一次特别国会来考虑这事。汤姆·福莱持谨慎态度，明显希望给制裁以更多的时间。虽然他承认我们是乐于向国会提供消息的，但除非发生意外他情愿等到1月份新一届国会。乔治·米切尔同意他的看法。总统告诉他们不要低估国会的支持联合国决议的议案对萨达姆的作用。

"宪法说可以召回国会，"鲍勃·多尔提醒他的同事，"我们正在失去机会。我们能够加快这个进程并且在三个小时内达成一致并形成一项决议，一项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决议。我们正在放弃我们的责任，而且以双重的方式放弃……让我们给萨达姆以及他的90万士兵一个信息。"这不是个两党政治的时候，他说。他希望如果国会不复会总统就召回它。"我倾向于多尔的意见，"鲍勃·米切尔说，"如果我们玩两党政治的游戏，也必须是两党一致表决的游戏。"

迪克·格普哈特说如果我们动武，也必须在制裁无效以后再动武，而且在什么是制裁无效上可能也达不成一致。"总统先生，你是很精明的，"鲍勃·卡斯藤说，"你已经得到我们的支持，现在要做的是两院投票支持联合国的表决结果。国会里的人现在急着想回家，而且建立在传闻之上的反应是有选择的。伊拉克的解释是我们这里发生了争执，伊拉克是另一个越南。总统必须得到赞成性的表决。把会议的内容限制好，你在一个下午就能得到你要的。"

帕特里克·利希说如果我们不曾在国会协商过，那么这倒也是

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的理由，但是他希望给制裁以足够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在任何事情上给予你支持，"他说，"特殊会议上的辩论对你不会有什么帮助。"克莱本·佩尔问是不是必须要进行秘密谈判。"我对'教训'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总统说，"但是今天的让步会使明天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一个危险的前兆。世界是团结的，对别国施暴的国家行不通。"

"没有说不干，"纳恩说，"问题是选择制裁这个长痛还是战争这个短痛？"他仍然相信时间在我们这一边。虽然他同意以武力相威胁是重要的，但是也担心我们军队的数量与后勤可能会启动独裁的政策。"打开轮换政策的可能性，它有可能使我们重新建立信任并且给制裁以时间，"他说，"我们军队的规模与非轮换政策会产生一种自满的预言。"

"眼前的问题是萨达姆并不相信我们，"迪克·路加说，"只要他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就存在。你求助多次。如果国会不支持，这对我说来是不可理解的——宪法的结构要求辩论。"

乔治·布什

共和党参议员领袖想先行一步，起草一个支持决议。他们担心共和党被贴上"战争派"的标签。希望推动民主党采取这个立场，即对总统宣战进行否决。多尔对此抱有信心：他们能够使国会议程限定在海湾问题上并产生一个肯定性的表决。我还没有作出决定。我们在要不要召集一次特别国会上——它的党派阵线是明显的——存在分歧，而一些人扬言要提交相反的议案这件事又迫使我寻求对我们的支持。我觉得最好不过的事是让他们试图限制总统的权力。如果在决议上两党分歧明显，这会给萨达姆一个美国人决心未定的最坏的信号。如果我们不能把议程限制在一个特殊的期限内并在参众两院达成共识，我们就没有要求表决的依据。

总统与巴格达互派外交使节的提议发布后的一个月，也是伊拉克进行内部布置和外交行动的一个月：巴格达可能存有让同盟瓦解，或者对美国施加更多的压力，使之给制裁更多的时间的希望。伊拉克表示它接受“邀请与举行会晤的想法”，但是没有作更多的说明。12 月 4 日，萨达姆声明他可以让他扣留的所有3 300名苏联人离开，两天以后，他说所有外国人都可以离开。这些声明明显是利用会谈的邀请拖延时间，也是对同盟施压，迫使其散伙。

乔治·布什

我是在南美之行的途中获得了萨达姆将释放所有人质的声明的，在那里我还收到国务院的声明，说一旦所有美国人都撤离科威特，我们的大使馆就将关闭。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进展，它使我感到很困惑。自从萨达姆命令大使馆关闭以来，这是在联合国的决议传出强有力的信号的时候我们所作的一个让步，而且我自己也提议举行双边会晤以提醒伊拉克我们的决心。关闭大使馆也就消除了对动武的潜在挑衅，因为我们不再担心它的给养以及解放那里被困的人员。虽然我担心关闭可能会被视为软弱的信号，但是美国的媒体则把它说成是我们企图为进一步的行动清理场地。它可能对紧张有所缓和，而且我也希望公众这样看这件事，但是我并不轻松。肯定的是，我不久就意识到，在我们华盛顿的支持的政治圈子内以及国外的我们的同盟者眼中，国务院的声明被解释为是对萨达姆的让步。有人说大使馆的关闭，计划中的巴格达之旅，以及我对阿齐兹的邀请，全都表明我们在变软。

12 月 9 日，包括 163 个美国人在内的人质迅速离开伊拉克。驻科威特大使纳撒尼尔·豪威尔以及其他四个外交人员四天后撤离。12 月 13 日我在白宫会见了几个被释放的美国人质，耳闻了他们在科威特的恐惧与恐怖故事。在我听的时候，发现媒体对于他们的经历给予很少的报道，我感到很气愤，觉得美国人对此似乎

并不关心。

释放了人质以后，萨达姆修改了他的策略，要把科威特问题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联系在一起，并要求进行一次范围更广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对话。我们表示拒绝，重复会谈必须限定在伊拉克撤军问题上。于是，伊拉克开始在会谈日期上与我们讨价还价，可能是想我们在1月15日的最后期限上有所松动。他们建议阿齐兹于12月17日到达华盛顿，并要求呆上三至四天，解释说他要与国会以及媒体见面。我们设想了美国政治家与媒体的各种各样游戏，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他会接近他们。我们接受了日期，但说明他只能呆两天。我们仍然要求对巴格达会晤进行确认，而且试图修正我们早先的错误的日程，提供可供选择的日期延至1月3日，否则会晤就取消。对于只有阿齐兹之行而没有贝克之行，或完全取消贝克访问这种观念，我们很简单地不予考虑，我们告诉伊拉克人，阿齐兹在这里的会晤视巴格达所确认的贝克访问的具体日期而定。结果他们把日期定在联合国最后期限的前三天。贝克于是建议我们表现出灵活性，向他们提供从12月20日到1月3日15天时间，使他们能够适应我们的时间表。

乔治·布什

日记，12月12日

我们收到伊拉克的又一封电报，说在1月12日萨达姆召见他们之前，他们仍然持有原来的立场。我们给他15天，他们可以在10分钟内见到约翰·克拉利或莱姆赛·克拉克、穆罕默德·阿里，但他们不能见国务卿。明天我将决定调查整个事件。

我对萨达姆的把戏很气愤，但是我仍然想穷尽所有的可能性。12 月 14 日，我声明直到 1 月 13 日且包括 13 日在内吉姆可以随时赴巴格达。第二天，萨达姆取消了阿齐兹的华盛顿之行，并称如果我们想要做的仅仅是重复联合国的决议，那么就没有会谈的必要。萨达姆的表演只是加深我对和平解决危机的悲观而已——虽然我依然尝试着和平解决的办法。

我仍然要与萨达姆的瓦解联盟的努力作战。12 月 11 日，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以色列总理以茨哈克·沙米尔两小时，我试图从他那里得到某种保证，即当伊拉克进攻以色列时让美国来作出反应。我因他的国家在面临伊拉克的无穷无尽的威胁时的低调处理对他表示感谢。“如果他进攻你，或者进攻变得明显，我们有能力摧毁他的军事系统，”我对他说，“如果以色列先发制人，那将是个很糟的事情。我知道你受到进攻时的反击立场并且尊重这种立场。但是如果我们事先协商，我们觉得以色列在见到我们的反应之前最好不要作出反应。”我希望在大规模的反击中联盟应保持一致。

沙米尔说他支持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且理解我们的困难。不过他指出，如果伊拉克进攻以色列，那么目标很可能是平民区，这会使他的国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你的话对于我们是一种鼓励，”他说，“但是我们有义务自卫，也有义务防止各种攻击继续。你说你能摧毁他们的军事设施，但是可能漏掉一些。”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看到诸如导弹之类的武器，我们再协商。沙米尔答应他们不考虑先发制人，但是我们的军队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互通信息，“但是如果什么事情必须发生，”他建议，“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必须事先协商。”我说我们正在这样做。

整个 12 月份，权威人士一直在加紧工作，预计发生冲突后的悲惨景象。伤亡的估计不断攀升并被危言耸听地引证着。与专栏

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等人报道相反，他们引用的伤亡数目在20 000人以上，实际上只有2 000人以下。前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预言伤亡至少30 000人，而前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争辩说战争所得远小于50 000条美国人性命之所失，他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死伤无数的图景。

有些专栏作家简单地指责我们没有头绪。罗兰·艾文斯和诺瓦克是持否定态度者中最糟的，他们称科威特是个陷阱，其他阿拉伯国家不会对它伸出援助之手，接着，联盟就会瓦解。马克·谢尔斯坚持说，认为战争是短时间的只是我们的幻想，他说我们在政治上正在自掘坟墓。“这是一个陷入困境的政府，它的确是，”他说，“这是个丧失理念丧失方向的政府。现在，1990 年，布什政府将与1979 年的卡特政府一样什么都不剩。”约瑟夫·索布兰附和说：“你没有必要到华盛顿来看布什先生，在政治上，他正在自我毁灭，还有他的党。”有些演说家不负责任地贴标签和采取机会主义，随危机与战争的呈现而改变姿态——出自自由媒体的自由言论。帕特·布坎南是孤立主义的好例子，他预言战争将使共和党分裂，使国家两极化，以及毒化它的政治。但是后面他又问：“当开火时萨达姆真的认为美国人民不会团结一心？”而在另一个地方他说：“对伊拉克之战将是布什先生领导世界新秩序的最后一战。当这场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人将不再到处寻找其利益需要保护的新联盟，或者新的联合国将实行这个星球分配给美国舰队的政策。”这次战争以后，他说，观察美国的战争机器，就会使人想起戴高乐将军在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评论：“实际上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

乔治·布什

我担心国会的阻碍以及专家们的议论，通过他们的经过选择的情报，会给萨达姆·侯赛因转达一个完全错误的信息，从而只会使他更大胆地集结军队和试图对抗制裁。因为现在有我们强大的

盟军驻扎在沙特阿拉伯，他可能不太敢向我们发出挑衅，他也可能体会到我们是严肃的（虽然直到第一炮打响，我觉得他一直相信我们不会开火）。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想要知道我们到底是否有决心做必须做的事情。媒体与国会的批评并不使我感到心烦，因为他们一直反对动武，倒是那些既不提供建设性的建议却又对我们说三道四的人使我感到心烦。他们不承担义务，对动武决定的后果也没有担心，这使他们攻击起我们来不受约束。他们不需要面临士气的低落，不需要面临维护联盟团结的困难，以及时间越来越少的事实。此外，他们对我们陆海空战士的生命也没有责任。我试图让某些国会议员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他们处在我的地位他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不做什么。最通常的口头禅是我们必须给制裁以生效的时间。

不过，仍然存在着强大和明确的支持者。在 12 月上旬，民主党众议员史蒂夫·索拉兹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他组织了一个两党海湾和平与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安妮·路易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政治主任，以及里根政府的前任官员，如理查德·珀尔、弗兰克·卡卢奇、琼·柯克帕特里克，以及国会议员约翰·麦卡恩、迪克·路加、杰克·默撒、鲍勃·托里切利。这个小组对于争论的我们一方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他们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使我们必须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一切，包括使用武力，他们在与国会协商之前就支持动武，但是不管他们的帮助多么有价值，要克服媒体与国会中许多民主党的反对仍然很困难。

日记，12 月 14 日

最后，我们把若干小组召集过来，召开一次定调会。很久以来被笑称为“公牛”的萨姆·纳恩和乔治·米切尔以及其他人控制了局面。我们仍然没有走出迷津，国会仍

然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但是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对我们的支持比我们想像得要大①。我仍然不能说我已经决定扣动扳机，但是我可以明确——如果他们在1月15日还不撤军，那么我将非常快地作出动武的决定。

12月18日，我收到大赦国际80页的关于伊拉克在科威特侵犯人权的报告。它使我感到很深的困惑，我敦促别人也看看。我把它的复印件送给盟国的大使以及国会议员。大赦国际自己会将其送至安理会。报告充满着关于被虐待的个案的细节描写，记录了许多起骇人听闻的、系统的迫害。其中有可怕的损害与强奸，以及滥用刑罚。我读到伊拉克士兵把科威特人从自己的房屋中带出，当着家人的面处死，把人绑在汽车后拖动并射击，暴尸街头，伊拉克人用科威特人作医学试验，强占医疗工具，等等。报告用在那里的医生与志愿者作人证，重述了伊拉克进攻的第一天，伊拉克士兵从一个医院的育婴箱中取出儿童让其死亡的事。

日记，12月20日，星期三

我们与爱德蒙·勃朗宁主教② 进行了一次非常情绪化的会晤，至少对于我是这样。他刚刚从约旦和伊拉克返回。他呼吁和平，而且他向我指出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平。他觉得他永远不可能宽恕暴力。我拿出很深地打动我的大赦国际的报告给他看，并问他，现在为了和平我们能做些什么？当这些人强暴时我们该如何

① 12月14日，《洛杉矶时报》报道民意测验显示61%的人支持我们的海湾政策。NBC作了相似的民意测验，54%的人支持战争决定，如果伊拉克1月15日还不从科威特撤军的话。

② 主持美国的艾皮斯考帕尔教堂，对我们反对他到伊拉克旅行置之不理。

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主教的立场是什么？我也会见了国会的两个代表团，包括乔治·米切尔。我越与这些人员谈话，我就越感觉到不得不自己单独作出决定，我不得不准备挨骂。如果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以可以接受的生命代价去解决，迅速摧毁萨达姆，我就将与国会以及全世界分享荣誉；但是如果事情解决得不好，不仅我将受到谴责，我可能如丹·井上所言落到被弹劾的地步。

12月22日

我一个星期前或更早的时候问鲍勃·伯德在我们与国会磋商期间我们应该做什么。他给我来信说我必须试图得到国会的宣战。这是一个对参议院了解很多的人的一封很有思想的信，并且对政府的三权分立形式提出了很多看法。他觉得我们仍然没到动武的时候，依他看来，制裁大半还会生效。

使鲍勃·伯德最担心的，也使美国人民、国会议员以及我们所有人担心的，这是一场会使我们陷入困境的阵地战。他谈到“大量的伤亡”，有人称之为“尸横遍野”。他指出如果在阿拉伯那一边有很高的死亡数，那么，即使是赢了也是输了。事实上，他说：“纵然伊拉克军队被摧毁了也同样会产生削弱我们长远力量的后果与反应，并且影响到那个地区的事务。”不过，我觉得他低估了美国支持联合国决议完全履行的控制力，也低估了我们从阿拉伯世界获得将这个独裁者制服的力量。在我的心目中，萨达姆要没落了，就像齐奥塞斯库那样没落。他被制服时人们会到大街上去跳舞，会说他是个暴君和恃强凌弱者，人们会感到欢欣。我相信这点，但我觉得鲍勃·伯

德不这样看。

我不太清楚如何对国会的犹豫作出反应。我知道如果我们不与他们协商而径自走向战争的话，绝大多数参议员与国会议员会被迫支持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正式要求一项宣战声明或一项支持决议的话，有可能难以成功。有些人仍然对媒体故作姿态。米切尔说他并不总是反对动武，但是觉得现在为时尚早。不过，无论如何，当他在 12 月 23 日受媒体问询时，他回答说他不觉得支持动武的决议会获通过，而且他也不会投票赞成——虽然他与我说过他会赞成。当他被记者当场问及他和别的民主党领袖是否通过对战争的需要提出疑问而故意削弱我的地位时，他表示轻蔑。如果他们现在没有进行辩论并对动武提出质疑，那么当战争开始时，每个人都会问他那时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不发表意见。与此相反，其他民主党人，如约瑟夫·利伯曼、查尔斯·罗布两参议员，似乎了解形势的严峻性，并告诉我他们准备支持动武。

国会中的不满和犹豫与联盟中的慌张相配。对阿齐兹的令人吃惊的邀请在我们的某些同盟者中产生了很大的担忧，这是 12 月外交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迹象表明法国、意大利与欧共体都可能单独派使节前往巴格达。我们特别关注法国。他们对联合国决议的反应很冷淡，而且在其公开的政治声明中与联合国的决议保持一定距离，虽然还没有从同盟的队伍中离开。密特朗仍然勉强支持埃米尔政府复位。以往他在海湾事务中是起很大作用的——虽然他仍然不同意将他们的军队置于美国的指挥之下——所以我们对他仍然抱有信心。布什总统 12 月 7 日写信给他，请他履行增派部队的承诺，而不要与伊拉克建立与美国平行的联系渠道。密特朗同意派去增援军队，但是关于是否与伊拉克建立直接联系，他说他还没有作出最终决定。

乔治·布什

另一方面，英国似乎决心依旧。约翰·梅杰于12月21日作为首相首次造访华盛顿，我以前见过他并且一见如故。我们计划等他一到就共飞戴维营，但是大雨倾盆飞机无法起飞，我们只好驾车前往。在我们等车的时候，我问布伦特我是否必须把全部的计划以及我们的军事部署都告诉梅杰，因为他毕竟刚刚上任，我想先交代一般概念而细节以后再谈是否更好。布伦特极力主张乘他在时把计划和盘托出。我们所有人都上了车，布伦特和查尔斯·鲍威尔面对着我们坐在折叠座椅上，当车子在大雾中沿盘山公路前驶时，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梅杰。我们计划最后期限一到就实施进攻性的打击。"16日早晨4点怎样?"我问。"你怎么定在这一天?"我们仍然没有向我们的军队发出命令，我们也没有与其他政府官员商量过。这是个"一闪念"的事情。

如果梅杰说他要考虑一下，说他必须与内阁或军方讨论这事，这些都是非常好理解的，但是他一点都没有退缩，他立即声明英国永远与我们站在一起。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他是第一个知道我们战争计划的外国领导人，也是我们中心组的第一个外人——非常适时献出他的忠诚以及不可动摇的支持，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他之前也是如此。

12月20日，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戈尔巴乔夫透露此事谢瓦尔德纳泽并没有与他商量。我对事情的这种进展以及它对海湾危机、同盟以及整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的意义感到震惊。12月12日谢瓦尔德纳泽在华盛顿访问我们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没有一点暗示，对吉姆也没有透露半点风声。这着实使我感到震惊，因为我知道他们俩关系密切，彼此有真诚的敬意与友谊。在伊拉克问题上把戈尔巴乔夫拉到我们这一边，他们俩的互信起了重要作用。几天以后，12月27日，戈尔巴乔夫派亚历山

大·贝西默特尼耶克送来一封关于谢瓦尔德纳泽辞职的信。贝西默特尼耶克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很恼火，认为谢瓦尔德纳泽已经精疲力竭了。他补充说戈尔巴乔夫想向我保证在我们的关系上什么都没有改变。他大声地念着翻译过的信。对于谢瓦尔德纳泽，信中有讽刺之词。不仅仅因为出人意料的辞职是一种他称之为“不忠”的行为，而且因为谢瓦尔德纳泽事先没和他商量。戈尔巴乔夫不赞成他的辞职方式，他认为这是向批评屈服。不过，戈尔巴乔夫称赞谢瓦尔德纳泽作为改革家与领袖的勇气、贡献与成就。谢尔盖·塔拉申科向贝克转交了谢瓦尔德纳泽的一封关于辞职的信。信中说他曾与戈尔巴乔夫谈了两个小时，戈尔巴乔夫拒绝他的辞呈。谢瓦尔德纳泽说这是最后的辞呈，他为了改革作了许多牺牲，再待下去无异于道德自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能够做的依然只是对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进行猜测。在他的回忆录中，他称此举是一种“不和与抗拒，同时也是一种警告”。但是当戈尔巴乔夫说此举是无缘无故的和无法接受的时候，可能有点虚伪。对于我们来说，戈尔巴乔夫可能正处于急剧右转的时刻。谢瓦尔德纳泽曾经告诉我们说，他对普里马科夫的有关萨达姆的阴谋表示关注这件事，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重。

我对谢瓦尔德纳泽的离任感到震惊与关切。它带走了戈尔巴乔夫身边最后的稳健的声音，从而使他易受保守派、普里马科夫和阿拉伯专家的伤害。这件事对外交政策的含义没有任何说明。波罗的海地区的日渐强烈的声音与行动清楚表明，至少在那个时期内，戈尔巴乔夫感到自己是军方的人质。在当时，谢瓦尔德纳泽的关于独裁的警告看起来似乎古怪，而且也许他受挫折辞职乃因他明显感到无力把戈尔巴乔夫保持在稳健的立场上。他也有可能是向他的稳健派同事发出警告，他们应该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

警惕。

当我们正在走向战争的过程中时，出现了一些小事，它们可以被解释成，至少在我们的军队中，有些人对前景已经不抱乐观，出现了类似于反越战的情绪。那时候文职领导人先指挥军队进入越南，后来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又命令撤出，这件事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反对情绪。受到黎巴嫩悲剧事件的强化，这种情绪1984年在当时的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身上有所反映，当时他定下了使用武力的几个先决条件，要求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时要有公众支持。当收复科威特的计划于10月份汇报给布什总统时，似乎在场的人没有一人想承担这项任务。同样，10月底保证进攻胜利所需要兵力的报告呈送给他时，所需数量之大以至于使人设想，要发布这样一项派兵命令甚至会改变他追求武力解决的计划。所有这些担忧在12月1日戴维营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都消除了。在会上，口气是很肯定的，默里尔·麦克皮克将军作了一个空军打击伊拉克30天见效的汇报，包括可能有的损失：损失150架飞机，半数飞行员获救，四分之一牺牲，其余被捕或者可能跳伞落到巴格达的大街上。他认为轰炸可能摧毁一半左右伊拉克的主要地面设施。

但是，12月21日，海湾部队副司令加尔文·华勒将军却告诉媒体军队尚未作好做这项工作的准备。随之而来的是中央指挥中心试图推迟战争开始日期。瓦格斯想起1862年林肯总统给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的信，问道，如果将军不打算动用他的军队，总统是否可以借用它一段时间？

乔治·布什

圣诞节前一天的早晨，我在戴维营会见鲍威尔、切尼、斯考克罗夫特与盖茨，讨论最新情况。切尼和鲍威尔刚从海湾回来，华勒的评论提醒了他们，在那里他们调查了军队的准备情况。我想知道最后期限一过我们最早什么时候可以发动空袭，打到萨达姆举手投降时要多长时间。我们再一次确证我们的信念，即1月15日

一过，攻击越早越好——更近于我与约翰·梅杰说过的时间。

我们讨论了如果阿拉伯军队开到那里了，他们会不会参加陆地战争的问题。埃及与叙利亚对于攻打伊拉克可能会犹豫，解除伊拉克军队的武装并将其逐出科威特需要多长时间？那时候我们再做些什么？我们是否要驻兵在那里，要驻扎多少，驻扎多长时间？我们的装备是否晚些再撤回？我们预期的伤亡是多少？我们也考虑了一些细节问题，如什么时候关闭驻伊拉克的大使馆，怎么样断绝外交关系。我们谈到了可能由吉姆来发布的对待萨达姆的最终作战计划。这必须是一项措词强硬的声明，提醒萨达姆他正在遇到灭顶之灾，他可能被捣碎。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这些问题中有的曾经在国务院成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讨论过。在秋季一开始，我就询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们以及我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讨论除了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之外，我们的战争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削弱萨达姆的军事力量，使他不再能对该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又保持它的适当的力量能够抵御外部威胁并与伊朗保持平衡。后来委员会的讨论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即是否把空中打击的范围从科威特境内扩展到伊拉克本土的萨达姆军队上。结果，建议集中在这点上，即摧毁伊拉克训练最好、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精密的共和国卫队，只要发现，不管在哪里。既然这些军队是伊拉克政权的脊梁，它们的毁灭可能进一步动摇萨达姆的权力。我们的阿拉伯盟友确信，我们也开始相信，打败萨达姆的第二个战场，是粉碎他在军队中的支持者，那时候他们有可能推翻他。摧毁共和国卫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委员会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即把促使萨达姆下台作为一个目标。除了揪准他个人（这在空中打击时显得极端困难，而且刺杀也不是个办法）这个困难以外，主要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目标能

否达到。我们不能把它作为联盟的正式目标,因为这个目标超出了指导我们行为的联合国决议范围之外,这也可能使联盟分裂。如果美国单方面把它作为目标,并且公开声明,这也会在政治与操作上造成麻烦。我们也许自己单独作出推翻一个政权并代之以另一个的承诺,但是如果不是伊拉克人亲手这样做,我们就有可能面临无限期地占领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和令人怀疑的"民主建设"问题。现实主义地说,如果萨达姆倒台,随之而来的可能不是一个民主政权,而是一个更有问题的强人。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尽可能彻底地摧毁他的军队,等待巴·哈斯政权的崩溃。我们可能集中精力解放科威特,并且尽可能地离开这个地区——实现我们的联合国的目标以及我们对阿拉伯盟友的承诺,我们希望摧毁萨达姆权力的基础。因此,这些目标(和限制)在年底已经很好地确立起来了,而委员会的讨论因此成为总统在1月份签署的沙漠风暴计划的基础。

乔治·布什

日记,12月24日,戴维营

今天是圣诞前夜,你们想到了家人和在远方的亲人。我阅读了10—15封信,每封信都说"关心我的孩子",有些说"请不要开枪",有些说"没有必要为了石油去死",如此等待。总的呼吁是"救救我的孩子——救救我的孩子"。于是我坐在这里想,如果萨达姆没有变化,我们只好走向战争;实际上我们已处在战争中,就在今天晚上科威特的家庭正在被毁灭与遭受惊恐,甚至被杀害。原则已经定下,而且我们不会失败。

我已经老了,这会使我心安理得地送别人的孩子去死吗?或者这更难以使我送别人的孩子去死?我知道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打击是正确的。我知道我们失败的

后果，我知道如果我们懦弱地、回避责任地让 1 月 15 日就这样过去，将意味着什么。

圣诞前夜我坐在这里等待我们小教堂的圣歌。我仍然想着海湾，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第一次到德黑兰时遇见的年轻的飞行员——“让我们去；让我们做我们的事情；我们能够做”；然后是水兵与职员，年轻的，年轻的，非常年轻。我想到了伊拉克的孩子，当然，我想到了坏事都是由那个人造成的。他不仅应被制裁，更应该被惩罚，还有，我们关心如何处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他们说我不关心国内的事情，我希望这种指责是对的；当你手中掌握那么多年轻士兵的生命时，你应该怎么做？

我把我的情感概括于我在戴维营给我的孩子们的信中。

亲爱的乔治、杰伯、尼尔、阿尔文和多罗：

我于 1990 年最后一天写这封信。

首先，我不能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戴维营，那将多么好。我喜欢下棋，我喜欢圣诞节，遗憾的是萨姆与艾莉(女儿朵拉的孩子)不在。我喜欢看电影——有些部分，我喜欢那笑声。一句话，我喜欢看到你们全在一起。我们是个幸福的家庭，这个圣诞节使之更甚。

我希望我不要表现出闷闷不乐，我试图这样。

当我承担总统这项工作时，我宣誓我永不会苦恼地绞着双手谈论“世界上最孤独的工作”，或者在“施压还是决断”时苦恼地绞着双手。说过这些话，我就要永远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保持关注。根本不存在“孤独”，因为我的后面是一群第一流的、有学识、有道德义务的人们。在这

方面没有其他总统有我这样的福分。

我必须做什么，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思考得很艰苦。在我年终写这封信的时候，仍然存在着一丝希望：伊拉克的独裁者会撤出科威特。我将随机应变。有时候我想他会撤出，有时候我想他太不现实了——太不知道他将要面临着什么了。我有和平的愿望，因为我知道我们为和平已经做得太多。我们曾经求助于联合国，我们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联盟。这样，离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是联合国定下的，规定他必须完全履行联合国的所有决议，包括完全从科威特撤军，完全彻底地撤军，我们还有16天的时间。

作为爸爸，我觉得应该让你们知道的是：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当有人问我"你想牺牲多少人的生命"时，泪在我的心里流。回答当然是不想，一个也不想。我们等待，给制裁以机会，我们调集大量的军队，为的是如果动用武力，减少每个美国士兵的生命危险。但是牺牲生命的问题仍然萦绕于心，折磨着我。

我回想起历史：

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如果绥靖政策更早地让位于武力，那么将拯救多少人的性命？有多少犹太人将免于毒气室的命运，又有多少波兰的爱国者能够活到今日啊！我把今日的危机说成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的，这是很明显的。

我知道我的态度可能较长的时间内使你们有点伤心，这对我是个伤害，但在这"除夕之夜"，我只想让你们知道我的感受：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原则必须被遵守——萨达姆无论怎样绝不可能

从他的入侵行为以及他对科威特人的残酷行为中获益。

——在生命中人有这样的时刻，你必须做你认为是最好的——你不可能妥协，你不可能放弃，纵然你的批评者声音太大、人数太众。

所以，亲爱的孩子们，干杯。

夏威夷的井上参议员对我说："总统先生，做你认为必须做的。如果它迅速取得成功，那么每个人都会支持你。如果失败了，那么准备国会中的某些人弹劾。"这是他所说的，且百分之百地正确。

所以我要多说几句祈祷的话，主要是向我的在海湾的孩子们，我将做我必须做的，每一天里家庭的爱会增强我的力量，这种爱在我的生命的每一天里都使我精神饱满。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爸爸。

爱你们。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们及你们全家。

忠实的爸爸。

这一年，结束于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和其他人对我的恐吓，说如果我在国会未曾宣战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国会有可能停止拨款。在海湾方面，伊拉克对我发出诅咒，并发誓他们绝不撤出科威特。

布伦特与我在12月31日谈了两次话，我告诉他我想再尝试一次与阿齐兹甚至萨达姆的会谈。密特朗因为国内政治的原因力主这种会谈，我知道吉姆也想再试一次。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是争取国会中的犹豫者的一个好办法，表明外交的通道我们已经走完，如果我们要让联合国的决议得以履行，必须采取别的办法。布伦特觉得没有一种能奏效的办法，但他并未试图和我把这个问题谈透。他告诉我吉姆的意思是让我们再等等，到1月3日所有的窗口都关闭了以后，再对巴格达作进一步的行动。我问在军队

的准备方面有什么新消息，到什么确切的时间他们能准备好。他汇报鲍威尔说大概在 1 月 18—22 日左右。这与最后期限已经很接近了，就是向后推迟了。我告诉布伦特我们不得不到 1 月份再看情况。

日记，1 月 1 日

我必须坦白我正好在半夜醒了，思考 1991 年将要做些什么——我对问题思考得越多，就越确信我将不得不坚持到最后。但是当你不得不与那么多的同盟者协商，不得不把那么多事情放在一起考虑时，譬如说，如何处理类似于以色列那样的三党制，又如何处理约旦的情况，保证他们不做任何事情？这是异常艰难的。我们到底要给萨达姆·侯赛因什么样的警告？我们如何与国会打交道？我的结论是与国会打交道就是谈，在余下的两周一刻不停地谈，然后在“战争权力议案”下，或者以与“战争权力议案”相一致的方式通告他们。

第二天早晨，我召集布伦特、吉姆、约翰·苏努努，向他们解释我想和萨达姆举行最后一次会晤，向他个人传达他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反对，会晤也许在瑞士——“国对国”的安排已经结束。如果我们来得及与盟国商量的话——这次可能不会太吃惊了，我们决定第二天，即 1 月 3 日发布这项声明。为了使他们放心，我强调这项提议仍然服从于我们 12 月份提出的最后方案中的同样条件：没有谈判，没有妥协，不要指望挽回面子，对侵略没有回报。

日记,1月2日

贝克在2日3点45分打电话给我,说"在我前往巴格达与萨达姆·侯赛因会晤前不要关闭大门",我告诉他我真想猛地一声关上门,因为这家伙在耍我们,而且这次会晤将取代国对国会谈。吉姆对此似乎不太高兴,但是他看起来还是非常想去巴格达的,他从一开始就想去。但是我不想。我想那会造成我们犹豫的印象,我们现在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向盟国发了电报,告诉他们我们的计划,第二天一大清早就与梅杰及密特朗谈话。所有人都站在我们这一边。

第二天我发出提议,1月7、8或9日送吉姆往日内瓦,他将与我们的盟友再一次会谈。这是一次冒险。因为萨达姆也可以利用这次会议去发布一个手段巧妙的、不带附加条件的计划,甚至可能在说他愿意谈判的同时撤出一部分兵力,而其余部分分步撤出。回忆起来,他肯定把11月份的第一次"相互回访"提议解释为软弱的标志,而不承认那是为了向国会、欧洲以及美国大众表明我们愿意为和平做出尝试。当我接着那项提议提出在日内瓦会晤时,他有可能向他的权力核心说:"他们软了,他们不会进攻我们,为什么布什老是作出和平的试探?"1月4日,伊拉克接受我的吉姆与阿齐兹会晤的提议并建议会晤于1月9日在日内瓦进行。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很担心。我可以想像萨达姆会提出随便多少外表上具有吸引力的实际上主题含糊的建议与阴谋,它们有可能导致同盟中发生严重的裂痕,加重美国国内的分裂。毫无疑问詹姆斯·贝克是个杰出的谈判者,我同样毫不怀疑的是他会竭尽全力用说服而不是强迫来达到我们的要求。在我看来,局势的不幸的现实是,伊拉克

的撤军会把我们弄到异常困难的境地。萨达姆可以把他的部队撤到北部边境，驻扎在那里，伺机进攻。美国军队不可能长时间地待在那里。军队太巨大超出了我们的轮换能力，而且，无论怎么样，那么庞大的外国军队无限制地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对于沙特是不能忍受的。

与此同时，新一届国会议员们开始上火。1月2日，众议员理查德·杜宾、本尼特，参议员汤姆·哈京发布计划，要提出一项动议，要求部队开火前获得国会的同意。第二天我们与国会领袖举行了两次会晤，一次与乔治·米切尔、鲍勃·多尔、福莱和米切尔，另一次是与全体两党领袖的秘密会晤。总统又一次向国会作了临时演说，要向萨达姆发出我们是团结的和下定决心的信号。如果他们通过一项支持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的议案，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

国会的口气似乎有所改变。福莱现在相信可能需要通过一项使用武力的授权。“但是我不能说这是压倒性的”。国会可能取消它的通常的1月份休会期而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开始辩论，但是在1月23日之前不可能有正常的议程。他认为也有可能存在相对立的议案。

总统说如果对策是迅速进行表决，那将是有益的——长时期的辩论有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你不可能停止争论或抑制它。”米切尔带有刺激地回答说，“在修正案上也没有限制。普雷斯勒、达马托、哈京都说他们将提出一些修正案。我觉得联合国决议式的决议，因为没有实质性的多数，在参议院可能通不过。许多参议员都说他们不可能给予明确的授权。在15日以后你们有可能获得几项特殊的授权。因为这些原因，我这里勉强提出要求辩论与讨论的压力仍在增加，我情愿等贝克从日内瓦回来。”多尔劝告说如果我们仍然取得不了共识那么我们还是什么也不能做。

在两党全体领袖会晤中，总统解释了海湾问题上我们的外交立场，简单交代了贝克之行以及与阿齐兹会晤的意图。反应普遍来说是积极的，有些人，如格普哈特称赞这种外交例外的努力。

鲍勃·伯德说他不打算投票支持联合国决议式的议案，而倾向于宣布战争状态。但是他认为宣战不会被通过。“美国人没有准备好，”他坚持说，“人民对诸如日本、德国、沙特阿拉伯之类的我们的所谓朋友的可耻行为恨之入骨。”

“这个国家没有压倒性的热情或源泉，”但丁·法塞尔补充说，“50％的支持率这个目标可以达到。但要通过一项支持决议，纵然有白宫与国会的支持，也会失去120—125票。”

萨姆·纳恩仍然支持制裁。“只有所有其他道路都深度尝试过以后我才支持动武，”他说，“一半以上的伊拉克国民生产值已经耗尽。我相信萨达姆现在的情况是每况愈下，他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正在受到侵蚀。”

“围绕着时间表的真正的差别是你动武的早晚问题，”李·哈密尔顿说，“我个人倾向于晚一些动武。我同意萨姆·纳恩。伊拉克正处在非常危机中。制裁正在起作用，我们应该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我们决定再等一等，在贝克会晤阿齐兹之后再讨论决议问题。在整个会谈中，在几个头脑发热的人当中，福莱和米切尔处在控制地位。这些人包括大卫·奥贝、裘·肯尼迪、布鲁克·亚当斯和汤姆·哈京。他们提出动议，试图对没有宣战不得采取军事行动的制度进行修改，并尽力加快辩论过程。“我们现在全都搅乱了，”鲍勃·多尔评论道，“当我们必须辩论时，国会却处在休会期。现在我们必须沉默，我们都想投赞成票。”

乔治·布什

日记,1月4日

对于那些认为我有媒体妄想狂的人来说,他们应该看看 ABC 和《华盛顿邮报》的民意测验[①]。昨天晚上有4条惊人的支持率消息——80%的人认为应该早动武而不是晚动武;认为总统的政策正确的人是持反对意见的2倍;等等。在今天的白宫新闻摘要中有简明扼要的概述。《华盛顿邮报》的封面是关于海湾危机的报道,但没有提到这事。他们是这次民意测验的发起人,关于国会的报道有两条,封杀了80%的人认为早动武比晚动武好的数据。他们可能会说报道是初步的,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想用它最终做些什么。对于我来说他们好像不愿意刊登那些他们不想让人读到的消息。典型的做法!

1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贾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到达戴维营,问及他能做些什么来化解冲突。我试图劝他停止这种(与联合国工作无关的)纯属个人性的使命,因为这种调解只能使萨达姆产生从另一扇门出来的希望。我告诉德奎利亚尔我们必须坚持履行联合国决议的每一条款。"如果我们妥协,我们就削弱联合国的作用,也削弱我们在确立世界秩序中的作用,"我说,"我觉得萨达姆一直不相信会动武——如果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僵局。我还觉得他错读了美国的公众意见。"

---

① 根据 ABC、WP 民意测验,66%的人支持总统对危机的处理(29%不支持)、70%的人认为国会应给总统更多的支持(18%反对),65%的人说赞成战争(29%反对),82%的人说美国应迅速出击。

“你必须首先穷尽所有争取和平的手段，”德奎利亚尔劝道，“你不是提议贝克到巴格达吗？他(萨达姆)会要求时间去研究你的信以及建议。”

“如果贝克与他会面，事情会更多，”我回答，“如果15日以后还什么也没发生，那么人民就会失去信心，同盟就会瓦解，我们的整个努力就要落空。安理会决议是再清楚不过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履行它。如果我们同意贝克去见他，我们就破坏了我们的努力。”德奎利亚尔觉得日内瓦会晤以后再一次巴格达之行的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贝克无功而返。他昨天会见了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问其是否有什么信息要转告我，大使说什么也没有。德奎利亚尔认为他与贝克处在不同的位置上。“我必须在15日之前做些什么，”他说，“我可能把决议送给萨达姆。但是如果我两手空空而回，就等于扣动了冲突的扳机。”

“比较坏的是你可能受到他的蒙骗，”我说，“比较好的结果可能是你的巴格达之行的确是最后一站。”德奎利亚尔觉得无论如何他得去一次，特别是当伊拉克大使说没有什么信息要转达给我的时候。他准备去巴格达，不过要取决于日内瓦的情况而定。

我们希望秘书长8月份第一次会见萨达姆的失败会使他放弃再作无用的尝试，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他有的仅是最良好的动机，他极其希望合作，但是他对于他的责任之所在，持有一种勉强的但却是坚定的观念。他还建议在1月15日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开另一次安理会，但我们觉得已没有必要，我们在联合国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那一天稍晚的时候，我重新写封信给萨达姆，定下了最后的调子。贝克可以把这封信带到日内瓦。

第二天我写信给国会，要求他们通过决议支持联合国的决议，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把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我同时把这封信传真给了布伦特，请他提意见。我自信我不需要决议。美国在其历史上动用其军队200多次，但只宣战过五次。但是为了这个

国家的利益，也为了向萨达姆表明我们的声音是一致的，我希望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国会能破个记录，我们手头没有草拟好的现成的议案，虽然有个别议员正在准备几个本子。语言精确相当重要。我希望避开要求"授权"的措词，因为这样就暗示国会在我相信是一个行政性的决定上具有最终的发言权。我也希望避免把这件事变成一种党派投票，它意味着这件事情的发起人相当重要。我可能支持保守党议员邓肯·亨特尔起草的那个措词强硬的议案，但是我们希望两党的联合支持。我让松尼·蒙哥马利与亨特尔沟通，后者了解局势。我们也许试图保留它的内容，但要与更广泛的发起人合作。我于是开始了与国会议员的非常频繁的电话协商。民意测验表明国会中的支持者会分裂，但是也有可能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一项决议。人民无论如何应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争端，而不是法律争端。我们也开始就如何推动议案和安排发起人等立法事宜与国会中的人与议员进行战略性的商谈。

1月9日，正如全世界所看到的那样，贝克在日内瓦会见了阿齐兹。他给总统打了两次电话，每一次都在会谈刚刚结束之后：第一次是在上午7点30分，第二次大概是下午1点。在早晨贝克汇报说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动向，倒是对伊拉克与科威特的历史关系讲了一大通。还不清楚阿齐兹会不会接收给萨达姆的信。贝克告诉他不管怎么说他来这里不是来谈判的，而是来沟通的，在每一次会晤中贝克都向他出示了总统的信。信在封好的信封里，但是贝克给他一个复印件，并向他读了一部分：

> 今天我们站在伊拉克与世界战争的边缘。这场战争是因为你侵占科威特而引起的；这是一场只能以伊拉克完全地、无条件地履行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而结束的战争。

我们希望一个和平的结局。不过，除了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以及在它以前的决议以外，什么都是不能接受的。侵略得不到报偿，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过，当其完全履行后，伊拉克将获得重新加入国际共同体的机会。撤离越早，伊拉克及伊拉克军事设施就有可能免遭毁灭。但是即使你完全且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你失去的都要比科威特更多。这里的赌注不是科威特——它将会解放，它的政府将复位——而是伊拉克的未来。这要看你如何选择。

伊拉克已经感受到联合国所指令的制裁的影响。如果必须战争，这对于你和你的国家将是极大的悲剧。让我再说一遍，美国不会容忍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或者摧毁科威特的油井和输油管道。美国人民可能要求最强烈的反应。还有，你将对任何伤害同盟者的恐怖主义行为负责。如果你在这方面下达了不讲良知的命令，那么你、伊斯兰革命党还有你的国家将付出令人恐惧的代价。

我写这封信不是威胁，而是告知。我这样做并无满意之感，因为美国人民与伊拉克人民没有争吵。总统先生，为了没有更大的冲突而结束这场危机，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把今年1月15日定为"善意的中止"。是有意识地利用这种中止，还是把它作为进一步暴力的前奏，决定权在你手中，在你们单方面手中。我希望你能仔细地掂量你的选择并明智地作出选择，因为所有的后果都取决于这种选择。

阿齐兹浏览了信，称它除了"威胁"外什么也没有。他把它扔到桌子中央，一直留在那里。贝克重复了自己的谈话要点，并提醒说这将是一场伊拉克赢不了的战争。阿齐兹回答说伊拉克不会在

一种错误的印象中过活，他们知道他们所反对的是什么。“我们接受战争。”他很有信心地回答说。贝克回敬说在这方面美国下定了决心而且阿齐兹不要小看美国或者小看总统的权力。当冲突开始后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的限度。贝克简单地勾画了如果战争开始伊拉克的可能遭遇，但是补充说如果伊拉克撤军且无条件地履行联合国决议的话，就不会受到攻击。阿齐兹说他们受到了侮辱。

乔治·布什

在那天中午与国会领袖的午餐会中途，帕蒂·普雷索克递给我一张纸条，说吉姆又来电话了。我拿起桌上的电话，他简要汇报了第二轮会谈的情况。他把它描述为是对伊拉克的“完全绝对的威胁”，虽然阿齐兹似乎有点紧张。“不管如何，都过去了。我们把道路摆在他面前，要么他自动到美国来，要么邀请我们到巴格达。阿齐兹说他‘会晤要听从总统的安排’。我说‘不，我们给你15天——你说不。现在你又试图操纵最后期限’”。最后，阿齐兹拒不把信带回，把它丢在桌子上。在日内瓦的伊拉克大使也不会把它带走。我希望阿齐兹至少能告诉萨达姆他所看到的那封信的复印件的内容。

日记，1月9日

我估计星期二是我的总统任期中最艰难的一天，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之一，我一直在等贝克的电话。我与国会协调，(同时)听候与阿齐兹会晤的情况。与密特朗、马尔罗尼、法赫德亲王、澳大利亚的鲍勃·霍克打电话，还要与国会的四个领袖的每一个谈话。

贝克与阿齐兹会谈的失败，我想可能对我们与国会的协商有所帮助。

1月10日我打电话给梅杰，向他通报了日内瓦会谈的情况。贾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正在前往巴格达，梅杰对此行非常乐观，认为这有可能使欧洲人不再作他们自己的最后几分钟的外交努力。他自己也刚刚从海湾回来。“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摩拳擦掌，”他对我说，“他们对萨达姆表示愤怒，都准备参战。”军队的士气很旺。“他们都准备好了，而且绝大多数想立即出发。”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那一天，决议案在众参两院同时提出并且开始辩论，我们作了巨大的努力以期令人满意的表决。除了那些我们认为肯定投赞成票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议员不是经过我们多次努力才相信国家利益存在于肯定性表决之中的。总统一直在电话机旁，一直与许多议员会面。我们的支持票数危险地接近反对票数，特别是在参议院。它一般是比较合作的。不过，在这个时候，有几个有影响力的、能说会道的又持支持意见的民主党议员，如阿斯平、默撒、索拉兹和托里切利，在众院中作了鼓动性的讲话。我们假定参院的支持是肯定的，我们把努力放在众院，在众院先表决。在众院我们是成功的，不过结果仍然是不明确的，直至有民主党参议员（尽管是少数）为了使胜利不确定而与其领袖绝交。

在国会进行辩论时，盟国内部出现了更大的挑战。法国国防部长切温纳曼特仍然敦促美国作出同意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姿态。我们担心德国持相似立场。接着，在1月11日，立陶宛形势恶化。苏联军队包围了维尔纽斯的主要印刷工厂，并且摧毁了一些国家防御中心。戈尔巴乔夫早上8点打电话给布什总统讨论这个局势，并要求他接见贝西默特尼耶克，他可能带来对于海湾问题的建议。总统敦促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不要使用更大的暴力。总统同意见贝西默特尼耶克，虽然我们不希望任何更复杂的建议。

立陶宛的局势在接下来的周末变得更加恶化。在一项很明显是地方指挥官下的命令中,苏联军队攻占了维尔纽斯的电视台——13人被打死,12人受伤。贝克给谢瓦尔德纳泽(虽然他已经辞职,但接替他的人还未产生)写了一封信,说所有西方盟国都暗示镇压将损害他们援助苏联的愿望。戈尔巴乔夫否认下令攻占电视台,我们不禁想起谢瓦尔德纳泽三个星期前辞职时所暗示的话。戈尔巴乔夫似乎无法控制局势,他周围的改革派不是离他而去就是靠边站了。在海湾危机最后期限临近的时候,立陶宛的镇压使得我们与莫斯科的关系更加复杂,但是我们尽力将两种危机分开来。

1月12日两院中都有三个议案要表决。众院的第一个议案是杜宾和本尼特提出的,它再次重申国会的宣战权,声称针对伊拉克的任何进攻性行动首先必须征得国会的同意。第二项议案是格普哈特和哈密尔顿提出的,它是一项"国会意义"的议案,表示要继续支持经济制裁。它也宣称针对伊拉克的任何进攻行动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关键性的表决发生在最后一个议案上。这是迈克尔和索拉兹提出的两党联合议案,它支持使用武力达到联合国的目的。它是惟一要求总统签字的议案,其他两项是立场一致的议案,也是咨询性的议案。参院与迈克尔-索拉兹议案相同的是多尔—华纳议案。米切尔和纳恩提出的一项议案对总统命令进攻伊拉克的权力提出挑战,并对现在就下令的明智性提出疑问。

接下来几天中,两院辩论情绪化了,但从没有白热化。所有倾向于和平解决的、也被很好地理解的方案,很快消失了。"我认为我们给予和平的最好的机会,我们给予和平的最好的希望,就是在各个方面增强总统的力量。"多尔说。约翰·华纳问如果国会不支持,那么对于那些已经出兵海湾的盟国将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士兵又会有什么影响?

"一如既往,总统必须在宪法的约束下向国会靠拢,"纳恩说,"他将获得联合国的支持。在有一天的辩论中我说过,我觉得战争

是合理的——但我认为这时候开战是不明智的，我觉得我们还有其他选择。”阿伦·斯派特争辩说如果国会“驳回”总统及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美国的信誉就会被削弱。本议员的观点是：制裁将崩溃，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将使总统权力受到限制成为一种制度”。

“说到战争，为什么必须是美国的战争，大部分由美国军队组成的战争，美国人伤亡的战争？”米切尔问道，“就在今天早晨我听说‘仅仅’可能有几百个美国人伤亡。但是对于这几百个人的家属来说，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而且真正关键性的、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是：他们的死亡是否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就打，那么就没有人会知道如果给制裁以充分而公正的时间它究竟会不会发生效力。”爱德华·肯尼迪把它说得更尖锐：“现在仍然有时间使总统从他自身中解救出来，”他说，“也有时间把数千名美国士兵从波斯湾沙漠战争的死亡线中解救出来，而且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只有不顾代价、失去理性之举才能超过。”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罕仍然坚持说这并不是个国际性的危机。“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小国入侵另一个更小的、同样令人讨厌的小国而已。”鲍勃·凯里怂恿国会去告诉萨达姆“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宣战或发动攻击。

芭芭拉·勃格斯援引可能将有15 000名美国士兵伤亡的预测。“如果我们坚持要回到老路上去，这对于我们的社会将是不幸与灾难。”她争辩说这个国家“正陷入在世界这样一个地区的战争之中，这个地区是以暴力、恐怖主义闻名于世的。我们再也不能与之同伍”。

“我们想卷入战争，是不是就是因为一个人——总统，做了一系列单方面把我们套牢、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使战争不可避免的圈套的决定？”约翰·凯里问道。

在众院，有着相似的辩论。“我们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信念是，

这不是个民主党的争端，不是个共和党的争端，而是个美国的争端。”索拉兹说。阿斯平力陈就授权总统动武的问题，正确的答案是赞成，“我相信不流血的胜利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在国会，惟一的争论在于，我们是用制裁慢慢地抑制住萨达姆，还是立即追求武力解决，”格普哈特说，“我们说过不要战争我们也会赢，真理在我们这边。”

1月12日，参众两院都投票支持那项联合议案，授权使用武力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众议院以250对180票通过迈克尔—索拉兹议案，而参院共和党华纳和民主党多尔议案的表决结果是52对47，非常微弱的多数支持战争。别的议案未获通过。

乔治·布什

虽然所有民主党领袖在两院中都投反对票，但结果比我预计的还要好。在参院，10个民主党人在授权问题上加入我们行列，而在共和党中，只有两个人，哈特菲尔德与格拉斯雷投了反对票，萨姆·纳恩承认被米切尔和勒伦说服而投反对票是个错误。当我听到这个结果后，感觉到弹劾的重压正在落到我的肩上。说实话，即使国会不通过决议，我也会采取行动，命令我们的军队进入战斗。我知道这将导致强烈抗议，但这么做是正确的。我心里感到快慰的是我具有宪法上的权威。我必须采取行动。

决议最终到手以后，1月13日，星期日，晚上6:00，我们国防与国家安全最高级人员在官邸会谈约一小时。贝克到日内瓦向我们盟国通报情况，现在正在返回途中。情绪是低沉的。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正在接近战争。一开始媒体对于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使者前一天到达巴格达只有点滴报道，德奎利亚尔的外交努力失败了。现在整版都是抗议、祈祷和专栏，所有人都在质问“我们准备战争”？反战示威在几周前就在白宫前面的拉法夷特

广场开始了，它们日夜继续，而且鼓声不息。

我决定于海湾时间17日上午3点，华盛顿时间16日晚上7点发动进攻，我们仍然面临稍微调整攻击目标的问题，主要指向伊拉克的导弹发射架、电力、桥梁和炼油厂。此外还有我们的飞机和导弹飞越别国领空等棘手问题。这是土耳其人特别敏感的问题，他们对我们巡航导弹飞越其领土的要求显得不自在。后来我们这样解决问题，重新选择攻击目标，不再飞越土耳其。

乔治·布什

我仍然出奇地平静。我一直不断地对自己说，留下足迹，做你必须做的，如果需要，就作适当的调整，然后坚定地做。我们必须摧毁萨达姆的核武器和生物武器设施。我们如何把时间通知我们的盟友？我一遍一遍地问布伦特和其他人："如果我们用这种可怕的空中力量进行攻击，我们如何结束？他怎么样投降？他会投降，我知道他会。他不可能招架太久。"

那天晚上的后一段时间，我审阅了将于1月16日对美国人致辞的讲话稿，力图用词准确。我检查了罗伯特·罗维、托马斯·潘恩和其他人的引文，但是没有一段能准确表达我的感受。在上床之前，我打开电视新闻，看了一会儿。我看起来就像一个父亲与他登舰开赴海湾的士兵儿子吻别那样。儿子哽咽，父亲拥抱，战争的回忆涌上心头。我清晰想起1942年8月6日我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柴普黑尔进行飞行训练的情景。我父亲陪我到纽约佩尼车站，在站台上他拥抱着我。我在火车上哭了：我刚满18岁，不知道什么是孤独，我离家去经历一个未知的世界。

1月14日，星期一，气氛非常紧张，当我从西翼绕白宫散步时就能感觉到。最后期限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所有人都在考虑，以后将会发生些什么。午饭后，我与迪克·切尼、布伦特、默里尔·麦克皮克将军仔细检查了轰炸计划，讨论了我们可能遇到的最坏的

情况，如平民被炸死，炸弹或导弹击错目标。麦克皮克对空军准确、成功地完成任务抱有信心。我担心在巴格达的美国记者，我也关心伊拉克的儿童。虽然首攻是在大清早，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呆在家里的床上。麦克皮克和其他人向我保证攻击目标都是那些不可能有平民被炸到的地方，我祈祷他们是正确的。

那天下午，我收到法国外长罗兰·杜马的传话，说法国仍然希望作最后的努力，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另一个决议劝萨达姆撤军。杜马再一次建议我们告诉伊拉克，如果他撤军，我们同意召开一次讨论中东问题的会议。有传言说密特朗本人可能前往巴格达。这是个联动装置，虽然他们否认，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支持这项提议，法国不久就放弃了。现在我已经很清楚了，扣动扳机的只有美国。

第二天，联合国的最后期限已到，早晨大约6点30分，我很简短地与吉姆通了话，然后独自在白宫的周围散步。6点45分时我头一个进了办公室。我发现我正在考虑在战争开始以后我们如何结束它。过了一会儿以后，我又一次向我的录音员发出指令：

> 1月15日6点45分，准备工作。如何结束战争，我陷入困惑。萨达姆说空袭是破坏性的而他让他自己的人民去承受。我们如何结束？我们如何避免滥杀无辜？绝大多数人不把它看作是个小插曲，是因为他们确信这将是一场长期的、在美国这方要牺牲许多人的战争。但是我想可以保证在那里我们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我想我们需要观察的是何时在巴格达和伊拉克清除我们的军事目标。

那天上午10点30分，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主要人物再一次聚集椭圆形办公室，敲定开始空袭的最后细节。我们讨论了总

统对全国讲话的时间安排，决定在空袭开始2小时后广播。我们也检查盟国在空袭开始后的通告次序，我们的通告次序依他们的部队是否卷入而定。有些人，像穆巴拉克，可能在“H”时通告；其他人，如密特朗、马尔罗尼、奥扎尔、霍克，可以稍早一些，早半小时或一小时通告。约翰·梅杰，他的皇家空军可能与我们自己的空军在最初的空袭时就在一起，有可能因此提早12小时通知他们。我们决定在“H”时前1小时，贝克通知班达和贝西默特尼耶克，切尼通知以色列的莫莎·阿伦斯。我们都同意决议中要求的对国会的通告基本上在“H”时送达。

乔治·布什

虽然计划是绝密的，但我仍然担心一个疏漏会惊醒伊拉克人，从而使我们的一些空军士兵失去生命。布伦特递给我授权实施沙漠风暴的国家安全命令。我在壁炉旁边的凳子上签署这份文件，把日期与时间空着。我告诉切尼他可以签署实施的执行命令并把它传达给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我于6点30分回到官邸看新闻。

日记，1月15日

无法描述的压力。这是15日晚上9点45分。离最后期限还有2小时15分钟——来自巴格达的报道是挑衅性的。人们在大街上游行、罢工，然而他们面带微笑，唱着歌。我想，噢，上帝拯救他们。有个孩子进入电视，我觉得他是个亚洲孩子。这个画面萦绕我心，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伊拉克人的孩子。我说，祈祷上帝，祈祷上帝，一定要准确，不要伤到孩子。

教皇的电报来了——这是美好的，美好的片断。劳尔主教打来电话，布朗宁主教打来电话，霍尔沃森打来电

话,鲍勃·舒勒尔、比尔·布莱特还有许多福音派人士打来电话。当然,比利·格拉罕也打来电话。白宫前面的拉法夷特广场充满着蜡烛与祈祷声。我希望上帝知道我们在祈祷。

华盛顿时间半夜,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已过。

第十七章　沙漠风暴

乔治·布什

和经验中的别的事情不同，最后期限过的那一天显得非常奇怪，日常事务与它相比显得没有实在感。在一个教育会议上，我觉得我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几分钟。我记得我们的导弹和飞机已经作好攻击伊拉克的准备，有的已经在进攻它们的目标的途中。突然之间，任何事情都觉得不重要了。整个一天，人来了一群又一群，并以"上帝保佑你"相祝福。国会中仍然有些议员心怀不满，对支持使用武力的决议拒不投赞成票的众议员亨利·冈萨雷斯，正在草拟一项弹劾议案。吉姆·贝克和我一起在官邸用中饭。

在下午之前，我已经进行了通报，和梅杰通了电话，整个一天，我一直向其他准备参与的盟友通报。我还向每一个前任总统通报了情况，他们所有人对我们准备干的事情都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吉米·卡特，他非常仁慈。我觉得他理解我们与阿齐兹对话的最后努力，而且尽可能地作了战争警告。在 5 点 30 分到 6 点 30 分之间，我向国会的领袖们通了电话，电话结束到 7 点炸弹发射这段时间内，一种不安的期望控制着我。现在，事情交给军队了。6 点 40 分的时候，芭芭拉、格拉罕和我在电视机前，坐等巴格达上空为火光照亮。我们听到了类似于开火的声音，一段时间内看起来就好像对方向我们发动攻击。我打电话给迪克·切尼，他说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向天空开枪。在 7 点的时候，切尼打电话给我说第一颗炸弹已经发射。我转向别人说："他们正好准时。"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当空袭开始的时候我和理查德·汉斯、鲍勃·盖茨一起看美国有线新闻网电视，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经验。我腿上放着进攻时间表，眼睛一直盯着电视上的攻击目标。当它发生在我的眼前时，就像看一个电影的脚本。我实际上是在看一场战争的开始。6点40分，有线新闻网记者贝纳·肖在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座饭店里报道说战斗在靠近南部边境进行。一切是按时进行的。于是在夜幕降临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在屏幕上看到它又被反飞机照明弹照亮——枪手们在冷静地开枪。

乔治·布什

几分钟以后，马林·菲茨沃特走进白宫汇报厅，宣读我的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解放科威特的行动已经开始，在9点左右我可能向全美国讲话。在我准备讲话的时候，使我觉得吃惊的是我竟然不感到紧张。我知道我要说些什么，把它说出来，并且希望说得准确。后来我才得知我是有记录以来对美国最多的电视观众说话——79%的电视机都打开了。

晚上10点，我正准备上床时，迪克·切尼打电话来，带来了海湾的第一份报告。50架海军直升飞机起飞，50架飞回。大约200架空军飞机起飞，也没有它们失踪的任何消息。我感到一丝轻松与安慰。我感觉到祈祷的需要。

1月16、17日之夜是一个无眠之夜，辗转反侧了几小时后，我决定起床。5点我牵着爱犬在南草坪上散步，在下楼到局势室之前先进了椭圆形办公室待一小会儿。一架美军F-18战斗机坠毁(伊拉克说14架)，佛罗里达梅波特的海军少校迈尔克·斯考特·斯彼彻牺牲。11点，芭芭拉和我与内阁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道，在弗吉尼亚爱林顿的福特迈耶教堂参加了一次礼拜，比利·格拉罕作了祷告。我们唱着“我们的主上帝”、“奇迹”，一个独唱者唱了“上帝保佑美国”。

经过一天的攻击，对于空袭的成功、少量的损伤已经产生了普遍的乐观情绪。但是晚上7点刚过，布伦特打电话告诉我伊拉克人向以色列发射了五枚飞毛腿导弹——1月18日早晨在特拉维夫第一次报道是混乱的。我们不知道损伤的程度如何，导弹从何处发射(在最早的攻击中，我们击中了固定发射点)，也不知道弹头是什么型号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传闻。一开始我们听说化学武器被用上了，导弹击中了黎巴嫩。后来又听说发射了七枚飞毛腿导弹，但损伤很小，也许没有人员被炸死，甚至不存在化学武器。关于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是否截住了任何导弹，或者是否发射，也有着混乱的报道。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以色列如何反应。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空袭开始的晚上是个很长的晚上，但是第一天的战斗进行得特别顺利。大约在7点钟，鲍勃·盖茨和我正准备回家的时候，马林·菲茨沃特和罗曼·波帕迪克跑进我的办公室第一次汇报飞毛腿导弹发射的情况。攻击是一次很精心的把阿拉伯国家从同盟中分裂出去的图谋，要么想直接引起以色列的军事反击，要么想取得极端的阿拉伯人的支持。我召集贝克和切尼，询问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切尼说，在空战期间，他最好不要离开国家武装力量指挥中心。

我同意，所以我们开通了我们间的热线，让他用话筒讲话。雷利·伊格尔伯格紧跟着贝克来了，约翰·苏努努在他的助手安迪·卡德陪同下走下楼来。几分钟以后，迪克·达曼紧跟着副总统也出现了。所有人都挤在我的办公室。

切尼汇报说飞毛腿导弹发射后以色列国防部长阿伦斯让他立即到他那里去，并要求尽可能快地安装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他还要求我们对以色列的反击作出安排。

我觉得要让以色列不还手几乎不可能，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切尼说他怀疑我们能否阻止得了他们，而且试图阻止可能使

局势变得更坏。他建议我们随它去，走得越远越好。切尼的估计产生了沮丧情绪。汉斯和我认为让以色列还手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打到伊拉克，他们的导弹必须穿过阿位伯国家的领空，要么是叙利亚、约旦，要么是沙特阿拉伯。我不能想像这些国家能容许对他们领空的如此侵犯而不进行军事还击。如果以色列不经容许发射导弹，他们很可能途经约旦。他们导弹穿过领空而不被监测到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约旦发现了它们，肯定会想法拦截。这就会把约旦拉进战争，而且会改变同盟的整个考虑。能使阿拉伯国家从同盟中分裂的以色列的攻击，仍然存在另一个障碍——一个技术术语称作"清除冲突"的过程。这意味着提供一种统一的信号，在一定的战斗时间与线路上进行，避免同盟国向以色列飞机开火的可能性。就我们拒绝清除冲突而言，以色列的任何攻击对于他们自身都是严重的损害。以色列可以有的惟一的选择是回击的武器种类——用它的杰里科地对地导弹。这是问题最小的选择，但是这也意味着以色列参加了战争，对同盟仍然是个威胁。

在我们争论的时候，有人说至少有部分伊拉克导弹带上神经毒气。这改变了讨论。伊格尔伯格说如果切尼目前还不在，现在他必须在场。他指出如果以色列用导弹而不是飞机还击，我们的合作条件就不受影响。

最优先的选择，我们决定是马上活动，迫使以色列不介入。贝克给总统打电话听取他的意见，并让他打电话给沙米尔。总统让贝克打电话，但是白宫接线员接不通以色列——线路全被在那里的人的亲属的电话占据。伊格尔伯格立即给以色列大使扎尔曼·肖瓦尔打电话，让他往家里发电报，说总统会被以色列的反击搞"废"掉。他再一次要求除了受到挑衅，以色列不要做任何事，让美国来作出反应。

与此同时，切尼设法接通阿伦斯。即使不能劝阻他们，也至少是一种争取时间的办法，他要求阿伦斯接受美国一个小组，以讨论

如何作出反应的问题。最后，在下午 10 点 40 分，贝克设法接通了沙米尔。此时我们才知道我们前面所得到的消息是错的，飞毛腿导弹并没有带毒气，也没有人员伤亡。从沙米尔口中，这点是很明显的，以色列一开始就克制住了自己。消息确证以后，我们叫切尼不要再派遣他的技术小组了。我们可以与沙米尔电话交谈，而不是在与阿伦斯的电话交谈的基础上作出选择。因此，当阿伦斯公开说以色列将进行报复时，我们考虑这主要是说给国内的听众听的。

这个电话之夜以“飞毛腿星期四”而闻名。没人吃过饭，所以我们把馅饼和三明治要到我的办公室。当危机的严重性有所缓和时，紧张气氛消失了，办公室开始充满轻浮的玩笑，贝克被起哄说写过下流的打油诗。这一晚对于我来说也是个教训——千万不要相信危机的第一个描述。早期的报道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错误或曲解的，把决定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上肯定导致严重的失误。困难是此外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不行动也不是个可行的办法——这是处理危机时的一个主要问题。

乔治·布什

第二天早晨我与戈尔巴乔夫作了一次很长的通话，他担心战争升级。当他试图让我停止空袭时，他的语气是忧郁的。“时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简单的。”他说。他们对萨达姆的怀疑证明是正确的，使用武力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是试图缩短战争的时候了。戈尔巴乔夫坚持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萨达姆在政治上已失败，而且多国部队对于他的武装力量和武装潜力已经做了沉重打击。“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他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还有什么目的？”它只能意味着更多的美国士兵与伊拉克平民的伤亡。

戈尔巴乔夫透露说苏联在巴格达的大使准备去见萨达姆，他已经指示他去问萨达姆，他是声明撤出科威特呢，还是准备接受进一步的军事打击。如果我们同意，他还可以将其动议公诸于众。

我告诉戈尔巴乔夫，在伊拉克攻击以色列后立即停止攻击，会使萨达姆声称他已经获得胜利，甚至使他变成个英雄。如果萨达姆的军队没遭摧毁，我们的阿拉伯盟友也肯定会把萨达姆视为这场战争的赢家。我们要继续打击，直到他自己撤出，并且在炮火下撤出。我解释说我们努力保护普通人的生命，仅仅瞄准那些试图摧毁的目标。戈尔巴乔夫争辩说空袭已经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战略目的，他敦促我考虑长远的政治问题。“我们显示了美苏合作。适时停止，想想伤亡”。我看不到萨达姆想履行联合国决议的迹象，而且，如果他想撤军，他一分钟内就可以达到，我们不需要为他提供任何东西。我想过停止轰炸，这是约翰逊与尼克松在越南战争中被迫作出的行动。但是这不能带来和平，只能给对手以集结力量的时机。我决不重复这种错误。

在中午的记者招待会以后，我与沙米尔谈话，告诉他我们将设法使飞毛腿导弹偏离方向。“我希望你把对付伊拉克的事情交给同盟国来办。”我说。我告诉他切尼向我保证将在 48 小时之内把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送给他。“我们工作得很努力，以使每一个同盟成员都能积极参加。”我补充说。他高兴了，说以色列有可能作出反应。“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在摧毁伊位克武器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说，“但是请考虑一下，我们不可能采取如此极端的立场，什么也不做(意指阿伦斯的声明)，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他的内阁将在 48 小时之内考虑这事。沙米尔想作出对等的反应，他要求我们之间“化解冲突”。我劝他忍着让我们来搞，虽然我知道这对他很困难。

日记，1 月 19 日

飞到戴维营后的整个晚上我都在计划着，当(早晨)1 点 30 分布伦特打电话告诉我以色列又遭攻击了，我顿时

觉得大事不好,他们正准备还击,他们想送100架飞机过沙特阿拉伯。当我们问沙特时,沙特人一下子火了,说这是不可能的。以色列的又一个选择是飞越约旦,用飞机或一些直升机,把人空运到沙漠去寻找导弹基地,要么用导弹。这肯定会使约旦不高兴。无论选择什么方法,约旦都受伤害。

早晨3点刚过我就打电话给沙米尔。飞越沙特阿拉伯或约旦打击伊拉克会损害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想你得在借道他国以外想别的办法,"我说,"你被导弹攻击,如果我要是没告诉你该怎么做,对于你来说反击也许是个方法。我只想作最后一次请求,承认让你忍耐是太难为你了。我们正在攻击你要攻击的目标。"沙米尔说他觉得以色列人不可能再忍耐更长的时间了。"我们的人民不理解。至于说到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必须寻找参战的办法。"

我告诉他我理解这些,但是以色列不能做任何我们尚未实施的事情。沙米尔说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我说,在三种可能的选择当中,用导弹还击可能是最好的。北方的某些飞机场可能在你的导弹的射程之内,向它们开火是对我们的努力的一大贡献——我还没与我们的军队商量这事,不过这些对于以色列所受的严重的攻击,可能是个比较适当的报复——沙米尔说他要跟他的同事商量一下然后再给我回话。

日记,1月19日

这天早晨后一段时间,阿伦斯说他们正在克制——今天晚上不再对伊拉克采取行动了。在与贝克、切尼、斯考克罗夫特、盖茨、苏努努、奎尔和鲍威尔的汇报会中途,我打电话给沙米尔,向他表示感谢。我告诉他我们正准

备派雷利·伊格尔伯格和一支高层防御人员去看看我们如何能帮助他们把防御搞得更好。我(如阿伦斯要求过的那样)给他送去一些对付飞毛腿导弹很好的爱国者导弹,他表示感激。

但是,如果今天,19日晚上,伊拉克再攻击以色列,我们就糟了。所幸的是,导弹没造成任何损失,它们仅仅吓到了一些人——最小的损失。我们拥有制空权——实际上拥有制空权。他们的反击几乎是无效的,伊拉克发了许多防空炮,但对我们似乎没有影响。我相信,全部只有10架飞机失踪。

幸运的是,那天晚上没有飞毛腿导弹。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送伊格尔伯格和保罗·沃尔夫维茨到以色列帮忙。我们一直保持电话联系。雷利准时到达,欢迎爱国者小分队和爱国者导弹,这是个有趣的巧合。不过紧随其后的是,沙米尔重复说如果攻击继续,以色列将被迫还手。阿伦斯补充说他不相信我们会全部摧毁飞毛腿的发射装置。他要求直接与施瓦茨科普夫联系,让以色列的一个队伍加入到我们的空军行列中来,或者至少,以色列将军在施瓦茨科普夫司令部办公。雷利很机智地拒绝了这些要求。

我被阿伦斯的责难所激怒。在军事上,我们把空军派去对付飞毛腿导弹的人数多达30%。不仅如此,我们与英国还准备派遣特殊队伍前往伊拉克的西部沙漠地带打击飞毛腿导弹基地——一个难以想像的危险任务。

伊格尔伯格之行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在劝阻沙米尔还手方面,这可能是个决定性的因素。无论如何,沙米尔自己还是极端值得信任的,这是他的一个最精明的决定。飞毛腿攻击不断,除了我

们对它们进行拦击之外，要使以色列的战鹰不出手，沙米尔处于极端的压力之下。在实施这种节制的时候，他打破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不能让恐怖主义的攻击行为不受惩罚。不管在别的时期中我们与沙米尔之间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他显示出自己是个坚定的、忠实的盟友。

乔治·布什

飞毛腿攻击以色列对我们的盟军也敲了警钟。赫尔穆特·科尔几天后打电话来说他计划送个使者到以色列以示支持。他还想让我知道，如果萨达姆对土耳其发动攻击(这似乎不太可能)，或对北约盟国发动攻击，德国将与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①。“直到目前你能够对赫尔穆特·科尔有所期望，”他说，“纵然我遇到(政治)麻烦，你仍然能够对我有所期望。”这是一个勇敢的诺言，因为德国的任何军事行动，甚至是对土耳其的行动，都可能使科尔付出他的地位的代价。我知道他想做得更多。

日记，1月19日

现在一个很微妙的争论在媒体方面产生了。什么样叫做够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退出？打击要持续多长时间？美国广播公司的民意测验显示对我、当然也是对军队的很大的支持率，赞成政府决策这样一种压倒性的情感正在这个国家出现。我从中得到了某些满足。但是网络仍然在抗议，我担心这会给海外的士兵们送去错误的信号。

---

①　德国与意大利、比利时一样，最后派战斗机到土耳其，作为北约第一次组建的欧洲多国机动部队的一部分。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1月20日,萨达姆开始在巴格达的电视上炫耀被俘的多国部队的空军士兵。他们显然受了酷刑,伊拉克人正在把他们当作潜在的靶子。他以前以同样的手段对待平民人质,我们又一次拒不让这种情况干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还试图控制在巴格达的外国媒体。同一天伊拉克人让战俘上电视,外交部让所有外国记者离开巴格达,但特别地让彼特·阿涅特和有线新闻网留下。萨达姆显然是有线新闻网的经常观众,图果·厄扎尔曾跟总统说伊拉克领导人似乎把有线新闻网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别的记者都被下令离去而偏偏让他们留下。伊拉克人花很长时间与有线新闻网记者谈论导演好的事情,记者便记下了他们所说的一切。

乔治·布什

我对这样的论证感到讨厌,这种论证是,一般说来只有媒体是不偏不倚的观察者,而且只有它才蔑视两个势不两立的政党。我对这种立场的逻辑表示怀疑。就是这些人掩盖了一场美国在其中具有利害关系的战争。我有一种惊异的感觉,他们希望证明五角大楼犯了某种错误。当我知道记者尝试着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美国人民在他们的有选择的报道重点中看到的是对美国利益的偏见。我知道我能看到这点。

我对彼特·阿涅特的报道看得越多,就越觉得他的报道是一面之辞,而且落入伊拉克人的圈套。在2月11日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当他谈论里根统治下的白宫的"审查"或"新闻控制",并将其与他在伊拉克的工作条件比较时,他的偏心与敌意就露出了马脚。(在这些记者被开除以前)对这个问题我倾向于英国人的态度。他们的记者可能会说"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些",或者"请动用你的想像力",这清楚地表明审查是严厉的,他们掩盖了好多。有线新闻网在屏幕的偶尔的切入表明,除了允许送入他们的电波的图

像和宣传外，伊拉克的审查者们不允许别的任何东西进人。一个有争议的例子是阿涅特报道了对伊拉克坚持说是“儿童制药厂”的空袭，这个制药厂我们的理智表明它实际上是个制造生物武器的工厂。这在有线新闻网和国防部之间产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阿涅特强调声明伊拉克人向他表明那个工厂就是他们所说的儿童制药厂。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纪念空袭五周年时，有线新闻网播出了一档回忆节目。作为这个节目的一部分，有阿涅特回到巴格达一家被轰炸的工厂，他手里竟然拿着一包奶粉。他再一次肯定他的在伊拉克描述过的关于这家工厂的信念，并补充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一个派去调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小组——从来没有调查过这个工厂，甚至没有将其列人可疑基地的名单。节目播出后一天，我收到鲁道夫·埃克埃斯大使，也是联合国特委会的执行主席的电话。埃克埃斯是我在海湾战争以后经常见到的人，他刚刚看了节目，希望我知道阿涅特是在瞎说。那个基地不仅被检查了，而且事实上，它现在仍然在特委会的监测名单上，因为在那里存在可以双重使用的设备。怀疑之处是该工厂可能生产生物武器的材料。特委会甚至从伊拉克的记录中发现两个来自技术研究中心的工程师于1989年被派往这个工厂一段时间，这个中心是负责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军事工业公司的组成部分。埃克埃斯进一步说，当更具优先性的任务（检查可能还在活动中的基地）完成以后，对此处工厂将作进一步的调查。

乔治·布什

日记，1月24日

战争第8天，晚上芬兰浴，我的嗓子哑了，我估计感冒了，不能动，好像什么东西都在晃动。我担心布伦特·

斯考克罗夫特。他整个晚上——好多好多晚上在办公室工作,我担心他的身体。我打电话给医生,医生下来对斯考克罗夫特说,总统得了流感,发烧了。而这个家伙就是不肯回家照看他自己。

我从韦伯斯特和盖茨那里听到报告说伊拉克人让很多石油从科威特的油井流出来,大量的原油流进海湾。我记得报告说比维尔兹油田的五倍还要多。伊拉克人还在焚烧很多被油流满的小沟,我想这会进一步激怒世界舆论。这种燃烧——实际上是烧地政策——使土地变得荒芜,现在也是烧海政策,使海变得荒芜。我担心沙特的淡水工厂,我担心海底生物,等等。

我最后叫上布伦特一起去戴维营度1月25—27日的周末,在那里我们可以充分地监督他,使他去休息、放松。他很勉强地与他的助手弗洛伦斯·格兰特来了,带上了一大堆文件。他不是休息,而是工作,他手里拿着电话,腿放在火炉旁,虽然在这里他比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多休息了一些时间。戴维营的美丽与安静一直是使人放松的,不管外界的压力有多大。

亚历山大·贝西默特尼耶克1月28日按时到达华盛顿开始他作为外长的第一次访问。虽然波罗的海问题正在商讨中,他带来了戈尔巴乔夫的关于波罗的海的信,但在这里讨论最多的还是海湾问题。与贝克会谈时贝西默特尼耶克是坦率的。苏联人对多国部队轰炸人口中心表示愤怒,虽然很明显我们很小心地挑选轰炸目标,并且使平民的伤亡减到最小程度。当我们攻击巴格达而不是对准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时,他们指责我们把战争扩大到联合国决议之外。就如空袭第一天戈尔巴乔夫所作的建议一样,贝西默特尼耶克建议放眼战后的中东局势,现在到了谋求政治解决的时

候了。苏联人正在考虑向安理会提交一项提议，要求中止轰炸。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可能给伊拉克以喘息之机，使他们重新武装，同样可能给伊拉克一种建立政治动力的机会，因为停火将允许萨达姆撤出科威特而其军队不受损失。当第一次会晤结束时，贝西默特尼耶克提议把他们的会谈结果表示为联合声明，与8月份在莫斯科、9月份在赫尔辛基的会谈情况相似。贝克含糊地处理这件事情，他让贝西默特尼耶克带着草稿回去。

乔治·布什

1月29日，我花了部分时间准备我的国情咨文讲话稿，将在当天晚上发表演说。当我正在白宫的底楼化妆的时候，布伦特带着令人惊异与困惑的消息跑进来，说贝西默特尼耶克刚刚向媒体宣读了一份美苏联合宣言，其中有一句是“我们继续相信”如果萨达姆做出一个撤出科威特的“明确的承诺”，并采取立即的与必要的步骤完全履行安理会的决议，那么停火是可能的。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在一个可能是最坏的场合得知联合声明的事情。无论是我还是总统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贝西默特尼耶克到华盛顿来寻求的就是联合声明，但是我们不想，特别是不想要苏联人喜欢的这种声明。照我的理解如果必须作出什么的话，贝克是想拖延的，但他这样做是无害的。

大约在那天晚上7点30分时，我向白宫的记者们就国情咨文中的外交政策作背景方面的说明，我解释了总统可能对战争持有的观点，有记者问我如果萨达姆承诺从科威特撤军我们是否会同意停火。当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说无条件地撤军是伊拉克的惟一道路时，提问者问我的回答与贝克、贝西默特尼耶克的承诺撤军可以导致停火的联合声明是否一致，我被惊呆了。我不知道贝克说了些什么，我只是含糊地说我不曾看到贝克的声明所以无法对它

进行评论,但是我陈述了总统的政策。问题是:"贝克没有和我们保持一致?"我只是简单地说在我没有看到他的意见之前我不可能说得更多。

我感到不快。我完全被晾在一边了,而且怀疑我们的政策是否出了什么问题。我首先要做的是告诉总统,以免他像我一样被难住。我实在不想在那么重大的事情之前把他心情弄乱,但是他需要受到保护,以免可能的窘迫。当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他的时候,虽然化了妆,他的脸色还是变得煞白。然后愤怒——就像我以前所见过的那样——开始升起。但是这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通过国情咨文讲话而不是争论对伊政策。因为不知道贝克到底讲了些什么,我们同意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政策没有改变,从而简单地把其放过。结果这种方法奏效了。

乔治·布什

听到这个声明,我变得狂怒。这意味着我们要因为萨达姆的诺言而接受停火,其结果就是,我们从入侵一开始就要求的无条件撤军的立场上作了某种退步。更糟的是,这项声明还把停火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紧密结合起来。如果说我们以前公开贝克与阿齐兹举行会晤的建议使我们的国际盟友感到不快的话,这种声明肯定会使他们感到恐慌。当我到达国会时,议长劈头就发难,问"有什么新的和平建议了"?我们发现那项声明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我们赶忙补救与国会的裂痕。所幸的是小风波不久便平息了,没有产生更大的损害。我知道吉姆并不想"蒙骗"我,他很快就向我道了歉。

在发表国情咨文那天,在围绕贝克与贝西默特尼耶克声明的一片喧嚣当中,伊拉克向沙特的边境小镇卡哈夫杰发动了攻击。那时候特别在白宫,还不清楚攻击的目的不仅仅是个试探,而且是萨达姆把我们拖进流血的阵地战的图谋。战斗不大,但是海军陆

牲了12人,他们其中有11人温和地开了火。这是第一次地面部队的冲突,它唤起了对这个倒霉的事情的注意:我们是否要开始地面战斗,何时开始?使用地面部队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去的军事命令变得很明确了,总统老早就得出结论说这是这场战争的必要部分。

乔治·布什

批评者所提出的反对地面战争的论据或"常识"是,为什么要打萨达姆的牌?为什么要让他的地面部队加害于多国部队,使之有无数的伤亡?为什么不让空军做这事?他们的这些考虑我都思考过。我不懂的是为什么萨达姆敢面对我们强大的军队而让他的军队遭受毁灭。我不认为伊拉克的军队能如萨达姆或我们的批评者所想像的那样对我们的军队造成那么大的损害。听了一遍遍的情况简报以后,我确信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多国部队最小的伤亡摆平这事。此外,这点也很重要,要使这个地区安宁,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伊拉克对这个地区的未来所产生的威胁。空军只能做那么多。

我并不怕作出地面战争的决定,我已经下定决心。我知道双方都会有伤亡,而且是很多的伤亡,但是我确信我们会推进得很快,在一个星期之内缴伊拉克军队的械,完成这项任务。我仍然担心的是化学武器,在轰炸以后我们对共和国卫队力量的估计的准确性。于是在我面前的问题实际上是进行地面战争的时间——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依赖作为引导者的军队。答案完全依赖于他们的准备情况:什么时候空军做好他们的事情,什么时候步兵司令说准备好了。在我这里,我有两方面军队的热线,一旦军队说准备好了我就可以下命令。我可能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去准备——但是一旦准备好就立即开战。我感到了结束这场战争的紧迫感。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对于地面战争我也早就变得不耐烦了，我从来不抱有空军独自就可以把事情做好这种观念。地面战役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是关键性的，不过我们以往一般是过高估计它的重要性——我觉得部分出自于愿望性思维。在去年秋天的军事战略的讨论中，我们讨论了空战的作用与时间问题。我们预想空袭能够摧毁伊拉克的空军力量和空军防御系统、指挥控制系统、通信设施，使其军事力量软失效（例如摧毁他们的重型装备或挫伤他们的士气）。这些任务大约需要2—4周，在这以后我们就可能开动我们的地面部队把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赶出去。空袭的效果比我预计的要好，表明进攻的日期可以更早些，但是军方对开始地面作战显得勉强，虽然中央指挥中心自己对轰炸的估计也是乐观的（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相比）。我觉得现在正是时候，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和同盟完好的情况下乘胜前进。媒体对我们是否击错了目标还在发出疑问，觉得我们把炸弹仍在粗石堆上了——一种受到伊拉克宣传滋养的臆想。

但是切尼和我仍然认为，不管空袭获得多大成功，地面战斗还是必要的，因为地面战争对于摧毁伊拉克的进攻性力量是必须的。它也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虽然在和平解决尚有希望的情况下不允许将其公诸于众。另一方面，贝克对于空袭可以使萨达姆撤军仍然抱有希望。如果他开始撤了，吉姆争辩说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再企图进行地面战争，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在世界舆论中的支持率。总统让我召开一次核心成员会议来讨论这事。

我们于1月31日开会，虽然讨论更多地是提出别的问题，而不是集中于发动进攻的时间上（时间被推迟了）。如果萨达姆·侯赛因现在就停止而其共和国卫队丝毫未损，这将怎么办？我们对他个人怎样处置？伊拉克如果使用化学武器怎么办？12月24日在戴维营时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排除我们自己使用的可能性，但

是如果伊拉克采取这个手段，那么我们的反应将视情况而定，而我们将让伊拉克的师长们负这个责任并把他们带到军事法庭受审。没有人提出使用核武器的观念，即使在受到化学或生物武器报复的时候总统也拒绝使用它。我们很小心地避免说或不说在地面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相威胁这件事情，因为用你根本就不打算做的事情去威胁别人是不合适的。在公开场合，我们让这个问题模棱两可。没有理由破坏有可能出现的威慑力量。

乔治·布什

至于如何处置萨达姆本人，我担心他有可能在这场使其虚弱的战争中东山再起并且作为一个"英雄"继续在位。我们再一次讨论是不是要追杀他。没有人介意他会不会在空袭中被炸死，不过要抓住萨达姆是极端困难的，因为他以跑得快和防卫极严著称。我们在巴拿马抓诺列加时就遇到过问题，而那个地方是我们所熟悉的。萨达姆要难以捉摸多了，他的防卫也要好多了。我们能做得最好的就是能炸到他有可能在那里的指挥和控制据点。这有很多，不过都在我们的攻击目标之内。我们后来听说萨达姆在多国部队的空军攻击中被一个护卫抓住，但后来没受伤害跑掉了。

日记，1月31日

我一直在想伊拉克人民应该用军队来对付他。眼看他们的军队与装备被毁灭——他们的确应该做点什么。我真希望……这是场战争，如果他在他的司令部里被炸弹炸着，将是很糟的。但是我似乎觉得，伊拉克人民忍受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有某人站出来做老早就应该有人做的事情——把这家伙除掉——要么把他踢出国内，要么做出让他不再能左右形势的事情。

我坚信我们不能开进巴格达。我们公开声明的使命，正如在联合国决议中所陈述的那样，是很简单的一件事——结束入侵，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的政权。占领伊拉克有可能迅速破坏我们的联盟，使整个阿拉伯世界反过来反对我们，使那个被击败的独裁者日后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这也可能使我们的行动超出安理会所使用的国际法准则之外，把年轻的士兵派去追捕一个处于非常牢固的安全防范地位的独裁者这样一种毫无结果的工作，会使他们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城市游击战之中。这只会使世界的这一部分陷入更加动荡的状态，从而毁掉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信誉。

即使萨达姆能活过这场战争，我觉得我们至少能够保证他的军事力量被削弱或被毁灭。我考虑的是他可能在我们碾碎他的盔甲和重型装备之前撤出科威特，而这是需要动用地面战役做这件事的下限——而且早比迟好。我们的结束战争的条件扩大了，为此我们可能遭受某些批评，但是我不能听任伊拉克的军队丝毫未损。

2月1日对于我是个令人感动的和情绪化的日子，我视察了三个军事基地，看望我们在海湾服役成员的家庭。我的第一站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切丽坪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在我们登陆的时候，我尽力使自己坚强起来，因为我知道这将是个痛苦的经历。战争对那些有人被送往海湾的家庭有何影响，我所遇到的情况是一个真实的写照。事实上，所有的年轻人都走了，人群主要是女人、孩子和老年人。我不相信在向他们致辞的时候我会不哽咽与垮掉。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寒风吹着我站在其中讲话的飞机棚。我们在海湾大约有8 500名海军士兵，他们中有几天前在卡哈夫杰受伤的人。当我听说在我面前听我讲话的人当中有失去丈夫的妻子时，我便想牺牲已经做出了。当我念我的评论的时候，我对我自

己说"要坚强,不能哽咽"。但是当我看到有些妇女的眼泪从她们的脸上流下来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我的情绪在上升。我试图把眼睛从她们的身上移开,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凝视她们,当我努力继续我的讲话时,就觉得什么东西哽在喉头。我也试图不长时间地盯到孩子,十多岁的正在哭泣的女孩,以及盯着正在敬礼的海军士兵看。这是我惟一能够挺住的办法。

讲话以后,我会见了许多妻子。她们都是了不起的坚强,支持她们的丈夫并以他们为骄傲。这里没有自哀自怜,每一个人都直视我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的丈夫知道他为什么在那儿,我们支持你"。有些人给我信件,有些人给我针和带子,她们中的许多人找芭芭拉。在切丽坪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受感动,我感激我们的海军及其家属的勇敢与爱国。当我回到空军1号时我对旁边的士兵说我到这里来本来是想鼓舞部队的士气的,但是结果却是另外一种——他们鼓舞了我的士气。

第二站是戈登斯波罗的塞谬尔·约翰逊空军基地,也在北卡罗来纳州,是第四战术战斗机部队,第68、第916加油站。在那里我的情绪仍然很高涨。我又一次试图读完我的稿子而不垮掉。但是当他们唱"星条旗",或者他们向你敬礼示意,或者当你听到一个小孩喃喃低语说"把我的爸爸安全带回家"时,不垮掉是很难的。

我会见了两个其夫失踪和两个其夫被俘的妻子。这四位女性的勇气使我备受支持,她们没有哭。我所会见的所有家庭都说着同样的话:我丈夫(我爸爸)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为了他的国家做了他应该做的。没有不同的声音,我没有看到任何抗议的迹象或者听到任何抱怨。我又一次感到情绪上的宣泄与升华。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佐治亚的福特·斯图尔特、第24步兵(机械)师的营地,该师在前线,而且是最早派遣的部队之一——他们在那里已经5个月了。在几周前我与他们中一些人共度了感恩节。现在我听说当他们8月份休假的时候,受到了热烈欢迎。当

他们驶过站点时，周围城镇的人民夹道欢迎他们，甚至在州际高速公路上迎接他们。我再一次作了讲话，并设法与一些家庭待上一段时间。当我离开这最后一站的时候，我的情绪高昂。我庆幸我的出行，感激在华盛顿的环形公路之外，在媒体的过滤之外，对这场战争对那些将生命放在战场上的美国家庭的影响进行这一严肃庄重的一瞥。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2月3日，星期天，我们的核心小组又一次在白宫开会，讨论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地面战争。总统在流泪，他不想做个凭空臆断的军事专家。这时候在他脑海里的仍然是越战中林肯·约翰逊的生动形象，他向前移动航空表，选择单个物体作为空袭的目标。另一方面，政治形势却变得很糟，同盟可能已经瓦解。现在我们的主力已经集结，似乎已经没有再拖延的理由。两个多星期过去了，空袭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预定使命：总统——还有我——的焦虑与日俱增。我们的军队推迟地面战争的倾向给伊拉克人造成了挑拨离间的机会，也给苏联的外交主动创造机会。

乔治·布什

在会上，鲍威尔解释说施瓦茨科普夫预测至少再有两个星期的空袭陆地战才能开始。这个消息使我感到不安，因为我想这有可能给萨达姆更多的时间借助停火来摆脱他的困境。有人认为我们还没准备好，而我们又要作出何时作战的决定，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权衡。鲍威尔提出与科林斯一起去沙特阿拉伯见施瓦茨科普夫。他们可能于星期四出发，离现在还有四天。我立即同意了。

日记，2月5日

宣传大战已经开始——说我们追击平民——你可能

听说(我们打中了一个卡车司机)他正躺在约旦的医院里。他(在伊拉克)沿着高速公路行驶,这条公路的高架桥下面隐藏着使以色列恐惧的飞毛腿导弹,而媒体似乎很同情他,至少他们一遍遍报道说炸弹落到了卡车上,它首先不可能拖运石油。

日记,2月6日

媒体会议今天开得还算好,但是我担心他们对平民受伤的事实进行歪曲、夸大、编造,而竟然还有人支持他们。(这些所谓的平民)他们大做特做的是这些事情:埋地雷、烧战壕。记者们不知道的事情是我们得绕道而行,但是不管如何这是个最坏的事件。沙漠中的几十万颗地雷会告诉你些什么。每一颗地雷对着每一个多国部队的战士,把它们排除掉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当他们报道我们冲锋陷阵的士兵的这些最糟的事情(伤害平民)的时候,他们不理解这些士兵正在四处出击,切断在科威特的伊军的退路,使他们无处可逃。伊军的给养将被断绝,而我们的军队将有能力处置在伊拉克南部的共和国卫队的残余。

第二天,切尼与布伦特和我讨论他的沙特之行。我告诉切尼说我认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我希望施瓦茨科普夫已经准备好了。但如果问题是我们再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使军队轻松些,还是提早一个月开战以消除由轰炸和同盟变弱带来的政治风险,我情愿在军事方面犯错误。迪克说他已经明白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去做了。

2月9日,我把我的地面战的想法与荷兰首相拉德·柳伯斯交

流，在世界政治领袖中，他是我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也是我经常讨教的一个人，他的智慧是我可以依赖的。我想问他欧洲人对地面战持何种立场。我透露我对萨达姆宣传战的担心，这种宣传战说我们被战俘的待遇所激怒，枪击平民百姓。拉德认为宣传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至少在荷兰和它的邻国。“我们欧洲人希望，虽然地面战可能是必需的，但是应尽可能用空袭。他的地面优势被削弱一点就好一点，因为它意味着他一天天削弱”。如果有人得出结论说地面战太早了，那么地面的攻击就会造成同盟国的不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消耗战反过来起作用，可以使我们走得更远些。“我不认为光凭空袭就能把事情做好，”他回答说，“但是从政治的角度说，地面战越晚越好。”这是一个极好的观点。我说：“我保证除非我们确信它能速战速决且多国部队伤亡很小，我们不会使用地面部队。”

不过，推迟军事行动的政治风险还是越来越大了。戈尔巴乔夫声明他将派普里马科夫到伊拉克，希望停火。苏联大使那天也带着一项建议会晤贝克。苏联人担心“战争的逻辑”会导致我们超越联合国决议的范围并导致更多的平民的伤亡。他们也担心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攻击会使战争不断升级。也许戈尔巴乔夫的话只是为了抚慰他的穆斯林选民，因为他一再提醒我们在伊拉克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与他们国内事务相关。还有，我们害怕苏联人在伊拉克尚未完全履行联合国的决议之前加强他们的停火努力。谢瓦尔德纳泽已经不在，对于右翼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让他干预、拯救他的老伙伴，已经不存在制约力量——莫斯科退出同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普里马科夫向萨达姆转达的建议与空袭开始后第二天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并无二致。萨达姆可能会声明将撤出科威特，然后同盟国将停火。幸运的是，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

乔治·布什

我们与阿伦斯的会晤是困难的和不愉快的。虽然我们立场一致，但对于如何对飞毛腿导弹作出反应，仍然是各执己见。他很情绪化，甚至发怒，他对损失的陈述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是夸大其辞，他要求我们共同进行报复。当他说我们没有摧毁伊拉克西部的飞毛腿导弹基地而以色列将有所行动时，我很恼怒，更激怒我的是以色列人，至少是他们的强硬派，似乎对于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很少表示谢意。

那天下午，切尼向我汇报了他的沙特阿拉伯之行的情况。在我们进屋的时候，迪克对我说，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对于行动的最后方案已经达成一致。军方打算于 2 月 21 日开火——距离现在 10 天——大约中间可以停火 3 天。施瓦茨科普夫对于具体日期不想太刻板，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议上使其他人都清楚时间尚未确定。我告诉他们两人我们必须知道得更早些，更确定些，这样我们好通知我们的盟友。

在 12 月份第一次勾画的行动计划现在被定下来了。可能向西侧发动进攻，优势在于我们的大部队可以调向伊拉克的主力，切断它的退路，并且从侧面、从后面向它发动攻击。我们的其他部队可以调向中部和右侧，还有一些师也可以从海上推进。所有的调集在几天之内就可完成，对此军方有信心，或者至少伊拉克军队，包括共和国卫队，可以在科威特境内被切断，防止他们向北逃窜。伤亡很小就能把这事做好，对此迪克和科林都抱乐观态度。多国部队的空军要对伊拉克的装甲兵发动攻击，这是我所担心的。当科林向我汇报时，他传达了一种非常有感染力的自信。他一直是一个愿意做必须做的事情的人，而且现在我觉得他实在是个很有热情的人，我觉得这次攻击能以很小的代价完成得很好——虽然我还在问自己对于那些儿子或女儿被杀死的家庭来说，很小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我把这种争论化为一种更大的确定感：这场战争

必定速战速决。

确定进攻日期还有其他更迫切的理由。2月12日深夜，我们收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空军在巴格达的市区炸毁了一座几层楼高的暗堡，成百个伊拉克平民被炸死。我们知道这个暗堡是伊克军事情报的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但是我们不知道平民被拉来作为空袭的挡箭牌。当我看到尸体从暗堡中挖出，有少年人和被烧焦的儿童时，我心痛。我的心因为人类的不幸而受到伤害，而不管不幸在哪一边。当关于死伤的媒体报道和电视图像传进来的时候，我问比尔·韦伯斯特我们有些什么关于那个暗堡的消息。他证实我们的所有情报都表明它原来是留给军事情报机构用的，但是很明显伊拉克人开始把一些楼层给平民住[1]。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中，比尔补充说报告表明，在未来伊拉克的所有暗堡同时用作民房。很明显，萨达姆计划用悲剧作为策略。他看到了他的平民被杀死的宣传价值，所以，虽然许多暗堡是合法的军事目标，但是他故意把平民安排进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残忍而堕落的行为。这个悲剧的直接后果就是公众对空袭还要持续多久的疑问——暗示着我们已经偏离了目标并且变得不顾一切。战争何时才能结束？另外就是改变目标，以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人类的和人际关系灾难的可能性。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当我们在华盛顿开会时，普里马科夫在巴格达也忙开了。2月13日晚上，我们听他报告说萨达姆为了和平愿意“合作”，只是合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还不清楚。第二天我们收到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说普里马科夫已经告诉萨达姆，他必须撤军。普里马科夫报告说已经有了某种“令人鼓舞”的迹象。很明显，萨达姆仍然有兴趣对其撤军设置条件。戈尔巴乔夫因此邀请塔利克·阿齐兹到

① 后来来自伊拉克情报部门的一个文件证实，这幢楼的一部分被军工部门使用。

莫斯科进一步会谈。他要求停止轰炸，并小心地补充说他希望阿齐兹在莫斯科的时间内不要有地面战争。说来说去，没有新东西，或者说至少没有向无条件撤军更进一步。我想戈尔巴乔夫的莫斯科会谈时不要有地面战争的要求，很明显意味着停止或拖延地面战争。

我相信戈尔巴乔夫这些调停努力的首要目的是恢复某些影响，和支撑他在国内的已经发生动摇的政治力量。他在为他的政治生命而奋斗，寻求一个主要的外交政策妙计来获得名声。我们阻止他的努力是悲伤的而不是气愤的，我们非常艰难地、尽可能温和地在不使之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否定他的提议，这是一个困境。戈尔巴乔夫在帮助我们集合国际力量对付伊拉克、孤立他们原来的伙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对于他和他的困境感到极大的同情。但是我们不能让他干扰我们的海湾政策以及在关键时刻我们的选择。

乔治·布什

2月15日，星期五的大清早，白宫的一个职员走进我们的卧室，我和芭芭拉正在看报纸和喝咖啡，他汇报6点30分伊拉克方面可能有个声明。我打开电视机，焦急地等待6点30分的到来与过去。最后，主持人插进来报道说伊拉克声明说他们将履行660号决议，包括从科威特撤军。我没有感到高兴，而是感到心情沉重。

我录下了我的反应：

> 现在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们的情绪不是高兴，我们在做一件尚未完成的事情。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如何能保证以后的和平？我不知道萨达姆在位子上会发生什么，我非常非常怀疑。切尼打来电话，和贝克一样，在6点40分，我鼓励他们继续向前

走，继续前进；现在不要让任何事情改变正确的决定。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对于这种提议我们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应变计划，并且和我们的盟友一道用军事标准对萨达姆的行动的真实性提出一系列的“测验”。我们从来没有采用这份应变计划，因为他的手法是明显的。不过，我对这件事情一直挺关注的，即他有可能提出一项你无法不顾的建议，这个建议可能一时阻止敌对行动，从而使他的部队几乎无损，甚至他会提出部分或完全撤出科威特的提议。一旦我们停止战斗，如果他的提议是一个骗局或难以实施的，那么就很难回到原来的各种布置上来。伊拉克声明的含糊性似乎证实了我的最坏的担忧。后来，电报传来了声明的全文，总统、贝克和我，后来苏努努和奎尔也进来了，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了个小型的商议会，一页一页地研究声明。当声明一段段被打出来的时候，要求越来越多，包括我们要重建伊拉克，我们从海湾完全撤军，以色列问题要解决，要对以色列实施制裁，黎巴嫩问题要解决，等等。我们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他就很容易说不。马林·菲茨沃特提议立即向媒体发个声明，指出“出价”与同盟国的要求相距太远。而且，声明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地面行动。早晨，我们检查盟国的反应，似乎没有人受到影响。一直在折磨我的是，萨达姆从未作出一个可以使他脱身的、即使貌似有理的表示或提议，他想为我们设下圈套。

乔治·布什

我按计划10点左右在老行政大楼发表一个讲话。在我的评论中我赶忙加进一个对萨达姆声明的回应。我称声明不过是萨达姆的一个残酷的把戏，“使伊拉克人民和世界的和平希望破灭”的把戏。我感情冲动地加上我所称的“结束流血的另一种方法”：伊拉克人民与军队干掉萨达姆，重新加入热爱和平的民族的大家庭。我焦急地等待这件事情的到来。这可能有点冒险，但伊拉克人民

也许会响应。几乎同盟的每一个领导人都对我说，挫败了萨达姆以后一定不能再让他在位子上。这些话在媒体中立即闪出一连串问题：我们是否增加了一个新的目标：刺杀萨达姆。我们没有这个目标，虽然两天以后在我对媒体的讲话中引用了约翰·梅杰的话，我们不会对他心慈手软。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这种没有限制的冲动，在我看来，不公正地导致了这档谴责，说布什总统鼓励伊拉克人民反对萨达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在冲突结束的时候，又无法继续对他们的帮助。我们希望萨达姆下台，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从来未想过在军事以外这件事能做到，也从没有试图煽动普通百姓来干这件事。我们的观点被曲解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想像华盛顿的讲话就影响到伊拉克的不满现状的人，并成为后来什叶派穆斯林与库尔德人行动的动力。

乔治·布什

2月15日下午，我飞抵肯尼邦克波特度总统日的周末。那个星期天，我与切尼谈话。他报告说军队仍然在敲定攻击的时间，不过看起来他们准备好了在1月23日以前发动攻击。

日记，2月18日

时间在流逝。上帝保佑，我希望鲍威尔和切尼现在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但是他们没有，我不打算去催他们，虽然今后几天充满困难。外交损失没有扭转，但是在他们没有说已经准备好之前我不会下令让他们进攻。今天上午我告诉斯考克罗夫特我想与切尼、鲍威尔、贝克，以及我们所有人下午4点30分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他说好。也许我能搞清我们到底准备得怎么样了。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那个星期一是总统日，当我们全聚在椭圆形办公室时，大楼的西半边就空掉了。那是个阴冷的夜晚，大房间显得尤其冷。总统决定升火议事，我们就在火边记例行的日志。当我们开始议事时，烟雾突然注满了房间。一个警铃叫了起来，保安人员迅速冲了进来，端着枪做着准备行动的姿势。总统忘记打开风扇排烟了。

当我们再坐下来议论时，戈尔巴乔夫的电报来了，是关于他与阿齐兹会谈的情况的，还提出了另外一项建议，还是老调重谈。伊拉克人会声明他们撤军，履行撤军要有一个特殊时间表，而且从停火的后一天开始，军队必须无条件地不受攻击。戈尔巴乔夫对他们说任何一种联动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在撤军以后，有可能会有联合国的一个新决议，而且苏联会推动联合国处理整个问题，包括黎巴嫩问题以及阿拉伯-以色列争端。苏联人仍然在越来越绝望地寻求避免地面战争的途径。我们，特别是贝克和总统，不想让苏联人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也不会离开我们的目标。问题是我们如何礼貌地对苏联人解释我们为什么不采纳他们的建议。

我们讨论如何作出反应。如果萨达姆在其大部队未受损失的情况下撤离，那么我们的确没有赢。这个建议还有其他问题：没有提到恢复科威特的王室，没有提到要履行其他决议，如赔偿。我们讨论了这个想法，即给伊拉克 96 个小时让他们完全撤出科威特，我们觉得这是对其立即撤军的一个"测试"。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立即向北移动并把其重型装备丢下，但是我们对这种办法也不是很热衷，因为让他们自己撤军，难以监控。结果，我们给了戈尔巴乔夫一个临时答复，感谢他，我们对他告诉我们这个提议感到高兴，但是敌对不会停止。

第二天，2 月 19 日一大早，总统一遍遍看戈尔巴乔夫的信，决定暂停行动。我们再一次聚集椭圆形办公室，讨论出一个更加正式的回答。我们决定在伊拉克必须履行的联合国决议之外，我们

提出4条标准以让其显示其善良信念：除非完全撤军决不停火，不再发射飞毛腿导弹，不用化学武器，立即释放战俘。总统在一封给戈尔巴乔夫的信里描述了我们的目标的要点和条件，并对他的努力表示感谢。

乔治·布什

后两天我们在等待我们的反建议的答复。我这边有好多外交事务，与密特朗、马尔罗尼、奥扎尔、穆巴拉克通话，向同盟国通报我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答复，使他们与我们团结一致。接下来就是使人不安的间歇期。和平之球还在天空，我担心不要有一个新的糟糕的行动。事情更复杂的是，我们得到情报说阿齐兹不愿意将我们的反应告诉萨达姆。最后，在2月21日早晨，萨达姆作了一个很长的电视讲话，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新的愿意实现停火、愿意让步的声音，虽然提到了从科威特撤军的问题。大约下午2点钟，密特朗打电话来，认为已经没有谈判的机会。

那天晚上，当我正准备去福特剧场观看慰问土斯基空军士兵的演出时，戈尔巴乔夫又打电话来，通报与阿齐兹进一步会谈的情况。他似乎觉得有了突破。伊拉克愿意撤军，但是要在停火以后。他建议我们在撤出2/3的军队以后加强制裁。没有提到赔偿问题，也没有提到战俘，或者余下的伊拉克军队怎么办的问题。这不是我们所要求的无条件撤军。我与戈尔巴乔夫通了近半小时的电话，尽我所能记下一切。我叫来鲍勃·盖茨，他正在代替布伦特，让他召集所有人商讨对策而我自己要去看演出。在整个演出中我坐立不安，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能让萨达姆从肯定失败的境地中攫取胜利果实？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迪克·切尼和我都如期出席为丹麦女王举行的晚宴。在总统回来之前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所以迪克和我商量好由他代表我们俩出席后来的宴会，我起草给戈尔巴乔夫的回信。汉斯起草一

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稿，贝克从国务院的角度起草了一个文稿，都拒绝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当总统回到他官邸的办公室时，我们出现在他面前就如裁缝的展品。切尼带着黑领结，我们几个穿着礼服，鲍威尔从家中过来，穿着高领毛衣。总统对每一个稿子都不满意，觉得语言太强硬。我们拒绝了妥协，为提议定了个最后期限，强迫萨达姆顺从，基本上是个最后通牒。这是一个请求宽恕，摆脱毁灭的办法。我们改变了各自为阵的办法，决定大家一块讨论有可能把我们"将"住的事情。一直存在着萨达姆让步的危险。在我看来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当口，执着于某一种答案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这是行得通的办法中最好的。

乔治·布什

第二天，2月22日，我与密特朗说及声明之事。他建议作些小的修改，我们照做了，他还提出所有的同盟国同时发布这个声明。当我们在谈话时，盖茨递给我一个报告，说伊拉克人正在毁掉科威特的所有石油生产系统。"如果还有不再拖延的理由，或者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不是依好的信念行事，这个报告就是个依据，"我对密特朗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能继续通过苏联人谈论和平却又干出这种事情来。""我对他一点也不相信，"他称，"你的声明很好，我只作些极小的评论，法国完全承诺沿着与你们相同的方向前进。"

布什总统在作声明之前试图与戈尔巴乔夫联系上，但是当他在10点20分左右打电话时，这位苏联领导人不在。半小时以后，在玫瑰花园，总统继续打电话，阅读了一些关于我们反应的简短评论，承诺发布一个关于我们所要求的特殊条款的完全的声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说除了一点点附加条件外，伊拉克答应无条件撤军。在另一方我们看不到任何善意的证据，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确信他们的行动会支持他们的言词。伊拉克在科威特正在实行烧

焦政策。此外，纵然阿齐兹在莫斯科谈判，伊拉克却不停地发射飞毛腿导弹。我们的要求中的最重要的一条是萨达姆必须在美国东部时间 2 月 23 日中午(第二天)"做他必须做的事情，立即并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我们必须公开地、权威性地听到他接受这些条件"。

11 点刚过，戈尔巴乔夫回电话表示道歉，说他刚才在一个庆祝苏联建军的电视直播节目中实在无法脱身来接总统的电话。他对他早些时候的提议有些修改，对他与阿齐兹的最后谈话作了说明。因为总统参加莱昂·马丁就任劳工部长的就职典礼已经迟了，他就让贝克继续谈话直到他回来。那天早上的通话时间很长，大约一个小时。贝克向戈尔巴乔夫读了总统对媒体的声明。当他读完时，总统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拿起了电话。

乔治·布什

"我是否该明白昨天我们所达成的一致是不可接受的?"戈尔巴乔夫问。我说是的。他说形势已经变了。他与伊拉克又作了一次会谈，他们同意立即并且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就从停火的当天开始。他们将在三个星期内完成撤军，此后联合国的决议将停止作用。我觉得，这既不是立即撤军，也不是无条件撤军。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继续毁坏科威特。这决非一个诚意的象征。

戈尔巴乔夫对我们否定他的建议作出强烈的反应。"那么优先考虑什么?"他问，语调明显升高。"我们是尝试政治解决还是继续军事行动以致展开地面战争?"他暗示我们故意向撤军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从而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找借口。如果美国反对政治解决那就应另当别论，但是，他说，在苏联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形成美苏联合行动，我们就有可能把事情移交给安理会，我们就能发现一个解决方法。

我问萨达姆是不是接受他提出的条件。戈尔巴乔夫说他们正

在等答复。我感谢他所做的努力，但是对他说我仍然不相信萨达姆，而且伊拉克所要求的与同盟的目标是不相容的。“萨达姆所要的就是要追回脸面并自我恢复，”我说，“他正利用间隙对科威特进行毁坏。人们已经向你展现了伊拉克对石油设施所做的一切，请动用你的智慧。”

我提醒戈尔巴乔夫这些暴行。“关于人的生命的价值，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我说，“我害怕把青年男女送去打仗。我知道我所要求的会使你陷入一种困境。如果你单单说‘乔治，我不能这样做’，我也理解。我想请你告诉阿齐兹，事情是明摆着的。这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也是其他同盟国的事情，我们现在必须履行我们的建议。他对你的建议没有答复，我们等了又等，我们有耐心，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答复。这里有最后期限，而且在他在科威特干下了这些事以后，我们不能让步。我们的建议是异常严肃的。我的请求是你支持我们的立场，你站在你的立场上艰难地寻找一种更有理由的立场，但是因为我给出的理由，我们现在不能同意。如果你不能支持我们的立场，如果你不反对它，我们表示感激。”

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我们向盟国通报了所发生的事情，菲茨沃特向媒体宣读了一份更完整的概括我们要求细节的声明，所有细节都不出安理会的决议。任何事情都必须回复到8月1日之前的状态，释放战俘，停止针对科威特平民的一切破坏性行为。反过来，我们答应不向所有撤退的军队开火。球又踢到萨达姆的宫廷中了。

声明发表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集合。鲍威尔和切尼向总统汇报了最新发生的事情。斯考克罗夫特对战况心中没有底。“我们已经为你做了一些事情。”他说。

“我知道，”总统回答说，“但是这件事不在其中。”

鲍威尔汇报说伊拉克军队已经开始溃败，再一次描述了地面

战争。如果可能，战斗可以推迟24小时。“诺曼和我更愿意看到伊拉克人自己撤出而不是被赶出去，”他说，“那将付出代价。到时我们可能失去相当多的士兵，这将很可怕。对于战死的美国人将有无数的报道。阵地会很乱——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得到确切的报告，也许要2—3天的真实的耐心。如果他们自己走，那么将不会有接触——化学战的可能性非常大。它涉及美国人打击一个阿拉伯国家。通过进攻我们将获得他们更多的坦克与储油罐，但是生命的代价与以后的问题使其变得不值。”

“你更喜欢一种谈判解决？”总统问。

“是的，如果它完全满足我们的条件的话，”鲍威尔说，“他们将溃败。”

“如果他们在武力下溃败，要比撤军好。”总统回答说。

“但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鲍威尔问。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这是个内心的交流。鲍威尔所关注的，正是我们的军队和如何达到我们宣布的目标。有估计显示伊拉克的军事力量至少降低了40%。如果萨达姆撤出科威特，我们的目标大部分就实现了，不再需要地面战斗。但是总统看到了伊拉克军队被摧毁之前撤军的危险性。它对于科威特的领土以及地区仍然是个威胁。我们的军队太大无法轮换，沙特不会容忍一个庞大的外国军队无限期地待在他们的领土上监视萨达姆。我们的军队已经调集而且正在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行动。

乔治·布什

最后通牒确定了地面进攻的时间：我们有可能在海湾时间第二天早晨发动攻击。因为那接近于美国东部时间的晚上8点，所以我希望尽可能接近那个时间公开这个新闻。军方因为安全的理由希望推迟动作，如果可能推迟到周末。我不想做任何可能会使

军队危险的事情，这是个华盛顿早就决定的事情，显然我们不能发动攻击而不及早向这个国家通报。不仅美国人民有权知道，而且那些有亲人执行命令参战的家庭成员更有权知道。我们定下来在星期六晚上 10 点。当然，我们必须与法英两国共同确定时间。密特朗与梅杰都提醒我只有他们才能命令他们相关的军队参战。我打电话给国会的四个领袖，让他们打电话给副总统奎尔和苏努努，他们会向他们简单介绍我们的决定。2 月 22 日下午，我与贝克一道飞往戴维营度周末。

2 月 22—23 日夜，萨达姆又作了一次拖延的尝试，要求联合国讨论。这已经太迟了。第二天上午 11 点 15 分，离最后期限还剩最后 45 分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来，带来了最后的提议。他打来电话时我正与贝克、戴维营的几个水兵以及我的几个随员打垒球。我把电话拿到一个关着的房间，站在那里满身出汗，一条毛巾披在肩膀上。布伦特也在接电话，他在白宫的电话线上听。戈尔巴乔夫说现在伊拉克答应完全、无条件地撤军——四天之内撤出科威特。阿齐兹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接受了这些条件。戈尔巴乔夫要求我们一道工作，在联合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萨达姆屈服了。”他说。

“我不能没有动作就让最后期限过去，”我回答说，“你做了很艰难的努力，但是最后期限还是存在的。”

“让我们冷静一些，”他敦促说，“我们都是人。萨达姆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我们需要达到我们的目标而防止冲突进入一个悲剧性的阶段。萨达姆想拖延，但是我们也不是笨蛋。”他敦促我们到安理会解决问题。“我觉得贝克和贝西默特尼耶克就能把事情做好，”他补充说，“这是一个朋友之言。”他要求更多的时间，用整个周末来谈判。我觉得萨达姆是在拖延，继续他的烧焦式的地面战争来惩罚科威特。我小心地、坚定地、礼貌地说我们不能改变最后期限。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戈尔巴乔夫明显地沮丧。他的建议没有一个被执行，而这是他的最后机会。他尝试了所有事情，最后仅恳求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与萨达姆讲理。总统是有耐心的、友好的，但是没有答应。这种谈话对于他是极其困难的。

乔治·布什

中午，最后期限已过。我们在海湾有 50 万美国军队，我们的空军执行了94 000次任务。那天晚上华盛顿时间 8 点，沙特阿拉伯时间 2 月 24 日早晨 4 点，地面战斗打响。8 点 45 分，在离开戴维营赴白宫之前，我向国会领袖作了通报。在我们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布伦特向我汇报了情况。在椭圆形办公室，我向全国讲话。

日记，2 月 23 日

在我发布声明之前我得到一个传闻——说20 000个平民在科威特被杀，还有传闻说整个科威特城市——银行区和其他区——一片火海。没有一个文明人在最后时刻会进行如此肆虐的毁灭。我担心化学武器，我担心会不会冒出什么惊人的武器出来。后来有报告说如果我们没有搞掉他们的核设施，他们就有可能在 1991 年 5 月拥有核弹装置，但我不知道这种报告的真实性。

关于我的情绪，我很高兴决定最终被作出并实施了。我深深地为出战家庭的人员伤亡担忧，一直在考虑如何结束这一切。例如，假设他们说现在就立即撤出，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下决心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我确信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正确的步骤。我累了，很累，但是我们是协作进行的，所以在这个决定中我不觉得孤单。我觉得只

有总统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肯定我就是发表今天的声明——最具权威性的声明——的那个人。现在，就像每一个美国人一样，我将坐到一边，去理解和思考它的进展，而不光是知道。

那天晚上我的致辞是直接的和中肯的。中午最后期限已过而伊拉克并未撤出科威特。相反，萨达姆加倍他的努力来彻底摧毁科威特和它的人民。

我下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与多国部队联合，运用一切现有的力量，包括地面力量，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科威特的解放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

我请求美国人民停下来，为我们男女军人祈祷。

第二天早晨，2月24日，星期天，芭芭拉和我在7点时穿过拉法夷特广场到圣·约翰教堂参加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总统教堂几乎挤满了我的白宫职员和内阁成员。我的助手帕蒂·普雷索克让大家跟随约翰·哈勃大人安排这次圣餐仪式，他知道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祈祷。

当我们倾听哈勃大人的精彩的布道的时候，第一份战况报告来了。迪克·切尼用一个折起来的便条轻轻地告诉给我一个消息——“诺曼说进行得很顺利！”仪式结束以后，我和芭芭拉回到官邸的起居室，在那里迪克和科林向我作详细汇报。当他们告诉我伤亡很小，且我们的军队进展很快时，我又一次高兴得溢于言表。所有事情都比计划得还好。海军陆战队在5点30分时突破了科威特北部的防线，正在向科威特市推进。多国部队的大部分向西部沙漠调集，以切断伊拉克的部队。在整个一天中，迪克和科林不断向我汇报地面战场的最新进展以及伤亡情况。就如科林对我说

的，伊拉克军队个个“举手投降”。在我们下午的会议中，他汇报说陆战队已经到达阿贾巴机场，离科威特市30公里远。士兵们全都进入科威特境内，只有一个士兵牺牲。他们推进得很快，比计划得更快。我们的担心被抛到一边，血流成河的预言证明是错误的。所以现在是观察、等待、不安的时刻——下面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的情绪处于对值得骄傲的军队的谢意与歉意之中。我的心中没有得意。

第二天早晨，2月25日，我和施瓦茨科普夫通话，他告诉我伊拉克的装甲部队正被陆战队击退，但是有了点伤亡。“明天或后天我们将锁住他们的角。”他预言。但是美国士兵的重大伤亡报告在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到达，一枚飞毛腿导弹击中了宰赫兰附近的美国兵营，炸死28人，炸伤近100人。我沮丧地察看被毁坏的范围。战斗本身死的人数比这枚飞毛腿导弹炸死的还要少。我们曾试图精确地找到发射架，但是一枚散弹就炸死了那么多的士兵。我发怒了，但是我知道萨达姆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天下午我在来本浩斯办公大楼的体育馆，刚刚结束与松尼·蒙哥马利一场板手球，布伦特打来了电话。有报道说巴格达广播了一条声明，萨达姆正在从科威特撤军，同时签署了装备部队撤出的命令。我试图把迪克和吉姆告诉我的所发生的事情连结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证实。另外一个声明大约在6点30分左右发表，那时我和芭芭拉、布伦特正坐下来吃晚饭，一会儿电话就响个不停。声明说阿齐兹在巴格达与苏联大使接触，要求他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一个口信，请求他使联合国呼吁停火。声明还说伊拉克领导人“强调它遵照联合国安理会660号决议接受撤军，赞成苏联的和平建议。与这个决定相一致，已经给军队下达了一个有组织地撤退至1990年8月1日之前的边界的命令”。萨达姆宣布了“胜利”，而且试图尽可能多地拯救他的部队。

晚8点我们相聚于椭圆形办公室，商讨我们对伊拉克声明的对策，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我们还需要加进什么条件。伊拉克的建议仍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履行联合国决议或同盟国的条件，但是很明显，萨达姆开始撤军了，这就使形势复杂化了。数千名伊拉克士兵投降，其他部队则从科威特市向北撤退，但是我们的军队开始与伊拉克的装甲部队交火。问题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让他过去，是否设置一些新的条件让他们把重型装备留下？

贝克说要求他们放弃装备超出了联合国的决议。总统说这是一局新的游戏而我们不能被我们先前的要求束缚住，相反，我们应该说清楚要结束战争伊拉克还必须做什么。鲍威尔敦促我们争取时间来完成工作。“我们可以两天之内合围切断其退路。”他说。无论如何，伊拉克官方还没有作出屈从的表示。

“我们需要萨达姆·侯赛因本人亲自接受所有决议。”斯考克罗夫特说。

总统担心公众的反应。“将存在这种压力，他们的人撤出了，而我们还在射击。”他说，“我必须关注我们军队的安全。在卡哈夫杰他们又对我们开枪（在那里伊拉克坦克佯装投降，反过来向陆战队开火）。战争仍然在继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贝克问如果萨达姆现在撤军却不接受我们所提的条件那怎么办。

“我们继续打。”斯考克罗夫特说。

那天晚上后来，菲茨沃特给了我们消息。我们继续战斗，没有听到任何改变这种状态的事情。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撤出了他的军队，事实上他们仍然在战斗。伊拉克人宣称他们要打出一条退路，但是我们说我们不会进攻撤退中的解除武装的士兵，虽然我们可能考虑撤退中的战斗为“运动战”。萨达姆使我们相信他的严肃性的惟一方法，是“亲自地和公开地”答应我们在2月22日提议中

的条款,并且完全满足所有联合国决议的条件。

乔治·布什

日记,2月25日

我觉得萨达姆·侯赛因一直在试图使我们陷入困境。也许,他想让他的军队撤出,然后转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在伊拉克要做些什么?从而使世界舆论反对我们——我们没有他们正在离开的证据,但是我们不会让他反败为胜。他正在被击倒,我们准备在巴士拉切断其后路——我们必须解除其共和国卫队的武装——问题是,如果他把部队带出科威特,那么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军队非法侵入伊拉克。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要求紧紧地钉牢在联合国所有决议的履行上。我的意思是赔偿、放弃对科威特的所有要求,等等。

对于我来说我们似乎要进入这样一种境地,即我们必须在与联合国保持一致和确定地结束这件事之间作出选择。我选择后者,因为我们的信誉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需要搞成另外一场平局,另外一个越战,一种泥泞般的结局。我希望我们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苏联人要求今天召开联大会议,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已经走到这种地步,已经作出牺牲。我们不能允许这样一种让这家伙捺回脸面的泥泞的结局。我对他挽回脸面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对其他事情也不感兴趣。我们可以在伊拉克境内实施打击以阻止这种结局,如果我们作了某些愚蠢的妥协,事情就会更糟。我不会这样做。

那个星期一的晚上,当我上床睡觉时觉得很恐惧。天亮了,大

自然潮起潮落,人的心情也是这样。这是个挫折。我不能让萨达姆不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任何代价就从科威特溜掉,我也不想看到伊拉克没有对手的"胜利",或者看到一个平局。要么他完全并公开地放弃,这等于投降,要么我们仍然有机会进一步打击他的军队以减少未来的威胁。

第二天早晨,2月26日,我再一次向全国讲话,拒绝萨达姆最后的建议。除了戈尔巴乔夫对我们的回应提出批评外,同盟国以及这个国家似乎强有力地支持我。民意测验支持率惊人地高,我从未看到任何事情像在这件事情上如此这般地平静。人民是一致的,他们的观点是我们不能让萨达姆溜掉。他成了一种邪恶的象征,也成了某种他们对准的目标。

大约7点,科林再一次打电话来。"他们的部队正在向外涌出,"他说,"他们在桥上乱作一团,伊拉克军队明显在撤退。"多国部队正开向幼发拉底河河谷,以截获北上路上的任何有组织的军事单元。天气变坏了,变得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最坏,我们的飞机都停在地面,所以地面部队没有空中支持。陆战队有的部分已经穿过科威特市的城郊,科威特抵抗者报道说伊拉克人已经逃跑。"不要担心共和国卫队。"他补充说。现在不清楚的是他们是留在原地还是向北行军,不过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只有很小一部分装备被带出科威特。"他们将在一天之内撤出科威特。"他自信地说。

日记,2月26日

——我们的四周全是他们的装备。我们希望埃及和和沙特人先进入(科威特市),我在想,上帝,这不是很兴奋的事情?这个小国将被解放,这不是个奇迹?最大的新闻,当然是我们军队的精彩表演——他们干的最出色的事情:坚信我们是正确的而别人是错误的。我们干了

件漂亮的事情，干了件好事，越战的影响将会被丢在脑后。

我如此详细叙及越战综合症的终结可能令人吃惊。我感觉到60—70年代国家的分裂——那时我在国会。我记得在阿德尔菲和耶鲁大学生对毕业典礼的反应[①]。我记得这个国家的挣扎与丑陋，而现在它团结了。我们现在到达了一个干净利索的结局，而且我还要说，我们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我们不能用投降这个词——阿拉伯人明显不喜欢这个词。我们如何撤出？我们如何使他们放下武器？我们如何保护平民？为了给海湾带来安全，我们如何使我们的作用与我们的信誉相互协调？

在这天的进展中，阿拉伯军队进入了科威特市，这个城市被笼罩在油井的燃烧所产生的浓浓的烟雾之中，但是天气是晴好的，多国部队的空军拦截了伊拉克护卫军由此向北的通道。看起来我们能够困住或摧毁萨达姆在科威特的军队，但是他似乎不愿意投降。因此，我决定那是我们的选择，而不是萨达姆的选择：只有我确信我们已经完全达到了我们的军事目的以及联合国决议完全得到履行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宣布结束。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战略形势变化得非常快，我们对于地面战争的情况还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图像。总体上说，事情是沿着计划向前推进，只是比预期的更快而已。巴士拉的大门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关死。当时我们尚不知道的事情是在科威特诱捕共和国卫队的计划尚未实施。陆战队向科威特市推进得太快了，以至于共和国卫队没来得及赶

① 当我在阿菲尔德学位典礼上讲话时，有大学生在外面示威。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耶鲁，研究生们对学位授予仪式不屑一顾。

到南方排起战线。因此，这个军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被这个包围圈抓住。

如果我们事先知道，是不是会有所不同？我怀疑。我们仍然非常依赖军方的任务已经完成的判断。有可能发生的是椭圆形办公室对战争最后一天性质的讨论会变得更加复杂。

乔治·布什

第二天，2 月 27 日早晨，大约 10 点 15 分，迪克·切尼报告说科威特的南半部现在已经解放。在科威特境内的 2/3 的共和国卫队被毁，原来在战场上共和国卫队的 43 个师中只有五六个师还在发挥作用。切尼认为这可能是行动的最后一天——也许至多还有一天。部分盟国也认为战斗接近了尾声，虽然没有要结束它的压力。密特朗在上午 10 点 40 分打电话来说外交的时间马上就要到来，现在是讨论如何结束战争的时候了。我告诉他我们也正在谈论如何结束战争，但是在军事形势合适之前，我们不得不推迟停火。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那天下午，在与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会谈以后，总统的顾问们坐到椭圆形办公室进行我们对战争的每天例行讨论。气氛是兴高采烈的。地面行动的进展比我们最乐观的预期都要好——无论是在所取得的胜利上还是在所遭受的伤亡上。鲍威尔描述了我们军队所在的地点和所取得的胜利。他补充说现在我们已处于最后阶段，我的结论与此相同。我接受到的一种估计认为可能只有二三个伊拉克师在战场上还能够完全组织起来作为一种作战单位，其余的已经失去基本的凝聚力，或者成了试图逃窜的乌合之众。科林观察到巴士拉的“门”最迟在第二天结束时会完全关闭，切断伊拉克剩余部分的退路。似乎有一种未明言的战略共识，我们所有人都越来越关注媒体所造成的从科威特市到巴士拉是“死亡之路”的印象。

总统追根究底地问是不是到了停止的时候了。鲍威尔说我们最好知道司令官的意见，说着伸手拿过施瓦茨科普夫的热线，它放在总统桌子前的一个抽屉里。施瓦茨科普夫刚刚送来“所有简报的素材”（在其中他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现在他回答说他不反对结束，但是要与他的司令官们商量，而这需要时间以确定他们能够安全地从其军队中离开。

大约在6点30分左右我们再次相会，并给施瓦茨科普夫打了电话。他的司令官们确证他的有条件同意。可能有点过分装腔作势，我们同意在华盛顿时间午夜停止敌对行为，这时离地面战争开始刚好100小时。

乔治·布什

9点刚过，我向全国发表讲话：

> 科威特已经解放，伊拉克已经失败，我们的军事目标已经实现。科威特又一次回到科威特人的手中，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分享他们的喜悦，这种喜悦因为我们对他们的痛苦折磨的同情而有所冲淡……
>
> 7个月之前，美国与世界在沙漠拉起战线。我们宣布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不能成立。今天，美国与世界守住了他们的诺言。
>
> 这还不是欢庆的时刻，肯定不是个心满意足的时刻。但是这是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为我们的军队感到骄傲；为那些在危机中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朋友感到骄傲；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感到骄傲，他们的力量与决心使得胜利是快速的、决定性的和公正的。
>
>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宣称这仅是它自己的胜利。它不仅是科威特的胜利，而且是所有盟国伙伴的胜利。它是联合国的胜利，全人类的胜利，正义的胜利。

在停火的时候，总共有 79 个美国在役人员在行动中牺牲，212 人受伤，45 人失踪；出动 11 万架次飞机。我一直为我们的军队的表现而自豪，非常自豪。前 30 年那些在军队中服役的人之所以“被打败”，主要是因为越战的战斗方式有问题。一代美国人声言拒不服役。那些服役的人不是带着感谢与自豪，而是带着嘲弄回到家中——甚至那些逃兵和抗议者被许多人认为是勇士和英雄。现在，这些已经被抛在一边，美国人的自信已经恢复。

日记，2 月 28 日

现在是 28 日，星期五大清早。仍然没有欢庆感，我知道为什么没有。昨天晚上我的讲话发表以后，巴格达电台开始广播说我们被迫投降。我在电视上看到在约旦和巴格达大街上的公众意见是他们赢了。这实在是个谎言。如此渺小，却使我心烦。这不是个漂亮的结局——没有密苏里舰上的投降。没达到的事情是未能使战争像二战那样结束，未能使科威特与朝鲜、越南分开来。

标题是大号“我们赢了”。电视很准确地反映了萨达姆·侯赛因的谦逊，它使得美国人民理解“赢了”。但是在国际方面，是另外一回事，至少阿拉伯世界还与萨达姆站在一起。很明显，当军队空手回家，失败了，至少 5 万人——或者更多丧命，伊拉克人民会知道，他们的兄弟和他们的儿子失踪，永远不会再回来。

科林昨天晚上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考察——它是历史性的，而且在历史上没有第二件事情像它这样。鲍勃·盖茨今天早晨对我说，一件历史性的事情是，我们停止了，我们粉碎了他们 43 个师，但是我们停止了——

我们所要的并不是屠杀，历史将会很仁慈地看待这事。（他还看到我们非常慷慨地向四任总统请教，像这样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

每个人似乎都给我高分，但是我并不这样看。我觉得我们这个班子太棒了，这绝非一个人的工作。我希望我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承认我需要鲍威尔的力量的支持；施瓦茨科普夫是坚定的和可以信赖的；迪克·切尼是忠诚的；吉姆·贝克是能干的。我不喜欢人们批评贝克，因为他的外交做得绝对棒，而且他一直用他的坚强的语言使联合国做它需要做的事情。外交工作的难度被低估了，而他的确干得太出色。当然，还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他分担了总统的重担，给官僚机构分派任务，解决纷争，而从不为自己记功。他总是沉默的，总在那里，总是可靠的。

第十八章 风暴以后

伊拉克有效抵抗的结束来得太快，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我们可能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突然从战斗转为和平。忠实于我们的既定方针，当我们达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消除萨达姆对这个地区的威胁)后，我们就停止了战斗，不幸地留下了若干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久便发现，共和国卫队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数量比我们相信或预想的要多。因为海军陆战队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开进科威特，所以卫队的预备队未来得及开进南方战场，也就没有进入我们计划中的从科威特西部和后部包抄的陷阱。我们虽然想通过摧毁另外的共和国卫队以减轻萨达姆对这个地区的未来威胁，但是实际上他并不需要这些死里逃生的部队来保持他的国内控制。他在伊拉克的其他地方有 20 多个未被触及的师。多一天可能不会改变战略形势，但在人的方面就有实质性的差异。在我们自己的任务顺利完成以后，伊军的散兵游勇也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

我们感到绝望的是萨达姆的失败并不会使他倒台，正如我们阿拉伯同盟预料的那样，也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南部的什叶派、北部的库尔德人的流产的起义，没有影响到伊拉克中部的逊尼派人口，而且伊拉克的军队仍然是忠诚的。批评者声称我们一开始鼓励分裂主义者什叶派和库尔德人造反，而当他们这样做时我们又食言拒不提供支援。布什总统一再声明萨达姆·侯赛因的命运掌握在伊拉克人民的手中。他偶尔也暗示除掉萨达姆是受欢迎

的行动，但是因为实际的原因，从来不曾有过支持起义的诺言。虽然我们希望人民起义或军队倒戈推翻萨达姆，但是不论是美国还是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都不愿看到伊拉克国家的解体。我们关注的是海湾中枢地带的长久的权力平衡。伊拉克国家的分裂也可能带来其自身的稳定问题。虽然奥扎尔优先考虑搞掉萨达姆，比以前土耳其的领导人对库尔德人持更多的宽容意见，但是土耳其——还有伊朗——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的主张。不管从原则上对库尔德人或什叶派自治抱有多大同情，但是这个特殊形势的实践方面决定了政策。除了这些原因使这些起义令我们担忧外，它们还给萨达姆一个重新肯定自己和召集部队的机会。伊拉克军队不仅没有把萨达姆当作它的屈辱的失败的原因，反过来被派去镇压起义者。这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事情。

除掉萨达姆，把地面战争扩展到占领伊拉克，如果这样就可能违反我们的中途不得改变目标、不得进行“任务移动”的政策，有可能付出不可估量的人员与政治代价。逮捕他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曾经在巴拿马连诺列加都抓不到，而对于巴拿马我们要熟悉多了。我们有可能被迫占领巴格达，结果被迫统治伊拉克。这样，同盟会顷刻瓦解，阿拉伯愤怒地遗弃它，而其他同盟者也一样会脱离它。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看不到有可行的“出口策略”，因而违反我们的另一条原则。更进一步，我们曾试图在冷战后的世界建立起一种处理入侵问题的模式，而进入并占领伊拉克，就会单方面地超越联合国的命令，从而破坏我们试图建立的对待入侵的国际反应的先例。如果我们进入入侵道路，美国就会令人信服地成为一个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的占领力量。这将是个差异极大——也许也是徒劳的——结果。

我们的讨论长时间集中在强迫萨达姆在萨夫湾-科伊北部边境的小镇，接受伊拉克战败的条款，接受这种全然的失败所要蒙受的责任和政治后果。后来我们自己问自己，如果他拒绝我们该怎

么办。我们的结论是我们面临两种选择:继续冲突直至他屈服,或者从我们的要求退却。前者可能把我们的阿拉伯同事从同盟中分裂出去,而事实上迫使我改变目标。给定这些不合口味的选择,也许我们可以允许萨达姆避免个人投降,允许他派一个将军来。我们也许还可以设计一个可选择的惩罚方案,如对不同的军事目标实行空中打击,这可以作为第三种可行方案,但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事先定好的任务。萨夫湾在等待。

萨夫湾的另外方面产生了争论:让萨达姆使用他的直升机的决定。伊拉克人声称他们需要它们作为联系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的不同部分的惟一工具。施瓦茨科普夫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没有收到指令,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萨达姆几乎立即使用直升机作为镇压起义的武装工具。斯考克罗夫特与切尼讨论这个问题后,提出授权使用直升机的决定被废除了。切尼和鲍威尔觉得这样做很明显是给施瓦茨科普夫难堪,而且那些用大炮做的事情用直升机也做不了,虽然要为此作更大的努力。斯考克罗夫特不再追问这个问题,也没有向总统通报。回忆起来,既然直升机被攻击性地使用,而不是用于交通,那么施瓦茨科普夫也没有被搞得难堪,而且,从心理学上说,在伊拉克人第一次犯罪的关节点上敲击他们,还可能是有益的。

我们感觉到站在阿拉伯同盟者的角度,尽快结束冲突回到正常状态是非常迫切的。这意味着迅速把美国军队撤至绝对最小的规模。早些时候,阿拉伯有些高层人士担忧一旦他们允许美国军队进入中东,我们就会待在那里不走。萨达姆的宣传机器煽动这种担忧。我们准时撤军则可以巩固我们与阿拉伯盟国的关系,他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信任我们。我们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及时支援他们,而在事情干完后又及时离开。除了对我们的战争行为有些批评以外,以色列人也加固了对我们的信任。当我们的利益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有能力——也愿意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介入

中东。我们还削弱了在这个地区的最厉害的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我们的新的信誉(加上阿拉法特在战争中站错队后需要挽回其形象这件事),在下一年度的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上有了一个快速的、实质性的高潮。

与单纯地反击伊拉克入侵和科威特复位相比,海湾战争在后冷战世界的形成方面有着更大的意义。它的重要性推动我们开始把我们的战略目光从危机扩展到一种在未来我们必须援引的先例上。从美国外交政策——长远地看——的角度,我们寻求一种可以赢得国内广泛支持的反应方式,这种反应方式可以尽可能广泛地运用于其他危机。从这点来说,我们的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是不可分的。如果我们很适当地处理好伊拉克问题,这事情本身就是对未来的可能的入侵者的一种警示。我们还相信美国不应该独自干这种事情,多边的方法可能更好。这部分是个实践问题。对伊拉克的入侵设置一种有效的军事反击需要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与提供基地。

建立一种国防的反应使我们立即转向联合国,它可以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一个为人接受的掩护物,并且可以动员国际舆论来支持我们意欲维护的原则。苏联支持反对伊拉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动用联合国安理会力量以及检验它的作用的机会。不过,我们对于安理会在主动对抗侵略的新角色上的有用性没有多大信心,而且我们也反对允许联合国组织并实施战争。联合国的作用应该延伸到世界的所有地方,这是重要的,可能更加重要的是,应该把控制的线索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就战时我们的行动本身而言,我们同样试图为未来建立一种模式或先例。我们寻求并成功地获得了世界共同体关于解放科威特的命令。如果单方面超越这个命令太远,我们就有可能损坏联合国在未来给予同样至关重要的权威的信心。

在许多方面,海湾战争成为冷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的桥梁。

在开始阶段，当美国与苏联站在一起反对伊拉克入侵时，贝克与谢瓦尔德纳泽的记者招待会是划时代的。它象征着美苏关系的改变。超级大国合作展开了这样一种世界图景，这个世界与前40年不同，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性成员可以根据其创始者的意愿处理侵略问题。

战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使得联合国走出了外交困局。在处理国际挑战方面，美国认识到并且肩负着特殊的领导责任，这种作用在全世界获得广泛的接受。美国的政治信誉和影响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借着苏联的至多可以说是勉强的支持，在海湾危机中我们几乎独自站在世界舞台。我们的军事名声同样增长。美国的军事力量与装备表现极佳，而伊拉克主要装备苏联的武器，没有很好地反映它们的制造者的水平。结果，从海湾冲突中，我们所在的世界由科威特受攻击以前的世界变为一个不同的世界。

第十九章 分 家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海湾战争是美苏两国前些年发展出来的那种有希望的新精神的象征。的确,在 1990 年 8 月,当我们两个国家站在一起谴责伊拉克入侵时,我就准备说冷战结束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两个国家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冲突中相互合作——这对于我来说证实了世界真正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可以考虑新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了,这种新秩序的一个基础就是美苏合作反对无缘无故的侵略。

当我们将 1991 年春的计划集中在沙漠风暴以后出现的问题与机会上时,我们也同样对苏联国内的事情表示关注。谢瓦尔德纳泽愤而辞职以及波罗的海镇压都表明在这个国家和它的领导人内部日渐增长的政治分野。

在许多方面,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间的关系,这个尚未讲述完整的故事,反映了苏联内部的混乱。两个人都是设计师和改革的拥护者,但是也许彼此对如何达到新的系统,新的系统应该或必须是什么样子等等,具有不同的观念。

谢瓦尔德纳泽似乎更致力于民主的原则以及它所要求的基本的政治变化,寻求更彻底的而不是简单的改变。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目标似乎仍然是要保留政治结构和一个更新了的、重新焕发生机的、但仍然是熟悉的苏联的中央权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改变的抵抗变得强硬了,戈尔巴乔夫越来越被中间派所左

右。他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摇摆不定,并且听任他们相互反对而坐收渔利,明显想继续控制他所发动的过程。他优先考虑的,事实上,已经不是追求原则化的、彻底的改革,而是政治自保。

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的前后摇摆更多地起源于战术的动机,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动机。他似乎的确想走在前列,但是又不时屈服于党内与军队的压力。例如,他懂得经济需要作激烈的结构上的变化,并时常把市场改革方案挂在嘴边,但是,他要么没认识到或没掌握所要求的改革的深度,要么就是不情愿作与此相关的政治上的冒险。结果,除了积极的言词以外,苏联经济改革政策直到1990年总体上是肤浅的。1991年8月,斯坦尼斯拉夫·莎塔林,西方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戈尔巴乔夫的贴身顾问,提出了"500天计划",认为可以迅速地把经济转变到市场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或多或少在言词上采纳了这个计划,那年10月份他把它放在自己的总统计划中,但是它从未付诸实践。不论莎塔林计划的妙处是堕落为资本主义,还是对垂死的苏联经济的休克疗法,戈尔巴乔夫就是不肯前进。

虽然口头上赞成谢瓦尔德纳泽的动武将葬送改革的观点,但戈尔巴乔夫偶尔采取,或者无法防止动用军队实施武力镇压来保证政治秩序和联邦自身。这在1989年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1990年和1991年上半年的波罗的海地区都成了事实。他在改革与保守间的摇摆到1990年下半年,甚至变得更加厉害,这些摇摆后来变成了一种自我终结——仅仅是一种保持联邦与自己权力的日渐增长的攻击性的努力。

相反,谢瓦尔德纳泽则似乎经历了对于民主与市场经济的一种更完全的哲学皈依。像他这样一个被党塑造出来、与戈尔巴乔夫具有相似的背景的人,能够这样不妥协地致力于变革,是难以理解的。也许当需要相信实用主义、视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的时候,他们的差异反映了他们的人格与选择。不管何时,只要我们警告

谢瓦尔德纳泽反对武力，他都会激烈地，我相信是真诚地坚持，武力甚至不可能被考虑为一种方法，他认为武力会毁掉改革本身。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对于他是不可能的。在他们所面临的政治环境中什么是可能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比他的朋友持更加“现实主义”的观点——只有通过耐心和妥协他们才能达到任何实践的和长久的改革。

整个1990年，在我们的眼中，谢瓦尔德纳泽是以苏联政府中的一个向前看的、领先性的改革家的面目出现的，他与军队与党的右派力量为争夺戈尔巴乔夫而战斗。他为了把戈尔巴乔夫巩固在一个致力改革者的道路上而斗争。在我们看来，一次又一次，当戈尔巴乔夫显示出迷茫或者显示出决心不足时，谢瓦尔德纳泽就介入了。从2月份的军事控制协定，到他一个人站出来——被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到8月份与贝克一道谴责伊拉克侵略，谢瓦尔德纳泽坚定地为保持苏联在改革的道路上前进而战斗。

1990年，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的海湾政策的争论中基本上是占上风的，但是到了那年的秋天，他的影响明显地减弱。9月在赫尔辛基，甚至当普里马科夫向戈尔巴乔夫进言说美国正试图毁掉苏联在伊拉克的30年投资成果的情况下，谢瓦尔德纳泽扭转了局势。不过，当10月份普里马科夫访问伊拉克时，谢瓦尔德纳泽似乎便失去了外交事务中的某些控制。那时他通过秘密渠道特别传给我们普里马科夫正在全力阴谋破坏苏联合作性的道路的警告。戈尔巴乔夫从未改变他的海湾政策，但是对于普里马科夫在伊拉克的诡计，他既感到困惑，又怀有希望。这并不令人吃惊。普里马科夫的努力是在至少部分地保持苏联在伊拉克的巨大的投资的同时避免军事冲突，而这肯定也是戈尔巴乔夫想做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到了年底，普里马科夫至少部分削弱了谢瓦尔德纳泽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

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也许是因为他越来越一个人孤军作战，

易受党内的右翼力量的攻击，这使他感到气馁。他可能最后相信自己已经失去了戈尔巴乔夫，或者担心一种反对——更痛苦地——或联合戈尔巴乔夫的专制力量正在兴起。没有谢瓦尔德纳泽的撑腰，戈尔巴乔夫似乎显得越来越犹豫不决，在海湾问题上，由于受到普里马科夫等人的刺激，他开始加倍阻止美国向动武的方向发展。在他的外交政策中我们看到了 1989 年、1990 年在中东欧和其他地方的重要的进步，也看到了 1991 年的退步，这两者间的尖锐对立，我们认为是谢瓦尔德纳泽早期坚定的影响力的证据。不管如何，党内反对改革的力量开始变得强硬，想让戈尔巴乔夫靠边站的压力在增强。

早在 1991 年，当戈尔巴乔夫先是想法避免空袭，后是想法避免地面战争打击伊拉克时，立陶宛又一次爆发了冲突。自从立陶宛 6 个月前宣布准备独立后，维尔纽斯与莫斯科的紧张迅速升级。1 月 2 日，苏联军队占领了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的公共实施，标志着镇压开始。这些行动与向其他加盟共和国增兵的决定相互配合。为了海湾问题上的团结，我们避免由布什总统作出的任何官方介入的声明。离联合国最后期限只剩下 2 天时间了，而且贝克与阿齐兹将与 1 月 9 日在日内瓦会晤。与莫斯科的裂痕现在只会激起萨达姆的骄气。更糟的是，这有可能支持戈尔巴乔夫周围的强硬派，使他停止与我们合作。但是我们又不可能没有任何批评地听任干涉。1 月 8 日，马林·菲茨沃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一份声明：我们把出兵视为紧张升级的标志，而且对派兵到波罗的海的决定表示关切，“派兵在我们看来是挑衅性的和无效的”，可能损害和平谈判的前景的。布什总统 3 天以后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敦促对话。

1 月 13 日，局势陷入了悲剧之中。军队向维尔纽斯的抗议者开枪，打死 15 人。在现在他应该怎么做的激烈争论后，总统发话

了，谴责暴力行为。戈尔巴乔夫声称直到事情发生以后他一直不知道动武的决定，而且认为是军方和平民阴谋集团在没有得到他同意的情况下下令开枪的。不管如何，一个星期以后，苏联军队又向抗议者开枪，这次是在拉脱维亚的里佳，在那里4人死亡。许多其他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不仅没有被镇压吓倒，反而对波罗的海地区深表同情，这表明苏联的中央权威已经削弱。领导谴责的是鲍里斯·叶利钦。

在苏联军队向维尔纽斯的抗议者开枪的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代表签定了相互安全协定。这个行动不仅支持了波罗的海的独立渴望，而且是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权威的挑衅。协定号召四个加盟共和国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不承认他们中的任何非民选的政府，在遇到中央政府反对时相互支援。此外，四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还集体向联合国发出了干涉的呼吁。几天以后，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苏联军队的镇压、叶利钦的组织反对，对于戈尔巴乔夫再造苏联中央权威的计划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提出一个新的、建立在自愿联合基础上的联盟条约，以此代替建立在高压基础上的苏联。在被所有加盟共和国批准以后，他准备了一个新的联盟宪法，其中包括了脱离机制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显示出戈尔巴乔夫的心已经从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转向了一个联邦制的甚至邦联制的联合体。然后，6个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在2月6日大胆地宣布将用全民公决来抵制条约。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波罗的海的镇压行动发生在空袭伊拉克的前夕，引起了我的怀疑。我奇怪这样安排是不是想趁机利用我们此时在海湾地区需要苏联支持而采取的粗糙的对策。不管是不是这种动机，这个当

口这种独裁的方法在美国政府还是产生了争论。这是我们困难的时刻，我们要在团结的需要与我们的愤怒之间进行平衡，一方面，在海湾冲突的关键时刻不要发生违反我们意愿的国内争吵，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很生气——在波罗的海事件上。1月21日布什总统再一次发话，他敦促苏联领导人停止使用武力。同时，他写信给戈尔巴乔夫，警告说如果在立陶宛的暴力继续，我们将冻结与苏联的经济往来并不支持苏联作为特殊会员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的行动仅仅是为了防止爆发内战。

当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围绕波罗的海事件发生争执时，我们并不非常关注个人方面的争吵。我们更多地是把叶利钦的行动与声明视为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从中央夺取更大的政治与经济自主权的日渐增长的努力中的一个而已。事实上，叶利钦与中央的斗争有很多都是关于苏联经济中的"俄罗斯"部分的控制问题，这也许巩固了他的权力基础。不过，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挑战不仅是因为他们间的敌意，而且是因为叶利钦是苏联中心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从历史上看，苏联与俄罗斯本质上是不可分的。现在叶利钦第一次在苏联与俄罗斯之间作了区分，而且肯定俄罗斯的利益反对苏联的利益。

在旧的帝俄时代，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在地理上与政治上形成加盟共和国以及后来的联盟的核心。俄罗斯不仅仅在领土与人口上是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它有近1.4亿人，而且80%是俄罗斯族。正如戈尔巴乔夫常常指出的，俄罗斯人在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中也组成数量很大的少数民族。俄罗斯与苏联的政治体制、共产党对其他加盟共和国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民族的统治密不可分。1920年代以苏联为名义兴起的国家不仅是俄国革命与内战的结果，而且是旧帝国的强有力的回声。在这些动乱的阵痛中，以

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确立中(如布列斯特和约),帝国瓦解了,它的一些民族在若干世纪俄罗斯的统治之后,宣布并短暂地享受过独立和主权,但立即就被重新夺了回去。列宁与斯大林把联邦强加到这些共和国的头上——表面上是由各自的一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联盟,实际上全被共产党的组织控制。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回忆起来,当叶利钦开始拒绝苏联和党的权威、重新肯定俄罗斯对其共和国自身事务的控制时,他攻击的是苏联国家的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它的政治结构。在撤出俄罗斯对中央的支持的时候,叶利钦也许并未意识到他正在清除别的加盟共和国被武力捆绑在苏联中央权威的手段,从而为他们进一步的分离壮了胆。

戈尔巴乔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民族组织对苏联权威积怨的深度,或者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对苏联生存的巨大威胁。很明显,他自信地(天真地)认为这些加盟共和国会把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前景与苏联捆绑在一起,加盟共和国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民族可能仍然会自愿联合于新的联盟条约。他似乎坚信(或至少希望)一旦改革被引入,对中央的憎恨就会消失。与此相反,民族主义者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看到了挑战中央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美国在审视这个形势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多年来我们倾向于假定苏联在清除而不是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方面取得了成功。

莫斯科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问题仍然是一团乱麻,而且没有一个领导人因能为其中某一问题找到回答而突现出来,也没有一个领导人能找到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首尾一贯的方案。我们想,苏联已经处于革命前夜的那种状态。我在3月7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对局势作了下列概括:

在下个月有许多事件可能会引发混乱。煤矿工人威

胁说要罢工,因为共产党可能对所有将在3月17日参与加入联盟全民公决的加盟共和国动武。克格勃、警察与军队更加可见的、攻击性的姿态可能在任何时候点燃暴力之火。已经发生机能障碍的经济在以后几月内可能再次恶化,而且不清楚的是苏联公民还能够维持温饱多长时间。没有人确切知道军方的立场,苏联的局势如此之糟以至于很难相信能够避免爆发一场混乱。

这是个出现在美苏关系的稳固行程中的最困难的背景。我们向总统提了三条建议:明确在近两年内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谨慎推进美苏议程,承认和接受这个过程可能放慢;避免介入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在如此迅速的进展以后,机会之窗似乎正在关闭。到了巩固我们所得的时候了。

美苏关系的严重问题开始出现了。前两年在军备控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进展现在成了问题。苏联——在其军队的压力下——在实施CFE(欧洲常规武器)条约方面产生了危机,称大量的军事装备不在最高限额之内,因为它们属于"海军步兵部队"。他们要求与西方就早就达成的协议进行谈判。意义深远的是,CFE的每一个签约国(包括苏联自己的华约伙伴)都反对变动条约。苏联的后退使所有的裁军谈判陷入僵局。如果我们在已经缔结的条约上不能相信苏联,就不可能有一个基点再去深入探索其他的细节。戈尔巴乔夫似乎不愿或无力选择CFE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可能就是克里姆林宫政治力量结盟发生改变的标志。

3月17日傍晚,新联盟条约付诸全民公决,俄罗斯中部煤矿工人罢工,在波罗的海地区镇压开始。贝克前往莫斯科。他去主要是讨论常规军备控制问题,但是也简短会晤了来自波罗的海的代表。3月17日他发来电报说他发现戈尔巴乔夫已经下了决心,

但是能否控制局面却一点也不清楚。全民公决的结果是与苏联及戈尔巴乔夫和睦相处,9个加盟共和国赞成条约,其他6个——亚美尼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摩尔多瓦以联合抵制表决作为威胁。这是这几个加盟共和国从中央努力取得的政治影响的一个实用性主张。此外,通过试图卷进CFE争论、批评中央政府号召修改条约,叶利钦自己以及俄罗斯的政治形象已经兴起。这是对中央以及戈尔巴乔夫权威的公开挑战。

乔治·布什

日记,3月17日

我的观点是,跟上节奏,灵活应变——你不要试图影响事件发展的连续性,你特别不要做那些可能是鼓励混乱的事情。我们与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会面,但是我们不能过分。

在波罗的海问题、CFE问题以及START(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细节之间,看起来我原来希望在七大工业国会议之前举行的与戈尔巴乔夫的夏季会谈要延期了。我想高峰会谈能给他减轻一些国内压力。我们需要澄清军备控制问题,但是如果他能以某种方式声明给波罗的海儿国以自由,我将立即前行。什么东西都没有比放弃这些国家更能使戈尔巴乔夫在西方站得住脚。但是我知道这对他也是要求太高——我怀疑他是否有政治力量与政治支持来做到此事。我想他一直尽力在做的是延缓党内右翼力量对立陶宛的压制要求。

春天以后,有信号表示戈尔巴乔夫又重新获得能力对党实行控制。他又向左翼回转并试图发动改革者与加盟共和国的妥协。

4月上旬，瓦伦廷·巴甫洛夫总理提出了一项政府克服危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目的是稳定经济，表明政府对加盟共和国独立的流血立场。格鲁吉亚最近于3月31日投票表决，重新确立中央的权威。戈尔巴乔夫呼吁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把他们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政治纲领和"个人激情"放到一边，统一行动，为拯救苏联于无政府主义状态而努力。他也要求那些已经通过全民公决的加盟共和国批准联盟条约。

他的变化历程，以及能表示这个国家前途的实质性迹象出现于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莫斯科郊区别墅会见了改革派以及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包括叶利钦。在那里他获得了成功：他们在共同合作解决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危机方面达成一致，虽然为此他与中央都付出了代价。加盟共和国现在在联盟的政治决策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更有甚者，条约可以被正式修改以允许分离。作为交换条件，加盟共和国将与作为中央的莫斯科保持现有的经济一致，在他们的领土上实行苏联的法律和法规。

两天以后，在4月2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击退了保守派的沉重压力，威胁要辞去总书记，他们当场急忙表示拒绝。他对权威的申张也表现在美苏关系上。布什总统在3月底收到他一封信，信中表示苏联准备在CFE僵局上作些让步，虽然不够，但是我们视其为好的征候。我们想戈尔巴乔夫在与军方的关系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另外，在5月20日，最高苏维埃批准了上一年戈尔巴乔夫在戴维营答应的迁徙与旅游立法，清除了与我们增加贸易往来的主要障碍。结果，在6月3日，总统最终能够废止1974年贸易法案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给予苏联与我们大多数伙伴同等待遇。

戈尔巴乔夫与9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协议标志着称之为"九加一"进程的开始。"九加一"的目的是通过谈判修改"联盟条约"、签署新的苏联宪法、联邦范围内的选举、在自愿的基础上创造一种

经济联盟，虽然愿意这样做的加盟共和国允许独自进行。这项安排进行得异常顺利，主要是因为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两人都尽力寻求妥协，避免对峙。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两人观念突然发生转变，还是不清楚的。戈尔巴乔夫避免介入俄罗斯的总统选举，而且，在叶利钦6月12日获胜时，还向他表示了祝贺。6月17日，7个加盟共和国在“联盟条约”草案上签了字，这个草案中联邦的许多权力被削弱。

除了恢复稳定的措施以外，以戈尔巴乔夫、中央为一方，和以俄罗斯为领导的加盟共和国为另一方，双方一致强调由联邦单方面控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与此相关的，戈尔巴乔夫丧失了自己的一些权力。现在还难以想像与预测权力由中央向加盟共和国转变的深度与速度，以及中央——还有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将会如何。我们所知道的延续若干年的旧秩序已经瓦解，但是会有什么样的新苏联？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政权和领导人的变化还是结构和政治制度本身的巨变？现在还难说。

乔治·布什

不管这个过程是什么，需要多长时间，会产生什么结果，我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更重要的是和平的变化。我觉得做到这点的关键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强大，以及中央机构的有效运作，结果还要看戈尔巴乔夫愿意怎么做。如果他在实施与加盟共和国达到的新的协议上稍有犹豫，那么联盟的政治瓦解就会加速，国家就会陷入动乱。与此同时，我奇怪党内传统主义者，现在紧密地团结在戈尔巴乔夫周围，占据由去年冬天改革派让出来的政府高级职务上，他们可能对权力的转移作出反应。如果戈尔巴乔夫显得妥协得太厉害，有可能挑起一场政变——虽然尚无严重的迹象。我仍然对苏联国内的暴力深表担忧，这有可能把我们拖进冲突中。

美苏关系在春夏以来一直围绕着军备控制与经济援助问题。

3月份，戈尔巴乔夫写信给我。要求在我们的农业计划下贷款1.5亿美元的谷物，我是很想帮忙的，但是苏联在CFE(欧洲常规武器)和START(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上的行为，以及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镇压，使事情变得非常困难。我对苏联的经济前景以及培育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改革不抱乐观，我甚至没有看到基本的经济改革的措施被实施的迹象。此外还有别的问题，如信贷能力差。在我看来，苏联所遭受的主要是经济无效与较差的优先配给权，而不是缺钱。

经济援助也将是7月份在伦敦召开的七国经济高峰会议的议题。戈尔巴乔夫希望出席会议以立刻获得援助，同时为加入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寻求支持，这些组织可能让苏联人获得更大的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的两个要求与对方要考虑的是同一问题：没有致力于市场改革和削减常备军的证据。给苏联世界银行的完全会员资格，在各方面都是有问题的。成员资格要求成员国向基金投入相当一笔钱，而钱我们知道他们是没有的。我准备支持苏联的“准成员”资格，这有可能使他们在检查他们的经济以及实行市场改革时获得技术上的援助，但不是完全会员国资格。

七国组织会不会邀请戈尔巴乔夫到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他来了，我们就得肯定高峰会议对于他是个政治上的胜利，但是我们不会向他作出我们做不到的承诺——有报告说他准备向七国要求100亿元的抵押贷款。我曾经跟普里马科夫说过我们不得不详细核算核算，以免戈尔巴乔夫为了借钱而来却不得不空手而回。普里马科夫向我保证戈尔巴乔夫不会到伦敦，也不会去力争巨额支票。

向戈尔巴乔夫发出邀请不是我，而应是作为整体的组织。布赖恩·马尔罗尼对此持有保留意见，他认为我们应该仔细考虑考虑约翰·梅杰最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他是此次会议的主席。梅杰认为

我们应该邀请戈尔巴乔夫，但是作为一个特殊身份被邀，而不是作为会议的主要参加者被邀。所以，我们同意在正常的会期之外与他进行政府首脑会谈。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七国首脑会议正在辩论的当口，也是我们开始形成援助苏联的一揽子计划的当口，出现了一个危急的时刻。6 月 20 日，我收到马特洛克大使的一个关于他刚刚与盖维里尔·波波夫，莫斯科改革派市长会谈的消息。他说在冬宫会谈期间受到可怕的克格勃的窃听。波波夫递给马特洛克一个条子，说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鲁申科夫、国防部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里·卢季扬诺夫正在密谋一个于第二天除掉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他敦促我们向叶利钦发出警告，那时叶利钦正在美国作为于 6 月 12 日获胜的第一位俄罗斯直选总统正式访问华盛顿，他预定当天下午会晤布什总统。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报告。我们知道一点巴甫洛夫的情况，他是个传统主义者，在未征得戈尔巴乔夫同意的情况下让最高苏维埃把戈尔巴乔夫的一部分权力转交给他。在第二天或其他什么时间将对这项提议进行表决。这将是谣传的政变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贝克在柏林打电话来，在那里他正与贝西默特尼耶克会谈。他收到与马特洛克相似的消息，希望贝克与贝西默特尼耶克讨论这事。我们一致认为并且决定，马特洛克必须通知戈尔巴乔夫，贝西默特尼耶克说此事不能声张，以免惊动克格勃。为了保证马特洛克能够把消息送达戈尔巴乔夫，我们通过苏联大使递交总统给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要他立即接见马特洛克，最后，我们决定与叶利钦讨论整个事情。

乔治·布什

我在那天下午 3 点与叶利钦会谈了大约 1 个小时，他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我事先知道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敌意与麻

烦，所以担心他会再次乘机攻击戈尔巴乔夫。当他称赞戈尔巴乔夫时，我感到非常安慰和吃惊。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次访问很愉快。他是个很投入也很有趣的人，他的富有感染力的大笑使他很讨人喜欢。与他以前的访问不同，他似乎已经翻过了戈尔巴乔夫这一页，显得干净利落、进取心十足。

几乎一开始的时候，我传递了巴甫洛夫的消息。我尽可能戒备地表达这个消息。我不想让他认为我们在扩散错误的信息。

“看，”我说，“我不想介入你们任何内部事务，我只想告诉你波波夫在一个手写的便条上告诉马特洛克的事情，说戈尔巴乔夫可能在明天被推翻。”我补充说波波夫暗示这可能是巴甫洛夫、卢季扬诺夫、亚佐夫、克鲁申科夫之间阴谋的结果。叶利钦认为这完全是个谣传，根本不可能发生。他建议我们共同给戈尔巴乔夫打个电话。我们试图打通电话，但未接通。我希望马特洛克已经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这个奇怪的传闻。

在那天下午的会谈的其余时间里，在谈到改革时，叶利钦讲了所有我们愿意听到的话，而且他把自己与戈尔巴乔夫放在同等的政治地位上。感觉到他正在对作为联邦和加盟共和国的外交主渠道的中央政府的作用提出挑战，我试图在支持这位新总统与支持中央政府方面保持平衡。我一遍遍向他解释我们非常尊敬他，并且尽可能多地与他们做生意，但是我不能削弱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说他理解并向我保证他与戈尔巴乔夫关系很好，他说，戈尔巴乔夫完全同意他所做的事情。

我向叶利钦询问苏联国内局势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压力。他大致描述了他所看到的近几个月的情况。“戈尔巴乔夫的压力主要来自军方、克格勃和共产党的机关，现在加上巴甫洛夫，”他开始说，“1－3月份的形势特别严峻。戈尔巴乔夫犹豫了并向后退，改革放慢了。有人发动了反对改革的攻势，我们就有了在立陶宛、格鲁吉亚和南奥德萨的事件。请不要误解我所作出的(要求戈尔巴

乔夫辞职)的声明。我说如果戈尔巴乔夫从改革后退,那么他必须下台。但是在4月份,出现了民主力量的团结。戈尔巴乔夫懂得没有左派他就不能存在。他放弃了这三个月的立场,这就为'九加一'协议开辟了道路。"

他向我保证俄罗斯坚定地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没有他我不能活动,"他断然声称,"我们只能在一起行动。戈尔巴乔夫的离任和其他人上任将是个悲剧,人民可能上街,内战可能爆发。但是我不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仅仅是说说而已。在24小时之内我将回国并掌握第一手资料。最高苏维埃清除不掉戈尔巴乔夫,只有国家杜马才有权。现在只有违反宪法才有可能罢免戈尔巴乔夫,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给我回电话,谈到了波波夫的消息。很明显他前一天就试图跟我联系,但是发生了一些混乱(他后来告诉我说当他听说我的电话没有被接进来时,他变得狂怒了)。马特洛克见到了他,他对我们把消息转告给他表示高兴。明显他感到很自信,觉得自己能够左右局势。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反对派代表在最高苏维埃制造问题的图谋,指的是把他的权力转交给巴甫洛夫的提议。最高苏维埃已经作了表决,终止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讨论。"那些反对我的人们在今天真正受到了其他方面的代表的敲打。"他兴奋地说。我奇怪会不会因为马特洛克把情况告诉了他所以才什么也没发生,并向他解释事情是怎么来的。"乔治,我让大使向你保证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戈尔巴乔夫说。

"那好,"我回答说,"我因波波夫的特殊要求把消息告诉了叶利钦。我这样做了,但是我希望你理解我并没有试图介入内部事务。但是我觉得告诉你是重要的。"这是一个不幸的事故,我忘记了波波夫特别关照马特洛克当谈到谣传的时候不要讲出他的名字。事实上,我在为打电话准备的要点上避免提到波波夫,只是简

单地说"一个可靠的人"。我们后来听说戈尔巴乔夫指责他不忠诚,不是直接将消息告诉他本人,而且有好长时间波波夫因为我们讲了他的名字而感到气愤,这是可以理解的。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关于苏联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者能为它做什么,七国首脑会议上的这个问题占据了我们6月份的其余时间和7月上旬。七国首脑的一些诱惑是许诺太多。在我们之中,关于什么人提供什么样的援助——从财政援助直到技术援助,已经有了一些不言的分工。虽然七国领导人个人可能准备给戈尔巴乔夫的仅仅是小心谨慎的、有条件的反应,而不是大量的财政援助的诺言,但是我们担心当面对面与他接触时,他们会倾向于做得更多。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念,如果我们对援助不附任何条件,那么就等于浪费资源,没有做任何敦促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事情。

乔治·布什

我的高峰旅行从7月14日法国国庆节对法国访问开始,在朗布伦城堡我和密特朗进行了简短的会晤。使我急于在此停留的一个原因是想访问享有声望的迈克·罗克杰夫将军的勋绩军团,作为我们对法国对多国同盟的巨大贡献的一种感激方式。罗克杰夫将军是沙漠风暴时法军司令。当天晚上我到达伦敦,在唐宁街10号出席了一个鸡尾酒会与约翰·梅杰的私人晚宴——在那里我访问了彼德·德·拉·比利尔领导的勋绩军团,他在海湾战争中为指挥英国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伦敦,焦点主要集中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在一次演讲中,他只有一次提到了财政援助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能为一次战争花掉100亿美元,那么也应该有办法来支援苏联。我觉得他不了解海湾国家、日本,还有其他国家,他们的前景受到伊拉克人侵的威胁,非常感激我们的领导作用,所以节省财力支持战争支出。

戈尔巴乔夫在事前给了我们一份详细的文件,介绍了他的经

济与社会改革计划。在他的演说中，他再一次概括了他的主要观点——价格自由化、卢布的可兑换——他暗示这两者都需要西方的财政援助，虽然从未明确其要求。他在细节上是模糊的，而且在语言上仍然强调混合经济与社会主义目标，不过他自己相信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更为广阔的原则，如私有化。当时我的感觉是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在会走之前得爬。我们仍然对他的军备和外援古巴感到关切，并向戈尔巴乔夫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援助将会切断，但是事实依旧，他们仍然在维持卡斯特罗。

总的来说，联席会议开得很好，没有争吵和对峙。当有些人对他的改革方案的细节提出好多问题来为难他——以训诫的口气时，我感到有点担心。欧共体主席雅克·德洛尔盘问戈尔巴乔夫就像一个教授提问学生一样。其含义是，如果你没有照办，那就得小心。其他人，如布赖恩·马尔罗尼，提出了同样重要的问题，但是以一种同事的口气，而不是教训和讽刺的口气。我一直小心避免向戈尔巴乔夫夸夸其谈，他值得平等地以友相待。

在一个间隙期，我试图向戈尔巴乔夫解释他没有必要介意个人性的布道。他们仅仅是提一些合法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是他们在决定援助之前想得到回答的。他不在乎地说没有感觉到被教训。对有些人（虽然不是梅杰和马尔罗尼）不注意海部俊树的讲话，把日本当外人，我也感到恼火。我觉得海部俊树的讲话很有道理也有教益。这是个我以前从未理解到的奇怪的文化鸿沟。这不是个偶然的小事，我一直担心对日本领导人缺乏礼貌不仅是有害的，而且对于七国首脑会产生反作用——他们需要日本的合作。附带地说，日本对七国首脑会议非常信任，这也许是他们所参加的最重要的论坛。

会议对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反应谨慎。我们需要看到改革更加丰满，我们决定最好的做法是在我已经提到的领域提供实用性的技术援助——能源、军转民、农业、食品分配。我们也支持苏联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准成员国地位。不过，对于苏联来说，在他们完成他们的“联邦条约”和在加盟共和国之间进行国内经济安排之前，不可能从国外获得更多的援助。

我自己与戈尔巴乔夫在温菲尔德宫的会面是温暖的。在会面期间，贝西默特尼耶克递来一个条子说他希望见贝克。布伦特和我猜想那是想消除在START(削减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的最后分歧——苏联是否准备使用新型导弹。我们所关注的倒不是分歧的实质，而是我们必须向其屈服这样一种感觉。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和平以及对苏联的经济援助，而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苏联想做的却是配置新式武器对准我们。我准备就此事与戈尔巴乔夫谈谈，但是在他就要到之前，吉姆进来看我并说：“我觉得我们要做笔交易。”布伦特也同意。当我和戈尔巴乔夫穿过照相室准备吃午饭时，他们打电话找来了军控专家商量细节。吃过饭以后，我把戈尔巴乔夫拉到一边密谈，此时吉姆和布伦特走进来，竖起大拇指说我们已经就军备控制达成一致。这是一个重大的和令人鼓舞的时刻：我们刚刚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削减我们的数千枚最致命的核武器。

我听着戈尔巴乔夫那天的苏联国内形势介绍，我越来越感到他的问题多迫切，他实施与加盟共和国的安排是多么重要。我告诉他叶利钦在访问美国时已经很好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戈尔巴乔夫说他的问题不是与叶利钦的关系，而是与叶利钦周围人的关系。他不相信叶利钦的小圈子，感觉他受了他们当中一些人的骗。

我想起在戴维营时他对叶利钦是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告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拥护我们所希望的许多事情——包括停止援助古巴、立即让波罗的海地区自由。戈尔巴乔夫能够做的而又能帮助他打动绝大多数美国人的事情是让波罗的海地区独立。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关键在宪法，并试图再一次解释独立的复杂性、补偿问题以及波罗的海地区与苏联其他地区的经济互补性。他自信地说问

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但是不谈他可能同意独立。在会谈中间，戈尔巴乔夫正式邀请我在7月份访问莫斯科，我接受了。

当戈尔巴乔夫在唐宁街10号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度过一个休闲之夜时，他感到十分自在。他自己给自己打趣，其中有一则故事是这样的。两个俄罗斯人抱怨买伏特加要排很长的队，其中一个人等得不耐烦了，说队太长了，他想去杀掉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是短缺的根源。他走掉两小时后又回到他朋友的队伍中，他朋友问："怎么样，被你杀掉了吧？"那人摇摇头："没有，要杀死他的人排的队比这里还要长。"戈尔巴乔夫一边讲一边大笑。

6月18日我离开伦敦到希腊和土耳其（我是从艾森豪威尔以来第一个到那里的总统）。图果·奥扎尔几个星期前打电话邀请我去伊斯兰堡，这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我们把行程扩大到希腊，北约在南欧的另一个盟国，希腊总理康士坦丁·米切塔克斯邀请我到他克里特的家中。我准时回到华府，开始了紧张的国内日程，我累坏了——离我访问莫斯科和出席另一个高峰会谈只剩几天时间。

当我们飞往莫斯科时，我阅读了科林·鲍威尔的一份报告。报告详细描述了他一个星期前作为军事交换计划的一部分在苏联旅行的印象，描述了至少在军方上层的广泛的不满。报告似乎证实了我自己的判断，表明我们多么需要小心翼翼地前行。

鲍威尔展示了他对军方、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正在兴起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的关系的观察：

> 虽然支持戈尔巴乔夫，但是军方上层人物对改革派嗤之以鼻。苏联元帅米哈伊尔·穆萨耶夫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大胆，他称谢瓦尔德纳泽退党为"叛变"（我不知道如果戈尔巴乔夫退党他会称其为什么）。将军们抱怨"总统"太多。一个不太著名的改革派人士，马杰·洛普丁（现在的人民代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面接待我。穆萨耶

夫很生气——在欢迎鲍威尔的宴会上，洛普丁准备敬酒，但被太平洋舰队司令制止了——穆萨耶夫后来对我说当他在街上碰到洛普丁时，对他摆出拳击姿势。我问他是否对所有的人民代表都这样。他说："你只要三个人就可以选一名代表：他们批评将军，批评政府，许诺任何事情。"

鲍威尔还写道，苏联军方"厌恶现在正在发展的多元主义，他们称之为无序与失控"。他们拥有无数的新式武器，而且很放纵。"军事设施，从兵营到疗养地，似乎只有这一个部门接受所有的投资。我们看到很多新坦克——而不是很多新汽车"。鲍威尔强调甚至整理一下苏联的320万军队都不仅是个浪费而且是个没有必要的事，特别是他们如果要想稳定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的话，但是"穆萨耶夫和军工厂不同意。我觉得未来他们将与任何进一步的削减作斗争。我也相信进一步的削减是不可避免的"。科林观察到穆萨耶夫元帅和他的高级职员们都是些士兵和官僚，他们准备尽力保护他们的制度。"他们在政治控制之下，而且行伍出身的人本身就难以控制。我怀疑他们征的兵会跟随他们到任何地方。戈尔巴乔夫已经把他们消化了不少。但是要戈尔巴乔夫或另外一个'总统'吃掉他们另一大块，那还得很长时间，但是他们不得不这样做"。鲍威尔把与他相处很好的穆萨耶夫视为"一个正直的士兵，而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

我们于6月29日晚近10时抵达莫斯科。在机场我受到副总统盖拉迪·亚那耶夫的迎接，我听说此人是个强硬派和冷心肠，但是他还是具有很好的幽默感的，只是不太迷人和不太讨人喜欢而已。在机场举行了一个简短但很热烈的仪式，没有演说，我们接见了他们的"第一部队(first Team)"，检阅了他们的仪仗队。我们花了30分钟驶达莫斯科。一些人在招手，我们上了耀眼的汽车(它

里面是亮的，好让人们看清里面坐的是谁），给亚那耶夫一个类似于美国竞选的感觉。坐在车里很难看到外面，我们向着灯柱挥了几次手，好开心。

第二天我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分别会面。接近中午时我与戈尔巴乔夫在圣卡特琳厅会面，这是一个华丽的接待室，墙上和天花板上挂着枝形吊灯和羊毛毯。戈尔巴乔夫、亚那耶夫、布伦特和我围着一个象牙色的桌子谈了近两小时。戈尔巴乔夫是了不起的，他究竟怎样顶住所有压力，我一点也不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仍然相信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大额的西方货币来帮助他克服苏联经济危机——他说的时候显得很自信——但是不久就清楚了，对于他不可能得到钱这个事实，他变得实用主义和顺从。

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完成了"联邦条约"的起草。虽然还有一部分加盟共和国反对，但是有 2/3 至 3/4 的加盟共和国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签署，不可能所有加盟共和国一下子都签约。"直到乌克兰决定签署时，过程将一直持续。第二步是新宪法，选举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以及组成新的政府。"他很自信，虽然在苏联的任一阶层都有人反对变化，但是反对越来越小了。"有些是吵闹，我们的媒体给予了关注，所以我们能够解决它。与加盟共和国合作也获得了动力。最困难的时期可能是 1991—1992 年。好就好在人民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决定加快私有化进程，以让人民有活可做。"但是我们需要学习东欧的经验，包括东德。"他补充说他们知道要与西方合作，他们必须加快步伐。

我想让戈尔巴乔夫认识到我们将尽可能地帮助他。我谈到了双边经济问题以及贸易与合作的可能性。要让美国公司与苏联合作，我们需要看到可见的进展。一个进展，一个大的项目，一个可以提供 1 亿美元的私人投资。"但是是私人的投资，你真正希望的

是什么?"我问,"是奇迹?"他回答说他想尽可能快地把国家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艰难中解脱出来。从这里我们开始一次非正式观念的集体讨论会,帮助他们解决硬通货的问题。

午饭后,戈尔巴乔夫和我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教堂广场,他做我的导游。天气晴朗,不是太热。我雨点般地向他提出所有问题。他骄傲地指着在鲜花丛中的巨大的列宁雕像,还有彼得大帝的雕像。不过,记者太多,太拥挤,我们只能前行 1 英尺。克格勃不得不扒开人群好让我们通行。出现了几个小事故,几个工作人员和记者被挤倒,相机被摔坏——但是"坦克"(克格勃)向前压去,戈尔巴乔夫自己也喊拥挤的记者们让开道。我们和人群已经几乎没有任何空隙。我不知道为什么摄影家非要站在我们前面 15 码的距离,与保安人员挤在一起,而且同样的图像咔嚓咔嚓摄个不停。整个路程花了近 15 分钟,因为我必须赶紧到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研究所演讲。

演讲以后我前往最高苏维埃与叶利钦会晤。他上午推掉了我们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另外两三个加盟共和国总统的多边会议,说他拒绝参加进"无脸的大众听众"的行列。在我们的个别会晤中,很明显他最重要的是保护俄罗斯的观念以及保证像对待苏联一样同等地对待俄罗斯。他告诉我说我是第一个他在新位置上接待的外国元首。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办公地点原来是戈尔巴乔夫用的。我们讨论了新联盟面临的问题,以及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等问题。我给波罗的海地区的自由定了调,他是高兴的。他说一天前他对戈尔巴乔夫说他应该向他们靠拢。但是叶利钦似乎对乌克兰的独立要求感到担忧,他害怕这会把联盟搞散。"乌克兰不能离开苏联。"他强调地说。没有它,苏联将是一个不平衡的、非斯拉夫加盟共和国占多数的国家。

那天晚上,在国宴之前我们在圣·弗拉基米尔大厅排在主宾队里,叶利钦的夫人娜娜——芭芭拉和我非常喜欢的人,后来她陪她

的丈夫访问美国——一个人进入队列。后来,在很晚的时候,在其他所有客人都到齐了以后,叶利钦才引人注目地走进来。他想陪芭芭拉进餐,但是他没有成功,因为这样会使戈尔巴乔夫难堪。戈尔巴乔夫陪着芭芭拉,我们一起进了餐厅。叶利钦还告诉马特洛克说他想在大使馆我们的回请宴上给我们敬酒,他想尽所有办法显示自己与戈尔巴乔夫平起平坐。

第二天,我向克里姆林宫墙的无名英雄墓献了花圈,在驶往戈尔巴乔夫的挪沃·奥加耶沃的郊区政府别墅之前与美国及苏联的企业家共进早餐。三个复合别墅很华丽,其中一个戈尔巴乔夫用来度周末,虽然赖莎说他们很少来。我们会见的那个别墅是美丽的,有很高的天花板、又软又厚的家具,很大的洗澡间。虽然没有克里姆林宫的艺术品,它仍然很舒服。我们沿着约 1/4 公里长的花园散步。树林里有很多鹿和野猪,但是我们被告知说这里不准打猎。

轻松的会谈一直持续近 5 小时可与一年前的戴维营会谈相媲美。就像在戴维营一样,我们穿着随便。戈尔巴乔夫一身灰色的衬衫、毛线衫和懒汉鞋。我穿一件水球衫。我们坐在圆桌边的藤椅上,别墅在我们的这一边,树林在另一边。

戈尔巴乔夫开始很长的独白,在其中我仅仅设法加进一些评论。他又一次回顾了苏联的国内形势,以及在变化的世界中我们两国的作用。他说他想把苏联的变化沿着法制的轨道前进,不要有危险或混乱。“没有教条能阻止我,”他大叫道,强调一周前他在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挑战。“当我们前行时将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他希望建立一种能够使社会保持团结的新经济。“美国领导人将是我们最严格的评判人,”他说。他转向地区问题。“专制主义,专制制度将离开历史舞台,”他继续说,“我们促成了这种变化”。现在是合作而不是寻求优势的时候。他建议我们在海湾与中东地区继续我们的互动精神。

大约在11点30分，会谈刚刚开始不久，贝克递来一张便条，写着6个立陶宛士兵在白俄罗斯边境海关被打死，还有一些人受伤。我立即问戈尔巴乔夫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看得出他脸色变白了，他让贝西默特尼耶克去调查情况。我希望这不是真的。这件事像阴霾一样笼罩在会谈上面。几分钟以后，贝西默特尼耶克回来了，贴在戈尔巴乔夫的耳朵上低语什么。戈尔巴乔夫解释说那里出现了一系列意外——一个白俄罗斯人被打死，他攻击兵营，现在已经平息。他说他们刚刚得知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可能进行了联合调查。后来，就这次意外戈尔巴乔夫向美国攻击他个人的人大发雷霆。但是我觉得他没起任何作用。

我们继续会谈，但是热烈的气氛已经没有了。戈尔巴乔夫谈到了那些他最关切的问题，以及他希望我们合作的领域，不仅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而且在苏联内部事务上。他攻击了中央所遇到的分离主义的压力，表达了对突然在加盟共和国发生的那些广泛的分离主义的立场。他重复了他喜欢的那句话，“进程”是重要的。

我们回到莫斯科圣·弗拉基米尔大厅签署START(削减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在仪式上我的确感到情绪的投入。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个仪式：它给全世界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希望，理想主义并未死亡。我们在真正削减洲际导弹上达成一致。在我的评论中，我偏离了我的讲稿。我提到了罗纳德·里根的名字，还有理查德·伯特和其他许多人在这个历史性的条约的谈判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希望我能够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除了军方不满的报告外，我们没有接管就要开始这种感觉。不过也有了一些迹象。在布什总统为戈尔巴乔夫举办的答谢宴会中，我与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坐在一起。亚佐夫是个中间偏右派——一个脾气大得很的人，有一双大手，红润的肤色表示他嗜酒如命。他是个很少言语的人，明显不谙外交闲聊。当苏联军队

的状况一天天恶化时,他满心郁闷,觉得什么事都走样了。没有新的装备(虽然鲍威尔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年轻人对征兵没有反应,从欧洲回来的士兵没有住房,等等。我问他为什么对苏联军队是否装备好表示那么大的关切,威胁在哪里?他回答说北约就是个威胁。我指出北约一直是个防御性的同盟。说到他严重关切的北约,我估计,他们原先所拥有的进攻性的装备因为削减现在可能全部被销毁了。他对这样的观察似乎稍感安慰,但是,在那天晚上晚些时间,以及伏特加酒兴耗尽以后,我设法让他去参加北约的酒会。

当我们登上空军1号时,丝毫没有想到这会是我们与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次高峰会谈。这是一次令人满意的会谈。我们最后确定了START(削减战略武器会谈)1号,这是在新时代的理性化的战略核武器道路上的一大步。戈尔巴乔夫显得太过乐观,在他看待国内问题的前景上几乎有点华而不实。波罗的海上空的乌云损害了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良好的进程并建立了我们双边高峰对话的亲善关系,而且从总体上说,似乎有理由认为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

乔治·布什

8月1日我从莫斯科飞抵基辅,对乌克兰进行短暂访问并会晤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我又一次由副总统亚那耶夫陪同,他上了空军1号来陪同我——这样做法对于最高层苏联官员肯定是第一遭。在高峰会谈当中,我开始对他有所了解,知道他喜欢钓鱼。当我回到白宫时,我在我的官邸办公室抽屉里翻来翻去,把所有的鱼饵都找出来,它们大多数是鲈鱼鱼饵,我想可能对他有用。

芭芭拉和我一起会晤克拉夫丘克。像在莫斯科机场一样,我们观看了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军事仪式。我难以忍受太矫饰的正步走,手要摆得老高,还要有仪仗队。我以前在莫斯科葬礼上看到

过这种仪仗队，但它在结尾的时候很生动。在莫斯科，他们奏美国和苏联国歌，在这里，他们又加上乌克兰国歌。成千上万热情的人群沿街而立。午饭后，我到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讲。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布什总统的演讲立即以“基辅母鸡”知名或声名狼藉。大部分是对自由、改革、民主和宽容的评论，它有这么一段：

> 但是，如果我们让专制繁荣，或者允许看起来很小的限制积少成多直至形成枷锁与桎梏，那么自由就不会生存。今天，我将访问在巴比·亚尔的纪念碑，一个阴森而又神圣的警示，警示人们如果不能抵制不宽容与专制的可怕的浪潮，就会发生什么。然而自由与独立不是一回事。美国人不会支持那些借寻求独立之名而用地方独裁者代替原来的专制者的人们。他们不会援助那些提倡在种族仇恨的基础上推进自杀性的民族主义的人们。
>
> 我们将支持那些希望建立民主的人。

媒体抓住这些词语，指控总统不支持那些寻求自由与自决的乌克兰人和其他人的渴望。他们谴责说，这是保持苏联统一的一个借口。他们错了。地方独裁者并不是直接指向乌克兰。它指的是所有受高涨的不宽容的民族主义威胁且大规模的暴力不断蔓延的地方。我们特别关注南斯拉夫、摩尔多瓦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进展。这种讲话在基辅发表因为很明显在莫斯科发布不太合适，而乌克兰是在俄罗斯之外的与此相关的惟一一站。当然，乌克兰的种族构成包含了民族冲突的可能性。南斯拉夫和若干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后来的历史证实了总统所表达的警告。

乔治·布什

当我到达巴比·亚尔纪念碑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纳粹入侵

者在那里杀死了数万名乌克兰人、犹太人和其他族人。在我讲话的中间，当我描述50年前的恐怖时我声音颤抖，那时纳粹让他们的赤身的牺牲者排队站在一个堑壕前面，他们的衣服被党卫军带回德国给人重新使用，在36小时之内射杀33 000人。党卫军用高音喇叭来淹没受害者的哭喊声。我被这里记述的历史漫长而可怕的这一章强烈震撼。

> 今天我们站在巴比·亚尔与令人敬畏的真理相对。我们惊异于人类行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我们发出神圣的誓约。
>
> 我们立誓这种屠杀将永远不会出现。
>
> 我们立誓决不让顽固与仇恨为所欲为。
>
> 我们立誓保证今后致力于自由与个人权利而抑制暴力与专制。
>
> 我们立誓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献身原则的激情有所衰退，我们就会想到这里。我们将永记当人们拒不保护美德时，邪恶就会繁盛。

我们向在场的幸存者表示敬意，也向帮助受害者生存的人表示敬意。

这就是漫长的7月。在8月1日我们返回华盛顿时，我期望在5天后我的假期开始时到肯尼邦克波特休息。我也期望戈尔巴乔夫在8月2日宣布新的“联盟条约”并等各加盟共和国签署后，也到克里米亚，以度假来阻止倒退。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还不是高枕无忧的时候。

第二十章 政 变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8月18日，星期日晚上大约10点30分，我躺在肯尼邦克波特挪那但饭店的床上看电报与听美国有线新闻网。我那天从华盛顿来这里接替鲍勃·盖茨，因为我想能有10天左右安静与相对休闲的时间。前面讲过，经验告诉我当总统在肯尼邦克波特，国家安全事务的领导人分散开来时，危机似乎就会神秘地出现。

我半听着电视，模模糊糊听播音员说，据报道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辞职了。我们两个星期前还见到他非常健康，所以我对这种报道不屑一顾，但开始仔细听。大约15分钟以后，报道又重复一次。我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盖茨，让他去调查此事。然后我打电话给罗曼·波帕迪克，他目前在肯尼邦克波特代理秘书之职。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不能处于沉默状态，所以我叫他过来。

已经是深夜了。我叫醒总统，告诉他我所听到的事情并指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得到的消息很少。我想我们必须发布某种声明，我与罗曼可以准备一个。总统和我打算第二天早晨6点30分打高尔夫球。我们决定密切关注局势，他让我5点30分时叫醒他，我想到那时我们应该知道有没有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同样关注鲍勃号飓风，预报说它可能在第二天什么时间经过新英格兰。我们想如果飓风严重的话我们很可能与华盛顿失去联系。不过总统很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不应改变计划过早地返回华盛顿，因

为这有可能给人家产生危机升级或灾难迫近的感觉。和一年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情况一样，我们在肯尼邦克波特可以工作得一样好。我们有全部最好的通讯工具，如果必要我们可以通过皮尔斯空军基地迅速与其他人联系上并立刻返回华盛顿。

乔治·布什

除了戈尔巴乔夫不予考虑的7月政变谣传外，近来存在着莫斯科的强硬派可能起事的某种迹象。8月17日星期六早晨，鲍勃·盖茨与我共进早餐，我们进行了总统的每日汇报。在汇报中有一个报告说未来联盟条约的签署对强硬派来说意味着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他们将被迫有所行动。鲍勃认为这种威胁是严重的，虽然我们尚未得到任何事情将会发生的消息。第二天，阴谋者起事了。

随着8月中旬事件的进展，我一直在我的录音日记中记下了我的反应。

日记，8月19日，星期一

布伦特打电话来说塔斯社报道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辞职。我大约5点30分向局势室打电话，他们给了我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最新消息。这是使我们措手不及的新闻。我今天早晨与布伦特提及此事，他说："是的，戈尔巴乔夫是辞职了。"看来消息是准确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多么感到意外，我开始考虑我要不要回到华盛顿，但是除了看起来太忙以外，在那里也做不了什么。我现在觉得我们与戈尔巴乔夫的合作进展得很好。有人可能不这样看，但是我们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右翼的政变，虽然近来我们确信民主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现在我们还得进一步观察事情是不是真的，观察苏联的大众会做些什么，会不会有总罢工？会不会有抵制？军方会不会用太多的武力

与太多的镇压以阻止进一步的民主进展?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星期一大约5点,仍然没有更具体的细节,但是莫斯科有一项声明,说戈尔巴乔夫已经被解除权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建立,其首领是副总统盖拉迪·亚那耶夫。委员会包括总理瓦伦廷·巴甫洛夫、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克鲁申科夫、奥列格、巴卡诺夫(负责军工厂)、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果,还有两个不太著名的人物:农业部长瓦莱里·斯塔罗都伯塞夫和国家工厂组织委员会主任亚·伊蒂兹亚科夫。我打电话给总统,知道他正与局势室联系询问最新情况。我提出举行记者招待会。消息太少使我们不快,但是总觉得应该说些什么。我们的困境在于我们不知道政变的最新情况。总统的意思是直截了当地谴责它,但是如果政变成功,我们就不得不与新领导打交道,而不管他们的行为多么令人厌恶。我们决定他既要表示谴责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绝。他还觉得应该与他的外国同事们交换一下意见。为了有时间与外国领导人联系上,我们决定招待会放在早晨7点30分。

乔治·布什

我的直接反应就是依靠一些非常活跃的外交电话来了解事件的进展情况,这不是疯狂,而是要向别的国家通报我们正在做些什么,特别是我们的盟国,还有那些并不总是站在最前线的国家。我的意思是政变是不能接受的。

我给约翰·梅杰打电话,主要是协调我们的反应。他得到的消息与我差不多,而且我们两人现在都还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到底怎么样了。我同意亚那耶夫似乎是个关键性人物。几分钟以后,我与弗朗西斯·密特朗的电话接通。我向他解释我准备发表一项声明,说我们将继续支持改革与开放进程。“但要避免重新对抗式的

声明。"我补充说。他说："的确，不要产生那种大势已去的感觉。这场政变将在几天或几个月内流产。它反对主流，用武力强迫一个转型国家的政权是极为困难的，它不可能得逞。"我声明我们应该坚持原则，同时我们也被搞得措手不及。"是的，"我说，想起布伦特早些时候向我所作的评论，"但是戈尔巴乔夫也一样措手不及。"

我们在莫斯科的主要代言人吉姆·科林斯，现在正在莫斯科等待我们刚刚指定的大使鲍勃·斯特劳斯的到来，他刚刚去了俄罗斯政府核心白宫，但没有见到叶利钦。他比我们对政变的情况了解得稍多一些。我又打电话给赫尔穆特·科尔。"我希望，"他说，"新的统治者能够明智到足以理解从以前的政策后退是不可能的事。"不管发生了什么，所有的国际协议，包括裁军与军备控制都必须继续。苏联除非尊重人权才会得到援助。我们对戈尔巴乔夫都深怀敬意，他说："作为一个德国人，我对他为我们所做的表示感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原先把记者招待会安排在老地方，即内含一个总统办公室的沃克小房子前面的草坪上。但是，招待会刚要开始时，飓风前的雨下了下来。不幸的是那里没有合适的室内简报设备。最后把招待会挪到我们的一所特工用的小房子里。记者们挤进来，衣服湿了，滴着雨水。

总统说对于他称之为"超越宪法的"、"令人困惑的"事件，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细节。他称赞了戈尔巴乔夫并说他已经与别的大国首脑接触过了。"政变只会失败。"他说，我们将对这次政变的发展保持关注。他不想做任何赞成所发生的事情的行为，也不想说任何赞成所发生的事情的话。当我们确知政变尚未完全完成的时候，随着这些谨慎的否定性的声明而来的，是一项对政变的领导人的企图进行尖锐批评与反对的声明。其中包括宣布支持叶利钦的"恢复合法选举的权力机关和重新确立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

乔夫"的号召。总统是第一个公开支持叶利钦的外国领导人,这位俄罗斯总统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乔治·布什

日记,8月19日

> 记者的问题总的说来还好,如"你为何吃惊?"将有大量的分析政策的人物出现,但是我的观点是,这完全表明了我们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立场。如果我们离开戈尔巴乔夫转而支持叶利钦,你就会发现比现在的发生的丑恶更坏的军事镇压。我相信这一点。我想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不能让戈尔巴乔夫所作出的进展倒退。我谈到东欧,谈到德国的统一,谈到从华约成员国撤军以及华约本身解散等问题。当然,(苏联)在中东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它的合作,谁知会怎样?

我在9:00刚过打电话给海部俊树,几分钟以后与布赖恩·马尔罗尼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承认我们对局势了解得还不多。"这是强硬派干的——普果、克鲁申科夫、亚佐夫、巴甫洛夫。我们不清楚穆萨耶夫在哪儿。有传闻说他向戈尔巴乔夫报告消息去了。"我回想起几周前访问苏联时我与亚那耶夫的谈话。"我们像所有人那样吃惊,"我补充说,"媒体说这是一个情报上的失败。"这是个典型的谴责。他们希望每一个细节、计划、动机,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都要由"情报"来参与。与此同时,有的记者攻击情报的作用,称之为某种不道德的、没有必要的东西。

"乔治,"布赖恩说,有一点你可能会代表我们大家受批评,他们会说,"这下好了,如果你们在伦敦会议上的那些人慷慨一点,也许这事就不会发生。"他想起七国首脑会议。"你可能想起在吃中饭时我转向赫尔穆特·科尔对他说,谁与局势离得最近——'如果

一个月之前戈尔巴乔夫被推翻，人们抱怨说我们做得不够，我们所建议做的事情不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吗？'他绝对会说：没有人预料到对伦敦会议决定的后果。"科尔最近在基辅会晤戈尔巴乔夫，他向我们保证这是戈尔巴乔夫最想要也最需要的。

我记得那次谈话。"如果我使美国太接近戈尔巴乔夫，我就会受到打击，"我说，"我会指出这是坏事中的好事，因为可以看到变化发生了。如果我们撤军支持，那么事情会发生得更早。"

"你从未怀疑过他之被推翻乃因与我们关系太密？"布赖恩问。

"没有，"我说，"看看新'领导人'怎么说将是很有趣的事情。一开始，他们说他健康有问题。它可能指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指甲掉了。更重要的是与其相配的经济混乱无序以及经济滑坡。而且我想，对于这些家伙而言，还有共产党的退步。这些是强硬派，他们视那个党是他们生命的血液，还有克格勃，永远干偷袭、破坏和威胁的勾当。"

布赖恩问我联盟条约的签署对事情是不是有影响。他相信戈尔巴乔夫回过来签字对于党内传统主义者来说是个"死亡之吻"，这就导致了政变。我虽然不能肯定，但这也很有可能(布伦特和我觉得这对于政变的时间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叶利钦站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坦克上说政变必须被推翻，"我补充说，"我必须给他的勇敢打高分。"

日记，8月19日

我想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已陷入危险境地。我想知道他的状况如何，他在哪里，他们会对他怎样。我特别想起了老卫兵亚佐夫，在我们访问苏联的整个时间里，他总是愤愤不平。喝好多酒，与约翰·苏努努以及其他人坐在桌子旁，抱怨事情是多么糟。

有线新闻网的图像是空洞的，一辆辆装甲运兵车停在莫斯科，坦克在大街上开来开去。然后报道说克里姆林宫被成千上万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一份官方声明说他们将承诺他们的国际协定，一个在波罗的海以外地区广泛引起困惑与关注的问题。原来使戈尔巴乔夫大发雷霆的兰兹伯格斯现在呼吁支持。如果支持意味着武力支持，这是难以同意的，就像诉诸武力在苏联国内难以获得尊敬与支持一样。他们希望我们阻止戈尔巴乔夫，给予叶利钦的极端主义者一些理性化的支持。

叶利钦呼吁让戈尔巴乔夫复位。极有趣，右翼人士呼吁忘记戈尔巴乔夫。他在那里是一种稳定的代表，但是现在，纵然是他，一个稳健的改革派，也遇到了麻烦。但是很明显，我们必须努力支持改革的力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以及其他所有人最近还告诉我们改革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考验的时候来了。

那一天，我们从苏联大使维克多·康普雷托夫那里得到亚那耶夫的一封信，他把信转交给在华盛顿的伊格尔伯格和盖茨。阴谋家解释了政变的“官方”理由：

太多的权力中心产生了一个无法控制的局势。所有这些，除了在人民中间扩展不满外什么也没达到。这里还存在着对于国家统一、单一的经济空间、单一的人权空间、单一的国防、单一的外交政策等等的实在的威胁。在这些状态下，正常生活是不可能的。作为国内种族冲突的结果，苏联国内许多地方出现了流血事件。苏联的解体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这种状况下，为了阻止滑向更大的灾难，除了采取

果断措施以外，我们别无选择。

亚那耶夫声称新政权将继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国际协定仍将有效。

日记，8月19日

……我决定把斯特劳斯招回华盛顿，明天将在椭圆形办公室和他进行谈话。吉姆·贝克去和他交谈并派去一架飞机把他（与贝克）一起带回。他们今天将到达。当然，在这当中，我们在这里将进行飓风般的抨击。我们总共有莱德·萨克斯、罗杰尔·克莱蒙、马斯·扬，还有其他人（他们是来打高尔夫球的），而我们所有人都想弄清如何撤出观景台的平房——它相对于主屋是不是安全。

叶利钦呼吁罢工，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仍然是保持平静，与我们的盟国保持接触，尽一切可能扭转这场军事接管。当然，我们的选择是有限而长远的。

此时我开始担心波罗的海地区。我们正与准备提供军事支持的兰兹伯格斯争吵。我们听说爱沙尼亚已被苏联军队接管，立陶宛的电台、电视台已被苏联军队控制。这样我们就有了大问题，对国内问题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冷静、坚定、忠于原则。不要因惊恐而发布太光火的声明。看看我们能走到哪儿。

在我们飞回华盛顿的路上，在空军1号上给梅杰又一次打电话。梅杰想我们是不是要开一个北约部长级会议。我对此持保留态度，因为这有可能使人认为我们要武装起来了。认为我们预见到了对西方的军事威胁。如

果北约明显要派兵的话，那么需要波罗的海地区的领导人要求我们这样做。卷入某种对峙，这是个最坏的事情。叶利钦希望我们让联合国发布支持改革的声明，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也乐意做。

西班牙总理菲利普·冈萨雷斯和其他人认为现在说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为时太早，甚至准备采取这种步骤都为时过早。当我和瓦克拉夫·哈费尔和莱奇·瓦文萨通话时，他们两个人都不担心他们国家会有军事危险，虽然哈费尔将苏联的形势与1968年春天的捷克斯洛伐克情况相比较。匈牙利的安太尔补充说对于苏联军队从他的国家撤出，这是个好观念的证据。他对匈牙利共产党的活动比苏联重新占领更加担心。

日记，8月19日

斯特劳斯和贝克飞回来了。他们在今天10点到达。我突然产生一个召开全体内阁会议的想法。丹·奎尔对该做什么表示疑问，我对他说他应该在他应该在的地方，稍事休息以后，我打算明天回到缅因州。我觉得我回来是件好事。布伦特在飞机上对记者谈话，他们对总统的离去表示奇怪。事情到底紧急到何种程度？一次尖锐的记者招待会，但是没有任何敌意。

我想搞清楚的是批评家将会从何处对我们进行攻击。而且难说他们是不是从右翼对我进行攻击。关于"右"，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对波罗的海能做些什么？我们如何保证他们的自由？联邦条约将于明天签署，而且这就是促成这次接管的原因。政变的阴谋者说他们正在做有关住房、能源和食品方面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是人

民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他们如何做?

大约3点,我们试图接通克里姆林宫的直线,告诉他们我想与戈尔巴乔夫讲话,但是没有接通。

有人看到叶利钦站在一个坦克上向人民讲话。另外一个问题是苏联军队将开向何方?在选举中,70%的俄罗斯军人支持叶利钦。他自己声称对俄罗斯的所有职能负有全责。那些坏家伙,阴谋政变者是如何敢走这一步的?

……如果今天晚上我对此事进行评论,我会说,"戈尔巴乔夫,我希望你平安。我希望他们没有亏待你。你曾经领导你的国家走上了一条令人难以相信的建设性的道路。你曾经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但是你值得无限的尊敬。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厄运会降临到你的头上,不知道你在哪里,你的处境怎样,但是我们都支持你,我为我们支持你而感到骄傲,在电视上会有无数个有头脑的人告诉我们什么是错误,但是你做了对你的国家是正确的、强大的、好的事情。我喜欢你并且希望你返回权力,虽然我对此还抱有怀疑。我对你的妻子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想念她和你的家庭。我喜欢亚那耶夫,在我见到他时我就喜欢他了,不过现在我不这样了,而且我同意匈牙利的安太尔的话,他说亚那耶夫仅是一个受人控制的傀儡。今夜我坐在这里,自然的力量的猛击着肯尼邦克波特,但不是很厉害,我看到权力政治的强力猛击到你身上。如果你正在倾听,那么不要听这个国家的极端力量的声音。我们支持你,而且我们支持你是正确的。

当我坐在这里面对着一大堆我们能够收集到的最好的建议时,我不能肯定,戈尔巴乔夫,你能否有任何机会回来。我希望你从未妥协到这种地步,当你回来时你将

失去支持。我希望叶利钦坚强起来,他呼吁你返回,希望他不要被这些丑恶的右翼阴谋者清除掉。我坚信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我们将站在世界舆论的角度看看他们是如何了结的。

现在我们得到很多观点。弗兰克·加夫尼似乎一直反对我们的军控政策,常常与帕特·布坎南并肩而坐。他今晚也在此。他们问他是否希望动用军事力量,他说不,但是他希望我们给改革者以更多的援助。好,我也是这样认为。比尔·科尔比持非常有理的观点。我的问题是,在一年前伊拉克问题上,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肯定要发生的事情是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返回,以及一场持续的民主运动。我不能肯定如何到达那里——这路新人是强硬派和专制主义者。亚那耶夫,他的某些原话说他是个强硬的共产主义者,他的确是。他们看到了这个党的衰败,他们看到了改革者反对他们所被教导去相信的所有东西,对此他们无法适应。我的观点是民主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们不可能被扼杀,因此我们相信并努力施加影响让戈尔巴乔夫返回,而叶利钦的当选是民主运动向前推进的标志。但这是不容易的,太不容易了。

19 日晚上已经足够,飓风已过去,主屋、栏杆一切完好。苏联处于混乱之中,东欧令人担忧,但是生命在继续。8 月 19 日,历史性的一天。

第二天,在我于白宫向鲍勃·斯特劳斯训示之前,我给叶利钦打个电话,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竟然接通了他。我问他情况怎么样了。

"情况非常复杂,"他说,"戈尔巴乔夫总统在克里米亚的弗罗斯。他被绝对控制住了,没有办法与他联系上。亚那耶夫总统(原话如此)的借口是戈尔巴乔夫生病了,但这没有得到证实。基本上,一个八人委员会接管了总统权力并且在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地区建立了一种紧急状态。军队被调进莫斯科,不仅是城市,而且是莫斯科市区和郊区。作出这些决定以后,这八个人自我暴露为右翼小集团。我出现在人民和士兵面前,向他们说委员会的行动是违宪的,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是无效的。

"最高苏维埃大楼和总统办公室被包围了,我估计随时都可能爆发激烈冲突。我们在这里已经24小时。我们不会离开。我呼吁成千上万人民站出来保卫合法选举的政府。

"基本上,这是个右派的政变,小集团的每一个人都很知名。他们想接管俄罗斯、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民主选举的领导人。今天早晨我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克鲁申科夫提出10条要求,其中一条是会见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要求我也要求和戈尔巴乔夫通话,要求我联合世界的领导人。他宣布了一场罢工,实际上所有的工厂和企业已经停顿。"我们将继续要求停顿直到这个委员会被推翻并受到审判。除非他们诉诸最极端的流血措施,我们没有失去任何希望的信念。当然,受伤的动物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不能保证他们不会采取极端措施。"我告诉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和合法政府复位问题上,我们全力支持他。我向他说昨天我试图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但是没有接通。不过,我同意这个想法,即我公开说我要和戈尔巴乔夫讲话。

"我们这边变化太快,所以我们不能等到明天晚上再联系,"叶利钦说,"事情可以说一小时一变。"

"我很高兴这样,"我说,"我希望线不要断。"我补充说我准备给亚那耶夫打电话,但是我不会做任何使这个政权合法化的事情。

"不,绝对不行,你不能这样做,"叶利钦赶快说,"你的一个官

方电话就可能使他们合法化。我们试图派一个小组去克里米亚见戈尔巴乔夫，但是他被卫兵和克格勃包围了三层。”

“我们全都努力接触到他，”我说，“我们虽然没有希望，但是它可以保证戈尔巴乔夫政权的合法性。”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这次电话以后，或者在第二天，我记得叶利钦说他能听到坦克在街头向议会大楼开去的声音。他说他必须去了，而且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听到他的讲话。当然坦克没有向大楼开火，但是这个插曲净化了叶利钦。

乔治·布什

正如叶利钦所说，这是一个现象上非常复杂的事情。我决定在不使我们卷入战争的前提下介入此事，以伸张我们的民主与改革原则。

第二天，8 月 21 日，星期三，我又与叶利钦通上了话。他显得更有自信，但是没有宣布已经取得胜利。“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坐在议会大楼前未移开一步，”他用一种戏剧气氛开始，“总统先生，我想告诉你我与克鲁申科夫以及军方谈了话，武力已经停止。上万人把他们截住了，不让他们向大楼开火。”他解释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已经决定宣布政变的图谋是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是无效的。他们支持作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的所有命令与行动。“他们还给我一项特别权力，如果地方当局支持小集团，他们将被撤职。”

叶利钦说克鲁申科夫主张他们飞往克里米亚见戈尔巴乔夫。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没有允许他前去。总理伊凡·西拉维耶夫和副总统亚历山大·罗斯科伊代他前行。普里马科夫和瓦金·巴加林也与他们同往。“我试图做的是与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合作，让他中途拦截他们，让他们在克里米亚的西弗罗普港登岸但是不让他们第一个见到他。现在已经有三架

飞机起航,试图最先到达那里见戈尔巴乔夫。

“包围的危险依然同前。小集团的空战部队指挥拒绝服从国防部长的命令,决定站到俄罗斯这一边。根据我的命令,他已经驾驶他的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到基地。我的代总理领导的一个小组驻扎在俄罗斯的地理中心地带,所以在我被捉的时候,俄罗斯的领导人能够继续。

“同样在昨天晚上,克拉夫丘克和那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总统)报告说他们已经决定不服从小集团的决定。成千上万莫斯科市民仍然继续包围联邦大厦。根据我的命令,所有的军队与坦克都正在离开莫斯科的外围地区。不过,仍然还有克格勃军队和斯佩纳茨部队不听我的命令可能发动攻击。这是这一个小时的情况。”

我问叶利钦,克拉夫丘克是否会与他合作不让五个政变小组成员见戈尔巴乔夫。他不能确定,但是克拉夫丘克说他只要有可能将做一切。“不过,这些飞机都是带有武装人员的直升机。他答应乌克兰的航空控制站将使他们降落在西弗罗普,而这不是戈尔巴乔夫待的地方。但是我不能确定,因为还有其他一些技术问题。”

“苏联有没有人能接触到戈尔巴乔夫?”我问。

“没有,”他说,“因为甚至是我今天也尝试了好几次,你需要一个特殊的定位装置。接线员告诉我们甚至无法接通他的两位助手。要么是我们打不进,要么是他们阻挡我们。通过戈尔巴乔夫的卫兵我们确定他是健康的,也确定他没有签署任何将其权力交给任何人的文件。如果我们在克里米亚无法拦截这些人的话,我们也将试图在他们返回莫斯科时拦截他们。我们已作好这样做的准备。我可以在电话中告诉你细节。”

我问其他的政变成员怎么样了。我希望穆萨耶夫已经放弃。叶利钦说卢季扬诺夫似乎已经放弃,并且力图显示他一开始就没

有与政变小组站在一起,他完全赞成宪法的方法。其他三人仍然在莫斯科继续维持政变。“巴甫洛夫躺在医院。”他补充说。

“真病了?”我问。

“不,‘外交手段’病。”他回答说。

我奇怪贝西默特尼耶克怎么会退回自己的办公室,他是个职业政治家。叶利钦嘲笑说“是的,但是他一直保持中立”。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叶利钦说除了揭露他们的行径和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发布声明以外,他没发现任何技术或其他方面可以提供的支持。现在的主要任务是8月26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他将尽力通过一项决议,说这个委员会的接管是非法的。他正在游说每一个代表支持这项动议。这样,政变阴谋者将处于法律的保护之外并被带上法庭进行审判。不过,在其他方面,也需要游说代表。

我问及波罗的海的情况,政变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显然是这个地区。爱沙尼亚在前一天已经宣布独立,拉脱维亚在我们打电话时也在宣布独立。叶利钦说30架特种部队飞机已经飞往那里。“他们已经在许多地方和区域进行接管。我们现在试图做的是劝说特种部队的司令让他的军队离开那地方,不要派兵去那里。我们现在正在与他们讨论。如果我们能说服他,他就会撤回军队。他把情况向国防部长亚佐夫作了汇报。”

我承诺我们将继续支持他。“除了伊拉克、利比亚、古巴以外,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持你们,”我说,“人民对你的支持超出了你的想像。”

“我将尽我所能挽救俄罗斯与全苏联的民主。”叶利钦大声地说。

一会儿以后,我与梅杰通话。他告诉我他刚刚拿到了一个条子说塔斯社报道八人小组已经被解散。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它的确切含义以及谁给塔斯社这个消息。这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们还

不愿宣布政变已经被挫败。我指出我们不希望削弱叶利钦，而且我们不得不对戈尔巴乔夫的地位表示关切。梅杰判断说叶利钦的地位将得到增强而戈尔巴乔夫将处于一种非常的政治夹层之中。我说他们至少还是同道人。“超出这一点，我们将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苏联。”

日记，8月21日

缅因州是个大雨天。布伦特与我坐在我的起居室，贝克和其他人在打电话。我们收到斯特劳斯打来的电话，他说美国应要求参加DCM层次的小组到克里米亚去见戈尔巴乔夫。我想这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因为事情并不如飞机从这里起飞然后降落到那里那么简单。

又一个情绪饱满的一天。我带着约翰尼·莫里斯（我的朋友）及其孩子上了“忠诚号”船。我们全速前进在波浪起伏的水域。然后回到了码头，约翰·马克高（我的特工头头）说：“你有一个国家首脑的电话。”“谁？”我问。他说他们在电话中不说。我回到屋里，到卧室拿起电话，是戈尔巴乔夫打来的。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我一直让信号交换台定时试图接通戈尔巴乔夫。最后，在星期三下午，出人意料地，他们接通了。我们不得不让他不要挂然后急忙去找总统。在等待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通过他的翻译彼德·阿凡那森科说话。“上帝！”他惊呼。“我被监禁了4天。”彼德向他解释说我们正在找总统。“我们能等，”戈尔巴乔夫说，“你不能相信这是个什么样子。我被完全隔离了。”

乔治·布什

当我接过电话时接线员告诉我是戈尔巴乔夫。“哦，我的上帝，太好了，”我说，“米哈伊尔！”

“我亲爱的乔治，我真高兴再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戈尔巴乔夫说。

“我的上帝，真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你怎么样？”

“总统先生，”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冒险没有取得成功。我在这里已经四天，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对我施压，他们用海与地将我隔离。我的卫兵保护我，我们经受住了挑战。”

“你现在在哪？”我问。

“我在克里米亚。从我重获总统权力到现在才一个多小时。我保持与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的完全联系，现在把这个工作移交给国防部长穆萨耶夫，他是一个现在听我指挥的人。军队已经撤出城市或回到他们正常待的地方。”他补充说他们以前做的与加盟共和国加强合作的努力全都取得了效果。“他们所有人都被撤职了。这些非法行动的最大反对者是叶利钦。”这是个可怕的悲剧，他说，“它表明冒险没有获得成功。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同了，像这样的事情已经无法成功。”

我问阴谋家们怎么样了。“有的人来看我，”他说，“我不知道他们负何种使命而来。过两天我必须作出所有这些紧急关键性的决定。”他已经与叶利钦通了话，他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给他的。他对我们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谢，说他一旦返回莫斯科把事情处理停当后立即跟我联系。“我们希望与你保持联系。”戈尔巴乔夫说，“因为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不能再迟疑。这事是被民主制止的，这是我们的保证。我们将在国内外保持合作。”

“这才像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充满生命力与自信。你一回去我们就联系，看看有什么新进展。”

日记,8月21日

所有这些使我认识到美国的反应是多么重要。我们可以反应太激,可以派兵救那里的人民于水火。我们在可能说那地方无论是谁我们都能对付。但是我想我这一次得到的劝告是对的,我觉得我们发现了恰当的平衡。在这场事件中,肯定地说,我们在苏联的关键性人物那里得到了巨大的信任。

很难说对那些参加者来说会发生些什么。亚那耶夫是个历史,我可以肯定。有传言说亚佐夫死了,自杀了。传言说普果和克鲁申科夫被捕了,说来说去,这仍然是个非常黑暗的局势。

叶利钦那天晚上又一次打电话来向我介绍了新情况。他在最高苏维埃院中。切拉耶夫和鲁茨科伊把戈尔巴乔夫带回莫斯科,没受伤害,健康状况很好。亚佐夫、巴甫洛夫和克鲁申科夫已被监禁。按照叶利钦的命令,苏联大法官开始对所有阴谋家立案审查。

"我想因我们国家民主的巨大胜利而感谢你,"叶利钦说,"我们必须紧密合作以使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非常感谢你的巨大的帮助。我自己对你与美国人民也表示感谢。"

"我的朋友,你的股票现在是牛气冲天,"我说,"你显示了对法律与民主原则的尊重,值得庆贺。你是个站在前线的人,排除障碍的人——我们所做的就是支持你。你使戈尔巴乔夫未受损伤地返回。你恢复了他的权力,你在全世界赢得了大量的朋友。我们支持你并因为你的勇气与作为感谢你。如果你现在想从一个朋友那里获得劝告的话,休息休息,睡上一觉。"

我问他穆萨耶夫的情况。他是否还在位?"不,他不在了。"叶

利钦说,"我们没有抓他。这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决定的。我只命令抓亚佐夫、巴甫洛夫和克鲁申科夫[1]。"

在8月21日之前,我们就因为我们的对苏政策而受到攻击——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并且可以阻止政变的发生。我这两天的日记记下了我对批评的反应。

> 当我们受到左右两方的攻击时我难以记录下我的情绪。左派——格普哈特说我们必须投入更多的钱而却没有。右派说你不应该与戈尔巴乔夫靠得这么近——我觉得我们走得是最合适的道路,我们的政策是可以站得住脚的,民主是可以自我巩固的。现在不必担心来自军队、克格勃等等对他的政治权力的威胁。而且也许我们可以在诸如古巴、阿富汗、波罗的海地区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
>
> 政变为什么会爆发与钱多钱少关系不大。它比钱要复杂多了。它与联盟条约有关,与军队的权力有关,与削减军队有关,与亚佐夫以及其他军工企业一直骨鲠在喉的军备控制议程有关。现在要让那些评头论足的人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分析这个问题当然是太容易了。我们在波罗的海地区还有问题。戈尔巴乔夫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他们自由。在他的莫斯科别墅我已经跟他讲过了。现在对他权力的挑战已经很少,这个权力在政变中受到打击,因此,他应该走在前头。摆脱波罗的海国家,确立一些项目,这些项目能对苏联的利益有所补偿,能确立一种新的分配系统和在某种更形式化的方式上改变对

[1] 在八人当中,普果觉得会被捕,在被捕之前自杀了。其他人在1994年2月俄罗斯议会通过的赦免法中被赦免。

波罗的海地区的依赖。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无论是在国内政策还是在国际政策的争论上，当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怨气在聚积时，政变是某种我们一直担心的东西。他已经面临了若干次从党内与政府对他的权力的严重挑战。他偶尔表示关切，但是在以策略制胜与压倒他的挑战者与恶意批评者的时候，他总是显示出很大的技巧。

签署联邦条约的时间表有可能促成这次事件。阴谋者可能想如果听任苏联作出如此剧烈的改变，那么要再把事情挽回就太晚了。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在条约准备好后，政变阴谋集团加紧了反对的步伐。不管如何，阴谋者由那些西方人听到就发抖达40年的那些组织的领导人构成：军队、安全部队和党。人们可能合理地得出结论说阴谋者的仓促反应产生了失败的后果。

当戈尔巴乔夫后来在1992年会见总统时，他已经有了一套不同的理论。他说在他会晤总统的同一个莫斯科郊区别墅，他曾经召开了一次领导人会议。他被诱使到另一个房间，很明显是一个装上窃听器的房间。在那里他讨论了他的政府改组计划，其中一个计划包括要换掉巴甫洛夫和克鲁申科夫。因为听到谈话了，作为反应，政变的时间提前了。

结果，阴谋者有可能只是简单地感觉到事情变得太快、走得太远了。在戈尔巴乔夫度假的时候下手似乎最合适。不管故事的真实解释到底是什么，但是批评者说如果我们在那年夏天给戈尔巴乔夫多一些援助，政变就可能避免，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戈尔巴乔夫从额外的财政资助获得收益以前，几乎完全可以肯定，资金流入必然促使政变者采取行动。

第二十一章 载入史册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8月事件的失败加速了苏共中央权力的衰退，特别是对苏共的不信任和戈尔巴乔夫个人政治生涯的结束，它预示着由人气较旺的叶利钦为首的共和国的出现。同时，这个事件也影响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个人关系，8月23日以前，叶利钦辅佐戈尔巴乔夫出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那段时间，他们的关系已经表面化了。叶利钦抓住每个机会让戈尔巴乔夫丢面子并且明目张胆地下令清除障碍。我相信，戈尔巴乔夫是真心真意地感激叶利钦有一段时间对他的支持，但随后他却被迫在苏维埃政府内部大声宣读关于那次事件声援程度的详细报告。不过，真正暴露问题是在他返回莫斯科后的一个紧急会议期间，他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尝试，他让人们相信共产主义，还宣称它能给人们注入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现象表明他远离当时形势，同时也说明了他的言论带有纯思想家的色彩。这个信号不会错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过去了。

乔治·布什

我认为叶利钦在事件平息后的确是一位铁腕人物，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彻底交出权力。我知道他们俩彼此不喜欢对方，那时叶利钦以全然蔑视的眼光看待政治上软弱的戈尔巴乔夫，终于他赢得了这一天，并且声望越来越高，他几乎不客气和不温和地将戈尔巴乔夫推出了历史画面。然而，这次事件看起来没能使从前的政治对手结成同盟，因为他们在为维护控制权和阻止对手改革而相

互争斗。

事件后的那个星期所发生的事叫人难以置信，不仅是对直接的密谋者，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紧密层周围也来了一个清洗。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此时有多少是他愿意做的，有多少是在叶利钦坚决主张下做的，我始终弄不清楚。戈尔巴乔夫看起来不情愿惩罚某些主要的密谋者并且在短期内又重新起用穆萨耶夫，但不久我们又听说叶利钦强迫他撤掉了这个曾经很有前途的年轻将军。我对穆萨耶夫很欣赏和喜欢，同时也遗憾他参与了这个事件，对亚佐夫我没有这种感觉，而对于马歇尔·瑟盖·阿克罗米耶夫，他的自杀无论如何让我感到深深的悲哀。马歇尔·瑟盖·阿克罗米耶夫虽然没有充当主要角色，但他不知怎地卷入了这个事件之中，他是一个可尊敬的、正直的军人，正如他以前告诉布莱特的那样，他目睹了他所重视和为之努力工作的每件事的破坏。还有一个类似的人物也被开除了，那就是戈尔巴乔夫撤换了亚历山大·贝西默特尼耶克，因为他未能有效地制止这个事件。据称外交部长给支持这个事件的所有使节发了遣返通知。第一个被替换的是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鲍里斯·潘金，不过最终戈尔巴乔夫又将他送回去了。戈尔巴乔夫还解散了部长会议，下令改组克格勃。

与此同时，针对党的领导能力他采取了措施，因为它在许多问题上有支持那次事件的企图。这一举动部分来自他清理和改组党的决心，但事实上又成为叶利钦把他打入冷宫的契机。叶利钦强行压制戈尔巴乔夫，关闭了苏联中央委员会总部，停了党报甚至暂停了苏联共产党的活动。8 月 24 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诉我他将辞去总书记一职（虽然他仍是名党员），下令政府没收党的财产。在他宣布的第二天，他又说中央委员会应该解散并主张建立一个新党。几天后，苏维埃主席团禁止了共产党的活动。尽管这有助于事态发展，但我认为仍存在着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如果叶利钦或他的支持者体验出成功的味道，忘乎所以地将他们的新法规和计

划强加给苏维埃主席团,激起当时有威胁的持强硬路线当权派的痛骂和改组,那麻烦可就大了。

共和国则利用混乱继续他们脱离出苏联的冲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事件中已宣布了他们的独立(立陶宛重新肯定它的1990年宣言),8月24日占苏联人口1/15的乌克兰,为独立(取决于12月1日的公民复决)、乌克兰货币和在它境内苏联军队的控制权等问题进行投票。第二天,白俄罗斯也为独立投票。尽管戈尔巴乔夫还在拒绝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强调仅有人民代表议会才有资格承认,但这毕竟是逝去的历史。俄罗斯承认他们,并且叶利钦宣称他们也要立刻行动起来。

为了戈尔巴乔夫政治派别的缘故,也为了美苏关系,我希望能在西方表态之前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等待时间越长,形势就越发紧张。但我想让戈尔巴乔夫避免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压力,因为美国不久将宣布承认,而国内他和他的同僚正在受到威胁。无论形势变得如何,给他们时间,大量的时间来承认波罗的海三国,我想这在苏联是说得过去的(或是可以理解的)。我计划用我们的影响,为我和世界上所有希望看到这种变化的人在幕后悄悄地做点工作,同时我不想苏联中央领导人感到四处碰壁而采取某些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在这个国家内部的党和安全部队里,有一些主张强硬路线的危险分子我从不掉以轻心,尤其是当他们感到不能有什么东西听任失去时更加危险。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总统说得对,因为没有及时承认波罗的海三国,我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强烈的批评。其实这很容易做到,因为没有哪个比我们更愿意看到他们的解放。但是我们正在为他们得到永久的解放而努力。由苏维埃自觉地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这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否则民族主义权利意识苏醒,他们更容易扭转局势,要求疲弱的苏联在威胁下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

可以申述独立是没有条件依据的,这样情况会持续到莫斯科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为止,我们要阻止有那种想法的人成功。

乔治·布什

我要求同盟国的领导采取行动以前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我通过海底电报与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告诉他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决定在8月30日承认波罗的海三国。他请求我们最好能等到9月2日后,因为新的苏维埃政府会议将在这天对此事采取行动。我同意了。与其像每个人预期的我们单方面先承认波罗的海三国,不如鼓励苏联先于我们承认。如果我们先采取行动承认了波罗的海三国,那对于戈尔巴乔夫在公众舞台上无疑将是重重的一击,也使得本已脆弱的苏联又将多一些不和谐音符。

日　记

肯尼邦克波特,1991年9月2日中午1点整,我独自坐在阳台上,那是我奇妙休假的最后一天,也是苏联处在混乱中的一天。在静静地吃完杂烩、一点火腿三明治和一小杯雪梨酒后,我一个人坐在外面。

大约有40只海鸥站在我附近的岩石上,10—15只鸬鹚散落在我常钓鱼的岩石上。那可能是我在9月看到的最晴朗的一天,我的思绪回到了1944年的9月2日——47年前的今天,我在邦尼岛被击中,而到现在为止许多的事情发生过了——在我生活里和这个世界上。

今天有一个紧急会议,我要承认波罗的海三国。我电话通知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总统,并在几天前告诉了立陶宛的兰兹伯格斯。我告诉他们我将做些什么,并告诉他们我们这么久才宣布的原因,我努力利用美国的权力和声望激励戈尔巴乔夫更快地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

> 立，而不是要做出某种姿态或充当什么老大。昨天，戈尔巴乔夫对这个事件发表了声明，今天要讨论“十个和一个”合约，在这里不同的共和国将决定他们自己和中央的关系——当然，能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最好。

苏联的命运被提到议事日程。事件后的几天人民代表议会曾开会考虑到它的附带问题，9月5日已对“尊重主权国家的宣言和被共和国批准的独立协定”进行投票，尽管真正地独立要经过与苏联在专门领域的对话之后，包括人权协定的签字、签署原子能及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加入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组织。议会支持一个新的独立国家联盟，待详细的协议出台建立一个过渡时期政府之后，成立一个由苏联总统任命的共和国（至少是决定留在新的政治联盟中的这些共和国）总统联席会议，它充当政府并且协调共同纲领；组成一个共和国之间内部的经济委员会，促成不涉及苏联协定的经济协议，同时修订最高苏维埃的中央与共和国间的关系协定。新政府应该遵守所有现行协定，核武器应听从中央命令，苏联军队也应该保留，虽然命令权（被改组过的）由中央苏维埃当局和共和国分享。

共和国加入新联盟还不确定，或者说看起来不像是最后结果。9月6日，新的苏联国家议会赞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没有参与。几个星期内，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其他的共和国为独立投了票，尽管几乎所有的共和国仍保留在苏联机构中并为联盟协定在工作。

9月4日我们返回华盛顿后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对这一剧变做出反应，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布什总统认为美国自认在决定苏联过渡结果方面能充当主要角色是不利的。他认为苏联和共和国应该能明确他们自己的将来并且我们应该抵制反对和批评每个进步的企图。面对更大的自由，动力是十分明显的。来自美

国的要求或声明可能有反作用，这些变化会惊动苏联走强硬路线的反对派们。

乔治·布什

内阁会议期间我听到的讨论越多，就越让我确信在设计详细的援助项目方面我们还了解得不够。我们不想要苏联挨饿或缺少机器，但是我所关心的在西方七大工业国会议上宣布的庞大技术援助项目，仍然只是一个美好的目标。我们在两个方面承担责任：一个是我已经宣布美国将帮助缓解这年冬天苏联的食品短缺并为其挑选所需的专家；其二，我们将提供药品援助到 1992 年底。在我们提供主要的财政支持以前，我们必须看到共和国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存在。科尔和梅杰建议考虑我们彼此如何能重新检验并且讨论我们现存的与苏联的双边经济关系、技术援助以便能帮助这个民族对付它直接的问题。

第二天，针对苏联未来战略我们开了一个很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焦点集中在我们是否支持解体、军队控制问题以及苏联原子能力量的改变，以便我们有一个既得利益。

布什总统观察到，波罗的海三国的最终自由和其他国家匆忙之中的宣布独立使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俄罗斯联邦及其他共和国中的小共和国的未来以及包容许多种族的苏联军队也有许多问题。所有这些情况正导致分裂，没有人能猜测出会发生什么。而且，即便叶利钦是个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他又如何能看出以后一个月的情况？我们不应该为实现目标匆忙地采取行动。

切尼提出一个更“积极”的目标，他主张我们发挥比预想中更多的杠杆作用，如果只是简单回应我们将坐失良机。“假定事态发展离结束还远”，他说：“……我们就做一个保持缄默的政府。我从现在关注一年左右时间，如果它变糟糕了，我们能解释不介入的原

国……"他建议采纳鲍勃·盖茨的一个主意,在所有的共和国建立领事馆,而且让我们关注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应该引导和塑造这个事件",当然,它对鼓励苏联解体只能是做做样子。斯考克罗夫特认为无论是欧洲人的援助项目还是我们的西方七大工业国项目,我们的援助要建立在一个强大中央的前提下。"那是一个过时的想法。"切尼反驳道。贝克认为我们应继续努力支持中央,"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对待这些共和国,"他说,"我们应该拜访各国领事,做一些能让这个中央强大起来的事,面对共和国独立的趋势,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做出回应。"

"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对付乌克兰呢?"切尼问。"我们正在做出回应,"斯考克罗夫特注意到切尼的暗示是指我们正在面临的是15或16个独立国家。"苏联自觉的解体是我们的一大利益",切尼指出,"如果它是自愿的脱离,一切照常;如果民主失败,他们变小了我们更容易对付。"

"苏联的和平解体对我们有利,"贝克纠正道,"我们不要另一个南斯拉夫。"

总统问我们乌克兰会不会在新联盟之中,"不会。"切尼预言道。"我们公然鼓励吗?"总统又问。切尼认为不应该:"我们的公开立场应该仅仅讨论在这个土地上我们仍然期望保护和维持下去的事。"

斯考克罗夫特问贝克如果这种抉择会导致流血他是否还将支持苏联。"沿用赫尔辛基的准则,边境上的和平是我们最关心的。"贝克回答道。"但是如果流血和解体有联系我们还支持解体吗?"斯考克罗夫特问。贝克认为我们应该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们友好相处,而不是煽动他们。

"我们不该等新的联盟协议出台吗?"布什总统问。

"你能和一个软弱的中央打交道吗?"斯考克罗夫特插进来。"如果没有其他政权,这个中央能控制军队吗?"切尼认为如果我们

知道用我们的政策来指引方向，我们能做得更多。鲍威尔则不太确定，“我们想看到老苏维埃联盟解散，”他说，“但这不意味着15个共和国可围着我们转，与某些组织联盟探寻双边关系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考虑苏联解体时还有苏联的命运问题、核武器的控制和命令权——它涉及四个共和国，这点由斯考克罗夫特提出。“我很放心它们在那里”，鲍威尔说，“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拥有它们，现在是红军，如果他们移交给俄罗斯，我不知道谁能控制得住。”

“这个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总统提醒大家。他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在为防御节约经费方面做些事情。切尼说五角大楼正着手审查这方面所有的项目和战略。其中一个可能是进一步削减短程导弹系统，可能超出现有的削减战略核武器会谈协议所指的幅度。斯考克罗夫特建议我们着眼于原子能试验，加大军队控制力度。鲍威尔补充说我们应该考虑改变我们的战略进攻的戒备水平。“这些棘手的提议叫人伤脑筋，”布什总统说，“我们要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之前平息这些问题。”没有更富建设性的事情可做，他在大家急躁的争论中结束了这个会议。

乔治·布什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行政机关内部对于我们怎样更好地让这些改革者的势力迅速扩大的争论在继续。有许多独立的共和国好，还是有一个以某种联盟方式、至少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的松散中央好？我个人感觉理想的最好的方式是讨论延伸到许多不同国家，因为它们没有令人敬畏的苏联的权力。无论如何，共和国需要同另一个“中央”有所联系，这样能发展它们的经济。在共和国内部有许多经济依赖关系，因此应该有个正式的合作和协调，另外我们想看到的最终结果是障碍的拆除或平等的经济竞争，因为它们中的某个共和国拒绝买或向其他国家提供谷物、能源等。

不久,我感受到共和国对苏联的不满,那是当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9月底访问华盛顿时,当时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改革还未出台,这使独立成为了可能。我上次见到克拉夫丘克是在基辅,到现在已发生了许多事情。克拉夫丘克,资深的苏共官员,他说乌克兰想完全独立。12月最高苏维埃为独立投票举行的公民复决就要开始了。他在8月事件中支持戈尔巴乔夫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但不久就可能退休。

克拉夫丘克告诉我,乌克兰不再相信中央除了把他们的生活搞糟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他请求经济援助和投资,要求我们绕过莫斯科直接和乌克兰联系。他好像没有意识到他提议的牵连和复杂性,我指出,乌克兰还是要协调商业和税法,并且与其他共和国建立协议。如果他们想得到投资,就要有一个大气候,在这里人们知道他们在和谁做生意,在更多的共和国有哪些生意业务上的简化。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虽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我没有坦率地指出,但我仍然相信我们能更好地摆脱苏联解体的阴影。从经济上讲解体对我们可能最为有利,但我们主要的安全利益受解体的影响,因此要分化我们面临的军队的威胁。当然无论如何它不能成为美国官方的政策,这样一个立场会造成与俄罗斯联邦的长期敌对,而它们占有苏联的绝大部分。无论从哪方面我们能影响这件事的力量都很有限,因此赞成解体的公众立场的势头看起来无法抵抗了。

对于贝克努力影响和平过渡的先人之见,国务院作出的反应是在独立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我们想看到的反对暴力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自己的目标。吉姆和我讨论过并且我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几天前宣布了。这“五项原则”不像我们为德国统一而设计的,它包括通过民主途径的自觉自愿、现有边界的尊重、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分歧、民主和法规的尊重、人权、以及坚持国际法和苏联

现有的协定契约,我们在后面还加了第六个——关于核武器的中央控制并且反对内部和外部生产的防护措施。虽然制定了这些原则,但因为看待问题视角的不同、事件的瞬息万变以及对解体时核武器控制讨论的关注,所以我们没能为存在解体可能的苏联设计出一个严密的行政方针。

在后一点上我可能不太担心,从苏联变成若干共和国,战略核武器的控制和命令的分散会有积极的利益。在我看来,它有助于淡化我们可能面对的攻击威力,对统一控制武器能力的退化有积极的利益。但无论如何中央政权的腐朽仍被看做具有潜在的危险,尤其是集团破坏后,会有国家武器控制力自然丧失的可能性。苏联的核武器主要有四个共和国把持: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无论是武器还是可裂变物质方面,不是所有共和国的操纵和使其安全能力叫人放心。对于美国来说,当这种特殊危险相当遥远时,我们担心这个国家能否为我们也为他们自己以及周围的共和国找出一个安全、控制激增问题的新主人。而且,我们(包括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个共识,宁愿看到武器在一个有能力和经验使其安全的整体手中。当时在9月份,我们仍倾向于一个中央政府的可能性,但最终,"一个整体"变成了俄罗斯。

正如总统9月5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和后来指出的,他还要在双方减少核武器,数量远远超过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的计划。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同时苏联和任何接任国家的领导们,将同我们一起工作。他的结束语把我们引向一个新方向,这是关于战略战术上武装控制主动权问题。切尼对于武器控制谈判的反感、以及与战术核武器有关的一些后果给了我一个提示,也许我们能利用这个情况同时解决一系列战术核武器问题。

比方说在欧洲,因为短程核武器有可能引爆德国的领土,因此德国在统一时舍弃了这种不受欢迎的武器。眼下再次讨论德国这一举措的必要性是切尼建议的基础。而对于被看作海军军械库的

朝鲜半岛，我们要解决另外一些问题。联系与到朝鲜交战的结果，韩国正建议迁移定居在那儿的美国核武器。我们不希望单独在朝鲜半岛行动，这会让朝鲜认为我们的行动是撤退的开始。海军的问题不太一样，许多国家不情愿让我们的军舰运载核武器进入他们的港口，尤其日本和新西兰的海军对于这种武器的存在既不批准也不拒绝，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此外，不再有针对潜水艇的较理想的武器。所有这些结果促使我建议我们将单方面销毁所有的战术核武器(空掷的除外)。

布什总统和我坐在观景台的平台上，我们讨论这样一个主动清除武器的可能性和关于战略方面的设想。他热衷于这个设想的长远性并要求我与切尼保持一致。迪克的最初反应是怀疑，他不相信能销毁所有撤回来的核武器，但是在经过一番讨论和修改后，他签字了。关于战略性武器，我们政策的焦点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在军械库中绝大多数不稳定的核武器和在苏联中的一些已明确销毁。这不同于战术上的减少，但无论如何只要是互惠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就是明智的，所以他们应该去谈判，我们也可使我们的攻击部队解除戒备状态。这些变化不仅是减少了核武器，而且也在增强所剩武器的安全性方面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所以在军队控制方面开始了新的变化，这是空前规模和特征的变化，是按大家更容易商谈的方式设计的。这主意成了 START(削减战略武器会谈)2 号的核心。1993 年 1 月，也就是在我们离开办公室前签署了它，1995 年 12 月参议院批准。

乔治·布什

五角大楼对这次主动行动给予高度的配合，迪克·切尼和科林·鲍威尔(以及工作班子的领导们)也因他们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突破而得到了很高的赞誉。我们准备 9 月 27 日主动地宣布单方面裁减，这是自 1950 年以来美国在核战略上最显著和最广泛的变化。在这之前我们曾发动过被看做是冷战的牵制战

略。我准备清晰地说出这个生动的计划，但因为有些首字母缩写和专门术语，比如SLCM、ALCM等，又有点担心它在美国的影响，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是不熟悉的，这个计划可能会被描述得过于复杂和太专业化了，所以我们试图在讲话时用直白的语言来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很显然，这样做最后的讲话是成功的。

正式主动行动包括消除战略进攻的戒备状态、所有我们已经在START（削减战略武器会谈）1号（还未实施）项目下安排销毁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失、几个导弹项目的停止和取消、核弹壳的排除和销毁、来自海军舰船和潜水艇的核弹头排除、也包括用于以陆地为目标的海军飞机上的核武器。我呼吁苏联也这样做。我大致描述了我们的新的战略军事计划，针对不管来源于哪里的有限弹道导弹攻击，要求他们同意支持有限度的运用防御保护。最后，我计划设立几个讨论来探究在拆除和销毁核弹头方面，增加物理安全、核武器安全，以及核命令和控制安排等方面的合作。

讲话前我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告诉他我已经给他写了一封关于这个声明详情的信，这个提议的焦点意味着确信苏联核威力的安全。戈尔巴乔夫积极地响应，但他还不能明确告诉我他将采取什么措施，他问如果这是单方面的行动会怎样。关键的问题是核试验，他们需要协商此事。

通过这次电话和另外一些政府间的接触，我感到有一种真诚合作的氛围，或许因为8月事件我们一直站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边并且表明我们想要看到他们成功；或许是因为马耳他会议和戴维营会议后，萌发了更亲密的关系和信任，总而言之，这是一种真诚合作的感觉。吉姆·贝克9月上旬到莫斯科，他分别告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正在为苏联和美国结束所有对阿富汗争斗者的支持制定了一个协议，并尽最大努力同他们一起工作。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迹象，戈尔巴乔夫想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他同意从古巴撤离他们的军队，并且打算在通知古巴之前宣布它。戈尔

巴乔夫和叶利钦还一同支持核武器的中央控制——无论苏联会变成什么样。

在军队控制主动权上我第一次打电话给叶利钦，他立刻喜欢上了这个计划，并且答应推动苏联作出积极的反应。我有点担心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个人，我们既不想伤害戈尔巴乔夫，也不想忽略正处在上升势头中的叶利钦——很明显未来由他承担。我认为军队控制权仍在戈尔巴乔夫职责范围，他对我先前的态度和我正在认识到叶利钦的政治高度是敏感的。当我在电话中和他谈到我想告诉叶利钦我很信任他，并请戈尔巴乔夫在我联络不到叶利钦的情况下转告他本人时，电话中有一个无情的沉默。

戈尔巴乔夫在 10 月 5 日宣布他的计划，事先他通知了我，他要销毁在海上的战术核武器，并准备裁减更多的战略武器，另外苏联也打算从重型攻击中解除戒备状态、贮存他们的武器。他计划停止试验一年，且准备讨论一个减少可裂变物质的计划。另外，苏联军队将减少700 000人。这虽和我们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它是积极的。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他已经和叶利钦谈过，并且叶利钦也同意——这令我高兴。他同时说 12 个共和国已经起草了一份经济联盟的协议，且将有一个新的联盟协定。

我和叶利钦在 10 月 8 日讨论了这个经济协定，他说他希望在三天后的莫斯科会议上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我们明白我们几乎没有多少利益，因为事实上，我们还可能失去一些东西，但我们还将签署它，因为有更大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拯救苏联。”其实叶利钦想让其他共和国都签署这个经济联盟协定，然后利用它作为一个正式政治联盟的基础。叶利钦正和戈尔巴乔夫在军队控制主动权问题上一起工作，他们正建议更根本地裁减苏联军队，因为俄罗斯有他们自己潜在的庞大的军队。紧接着，10 月 19 日 8 个共和国签署了一个独立联盟经济共同协定草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也于几天后在协议上签了字。

整个10月我都在为月底马德里召开的中东和平会议作准备，我们要求苏联也成为共同的支持者。这次会议真的很令我高兴，因为它是海湾战争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如果没有冲突事件的成功解决以及我们同阿拉伯联盟结成的合作体，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会议，我们希望利用和阿拉伯联盟锻造的这种友善来推动地区的和平与安全。1991年我们大家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尤其是吉姆·贝克的部分思想加入到此次进程中并使马德里会议获得成功，因为我们一起制服了那个不情愿安分的对手。

我期望在马德里有机会见到戈尔巴乔夫并和他有个长谈。

日记，10月26日

很清楚，对我来说戈尔巴乔夫和中央已经同从前大不一样了，他俨然越来越衰弱。我渴望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他在原子能问题上仍然重要，除了所有经济方面——依我看共和国好像自己正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猜测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是有趣的，我记得前不久他还如何地不支持叶利钦，在戴维营（1990年6月）他很明显地表达他不认为叶利钦在向某个目标努力。但现在不同了。最近有消息说他在位时间大概不会太长，按这个说法这可能是我和他最后一次在这个地方开会。

10月29日我遇到戈尔巴乔夫，那是中东和平会谈前的一天，在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馆的午宴后。一个盒子形状的建筑物在大使馆后面的山坡上，戈尔巴乔夫饶有兴趣地看着，微笑洋溢在他脸上，但不如从前那样充满活力。他描述着苏联国内的发展并要求贷款。我知道这对于他来说很不容易。他说他需要3.5亿美元的农业贷款和相当于1.5亿美元的食品援助。我告诉他我们仅能考

虑1.5亿美元的农业贷款，因为我们的报告显示苏联的贷款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糟糕得多，银行几乎全部倒闭。戈尔巴乔夫仍然争辩利用他们所有的资源，他们可以偿还贷款，他好像没意识到他正在固执己见地提要求。

这时，我打断了戈尔巴乔夫，“你看，”我说，“我不想伤害你和叶利钦，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地知道一些你们之间真正的关系。”叶利钦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经济改革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描述了这种剧变带来的调整——包括物价控制、农业和一些工业私有化速度以及结束外国援助——同时他也提醒其他共和国，如果他们在制定一个新的联盟协定问题上不合作，俄罗斯将带着它的军队和货币走自己的路(因为乌克兰的两个共和国已宣布这样做)。叶利钦没有提及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府，但他提醒从9月1日起停止给一些部门和“从前的联盟”办事处提供经费。戈尔巴乔夫告诉我叶利钦的这个经济政策大部分是积极的，但也有一些是令人担心的。“他在联盟协定上回避了一些问题，”他说，“但是我仍然给他支持，因为他推进改革——只要他不拥护分裂主义。”

这个晚上，我们和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一起出席了由胡安·卡洛斯国王在他的住所扎左拉宫殿招待的晚宴。国王友好地向我致意，并且我很高兴早些时候我们在东京期间(裕仁天皇的葬礼)的会见。实际上在戴维营我们就开始认识了，我敬重他，他是被国际公认的伟大的君主，在西班牙很受尊敬，因继佛朗哥时代后帮助他的国家平稳过渡到民主时代而声名远扬。

戈尔巴乔夫和赖莎不久到了。在一个话题上赖莎谈起那次事件中她被限制在克里米亚的事，我告诉她芭芭拉(没能来出席)看到她和她的孙儿在莫斯科下飞机的画面时掉泪了，芭芭拉已经给赖莎写了一封信，告诉赖莎当她知道他们安全以后她是多么的宽慰。说到这时，赖莎看起来一副真诚喜欢芭芭拉的样子。

我们坐在沙发上，旁边有一个方形的玻璃面的咖啡桌，这个客

厅极舒适，王室家庭的私人画像陈列在这些桌子上方和墙上，周围是更多的个人肖像和挂毯。当王后陪同赖莎到房间外面后，只剩我们四个人准备吃饭，我们打了几组电话回去。

我坐在国王旁边，对面是戈尔巴乔夫，他的情绪逐渐兴奋起来，他给我们精彩描述了克里米亚那决定性的24小时。他说他的卫队仍然很忠诚，是安全部队的头儿向密谋者出卖了自己，使他们有机会接近他。他讲述自己被迫对外作了一个关于他情况的录像带声明，以显示他的健康状态很好。他在一个带子里录了四个声明，安全部队拿到后将它裁开卷成小团，计划如何绕过卫队得到它们。事后戈尔巴乔夫通过吉姆·贝克9月去莫斯科时送了我一个，因为在带子被送来以前，我正收集这个事件结束的有关资料。

戈尔巴乔夫反省赫鲁晓夫在60年代早期为何从办公室被赶出的原因是被指控掌握了太多的权力。他解释道，在近期一个共和国领导人会议上，他已经说了“我不需要权力，并且如何不期待它”。他已经告诉公众他之所以要保护苏联，不是为了权力；如果他们叫他下来，他会辞职的，但是他们中间没人能接替他的位置。这时，国王问戈尔巴乔夫他们是不是想剪掉他的翅膀，戈尔巴乔夫认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会这样做，尽管他承认有些人要削减中央的权力。

对乌克兰仍留在联盟内戈尔巴乔夫感到欣慰（我没有打断他，虽然我回忆起我和克拉夫丘克不到一个月前的谈话），这时他也提到庞大的“俄罗斯问题”以及其他共和国，他听起来对克拉夫丘克评价不高，他不认为克拉夫丘克能赢得这个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相反地，他倾心于纳萨尔坦·那扎尔巴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他说，此人有一个“关于苏联应该如何工作下去的好主意”。关于叶利钦，他告诉我将继续同他一起工作，而我的感觉是尽管叶利钦相当强大，但他很坦白地并不支持戈尔巴乔夫。

这天晚上是我会见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很好机会，我和他有着

真挚的友谊,正如我在日记中回忆到的:

> 他的问题是庞大的,我很担心那个结果会真的出现——"这将是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最后一次会谈。"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事情发展得太快了,他不能保留从前拥有的军队,事实上他几乎成了个看守人。也许戈尔巴乔夫已感觉到他正处在一个不稳定的斜坡上,但我必须说他在谈话中并没显露出来,他很清楚问题是复杂的,但他并未显示出焦虑,他不相信自己已经被洗刷出去了。

当我们抓紧对苏联解体作出反应时,我们同俄罗斯、乌克兰的关系就成了公开的问题。当9月来临,叶利钦开始了系统地为俄罗斯从苏联争取权力,解除同中央的关系,并且声称自己是经济、金融和政治方面的权威。乌克兰将面临两种决断:第一,是否独立投票;第二,如果他们选择独立,是否会在戈尔巴乔夫设想的新联盟中。比较好的可能性是他们将为独立投票,这是共识。我们要小心对待,不能太轻率以至于激化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俄罗斯是放弃乌克兰和它的12 000万俄罗斯人种的重要阻力。最后,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他们两者之间的对抗——也许是一个经济战争,俄罗斯开始按世界石油价格向乌克兰收费、而乌克兰则以削减从俄罗斯进口工业食品和农产品作为回应。

乌克兰加入新联盟(尽管这是戈尔巴乔夫的乐观估计)还不确定,在两个共和政体间的归属关系也没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共和国的总统仍在争论国家结构问题,戈尔巴乔夫主张建立由单个州在里面的联盟,叶利钦和其他人则支持建立独联体,尽管他们对这个组织的牢固程度看法不一。11月14日政府委员会通过了没有共同的章程和基本协定的独联体。一旦他们和自己的国会商

量之后，这个协定就签字。形势是混乱的，虽然有中央集权的武装部队，包括核武器军械库，但最后公开的这个协定文件暗指了这些新联盟的每个成员可以拥有他们本国的政策甚至他们自己的军队。此时苏联如何工作下去是茫然的。这个协定计划于 11 月 25 日在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被签署，但是这期间，叶利钦宣称最高苏维埃反对这个文件的某些部分并且要求延期——其他共和国的总统也纷纷效法。戈尔巴乔夫也考虑到更多的工作要等到乌克兰 12 月 1 日全民公决之后再做，如果预先签定协议，那可能会影响反对一个联盟的结果。最后，总统们同意提交给立法委员会讨论通过这个协定，并且在年底前再碰面签署它，回避这个问题直到乌克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就这样，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延期。

乔治·布什

在全民公决前一天，我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告诉他我们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支持乌克兰，但我们也想为和平过渡到新秩序做点事。对我来说，承认乌克兰接下来就把它带入一个协议进程——关于它转移主权的问题。我补充说我想看到合理的安排，核武器的中央控制，一个无核的乌克兰，人权和少数民族的尊重以及现存协议如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和欧洲常规武器会谈的履行。我说我们将派一个外交使节去讨论这些事情。

很明显戈尔巴乔夫对这个消息不太满意，接下来不幸的是我的乌—美会谈也被披露，对承认乌克兰我们在作一个重大考虑。“这表明美国不仅试图影响这件事，而且还想介入进去。”他抱怨说。他宣称即使大多数共和国宣布独立也不能阻止他们由多方参与的联盟的形成。他好像在想乌克兰无论如何仍可以成为联盟的一部分。

显然戈尔巴乔夫相信应该在联盟内部保留自由，他让我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把事情导向“错误的”一方。他提示如果乌克兰脱

离，生活在那里的俄罗斯人和非乌克兰人将成为外国公民。此外，克里米亚人（以前曾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后来勃列日涅夫把它划给了乌克兰）也威胁如果共和国独立，他们将“重新考虑自己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的地位”。叶利钦正在要求归还所有俄罗斯的领土，包括在塔吉克斯坦、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如果这个进程被打断，”他警告，“对于俄罗斯、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地方将是一个大灾难。”我告诉戈尔巴乔夫我想采取合作态度，但欢迎独立的同时要防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激进因素。我努力不为难他和叶利钦，也不在他们的内部事件里调和。他告诉我在一个改革的会议上，他们所有的人都认可政治联盟是必要的，“没有它，”戈尔巴乔夫再次警告，“结果对于苏联、你和全世界都是灾难。”

随后，我与叶利钦有一个 45 分钟的谈话，其间回顾了我与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观点，以及我对苏联稳定的担心。他的想法和戈尔巴乔夫不同，他明白我的关注，他指出仅有七个共和国为这个联盟签字——五个伊斯兰国家和两个斯拉夫国家，他们分属于白俄罗斯 Byelorussia（现更名白俄罗斯 Belarus）和俄罗斯，他表示关注，因为它意味着两个最大的国家（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得票上将胜过对方。

“我对你一如既往地开诚布公，”他说，“我相信如果乌克兰不加入……这将更是一个疲弱的联盟。我今天也告诉过戈尔巴乔夫，像昨天在新闻评论上说的，如果乌克兰不加入联盟，这对苏联将是个难题，”叶利钦相信如果乌克兰为独立投票，将不签订这个新的协议。“我认为新的乌克兰总统不会和戈尔巴乔夫开始磋商，但会和俄罗斯对话。”他补充道，因为俄罗斯—乌克兰关系的重要，所以如果乌克兰宣布独立，无论这个新国家是否会在联盟协议上签字，俄罗斯都会承认它。“真的吗？”我问。“是的，我们需要马上去做，”他断然地说，“……戈尔巴乔夫没认识到这点，他仍认为乌克兰会签字，”叶利钦又补充说他将在 12 月会见乌克兰的新总统

讨论新关系的基础,比较高的预期是解决核问题。

实际上我已经向他和戈尔巴乔夫表过态,但叶利钦仍提醒如果不承认乌克兰,将会在极端主义者中间导致叛乱。"但是你是对的",他又说,"在乌克兰和苏联之间我们不能失去纽带,我正在为保护这个联盟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我们和乌克兰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中亚共和国更重要,我们需要供给。"最后他要求我不要透露这次谈话的内容,直到公民投票结果公布。

正如那天下午我告诉布赖恩·马尔罗尼的,我没有预料到美国会拖那么长的时间才承认乌克兰,但我的确想给它和苏联一个调和问题的机会。尽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乌克兰是否会留在联盟意见不同,但我认为他们俩最终应该同意独立。

在加拿大的西部省有一大批乌克兰人,布赖恩迫于压力承认了乌克兰。"我不喜欢做任何伤害戈尔巴乔夫的事,"他不容置疑地说,"即使我们已经意识到和苏联保持一致已失去意义。"

"的确如此,"我说,"帮助戈尔巴乔夫那多半是私人的事。"布赖恩说:"我们在对待波罗的海三国的态度上,我几乎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不想做任何不团结的事,尽管存在着语义和措辞方面的差异,但我们和你们的目标是接近的,我们将确定并承认乌克兰的独立,然后协商建立外交关系。"

"那也正是我们想要做的。"我答道。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乌克兰是创建一个可行性联盟的关键。戈尔巴乔夫不知何故认为乌克兰为独立投票却仍然会加入联盟。叶利钦不以为然,他关于尽快承认独立的意见表明他正在用计谋让乌克兰留在联盟之外,并因此导致联盟的失败。对于苏联国内俄罗斯在承认乌克兰和它广大的俄罗斯人种独立的政治分歧上叶利钦是相当敏感的,无论如何乌克兰或俄罗斯都会将这个赌注押到新联盟的关键部位。如果俄罗斯不承认乌克兰的独立,他就不得不考虑和乌克兰

的长期敌对。对我们来说,我们正处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关系不稳定的时期,虽然我们有来自乌克兰——美国必须立即承认的重大压力,但是它也被看作是偏袒一方和宣判苏联命运的事。

当鲍勃·斯特劳斯大使告诉谢瓦尔德纳泽我们的意图时,这位外交部长显得十分悲观。他提醒斯特劳斯如果乌克兰独立,军方可能会有强烈反应。他前天已与在8月事件期间安排苏联白宫防卫的将军谈了话,军方提醒在军队中保守势力的基础依然强大并且正在秘密组织行动。保留在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的苏联军队也有着相当不满的情绪,类似的问题会在乌克兰以外更大的范围发生。"这是一个令人悲观的民族。"他断言说。

谢瓦尔德纳泽也告诫我们不要信任那些正煽动民族主义高潮的共和国的领导们。事实上,他说乌克兰的共产党是苏联最保守的之一,它的领导人暗地里支持了8月事件。他指责克拉夫丘克实际上事先知道了这个事件,但他没有及时通知戈尔巴乔夫。现在共产党正在团结乌克兰的分裂主义势力并试图拯救自己。

乔治·布什

12月1日,乌克兰人以多数得票赢得了独立——90%,并且克拉夫丘克也获得了62%的选票。我在12月3日给他打了电话,向他表示祝贺。他告诉我叶利钦已经与他联系,说俄罗斯将承认乌克兰,正如叶利钦所说的那样,两人将在12月8日会面来协调政策。我说我们希望看到摆脱核武器、CSCE(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原则的坚持、边界的防护以及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等事情的兑现,我们将派一个使节去讨论这些问题。

12月8日,叶利钦打电话告诉我他与克拉夫丘克以及白俄罗斯总统斯坦尼斯拉夫·舒斯科维奇的会见,事实上,他那时仍和他们在布列斯特附近狩猎场的会议室里。

"今天,在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想在你从新闻里知道之前由我自己来通知你"。他炫耀着。他说他们已经举行了两天的会议,已同意"我们不满于某个人正推动我们签字的地方组织和联盟协议,那就是我们走到一起在几分钟前逐字地签定一个联合声明的原因"。

叶利钦听起来就像在朗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详述联盟协议周边磋商的问题及苏联现存的问题,并断言中央目光短浅的方针已经使本国的政治经济出现危机。最终他们签署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他加重语气说,"包含了16个条款,它是创建联邦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基础。"简言之,叶利钦告诉我,他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总统已决定解散苏联。

当他念完了准备好的这段文字,他的语调变了,他提示这个协定包括一个向所有从前共和国开放联邦的条款,所有成员国将履行国际公约和前苏联所签协定,包括外国援助债务。"我们这样做也为了核武器的统一控制和不扩散。"他向我重申。目前这个文件已经被三个共和国的领导签过字了,他刚才又和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谈了话,他表示和他们的行动保持一致并且计划尽可能快地签字。

对我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仅为赢得美国的支持而设计的,因为他们直接针对我们已经公开的关于承认的条件。我并不想过早地表明赞成或是反对,"我明白了。"我简短地说。

"这是很重要的,"叶利钦说,"这四个国家的产品占苏联的90%,对于形成一个联邦这是一个尝试,一个步骤,毕竟让我们从这个大中央里自由出来,这个中央对我们发号施令已70多年了,这是重大的一步。并且我们希望,我们确信,我们肯定这是走出危机状态的惟一途径。"

"总统先生,"他补充道,"我要悄悄告诉你,戈尔巴乔夫总统不知道这些结果,他只知道我们有个会见——事实上是我亲自告诉

他的。的确我们将马上送给他这份协议的文字材料，按他的水平肯定又将有个讨论。总统先生，我今天非常非常坦率地和你谈话，我们四个国家感到这是我们摆脱危机状态惟一可行的道路，我们不想悄悄做任何事，我们将立刻向新闻界发表一个声明，并期待着你的理解。"

"亲爱的乔治，"他说，"我已经讲完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按照我们之间的惯例，我不能等十分钟以后再说。"于是，我答应叶利钦只要这个协定一发给我我就看，并且很快作出答复。我感觉有一点点不安，"为了进步我们将和你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我说，"当然，我们希望整个事态的发展将是一个和平的进程。"为避免美国有支持叶利钦之嫌，我补充说我们明白这必须经参与者来选择，而不是外部诸如美国的参与。叶利钦同意，并且十分自信地补充道他确信其他所有的共和国不久也会加入进来。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接下来在12月8日的独联体声明中，叶利钦勤恳工作并彻底解散了苏联。事实上，当他和戈尔巴乔夫在那个未遂事件后一同出现在最高苏维埃以前，他就开始了这个进程。这些成就的目标与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不如说是对苏联本身。有一点疑惑的是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目标，还是叶利钦抓住了一个由那次事件结果提供的意外机会——戈尔巴乔夫的疲软和他自身实力的增强。

像8月事件的导火索一样，预期的联盟协议投票的重要性被叶利钦在乌克兰独立表决问题上的先人之见所证实，他似乎决心阻止乌克兰加入戈尔巴乔夫的联盟。对于那次事件的密谋集团和叶利钦，新联盟被看作把苏联带入新起点和新历程的一个步骤——所以不能让其达到目的。

看着叶利钦撇开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劈成一块一块，并且把大多数的利益转移到俄罗斯这是件痛苦的事。最终，戈尔巴乔夫的控制权比耶维金里·沙波斯尼科夫将军更小，此人是苏联军队的司

令,他的势力正在快速地被从前的共和国消融。也许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确过去了,但他应得到更少一些的不名誉的结局。

乔治·布什

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诡计很恼怒,这个深思熟虑的计划打击了正在崩溃的苏联。他和叶利钦开始了争斗,同时他们都在试图拉拢军队对他们的支持。

日记,12月8日

现在我听说戈尔巴乔夫在讲叶利钦和其他人所签的全部协定是违法的。"我们需要一个全民公决,我们要人民出来说话"。就在这个星期一晚上,我发现自己对军事行动又有了担心,军队在哪里——他们已经沉默了,将会发生什么?这能摆脱支配吗?戈尔巴乔夫将会辞职吗?他会组织反击吗?叶利钦适当地通盘考虑过这些问题吗?这是严峻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

五天后,叶利钦再次打电话给我,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议会日前已经彼此认可了联盟协定,中亚五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也已决定加入,并将于12月21日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签署这个文件。他继续说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已表示他们也将签署。"也就是说在12月20日或21日或22日十个独立国家将一起签署这个协议。另外,我会见了军队全体将领、安全部队以及国际安全部队人员,他们都支持我们的决定。今天,在莫斯科的一切都很平静"。叶利钦每天和戈尔巴乔夫保持联系以确保平稳过渡。"12月底1月初将会有一个完整的独联体,并且中央这个组织将停止存在。我们对米哈伊尔·萨基耶维斯·戈尔巴乔夫表示最大的敬意和热情。我们认为由他来决定他自己的命运是比较好的"。核武

器将在统一的命令之下，至于剩下来的军队，因为他们认为海军和空军属于战略部队的部分，所以除了乌克兰有它自己的地面部队外，所有其他共和国的部队将被遗留下来。

我问叶利钦他觉得戈尔巴乔夫会做什么，他说他日前和戈尔巴乔夫见了面，“他不反对承认这10个共和国的决定，他正在现实地考虑问题。依照1922年协定，我们现在可以说十个共和国将签署这个协定，并且他们的决定是最终的。所以，这个中央组织将自然的终止”。简而言之，苏联将消失了。

我对叶利钦藐视戈尔巴乔夫有点担心，后者对苏联以及和平作了很大贡献。我提醒叶利钦我们与他和戈尔巴乔夫都较为密切地工作过多年，我说，“我们对他、谢瓦尔德纳泽和这些改革家们致以高度的敬意，历史将展现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希望事态能以温和的方式进行，“我保证，我以个人名义担保，总统先生，”叶利钦说，“每件事将在良好的得体的方式下进行。我们将给予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高度的尊重，每件事将是平稳和渐进的而不会有激进的事情发生。”

这个下午我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告诉他我们不打算干扰这个事情，“我特别关心你个人的问题，”我说，“我担心你是否能在这个对我们来说混乱的局面中发挥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愤怒是明显的，他很快地详述了从11月25日以来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们已经同意一个联盟协议草案，并且政府会议包括叶利钦也签署了决议案。这个协议已送给共和国批准，然后再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叶利钦协助我参与了所有阶段”，戈尔巴乔夫气愤地说，但明斯克突然发生的一切根本改变了道路。“两天里，我与他没有任何联系……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变化”，戈尔巴乔夫说他已尽了最大努力保持这个协议进程能延续下去，并且每件事能通过苏联议会走向一个积极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突然间让叶利钦改变了。在政治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尤其当一个人面临这样一个政局”。

人们正在说这个进程是个死胡同，但戈尔巴乔夫不明白为什么。除了乌克兰每个共和国都同意独立。“好了，所以乌克兰也想要独立了，”他说，“但乌克兰仍能成为经济和防御协议的一分子——这是克拉夫丘克向我指出的，并且现在正在变成他的行动。有什么不同呢？乌克兰可能成为联盟协议的一员。”事情正在从他预想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当他感觉到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联手是一种背叛时，他仍然固执己见。“我们是政治家，”他说，“我们面对事情不得不采取相应的行动。”

不管发生什么，戈尔巴乔夫想在宪法的框架内继续这一进程，“我将屈从于共和国的决定，”他说，“明斯克声明是在即兴演说中被公布的，这里有许多事情不太明朗。国家是完整的，现在被打碎了。”戈尔巴乔夫希望其他共和国能介入，也许还能反击俄罗斯和乌克兰推动瓦解前苏联。“许多法律问题是不清楚的，尤其是谁对外国和苏联的安全事件以及它的债务负责，独联体安全委员会的位子将交给谁？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像外行人在工作。”他抱怨说。

作为苏联总统，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我想戈尔巴乔夫个人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吃惊。他的权威消失了，“他们不接受我这个角色，”他说，“即便我不参与这事，但我明白这个处境。”他证实了叶利钦关于武装力量和控制之下的核武器的说法，“我如何明白自己未来的角色呢？”他问，“如果这个联邦是个不定形的组织，没有机构处理对外政策、防御和经济交互作用，那么我看不到自己所能承担的角色。现在，正如我看到的形势——我认为这个联邦是个错误——我们必须在这些共和国之间有一个更好的协调，否则将无法摆脱这种形势，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泥潭……”我不知道“更好地协调”是否意味着一个总统，一个为戈尔巴乔夫安排的位子。叶利钦已经系统地从戈尔巴乔夫那里把苏联脱卸下来。

结局很快到了。12 月 21 日，在阿拉木图，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其他共和国都签署了独联体联合声明。苏联已经没

什么东西了。

我的朋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圣诞节这天辞去了苏联总统的职务。那天早晨，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莫斯科时间下午5点整，我收到了他想和我谈谈的信息——一个“最后的通话”，我在戴维营拿起电话，当时我正在和家人度假。

他祝愿我和芭芭拉圣诞节快乐，说已给我写了封信，现在只想重申一下它的内容——他很看重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事，那时我还是副总统然后是总统。他不记恨苏联的瓦解和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只是看起来已经有些心力交瘁，他对他所热爱的国家感到茫然。

“在我们苏联这样一个国家产生这样的争执，把苏联从我认为正确的方向拉到不同的轨道上去了。”他坦言，“但是我告诉你我将用我的政治权威和地位来保证这个新联邦是有生命力的。我很高兴在阿拉木图联邦的领导人已经讨论了重要的核武器战略协议。我希望在明斯克他们能作出决定在共和国之间确立一个合作机构。”

他担心他国家的命运：“乔治，让我来告诉你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事，当然，这需要改变你对所有这些国家的看法，我想让你重视这些联邦的前途，这样解体的过程就不会变得很糟，所以推动这些共和国间的合作进程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的确要着重向你强调这点。

“现在，关于苏联——我们谈话的第二个着重点。放在我桌面上的辞呈有个苏联总统令，我将同时辞去总司令的职务，并且把使用核武器的权力移交给苏联宪法总统。在宪法过程还未完成之前，我仍在管理一些事务。可以向你保证，每件事都在严格的控制之下，一旦我宣布这个辞呈，我就公布这个法令，这是分不开的。你应该有一个平静的圣诞之夜。其次，关于苏联，我说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支持它，我做这些是为了支持苏联，但是我们的伙伴也应该这么做并且应该充当一个帮助和支持它的角色。

"至于我，我不想躲进深山老林中，我将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我的主要意图是在世界事务中推进改革和新思维进程。住在这儿的贵国公民问我个人同你的关系，我想让你知道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我非常看重我们在一起的合作、我们的伙伴关系和友谊。我们的地位可能会改变，但我想让你知道我们的关系是不会变的，赖莎和我向你及芭芭拉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米哈伊尔，"我回答，"让我首先说听到这个电话我是多么地感动……我们将停留在一个复杂的境地，尤其是俄罗斯今年冬天一些庞大的问题有可能变得糟糕起来，我很兴奋地听到你说你不躲进深山老林之中并将继续留在复杂的政治和公众之中。我完全相信这将对新联邦有益。"

"我已经给你写了封信大概你今天可以收到，在里面我表达了我坚信你的所作所为将载入史册并将受到历史学家们的高度赞扬……米哈伊尔，就个人方面，我注意到关于你和我关系的一个极好的和坚固的声明，这种关系也包括你同吉姆·贝克，我非常赞成，因为那的确也是我感觉到的。你知道我现在又到了戴维营，我和芭芭拉以及三个孩子的家庭在一起……你上次扔套环马蹄铁留下的痕迹仍然完好地留在那个地方，所有这些提醒我在信中告诉你，我希望我们不久还会见面，在这里你永远是受欢迎的。的确，我重视你在短时间内列出这些事情的忠告，也许我从戴维营回来能立刻做它。但无论什么事情，你提到的友谊——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依然是一样坚固的并且会随着事情的展开还会继续坚固下去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我将给予俄罗斯领导人及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以充分的尊重——坦率地、有说服力的并且对进步满怀希望的。我们将推进认识，给每个有自己主权的国家以更大的尊重，我们将和他们在广泛的事务中工作，正如和你在那个方向积极工作一样。但是，没有人阻碍我保留和你的联系，无论你的新职务是什么，欢迎来自

你的建议,而且要一如既往地保持芭芭拉和我都非常非常看重的这个友谊。

"因此,在一年中的这个特殊日子和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向你致敬并感谢你为世界和平所做的一切。衷心感谢!"

"谢谢你,乔治",戈尔巴乔夫说,"今天我很高兴听到这些,我要挂电话了,你已经对我说了许多重要的事情,我感谢你。"

"祝福你,米哈伊尔。"

"再见!"

当我们放下电话后,我把我吐露出的关于这些年间许多的思绪又说了一遍,录进了那个小小的收录机中。

这是一个好朋友的声音,是一个历史将给他巨大荣耀的男人的声音。

这个电话是非常动人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录。我向他提到戴维营并且想让他再回到那儿——那个他从前掷半圆形马蹄铁的地方——我想他愿意,但这是我的感觉。虽然我不想太伤感或者太感情用事,但是这样的一个电话,让我一字一句地感到自己像被真实的历史所缠绕,那些事是重要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帝啊,能生活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真幸运——我们有这么多的恩赐。